1912年（民国元年）

四川代表参加临时议会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此前，1911年12月29日，已宣布独立的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的临时议会上，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四川代表黄复生、李肇甫、熊成章（均为同盟会员）参加了会议。1912年1月23日，上述四川代表当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

四川军政府发行军用票、铜元票

1912年1月1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四川银行”，发行军用银票，额定300万元（实际发行1500多万元），分一元、五元两种，规定每元换钱1000文。票面注明一年内不兑换现银。四川银行既无资金，更无发行准备，开了四川军阀无资金准备发行纸币的先例。同时又由财政司利用钱庄，发行100文、200文、500文三种铜元兑换券，每军用票一元换铜元票1000文，共发行铜元券124万吊（每吊千文）。所以民国建立之初，成都市面即出现银元券、铜元券两种纸币。

军用票发行初期，重庆大汉银行等金融机构拒绝使用。经商会调解后，以3∶7搭配银元使用。一年以后，收兑军用券的诺言无法兑现，信誉丧失，券值下跌至三、四折。1914年，商准由盐税项下搭收三成军用票，共计回收300余万元销毁。1915年陈宧主川，决定以浚川券和中行券（分别为浚川源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川分行发行的纸币）按票面值五折回收军用票，连前项共收回军用票1390万元，铜元票122万吊，才勉强平息了军用票风波。

熊克武筹建蜀军

1912年1月9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命令熊克武、黄复生等接收存沪之川汉铁路股款，筹建蜀军，参加拟议中的北伐。不久，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北伐中止，熊、黄乃率蜀军三营入川，向传义被熊任命为营长，率部抵宜昌待命。不久，向入保定军校一期。3月15日抵渝，由重庆军政府扩编为蜀军第一师，熊克武任师长。同盟会又荐黄复生继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为四川都督尹昌衡拒绝，尹任命胡景伊出镇重庆。3月下旬胡率卫队抵渝，与熊克武所部蜀军对峙，隔江为阵。胡上任未遂，乃返蓉，熊克武遂镇守重庆。

1912年3月上旬，中国同盟会任命熊克武为四川支部长（各省分设支部长一人）。

彭家珍炸良弼

1912年1月27日凌晨二时许，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西城红罗厂附近炸伤清禁卫军统领兼军谘使、宗社党党魁良弼。家珍亦被当场炸死，良弼于29日伤重毙命。良弼是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坚持保皇立场的清廷实力派首脑。他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成为孙中山推行民主革命的两大障碍。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的彭家珍与同志密议，决策诛杀袁世凯、良弼等首恶。1月16日炸袁世凯未成，袁遂闭门不出，防范森严。彭乃将目标转向良弼，经过周密准备和调查后，他化装成清军军官，暗藏炸弹，以谒见为名，成功地炸死了良弼。良弼死后，宗社党作鸟兽散，清宗室再无人敢对抗革命政权。

孙中山高度评价了彭家珍壮烈事迹，以大总统名义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其故乡原金堂县城即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至今仍有彭家珍大将军专祠，受到人民政府保护。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次日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在北京就任，11日南京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试图以此约束袁世凯的独裁行径。

川剧艺人合组三庆会

1912年2月，由人称戏圣的康芷林、名旦杨素兰、名小生李甲生、名丑唐广体发起，邀请长乐、宴乐、怡乐、翠华、彩华、桂春、太洪、舒颐八大班部艺人刘芷美、谭芸仙、萧楷臣、周名超、刘世照、周辅臣、贾培之等180余人在成都联合组成第一个由艺人自由结合、自主经营的川剧演出团体——三庆会。康芷林阐明三庆会的宗旨：“脱专压之习，集同业之力，精研艺事，改良戏曲。”

三庆会艺人康芷林、杨素兰、刘芷美、萧楷臣、唐广体等，在民主革命思潮影响下，力主将代表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的主要班部舒颐、翠华、太洪、宴乐都纳入三庆会，融五种声腔于一体，同台演出。在三庆会成立时，艺人们请警察总监杨维题辞为：“联合升平堂，协力三庆会”。

三庆会实力雄厚，荟萃了当时成

都剧界名伶，齐集了川剧各派声腔，在同台演出中各展其长，表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诸多个性特征，给成都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由于三庆会废除了狭隘的班部、剧目限制和陈旧的包银制，实行开放式兼收并蓄自由结合体制和体现按劳取酬的分帐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使艺人们同心协力，互相切磋，不断提高，大大促进了川剧事业的发展。

三庆会在历任会长著名艺人杨素兰、康芷林、萧楷臣、贾培之精心组织和全力支撑下，其演出活动延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中国社会党在渝成立四川支部

1912年3月6日，以陈翼龙、江亢虎为领袖的中国社会党在重庆成立四川支部。这是民初川省新兴党派中成立最早的组织。社会党四川支部主要领导人是唐廉江，骨干成员有燕梓材、周文钦、何子桢等。唐廉江与重庆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曾积极支持革命，光复后又率先联系省内外同志组织北伐军。四川支部成立后，在渝兴办《国是报》，依据该党党纲支持共和制度，鼓吹人权，号召废除世袭遗产制度、普及平民教育、限制军备及奖励卓越劳动，废除除地税外的一切税收等。唐廉江又联络哥老会，组织“汉流唯一会”。该党上海本部曾在天津吸收李大钊和劳动群众入党，积极响应孙中山、黄兴的革命活动。次年因投入反袁斗争，遭到镇压，陈翼龙牺牲，江亢虎变节。社会党四川支部遂销声匿迹。

成渝两军政府合并

1912年3月11日，成渝两地军政府正式合并，称“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

先是，1911年11月27日成立的以蒲殿俊为首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在12月8日的兵变中解体。原军政府军事部长尹昌衡因平息兵变有功，于12月9日被推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与此同时同盟会在渝的负责人张培爵、杨庶堪等，与率新军一部由蓉东下的夏之时部配合，推翻当地清政府，建立蜀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分任正、副都督。

1912年1月27日成、渝两军政府代表于荣昌会晤，商讨合并条件，旋到渝签订《成都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协议合并草约》。决定以成都为四川省会，重庆设镇抚府，直隶都督府。2月2日经双方盖章批准生效，通告成渝合并；南京临时政府予以承认。

3月11日尹昌衡、张培爵在成都正式就任合并后的“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正、副都督。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董修武任都督府总政务处总理兼财政部长，谢持任副总理，杨庶堪任外交部长，杨维任军事巡警总

监部总监，王祷昌任参谋部长，以上均为同盟会员。此外，新军军官周骏（平定成都兵变有功者）任军务部长，罗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知名人士邵从恩，沈宗元、郭开文、邓孝可等分长政务、教育、交通、盐务等部。

3月18日，重庆镇抚府总长夏之时要求辞职出国留学，四川都督府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各省都督，宣布接受夏之时辞呈，另委四川陆军军团长胡景伊接任重庆镇抚府总长。3月22日，夏之时通电四川都督府，在胡景伊接任前，暂代重庆镇抚府总长。同时，夏之时通电全国和四川都督府，宣布依照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协议，任命同盟会员、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为重庆镇抚府师长，统率镇抚府全部军队。

孙中山大总统令陆军部抚恤邹谢喻彭四位烈士

1912年3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令陆军部对烈士邹容、喻培伦、彭家珍准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谢奉琦准照陆军左将军阵亡例赐恤，均崇祀忠烈祠，以慰忠魂而垂不朽。

邹容（1885～1905年），巴县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著作《革命军》的作者。1903年7月被清政府和外国反动势力逮捕，1905年4月在残酷迫害下，死于上海租界狱中。

喻培伦（1886～1911），内江县人，早期留日学生，1911年3月29日参加同盟会领导的广州起义，英勇牺牲，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功绩卓著者。

彭家珍，（1888～1912年），早期留日学生。1912年1月参与京津同盟会诛杀袁世凯、良弼、载泽的决策，1月27日凌晨手掷炸弹炸伤良弼（不久伤重死去），自己也壮烈牺牲。

谢奉琦（1884～1908年），荣县贡井人。1908年初，同盟会发动叙府（今宜宾市）起义的领导人，事败被捕，同年3月从容就义。

入川滇军侵扰川南，革命党人黄方被杀害

1912年3月，入川滇军杀害蜀军政府官员。

1911年10月云南独立后，滇军以“北伐”和“荡平匪乱”为由派兵入川，先后有三个梯团之众（一梯团约相当一师）进入川南。1912年1月上旬，古蔺县发生原清军巡防队屠杀川省同志军首领和蜀军政府人员事件，蜀军政府照会入川滇军“进剿”；湖北军政府亦有邀滇军经川、鄂诸省赴河南“会同北伐”的电示。滇军遂藉此占据叙府（今宜宾市）、自流井（今自贡市）一带，委派地方官，把持盐税，复进窥成都，尹昌衡派出川军抵拒，两军相持。

1912年2月下旬，南北议和，南京政府令罢北伐之师。蜀军政府馈赠驻川滇军白银30万两，敦促其撤回云南，云南都督蔡锷同意撤军。3月9日，滇军一部偷袭合江县城，惨杀隶属于蜀军政府的川南军分府司令黄方及随同官兵、士绅共118人于合、泸道上。黄方为老同盟会员，曾与熊克武、杨维等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策划成都起义，事泄被逮，光复后出狱，主持泸、合一带军事。除黄方被冤杀外，滇军还先后藉词杀害辛亥保路有功的自流井民军统领周鸿勋、富顺司令范华斋，囚禁大足、富顺民军统领张桂山（原农民起义军余栋臣部首领，辛亥革命后一度任富顺都督），川南纷扰。惨案发生后，滇军在各方压力下，陆续撤出川南。

四川田赋开征

1912年3月，清理田赋旧制，改定四川田赋征收办法：将地丁定为正税，津贴、捐输和新加捐输合并为副税，其他火耗、羡余、津捐节存等加征名目取消。正税和副税仍按原征银额摊派。年征田赋定额，全川共银430万两，其中，副税银363万余两，相当于正税的5倍多。田赋由县征收课办理，以征收库平银为准。自1914年（民国3年）起，一律改征银元，每两库平银折征银元1．60元。

同时变更边屯收入所采征收本色及折色和三贡品折银等办法，一律比照内地，改折为元征解。

1915年，四川修改民元所定《征收国家正副税暂行简章》，通令各厅县对载粮8分以下的“畸零小户”，一律摊完副税。为弥补收回军用票“折耗”，以本年开始随赋带征专款，规定每正粮1两，带征银洋1.8元，全年全川共收100余万元。自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地方税草案，允许在不超过正税税额30%的范围内征收地方附加后，四川各县纷纷开征田赋附加。因省财政厅无法全面控制，各县实际附加超过上项规定的最高限额者，逐渐增多。

四川造币厂滥铸减色铜元

1912年4月26日，四川财政司与成都造币厂联合通告，添铸每枚重五钱的当50文铜元一种。同时，造币厂改铜元成色为铜七铅三（清代铜元铜九五），当20文铜元减重为三钱（原为四钱）。

1913年，军用票贬值，成都钱荒，军政府下令铸造当100文（重五钱八分）、当200文（重七钱）大面值减重铜元。其铸造数额：当100铜元960余万枚，当200铜元195余万枚。同时，重庆铜元局也开机铸造。

由于大额减重铜元获利甚厚，军政府又令停铸小面额铜元，加紧铸造当100、当200文铜元，以搜括民财。

四川省临时议会成立

1912年7月1日，四川临时省议会在成都纯化街开幕，选出前清状元、曾任广东学政的骆成骧为议长，邓孝可、胡骏为副议长，姚弼宪为秘书长，议员计292名，原立宪派人士占多数。此后各县相继成立县级临时议会。

1912年8月，北京政府正式公布由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按规定参议院议员由各省议会选出，四川名额为10名；众议院议员由各地方人民直接选举，四川名额为35名。9月，公布《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和各省名额，川省应选出省议员140名。预定1913年春正式成立国会和省议会。

同年11月17日，四川省临时省议会议决通过《四川省临时省议会法》。

四川省临时议会维持到1913年3月底，筹备第一届省议会时结束。

尹昌衡西征，胡景伊窃取川政

1912年7月10日，四川军政府都督、征藏军总司令（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尹昌衡，率部2500人，从成都出发西征。行前他推荐胡景伊护理川督。

尹昌衡西征的原因是：本年4月，西藏统治集团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唆使下，策划“独立”、“驱汉”，武装叛乱。围攻驻拉萨等地川军。英国又以保护商务为借口，乘机出兵侵占西藏江孜、亚东等口岸。西藏统治集团派兵进攻川边，攻陷理塘，围攻巴塘，逼近打箭炉，川西震动。尹昌衡出于爱国热情，表示“自愿率兵前往，亲冒矢石，以定边乱，恢复西藏。”边藏诸部落得知他是诛杀赵尔丰的大将，“畏之如虎”，西征战事节节胜利。

胡景伊，巴县人，清末曾在川办理军事学堂，民初川军将领多为其学生。1911年（清宣统三年）任广西新军协统，尹昌衡与之过从甚密。武昌起义后胡经沪返川，参与川、滇军之间的撤兵调停事宜，回成都后，尹希望利用他的资望壮大自己的势力，故予重用。1912年2月27日，尹任命他为四川陆军军团长，统率四川军政府陆军。

1912年3月，尹任胡为重庆镇抚府总长。7月，尹昌衡率部西征，行前向北京政府推荐胡景伊为护理四川都督。袁世凯素知胡非同盟会员，又与革命党人有旧怨，乃顺水推舟于1912年7月12日任命胡景伊护理川督，并借“军民分治”之名，贬副都督张培爵为民政长，旋又以咨询为名，召诱张培爵入京加以软禁。令胡景伊兼任民政长，胡遂独揽四川军政大权。胡上台后，一面利用军事学堂师生关系拉拢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第四师师长刘存厚，结成亲胡实力，一面派亲信赴京向袁世凯及其左右行贿输诚，

表示效忠；同时秉承袁的意旨，竭力破坏民主政治。11月胡捕杀前《蜀报》主笔、知识界名人朱山。又先后迫使都督府财政司长董修武和全省巡警总监杨维辞职（董、杨均为同盟会员），改组民政长公署，安置亲信，迫害异己；又扣发西征军饷械，对驻渝的熊克武川军第五师百般刁难、歧视；滥发军用银票，搜括民间资财，持有银票者兑换无期，拒用者遭到血腥镇压。

1913年6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胡为四川都督，斥尹为川边经略使。

民初四川陆军的建置

1912～1917年，是四川陆军的形成期。民初四川陆军来源于清末新军、巡防军、保路同志军；军官则来自光宣之际由日本士官学校和四川陆续开办军事学堂培养的士官生。

1911年11月，成渝先后独立。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后，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罗纶将陆军编为3个镇。原十七镇新军改为第一镇，由宋学皋任统制；将保路同志军收编为第二镇，由彭光烈任统制；原巡防军改为第三镇，由孙兆鸾任统制。不久，刘存厚打着援川旗号由滇返川，组成陆军第四镇。尹昌衡与刘存厚同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

1912年4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根据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军制改革命令，废镇改师，四川陆军1～4镇改为1～4师。原重庆蜀军政府所辖蜀军第一师（由熊克武等创建的新军），改为四川陆军第五师，陆军五师中，1～4师均由袁世凯的信亲胡景伊控制，国民党掌握的仅熊克武第五师和蜀军两个团。

1913年二次革命中，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成立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与川军一、二、三、四师作战。结果讨袁军失败，土崩瓦解，熊克武等离川东下。

1915年7月中旬，袁世凯亲信陈宧继胡景伊主持川政后，将川军整编为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

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周骏，辖第一步兵旅旅长张邦本（下设二个团），第二混成旅旅长熊祥生（下设二团）；辖骑兵第一团团长鄢孝鸿，炮兵第一团团长唐廷牧。

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辖第三步兵旅旅长钟志鸿（下设二团），第四步兵旅旅长雷飙（下设二团）；辖骑兵第二团团长宁绍武、炮兵第二团团长杜永泳。

四川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黄鹄举。

四川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钟体道。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为了加强抗击护国军的力量，改川军第一师为国军第十五师，并扩充军实，师长

由王陵基充任。其编制为：第十九旅，旅长熊祥生；第三十旅，旅长黄鹄举。下辖陆军4团，炮兵、骑兵各1团，工兵、辎重、补充营各1营。原师长周骏督理四川军务。

1916年8月，护国战争胜利后，护国军总司令蔡锷报请北京政府批准，对川军和驻川滇黔军进行改编，调整驻地。

川军第一师驻合川，师长周道刚；川军第二师驻成都，师长刘存厚；川军第三师驻川西北，师长钟体道；川军第四师驻川西，师长陈泽霈；川军第五师驻重庆，师长熊克武兼重庆镇守使。

其它举义各军，石青阳部驻川北顺庆（今南充），黄复生部驻荣昌、隆昌一带。

舆论开放，报刊蜂起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舆论开放，全国报刊如雨后春笋，一时形成生气蓬勃的思想启蒙运动。当时成都刊行的报纸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都督府政报》、《四川独立新报》、《蜀江报》、《蜀风报》、《民鉴日报》、《大岷报》、《鸿音报》、《西成报》、《寰一报》、《民极报》、《新民语》、《牖民白话报》、《民主急进报》、《禾民报》、《社会新闻》、《白话进化报》、《民意报》、《益风报》、《大汉国民报》、《共和日报》、《公论日报》、《演进报》、《女界报》、《西蜀新闻》等。

这些报刊尽管政治倾向有差异，但多数是以宣传民主政治、批判封建专制、提倡自由平等为宗旨。这些报刊发表的论说、新闻的鲜明特点是直言不讳、尽情倾吐。如1912年6月创刊的《女界报》在发刊辞中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三从之外，又加七出；束缚压抑，惨无人理；谬种流传，积非成是"。呼唤妇女，"自当一扫从来屏息低首，宛转依附，深闭幽锢，卑鄙污贱之戮辱桎梏；发奋而起，以光复神圣之女权。"宣传民主政治、启迪民智是这些报刊的又一特点。如同年10月创刊的《西蜀新闻》在发刊辞中提出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融和党见等办报宗旨。

四川报界公会成立

1912年四川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团体四川报界公会在成都成立。《四川公报》负责人樊孔周是该会发起人。会址设在川北会馆内。报馆及记者、编辑均可入会。会员每周聚会一次，研究交流情况，协调和商讨共同应付当局限制舆论的策略。1913年袁世凯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凡是不受他节制的报纸，就千方百计迫使停刊。当时成都只剩下掌权的共和党办的三家报纸，四川报界公会无形中消失。

重庆大火，川江洪水

1912年7月31日，重庆市区发生特大火灾，全城房屋焚烧达1/5，公私财产损失达白银100万两。

同年夏秋之际，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发生洪灾。

7月7日夜，灌县岷江洪水泛滥，淹没大片田园。8月上旬，五里坡突发洪水，居民逃避不及，所有田地房屋被淹没，金马桥山洼处停放溺毙尸体60余具。

7月中旬，苍溪县大雨连天，嘉陵江上游洪水暴涨，旺苍坝、庙二湾等处田庐冲毁大半，人畜损失重大。

胡景伊铸造川版银元

从1912年8月开始，川督胡景伊鼓铸正面有“军政府造”字样，背面篆书“汉”字的川版银元。到1915年5月陈宧入川时止，共铸了约1300万元，其中仅有5万余元的一、二、五角币，其余均为一元的大洋。初铸时含银量较高（大洋银九铜一；角币银八二，铜一八），币值稳定。

共和党四川支部成立

1912年8月18日，共和党四川支部在成都铁路公司举行成立大会，由四川已有的统一党、民社党、演进党、政进党、政济党、民主党、国民经济会七团体代表组成。推出胡景伊、黄云鹏、印焕门、张子梁、刘冕5人为常务干事，裴钢、杨光护等30人为干事，由朱大镛代表胡景伊主持党务。改重庆国民共进会总部为共和党四川支部重庆交通处。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第四师师长刘存厚均为共和党员。该党鼓吹“本党以力谋统一，巩固中央政府为主义”。无条件支持袁世凯政府，反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办有《共和日报》。共和党四川支部以旧官僚、政客、豪绅为骨干，受军阀操纵，代表了袁世凯在川势力。

国民党四川支部在成都成立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在北京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五政团合组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五条为政纲。9月，四川同盟会员根据国民党总部指示，组成国民党四川支部，设机关于成都廉官公所街原周善培宅院，张治祥、董修武任正副支部长，下设党务、交涉、庶务、评议、财务、文书六部；创办《四川民报》，以文书部负责人谭创之任总编辑，宣传国民党主张。

四川川汉铁路让归国有

1912年11月1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核准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代表与

交通部商订的《交通部接收四川川汉铁路合约》。该合约规定：川汉铁路公司所有宜万段全线工程地段、机材、厂房等，照川路股东会议议决办法让归国有。此外，川汉全线（成都至万县）也依法办理。但此路若不作为国道干线，得仍归公司承办。公司现存路款，照股东会议议决办法，由公司自办实业。其余财产及债票，由国家负责归还公司。宜昌路工所发包工工价公债票及所欠各洋行料价、鄂军饷粮借款约90余万两，前项由国家偿付，后者由公司自行经理。凡公司直接间接用于路工之款，均由部给预定期票，年息6厘，分10年和15年还清。上海倒帐之款，公司自行清理。

袁世凯政府侵吞川汉铁路公司资产从此开始。

四川开始实行公库制度

1912年11月，四川军政府财政部制定《金库管理程序及办法》，决定在四川银行内设立四川省金库，重庆设分金库，办理全省公款出纳、保管事务。四川银行撤销后，金库业务交由浚川源银行代理。这是四川实行公库制度的发端。但在“防区制”时期，公库制度事实上无法实施。

英商成立白理山货出口洋行

1912年英商白尔理与重庆买办古学渊合办白理山货出口洋行，注册资金银5000两，行址设白象街。白尔理负责向上海外国洋行接洽卖货，货源完全来自买办企业《同茂丰》所攒积的各类山货和加工洗制的大批熟鬃。同茂丰山货字号成立时，资本银10000两，古绥之投资5000两，该字号设文华街，李叔堃任经理，开始主要经营猪鬃洗房，出产“虎牌”商标熟鬃，产品完全由白理洋行收购出口。

川盐实行自由运销制

1912～1913年，四川军政府盐政部长邓孝可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食盐运销制度，以平均利润代替垄断利润，对川盐实行自由运销制。征税定章规定：1. 破除前清引岸，实行就场征税，一税之后，任其所之；2. 从前按引收的课税、羡截和各类杂捐一概废除，仅就旧税中计斤抽收的正税附加税6项、厘钱，照各厂实收数目，每斤超过10文者，减收一半；10文以下者酌减收数，最低不少于5文。3. 配运销手续仍照从前办法。

四川外贸概况

1912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数达24607002元，出口达17262819元，进出口货值总数41869821元。入超7344183元。

重庆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口税35245元；出口税544450元；复进口税16268元；内地子口税进3480元；

税收总额599443元。

本年上半年，因成渝两军政府对峙，政局动荡，洋货直接进口和转口（复进口）大幅度下降。下半年出现转机，洋布获畅销之利。煤油进口增加。土货中，土药（烟土）几乎从市场上消失。生丝出口增加，价格下降。中药材需求量增加，但供应不足。猪鬃销量上升，价格涨近一倍。

四川人口及耕地概况

1912年据国民政府主计处及立法院《统计月报》（载1933年《申报年鉴》）统计，四川省人口数为48129596人，191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农经科编《农情报告》测算全省耕地面积，为91021000亩。

1913年（民国2年）

四川筹建地方财政

1913年1月1日，根据北京政府财政部颁布的国家税、地方税税法草案及国家费用、地方费划分标准的规定，四川开始建立地方财政，实行省预算决算制度。11日，北京政府决定设立四川国税厅筹备处，任命蔡镇藩为处长。筹备处于5月正式成立，主管国税征解。1914年6月，大总统令撤消国税厅筹备处及省财政司，改组为财政厅，所管国家税由财政厅代征。11月，四川省财政厅正式成立。

北京政府颁布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废府、州、厅，省下辖县

1913年1月8日，北京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废除府、州、厅建制，省直辖县。成都废府后，省直辖成都、华阳等县。重庆废府后，市区称巴县，江北厅改江北县，合州改合川县。

次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公布更改各省重复县名清单，四川部分重复县名亦被更改。如重庆市所辖东安县，改名潼南县。

尹昌衡倡议尊孔读经

1913年夏，原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致电袁世凯，倡议尊孔读经。电文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其大公至正固足以范围乎万世也。"请袁世凯令全国学校尊孔读经。袁世凯正要恢复专制统治，对尹昌衡电文大加赞扬，夸他"所见极为正大"。同时，封建文人曾学传在成都发起组织"孔教扶轮会"，旋改为孔教会成都支会。6月各县成立支会者20余

处，并于年底向国会请愿，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徐炯也倡导成都、华阳两县成立孔教会支会；后于1918年改立“大成会”，自任会长，鼓吹尊孔读经，恢复名教纲常。1914年，曾经是改良派代表的宋育仁，与清朝遗老劳乃宣等在北京公开宣讲尊孔复古，公然主张清帝复辟。此后徐炯又主持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继续鼓吹尊孔读经。

四川省第一届省议会选举

1913年1月26日，全省分七区选举第一届省议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共和党及地方乡绅斗争激烈，最后选出省议员140人，其中，国民党70人，共和党60人，民主党10人。议长胡骏，副议长朱大镛、唐宗尧，秘书长张省承等七人。

1月31日，四川省选出参加国会众议院的议员35人，国民党占了17人。议员中有国民党人熊成章、张知竞、李肇甫，民主党人肖湘、张澜，蒲殿俊等。

2月26日，第一届省议会开幕，出席议员119人。因选举议长发生争议，国民党推杨庶堪，共和党推朱大镛，民主党推胡骏，参加竞选。杨、朱各得54票，胡得10票。因均未超过半数，选举无结果。依法胡已无再被选资格。3月1日省议会开会复选议长，出席议员123人。护理川督胡景伊为排斥异己，以武力威胁议员，强迫投票，使胡骏以63票当选议长。3月7日勉强选出胡景伊的党羽、共和党员朱大镛和国民党员唐宗尧为副议长。3月18日，游运炽等74名省议员，电京纠举胡景伊违法炮制，否认胡骏的议长资格。袁世凯政府包庇胡景伊，于3月27日、4月3日、19日连电四川督府，强行维持原议，以打击国民党在川力量。

第一届省议会活动时期为1913～1918年。

恢复征收关税、厘金

1913年2月24日，北京政府电示各省在税制改革前，征收税课应照原章程办理。四川对已废除的关税、厘金先后恢复征税。常关税继续征收；厘金改按统捐征收，税率按估定成本价额，值百抽二，1915年6月起改为值百抽二点五。

民主党四川支部成立

1913年春，以四川原立宪派为核心的四川共和建设讨论会，改组为“民主党四川支部”，推胡骏、邵从恩为正副支部长，罗纶、邓孝可、张澜、沈宗元等人为骨干。先是，1912年8月湖北汤化龙等立宪党人，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联合其他团体组成民主党，推梁启超为党魁。四川原立宪派胡骏等即组织相应机构成为民主

党的地区组织，也是民主党四川支部的前身。

国务院批准四川将府、州、厅一律改县

1913年3月29日，遵照大总统颁布《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法》规定，兼署四川民政长胡景伊经呈请国务院批准，将府、州、厅一律改县，懋、松七厅名称暂行旧制。原川省共有十二府、九直隶州、三直隶厅、十一州、七厅，合计42个行政单位，均改县制。

袁世凯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

1913年6月13日，袁世凯政府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先是，胡派亲信赴京向袁表示效忠，并行贿袁世凯左右以求内援；同时极力向袁密告尹昌衡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被袁倚为心腹。6月15日旅京川人反对胡实授四川都督，公举清末护理川督、同情保路的王人文为川督，遭袁拒绝。四川省议会内亦分拥胡与迎尹拒胡两派。国民党与民主党合作拒胡，支持尹昌衡率兵返省城复职。四川各法团联合会刊布传单，声讨胡蹂躏议会、破坏法津等十大罪状。胡则策动川军第一师、第四师拒尹回任，并迫害反对派实行白色恐怖。进步党人、省议会议长胡骏、议员邵从恩等畏祸离川，副议长国民党员廖宣尧也逃出成都；国民党主办的《四川民报》总编辑谭创之被捕下狱，党人张捷先、徐回天、李俊侠等人被杀害，国民党四川党部被查封；主张迎尹拒胡的省议员纷纷逃离省城。尹昌衡与胡妥协，回康定就任川边经略使。胡景伊于7月15日通电接任四川都督。

裁撤川边镇抚府，改置川边经略府

1913年6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川边镇抚府，改设川边经略府。四川都督尹昌衡改任川边经略使。镇抚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四司同时撤销，改置边东、边西两观察使。

川边镇抚府是民国元年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设立的。

进步党四川支部成立

1913年6月，进步党四川支部宣告成立。进步党的前身是民主党。民主党是以清末立宪派、东南地区绅商为基本力量，于1912年8月建立的，该党推举梁启超为领袖，提出民主、共和、建设等基本政纲，与共和党、国民党鼎足而立，成为民国初年国会重要政党。

1913年夏，袁世凯授意梁启超等人把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等合并为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民主党四川支部根据北京本部电示，亦与共和

党四川支部酝酿合并（川省无统一党），因支部内有人反对合并，故于6月22日开大会议定，先行改党，定名为进步党四川支部。

二次革命，熊、杨讨袁之役

1913年8月4日，驻重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省议员杨庶堪响应黄兴、李烈钧等在江苏、江西的讨袁军事行动，在渝宣布独立。熊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杨分管民政。熊克武领衔发表《誓师文》和《告四川省军界同胞书》，声讨袁世凯篡国大罪和胡景伊“助纣为虐、毒害川民”等罪行。讨袁军分兵，一由中路取道永、荣攻泸县，一由水路取道合江攻泸县，企图两路攻下泸县后进取成都。胡景伊亦迅即调兵遣将反击，川省讨袁战争遂爆发。胡景伊的兵力有川军第一、二、三、四师及模范团，其中，最为卖力的是第一师周骏部（原清末新军第十七镇）和第四师刘存厚部。

熊克武讨袁军中路之师连战皆捷，进围泸县。附袁之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逃奔纳溪，急电黎元洪求援。8月20日黎元洪电示胡景伊，称援川之鄂军、陕军即将分道入川。北京袁世凯则早于12日已下令川、陕、鄂、滇、黔各省都督合兵会攻讨袁军。

9月12日，黔军黄毓成部自綦江乘虚进占讨袁军后方大本营重庆，熊、杨仓惶出川去上海。北京政府旋任黄毓成为重庆镇守使，特授勋五位，酬其功。先是，四川讨袁军北路之师虽一度进抵顺庆，但后为胡景伊部击溃，合川亦不守；各地响应讨袁的义军，如打箭炉张煦部，绵阳张伯祥部，荣县王天杰部，开江颜德基部，酉阳邹杰和阆中母剑魂等部，均被各个击破，先后败亡。奉袁命援川之滇军进犯川南，陕军由夔门逼万县，鄂军亦溯流而上，下川东告紧，讨袁军四面受敌，讨袁之战遂失败。

胡景伊以查禁“乱党”为名，大肆镇压异己

1913年8月4日，胡景伊发布《查禁乱党令》，称倡导“二次革命”的国民党为“乱党”，用以作为镇压反袁势力的法令依据。讨袁军失败后，熊克武、杨庶堪、龙光，但懋辛等122人被通缉，家产被抄没；许多国民党籍的军政人员和参加讨袁军的人员被屠杀；并广为株连，仅“重庆一处，株连至300余家”。10月15日，袁世凯以胡景伊镇压反袁起义有功，特授勋二位。

冕宁地震

1913年8月中旬，冕宁发生地震。城圮，石桥震塌，城内观音塔震倒一半，房屋墙壁大部分倒塌。冕山东山山崩地裂，泸沽土山崩垮，树木震倒，死数十人。据现代科学推测，地

震震中位置在北纬 28°4′，东经 102°3′，烈度 8 度，震级 6 级。

民初滇黔军入川

辛亥革命后，滇军以援助四川革命的名义进入四川，在叙府（宜宾）泸州一带攻击革命政权和同志军，劫夺税款，委派官吏，建立独立王国。

1913 年 8 月 12 日，当熊克武在重庆独立，举起兴师讨袁义旗后，袁世凯斥责熊克武“附和乱党”、“图谋背叛”，除责成胡景伊严拿征办外，并令湖北、陕西、云南、贵州四省都督移师讨伐。

9 月中旬，陕军张钫部由长江经夔州进趋万县，下川东告急。滇军叶荃部进至宜宾，霸占自流井，劫掠盐款，使讨袁军南面受敌。黔军黄毓成部攻陷綦江，直接威胁重庆。由于黄毓成部、川军王陵基部攻占重庆，讨袁军土崩瓦解，四川“二次革命”失败。

9 月 14 日，胡景伊电告黎元洪，重庆战事结束，请转令滇、黔、陕、鄂各军停止前进。9 月 17 日，袁世凯任命黔军旅长黄毓成为重庆镇守使。20 日，川军周骏、刘存厚两师前锋到达浮图关。21 日，川军王陵基部与黔军黄毓成部在城内发生冲突，双方开展巷战，居民死三四百人，大量街房遭到焚烧。王陵基被迫撤往江北。

9 月 30 日，北京政府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重庆镇守使。10 月 5 日，由袁世凯汇给黔军黄毓成部军费银 20 万元，奖银 3 万元，黄毓成才勉强率部回黔。

1915 年底，护国战争爆发。1916 年 1 月初，护国军第一、二军总司令蔡锷、李烈钧分兵向四川、广西进军；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留驻云南。袁世凯得到警报，迅速派遣北洋军三师师长曹锟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统率第三、七、八师入川占据重庆，抗拒护国军。

蔡锷率领的入川护国军第一军下辖赵又新、顾品珍、刘云峰三个梯团，分率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邓泰中、杨蓁六个支队，共计 3000 余人。罗佩金任第一军参谋长。

1 月 27 日，护国军右翼司令戴戡率黔军 6 团由綦江入川，与北军相持于綦江附近。

1916 年 8 月，护国战争胜利后，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在整编川军的同时，也对入川滇、黔军进行整编。

滇军第一师（又称川军第六师），师长顾品珍，驻川南；滇军第二师（又称川军第七师），师长赵又新，驻川东。

黔军总司令戴戡，驻重庆、万县。

不久蔡锷病重赴日，罗佩金以代理督军身份总揽四川军政大权。同年 9 月 18 日，北京政府任命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

云南唐继尧为控制四川，护国战后又陆续派滇军入川，滇军总数达到3万余人。贵州刘显世亦步其后尘，使黔军入川总数达1.2万人。因此，川军与滇军黔军之间矛盾迅速激化，战事不可避免。

川剧艺人团体——“教育会”成立

1913年，继川剧艺人团体——“三庆会”后，由川剧名小生王治安发起，以未参加“三庆会”的艺人为对象组成“教育会”。据说该会得到同志军军官、日本留学生母剑横的鼓动与支持。该会以王治安为会长，以面目一新、独树一帜的姿态与“三庆会”抗衡。

“教育会”编演“时装戏”20余种，王治安邀请一些擅长戏剧创作的文人，采取当前时事为题材，共同编排新剧上演。新编剧本有《重庆独立》、《八国议和》、《祭邹容》、《一纸冤》、《成都故事》、《炮打尹昌衡》、《国民捐》、《取大沽》、《陕西独立》、《烟鬼现形》、《清江独立》、《黄兴挂帅》、《闹广州》、《半合米》、《徐锡麟刺因铭》、《同志大王》等。这种“时装戏”贴近生活，针砭时弊，颇能吸引观众，有哄动效应，是川剧随历史潮流发展的新苗。

“教育会”也提出了提高艺人社会地位的要求，反映了民主思想对艺人的影响。

成都建立“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1913年，在四川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由川汉铁路总公司主持，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建立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此碑为纪念1911年9月7日（七月十五日）前往总督衙门（今督院街省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川督赵尔丰诱捕的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等人，而被赵尔丰下令枪杀的无辜群众（死32人，伤数百人）所建立。

纪念碑通高31.85米，方位北偏西56度，砖石结构，石为红砂石，共分碑台、碑座、碑身、碑顶四部分。碑台高4.2米，圆形，。碑座四层，呈方锥形，第一层南西嵌汉白玉小碑，上镌“中华民国二年川路公司建”红字。第二层南壁上半部有沙灰浮雕，图案为正在行驶的火车机车和路轨。第三层四壁均有浮雕，南两面为路轨、镙钉，东面为铁轨、枕木，转辙器，西南为信号灯。碑座上的这幅浮雕涂有黑、红、绿等色，象征着当时四川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交通困难局面的意愿。

碑顶为四角攒尖顶，有中西全璧的建筑风格。其四角主柱，系琉璃瓦

烧制的罐瓶叠垒而成，每柱系有铁索以固定碑顶正中的宝顶。宝顶以琉璃罐瓶垒成，高3.13米，玲珑秀丽，风雅挺拔，碑顶其余部分覆以黄绿色琉璃瓦，金璧辉煌；瓦钉上的三角形装饰物，亦为琉璃烧制的蝙蝠和龙相配；滴水也有龙和蝴蝶图案。

川西地震

1913年9月1～29日间，川西发生地震。地震声自东南来，如雷霆状，天崩地裂，城郭为之倾陷，楼阁倒塌。川西七八百里同时发生程度不同的地震。同时松潘有大风自北而南，折木拔屋。

各地大征杂捐

1913年，前清捐厘制度瘫痪后，新的捐税制度尚未建立，各地自行其是，大征杂捐。崇宁县（治今郫县唐昌镇）附加地方契底捐、肉税。隆昌县征收牛羊捐。安岳县征收房捐。潼南县、纳溪县征收船捐。蒲江县征收叶烟捐。营山县征收团费、猪捐。绵竹县征收烟秤捐。渠县征收船、饴糖、木筏捐。青神县征收烟亩捐。绥靖屯（今金川县城）征收烧锅捐、牛猪捐。大宁县（今巫溪县）征收山货捐。新繁县（今新都县新繁镇）征收屠宰捐。

四川加征盐税附加

1913年，四川擅自加征盐税附加，其后各省相继仿效，使盐税附加漫无限制。1919年7月，川省更定川盐税率，改征银两为银元，按担（司马称100斤）计税，变散为整。1920年2月，又更定税率，除简阳、射（洪）蓬（溪）等盐场外，全川各主要产盐区的税率均大大增加；同时，每担盐附征“镑亏费”2～3角。根据1924年统计，四川盐税附加多达26种。1926年，每担盐共征盐税附加7.159元，高出正税1倍多。

重庆开办50余家钱庄

1913年，重庆开办50余家钱庄。四川各票号原以吸收官场存款，代解代汇公款为主要业务。辛亥革命后，失去对官场的依靠，无款汇解，加以钱庄增资办理汇兑，难与竞争，已多收歇，票号业务渐为钱庄取代。据统计，四川已有钱庄243家，其中在重庆50余家，约占1/5。

四川省推行印花税

1913年11月，四川省推行印花税。1912年，北洋政府根据清末拟定的印花税则，颁布《印花税章程》，派定四川每年推销印花税的比额。1913年11月，四川按期开征印花税，通令各县分等代销，并一律准加三成奖金。开始只就商事、产权凭证征税，委托海关监督，由邮政局、中国银行、电报局、商会发售印花税票。1914年8

月，又颁布《人事凭证贴用印花条例》，对各种人事凭证，征收印花税。

四川外贸概况

1913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数达28016760元，出口达18911905元，进出口货值总数46928665元。入超9104855元。

重庆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口税55730元；出口税534821元；复进口税26374元；内地子口税进3158元；税收总额620083元。

本年度洋货直接进口和转口贸易增加很大，染料进口创纪录，煤油进口量下降。生丝出口增加，质量上升。猪鬃出口稳步增加，价格也大大上升。

1914年（民国3年）

四川第一家雪茄烟厂创办

1914年初，什邡烟商冯四鑫在家庭作坊手工卷制雪茄烟的基础上，集资在本县两路乡创办什邡第一家雪茄烟厂——同茂烟厂。

1919年从中江雇来20余名技工，领导工人从事手工卷制技艺，从业人员由家庭作坊时40余人发展到80余人。生产经营方式采取间隙式，主要依据市场需求和农业生产忙闲而定，农闲时多产，农忙时少产。每个工人日卷制雪茄烟最多1000多支。全厂平均年产60～120万支，当时生产的牌号有“福、禄、寿、喜”牌雪茄烟，产品主要是地产地销，或将产品运往江油中坝赶会，与西北商人进行物资交换，如药材、牛羊肉等。1926年与什邡一批小厂合并，成立益川工业社。

尹昌衡被捕

1914年2月2日，尹昌衡在北京被袁世凯逮捕。

尹的被捕实际是堕入袁世凯铲除异己的圈套。尹在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他在同盟会等社团支持下，清除了赵尔丰残余势力，稳定了成都兵变后的川局，因而早已引起袁世凯的嫉恨。1913年秋，袁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认为时机已到，乃于是年11月藉批准尹昌衡病假，以入京调理并“议决边务”为由促其北上。尹至京即遭软禁。袁赓即下令裁撤川边经略府及川边都督名号，改调拥袁的胡景伊亲信张毅为川边镇守使，改编尹昌衡部队。袁世凯既对尹釜底抽薪，乃又藉口有人告发尹有擅杀及贪赃等罪，拘尹审讯，旋正式逮捕。1915年10月26日判尹有期徒刑

9年。至1916年7月4日，始被担任大总统的黎元洪特赦免刑出狱。

重庆《商务日报》创刊

1914年4月25日，重庆总商会的机关报——《商务日报》创刊。商会主席曾禹钦聘请周文钦为该报社长兼总编。出版经费由商会提供。《商务日报》具备了现代报刊的装帧设计，开始时每日出一大张，每半月采其精华汇编一册，名为《商务日报汇要》，以后定为每日出三大张，不再编汇要。1929年以前，该报销数最多时达到2000余份。

《商务日报》重视现代新闻的客观写实性，申明该报是公众舆论的代言人，在新闻报道中不带倾向性，在各种社会纷争和对立观点中保持中立、客观。但该报在大是大非面前仍有自己鲜明立场，如1915年袁世凯通过重庆的党羽使用金钱贿赂，要求在报上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唱赞歌，该报以停刊相抵制，袁世凯始终无法达到目的。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复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该报立即加以报道，对重庆市民投身民主革命洪流起了促进作用 。

袁世凯裁撤各省都督，解散议会

1914年6月，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于京师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衙。”本月“特任陆军中将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同年，袁世凯下令“将各省省议会一律解散，俟厘定地方制度时，再行折衷之制。”

中央政府颁行川省所属道区域表

1914年6月2日，北京政府制定各省所属道区域表，明令公布。四川省分为西川道、东川道、建昌道、永宁道、嘉陵道共5道。每道之下，管辖一定区域的县。道的长官为“道尹”。

6月24日，任命方履中为西川道道尹、霍勤炜为东川道道尹、梁正麟为建昌道道尹。9月30日，任命戴赓唐为嘉陵道道尹、修承浩为永宁道道尹。

四川盐务稽核分所成立

1914年7月，根据1913年4月袁世凯同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签定的总数为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的规定，北京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丁恩下令在泸县成立四川盐务稽核分所。1915年又增设川北盐务稽核分所于绵阳，后迁三台。泸县分所后迁自贡，更名川南盐务稽核分所。

四川盐务稽核分所的职能是：“保证盐税担保之各项外债”按期偿付。因此，它的主要任务是稽征盐税，并及时解部汇总。具体作法是：各场盐税

先由局税署经征，按月解送稽核分所指定的银行，向分所报告税收帐目。每年收数，由分所直接报送北京稽核总所。四川税收机关则无权过问盐税收缴情况。

按照《善后借款合同》的清偿计划，川南每年摊入盐税的偿债额为106.09万元，川北每年偿债额为15.89万元。由于汇率上涨，照额加派30%，川南为137.917万元，川北为20.066万元。1914～1921年，四川分所解往五国银行的盐税总额即达1794.58万元，其中川南1493.47万元，川北301.11万元。1916～1926年，四川军阀借拨盐税期间，北洋政府财政部代四川垫支盐税债款为：川南8910.47万元，川北1182.61万元。因此，四川盐务稽核分所在这期间偿付给五团银行团的偿债总额为10093.08万元。

川西、川南水灾

1914年8月22～25日，川西暴雨成灾。成都大街成河，深者过膝，四门内外均成泽国，农田淹没无数。金堂河水泛滥，大片临江良田淹没。灌县、崇庆河水暴涨，道路、桥梁冲毁甚多。温江大雨之后，外江水涨横决，近河田亩悉遭冲刷。

同年8月，宜宾、屏山均遭连日大雨，江水暴涨，沿江田地、房屋冲塌甚多，为10余年来水势最大者。

川省首次摊销国家公债

1914年8月，财政总署发行当年内国公债1600万元（年底又增加800万元），开始向四川摊销。派募债券总额100万元，年息6厘，年前分3期认购，由财政厅设内国公债经理处专职办理。此项公债，全省实募债额104.7万元。

川剧业余艺人成立“进化社”

1914年由川剧业余艺人（玩友）组成的演出团体——“进化社”在成都沟头巷成立。参加剧社的人来自社会各方面，有手工业者如须生贾培之，有兵工厂工人如须生曹益三，有商人如须生兼鼓师李华琴，有教师如须生刘怡情，有书画家如须生蓝九垓，有律师如场面黄鉴中，有市民如小丑巫新之。旦角浣花仙、桐花风等，还有赵恕安等数人专写剧本。

“进化社”成立的第一年为学习期，聘请职业艺人柯飞燕（又名古玉珂、攻老旦）为教师，每天业余集中练唱腔，盘身段、练指爪。到基本功成熟后，开始排练剧目。第二年（1915年）在成都中新街锦新舞台公演。学习期间，一切费用由原同志军旅长胡檀负担。演出期间，则照月薪制分等定级，按月支薪，改变了一般戏班的分账或包银制度。他们注重艺人社会地位，称艺人为艺员，认为旧戏班对

艺人的歧视应当废止。

“进化社”注重声腔研究，尤其在胡琴戏方面很有造诣，出过不少优秀艺员，如须生张克成的唱工，当时竟压倒锦城丝管，所演唱的《柴市节》、《曲江打子》、《高鹞子观星》、《保国图》等剧，不仅受到观众喝采，而且为许多专业演员倾服。

“进化社”整理和新编川剧本40种，使不少流传于老艺人之口的剧目得以保存，对川剧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川江轮船航运业兴盛

1914年川江轮船公司蜀通、蜀亨号轮船畅行川江。川江商轮的通航，以川人集资经营的川江轮船公司蜀通号为始。1909年9月4日，在上海订购的蜀通轮至渝，该船拖驳的容量能载货159吨，有房舱12间，统舱68间。在川江行使数年，略有赢利。1913年，川江轮船公司再订购商轮蜀亨号，容量为560吨、马力2000匹。1914年5月30日，蜀亨号抵渝。两轮行驶时期，正值四川生丝大量外销之际，川江轮船公司鼓动丝商，概由轮船载运。川江上货得以畅行，行旅亦称便利，公司始获厚利。

1914年，是川江航运史上重要的一年，除川江轮船公司的“蜀通”“蜀亨”外，川路轮船公司向上海求新船厂订购的两艘浅水轮船大川、利川（均为800匹马力，载重200吨，搭客200余人）已往来川江营运。民国初年，四川革命党人筹设华川轮船公司，后分化为瑞庆、利川、庆安三家轮船公司。瑞庆公司经营宜昌——乐山航线，1914年投入庆余轮营运，后又有瑞余轮加入。利川公司有小轮利骏，庆安公司有木质小轮庆安投入航运。本年川江轮船运输量由1913年的5096吨提高到25447吨，增长近4倍。

川省开征契税和附加

1914年四川省巡按使通令全川各地开征契税和附加。1914年1月，北京政府颁布《契税条例》，税率仍沿用清末卖九典六的旧制，并规定有比较苛重的罚则。后考虑税负过重，乃电令各省体察实情，在卖契征税2～6%，典契征税1～4%的幅度内，自订税率，报部核准施行。其后又于1915年和1917年两次调整税率，最后规定契税税率为卖六典三，各省如因调整税率影响地方收入，可变通作为附加名目，另征附加税以资抵补，此项附加最多不得超过正税1/3。四川省1914年1月1日开征验契税。1915年1月1日开征典契税，并厘定《契税章程》，允许各县在不超过正税30%的范围内征收附加。各地新增契税的附加名目，自此以后日益增多。

川省组织运盐公司，实行食盐专

卖

1914 年 2 月晏安澜任四川盐运使后，为保证税收，对引盐创办“盐运公司”，实行食盐专卖。晏安澜在川推行的盐法，一面恢复旧有的引岸，组织各岸设盐运公司；一面采用官运成法，改用官督、商运、商销，又重新厘定岸区。全川名虽定为 18 公司，实则有公司 25 家。年共征税银 4809315 两。至此川省引盐皆由公司经营。嗣后北京稽核总所会办丁恩主张破岸均税，以求增加盐税，保证外债偿付，胁迫北京政府取消公司专卖。1916 年 9 月川省盐运公司解散，改为散商，食盐专卖制度取消。

川省修正屠宰税则

1914 年四川省财政向各县提解猪税专款，每只 100 文。1915 年 1 月，北京政府财政部颁布《屠宰税简章》作为全国统一的屠宰税法。川省依照北京政府的规定，改肉厘为屠宰税，并规定对猪、牛、羊三种牲畜一体征收，采用定额税率，从量按头计征，改银征钱。对耕牛给予免税照顾。

四川外贸概况

1914 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达 37052668 元，出口总值达 21606917 元，进出口总值 58659585 元。入超 15445751 元。

进口税 119580 元，出口税 619255 元，复进口税 34679 元，内地子口税 3432 元，全年税收总额 776946 元。

本年度洋货直接进口较上年增加 1 倍多。为铸铜元从日本大量进口铜锭是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从英国和香港进口大批纯碱、肥皂和棉纱，是又一原因。但洋布进口减少，原因是价格太贵。由于票号倒闭，新开钱庄在上海无分支机构，因汇兑繁琐，汇水高昂，大大影响了出口贸易。欧战对外贸也有很大影响。

1915 年（民国 4 年）

中国银行驻川分支机构开业

1915 年 1 月 18 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开业，首任经理王不煦。同年，中行在成都、泸县、万县、自流井、五通桥等地所设分支机构也相继开业。该行先后发行印有四川、重庆、成都、自流井等地名的中国银行兑换券（简称川中券）。最初，川中券随时兑现，币信甚高，币值稳定，商民乐用。1916 年 5 月，因执行北京政府停兑令，银行信誉下降，该券价值猛跌。到 1918

年，重庆、自流井等地，川中券跌至7折以下。川中券在川发行最高额达592万余元。

大修都江堰

1915年2月8日，署四川巡按使陈廷杰报请北京政府内务部拨款大修都江堰，并请设立都江堰水利工程局。4月6日，内务部全国水利局批复拨款30万元大修费用，并委西川道道尹王章祜兼任都江堰水利工程局局长，负责大修工程。1916年4月1日，都江堰大修工程全部完成。

都江堰水利工程自前清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大修之后，已有36年失修，淤积沉淀的泥沙，使河底日渐增高，堤埂屡见颓倾。沟洫难通，遇夏成涝。这次大修，对上游河床进行大规模疏淘，修筑堤埂一处，对下游内外疏淘河床36处，修筑进埂24处。由于经费有限，对支流沟渠及关系较小之处，则由各地人民就地筹款修浚。

袁世凯派陈宧入川控制军政大权

1915年2月20日袁世凯任命亲信陈宧为毅威将军，会办四川军务，率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入川。5月1日，袁世凯任陈宧兼署四川巡按使。5月28日陈宧抵成都接任。6月22日袁世凯调胡景伊入京，任以参政院参政的闲职。同月，任陈宧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取代胡景伊掌握全川军政大权。陈亦不遗余力地为袁世凯在川发展北洋势力和复辟帝制开辟道路。

陈宧，初名仪，字二庵（安），湖北安陆人，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在袁世凯麾下任虎威营管带。1903年，由袁推荐，任四川常备军教练兼帮统，升常备军统领。不久，编练新军，任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任武备学堂会办，陆军小学堂会办。1907年随锡良先后调云南、东三省。辛亥革命后，受袁宠信，任参谋部次长。此次奉命镇川。

张培爵被杀害

1915年1月，前四川民政长、辛亥重庆光复的重要领导人张培爵因积极进行反袁活动，被袁世凯政府逮捕。张狱中怒斥袁氏背叛民国的阴谋，3月4日被惨杀于北京，时年34岁。

先是，1912年9月袁世凯的以“咨询边防民事”为由，电召张培爵解职入京。张途经上海时与孙中山、黄兴会晤中，对袁世凯的野心有所了解。张进京后，袁委以总统府高等顾问职，每月付高薪600银元。但张不为利禄所动，拒为袁氏鹰犬。“二次革命”爆发，张摆脱监视至沪，欲回渝参加讨袁未果。此后张在天津以办企业为掩护，秘密联络革命党人，策划反袁活动。袁侦知后，遣人设计诱捕入狱。与张同时就义的尚有其挚友、四川讨袁

军干部邹杰。

聚兴诚银行在重庆开业

1915年3月16日，重庆富商杨文光、杨希仲、杨粲三父子创办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在重庆开业。杨文光任董事长，杨希仲、杨粲三昆仲分任总理、协理。该行定为股份两合公司，共募集资本100万元，实收40万元，后续增至70万元，极盛时达200万元；股份有限与无限各半。1937年以后一律改为有限公司。除办理一般银行业务外，还发行钞票。总行1921年迁汉口，1928年迁回重庆。该行在成都、万县、泸县、上海、南京、北平、汉口、宜昌、沙市、武昌、长沙、常德、苏州、天津、涪陵、内江、乐山等地设立分行或支行，并在香港、伦敦、纽约、旧金山等地设有机构或代理处。该行是四川成立最早的商业银行，也是重庆最大的私人金融资本。

川省改抽统捐

1915年3月，四川省废除“厘金”名目，改抽统捐。民国初年，对烟酒征税既无专税名称，也无统一制度，各省仅凭一纸文书，即可饬令所属征税。课税标准也很不一致，有的从量，有的从价；征收机关有海关、常关、厘金局、税局、县公署等；税率更是有高有低，有以钱计，有按银征。1915年3月，四川省通令废除“厘金”名目，改抽统捐，初照值百抽二捐率开征。当年8月，将捐率提高为值百抽二点五。

川省颁行烟酒公卖暂行简章

1915年4月，北洋政府公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和《各省烟酒公卖局暂行章程》，对烟酒实行公卖制，川省通令全川自4月1日起一律照案办理。旋又按北京政府烟酒公卖办法，拟订通行于四川的《烟酒公卖简章》，设立烟酒公卖局，划全省为20区、酌设分局及监理所。烟酒公卖价格包括生产费，利益，各种捐税厘金，再参照生产贩卖情况，加1/10到5/10的公卖费，随时公布。凡经营烟酒公卖的商人，必须申请批准，按规定交纳1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公栈保证金，取得许可证，方准经营。同时颁布施行《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

陈宧杀害董修武及大清乡

1915年7月29日，陈宧下令杀害原同盟会四川支部长董修武于狱中。董于辛亥革命后曾任四川军政府要职，在二次革命中被胡景伊逮捕囚禁一百多天，胡慑于舆论，又无任何罪证，不得不将董释放。陈宧接任巡按使后不出十日即以莫须有罪名重新将董逮捕，进而杀害。原省议会副议长，国民党人唐宗尧，共和党负责人

黄云鹏、印焕门，进步党人彭兰村等均被投入监狱。陈宧又藉“大清乡”之名，继续镇压、屠杀川省的反袁人士和人民，仅华蓥山麓的草子山、烈面溪两乡镇被公开杀害的群众即达400余人；在营山县被“清乡”惨杀的群众亦达二三百人。四川陷入袁世凯的血腥统治之中。

陈宧加强对川省的军政控制

1915年8月，陈宧以整编川军为名，削弱川军，排斥异己。本月，陈呈准北京政府，将川军旅长王陵基、刘成勋撤职，川军各部团长亦多被编遣、调离；而派一批随己入川的北洋将领分任川军各部旅、团长，以加强对川军的控制。陈宧又将全省划片分区，令川军各部在北洋军监督下分片进行“清乡”，以达到分化削弱川军和彻底清除反袁力量的双重目的。此外，原省垣、川边及重庆的高级官吏亦被撤换，除陈宧自兼巡按使外，川边镇守使、省政务厅长、财政厅长、四川盐运使、各道道尹、重庆警察厅长、川江水上警察厅长等要职，均由北洋派充任。

陈宧在成都举行表决国体的国民代表会议

1915年11月12日，陈宧秉承袁世凯意旨，加紧进行改变国体、复辟帝制活动，亲自兼任“四川国民会议”的选举监督。本日在成都将军署举行的“选举”中，选出饶应铭、兰光第等146名代表。16日全体代表投票决定国体，士兵荷枪实弹封锁、监视会场，陈宧身着戎装，率省会警察厅长及成都、华阳两县知事亲自到场监督。投票结果，全体“一致赞成帝制”，演出一幕丑剧。12月31日，陈宧致电袁世凯，促请早日称帝。袁世凯政府亦于本日宣布明年改为洪宪元年，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极大典”。

簿蓝田整治川江航道

1915年，为帮助川江轮船航行成立扬子江上游河道视察局，著名英国船长、精通长江上游情况的簿蓝田担任巡江工司。

簿蓝田针对长江上游航道滩险礁多的特点，在川江上兴办了28处信号站，设置了7支标志船和53处各种形式的指向标、12处水位标尺，制订了新的《川江行轮免碰章程》。1917年设立川江第一所引水教练学校，巡江工司簿蓝田亲自教授驾驶轮机之法，并担任主考，培养出川江上首批领有正式执照的领江。1918年11月，实施《扬子江上游航行章程》。1921年，颁布《扬子江上游领航事务总则》。在他的《船长指南》和《扬子江领航》两书中，详尽总结了在困难和危险的扬子江上游航行中应当具备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

民国时期长江上游轮船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与簿蓝田整治川江航道的贡献有很大关系。

川省遭受水旱灾害

1915年，四川自上年亢旱、粮价腾贵之后，年初至春分无雨，小春无望，大春播种无期，东南西北各道几乎无县不荒。贫苦人家采食草根树皮充饥，饥民成群，饿殍塞途，骣家自尽或易子而食者时有所闻。

同年夏秋重庆水灾频仍，米价暴涨。稻秧最初因非常干旱而枯萎，以后又因雨水过多而大受损伤。米价涨到从来未有的高度，每斗（40斤）达2000～2500文。

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开业

1915年12月1日，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开业，并发行印有“重庆”字样的兑换券。1916年5月，因执行北京政府停兑令，币信下降，券值暴跌至三四折。交通银行在川发行兑换券最高额达90万余元。

护国军起义讨袁

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在云南以袁世凯祸国殃民、复辟帝制，决定兴师讨袁。12月23日蔡、唐致电川军第四师师长刘存厚，动员其维护共和，共同讨袁。25日蔡锷等亦在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发布文告声讨洪宪帝制。先是，本年春季、云南革命党人已在滇军中策动反袁起义。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更早举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旗帜，曾先后委派党人卢师谛、石青阳、刘国佐、韩傧等回川分别组织武装讨袁。12月19日，摆脱袁世凯耳目监视、从北京绕道越南回云南的蔡锷，立即会同唐继尧等旧部发动讨袁战事。云南护国军分为三军发动：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主力进攻川南；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滇南攻粤；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居中策应。本月，熊克武、但懋辛等在滇参与反袁大计，旋随军返川组织起义，响应讨袁。

护国战争

1915年12月～1916年5月，四川成为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云南发动的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1915年12月，护国军兵分三路，进攻四川、贵州和广西、广东。入川护国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统领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滇军精锐3000多人，加戴戡所部黔军一个梯团，分左中右三路进入川南、川东。

1916年1月初，袁世凯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派遣长江上游总司令曹锟为“剿”川、黔护国军的北洋军第一、二路总司令。第一路攻贵州；第

二路攻四川，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司令。进入四川的北洋军还有李长泰的第八师，曹锟的第三师，总兵力约2万余人。曹锟、张敬尧坐镇重庆，指挥北军作战。

这次战争，为时近半年，其间叙府（今宜宾）之战、泸纳之战、綦江之战是主要战役，兹分述如下：

（一）叙府之役

1916年1月15日，刘云峰率护国军第一梯团进抵川边滩头、新场等地。18日，护国军克横江，乘胜突袭安边，袁世凯任命的川南镇守使伍祥祯旅溃败，21日，护国军进占川南重镇叙府（今宜宾市）。伍祥祯得冯玉祥旅和陈宧调兵支援，从三面向叙府反攻。从1月29日～2月6日，护国军以少敌多，挫败了袁军的四路进攻，取得了叙府保卫战的胜利。2月下旬北洋军主力曹锟部与蔡锷所率之护国军一部在泸县、纳溪一线激战，蔡部伤亡较重，调第一梯团大部兵力驰援。冯玉祥率北军第十六混成旅乘虚猛袭叙府，留守的少数护国军于英勇抵抗后，被迫于3月1日撤出叙府，退守横江，北军遂再据叙府。

（二）泸、纳之战

1916年1月31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以护国川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袁露布，与此同时蔡锷率第二梯团自滇南取道毕节入川，2月4日与刘部会师纳溪。5日滇、川护国军合攻泸县南岸兰田坝，直逼泸县，因遭曹锟主力阻击旋退据纳溪，与北军相持。

1916年2月中旬，护国军第三梯团长顾品珍率领朱德等三个支队陆续赶到纳溪前线，与北洋军主力激战20余日。支队长朱德在棉花坡制高点争夺战中率部英勇杀敌，战功卓越，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他率部挫敌凶锋，稳定了纳溪一线的护国军阵地。

2月28日、3月17日，蔡锷亲到前线，会同刘存厚部两度向北军发起反攻。第二次反攻中，熊克武所部护国四川招讨军配合作战，接连收复南溪、江安、纳溪，迫使北军处于守势；护国军也因消耗过重，蔡锷于22日下令暂停进攻，休整部队。3月31日护国军与北军开始停战、议和。

（三）綦江之战

1916年1月24日，戴戡率云南讨袁先遣军进入贵阳。1月27日，贵州独立，举护军使刘显世为都督，通电讨袁。滇黔两省旋合组护国军滇黔联军，由蔡锷任总司令，戴戡任右翼军司令，率北路黔军进取川东綦江，威胁北军曹锟总司令部所在地重庆。从2月中旬起，戴戡所部与曹锟军及附袁之川军第一师周骏部激战，23日滇军华封歌团与黔军会师，与北军鏖战匝月。綦江之战阻遏了北军继续增援泸纳战场的企图，策应了护国军的主力作战。

（四）四川各地的讨袁起义

1916年12月下旬，随护国军入川的熊克武、但懋辛等，收编川东南反袁起义武装，成立“护国军四川招讨军”，由唐继尧委熊克武为司令，但懋辛为参谋长，下辖吕超、周官和两个支队及直属司令部的两个独立连，同护国军第一梯团并肩作战。

在叙府、泸、纳，綦江之战前后，四川人民讨袁义军纷起。1916年2月，由孙中山派遣回川的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卢师谛联系了原四川同志军统领孙泽沛、吴庆熙、丁泽煦等在崇庆、温江、双流交界的刘家濠举义，建立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吴庆熙、孙泽沛分任正副司令，率兵攻占邛崃县城，围崇庆，陈宧所部龟缩城内，不敢出战。老同盟会员杨维、杨兆蓉等成立“四川招讨军司令部”，攻下灌县。此时期，川北三台、广安、川东大竹、酉阳、秀山均树起讨袁义旗。1916年5月奉孙中山命回川组织讨袁的石青阳，在酉阳以“中华革命党川东区司令”名义率师出黔江、石邮，威胁下川东。中华革命党人刘伯承、王维纲、康云程等则在奉节、万县一带运动民军和涪陵警备队，于1916年3月在涪陵新庙场举义，攻入酆都县城，击毙敌县长，缴获快枪600余支，川东震动。刘伯承不幸在此次战斗中失去右眼。

渝、井各商投资富荣盐业机器采卤

1915～1919年，重庆、富荣各商争相订购蒸汽采卤机车，开展包推业务，使富荣盐业转向机器生产。

1915年重庆协兴和钱庄董镜莹筹银1万两，开办协成公司，以每部3000两的价格向汉阳周恒顺五金厂订购蒸汽采卤机车4部，在富荣盐场承包下一兴、丰旺、恒通等井采卤业务。

1916年，重庆存义公（山西票号）王子野开办合丰厂，万丰钱庄杨笃行、韩友仁等开办正谊厂，由合丰股伙、重庆电灯公司工程师黄福荃按照汉阳五金厂蒸汽采卤机车规格设计，向上海厂商订购3部机车，每部价银1500两，其中一部属合丰厂，包推富荣场其昌井，两部属正谊厂，包推珍海井和神涌井。

1917年王子湘又开办阜隆厂，向上海厂商订购4部机车，包推汲咸、金洋、初生、添源等井。

上述厂商经营“包推”业务时，先由井方付给推方押车银1000两，合同终结时退还。推汲卤水价格：每向（约1.3担）由井方付给推方价银3.2钱；不足一筒者，仍以一筒计价。井上所需材料，工本一律由井户负担。

与此同时，富荣盐商也开始投资机器采卤业务。

1915年，灶户范容光“同德祥”号

开办福昌公司，向上海、汉阳两地购回车炉5部，分别推汲所属同盛、同涌、源生3井，并放推凉高山余天福井、杨家冲滦流井。灶户王和甫“仲兴祥”号开办仲兴厂，在上海、汉阳各订购4部共8部机车，推汲所属殽洪、源流、万福、春海等井，每井配备后备车炉，安装双车双炉。

1916～1917年，由于井盐销路畅旺，每引售价涨至银300两左右，盐商获利丰厚，促使盐业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转化。灶户赖明兴、熊佐周、王三畏堂分别购回协成公司用于包推丰旺、下一井的车炉，吴宗汉购回正谊厂包推其珍海、神涌井的车炉。同时，盐商开始采用新式卧炉蒸汽机车，以提高生产力。灶户张筱坡、李允之以每部8000两的价银，各购汉阳周恒顺厂卧式机车一部，推汲其盐源、煜生二井，产量倍增。

1919年，富荣盐场灶户纷纷改用新式卧炉机车生产，卧式机车购销畅旺。原正谊厂股东杨笃行向上海包纯富厂投资制造新式机车，以每部2000两价银购得17部，转运自流井，以每部7200两的价银出售给灶户罗筱元2部、李品九2部、范容光2部、王慕陶1部，贡井灶户华相如1部。汉阳周恒顺厂运销富荣盐场卧式机车12部，以每部8000两价银，分售大坟堡盐岩井各灶户。此外，灶户颜心畬、李敬才等还直接向汉、沪定购卧式机车若干部用于自采式包推。

在短短几年中，自流井、大坟堡地区的黑卤、盐岩井均陆续更新为卧炉机车，旧式站炉机车则用于较浅盐井。至1919年底，富荣盐场共有各类蒸汽机车38部。

外国专家多次来川调查油气

1915～1947年，外国人多次来川调查油气。1915年有美国人劳德伯克（G. D. Loudoback）到自贡、犍为、乐山一带考察石油，著有《四川石油调查报告》。

1933～1934年，四川督办公署与德国雅利洋行订约，在川勘探石油，由丹麦人萨飞耳（Salfeld）领导，在自流井、五通桥、蓬莱镇等地进行地面电流勘探。这是四川、也是全国首次使用地球物理方法勘探石油。

1945年美国人芮奇（John L. Rich）以“战时生产局顾问”来川，曾到巴县、隆昌、五通桥、成都、江油等地考察石油，著有《四川盆地油气的可能性》一文，认为在容易进行工作的构造上，应集中力量去开发天然气。

1947年，英伊石油公司总地质师斯特朗（M. W. Strong）受聘来川，在重庆、圣灯山、威远、五通桥、龙泉山、灌县、江油、广元等地考察，事后编写了《四川石油地质报告》及附图42幅，认为四川盆地白垩纪、三叠

纪、二叠纪都有生产石油或天然气的希望。

四川外贸概况

1915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29408150元，出口总值26398381元，进出口总值达55806531元。入超3009769元。

重庆关税分类统计：进口税56142元；出口税682508元、复进口税29955元；内地子口税进2545元；税收总额771149元。

本年度洋货直接贸易量只相当于上年50%，主要是进口铜锭下降所致。转口贸易也有所下降，原色布和粗布销量上升，斜纹布、羽绸、绒货、哆啰呢因价格过高，进口量减少。美国煤油销量独占鳌头。土货直接和转口贸易均稳定增加。羽毛出口因德国市场关闭而减少，皮革因战争需求而增加。生丝出口量减少，主要是本省丝织业的发展引起生丝原料需求的增加。

1916年（民国5年）

滇军在川发行“滇中券”

1916年1月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率滇军入川后，8月在成都设立护国军中国银行，发行印有“云南”字样的中国银行兑换券（民间称之为“滇中券”）200万元，滇军所至之处，随地行使。

袁世凯撤销帝制，四川独立，北军出川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迫于全国反袁大势，宣布撤销帝制案。26日袁世凯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名义致电蔡锷，建议停战议和。3月31日陈宧与蔡锷商定停战一周，4月6日双方商定继续停战。这段时间孙中山、蔡锷等分别揭穿袁世凯欲保留大总统权位的阴谋，表明要将反对袁氏窃取民国果实的斗争进行到底。陈宧所部北洋军第十四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回师川西，逼陈宧脱离袁氏。5月中旬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钟体道在顺庆（今南充市）宣布独立，自任川北护国军总司令。广西、广东、浙江等省亦先后脱离袁氏，宣告独立。举国反袁浪潮汹涌。陈宧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于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与袁氏“断绝关系”。6月6日，袁世凯忧惧病发而死。次日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6月8日陈宧电黎表示拥护，宣布取消四川独立。6月24日，黎元洪

任蔡锷为督理四川军务兼巡按使。6月25日陈宧离成都出川。7月6日黎元洪令各省政军长官改称督军、省长，并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北军曹锟、张敬尧、冯玉祥、伍祥桢部相继退出川境，护国战争全部结束。

同年10月1日，四川省议会宣布复会，选举唐宗尧为议长，朱大镛、钟山为副议长。

周骏退出成都，蔡锷离川治病

1916年6月24日，黎元洪总统令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调京，所辖军队交王陵基接管，同日任命王陵基为重庆镇守使。周骏接受袁世凯5月24日任他为益武将军取代陈宧的任命，不服调动，于6月27日率军进占成都，自任川督。蔡锷所部滇军及川军刘存厚部击败周骏，进驻省垣。7月29日蔡锷抱病到成都视事，受到人民欢迎。旋整编川军各部，共编五个师，周道刚任第一师师长，刘存厚任第二师师长，钟体道任第三师师长，陈泽霈任第四师师长，熊克武任第五师师长。8月9日蔡锷因喉疾加剧，离成都去日本就医。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令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后又令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罗受段祺瑞之令召开四川编遣会议，大肆扩充滇黔军，缩编川军，引起川军将领的普遍反对，导致1917年刘、罗、戴的成都大战。

罗佩金、戴戡通饬各军“就地划饷”，盐税横遭掠夺

1916年8月，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后，因川军已增至5个师，连同入川的滇军、黔军，饷款不断增多，财政厅已无力拨支，准由各县征收局将所有税款一律汇解各道署转拨军饷。

1917年2月17日，暂署四川省长戴戡公布“驻防外县军队就近拨领薪饷办法”，规定除省军仍转省公署核发薪饷外，所有驻防外县军队饷款均准就近向征收局拨领。原定各军饷款由督署核准，凭单通知财政厅指定金库或征收局拨付办法，已无力推行。盐税虽为国税，但为保证盐区安全，也不得不由驻军借拨、提支。各军饷款在防区开始自收自支，全省财政失控。

本年四川盐税收入共790余万元，为1917～1934年间最低数。盐税向系拨充“善后大借款”还本付息之用，自罗佩金截留本年盐税数百万元，拨充滇军军饷开始，四川各派军阀竞相效尤。

1916～1919年，四川各地被军阀强行提拨的盐税额达2285.74余万元。争夺自流井等井盐产地，估提盐款，成为军阀混战的重要因素。

戴戡就任四川省长

1916年12月10日，戴戡在重庆

宣布就任北京政府任命的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职务。1917年1月15日，戴戡由重庆到达成都，正式接任。同时，北京政府任命罗佩金为暂署四川督军，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殷承圖为川边镇守使。

全省痢疾、伤寒病流行

1916年，据《四川省内务统计报告书》载：全省痢疾病患者332758人，死亡151406人，死亡率高达45%，居当年各种传染病死亡率首位。

同年，全省伤寒病患者590790人，死亡218522人，死亡率38.7%，居当年各种传染病死亡率第二位。

1916年四川省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类表

1916年，四川始有较为完备的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类表。四川国家岁入总额为11550752元。其中：①田赋收入6866611元；②厘金收入519402元；③正杂各税收入3681108元；④正杂各捐收入218041元；⑤官业收入182715元；⑥杂收入82875元。四川国家岁出总额为10879297元。其中：①外交费36247元；②内务费3037945元。③财政费251449元；④陆军费6024078元；⑤司法费387784元；⑥教育费791306元；⑦农商费350488元。收支相抵盈余6714155元。

四川外贸概况

1916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23634606元，出口土货、土货复出口、洋货复出口为27898926元，进出口总值51533532元。出超4264320元。

重庆海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出口税31167元；出口税716868元；复进口税17243元；内地子口税进36500元，出203元。税收总额801981元。

本年度外贸受战乱影响下降。民船和纤夫均被军队征用，几乎所有的棉货进口都比上年下降。卷烟进口量比上年增加一倍。土货总值比上年增加100万两。山羊皮出口量增加，价格上涨。药材出口量增加，但供货不足。

1917年（民国6年）

北京政府任命四川主要官员

1917年1月1日，北京政府公布所任命的四川主要官员名单：

督军：罗佩金（云南河阳县人，滇军司令）

省长兼军务会办：戴戡（贵州贵定县人，黔军司令）。

政务厅长：尹昌龄；财政厅长：邹宪；高等审判厅长：邹文易；高等检察厅长：曹兴蕲；特派交涉员：钱为善；盐运使：晏安澜；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川边镇守使：殷承圖；西川道尹：钟文虎；东川道尹：修承浩；嘉陵道尹：张澜；建昌道尹：杜庆元；永宁道尹：赵又新；川边道尹兼川边财政分厅长：熊廷权。

吴虞在《新青年》杂志连续发表反孔檄文

1917年2～7月，吴虞在北京《新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6篇战斗性很强的论文。吴文力倡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认为孔孟儒家学说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社会上封建伦理观念的依据；是阻碍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人民获得自由民主的大敌；认为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与文化思想的根本改造同步。吴虞的文章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有影响的作品，在当时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吴虞，四川新繁县（今新都县）人，清末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1902～1903年在成都创设新书局、阅报社，积极传播新学以开风气。1905年赴日留学返川后，先后从事教学及主持报馆笔政，发表了一系列抨击传统儒学中消极因素的论文，又鼓吹言论自由，声讨封建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因而屡受当权者迫害，曾被“逐出教育界”，“逐出成都”，主持的报纸被“查禁”，本人遭“通缉”。吴虞是“五四”时期推动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和四川发展的著名斗士，胡适誉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支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1921～1924年，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5年返川，继续与宣扬“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作斗争。他晚年穷愁潦倒，1949年4月病逝于成都家中。他生平重要著作收集比较完整的有80年代出版的《吴虞集》。

重庆海关在万县设分关

1917年3月16日，根据北京政府的决定，由重庆海关在万县水井湾设立海关分关，本日正式开关，重庆海关税务处会办蔡廷干出席了开关仪式。万县分关以龙盘石为停泊轮船的码头。本年万县出入港口的轮船为290艘次，总吨位为71808吨。

罗、刘之战在成都爆发

1917年4月18日晚，成都爆发了刘存厚、罗佩金川滇军争夺战。

滇系军阀唐继尧、罗佩金早有独霸四川富庶之地以养滇军之意。罗佩

金原系蔡锷护国军总参谋长，随蔡入川。蔡锷在日本逝世后。罗当上了四川督军，掌握了四川军权、财权。他在成都设立护国军银行，大量发行钞票搜括川款，截留四川盐税数百万元。四川兵工厂和造币厂也为罗把持。罗又扩编驻川滇军，同时将川军四、五师缩编为旅，对川军其他各部也进行了裁减性改编，并极力压低川军军饷（川军每师军饷仅为滇军的四分之三）。罗佩金此举引起川军强烈不满，刘存厚领衔于3月6日联合川军五师长电北京政府控告罗，川滇军矛盾日益激化。

刘存厚为川军二师师长，因护国之役协助蔡锷军而被蔡提为川军一军长，辖二、四师。刘拥重兵坐镇成都，极想取罗的督军职权而代之，罗曾设计诱捕刘但因事泄未果，因此罗刘矛盾十分尖锐。4月13日罗诱拘了刘所辖四师师长陈泽霈，次日下令撤去陈的师长职务，又指挥滇军将川军四师全部缴械，军官遭拘禁，士兵被遣散。罗随即调兵遣将，并约戴戡率黔军协同解决刘存厚军。临战时戴戡却按兵不动，企图坐收渔人之利。

4月18日晚，罗佩金的滇军分三路出击，一路从东较场进攻北较场刘存厚师部和文殊院的机枪营，一路出皇城经东城根街进攻驻将军衙门的刘部炮团团部，一路由城外冲入新西门，攻西较场刘的炮团。滇军为便于作战，亮开射程，在皇城附近一带大肆纵火焚烧民房，连续三天火光、浓烟不绝。刘部川军也拼死反攻，双方反复争夺，进行激烈的巷战，甚至白刃肉搏，成都城内弹如飞蝗，枪炮之声昼夜不绝。与此同时滇军的援军和川军的阻击部队也在资阳、简阳一带激烈战斗，由于川军拼死力战，滇军的援军始终未能攻下简阳，更无法到达成都。4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免去罗佩金督军、刘存厚师长之职务，由戴戡兼代督军。4月24日黎元洪又令将刘存厚免职查办。由于四川省议会出面呼吁和平，英、法、日等国领事居间调停，罗佩金因滇军无援不能久战，被迫同意停火撤军，并将督军大印交戴戡。4月25日双方开始撤军。滇军沿府河，由华阳、仁寿小路东走，开往自流井、富顺，刘存厚军从北门退凤凰山，但在东、北较场仍驻有留守部队。成都市内才算平静下来，然而市内走马街、东大街、顺城街、总府街、东，西御街等繁华市区尽被乱兵焚掠一空，永靖街、贡院街、学道街皆被烧光，人民“冤死者数以千计，财产损失数百万元”。这是自明末战乱以来成都遭受的最严重的破坏。5月25日地方当局向刘罗巷战中无辜死伤百姓发放抚恤，受伤者每人8元，死者每人仅20元。

樊孔周遇刺身亡

1917年4月20日四川省商会协

理、《四川公报》（即后来的《四川群报》、《川报》）社长樊孔周因反对三师师长钟体道在驻防区设卡征收过境盐税，在由重庆返成都途经乐至施家坝时被钟体道部团长张鹏午派人刺杀。

樊孔周，名启洪，华阳县增生，是四川民族资本家进步的代表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前在成都学道街创设“二酉山房”书店，介绍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和邹容、陈天华等革命人物。当时有人将此事与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相提并论。他不仅对四川文化发展起了极积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后对四川的实业建设也曾有一整套计划，准备以成都为中心，兴办工厂，开发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等。他曾创办“因利利”织布厂，昌福印刷公司，还打算创办机器造纸厂（当时四川的新闻纸张都从上海购进）。

四川各地土匪成灾

1917年开始，随着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加剧，四川各地大股土匪公开活动，抢劫行旅，绑票勒索，奸淫妇女，祸害乡民。这些匪类多系“浑水袍哥”，占山为王，以抢劫烧杀为业，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为害最烈的地区，人称“匪世界”。以广汉、隆昌、新繁、酉阳为例：

广汉匪多如毛，匪首依势力大小，各划一块地方作为抢劫范围，除三水关“团防”实力雄厚，与土匪有一定默契外，其余22个乡镇，都成为匪区。广汉居川陕大道繁盛段，距省会成都仅40余公里，商旅往来素称频繁。1917年以后路断人稀。土匪不肯自绝财源，变通办法，收取“保险费”，行旅凭“路条”通行。农民因猪牛被拉，农具粮食被抢，无法耕作，只好举家外逃。造成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不能外逃的农户，受尽土匪欺侮奴役。凡得罪土匪的人，常常遭打被杀；对匪徒婚丧庆吊不送礼捧场的人，立即大祸临头。巨匪曹杰三甚至规定，在他盘踞的永丰、金轮、兴隆三乡，所有出嫁新娘，都要先送他奸淫后，才能前往男家。当地凡属年轻美貌妇女，大半被他糟蹋。

隆昌也是有名的“匪县”。土匪有快枪、土枪、马刀、打青丝裹头，穿红绿马褂；有哨棚、边棚；三五支枪的，几把马刀，就算一边棚。哨棚有10多杆枪的，最大的哨棚有四五十杆枪。匪首中较大者有黄宝书、王全之、彭耀武、蔡北平、谢荣章、曹占云等。他们分别统率几个哨棚，彼此划片枪劫，分段拉肥（绑票）。拉肥是把有钱人抓到匪棚，胁迫其家人拿钱取人，赎金动辄几百数千，甚至上万。有钱者多逃往成都、重庆、内江避难。部分逃到云顶寨，土匪曾攻寨数次，避难者无奈，派人疏通，送款5000元消灾。有的富户向通匪的袍哥大爷送礼，寻求庇护。还有10家绅粮逃到福音堂躲

祸，但教堂已失去保护能力，匪首谢荣章带土匪入堂拖出，加倍勒索。经过两三个月抢劫拉肥后，地方一贫如洗，匪首黄宝书、王金之出面收取保安费，黄每月收3000元，王每月收2000元，城区居民为求平安只好出钱。至于乡间，抢劫拉肥之外，家禽家畜成为土匪盘中美味，粮食蔬菜成为土匪家常便饭；农舍化为匪窝，农民露宿旷野。匪县之名，不胫而走。

新繁地近成都，素称殷实，成为土匪攻掠目标。1917年4月29日夜，巨匪破城抢劫，匪首李麻子率众二三百人由东门攻进县城，焚烧监狱，征收局、典狱署和东街民房数十家，县知事李某率兵抵御，毙匪多人，土匪焚掠而去。

酉阳土匪中，饶玉德、伍南清、张少清三部为巨，每部有枪五六百支；其次的有枪百余支，稍小者约10余股，每股有枪三五十支不等，总计各路股匪2700多人，枪1000余支。县境偏岩、柏溪、甘溪、麻旺等地，农民十室九空，老死壮逃。

曾鉴、廖平等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尊孔读经”

1917年上半年，四川教育会曾鉴、廖平、宋育仁、徐炯等290余人联名上书北京政府，认为：“中国道德之要，备载群经，不读经何以言道德，将何以为国乎？”要求“明令学校次第读经，以正人心，以明国教。”

戴、刘之战在成都爆发

1917年7月5日，刘存厚，戴戡川黔两军在成都发生大战。

刘罗之战爆发前戴戡曾许偌罗佩金协同解决刘存厚部，但临战时戴却袖手旁观，坐收渔人之利，结果一人手执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大印，而刘反被免职查办，因而激起刘的忌恨。滇军撤出成都后，川黔军逼处一地，冲突不可避免。戴以刘存厚在城内驻有留守部队而视之为心腹大患，刘则想驱逐戴戡取而代之。7月3日传来溥仪复辟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的伪谕，戴戡认为时机已成熟，即以此为借口，密约滇军共同讨伐刘存厚“附逆”（实际上刘存厚于7月4日通电声讨溥仪、张勋复辟）。

7月5日晚戴戡派黔军7营到西、北两门刘存厚军驻地“接防”，戴、刘之战遂在成都爆发。黔军开始攻势凶猛，逼得刘军死守西门。6日刘军增援部队入城，两军即在城内展开巷战。黔军每当进攻或退却时，大肆抢劫之后即纵火焚烧民房以为掩护，一时间东西珠市街、鼓楼街、锣锅巷、昭忠祠、顺城街、玉带桥、红庙子、焦家巷、长顺街等几十处尽成火海。双方交战之处，枪林弹雨，炮声不绝。7～8日，刘军连续击溃西、东较场之黔军，黔军被迫逃入皇城固守，以待滇

军来援。

由于罗佩金忌恨戴戡在罗、刘之战中坐收渔人之利，因而行动迟缓，使黔军遂成孤军，被川军团团围困，弹尽粮绝，四千之众只余残兵不到千人。戴戡要求川军停火，黔军撤回贵州，于7月17日交出三颗大印由省议会保管后，率领残部向仁寿方向撤退。17日戴的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和一部溃散黔军经过华阳简阳交界时，即遭川军伏兵袭击，张、黄二人被击毙。戴戡与旅长熊其勋行至仁寿秦皇寺时，被袍哥队伍截击，戴戡自戕毙命，熊逃到简阳，被刘军俘虏斩首，至此黔军全军覆没。

刘存厚率部占领成都，通电各方宣称维护省城秩序，刘戴之战历时13天，成都人民遭受的损失比罗、刘之战更为惨重。据当事人所写《刘、戴成都血战血迹记》等文和《吴虞日记》载，这次战祸中，成都被焚街道75条。民房数万家，无辜死难百姓数千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暂代督军，张澜代理省长

1917年7月24日，由于戴戡在成都战败身亡，北京政府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并命周率所辖各部进解成都之围，滇黔各军不得再行前进。

8月8日，北京政府令刘存厚、罗佩金将所率军队交周道刚统领，立即赴京；并令在川的滇黔军撤出川境，由财政部拨银20万元交新任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带往四川，听周道刚赈抚四川灾民。8月10日，周道刚电告北京政府，宣布在重庆就任四川代理督军职。并拟率军西进成都。

8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代理省长。

四川洪水成灾

1917年7月下旬～8月上旬，岷江大洪水，沿江城镇无一幸免，乐山损失尤为惨重。7月乐山连续3日淫雨不止，河水陡涨，三江汇合，府河尤甚。城中进水深五六尺，西门及县署前，城东南的一些街道皆被洪水淹没。沿河居民只有坐在屋顶上，处处呼救。沿江各乡镇损失田土房屋生命财产不可数计。水未退，地大震，山崩多处，压毙数家。是年冬月，天降黑雨，山原溃水处处为墨。

7月，名山、雅安、丹稜、眉山大雨数日不止，水暴涨，沿河房舍农田多被漂没，财产损失无数。夹江县城洪灾严重。先是连降三日大雨，河水陡涨，田禾尽没，损害房屋人畜不计其数，城中水高五六尺，被害者十居八九。县北杜山岩地崩裂，民房毁坏，牲畜死亡无算。

7、8月，犍为县遭受洪水，洪水穿城，城垣冲塌258丈，城内建筑损失

惨重，毁坏旧城、县佐署、看守所、书院、清紫云宫、清三元宫等处。田土人畜被水漂没不计其数。时值军阀混战，人祸天灾，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8月，泸县几经大水灾。江水暴涨，大小河街、兰田坝等处江洋一片。

8月，双流、绵阳、北川、合江等城镇亦遭洪灾，房舍、农田、人畜均受严重损失。

四川“靖国之役”

1917年8月11日，云南军阀唐继尧发表通电，拥护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解散国会的“护法”运动；并将滇军改称“靖国军”、宣布以四川为基地进行北伐。除原在四川的滇军外，又陆续增派滇军入川，还将他的行营迁至川、滇、黔交界的贵州毕节。

唐继尧任命顾品珍为第一军军长（已驻四川简阳、资阳）、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庾思旸为第三军军长、黄毓成为第四军军长、张开儒为第五军军长，方声涛为第六军军长，他亲自督师，大举北进。

8月底，川军刘存厚、钟体道部与驻简阳、资阳滇军顾品珍部展开激战，滇军败退资中、内江一带。9月上旬，周道刚的川军第一师刘湘部也从荣昌西进，夹击滇军，双方在内江、资中形成拉锯战。9月中旬，内江两度易手，最后滇军再败，退往泸县、宜宾，川军夺回川南10余县。唐继尧得知滇军大败后，一面电告顾品珍必须收复失地，一面调兵遣将，部署决战，将北军云集的重庆作为下一步攻战重点。

滇黔联军攻占重庆

1917年12月3日，靖国军滇军联合黔军及川军熊克武部围攻重庆，北军司令吴光新、川军周道刚部抵挡不住，弃城而逃，联军攻占重庆。

12月4日熊克武通电负责维持重庆秩序。滇、黔军占领重庆后、战局急转直下，刘存厚等部川军逐渐转攻为守、转胜为败。12月3日颜德基、帅公安、王维舟等在达县、宣汉、开江打出靖国旗帜，成立靖国军司令部；接着石青阳、夏之时、黄复生、郑英、陈风石、卢师谛、杨春芳、陈泽霈、张煦、丁泽煦纷纷在各地竖起靖国军旗号。12月13日熊克武在重庆通电拥护孙中山护法。12月24日滇、黔军及川军熊克武部将领在重庆开会，成立了川、滇、黔靖国军总司令部，推唐继尧、刘显世为联军总、副司令，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形成了以熊克武部川军和滇黔军组成的靖国联军为一方和以刘存厚、钟体道为首依附北洋军阀的川军为一方的相互对立的局面，最后攻进成都。

孙中山对四川的形势极为关心，10月12日他任命黄复生为中华民国

军政府四川国民军总司令，卢师谛为副总司令，石青阳为川东招讨使。11月18日又改任黄、卢为四川靖国联军副总司令，并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为代表赴川协助“护法”工作。他及时了解四川局势，发出指示，提出建议。“护法”时期孙中山有关四川方面的往来电文已收集到的即达37封之多。

罗佩金、戴戡铸造大面额铜元

1917年上半年罗佩金、戴戡主持四川军民两政时，为了掠夺川民，停铸当十、当二十两种小额铜元，只铸造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大额铜元。当一百铜元的铸造数竟突破千万枚大关，当二百的也比胡景伊时铸造数增加了一倍多。

四川纸币泛滥，熊克武整顿币政

1917年，由于四川省纸币泛滥，币值狂跌，币信丧失，发生金融危机。

当时四川市面纸币流通情况是：

浚川券：四川官银行——浚川源银行发行，流通总数约200万元；

川中券：中国银行四川分支机构发行，流通总数约592万元；

交通券：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发行，流通总数约90万万余元；

滇中券：云南护国军在四川发行，流通总数约200万元。

护国战争开始时，陈宧统率的北洋军以军需急用为名，强迫中行提借库存现银和部分兑换券180万元，消息传出，成、渝等地爆发了兑换券挤兑现银的风潮。成都分行因现金周转不灵，曾请当局变卖仓谷提拨现金，由成都造币厂每日交付中行铜元10000吊，以拨足100万吊为限，应付挤兑。不料尚未拨足，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饬令中国、交通银行所发兑换券一律停兑。中行信誉扫地，币值急剧下降。浚川源银行因抵押基金被移作军饷，继中行之后，也宣布停兑，浚川券价值也急剧下落。

1917年浚、交、中券跌至七八折。次年，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入主成都，接管军民两政。全川金融市场混乱不堪，除银元、铜元等硬币外，纸币全部暴跌，军用券几同废纸，每元仅值二三分；浚川券、川中券、滇中券跌至三折左右。1919年1月开始，熊克武整顿金融市场。浚川源银行为四川地方银行，所发兑换券维持价规，规定：凡购置官产房屋者可搭券8/10，购田地可搭券2/10。并对浚川券实行抽字兑现，中签者每元兑换铜元1000文。为防止滥印，下令将浚券石印模当众销毁。对川中券，滇中券都实行收兑，如税收按银券对半搭收，官吏薪俸按银元7成，纸币3成发放。对收回的券票，由财政厅分次当众销毁。熊克武还将伪造浚川券的靖国军援陕第四路军司令丁泽煦枪决

于绵阳。

迄止1922年1月，浚川券共缴销298.3048万元，川中券由各县局税收项下缴销102.9741万元，由盐税顶下缴348.844万元，云南中行券共缴销162.2333万元。至此，纸币风潮暂告平息。

万县成为四川桐油输出口岸

1917年万县开放为重庆海关分关后，成为桐油集散市场和主要输出口岸。县城经营出口桐油的洋行共25家，有：其来、三井、三菱、安利英、日华、性和、礼和、美最时、丰利、合义、亚细亚、开利、福中、义瑞、生利等，其中日商、英商和美商最为活跃。经营桐油的华商，以聚兴诚为最早，于1913年就输出桐油200篓（20余吨）赴美销售。其它还有福星、慎裕、中原、同裕昌、裕国祥、礼福长、福顺昌、同信昌、川发沛记、中华、同义等商号。1917年输出量为188.5万公斤，1927上升为1169万公斤。1937年高达2000.5万公斤，20年间增加10倍以上，成为四川最大的桐油出口市场。

英、美、法等国驻华人士在峨眉山建立疗养基地

1917年，英、美、法、加拿大等14国驻华人士，租用峨眉山大峨寺、神水阁一带山场筹建疗养基地。大峨寺僧融照约集全山僧尼群起反对，逼迫往后山新开寺一带筹建。先后建成消夏别墅13幢，并建有图书馆、银行、邮寄代办所、游泳池、运动场等生活服务设施和天主教堂，以及“峨眉学会”会址等。

四川外贸概况

1917年，据重庆海关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30465842元，出口土货、土货复出口、洋货复出口为26185745元，进出口总值为56651587元。入超4280097元。

重庆海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口税42784元，出口税617360元，复进口税32265元，内地子口税26796元，税收总额719205元。

万县分关关税分类统计：进口税817元，出口税60755元，复出口税1133元，船钞17元，内地子口税428元，税收总额63150元。

本年度外贸总值较上年增加3%，进口净增467400元，出口下降3895000元以上。

1918年（民国7年）

靖国军攻占成都

1918年2月20日，靖国军川、滇、黔联军攻占成都。上年12月13日，重庆镇守使、第5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通电拥护护法，与滇、黔军联合。北京政府为挽回颓势，于12月18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21日令徐孝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靖国联军在四川攻击的目标是依附北洋军阀的川督刘存厚，决定分三路攻取成都。东路为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两部；中路为黔军王文华、袁祖铭、王天培，谷正纶等部；北路由但懋辛率第5师吕超、喻培棣部。刘存厚则纠集川军1.2.3师兵分5路对抗。由于靖国联军进攻势猛，川军各路均节节败退。刘存厚为为保存实力，缓和靖国军的进攻，于2月16日与省长张澜发出宣言，愿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18日，川军旅长刘湘、刘成勋、陈洪范等人倒戈，通电护法，拥护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刘存厚在政治上，军事上陷入孤立被动，被迫于2月19日率部退出成都。2月20日靖国川军吕超，黔军袁祖铭及靖国军颜德基、石青阳等部先后进入成都。当天，熊克武通电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川省军民两政。

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四川防区制形成

1918年3月8日，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发表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云南督军唐继尧竟于2月5日，先擅自电委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熊本人则仍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军民两政。1919年2月9日，熊克武就任广东军政府所委四川督军职，不久，熊又被授予护法陆军上将衔。

护法之战后。四川军阀势力扩张，唐继尧则企图控制四川，滇黔军占据四川大片富庶地区，不受四川当局号令，熊克武所辖军队虽有所扩充，但不足以控制全局。为保持川局的暂时稳定，只好承认现状，1918年7月，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和清乡剿匪区域表”，将川军划分为十余区，就地分防，滇黔军驻地不变。1919年4月，熊克武又明令公布“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将“卫戍区域”改为“驻防区域”，主客军由所占防区就地划拨饷款，于是，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正式

形成，并进而演变为各军阀在自己防区内征赋税，自委官吏，自行统治的割据局面。

“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划分的防区如下：

第1师驻防区域：成都、华阳、温江、郫县、崇宁、灌县、崇庆、广汉、彭县、什邡、金堂、新都、新繁，计13县。

第2师驻防区域：永川、荣昌、隆昌、铜梁、安岳、潼南、璧山、大足、合川、武胜、江北、长寿、邻水，计13县。

原第3师师长石青阳（后为援陕第一路总司令）驻防区域：西充、南充、广安、岳池、营山、仪陇、蓬安、南部、阆中、苍溪、剑阁、昭化、广元、巴中、南江、通江，计16县。

原第4师驻防区域：越西、冕宁、西昌、会理、盐源、盐边、昭觉、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芦山、汉源、邛崃、大邑、蒲江，计16县。

第5师驻防区域：彰明、江油、北川、平武、梓潼、罗江、安县、绵阳、绵竹、德阳、遂宁、乐至、射洪、三台、中江、盐亭，计16县。

援陕第二路总司令颜德基驻防区域：达县、渠县、开江、宣汉、万源、城口、奉节、大竹、巫山、巫溪、开县（后又进驻万县），计11县。

援鄂总司令黄复生驻防区域：涪陵、酆都、忠县、垫江、石邮、黔江、彭水、酉阳、秀山，计9县。

独立第1旅驻区域：眉山、彭山、青神、丹棱、仁寿，计5县。

独立第2旅驻防区域：犍为、荣县、峨眉、洪雅、夹江、峨边、井研、雷波、马边、屏山，计10县。

屯殖军驻防区域：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计5县。

川边镇守使驻防区域：泸定、康定、理化、巴安、稻城、定乡、雅江、贡噶、丹巴、道孚、瞻化、德格、炉霍、甘孜、昌都、得荣、盐井、察隅、安良、义敦、武成、宁静、贡县、科麦、恩达、邓柯、石渠、白玉、同普、硕督、嘉黎、太昭，计33县。

万县、巴县及江北附近，由江防军总司令余际唐及总司令黄复生选派驻防（按表内未列卢师谛驻防地，但后来卢系驻万县，或因同属援鄂部队之故），江北地接长寿，暂归第2师驻扎，以便统治，惟客军驻扎城内，该师不派队驻防。第1混成旅吴游击、郭守备所部，暂驻成都。

川江正支河流防备，概由江防军担任，并得于沿江要镇，分兵驻扎。

其它：简阳、资中、资阳、内江、宜宾、富顺（除自流井）南溪，庆符、高县、筠连、珙县、兴文、叙永、古蔺、古宋、泸县、纳溪、合江、江津、江安、綦江、南川计22县，均由客军（滇、黔军）驻扎。

钟体道在绵阳预征正副税

1918年3月15日，受到靖国联军围攻而撤退川北的原重庆镇守使、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在绵阳预征民国8年（1919年）的正副税，开了四川赋税预征的先例。

熊克武整编川军

1918年5月22日，四川督军熊克武在成都召开靖国各军首脑会议，决定整编靖国军为六个师，两个独立旅，一个援陕司令。根据这个决定，熊克武任命但懋辛为第一师师长，刘湘为第二师师长，石青阳为第三师师长（石后来改任援陕第一路总司令，由向传义任师长），刘成勋为第四师师长，吕超为第五师师长，颜德基为第六师师长，向传义为独立第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独立第二旅旅长，舒荣衢为援鄂第一路司令。刘存厚退走陕南后，所遗部队分别由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接管（邓为刘部团长，未随刘走，退到眉山，初任独立旅长，后归向传义师）。

同年10月，熊克武在7月划分防区后，再次对四川靖国各军进行整编，扩编为八个师。但懋辛为第一师师长，刘湘为第二师师长，向传义为第三师师长，刘成勋为第四师师长，吕超为第五师师长，石青阳为第六师师长，颜德基为第七师师长，陈洪范为第八师师长。黄复生、卢师谛仍分任援鄂总司令和副总司令。

刘存厚败退陕南

1918年7月1日，刘存厚率部败退陕南。1918年2月22日，刘存厚率部退至绵阳与川军第3师师长钟体道会合。刘存厚见钟师的实力仍然保存，即同驻绵阳，整顿残部，商定反攻计划。刘存厚以四川督军名义，在绵阳预征田赋一年。熊克武对刘、钟两部进行分化。钟体道惧怕所部被熊克武吞并，拒绝熊克武的拉拢。1918年，4月2日，熊克武委吕超为援陕司令，命吕超、喻培棣、王维纲等部进攻绵阳，以石青阳部由三台助攻。5月3日，吕、喻两部进攻绵阳。刘、钟率田颂尧、赖心辉败退江油、中坝及梓潼等地。5月12日，靖国军王维纲部攻入剑阁。19日攻克昭化。

6月9日吕超部彭远耀团攻入广元。7月1日，刘存厚、钟体道两部被迫退入陕南宁羌。后来刘存厚在汉中仍挂出四川督军署的招牌。

川江沿岸洪灾，泸县大火

1918年7月21日，川中连旬大雨，沿江各县遭受洪灾。长宁遭受江水冲荡，漂没1000余家；铜梁遭山洪袭击，漂没800余家。9月上旬，广安、大竹、合川均遭水灾，合川县漂没数千家。渠河猛涨，沿河农田、庐舍被

灾。9月中旬，南部亦受洪灾洗劫，秋禾荡尽。

7月21日，泸县城突发大火，焚毁店铺、民居1000余家。

唐继尧在重庆召开三省联军会议

1918年9月24～10月2日，唐继尧在重庆召开川滇黔3省靖国军联军会议，名义上以讨论北伐为议题，实则企图实现其兼并四川的野心。

护法之战后，唐继尧的滇军、拥唐的黔军和靖国川军占据了重庆、川东、下川南、川北大片腹心地带，熊克武的势力只局限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7月22日唐继尧通电就任广东军政府总裁后，为推行其大西南主义，实现其兼并四川的野心，下令于9月在重庆召开3省联军会议，并举行隆重的总裁就职典礼。在唐继尧到重庆之前，即派秘书长钟动带上他先拟好的以兼并四川为目的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稿，到重庆试探熊克武。《计划书》的主要内容是把四川的军权、政权、财权（包括盐税的各种税收）和兵工厂、造币厂完全交由以唐为总司令的靖国联军总部支配。把重庆、泸县、万县、宜宾，自流井等四川三分之二的富庶地区和战略要地作为滇黔军的防区，并规定滇黔驻川各军军费每年600多万元由四川负担，遭到熊的拒绝。9月17日唐一到重庆，当晚即约熊到其行辕商谈，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在座。唐拿出由他和贵州督军、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签字的《计划书》，要熊立即签署，熊以非自己所能决定为藉口予以拒绝。9月24日会议正式开始，滇黔军旅长以上军官、熊部高级人员、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靖国川军各部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等出席，还有河南王天级、湖北兰天蔚、黎天才出席。会议围绕《计划书》展开争夺。26日王文华见会议无成，匆匆离渝回黔。会议没有结果，唐即宣布援陕援鄂军事布置，并于10月2日发表各路指挥命令，将熊克武的指挥权限制在援陕的川军、把熊限在川西一隅。唐又将拥护他的靖国川军将领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委为援陕援鄂各路总司令，又委旧川军将领刘湘为滇川黔靖国联军第一路左翼司令，以培植倒熊力量。唐与熊的矛盾斗争由此公开化、尖锐化。唐，熊均于10月8日离开重庆。

川江航业凋敝

1918年，川滇黔军占据重庆，北洋军扼守宜昌，形成沿江军事对峙，使川江航运贸易，特别是民船贸易受到沉重打击。由于“联华”“大川”两轮被北军拉差，驶于宜昌、巴东间，“蜀通”“蜀亨”不敢回航，坐困上海水域，华商轮船几乎绝迹。重庆、万县两埠，除食盐外，禁止粮食下运，以断北军

供应。宜昌北军则禁止川盐入楚，听任芦盐侵销沙市、宜昌等川盐口岸。

四川江防军司令余际唐以沿江不靖为由，派兵护送商船，由商民付给津贴，各军争相效尤，见货收费，成为常规，名日“护商费”。

洋商轮船受特权保护，南北军不敢侵犯，形成独霸川江局面。油轮“美川”、“美滩”、“安澜”乘华轮困乏之际入川，载油返货，颇获厚利。

四川外贸概况

1918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28373126元，出口土货、土货复出口、洋货复出口27422071元，进出口总值55795197元。入超951055元。

重庆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口税30412元；出口税666216元；复进口税22118元；内地子口税进14576元；出103元；税收总额733425元。

万县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口税1995元；出口税138712元；复进口税8837元；内地子口税1806元；税收总额151350元。

本年度受战乱影响，年初贸易陷于瘫痪，武装匪徒的横行，又妨碍了船舶安全运行，造成贸易萧条。

1919年（民国8年）

藏兵进占川边各县

1919年1月22日，藏兵骚扰川边北境之后，又在川边南境构兵，已攻陷理化（理塘）、巴塘、壤塘，其它邻近地区也纷纷告急。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派兵防御。

2月21日，藏兵增兵川边，雅江以南各县多被进占，川军统领彭日升被俘。

孙中山先生针对川边民族纠纷，于本年2月8日、5月30日两次指示安定川边要略。5月30日再函复安建（已到康定处理川藏问题）称：

“川边地广人稀，为西陲屏藩，若得处置得宜，设法展拓，联络本地边民，结之以诚信，示之以惠爱，泯其猜忌之心，然后从事规划，兴办实业，开发交通，则将来发展，讵有限量。此时长江沿海地域，民性皆甚柔顺，惟边民坚朴诚挚，刚毅有为，能团结其心，使为我用，则遇危难，皆可不变。”

四川人民声援“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7日，成都《川报》在显著位置刊登特约驻京记者王光祈5月4日从北京发来的关于天安门广场学生大游行、火烧赵家楼、以及痛打

北洋军阀卖国贼的通讯。

5月9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各校学生酝酿组织“四川学生联合会”。同时，重庆各校学生抗议北京军阀逮捕学生，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并发出通电，强烈谴责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

5月16日，《川报》收到王光祈写的关于五四运动的长篇通讯，《川报》编辑李劼人加上按语连夜编排付印，于5月17日在《川报》头版头条刊出。当日，以成都高师为首的各校学生数千人在高师致公堂(今展览馆位置)前广场上集会，高呼口号，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随即整队上街游行、讲演，并向督军署和省政府请愿，要求通电各省，奋起抵制仇货（日货），爱国救亡。5月24日，重庆各校学生集会，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并致电北京政府提出释放逮捕学生、拒签巴黎和约等强烈要求。

5月下旬至7月，爱国运动从学界扩大到工、农、商、绅、军、政和女界，各界各阶层广大群众纷纷集会、游行，并组成各种救国团体。5月25日，成都学界和各界人士上万人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大会，并组成学界外交后援会。6月8日，成都数万人民在少城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共谋救国方略。全川近百个县的各界群众先后加入爱国运动行列，成立国民大会的分会，参加爱国“十人团”的达1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在全川范围内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重庆、成都和全省很多县都成立商学联合会，共同普遍抵制日货，重庆受雇于日人的工人、雇员纷纷罢工或退职，工人拒运日货和日人，成都、重庆、泸县、江津等地都发生了群众大批焚烧日货的斗争，抵制日货运动持续近3年，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击很大，使日货在川几乎绝迹。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发层，进步组织和刊物纷纷出现。较大的组织有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四川学生联合会（张秀熟任理事长）、川东学生联合会，救国毅进会、劳人团、綦江青年砥励会等；影响广泛的刊物有《四川学生潮》、《星期日》、《川东学生周刊》、《半月报》、《友声》、《新空气》、《威克烈》、《直觉》、《巴声》、《新蜀报》、《渝江评论》等。进步团体和刊物的先后问世，促进了四川爱国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道孚、炉霍一带地震

1919年5月28～29日，道孚、炉霍一带发生地震。当地喇嘛寺所受损失极大，寺院周围地区的多数房屋受损，藏民20余人被压死。余震连续数日。据现代科学推测，地震震中的位

置在北纬31°30，东经100°30′，震级6.2级。

四川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赴法

1919年6月1日（一说为2日），四川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61名离开成都。1917年，曾留学法国的学者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张继、吴玉章（四川荣县人）等人本着“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的思想，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总会设北京，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设分会，并在北京、保定等地开办留法预备学校（法文专修馆），在全国掀起留法勤工俭学热潮。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是在全国这一热潮推动下兴起的。

1918年春，四川第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爵版街成都志成法政专门学校内（今成都三中校址）开办，志成校长张春涛兼任校长，教务由冯元勋（官费留比学生）担任。1918年3月，招收第一届学生150余名，分4班上课，以法文为主要课程，教员有吴钢、曹显庭、李璜、吴少虞、李治中等人。大多数学生学习勤奋，生活俭朴，还组织了学生会，推学生刘述一、黄代镕为正、副会长。四川督军熊克武和省长杨庶堪对这届学生非常器重，指示学校，凡毕业考试名列前30名者，政府给每人旅费津贴400元，以资鼓励。1919年夏初，第一届学生毕业，陈毅、刘子华、金满城等成绩列前30名获旅法津贴。其余学生能自筹400元者，或非本校毕业经审查合格者，也可同赴法国，故同行的还有李嘉秀、谢泽源、卜永鑫等31名，共61人。5月25日，法国驻成都领事在领事馆设茶会与赴法同学饯别，5月28日预备学校设宴为赴法同学饯行。6月1日，这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四川省长公署派出的护送员吴钢带领下由沙河堡集合出发，6月11日抵重庆，20日抵宜昌，6月27日抵上海。抵上海后因等候轮船，补习法文4周。8月12日乘法轮麦朗号从上海起锚，于10月10日抵法国马赛港，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分赴巴黎和其它城市，由此开始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艰苦历程。

8月中，省长杨庶堪保送李劼人、何鲁之、李思纯等17人自费赴法留学。8月末，李劼人将《川报》社务移交给卢作孚。9月18日17人同行赴法。

四川各地学生只要在当地加入华法教育会成为会员，凑足旅费，办好手续，也可直接赴法勤工俭学，故同年12月还有江津、巴县、长寿、涪陵、南充等地学生35人自费赴法，其中聂荣臻等江津学生20人就是得到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的帮助，取得法国驻渝领事馆签发护照赴法的。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星

期日》开办

1919年6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当年春，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与李劼人联系，商量先在成都成立分会。6月15日，李劼人在成都发起约集孙少荆、李思纯、何鲁之、李晓舫、彭云生、周晓和、穆济波、胡少襄8人组成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李劼人任书记兼书报管理员。7月13日，创办《星期日》周报出版，孙少荆任经理，李劼人任编辑。该刊鲜明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还转载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等重要文章。该刊发行到省内外，最多时达3000余份，与当时全国著名的《湘江评论》、《星期评论》等齐名。9月18日，李劼人赴法留学，改选孙少荆为分会书记，兼保管员。1920年4月以后，由于孙少荆及其他许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星期日》即由新组成的“星期日周刊社”接办。1920年7月《星期日》出刊至52期时停刊。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因会员大部赴法勤工俭学，遵照总会暂不在成都设立分会的决定而结束。

第二届省议会成立

1919年7月，四川省第二届议会成立。议员共146名，选举议长李肇甫、副议长熊崃、郭云楼，秘书长尹亮易、段班级、熊兰陔。省议会设于成都纯化街。该议会活动时期为1919～1927年。

重庆学生团打击日货

1919年11月17日，川东学生联合会组织2000余名学生到重庆警察厅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厅长郑贤书交出用公款向信孚洋行购买的日货60余件，价值2000余元。学生从上午10点到当天深夜，忍饥挨饿，露宿警察厅外，坚持要求郑交出日货。当夜，郑贤书被迫向商会交出全部日货。18日上午，学生们前往商会查封日货，与郑的卫队发生冲突，郑下令开枪射击，打伤学生数人。学生义愤填膺，群起与军警搏斗，迫使军警缴械。学生们将日货运至朝天门，全部烧毁。不久，在全川各校学生团体的强烈要求下，四川省长公署撤销了郑贤书的重庆警察厅长职务。

四川烟酒税、公卖费合一

1919年经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批准，由省财政厅下文，实行烟酒税和公卖费合并征收，税率为25%，此项收榷，原由各县分栈经手，现改为官收。本年实收烟费57.0664万元，酒费67.6879万元，两项合计为124.7543万元。

重庆铜元局开铸银元

1919年，重庆铜元局应重庆总商

会的要求，首次铸造“汉”字银元100万元。

四川外贸概况

1919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43701132元，土货出口、土货复出口、洋货复出口为31063672元，进出口总值为74764804元，比上年增长34.18%。入超12637460元。

重庆海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口税57177元，出口税797972元，复进口税44770元，船钞9元，内地子口税27458元（进）、199元（出），税收总额927585元。

万县分关关税分类统计：进口税1918元，出口税159017元，复进口税13476元，内地子口税1279元（进），税收总额175690元。

1920年（民国9年）

《新四川》杂志社成立

1920年1月4日，由王光祈、吴芳吉、陈启修、叶麟、杨廉等人发起，成立《新四川》杂志社。该社宗旨是：集合同志，砥砺学行。为四川青年谋文化交流，以创造新四川。社约为：一不嫖，二不赌，三不纳妾。信条是：一真实、二奋斗。该社在北京、上海均有会员。

重庆火灾

1920年2月10日，重庆市区较场口一带发生大火灾。傍晚大火从荒货街烧起，延及百子巷、走马街、黄土坡，十八梯、木货街、演武厅、瓷器街等处，直到次日凌晨大火才熄灭，烧毁民房数千家，财产损失甚巨。

倒熊之战

1920年3月，倒熊联军组成。由于四川是当时唯一由革命党人掌权的省份，孙中山十分重视，欲以四川为根据地，联合滇黔两省，抗击北洋政府。但熊克武依违于南北政府之间，既不甘受唐继尧控制，又不接受孙中山的领导，鼓吹“川人治川”，企图割据四川。对孙中山派来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大加排挤，杨通电保廖仲恺任四川省财政厅长、蒋介石任四川省警务处长，熊则拒绝两人到任。孙中山多次函勉熊克武与杨通力合作，团结川中同志，联合滇、黔军共同反对北洋政府，熊仍置之不理，并在整编中削弱、排斥拥护孙中山的吕超、石青阳、黄复生等部队。

1920年春，由吕超、卢师谛与滇黔军首领在南充召开军事会议，组成倒熊联军。推举吕超为滇川黔联军总司令兼川军总司令，卢师谛为川军副总司令。联军阵容如下：

滇军第一军顾品珍部，第二军赵又新部，第八军叶荃部（从陕西调四川），河南靖国军司令樊钟秀部，黔军总司令袁祖铭部所率两个混成旅，川军第五师吕超部，第三师刘斌部，第六师石青阳部，第八师颜德基部，卢师谛部。

与此同时，吕超又极力怂恿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投靠倒熊联军，并由唐继尧以联帅名义委石青阳、刘湘为川军正、副总司令。

当时，熊克武手中兵力单薄，仅有但懋辛师、重庆镇守使兼全川江防司令余际唐部、督军署警卫团张冲部、宪兵司令李昌权部，以及四川陆军讲武堂500～600名士官生。为了改变这一形势，熊克武采取策反、拉拢、化敌为友等手段，使自己从劣势转为优势：

（1）他利用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与唐继尧争夺云南军政大权的矛盾，与但懋辛一同密约顾品珍在简阳石经寺会晤，秘密商定：熊资助顾饷款30万元，并给予武器弹药，由顾率部回云南取代唐继尧。顾于5月26日通电反对唐继尧对四川用兵；

（2）他又与但懋辛到德阳会晤吕超，表示愿自动辞职，推荐吕为四川督军，吕虽未正式接受这一条件，但对倒熊之战态度有所软化；

（3）在此之前，熊已通过但懋辛与刘湘讨论四川局势，并转达了熊对刘的倚重之意。正当刘湘在倒熊与拥熊之间犹豫时，得知5月21日唐继尧、刘显世任命他为川军副司令，十分不满，很快倒向熊克武一边。

经过上述活动，倒熊之战开始，黔军拉开战幕，余际唐部失去重庆，退守川北后，熊克武尚能宣布复职并组成讨伐滇黔军阵营，其兵力部署是：

（1）以但懋辛为中路司令，率其第一师第一旅喻培棣、第三师第五旅邓锡侯部，对抗简阳、资中滇军第一军顾品珍部；

（2）以刘成勋为南路司令，率其第四师及第八师刘文辉支队，对抗自流井、富顺方面滇军第2军赵又新部；

（3）以刘湘为北路司令，率其第二师及江防军余际唐部，对抗重庆黔军王文华等部。

倒熊联军于7月18日攻占成都后，吕超与唐继尧矛盾激化，为熊克武、刘湘等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编修四川通志稿

1920年5月23日，经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批准，成立四川通志局，负责编修《四川通志》。该局成立后，开始拟订县志编纂纲要，通

知全川各县市征集新旧县志稿本、印件。征采纲要列有：①建置沿革，②疆界，③山脉水道，④食货；另有记、表、传、录、图等内容。

1924年（民国13年），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后，改立“重修四川通志局”，设成都陕西街，着手编修《四川通志》。

通志局初开，杨森聘请宋育仁为总裁，陈酉生为协理。宋育仁邀约的人员有提调林思进，以病辞，继由苏兆奎担任；编纂有陈酉生、龚煦春、周翔、张森楷等；另设校理若干人。此外则为庶务及勤杂人员。通志局又特聘杨森为“监理”，以便得到他的全力支持。通志局开设后，杨森并未明确规定由省署拨款多少，而是要各县解款，因此，筹款十分困难，宋育仁经常为经费不继所困扰。

1931年，《四川通志》尚未修完，宋育仁逝世。宋育仁逝世后，由陈酉生、苏兆奎共同负责，但二人不久也逝世，通志局陷入瘫痪状态。1935年，刘湘统一全川后，曾函请邵从恩、尹仲锡分任正、副总纂，但二人联名辞谢，通志局无人主持，编纂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后由陈钟信等辑补，1936年编修成稿本共计300余册，都是毛笔小楷抄正线装的。其中龚煦春纂辑的沿革地理部分，后由龚编成《四川郡县志》单独刻印。所编《四川通志稿》交省图书馆接收保存。

1942年，张澜、李璜等向省主席张群提议编修省志，经张群批准同年9月成立“四川通志馆”，由省府秘书长李肇甫兼任馆长，舒君实为主任秘书。该馆于1950年被接管解散，成立七八年连总纂也未聘定，到1944年仅编成四川方志简编稿本30万字。

《四川学生潮》创刊发行

1920年5月23日，“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正式创刊发行。该刊“以警觉国民、促进文化、改良社会为宗旨”，成为鼓动青年学生反封建文化，追求民主与科学的重要阵地。因受军阀压制，该刊发至15号被迫停刊。

霍乱、伤寒流行

1920年初夏，重庆、巴县等地发生霍乱时疫。到7月，传染江北、永川、成都、雅安、乐山、达县，宣汉等45市县。病势猛烈，有朝发夕死者，流传地区路断人稀，家家闭户。成都的苦力身挂“腰牌”，上写姓名、住址，以便路毙后家人认尸。由于政府未采取有效防御措施，霍乱肆虐百日以上，死亡人数难以确记。

同年，天全、阆中、万县流行伤寒。天全始阳至圈子岗500余家无一幸免。

成都高师师生抗议军阀克扣教育

经费

1920年8月22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全体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发表宣言。宣言历数1916年高师改为国立以来，学校教育逐年发展而教育经费横遭克扣的情况，强烈谴责军阀克扣教育经费，摧残教育的罪行。

9月1日，成都教职员联合会在高师致公堂召集全体会员大会，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到会会员100余名。王右木在会上发表演说，质问政府，全川课税总额不下3000余万元，国税已数年不缴中央，为何无款开支每年区区60万元教育经费？王右木措辞激烈的发言，使与会者情绪高昂，一致要求教育经费独立。

熊克武联合刘存厚发动"靖川"之战，滇黔军退出四川

1920年8月23日，熊克武与刘存厚联合组成靖川军大举反攻。熊克武败退川北后，在保宁（今阆中市）整顿部队，为了充实其反攻力量，将但懋辛、刘湘两部扩充为两军，任命但懋辛为第1军军长；刘湘为第2军军长。熊部兵力不足，粮饷两缺，困难重重。刘湘、杨森等向熊克武建议，联络被赶到陕南的川军刘存厚。8月6日刘存厚应熊克武、刘湘之请，在汉中组成"靖川军"，自兼总司令，任刘湘为前敌总指挥，田颂尧为靖川军第1路司令，唐廷牧为第2路司令，张邦本为第3路司令，赖心辉为川北边防司令。8月10日刘存厚部南下返川。8月23日，熊刘两部分道反攻。熊克武、刘湘部从东路攻重庆，刘存厚部从西路攻成都。9月1日，杨森部攻入三台，初战告捷。刘存厚加委陕军王鸿恩为靖川军第5路司令，刘成勋为南路司令，陈洪范为中路总司令。9月4日，又委邓锡侯为第6路总司令。熊、刘两部声威大振，进攻顺利。9月5日，吕超率部退出成都，向简阳、乐至败退。9月6日，杨森、张冲、唐式遵等部先后占领成都。9月8日，刘湘、但懋辛部在成都郊区龙泉驿与滇军决战，滇军败退泸县，大部被消灭，二军军长赵又新被击毙，一军军长顾品珍率残部退回云南。10月15日熊部刘伯承团首先攻入重庆。省长杨庶堪通电辞职。刘湘部进而攻占涪陵、万县，"靖川"之战结束。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部战败回黔。

9月10日刘存厚率部由绵阳进入成都，在城北昭觉寺恢复其四川督军公署。10月30日熊克武亦设四川督军公署于重庆，形成四川省两个督军相对峙的政局。

四川第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起程

1920年8月27日，四川第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84人，由法国驻渝领事馆办理签证后，离渝赴法。

1919年8月28日，在五四运动和成都留法热潮影响下，重庆商会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商会会长汪云松为会长，教育局长温少鹤及童宪章为副会长，法国驻渝领事为名誉赞助员。不久，汪云松、温少鹤、杨希仲、曾吉之、朱芾煌、黄复生等各界名流筹集经费数万元（杨希仲独捐5000元），作为在夫子庙开设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开办费和赴法的补助费，预备学校招收学生110名，其中公费生60名，其余为自费生，分甲、乙两班上课，以法语教学为主。1920年暑假，学满一年，经毕业考试和体格检查，有84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46名获得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发给300元旅费，其余37人和未进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为自费生，由重庆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以凑足旅费。邓希贤（小平）、付汝霖就是其中的自费生。

国会移渝，旋离渝

1920年9月16日国会移至重庆。1920年8月1日川军总司令吕超电请孙中山先生及唐绍仪等入川组织政府。9月7日郭同、汪彭年等电呈孙中山先生，请移国会、军政府于重庆。9月16日，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率国会议员70余人抵重庆，拟开国会。

国会议员抵重庆时，正值熊克武联合刘存厚大举反攻，吕超和滇、黔军战败，重庆处于熊克武、刘湘部队的包围中。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决定另觅地方开会。10月15日广东军政府总参谋部长李烈钧随议员乘英轮隆茂号离重庆，18日抵宜昌。留滇军旅长鲁子材任重庆警备司令，维持秩序。30日熊克武入重庆，杀害鲁子材于督军署。

四川第三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

1920年10月5日，四川第三批留法勤工俭学生75人由成都启程赴法。

成都留法勤工俭学生预备学校第一届毕业生赴法后，1919年秋季，又招收学生200多人，分3个班上课。原校长张春涛病逝，改由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唐宗尧兼任校长，冯元勋仍负责教务工作。

这届学生进校时，正值五四运动蓬勃发展，抵制日货风潮激烈之时。同学们一面紧张学习，一面走出校门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其中倾向革命者不少。学生肖树域（朴生）、穆清（树珊）、程秉渊（子健）、周权（秉衡）、李季达、李枏、陈家珍、何嘉谟、杨长茂、许祖熊、许肇梹，刘仁信、黄映湖（里州）13人组成“劳人团”，主张“劳工神圣”。后来这13人除刘仁信外，均先后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共党员。

这届学生毕业经考核合格，录取自费赴法有肖树域、程秉渊等70人，加上未上预备学校的常云湄、石南阳等5人共75人。10月5日，在四川省长公署派的护送员章士林（崇儒）的带领下，由外东望江楼出发。1920年11月下旬，这批学生乘法轮"智利"号离开上海，于1921年1月上旬抵法国马赛。

同年11月，张雅南（巴县学生）等13名女生，在广东公费留法生女律师郑毓秀帮助下，也赴法勤工俭学。这是四川女学生赴法求学人数最多的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1918～1921年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约为1500～1600人，而四川的人数截至1921年11月为止，在巴黎华法教育会有名在册的，包括郑毓秀统率的13名女生在内，共达为492人，占全国留法学生总数近1/3，为全国各省冠。巴县、江津、华阳等县人数较多，巴县和江津县学生多达90余人，其中巴县47人，是四川留法学生人数最多的县份。

"宝元通"开业

1920年10月萧则可等在宜宾合伙创办"宝元通"公司，开业资本仅840元，从经营铁锅、毛铁开始，逐渐扩大到以零售百货、匹头为主，兼营多种批发业务，进而投资工业生产，开办纺织、印染、茶叶、皮鞋工厂。萧则可开始时在宜宾林家巷口开一家小铁锅铺，由此起家，后来公司发展，逐步在省内外不少城市设庄、开店、办厂，经营的百货贸易业务扩大到泸县、重庆、成都和省外昆明、上海、南京以及香港、印度等地。至1937年抗战前资本积累已达100余万元，1946年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1950年2月宝元通西南区总公司，成都、泸县宜宾分公司获准改为国营贸易公司，全部资产折合人民币400万元左右。

成都、重庆、绵阳等地发生地震

1920年12月16日，绵阳、苍溪、什邡、成都、中江、重庆、长寿、广元、巴中、万源、大竹、合江、简阳、遂宁、乐山等地发生地震。什邡七区观音堂一带，地震时起火，顷刻延烧数家。成都地震由南而北，其势颇烈，约6分钟停息。中江地震人不能立，房屋多有倒塌。乐山地震，人如在舟上摇摆。绵阳地震，雷电交作。

据现代科学推测，此次地震为甘肃海原大地震波及范围。

全省邮政网络的形成

1920年12月统计：四川全省邮政局及其代办处共设立843所，保有3万余公里的邮递路线和2000余公里的邮船路线。成都、重庆和万县每年轻量邮件的数量从1912年的1130

余万件增加到1920年的2500余万件；邮递包裹1920年达到63.2万件，总重量达387.2万公斤；收兑邮汇从1912年43.3万元，增加到1920年的600万元（银元）；全省电报局和分所约50处。

自1919年4月26日四川省府有关部门以未经挂号批准为由，勒令麻乡约民信局停止营业以维护邮政以来，活跃于四川等省半个多世纪的麻乡约民间通信网宣告瓦解，其通信功能被邮政局取代。

四川自治运动

1920年南方各省掀起了“自治运动”，由本省人制定省宪，选举省长，管理本省事务。熊克武联合刘存厚、刘湘等赶走滇、黔军后，12月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12月30日，熊克武通电解除自己的四川督军职务。1921年1月10日，熊又通电反对北京政府对他省长职务的任命，提出四川省自治，并策动刘湘、但懋辛、刘成勋三位军长及其他部属拒绝北京政府封官授勋，使接受北京政府督军职位的刘存厚处于孤立地位。刘存厚为敷衍场面，抬出清末状元骆成骧任四川自治筹备处处长，以表明他也在搞自治。1921年1月8日，第1军军长但懋辛、第2军军长刘湘发出拥熊通电。

1921年2月18日，由熊克武、刘湘、刘成勋联名发表通电，宣布刘存厚为四川自治障碍，并出兵攻打刘存厚。2月21日刘存厚战败退出成都，再次亡命陕南。此时吴玉章回川，积极开展自治活动。1921年4月3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100多个县每县都有一二个代表参加。吴玉章借这个公开的讲台经常写文章，作讲演，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起草了“全川自治联合会”的宣言和12条纲领，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

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后，也表明实行地方自治的态度，7月24日刘湘宣告四川自治。当时又有人提出联省自治，以四川熊克武和湖南省长赵恒惕推进最力。1921年5月底熊到达长沙，与赵恒惕商定，同夏斗寅组成湘、鄂、川联军，发动一场“援鄂自治”战争，企图占据湖北，作为联省自治的基础，以便在汉口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组成联合政府，取北京、广州两个对峙政府而代之。

1921年8月25日，川滇黔联合会议在重庆刘湘的总司令部召开预备会议。滇省代表李传麟、黔军代表李其荃、刘湘派其参谋长杨芳毓、顾问张梓芳为四川代表，其他各路军阀的代表杨鉴彰、周世英、税润生、曾子唯、郭崇渠、肖德明等发起组织“联省自治会”。其成立宣言提出：由各自

治省完成联省自治统一国家的重任。

1922年8月熊克武与刘湘之间的“一、二军之战”结束，11月召开四川军事善后会议，作出川省自治、制定省宪法等决议。12月15日，省议会选出四川省宪筹备处，刘成勋、邓锡侯、但懋辛、向楚、石青阳、曾宝森、肖德明7人为筹备员，通命全川各县，每县推举一人任四川制宪审查员。9月28日，四川省宪法筹备处开会决定：自10月10日开始起草省宪法。1923年1月10日省宪起草委员会在成都成立。荣昌、隆昌、江津、铜梁等县的豪绅地主组织“旅渝九县同乡联合会”，发动所谓“联县运动”，其宣言中竟有“联乡镇而成县，联县而成省，联省而成国”等奇谈怪论。1923年2月省宪法按期脱稿，3月10日召集审查会，宣布“依法成立”。

这期间吴佩孚实行武力侵川，接着发生四川“讨贼之役”，1924年初熊克武部败退离川，刘成勋部退驻川边，四川的所谓自治也告结束。

乐山嘉裕碱厂开业

1920年，由施步阶创办的乐山嘉裕碱厂开业，资本5万元，年出碱6000担，供给夹江、洪雅、嘉定（今乐山市）等地纸厂之用。有工人80人，其制碱原料由彭山县供给，其电力由嘉裕电厂供给（电厂亦为施氏企业）。

四川遭灾，霍乱流行

1920年，四川许多地区遭受旱、水灾害，霍乱（俗称“麻脚瘟”）流行。

本年，渠县、岳池、营山、南江、眉山、资中、乐山、蒲江、峨眉、璧山、永川、奉节、灌县、双流等16县遭受旱灾。泸县、江北、巴县、奉节、潼南、射洪、江油、雅安、夹江、简阳、彭水、阆中、珙县13县遭受水灾。

本年，霍乱病流行全川，其中蓬溪、梁山、德阳、广汉、隆昌、成都、重庆、金堂、宣汉、郫县、武胜、罗江、华阳、新都、荣昌、彭县、天全、永川、资中、峨眉、泸县、绵竹、什邡、中江、江北、潼南、射洪、简阳、阆中、雅安、灌县、绥定（今达川市）、乐山、射洪、富顺、三台等36县为重症区。重庆因霍乱不治而死亡者高达1万余人，富顺、自流井死亡6000～7000人，成都死亡4000余人，郫县死亡2000余人。

四川开征“团防款”

1920年因省内各地匪风猖獗，四川省长杨庶堪下令各属办理团防，维持城乡秩序。办团经费摊入田赋，每亩粮款加征2.5元，交由各地方团防。于是，团防款成为四川的重要苛捐杂税之一。

四川外贸概况

1920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39804641元，出口土货22338863元，进出口总值62143504元。入超17465778元。

重庆海关关税分类统计：进口税45264元，出口税520773元，复进口税29462元，船钞44元，内地子口税18677元（进）、81元（出），税收总额614301元。

万县分关关税分类统计：进口税3339元，出口税76058元，复进口税13587元，船钞316元，内地子口税11元（进），税收总额93311元。

四川人口及耕地概况

1920年邮政局调查（载1933年《申报年鉴》）：四川省人口总数为49782810。《民国8年农商统计录》载1919年耕地面积为125431727亩。

1921年（民国10年）

《新蜀报》创刊

1921年2月1日，《新蜀报》在重庆正式出版发行。该报由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陈愚生同刘泗英共同开办的新文化印刷社创办，社长陈愚生，编辑刘泗英、穆济波。《新蜀报》注重宣传新思潮，支持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该报出至102号，于5月29日被迫停刊。经过改组，6月13日续出103号。1922～1923年10月，陈毅常在该报发表文章，并曾任主笔。1923～1925年，肖楚女被聘为主笔，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声势大振，发行量由最初的500多份，逐渐增加到万余份，成为重庆乃至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阵地。

驱逐刘存厚之战

1921年2月18日爆发驱逐刘存厚之战。刘存厚接受北京政府督军任命之后，继续投靠北洋军阀，与熊克武争夺四川军政大权，除继续加紧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外，暗中派人挖刘湘、刘成勋的墙脚，企图分化瓦解二、三军。刘存厚派人联络刘湘部的第二师师长陈能芳、第三混成旅旅长张毅崛，许陈取代刘湘升军长，张升师长。又拉第7师师长陈国栋倒刘成勋，许陈取代刘成勋升军长。刘湘及时察觉刘存厚的图谋，急调唐式遵一旅由永宁赶回重庆，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陈能芳、张毅崛拘捕。刘存厚挖墙脚的计划落空，促使一、二、三军

联合驱刘。2月18日，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刘湘的二军和刘成勋的三军联合，通电驱刘，分路出击，并推刘湘兼前敌各军总司令，指挥所部由东路向成都进攻，阻截刘存厚的退路；刘成勋率所部由南路会攻成都。这时在北路的刘部川北边防军司令赖心辉倒戈反刘，就任熊克武委任的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并任前敌总指挥。刘存厚不能抵挡联军各路的进攻，于2月21日放弃成都，退守南充、广元。3月22日刘存厚通电解除靖川军总司令，再退陕西宁羌（今宁强县）。

王右木建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组织

1921年春，王右木在成都组建了四川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王右木，四川江油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结识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等。1919年返川后，即在成都开始革命理论的宣传。1921年春，王右木在成都组建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参加人员有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还有部分工人。为了扩大影响，有时也邀请非会员参加活动。王右木给读书会员讲《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他还要求读书会员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展宣传活动，读书会员最多时达百人左右。1921年冬，在读书会上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组织，领导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斗争。在成都中共党团组织已经建立的情况下，逐渐停止活动。

重庆中和银行开业

1921年6月1日，重庆中和银行开业。该行为刘湘驻渝时官商合办，渝商温友松、赵资生主持行务。资本总额60万元，刘湘第二军占20余万元，商股占30余万元。该行代理第二军金库收支。总行开业后，又陆续在上海、汉口、成都、宜宾、泸县、万县等地开设分行。1926年黔军袁祖铭部攻占重庆后，该行无法维持，几乎倒闭。刘湘驱袁后复业，在上海印钞320万元发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列主义思潮在川传播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此前后，《新青年》先后发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论文及通讯137篇；毛泽东等创办的《湘江评论》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提出革命统一战线观点；《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浙江潮》、《新潮》等期刊相继发表了有关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中文译本也于1920年出版。这些著作很快在四川传播开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成都人陈育安

开设“华阳书报流通处”，专门销售《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和新书。重庆人杨叶在天主堂旁开设重庆书店，出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学灯》等刊物。省内报刊也开始评介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星期日》发表了《俄国革命后的觉悟》、《波尔雪勿党的教育计划》、《社会主义的劳动问题》等文。一向倾向保守的《国民公报》，在1921年前后，也发表过《布尔什维主义之解释》、《马克思（原译为马尔克）小传》、《劳农俄国的艺术》和《苏联宪法》等。1921吴玉章借四川“自治运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拟定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和12条纲领，提出“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的总目标，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宣言和纲领在《新蜀报》发表后，在四川思想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刘湘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重划各军防区

1921年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同时宣布，令杨森代理第二军军长。这一决定是同年6月6日各军联合办事处在重庆召开混成旅长以上军官会议作出的。会议上，由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领衔，川军10位师长，8位混成旅长及边防军司令联名推举，通过了刘湘担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职务倡议。

同时在重庆市召开的财政会议上，成立四川全省财务统筹处，负责处理混乱不堪的全省财政问题。审定拨支军费条例。

9月，发行临时军费公债300万元（以烟、酒税为抵押），分配全川各县，限令一月筹解。1922年刘湘下野后，上述条例取消。

当时四川有三个军长、十二个师长、八个混成旅长、两个总司令和一个镇守使。刘湘根据他们实际割据情况划定防区。这些军师旅长及其驻地是：

第一军军长但懋辛，驻绥定。

和二军军长刘湘（兼），驻重庆（后由杨森升任）。

第三军军长刘成勋，驻成都，兼成都卫戍司令。

川军第一师师长喻培棣，驻下川东，属一军系。

川军第二师师长唐式遵，驻万县，属二军系。

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侯，驻汉州（今广汉），刘存厚旧部。

川军第四师师长潘文华，驻合川，属二军系。

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驻顺庆，属一军系。

川军第六师师长余际唐，驻巫山，属一军系。

川军第七师师长陈国栋，驻遂宁，

属三军系。

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驻嘉定，属三军系。

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驻泸州，属二军系（后升任第二军军长）。

川军第十师师长刘斌，驻绵州，刘存厚旧部。

陆军（又称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驻保宁，刘存厚旧部。

陆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驻资中，刘存厚旧部。

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驻叙府，与刘成勋、刘湘均有一定关系。

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冲，驻开县，属一军系。

川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李树勋（樾森），驻铜梁，属二军系。

川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袁斌，驻重庆，属二军系。

川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张成孝，驻重庆，属三军系。

川军第六混成旅旅长魏楷（虎臣），驻重庆，属二军系，后易王陵基。

川军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钲，驻成都，属三军系。

川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郑英（经武），驻广安，属一军系。

川陕边防军总司令王鸿恩，驻广元，属北洋系。

四川边防军总局令赖心辉，驻简阳，原刘存厚系。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驻康定。

以上各部，属第一军但懋辛系者二万余，属第二军刘湘系者二万余，属第三军刘成勋系者一万余，其他各部二万余。

王德熙、恽代英主持川南师范学校

1921年9月，在卢作孚支持下，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陈愚生推荐王德熙（南京高师毕业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时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恽代英（著名民主革命家）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址泸县）校长和教务主任。王、恽聘请穆济波、周晓和、陈佳泉、张震陆为该校教师，胡兰畦、秦德君、朱昌文为附小教师。这批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主持川南师范学校教学后，一扫学校死气沉沉局面，使该校成为全川新思潮的重要据点。

杨森实施重庆市政建设计划

1921年11月12日，川军第二军九师师长杨森在重庆发起成立重庆商埠管理局，拟实施诸如修造新路、建筑码头、布置公园、扩宽现有道路、修建自来水厂、建筑房屋、造成商业中心等一系列市政建设计划。工程曾经按照计划着手，但为军事行动所阻挠。1922年，邓锡侯被委派继任局务，改组更名为重庆市政局，但局务无可称述。到1926年潘文华继任时，实际建设工作才开展起来，重庆城之上15公

里和下15公里的地区被划定为市政建设范围。

各防区新设大量关卡，商旅颇遭苛索

1921年四川各地关卡林立，军阀苛索无厌。关卡初设于1917年，四川江防军总司令余际唐以沿江不靖派兵护送商船，由商民酬以津贴，名为“护商费”。此后各军相继效尤，征护商费成为常规。1921年，全川开征江防费，初于水路征进出口费各1次，继复征各陆路费。全省关卡总数难以统计，如糖由资中运重庆，所经关卡21个；米由合川运重庆，所经关卡36个；海带由重庆运至泸县，所经关卡134个；药材由碧口运重庆，所经关卡83个。以成渝千里陆路而论，每运货一挑，除运费不计外，各关卡所收捐税需缴纳30元；由三台运丝100斤到重庆，500余里路程沿途共缴纳税140～150元。

川边镇守使在西康发行纸币

1921年川边镇守使陈遐龄驻节康定，因经费支绌，在西康地区发行藏洋纸币30万元（一元券），折合大洋12万元。民间不习惯使用纸币，疑虑甚重，陈遐龄仗势强制推行，民间怨声载道，不久即全部收回。

泸县济和水电厂筹建

1921年6月，留德学生税西恒创议筹建泸县济和电厂，在地方筹款1万余元，向德国西门子洋行订购14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一套。1925年建成发电。这是四川省技术人员自己设计、施工的最早的一个水电厂。

重庆求新机器制革厂开业

1921年，重庆求新机器制革厂在南岸大佛寺江岸开业，资本10万元，有16匹马力的座式锅炉1座，砂皮机、压皮机、打光机、抽水机各1部，用马达带动的大转桶3个，以及烘房、石灰池、单宁池、蓄水池等。1922年开始生产皮鞋、皮件。1928年在全省实业展览会上，求新厂的“牧牛牌”轻、重革均获甲等奖。

英商经营川江航运获利

1921年，英商白理洋行转向经营川江航运，将江轮改为柴油浅水轮船，以增大载运量，又可终年不停航，枯水季节上驶至宜宾，洪水季节直达乐山。经过这一改良，白理洋行在短时期内几乎垄断了川江航运，不久就由1条船激增至4条，获20余万巨额利润。

四川物价上涨情况

1921年统计资料证实：1912～

1921年四川物价上涨。10年间生活费上涨了将近2倍。米价由1912年的1500文1斗（20公斤），涨至1921年的4500文1斗。1921年是上涨幅度最高的一年。年初，成都市面大米每双石（160公斤）售价11～12元，年底涨至25～26元，菜油每100公斤年初售价18元，年底上涨至2倍。房租也涨了近150%。因征募兵丁而农村劳力减少，因匪风炽盛而运输艰难，因滥铸铜元而通货贬值，以及许多乡区广种鸦片，这一切都助长了物价的猛烈上涨。由于生活费高昂之故，工资也相应上升。铺店经理的年薪由240元涨到600元以上。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每天360文增至800文。

四川生丝产销畅旺

1921年，四川生丝业呈现产销畅旺局面。这是1912～1921年四川生丝连续10年产销良性增长的结果。四川早年系以土法取丝，丝质不佳，出口有限。清末以来，各地对栽桑养蚕缫丝不断改进，提高生丝质量。到1921年前全川共设缫丝厂20余家，拥有丝车近7000部，此外还有手摇丝车200多台，全川直接间接以丝业为生者约1000万人。生丝产销盛极一时。川丝年产量平均不下3万担，1918年高达3.8万余担。每年出口海外的生丝约1.2～1.5万担，最高年份1918年达23364担，价值573万余元，占全川出口贸易额的首位。由1910年在全川出口贸易值中占17%上升到33%，占全国生丝出口的比重也由1912年的8%上升到1913年的19%、1918年的31%。川丝的海外市场主要是欧美各国和印度、缅甸。通过上海转销欧美各国的约占1.5万担，由云南帮运销印度、缅甸的约5000～6000担。

川丝外销畅旺大大刺激了蚕茧生产。民初在著名产区“丝厂林立，收蚕者多”，农村“几无一户不饲蚕”[①]，川省蚕丝生产中心三台县1911～1918年间，种桑亩数由3.3万亩扩大到5.4万亩，产茧量由339.8万斤上升到556.8万斤，出口生丝由2265箱增加到3707箱。

四川外贸概况

1921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60390640元，出口土货34674377元，进出口总值95065017元。入超25716263元。进出口总值均呈大幅增长之势。

重庆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口税48441元；出口税750230元；复进口税42420元；船钞281元；内地子口税进28365元，出175元；附征赈捐74428元；税收总额944340元。

① 《四川第四区教育杂志》第25页，1915年1月

万县关税收分类统计：进口税637元；复进口税19234元；出口税155041元；内地子口税进6元；附征赈捐14965元；税收总额189883元。

1922年（民国11年）

《人声报》出版

1922年2月7日，王右木主编的《人声报》创刊发行。这是四川第一家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刊物。最初出日刊，继出周刊，后又改为旬刊。《人声报》宣传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介绍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情况。它在创刊号中即明确宣布：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还提出参照世界革命运动，结合本地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运动等。

《人声报》一开始就被地方军阀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它“语极离奇”，要求“嗣后言论务求中正，不得再涉离奇”。到第3号时，警察局曾以“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的罪名，勒令停刊。后虽经王右木巧妙周旋复刊，但由于反动派的不断迫害，加之经费困难太大，《人声报》办了5个月被迫停刊。

大中银行挤兑风潮

1922年2月，重庆大中银行发生挤兑风潮。该行是1919年7月21日开业的，由重庆商人汪云松、长寿商人孙仲山集资创办，资本先收30万元，次年收足100万元。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开设分行。该行在市面流通的兑换券约50万元，因北京分行借给奉军50余万元，奉军败退后未还；代财政部放执照票200余万元又已到期，军人持票索款。北京分行只好将重庆总行资金调去应急，而重庆军饷借垫、商款呆帐不少。北京索款又牵及上海，汉口分行，各处电渝告急，重庆市民执票挤兑，人山人海，该行只好关门停付。后经重庆盐款救济，将兑换券收回。

“川南联合运动会”在泸县开幕

1922年4月，中共党员泸县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恽代英发起和组织了“川南联合运动会”。这次运动会还展销地方名特产品，是体育竞赛与经贸活动结合的一次尝试。

泸县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

1922年5月，恽代英在泸县川南师范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底，恽代英应邀到泸县川南师

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后，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内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学行励进会”。1922年1月，恽代英利用寒假组织川南师范学校师生旅行讲演团，步行到川南10余县巡回演讲，行程2000多里，历时1月，演讲20余次，同时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农的生活状况。他写出《四川省合江县农民状况》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5月5日，恽代英在师范学校师生中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建立泸县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军阀迫害，1923年春，恽代英应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之邀到成都任教。夏天，恽代英离川赴上海团中央工作。

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

1922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自发斗争的发展，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右木、恽代英、肖楚女开始在成都、泸州、重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通过团组织去开展工人运动。同年5月，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0月10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组织成立，负责人为唐伯焜。10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为童鲁(庸生)。

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团组织成立后，王右木等积极开展学生、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壮大组织，利用《人声报》、《新蜀报》等传媒工具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潮。

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1922年6月，四川教育界发生大规模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早在3月，成都教职员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就要求省财政厅补发长期拖欠的薪水，多次争取毫无结果。迫于生计，6月初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决定成都各校一律罢课争生存，王右木被推举为这次运动的总指挥。10月成都各校学生举行游行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组织发表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12日，王右木率学生代表到省议会请愿，学生代表8人被扣押。13日，1000余学生再次到省议会请愿，遭武力镇压，学生受伤30余人。18日，重庆教职员联合会为声援成都各大中学校师生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召开全体会员大会。20日，重庆各校学生上街游行。21日，重庆各校罢课。省议会迫于形势，通过了各校师生代表提出的议案，四川省长刘湘也被迫同意划拨全川屠宰税作为教育经费，并设置“教育经费收支处”，规定各县市屠宰税由教育局接管。但各地军阀把持肉税，决议未能完全实行。到1925年缴作教育经费的屠宰税仅193万元，平

均每年48万余元。王右木因领导运动被高师解除了学监和任教资格。

川军一、二军之战

1922年7月9日，一、二军在川东忠县、合川发生激战，这次战争的起因有三：

（一）刘湘就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时，表示公平对待各军，饷械按各军人枪数目分配。但刘湘上任不久，即将盐税和四川兵工、造币两厂完全把持，引起各军愤愤不平。（二）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是熊克武提拔的，他要靠第一军的支持才能巩固其势力，所以对熊克武唯命是听。熊克武又通过刘成勋笼络刘存厚留在四川的邓锡侯的第三师、田颂尧的第二十一师和刘斌的第十师，结成倒刘湘的同盟，使熊克武实力增强。（三）刘湘就任省长，不在省会所在地成都，而常驻川东重庆，很少与四川省参议会接触。参议会议员大都是国民党员，接近熊克武，副议长代议长熊晔也是“熊派”，因而对刘湘不满，经常发生争执，使刘湘的政令难以推行。

1922年5月14日，刘湘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职务，升杨森为第二军军长。刘虽名义上下野，却在幕后策划，命新任军长杨森积极准备发动攻击第一军的战事。杨森将所部第九师调往重庆，将永宁（叙永）驻军移驻泸县，将原驻奉节、巫山的唐式遵师、李树勋混成旅集中于开江、袁彬旅集中于涪陵；对魏虎臣的第六混成旅，也派参谋长王陵基接手整顿，驻扎垫江。

7月9日杨森通电讨伐第一军。第二军向第一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杨森先发制人，亲率重庆驻军东下，与开县、开江部队配合，分东西两路向驻扎忠县、万县的第一军主力部队夹击。令李树勋由开县攻忠县第一军喻培棣师（第一师），唐式遵师（第二师）由开江攻万县第一军余际唐师（第六师）和张冲旅（第二混成旅）。杨森自率第9师王兆奎旅和宪兵大队杨天华等部由重庆直趋万县。5日，喻培棣师放弃忠县，渡江退至万县，与余际唐部会合。8日，杨森抵长寿，喻培棣、余际唐、张冲等又放弃万县，退守梁山（今梁平）。9日下午，杨森与唐式遵、李树勋等部进逼梁山西郊，遭遇一军激烈阻击。傍晚入城，得知一军主力早已撤离梁山，仅留下后卫部队掩护退却。第二军乘胜追击，虽然遭受伏击，仍先后占领达县（14日）、渠县、广安、岳池（23日）。

7月11日，成都各军联合办事处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由第一军、第三军与邓锡侯、赖心辉（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田颂尧、刘斌、石青阳等部组成省联军，通电讨杨。刘成勋命令第三军和上述各部向二军进攻，各路会攻重庆。杨森下令由唐式

遵师断后，自率第九师回救重庆，7月20日，杨森与邓锡侯、赖心辉等部在永川至重庆间激战。7月26日，第一军因省联军攻杨森大本营重庆，也转守为攻，迅速攻占泸县。8月6日，杨森战败，逃离重庆。8月7日，赖心辉、邓锡侯等部攻入重庆。刘湘仅率手枪营潜回大邑老家。8月9日，第一军攻占万县。8月22日杨森率残部逃到宜昌，投靠吴佩孚，被委为国军十六师师长。一、二军之战结束。

刘成勋就任川军总司令，兼管军民两政

1922年7月13日，刘成勋在成都就任川军总司令，宣布四川自治。10月3日，刘成勋召开四川军事善后会议预备会议。10月23日，四川省议会通过临时省政府组织大纲。10月25日四川军事善后会议正式开幕，会议议决川省实行自治的七项办法：①川省暂取自治态度，仍促成国宪之合法统一。②仍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在省宪未制定以前，以总司令权摄民政。③废军长制，各师旅原有单位暂不变更，分期实行裁兵。④破除防区，统一财政，限定民国12年1月开始实行。⑤取消护商、清乡、公益等捐，以纾民困。⑥继续开办钢铁厂，定为官商合办。⑦兴办官银行，整顿交通，划一军事教育，开办全省讲武堂、军事研究所、武学官书局。11月8日四川军事善后会议闭幕。

吴玉章就任成都高师校长

1922年8月16日，吴玉章被任命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9月4日到校视事。高师为当时四川最高学府，也是“五四”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据点之一。吴到校后，实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推进新思潮，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亲自给学生讲授《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他重视延聘有新思想的教师来校任教，先后聘请王右木、恽代英等任教。他一反高师重文轻理的积习，让物理学家郭鸿銮代替贺孝齐任教导主任。他还派人出国留学、出省考察，吸取教学经验，促进教育改革。他审定的高师“学科编制大纲”，除去陈腐科目，增加了新内容。他重视社会实践对学生的提高，鼓励学生到兵工厂、丝织作坊、教会学校的工友中参加革命活动。

1924年3月，由于军阀混战，成都易帜，吴玉章被迫辞职。

青年团重庆、成都地方执委会成立

1922年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成立。这年夏天，在上海入团的唐伯焜返回重庆，联络外地回重庆的团员，发展进步青年入团，成立团组织，唐伯焜任“临时书记”，共有团员10人，

经过5次会议的筹备，于10月9日选举产生重庆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周钦岳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制定了地方团纲领、章程和宣言，并报告团中央请求承认。10日，团地委组织3000工人、学生游行，沿街散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和《致工界》的传单。宣言称："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1924年1月，团中央正式承认重庆地方团组织，发给文件，指导工作。到5月，团员发展到两个支部共34人，大多数为中等学校的师生。

10月15日，成都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当年春，童庸生等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员在王右木的影响下，根据团中央第一次代表大会章程，建立起名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夏，王右木抱着谋求统一组织的愿望到上海，与党、团中央联系。10月初赶回成都，15日，他在家中召开全体团员会议，选举王右木、童庸生等为团的执委会委员。王右木因年龄超过团章规定，推举童庸生为书记。1923年1月第二届团地委改组选举蒋雪屯为书记，6月，为了使团组织能更好地开展工作，经团中央同意，选举王右木为书记。到1924年初，成都团组织发展到10个支部，团员分布在成都各大专院校和部分工人之中。

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在渝开业

1922年10月，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开业。资本总额国币25万元，美股占52%，华股占48%。第一任董事有：雷文、白立登、胡汝航、周云浦，在美国康涅狄格州（State of Connecticut）注册，总行设在重庆，总经理雷文（美），经理赫尔德（美），协理邓芝如、康心如。专营普通商业银行一切事务，发行钞票最高额达150万元。

1927年3月，该行美方股东因受北伐战争形势影响，急于离渝，将所有美股转让华股承受。此后，该行为华人经营，改选第二任董事汪云松、曾禹钦、胡汝航、周见三、周云浦，选周光明、杨梦俟为监察，聘康心如为经理。翌年，经股东会议决定，增加资本总额为100万元，收足半数，改定章程，呈部备案。

1936年，召开股东会议两次，修订章程，增资为120万元。先后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及仓库，专注力于农村信贷、救济。

1937年，增加信用，追加资本至300万元，全行职工168人。

聚兴诚银行发行本票

1922年，重庆聚兴诚银行及稍大的钱庄，发行五元、十元、二十元、三十元等面额的本票，每家十数万元不

等，因随时可以兑现，携带方便，商民乐用。

各军大量铸造劣质银币

1922年，刘成勋主川后，因见五角银辅币法定成色较一元主币为低（《国币条例》规定，一元银币银铜含量比率为89∶11，五角银币银铜含量比率为86∶14），有利可图，便乘机降成色，扩大五角辅币的铸造数量，违反《条例》对主辅币铸造比例的规定。1924年，杨森以四川督理名义驻成都，干脆停铸一元币，只铸五角币。1926年后，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占据成都造币厂，邓自兼厂长，不仅大肆铸造半元银币，而且降低成色为银六铜四，称“新厂版。”当时成都为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分割占据，三军所属高级军官也看中了这一“生财”的捷径，纷纷购置机具，设立私厂于成都及附近县份，竟达28处多，竞相伪造半元银币，含银成色只有四五成，最低者仅有三成。市面上称为“杂版。”刘湘占领重庆铜元局，1928年所铸渝版大洋，成色极差。周西成在贵州赤水所铸“周大版”含银量最低百分之五十三，罗泽洲所铸的“合川版子”大洋，与“周版”成色相近。刘文辉的旅长刘元塘在会理伪造的云南钢版大洋，含银成色仅十分之一。劣质银币流行造成四川的金融极度混乱。

据统计：1912～1928年，成渝两家造币厂共铸各类“汉”字银币8600多万元，各军阀防区所铸银币数量完全失去控制，难以统计。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汉”字银元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川江轮船航运业的飞速发展

1922年，轮船进出四川各港总数为1087艘，467186吨，比上年650艘、207772吨大幅度增加，轮船进出数净增67%，吨数净增125%。大队商轮在洪水季节（4～11月）经常往返长江上游的宜昌、重庆之间，使四川成为较为开放的轮船航运贸易省区，是川江航运史上的一大飞跃。搭乘特制江轮由上海到重庆只需8天，宜昌到重庆的艰难航程，也缩短到3～4天。川南汽轮于7、8、9三个月可往来宜宾、乐山6次。

川江轮船以华轮为主，为避免苛捐杂税和兵匪骚扰，华轮仍采取挂洋旗营运方式，轮船吨位德旗第一，其次为日旗，英美旗并列第三。

各类江轮数量：新加轮9艘，6大3小。新旧轮船合计30艘，其中最大的有14艘，“峡江”、“字水”、“大佛”、“江南”4艘浅底快轮维持冬季航运。洋轮较少，有“日清”公司“宜丸”、法舰“柏年”（Baliny）、“刚健”（Laymndiere）、英怡和洋行“福和”轮入川。

由于航运竞争激烈，货、客运价

均大跌，由宜昌运往重庆的每件棉纱水脚价银由12两跌至1.5两。

本年轮船失事共6起。

川江航业的飞跃，是19世纪晚期以来，中外航运贸易人士不断探测川江航道，治理三峡险阻，制定川江航道管理规则，研制适合川江航行的江轮和不断培养航运人才的结果。

1912～1922年重庆港进出轮船数量和载运量统计表

年度	轮船进出港艘次	货物载运量（吨）
1912年	25	4900
1913年	26	5096
1914年	90	25447
1915年	120	31627
1916年	53	16374
1917年	113	31117
1918年	43	8694
1919年	220	58728
1920年	290	75386
1921年	365	133098
1922年	639	279009

四川外贸概况

1922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72668344元，出口土货43282468元，进出口总值115950812元。入超29385876元。

由于川东成为一、二军之战的主要战场，下半年航运和贸易几乎全部中断。

重庆海关关税分类统计：进口税47457元，出口税780874元，沿岸贸易46479元，子口税46754元（进口），93元（出口），全年税收总额921657元。

1923年（民国12年）

川军援鄂之战

1923年2月6日，四川一、二军再度发生火并之战。

一军首领熊克武1920年联合二军首领刘湘及前任四川督军刘存厚共同驱逐了滇、黔军，打垮了南方政府支持的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吕超等军以后，同南方政府关系疏远了。1921年3月，熊克武联合刘湘驱逐了北洋军阀支持的刘存厚，北洋政府亦对他耿耿于怀，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湘通过两次战争，势力膨胀，级想利用熊克武的孤立处境，取而代之。熊克武对外打出“四川自治”以对抗南北军对他的兼并；对内则自动解除四川督军职务，授意各军推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转嫁矛盾于刘湘。刘湘也知熊克武退让是权宜之计，与他争夺霸主地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暗中派其亲信张斯可驻京与北洋政府暗通款曲。

熊克武为摆脱孤立，寻求外援，打出联省自治的旗号，与湖南督军赵恒惕共谋联合。适逢湖北自治代表请兵援鄂，驱逐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湖北督军王占元。熊克武想以出兵援鄂作业向外发展，同时又化解一、二军矛盾的办法。于是，征得刘湘同意，正式确定了作战部署，推举刘为四川援鄂总司令，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统率其第二师及袁彬等四混成旅，附以第一军的张冲第二混成旅，全部先发，由长江北岸东进（后转南岸）；以但懋辛为第二路总指挥，统主第一军，由长江南岸东进。

8月中旬，唐试遵先到奉节，下达分三路进攻宜昌的命令：张冲旅由且昌南岸上游三斗坪监视安安庙之敌；费东明旅由宜昌北岸上游在兴山一带监视对鸡山、珠宝山、小基塔之敌。各均于8月28日完成部署。9月1日，唐式遵下达总攻令。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刘伯承采用夜袭白刃战，将北军张允明旅所属段其澍团全部歼灭，占领安安庙。费东明旅配合鄂西总司令潘正道部，进攻宜昌屏障东山寺、乌烧尾一线高地，围城四五天，均未攻下宜昌。后因日、英、美领事出面交涉，北军要求休战和谈，实际是缓兵之计。

原来湘鄂联军已于7月底8月初将王占元的中路军孙传芳击败，王占元从武汉逃走，联军形势大好，可惜发四川的电报迟误，川军未能及时配合，因此使吴佩孚有充裕的时间先击

败湘鄂联军，再回头来对付川军。

吴佩孚于8月12日亲到武汉，部署反扑。22日，北军大举反攻，在汀泗桥击败湘军。28日猛攻岳州，赵恒惕败退回长沙，签约认输。

吴佩孚亲率主力孙传芳第二师、王承斌第二十三师、张来福第二十四各一旅及吴自率的第三师一个团，还有海军舰艇四五艘，驰援宜昌。外国使节见援军已到，宣布调解无效，川军始知上当，只好拼搏。

9月13～27日，川军与北军在宜昌开展激战。唐式遵被击败。川军第一军由长江南岸向四川退却。川军第二路由长江北岸向四川退却。10月，北军进占秭归、巴东。为扼制川军向东发展，吴佩孚委任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率师长王汝勤、卢金山驻宜昌。

反熊各军全面进攻，熊、但退往遂宁

1923年2～4月，川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在协同第一军军长但懋辛打败第二军军长杨森、刘湘后，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管军民两政。刘成勋威望不高，势力不强，为削弱各派军阀的实力，明令取消军制，压缩编制。这不仅使希望升任军长的邓锡侯（第三师师长）、陈国栋（第七师师长）反目为仇，而且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对他十分不满。1月25日，陈国栋枪先一步吞兼驻大足的杨森旧部何金鳌旅，遭何反抗。刘成勋以“估编军队，擅开兵衅”为罪名，于1月29日电令解除陈国栋第七师师长职务，派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钲、第六混成旅旅长张成孝率部从成都前往永川查办。陈国栋见势不妙，乃与何金鳌讲和，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刘成勋。驻重庆第三师师长邓锡侯与陈国栋防区毗邻，唇亡齿寒，担心刘成勋逐个解决，于是，决心助陈发难。于2月6日率部离渝赴永川援陈，二人合兵围攻隆昌的蓝世钲旅，邓锡侯又策动驻资中的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出兵共举大事。刘成勋又下令解除邓锡侯的师长职务，并于2月13日明令讨伐邓锡侯、陈国栋，又电请已就任川东边防督办的但懋辛出兵援助。但懋辛派出第六师余顺筠旅助战，并趁邓锡侯率兵西进、重庆防务空虚之机，派第六师余际唐旅于2月8日开赴重庆，将邓留守部队解决。

川战爆发后，为壮大声势，加强力量，邓锡侯即派人联合已退往陕西宁羌的刘存厚、川边镇守使陈遐龄，鄂西杨森、川北田颂尧、刘斌等，共同讨伐熊克武、但懋辛。

川战一发生，吴佩孚即认为是控制四川的良机，于是调兵遣将，协助杨森、刘存厚重整旗鼓，打回四川省。湖北方面，以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施宜镇守使赵荣华为援川正副总司

令，卢金山为总指挥，杨森为前敌指挥，率第八师两个混成旅及杨森所部第二军，由施南、宜昌入川。卢金山部入奉节、巫山，杨森部入万县。陕西方面，北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率部与前四川督军刘存厚由宁羌、广元入川，进驻绵阳。甘肃方面，甘南镇守使孔繁锦率部由摩天岭入川，进驻江油。贵州方面，黔军袁祖铭率五旅之众由毕节入川。

2月中旬，邓锡侯、陈国栋挥师西上，19日，直逼成都东门，赖心辉亦尾追而至。邓锡侯、陈国栋退往绵阳，与田颂尧、刘存厚会合。赖心辉追逐邓锡侯、陈国栋，唐廷牧即移师犍为，刘文辉攻取泸县。何光烈、陈洪范宣布中立。刘成勋见反熊联军势力大，又有直系军阀吴佩孚力助，不再支持第一军，于是熊克武、但懋辛成为各派军阀共同攻击的对象。

北洋军卢金山部和杨森部入川后，但懋辛退守万县。驻忠县的第一军第六师独立旅旅长杨春芳倒戈投杨森，前后夹击第一军，但懋辛率部退守梁山。3月8日杨森部进占万县。26日，杨森率部进占梁山，垫江，但懋辛退守重庆。

3月29日，但懋率通电辞去川东边防督办职。4月4日，重庆设立川东各军联合办事处，推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喻培棣为主任，第一军第六师师长余际唐为前敌总指挥，第一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冲、川东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汤子模为副指挥，负责对抗杨森的攻势。4月初杨森等联军与第一军在重庆下游10余里的寸滩、横梁子、人头山、鸳鸯桥等地激战。4月5日，第一军撤离重庆，分路向永川、合川退却，然后会合于遂宁。4月6日，杨森联军占领重庆。

正当杨森和北洋军节节胜利之际，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三部受赖心辉大军逼退罗江、绵阳一带。熊克武、但懋辛第一军增援赖心辉的部队也由成渝路西上，对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各部构成围歼之势。为摆脱困境，邓、陈两部4月2日乘夜行军，绕过赖心辉部主力，走德阳、什邡间小道，穿过第十师刘斌防区（此役表示中立），两夜一昼强行军280里，于4日上午8点直达成都北门外，邓锡侯第三师、陈国栋第七师、唐廷牧第二十二师、田颂尧第二十一师、刘斌第十师、刘文辉第九师、陈遐龄川边镇守使、彭远耀屯垦司令，形成反裁编联盟八将领会攻成都的局面。

坐镇成都的川军总司令刘成勋部主力均在前线，城中无兵可用，急电赖心辉回援，但赖的大部队被邓锡侯、陈国栋两部隔断，无法前往解围。城防空虚，危在旦夕。省议会副议长郭崇榘和部分议员出面调停，由刘成勋将成都兵工厂、造币厂、四门统捐税

局税收、成都关监督税收，一并交与第九师师长刘文辉接管，刘文辉部队驻扎于东门外至龙泉驿一线，把邓锡侯、陈国栋等部隔在东门以北地区。然后，放开东门，让刘成勋、熊克武、赖心辉等部白日出城，向东南路安全撤退。

3月30日，刘成勋通电辞职，宣布停战。刘成勋退往新津，熊克武退往遂宁。4月2日刘文辉以成都卫戍司令名义进入成都。5月，联军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刘斌等部相率分占成都。

炉霍、道孚间发生强烈地震

1923年3月24日，炉霍、道孚间发生强烈地震。炉霍县城及虾拉沱、仁达沟一带的城墙、教堂、庙宇、官民房屋几乎全成丘墟，城乡200里内炊烟断绝。城内将军桥及河坝地裂宽至1～2米，全县人畜死伤甚多，死人在3000以上，财产损失200～300万元。虾拉沱天主教堂倒塌，压死法教士及其妻、子共6人。炉霍农村经此剧变，约废十分之一。

道孚的孔色、麻孜二乡房屋荡然无存，压死500余人。城内官民房屋约半数受损。道孚西北30公里的恰叫，房屋全部倒平。震中呷拉宗被毁灭，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亡。类似的大破坏遍布整个区域。在震中，强大的裂缝带在地面上形成鼓包，土层发生不规则的翻转。

据现代科学推测，地震震中位置在北纬31.5°，东经101.0°，烈度10度，震级$7\frac{1}{4}$。

成都劳工联合会成立

1923年5月1日，成都劳工联合会成立。从1921年冬起，成都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开始在工人中传播革命理论，开展工人运动，终于使劳工联合会在1923年5月1日在成都建立。是日，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成都长机、生绉、粗丝、牛骨、刺绣、建筑、店员等20余帮的代表，会上散发了《劳动五一纪念游行大会宣言》，通过了关于工人正当利益的四项提案，选举出青年团员刘亚雄、钟善辅为正副会长。成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四川工人运动跨入了新的阶段。当时《川报》称劳工联合会“为成都破天荒之工人盛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真正工人的工会”。

川西特大洪灾

1923年5月25日，成都、崇庆、彭县、什邡各县连日大雨，雷电交加，村落、田舍、道路、桥梁均被洪水淹没。灌县城暴雨连旬，城内积水，街市可以荡舟，房屋毁坏，人畜淹毙。新都南西乡一带淹没良田20余万亩，死亡人数约在500人以上。损失柳叶烟

值银30～40万元。广汉城内半边街、金坪街及上下河坝民房、商铺、烟堆栈、木料棚等均被水淹，损失40～50万元。河坝街内全县谷米集散市场，水灾损失谷米价值约达数万元。

同年7月，金堂城乡遭受巨大洪水。由于连续几天大雨，江水暴涨2丈余，赵家渡淹没，淮州河街大半被淹，冲毁民房数百家，沿江多数良田变为沙洲。境内3条大河同时猛涨，沿岸尽成泽国，溺死约1000余人，毁民房数千家，淹没田地达数十万亩。

熊克武就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北军退出重庆

1923年6月4日，孙中山大元帅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四川省长兼川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四川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形成川军第一军、第三军和四川边防军的大联合，对付入川北军及川军杨森、邓锡侯、陈国栋等部。1922年秋，石青阳奉孙中山之命，回川招集旧部，并与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等代表充分交换意见，检讨错误，决心重新联合起来，讨伐曹锟、吴佩孚及其在四川的势力。石青阳将这一结果报告了孙中山，孙中山遂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大元帅命四川所有滇、黔讨贼各军，统归熊克武节制调遣。9月4日讨贼军进攻重庆。9月23日，前敌总指挥赖心辉率军攻入巴县西里，直抵浮图关，日夜猛攻。10月16日，杨森、刘湘、邓锡侯、袁祖铭及北军将领赵荣华等退出重庆。10月23日，孙中山命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嘉奖克复重庆有功将士，并饬督率各军迅速肃清川境，并力北伐。

讨贼军占领泸州后，熊克武扩编部队，任命汤子模为讨贼军第一师师长，周西成为第二师师长，两部驻叙永、江津一带；郑啟和为第三师师长，驻梁山、大竹；杨春芳为第四师师长，仍驻泸州。这四师为总司令直辖部队，由吕超、石青阳指挥。

国民党右派四川省党部成立

1923年7月5日，孙中山任命石青阳为国民党四川总支部长。次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党部曾派石青阳（中央执行委员）、熊克武二人筹备四川党务。但二人并未回川。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川籍国民党人石青阳、谢持、戴季陶等参加了西山会议，加入国民党右翼势力。同年夏，石青阳和四川国民党人邓懋修（左派）受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遣，以石青阳、邓懋修、曹叔实、郭云楼、朱叔痴、黄复生、唐德安、曾吉芝、陈炳光、谢宝珊、张赤父、刘浦生等人筹备四川党务。石青阳等回川后，于7月9日成立了国民党四川

临时省党部，选出石青阳为指导委员，黄复生、唐德安、朱之洪、陈敬修、黄以镛、郭崇渠、宋绍增、张赤父、邓懋修为执行委员。同时选出组织部长宋绍增、宣传部长陈敬修，妇女部长黄以镛、青年部长不详。这个党部设重庆忠烈祠光国学校内。由于该党部大部分执委均系国民党右派，思想保守，又吸食鸦片，基本无所作为。

不久，省党部即以临时执委名义委朱叔痴、陈炳光等9人为筹备委员，成立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

1926年春，上海国民党（右派）中央党部派黄复生、陈静修等回川，联络朱之洪、张赤父等于3月1日成立了右派省党部，办公机关设在重庆总土地，故称总土地省党部。这个省党部勾结地方军阀、团阀等，收罗流氓打手，欺骗拉拢落后青年学生，充当了破坏革命、镇压民主运动的帮凶和打手。

刘湘统领反熊联军，直系军阀控制四川

1923年7月20日，杨森为挽回军事上失利的颓势，与邓锡侯、陈洪范、陈国栋、田颂尧、唐廷牧、唐式遵、潘文华、杨春芳、李樾森等发出通电，拥戴刘湘出山，推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一面伪装调停，提出“礼请北军出境”为双方停战的先决条件，以博取川人同情；一面则集中旧部潘文华、唐式遵等在川南及泸县一带与汤子模、吕超、石青阳部厮杀，以分散熊军兵力。与此同时，曹锟任刘湘为四川清乡督办，用以笼络刘湘。9月15日，吴佩孚以北京政府名义委邓锡侯为三十一师师长、陈国栋为三十师师长，唐式遵为三十二师师长，潘文华为三十三师师长。1923年，10月23日，北京政府特任刘湘为嘉威将军，统领反熊联军，杨森为森威将军，担任反熊前锋。10月25日，杨森、刘湘等退万县后，奉吴佩孚指示，约集刘存厚、袁祖铭及邓锡侯、陈国栋等，在万县会商反攻计划，共推刘湘就任四川善后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联军前敌总司令，主持反攻军事。

1923年12月10日北京政府特任邓锡侯为骠威将军，陈国栋为骜威将军、田颂尧为章威将军，唐廷牧为恒威将军。同日，袁祖铭下命反攻，命邓锡侯、陈国栋部沿梁山、垫江取道长寿，黔军和杨森部从万县沿江而上取道忠县、酆都，直趋重庆。12月13日，杨森、邓锡侯攻占重庆。熊克武、赖心辉、石青阳各部西退永川、荣昌。熊克武率第1军转向北道遂宁到达三台。1924年1月27日，杨森率部于晚8时出其不意地扑向三台熊克武总司令部，熊克武仓惶从北门退走。孙中山对熊克武在四川讨贼，进而参加北伐，寄予希望。在1924年1月30日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2日，刘湘、杨森、袁祖铭部已抵成都郊区。3日拂晓，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在成都城内商议，认为背城决战实为不利。熊克武部退双流、仁寿，赖心辉部退资中，刘成勋部退雅安。2月9日，刘湘、袁祖铭、杨森占成都。熊克武率残部战到3月下旬，失败出川，退贵州遵义，继转移到湘西。后与黔滇军阀刘显世、唐继尧等筹组“建国联军”，活动于湘、黔边境。后率军开赴广东，被广东军政府遣散，熊等被汪精卫、蒋介石逮捕。1927年，被释放出狱。

王维舟在宣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1923年夏，王维舟在宣汉县清溪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王维舟在上海经朝鲜共产党员金笠等人介绍加入了朝鲜共产党。年底赴苏联学习，曾聆听过列宁的讲话。1923年夏，他回到家乡宣汉县清溪场创办新群女子高小并接办宏文学校。在此期间，他联络进步教师宋更新、冉雨生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共产主义，为四川建立党的组织作准备。

中共成都独立小组建立

1923年9月，中共成都独立小组建立。8月王右木到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到上海，接受了中共中央在川建党和国共合作的指示。回川后，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9月在团员中发展童庸生等几位优秀分子为共产党员，组成秘密的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王右木为书记，直属中央领导。这是中共在川建立第一个地区组织。10月，王右木任国民党四川省总支部宣传科副主任干事，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3月，王右木离开成都赴上海后又转广州，在返川途中遇害。

防区制时代的田赋预征

1923年四川开始实行田赋预征。

自1916年以后，川中军阀割据，驻军就地筹饷，全省财政系统四分五裂。四川田赋苛重为全国之冠，除正税增长，附加税数额也日益增大。1920年全川开始随粮带 征办团练费，每正粮1两带征银2.2元，此款由各县自收自支。此后各县任意征收附加税，甚至有每年超过正税70余倍者。各地军阀仍感扩军打内战经费不足，于是普遍预征田赋。川北的军阀，在1924、1925年各预征田赋1年，1926年以后，每年预征2年、3年或4年，有的已预征了1960年田赋。一年预征的田赋高的达50万元，为1923年的5倍。川西的军阀，1923年预征1924～1927年的田赋，1925年预征1928～1935年的田赋，1926年预征1936～1940年的田赋。到1934年已预征了1974～1981年的田赋。从1923～1934年，

共征了60年的田赋。山多田少的灌县，民国初年每年田赋不到3万元，1932年24军竟预征了40多万元，等于一年14征。驻守安县的军阀，在1925～1934年的10年中，甚至把田赋预征到了2012年。预征田赋虽发给预征券，但只借不还，且越借越多，预征券成为废纸。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的《重申整理川政令》中说："捐税名称之繁，既已无奇不备；勒借预征之酷，复又遍及荒野。哀哉川民，将无噍类！"

洋商垄断四川桐油市场

1923年，洋商垄断四川桐油市场。四川是中国桐油的主要产区之一。四川桐油的主要集散地是万县，其次为重庆。随着川江轮船通航，从1912年起，英、日、德、法、美以及丹麦等国商人先后在重庆、万县开设洋行、公司，从事桐油出口贸易，最多时达30多家。这些洋行造油池、建仓库、修码头，吸引四川产桐油地区各县乃至鄂、湘、黔、陕等省共45个县的桐油运万县出售。在争夺油源的竞争中，万县的桐油市场逐渐为美商施美、生利，日商三菱、三井，英商安利英等洋行所垄断；重庆桐油出口业为美商施美、生利等洋行垄断。到1934年万县、重庆桐油市场均被美商施美、生利洋行垄断，两家运往美国的桐油共占四川桐油总输出量的70%～80%。

四川外贸概况

1923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63354557元，出口土货50962023元；进出口总值114316580元。入超12392534元。

据重庆海关关税分类统计：进口税50067元，出口税774297元，沿岸贸易税44122元，子口税47925元（进口），吨税1248元，全年进出口税收总额917659元。

1924年（民国13年）

中国青年共产党在成都建立

1924年1月12日，由吴玉章、杨阆公等20多人组成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始简称C.Y，后称Y.C.最后定名为中国Y.C团）在成都建立。1月20至30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吴玉章、杨阆公等积极推动四川革命舆论的发展，建立共产党外围组织。5月1日出版《赤心评论》为机关刊物，组织赤心评论社为Y.C团的外

围组织，参加人数最多时达60余人。中国Y.C团的活动开始主要在成都，半年后，活动扩展到北京。Y.C团在成都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所称S.Y）实行政治联合，共同组织过多次政治活动。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团员，同时也是Y.C团的成员。在北京的Y.C团员活动，引起了北京中共党组织的关注，曾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行联络。肖楚女还在《中国青年》第36期著文肯定《赤心评论》是“一种激进的青年刊物”。1925年4月，吴玉章在北京由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吴玉章写信给杨阎公，要求Y.C团组织解散，其成员个别按中共中央规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重庆发行铜元券

1924年2月，袁祖铭进驻重庆后，派杨永懿任铜元局局长，除铸造劣质铜元外，并在市内设官钱局。发行100文、500文、1000文铜元票三种，共3000万吊，在黔军所辖川东南18县流通。刘湘、杨森击败袁祖铭后、重庆官钱局关闭，所发铜元券成为废纸。

同年9月20日，驻防川东、遥领四川省长的邓锡侯批准重庆市政公所印发当10、当20、当50三种铜元券10万吊。后经该所与重庆商务督办收兑，于1926年9月收兑完毕，总数额为16万余吊。

成渝铜元局铸造劣质铜元

1924年3月，杨森占领成都后，将重5.8钱的当100铜元减轻重量，改为重2.7钱，市面上称为小100铜元，渔利一倍有奇。又将重7钱的当200铜元减为重4钱，俗称小200铜元，谋取暴利。每年铸数高达1.4亿枚。

同年6月，重庆铜元局长派杨永懿借商债30万元，收购铜料及制钱，开工熔铸当20文、50文铜元，盈利除偿债外，专供黔军军饷。后又铸造当200的铜元，较旧铸100文者才加二成，且铜质恶劣，商界为此于6月7日罢市。省议会也决议，请省长迅令成都造币厂、重庆铜元局停铸当200文铜元。决议认为“如此铸造，不异政府以当200文铜币为新式武器，间接剿杀我全川人民。”但邓锡侯接管重庆铜元局后，仍大肆铸造劣质铜元，当200文劣质新铜元更充斥市面，旧时10文、20文、50文、100文铜元，被铜元局搜罗熔毁改铸，逐渐绝迹。川中各师、团、县、乡争铸劣币，市面零星交易，因找补不便，多以自制的木筹、竹签、铁片、宰割铜元、小额钱票、锡钱、镔铁钱等代替行使，钱法大乱。12月，四川善后会议通过《四川财政善后案》，决定成都、重庆两厂停铸当200文铜元，银元成色重

量照部定条例办理。后因黔军进逼重庆，战事再起，善后案没有执行。

重庆刘湘、邓锡侯与成都杨森形成对峙

1924年5月26日，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所有川军受其节制。又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

吴佩孚将刘湘置于杨森之下，引起刘湘不满。四川省长邓锡侯顾虑杨森擅权专断，难与共事，便把成都的省长公署交给政务厅长徐孝刚代行，另在重庆设省长行署。刘湘、邓锡侯在重庆与成都的杨森形成对峙局面。

这一时期，四川有督理、省长、四督办、一镇守使，各自为政。全川军队共计21个师，13个混成旅，还有两个总司令以及其他杂色部队，总计约在25万人以上。军队之多，派系之繁，甲于全国。兹将各部队按驻防地简列如下：

国军第二十一师　师长田颂尧兼，驻保宁。独自为系。

国军第二十二师　师长唐廷牧，驻成都。已被杨森收编。

国军第三十师　师长邓锡侯，驻合川、重庆。独自成系。

国军第三十一师　师长陈国栋，驻遂宁。独自成系。

国军第三十二师　师长唐式遵，驻万县。刘湘系。

国军第三十三师　师长潘文华，驻万县。独自成系。

国军第三十四师　师长袁祖铭兼，驻重庆（时已兼有贵州政权，唯仍驻重庆，其在川部队除国军第三十四师外，尚拥有黔军王天培、彭汉章、周西成、吕鹿、刘辅卿五个师，共约四万余人，分驻重庆、合江、璧山、江津、涪陵、綦江、赤水、南川等地）。

川军第一师　师长李家钰，驻广安。邓锡侯系。

川军第二师　师长李树勋，驻长寿、忠州。刘湘系。

川军第三师　师长陈鼎勋，驻铜梁。邓锡侯系。

川军第四师　师长杨春芳，驻泸州。杨森系。

川军第五师　师长何光烈，驻顺庆。中立，独自一派。

川军第六师　师长魏楷，驻梁山。中立，独自一派。

川军第七师　师长陈能芳，驻潼南。陈国栋系。

川军第八师　师长陈洪范，驻嘉定。中立，独自一派。

川军第九师　师长刘文辉，驻叙州。独自一派。

川军第十师　师长刘斌（春藩），驻绵阳。刘存厚系。

川军第十一师　师长蓝世钲，驻雅州。刘成勋系。

川军第十二师　师长张成孝，驻邛州。刘成勋系。

川军第十三师　师长段荣琮，驻安岳。陈国栋系。

国军第二十二混成旅　旅长王鸿恩，驻广元。独自一派（陕军）。

国军第二十七混成旅　旅长孙震，驻潼川。田颂尧系。

国军第二十八混成旅　旅长王陵基，驻大足。刘湘系。

川军第一混成旅　旅长郭汝栋，驻涪陵。杨森系。

川军第二混成旅　旅长何金鳌，驻重庆。杨森系。

川军第三混成旅　旅长白驹，驻成都。杨森系。

川军第四混成旅　旅长刘国孝，驻新津。刘成勋系。

川军第五混成旅　旅长包晓岚，驻成都。杨森系。

川军第六混成旅　旅长费东明，驻自流井。刘文辉系。

川军第七混成旅　旅长蓝文彬，驻荣县。陈洪范系。

川军第八混成旅　旅长郑世斌，驻成都。杨森系。

川军第九混成旅　旅长范绍增，驻乐至。杨森系。

川军第十混成旅　旅长陈兰亭，驻重庆。赖心辉系。

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兼边防军第一师师赖心辉，驻内江。独自一系。

全川江防军总司令黄隐，驻灌县。邓锡侯系。

川边镇守使孙兆鸾，统有边军六个混成旅，另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两个骑兵团，驻川边。

（当时在川部队有国军和川军之分，国军地位比川军高，如陈国栋竟以国军师长名义委派川军师长段荣琮等）。

全川水旱灾、兵匪祸交织

1924 年春夏，四川遭受持续大旱，74 县灾情严重。夏秋时节，川西什邡、金堂以及金沙江流域各县发生特大洪灾，灾区损失甚重。与此同时，熊克武、杨森互争雄长，频起战端，兵匪祸蔓延全川，川民惨况空前。

春夏大旱、灾区遍布全川，其中以通江、剑阁、乐山、彭山、资中、三台、巴县、奉节、汉源、西昌等县尤重。这些地方入春少雨，炎夏亢旱，禾苗、苕、麦并枯。三台井泉皆涸。巴县等县连旱 3 年，草根树皮食尽，流离者载道，死亡枕藉。

7 月，什邡县发生水灾，大雨连续两昼夜，洪水横溢，高景关铁索桥被洪水冲断，白鱼河、石亭江及县西鸭子河沿岸粮田庐舍漂没甚多。

本年为金沙江特大洪水年，8 月开始，沿江市县连降大雨 30 多天。9

月18日开始，水位陡升，连续10余日暴涨。宜宾、屏山、珙县、叙永、高县春夏大旱，秋后水灾，沿岸稻田荡然无存，村舍人畜漂没数以千计。屏山城内可行船，街房坍塌无数。长江洪水高程为309.09米，洪峰流量达每秒36900立方米。

本年，杨森、刘湘与熊克武、但懋辛互相兼并攻战，祸及全川。成都龙泉驿之役、重庆浮图关之役、梁（平）垫（江）反攻、潼川（三台）决战，师行所至，闾阎为墟；勒款筹饷，敲骨吸髓，兵匪交侵，生民涂炭。成渝两商会各筹款10余次，共达200万元。成都发行官银号兑换券，共约200万元，重庆所发官银号及四川银行所发兑换券，共约400万元。这600万元兑换券榨取了商民的血本。此外，又借支成渝两地房租约60万元，预征粮税约60万元，重庆派垫公债约80万元。成渝两地总计筹垫各款近千万元。其余各县，无不承担预征、强派各款。一县所出，多的达数十万元。供款不足，又增设特别捐税，江河、陆路遍设关卡，抽收捐税。自流井盐船，由邓井关到重庆，历卡14处，每船一支，累计抽收1000余元。江津至重庆，百里之遥，共13卡。商旅纳款输捐，超过清末10倍，而各军仍缺军饷，或截商米，或封仓谷，或强令团保供应，商民存储已尽，饥馑随之而来。

民初以来，四川多匪，各军争战，匪势日益猖獗。忠县、永川全城被匪洗劫，哭声震野。成渝两地驻军云集，匪风最盛。城中劫杀大案不断，城郊白昼抢人。兵匪勾结，狼狈为奸。兵以匪为羽翼，匪倚兵为护符，使川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重庆发生特大火灾

1924年8月26日，重庆市区突发特大火灾，由于汲水困难，扑救无力，自26日起火，延烧4昼夜，到29日方熄灭。此次大火，焚毁商店民宅2000余家，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

肖楚女在川的革命活动

1924年9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任命肖楚女为驻川特派员。1922年秋，中共党组织早期理论家肖楚女受少年中国学会成员、重庆联合中学校长熊浚（又名禹治）之邀到重庆任教，适遇川中学界爆发择师运动，大批进步学生被开除出校。1922年11月，肖楚女、熊浚等创办重庆公学，专门接收重庆、成都、泸县等地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的学生共156人。开学不久，即遭反动当局压迫，于1923年1月被迫解散。肖楚女旋赴万县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其间他指导建立该地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3年6月回到重庆，任省立二女师国文教员兼《新蜀报》主笔，积极从事青年运动，批驳国家主义派理论。1925

年1月离川到上海，在团中央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报》。8月，经重庆团地委的再三邀请到渝。同时，团中央获悉潘学海以重庆，成都、泸县三个地方团组织名义与四川国民党缔约并接受其津贴，认为严重违反纪律，决定解散这三个地方团组织。1924年9月1日，委任肖楚女为团中央驻川特派员，授与全权，负责清理整顿组织。后来查明缔约系潘学海个人行为，与三个地方团组织无关，但肖楚女仍然帮助重庆青年团地委进行了整顿，他着重批评了团地委前主要领导人唐伯琨个人主义严重，以及团组织内的错误倾向。他团结大多数，包括反对他，对他有很深误解的同志在内，并引导推动地方团组织参加实际斗争。1924年9月改组由罗世文任书记，杨阆公任组织。1925年1月，由童庸生任书记，杨阆公任组织，罗世文负责学生部。从此，重庆团地委摆脱了"研究小团体"状态，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此时，团地委所辖的市内组织发展到5个支部，还在江北、涪陵、綦江、巴县永兴场建立了4个支部。

四川平民学社在重庆成立

1924年10月26日，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培养革命骨干，重庆团地委发起组织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学社成立。数月之内，社员发展很快，重庆设总社，成都、内江、江津、南川、泸县、宜宾、南充等地设分社。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数是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也有青年工人和店员。平民学社创办了三所平民学校，出版了自己的刊物——《爝光》，肖楚女亲自为该刊撰文。《爝光》宣传革命思想，抨击时政，刺痛了当局，只出了3期便被军阀王陵基查封。

与此同时，团地委还组织了"学行励进会"和"劳工互助会"等团体，在团地委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工人、店员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培养后备力量。

"德阳丸"案

1924年11月19日，重庆发生日轮"德阳丸"私运劣币，抗拒检查，殴伤中国谍查员事件。日本商轮"德阳丸"载运成色低劣的双角银毫到重庆，拒绝重庆军警督查处派出的谍查员检查，船主指使船员将4名谍查员推入江中，并打伤其他人员。军警督查处闻讯派员将船主石井熊藏、大副北神林造等人和查出的劣币两大箱零两袋扣押。驻重庆日本领事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重庆当局奴颜折膝，竟指令放人退币。这就是"德阳丸案"。日本商轮的暴行和重庆官厅对日交涉的丧权辱国态度，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慨，肖楚女和团地委积极投入并领导了这场反帝斗争。11月27日，重庆46个团体在巴县图书馆召开大会，成立

“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在肖楚女支持下，省立二女师提出：不经过各级官厅，由人民直接进行国民外交。12月8日，“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发表第二次宣言，提出6项主张，要求当局于48小时内撤销丧权辱国的渝关监督职务，并向日本提出惩凶赔款要求，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休止”。13日，重庆及江北、巴县各界64个群众团体集合7000余人，高举“外抗侵略，内肃官厅”的旗帜，在打枪坝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会上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通电、抗议和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到省长行署请愿。这场持续一个月的群众斗争，迫使地方军阀政府撤换了重庆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调回了驻重庆的领事，德阳丸案以人民取得胜利而结束。

川省军阀扶植鸦片产销

1924年，四川军阀扶植鸦片产销。1923年黔军袁祖铭驻重庆，为了搜括军费，设立“禁烟查缉处”，在“寓禁于征”的幌子下开始征收烟税。1924年刘湘占领重庆和万县，设“四川全省禁烟总局”，烟土上税之后即凭贴上的“税花”公开行销，其他军阀相继效法，并强迫农民种烟。川西某县规定，每10亩土地必须有3亩种罂粟。凡是拒绝不种的则估收“懒捐”。另一种鼓励种鸦片的办法，是规定种烟只上一年的税，若种粮食则上三年的税，次年再种粮食则上五年的税。在军阀扶植下，鸦片越种越多。于是，一度绝迹的罂粟花又在大巴山麓、长江沿岸、邛崃山地遍地开放。到30年代初，川东涪陵3/4以上的耕地种植罂粟，每年产鸦片23153担。全省140余县，大部分都种鸦片，种植面积占耕地1/30。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记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每年鸦片烟的产量达120～140万担，成为当时全国产烟最多的省份之一。

重庆丝业公会成立

1924年重庆丝业公会成立。四川防区制时代，重庆是军阀必争之地，进出的军阀筹饷派款层出不穷，工商业负担的苛捐杂税十分繁重，商民不堪其扰，乃有成立自己的共同组织来应付军阀压榨的需要。1924年，重庆丝商温少鹤联络丝业各厂商，并以重庆各铁机丝厂为骨干，成立了重庆丝业公会，“以维持丝业之进行，排除丝业之障碍，研究关于丝业之发展上的种种计划为宗旨”；提出“凡业丝而区域未在重庆，但必以重庆为转输者均得加入本会”。因而，重庆丝业公会包括的范围较广泛，计有：重庆各铁机丝厂，本城丝帮、川南帮、川北帮、合川、陕西帮、云南帮、广东帮和上海帮。由于四川是西南的唯一产丝区域，

重庆又是川丝的集散地，有些商户虽到外埠运货，但资金调动、营业策划的重心都在重庆，故重庆丝业公会就成为省内省外经营丝业的一个共同组合。该公会曾经过多次改组，名称迭有变更，如1937年改为四川省重庆市丝业同业公会，1939年以后改为重庆市生丝输出业同业公会。解放后，经过行业调整，贩运、零销部分并入土产输出业同业公会，缫丝业部分并入机器纺织业同业公会。至1958年，随着同业公会的历史任务完成而结束。

四川外贸概况

1924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为71804038元；出口土货53759581元；进出口总值125563619元；入超18044457元。

四川出口夏布达14000担。仅隆昌一县之铺商即达40余家；川帮出口商亦有20～30家。

张荣廷、石荣廷等12人发起组织“重庆山货皮毛业研究会”，调查研究了50多个山货品种、花色的产销和用途等情况。本年开始，该会代替了原有的山货帮“福庆会”，参加重庆市总商会担任帮董。

1925年（民国14年）

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建立

1925年1月18日，重庆团地委联合四川国民党组织发起成立“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是中共中央为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在全国发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团地委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拥护这一主张。促成会选出童庸生等党、团员和进步人士6人为参加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2月7日，重庆团地委召集各界14000余人在打枪坝开欢送赴京代表大会。重庆代表在北京与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綦江代表4人合并为四川代表团。5月底，童庸生等部分代表返回重庆后，向各界代表报告了参加会议的情况。

杨森统一之战失败，刘湘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

1925年2月2日，杨森在四川发动统一之战。杨森任四川督理之后，大肆扩军备战，他的总兵力包括黔军在内总计约20万人，决心以武力统一四川。1925年2月2日，突然出兵袭击

第 10 师师长刘斌驻什邡防地；3 月 1 日，杨森以执行北洋政府“统拨盐税”的命令为借口，派郭汝栋等部出动，屯兵自流井，将刘文辉部旅长费东明赶走。杨森出兵抢夺盐税，不仅关系各军利益，也关系到各军生存。

1925 年 3 月下旬，刘湘召开有赖心辉、邓锡侯、李家钰、陈书农、唐式遵、潘文华以及刘成勋、田颂尧的代表参加的重庆军事会议。刘湘对反攻杨森作了部署。他以联军总司令名义，委派赖心辉为前敌总司令兼第 1 路总指挥，邓锡侯，刘文辉为前敌副总司令。邓兼第 2 路总指挥，刘兼第 3 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 4 路总指挥，第 8 师师长陈洪范为第 5 路总指挥，第 31 师师长陈国栋为第 6 路总指挥，张成素为第 7 路总指挥。准备兵分 7 路抗击杨军。3 月 3 日，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令杨森交出兵工厂、盐税，并责杨森称兵构衅，饬其停止进攻各军。着刘湘“秉公查办，听候处理”。杨森置之不理。4 月 11 日，杨森命所部分道向刘成勋、赖心辉、刘文辉等发动进攻。杨森部节节取胜，部队骤增至 19 个师 12 个混成旅。杨军南抵泸县、合江，东越隆昌、荣昌等县。

5 月 16 日，北京临时执政命：特任杨森署理参谋总长，刘湘兼署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邓锡侯为四川清乡督办。7 月 1 日，刘湘与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袁祖铭为总司令，下达动员令。14 日向杨森大举反攻。8 月 8 日，袁祖铭部的黔军王天培进占成都，杨森退乐山，彻底战败出川。

川东北旱灾，盐源流行伤寒

1925 年 2 月，川东北继上年干旱之后，又遭旱灾，旱灾区域达 70 余县之多，绥定（今达川市）、巴中、通江、南江、营山、城口、万源等县均为重灾区。绥定尤以去年为最甚，秋收无望，小春也无收。通江斗米涨至 12 元，概由下游岳、广运来，沿河防军设卡抽税，有钱也难买到米。一般贫民采根食蕨，或挖白土充饥，路途倒毙者比比皆是。巴中饥民吃尽树皮草根，无以为继，饿死 3/10，无食之家达 8/10。因城内外死尸太多，在郊外连掘两个万人坑均已填满，又继续挖新坑。巴县春夏亢旱，大小春告歉，饿死 70000 余人，易子而食者 11 家，自食子女者 10 余家。

同年，盐源县伤寒大流行，死亡 7000 余人。

孙中山逝世，四川举行悼念活动

1925 年 3 月 12 日，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总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

噩耗传到四川，成渝两地的中共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四川党部，积极筹备悼念活动。肖楚女为《新蜀报》撰

写了沉痛的悼念社论。在肖楚女、杨阆公领导下，重庆团体举行最隆重的悼念活动。党团员组织了宣传队，在群众中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熊克武在湖南常德接到噩耗后，当即发电哀悼，并令联军各部代表但懋辛助理丧事，要求各军停止办公及操练1日，下旗哀悼3日。

4月15日，重庆各界举行哀悼孙中山先生大游行，参加悼念游行的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暨民众共4万余人。

重庆盐帮公所通电抗议兵匪掠夺

1925年5月1日，重庆盐帮公所发出通电，对兵、匪暴征、抢劫川盐的强盗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

川盐税率极高，每盐一俄（约60吨），厂价约1000～2000元，但税额却高达2000余元，税率高于成本，举世罕见。

榷课之外，自流井、重庆等川盐产销场岸军队云集，筹饷集款，格外加重，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盐商血本有限，苦不堪言。

兵灾未了，匪患滋炽，沿江一带城乡市镇，匪棚林立，提引劫盐，捉人勒赎，习为常事，盐船难以通行。沿途设置护商机关，关卡林立，经一地而数处征费，动辄累百盈千，费虽迭缴，船仍阻滞。若匪徒护送，也非钱不行。自邓井关达重庆，沿途有名目的护费竟高达1400～1500元。由重庆达宜昌，杂捐附加，也与此不相上下。

盐帮公所强烈要求军政当局取消暴征，惩治路匪，保护盐运。

张闻天被迫离开四川

1925年5月下旬，在重庆参加革命活动的张闻天被迫离开四川。1924年11月，张闻天到重庆省立第二女师任教，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5年春，在地方军阀政府的支持下，教育界的封建顽固势力和一些报刊对进步力量发起攻击，团地委和肖楚女、张闻天等合力进行反击，在思想舆论界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3月30日，肖楚女、张闻天在重庆川东师范创办《南鸿周刊》，行销成都、武汉、北京等地，他先后在该刊发表政论、杂文8篇，猛烈抨击封建势力，宣传革命思想，支持革命运动，这些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忌恨，只出8期，到5月中旬，重庆卫戍司令部下令查封《南鸿》和平民学社的《爝光》，并勒令肖楚女、张闻天、廖划平限期出境。张闻天被迫离渝去泸。同月下旬，张闻天、肖楚女先后离川。离川前，他们将建党工作移交给了杨阆公。

江津县发生大滑坡

1925年5月23日，江津县四面山林区二台山处横向断裂约700米，

发生大滑坡，房屋毁坏，河流堵塞，形成头道河湖涌（今龙潭湖）。湖长2000余米，宽65～100余米。

声援“五卅”惨案

1925年6月，四川人民大规模声援“五卅”惨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四川，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反帝群众活动迅速兴起。6月7日，重庆工、学、妇女等84个团体联合组成“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开展宣传，组织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并发动市内英日洋行工人罢工，查禁英日货物。重庆航业公会所属11万多船帮工人宣布，宁愿牺牲营业，坚决对英日经济绝交，誓言：“有国无家，誓死不变”。6月30日，各界响应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倡议，举行了盛大集会，参加全国公祭“五卅”死难烈士的统一行动，实行全市大罢工、罢课、罢市。慑于全市人民的反帝怒潮，英领事开始撤退侨民，英轮船也被迫停航。在运动中，重庆团地委发展进步力量，在部分学校和青年中成立了“学行互进社”、“怒涛社”、“破浪社”、“六九赤社”和“青年改进社”等进步组织。

在成都，6月18日成立了“上海英日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到会100余团体，会上通过了简章和宣言。21日，后援会又在西较场召开“五卅”惨案暨追悼何秉彝烈士（何烈士四川彭县人，“五卅”惨案被租界巡捕枪杀），参加大会群众数万人，会后，上街示威游行，是日全城下半旗致哀。按着总商会发出通告，宣布对英日经济绝交的具体措施。宜宾、泸县青年学生奋起抵制英货在该地倾销；南充、达县、万县、涪陵、内江、乐山、自贡、绵阳等地和许多边远乡镇的人民也都起来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全川的革命运动形成高潮，中共党、团组织开始进入比较快的发展阶段。

英国水兵杀戮重庆市民

1925年7月2日，当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宣传队在南岸龙门浩隆茂洋行附近向群众宣讲对英日经济绝交问题时，英国水兵从码头登岸，用刺刀杀戮重庆市民4人，伤10余人，一手制造了“龙门浩血案”，激起重庆人民的新仇旧恨。中共重庆党团组织通过“国民外交后援会”召开群众集会，抬尸游行。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镇压，打伤工人纠察队员，拘留讲演队学生，还遍贴布告，禁止英日企业中的华人罢工，禁止在英侨民住地宣传，禁止童子军持棍棒结队游行等等。

7月4日，四川省议会提出交涉办法6款：一、英舰离渝；二、撤换英领事；三、惩凶手；四、道歉；五、赔偿；六、废除不平等条约。

8月1日，英国驻华代办为“龙门

浩血案”狡辩，竟提出“抗议”。

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成立

1925年8月15日，吴玉章受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以中央党部特派四川党务筹备员身份回川整理党务，抵达重庆。上月成立的国民党四川党部留给吴玉章一个组织部长的职务，开执、监委会议，执、监委均不到场，仅派一、二人敷衍场面。吴玉章、杨阆公、权懋修等积极开展党务，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发展组织，壮大队伍。10月，全川建立了四百多个国民党区分部，有八千多名国民党员。10月20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川代表的选举中，选出了吴玉章、杨阆公、刘公谐、邓劼刚、陈宣三和张克勤为四川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取代了大批右派成员。省党部租定城内莲花池积原里的房屋一幢作为机关驻址，4月初开始办公。因此，左派省党部又称莲花池省党部。

刘湘在自流井召开会议，分配军费

1925年8月24日，刘湘在自流井召开会议，有袁祖铭、刘文辉、赖心辉、邓锡侯、刘成勋、吕超以及田颂尧的代表孙震等参加。会上按财政拟定的标准分配军费，每快枪1支，每月饷款10元。当时川军约有27.7万支快枪，每月共需饷款270万元。会上各军分配军费和驻地如下：

邓锡侯：有枪3万支，月需30万元。驻地为金堂、广汉、彭县、什邡、郫县、灌县、新都、遂宁、安岳、乐至、新繁、合川、武胜等县。

刘成勋：有枪1.4万支，月需14万元。驻地为邛崃、大邑、蒲江、双流、新津、温江、崇庆、彭山、丹棱和雅属、宁属。

刘文辉：有枪2万支，月需20万元。驻地为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乐山等县。

赖心辉：有枪1.5万支，月需15万元。驻地为富顺、泸县、成都、华阳、简阳、江安等县。

田颂尧：有枪1.5万支，月需15万元。驻地为安县、绵阳、绵竹、罗江、德阳、梓潼、阆中、苍溪、巴中、南江、通江、仪陇、三台、中江、龙安四属。

何光烈：有枪0.8万支，月需8万元。驻地为南充、西充、蓬溪、蓬安、南部、营山等县。

刘存厚：有枪0.5万支，月需5万元。驻地为达县、宣汉、太平、城口、开江等县。

刘湘：有枪7万支，月需70万元。驻地为巫山、奉节、云阳、开县、万县、巫溪、梁山、忠县、石邱、酆都、垫江、大竹、邻水、岳池、铜梁、大足、永川、荣昌、内江、隆昌、资阳、

资中等县。

袁祖铭为客军，月分得饷款40万元。

重庆中法学校建立

1925年9月4日，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在重庆大溪沟“懋园”开学。第一期招收学生300余人，附设高初中级学校，招收男女学生60余人。开学典礼来宾20余人，校长吴玉章、法国朋友巴礼斯、各界人士鲜特生，赵松森、周钦岳、胡子昂、文伯鲁先后发热情洋溢的讲话。

为了培养四川的革命人材，吴玉章、杨阆公经过积极筹备，以法国中法大学的名义在重庆创办起中法大学四川分校，由吴玉章任校长，教职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第一批招收学生300多人。党在学校中培养了不少干部，并在学生中发展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重庆党、团地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都在此召开。“三·三一”惨案后，该校被反动派捣毁查封。

成都佛学社欢迎大勇法师

1925年10月11日，成都佛学社集会欢迎大勇法师。法师向僧众、居士宣讲《佛教前途之悲观及其救助办法》。

大勇法师系北京佛教藏文院院长，9月初率留藏学法团入川，10月4日自峨眉山抵达成都，住大慈寺。大勇法师在成都期间，先后在大慈寺、文殊院、草堂寺、昭觉寺、宝光寺等处设坛传法，每次听众数百人，有时达千人以上。

大勇法师在成都吸收了不少佛教徒加入留藏学法团。次年春，法师离川前往西藏。

杨森就任“讨贼联军”四川总指挥

1925年10月26日，杨森在乘轮东下，抵万县时，通电接受吴佩孚所委“讨贼联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职务。

同年8月，杨森残部被刘文辉、邓锡侯等部合围于嘉定（乐山）。9月1日率部逃犍为、宜宾。杨森部将李树勋、王正钧、郭汝栋、何金鳌、杨春芳、蓝文彬、白驹、李雅材、包晓岚、吴行光、向成杰联名通电，服从刘湘节制。边军孙涵也表示脱离战争，回康边原防，杨森率范绍增、王文俊、杨汉域三个旅和手枪大队到达宜宾所属牛喜垴。随即电召在宜宾的李树勋、王正钧、喻孟群、谢国钧等于9月9日前往开会。会上，杨森主张以乐山、宜宾、泸州为据点，扼守岷江、心容部队，与联军谈判停战条件。李树勋提出异议，建议杨森避入滇边。会后，李树勋等遭杨森密令范绍增伏击毙命。其他部将一起投向刘湘。杨森众叛亲

离，无可奈何被迫乞求于刘湘、袁祖铭，自愿解除兵权，请求保护离川，因此，乘轮东下。

11月4日，杨森到汉口投靠吴佩孚。

嘉乐纸厂创办

1925年10月，由李劼人、卢作孚、陈晓岚等人集资5万元，在乐山徐家湄创建四川第一家机制纸厂——嘉乐纸厂，从天津义聚成铁工厂购置44寸圆网造纸机1台，小蒸锅2台等设备，简易上马，以稻草、竹子制浆造纸，质量较差。后经不断技术改造，于1937年产出嘉乐新闻纸，以“纯系国货为特色”。1939年《新华日报》给以预付货款全部包销，业务扩大，该厂在成都成立嘉乐造纸总公司。在抗战大后方缺纸的情况下，嘉乐纸颇有名气，1943年教育部规定一部分教科书用嘉乐纸印刷。嘉乐纸厂最高年产量是1945年，产纸700吨，供应7家书局和《新华日报》等，部分销往西南、西北。

四川第一辆汽车在成都望江楼河边演试

1925年10月31日，成灌马路总局订购的一辆英制奥斯汀小轿车在成都望江楼河边演试，刘文辉和田颂尧乘此车入城，汽车所到之处鞭炮震天，盛况空前。

“四川联成剧部”成立

1925年11月1日，“四川联成剧部”在中城公园剧园古方图书馆宣告成立。该部由成都悦来、群仙、万春、中城各团联合组成，尹昌衡任总经理，张少华、唐广体等任正副干事，特设执行、研究、编辑等部。剧部暂行章程第一条规定：“本部以改良戏曲、普及教育、鼓吹文明、提倡平民道德为宗旨，培植戏曲专门人才，辅助慈善事业兼顾之”。剧部发表宣言称：“凡以前涉及迷信或颓丧志趣及败俗伤风各曲，一律停演，另编有益于国家社会诸本，逐次演唱。”又决定创办剧部学校，以期造就新演员；设立医院，为慈善之助；创办剧报，为推行剧改先导。

四川佛学会成立

1925年11月25日，四川佛学会在成都文殊院召开成立大会。该会由佛学界人士李其相、邓叔才、陈岳安、周心甫、章亥伯等发起和筹办。应邀出席成立大会的军政首脑有：刘湘、赖心辉、邓锡侯、刘成勋、田颂尧等。出席大会的还有各界居士、诸山长老。公推黄肃方为临时主席，宣布《佛学会简章》。刘湘等在会上发表演说。

刘湘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

1925年12月6日，刘湘根据自

流井会议的决议，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这个会议以处理四川的兵工厂、造币厂及盐款为至要议题，实行分配防地。到会的有：袁祖铭、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会议期间，成都各界人士指责兵工厂是祸乱根源，要求停止制造枪弹。省参议会于19日通电请立即将兵工厂改为实业工厂。刘湘拉拢黔军共同打杨森，袁祖铭被推为川黔联军总司令时，曾允诺拨给黔军枪5千支，每年军饷480万元。现兵工厂停办，黔军的5千支枪就无着落，引起袁祖铭不满。善后会议还未结束，刘湘、袁祖铭的矛盾已表面化。

四川茧产量最高年代

1925年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记载》，四川产茧额358092公担（即716184市担），是四川省在1937年前有记载的最高年产水平。主产地为三台、南充、成都、乐山、阆中、眉山、雅安、绵阳、资中等地。

1930年以后，由于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战乱和国民政府苛税的勒索，特别是抗日战争后期，对外水、陆交通完全断绝破坏，1949年产茧9.8万市担，仅及1925年的13.68%。

四川兵额和军费开支总额

1925年，北京政府财政整理委员会编制的《四川省民国14年度收支预算》一书，公布了四川省当年的兵额和全年的收入支出数额。该书说：自1916年以后，四川省内大小凡470余战，陆军由5师增至29师、37混成旅；各县民团亦较前增加5～6倍。估计全川军队与民团共达100余万人之多。1925年全川收入共125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3029万元以上，其中军事费支出占2650万元；不敷额达1779万元之巨。弥补赤字的方法为预征田赋，兴办苛杂，滥铸劣币，借款弥补等。

川盐实行派税包商制

1925年（民国14年）～1936年（民国25年），防区制时代盐税统筹办法遭到破坏，川北盐税归第二十八、二十九军提用，川东各厂盐税归二十军（杨森失败后归二十一军）提用，富荣盐场盐税归二十一、二十四军提用。富荣两场产盐占全川1/2，每年税收约600～700万元。由于分提军队多，月收不足，只好预提税票，派商承领，各地仿效。有时军用孔急，强迫商人承领预缴，予以折扣，最低可至六七折。若无现金，则具缴3月期票，找商兑现，优给利息、有高达六七分者。这种预征，销一儎盐，要垫10儎盐税，小本经营无力承担，其后只余大商20～30家，形成包商，垄断运销。派税的对象也是他们，无形中又成为派商。

包商制度使食盐运销陷入混乱，经营者垫付巨额税课，营运资金短少，不愿购运；形成产销矛盾；食盐抵岸后，又必须守候轮次，为时一年以上，使运商坐失血本；运商盐到岸，岸商不愿即时进货，以维持其在本地销售高价垄断。这就形成厂盐难销、运商货积、销区价昂难售的恶性循环局面。

万县开为商埠

1925年，万县开为商埠。由于桐油等土产出口量的激增，万县商埠地位业已形成。本年设立万县商埠筹备处，旋由北京临时执政府公布开埠文。

万县开埠后，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加：开埠前的1921年，贸易值银10万关平两，1928年为1824万两，1929年为2110万两。以后稍有回落，也保持在千万两以上。

四川外贸概况

1925年，据统计：四川洋货、土货进口总值79604829元，出口土货51190616元，进出口总值130795445元。入超28414213元。

同年，四川产大黄达70万担以上，生丝产量达70000担，丝绸的出口占全省出口物资总额的40%。

重庆海关关税分类统计：进口税67126元，出口税855571元，沿岸贸易税63906元，子口税37787元（进口），吨税1542元，全年进出口税收总额1025932元。

1926年（民国15年）

四川第一条公路——成灌路建成通车

1926年元旦，成灌马路[①]通车典礼在成都举行，一辆16座美制福特汽车由成都驶灌县，此为四川第一条公路。同时，成灌马路长途汽车公司在成都西门、郫县、灌县三处设置了四川最早的一批客运站。

早在1913年，川督胡景伊倡修成灌马路，路长55公里，委戴洪畴为总办，聘主任技师刘饧松测量。1914年，公路由灌县开工，仅修至赵家院长1公里，遭到地方势力强烈反对，当局令缓办。1923年，灌县参议会提议由官商合资修建，省署认可，因集股艰

① 当时四川称公路为马路。

难进展迟缓。到1924年，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助款数千，修至崇义铺（距灌县14公里），又停顿，决定扩募商股，以江津人张鹿秋入股最多，被委负责马路总局，至1925年10月修通，共耗资20万元，历时12年。

中共重庆地委成立

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前，四川已先后成立中共党的支部4个。1月，杨阎公、童庸生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2月下旬，杨阎公，童庸生回到重庆，正式建立地委。地委书记杨阎公，宣传吴玉章(因吴玉章留国民党中央工作，改为钟梦侠负责)，组织冉钧。重庆地委成立时，重庆原有党员19人，从团员转为党员22人。地委成立后，綦江、泸县等地以及陆续建立的省内各地党组织均由重庆地委领导，重庆地委成为全川党的领导机构。以后，地委增设工委，程秉渊任书记、学委，杨伯恺任书记、妇委，程志筠任书记。

同时，重庆团地委也进行改组，书记由团中央指定童庸生担任。3月，童庸生代表党、团地委巡视四川各地时，书记由刘成辉代理。重庆团地委也成了全川团的统一领导机构。

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川籍学生遇难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高校学生和广大市民为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国家主权，示威游行，向执政府请愿，遭卫队开枪射击，伤亡者数百人，史称“三·一八”惨案。川籍遇难者有：国立工业大学学生陈燮（长寿县人）、国立农业大学学生孔林堂（大竹县人）。受伤者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如锦（长寿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周开庆（江津县人）。

陈燮、孔林堂两烈士殉难后，成都、重庆学生、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悼念声讨活动。烈士所在两县均立纪念碑，民国两县志并记其生平事迹。

刘湘联合杨森驱逐袁祖铭

1926年5月4日，刘湘拉拢杨森、刘文辉等川军将领，向守重庆的黔军发动进攻。下川东川军分两路攻重庆。袁祖铭为保存实力，命黔军向南岸及江津方面移动，并将驻重庆的黔军大军撤至南岸。5月10日袁祖铭电刘湘、邓锡侯、刘文辉：“黔军离川，得款立即出发”，并在5月7日下令江、巴两县知事公署，查封木船150支，齐集在朝天门、太平门、储奇门、菜园坝等地，使黔军渡过南岸。20日下午川军各部开进重庆。5月28日，黔军全部退出川境。

日本政府向成都赠送《大正藏

经》

1926年5月中旬，受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局派遣，日本文学家迟塚丽水护送日本政府赠送四川省成都市的《大正藏经》2部及《古檜集》1部，由日本抵达成都。在蓉期间，迟塚参观了成都高师等教育机构，成都文化界名流颜楷、林恕等宴请迟塚。日驻蓉外交官员博松治平为迟塚来蓉举行招待会，颜楷、徐子休、朱清长等出席，并向迟塚赠书，迟塚于席间作汉诗绝句答谢。5月18日，迟塚离蓉返日。

1929年7月，日驻渝领事阿布致函四川省交涉署，请准许将日本政府赠送四川省会的《大正藏经》分送各单位。27日，交涉署函准。28日，由日驻成都外交官博松治平将2部《大正藏经》共66卷分赠成都文殊禅院及市立图书馆。7月底，继至的《大正藏经》共14卷再次分赠文殊院及市立图书馆。

民生实业股份公司成立

1926年6月10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公司创办人卢作孚认为，四川所以落后于沿海沿江各地，主要是交通不便，尤其是未能发挥航运之利，因而主张先办内河短途航运，再逐步沿长江发展。1925年10月11日，在合川召开发起人会议，筹集资本3.5万元后，在上海订造一小火轮。1926年6月10日，公司在重庆成立，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公司宗旨，选出郑东琴为董事长、周纯钦为监察人。卢作孚任总经理。轮船开始在合川至重庆间短途航行。

“万县惨案”激发反帝浪潮

1926年6～8月，英国“万流轮”、“嘉禾轮”、“滇光轮”先后浪翻撞沉中国船5艘，淹毙数十人，损失数万元。英轮肇事后，不负赔偿责任，因此事态愈演愈烈。8月29日，英轮“万流”号在云阳县境内浪沉华船三只，淹毙杨森部属官兵58人，船工28人，沉没饷款8.5万元、枪56支，子弹5000余发。

时在杨森部任职的朱德建议杨森要求赔偿，杨森派轮船检察长率兵8人前往江中查询“万流”轮，遭英驻万军舰“柯克捷夫”号枪击，士兵二人受伤。在英舰掩护下，“万流”轮逃离万县。于是，杨森下令扣留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万通”、“万县”两轮，要求赔偿损失。同时，杨森致电重庆海关监督季叔平，要季向英驻渝领事卢思德提出严重抗议。

9月5日，英国三艘军舰炮轰万县两个多小时，死伤千余人，被毁商店、房屋上千间，造成震惊中外的“九五”惨案。朱德立即会同《万县日报》社长秦正树，在报上刊登《杨森通电》、《四川万县各机关法团暨全县

人民电》、《万县外交后援会通电》、《万县市民抗英大会通电》等，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

9月5日惨案发生后，朱德、陈毅等立即组织了“九·五惨案后援会”，向全川、全国通电呼吁。中共中央于10月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群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民组成“万县惨案雪耻会”，举行了5万余人的示威游行，抽调了60多名优秀青年工人组成“雪耻工人纠察队”。宣传发动市民拒用英日货物。成都市组织成立“成都国民雪耻会”，向全国通电，主张与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内江、自贡、荣县、安岳、彭县、绵竹、绵阳等地也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英斗争。“九·五惨案”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等许多城市成立了“惨案后援会”、“国民雪耻会”等组织，发表通电、宣言，海外许多爱国团体和华侨也纷纷致电声援万县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共产国际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人民发表了宣言，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切实动员起来反对英国在华暴行。农民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巴黎工界等组织通电抗议英国暴行，苏联的许多城市举行市民大会，在柏林、伦敦等地，人民一致反对英国的屠杀政策。英国工党召开大会，指责政府的在华的帝国主义政策。朝鲜青年总同盟、朝鲜前进会、韩国革命女子会及驻上海的韩国青年同盟等，均发通电抗议英帝，慰问万县遇难人民。

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九·五惨案”的斗争在四川持续时间最长，达半年多。

中共重庆地委召开军事会议

1926年9月28～29日，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为了策动川军响应北伐，筹备起义事宜，杨阆公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名义，在重庆莲花池召集川军中左倾将领黄慕颜（中共党员）、秦汉三（中共党员），郭勋祺、杜伯乾、袁品文、陈兰亭等开秘密军事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接着又秘密召集上述人员会商，部署在其驻地顺庆（今南充市）、泸县、合川举行起义。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黄慕颜为正、副总指挥。黄慕颜（邓锡侯部江防二区司令）、秦汉三、杜伯乾（两人均何光烈部旅长）、陈兰亭、袁品文（两人均赖心辉部旅长）分任一、二、三、四、五路司令。会后，各部在驻地积极准备，待命行动。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任命刘伯承为负责四川军事工作的中央特派员。重庆地委先后派遣30多名党员到预定的起义部队地区工作。

成都市工会成立

1926年10月10日，成都市工会举行成立大会。这时，成都党团组织领导的工会组织，在劳工联合会的基础上又有大的发展，全市计有基层工会42个，会员4万多人。10日，到会的245名代表推选出中共党员刘亚雄、钟善辅任正副会长，党员孟本斋等9人为评议员。大会讨论了“禁止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援助罢工案”、“工人休息案”、“经费案”等议案，并作出了配合华西大学学生退学运动举行罢工的决定。

北伐时期四川军阀易帜

1926年秋到次年春，四川军阀陆续易帜，投向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发。8月初，连克长（沙）、岳（州），进逼武汉。9月北伐军攻克直系军阀吴佩孚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汉口。四川军阀善观风色，于是纷纷派代表到汉口向北伐军输诚，请求给予国民革命军名义。10月23日，北伐军武昌行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名义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朱德为党代表。11月27日，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12月12日任命邓锡侯为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各军先后取下自1924年熊克武败退出川后挂的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改挂国民革命军军旗。只有刘存厚仍任“川陕边防督办”，所部仍打五色旗。

国立成都大学成立

1926年11月10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国立成都大学。12月1日，张澜被任命为成都大学校长。他主持校务后，广延名师，用人唯才，提倡民主办校，重视教授作用，实行兼容并包，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支持新思想、新文化，鼓励青年进取向上，形成生气蓬勃的优良学风。

中共重庆地委建立军委会

1926年11月，中共重庆地委建立军事委员会。先是刘伯承从广州奉命回川进行策应北伐的军事工作。11月上旬，成立军事委员会，杨阆公任军委书记，朱德、刘伯承任委员。随后，杨阆公、刘伯承到合川黄慕颜部具体安排起义事宜。预定，黄慕颜部开拔到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部会合，宣布起义；同时，袁品文、陈兰亭部在泸县起义，并到顺庆集中；共同北上消灭盘踞在绥定（今达川市）一带顽固投靠北洋军阀的刘存厚部，再出陕西，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合。

重庆市总工会成立

1926年11月21日，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在此之前，中共重庆党、团组织经过细致的工作，争取了工人的多数，瓦解了右派控制的总工会，成立了由党、团员和左派人士组成的重庆市总工会领导机构。

国民党左派召开省党代会在渝举行

1926年11月25日～12月4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到会有27个县、市党部和特别区党部、妇女代表共6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国民党左派。杨阆公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军事报告；程志筠作妇女运动报告；邓劼刚作商民运动报告。各县市代表分别作了党务报告。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及惩办右派党部反动分子和加强对国家主义派斗争等议案。会议选出李筱亭、杨阆公、朱德、刘伯承等9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刘愿庵、廖划平、陈宣三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李嘉仲等5人为监察委员，熊晓岩等3人为候补监察委员（22名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10名为共产党员）。

泸顺起义

1926年12月1日、3日，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刘伯承指挥的起义分别在泸县、顺庆爆发。1日，泸县驻军旅长陈兰亭、袁品文率部起义。并分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四、第五路司令。3日，顺庆（今南充市）驻军旅长秦汉三（共产党员）、杜伯乾起义。5日，刘伯承自重庆赶赴合川，与黄慕颜（共产党员）率起义的黄部开往顺庆。9日，起义军在顺庆召开誓师大会，刘伯承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杜伯乾分别任二、三路司令。起义后不久，顺庆即遭军阀部队围攻，又因泸县起义部队未到顺庆会合，起义部队被迫退至开江。刘伯承到万县与杨阆公、朱德商量后，于1927年1月赶往形势紧张的泸县指挥起义部队战斗。起义期间，吴玉章在武汉同杨阆公保持密切联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并促使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要求刘湘等停止进攻起义部队。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刘湘纠集四川各军阀部队，赖心辉组织川黔联军共20多个团围攻泸县。5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授予泸顺起义部队国民革命军暂编15军的番号，以刘伯承、黄慕颜任正、副军长。起义军坚守泸县半年。在此期间，中共重庆地委派了一批黄埔军校学生和重庆中法大学的

学生到泸县工作。刘伯承在纳溪开办军事政治学校，培训中下级军官和革命青年。1927年5月下旬，泸县起义部队因寡不敌众，加之一些将领动摇，致使起义失败。刘伯承于5月16日撤离泸县。辗转到达武汉，接受党中央之命赴江西南昌参加八一起义的准备工作。泸顺起义失败后，泸县部队被刘湘、周西成分别收编；退到开江的部队一部分缩编为一个旅，东下鄂西，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泸顺起义是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一次可贵的尝试。

四川妇女联合会成立

1926年12月16日，四川妇女联合总会在重庆成立。随着大革命运动在四川各地蓬勃开展，中共在四川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重庆、成都、自贡、内江、綦江、涪陵、南充、泸县、宜宾等市县都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全省大多数市县建立了国民党（左派）党部，妇女组织也开始扩展到各地。到1926年12月，全省已有10多个县市成立了妇女团体。为统一领导全川妇女运动，四川妇女联合总会于1926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中共党、团地委负责人程仲巷、程志筠及中共党员李瑞华被推举组成妇联总会三人主席团，全省13个县、市、区妇女团体的代表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了《统一妇女运动案》。妇女联合会成立后即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要求迅即召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妇联会于1927年1月创办了《四川妇女》刊物。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由于四川革命形势逆转，妇联总会于4月被迫改组。

军阀掠夺民财，四川发生“执照”风潮

1926～1927年，成都金融市场发生银行“执照”风潮。

1923年前后，聚兴诚银行曾在成都市面发行几种定额执照票（无息存单）。由于该行讲求信用，执照流通情况良好。以后，因成都市面流通的“厂杂版”半元银币，既多且滥，银钱收交，时起纠纷。银钱业、商号为求避免纠纷，采用“执照”方式，记明大洋、厂版、杂版来往数量，作为相互结账的凭证。因“执照”易于识别，便于流通，商民将它作为变相纸币行使。

四川军阀见“执照”走红，认定发行“执照”是“点石成金”、掠夺民财的好办法，开始在自己开办的银行、钱庄大肆发行没有任何准备金的定额执照票。

1923年初，国内政局南北分立，川军拥南者称“省军”，驻成都一带；拥北者称“联军”，驻重庆一带。3月，联军以饷需急迫，由总司令杨森下令设立“四川银行”，发行四川兑换券80

余万元（此券为民国10年印制，背面加盖“此券由四川银行兑现”印记）。10月16日，省军攻入重庆，四川银行撤销，该券尚有38万余元未收回。

同年9月，省军为筹措军费，由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下令设“四川官银号”（又称“成都官银号”），发行四川官银票295万元，规定6个月兑现，实际上只能抵充田粮税款，无法兑现。1924年2月，“援川军”攻入成都，四川官银号瓦解，所发官银票仅收回20余万元。

同年10月，省军攻入重庆后，总指挥赖心辉又令设立“重庆官银号”，将四川银行未发完的“四川兑换券”背面加盖“此券由重庆官银号兑现”印记，继续发行100万元，币值跌至七八折行使。不久，联军反攻，省军败走，“重庆官银号”撤销，所发兑换券仅收回720余元。

1925年11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控制成都后，利用各自的银号、钱庄、银行等，无限制地发行“执照”，流通市面，套取现金。滥发“执照”，造成纸币泛滥，加上滥铸杂版银币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危害了人民生活，成渝商民曾请求严令禁止，但由于停发执照票影响军阀的利益，终使发行执照合法化。当时成渝市面，发行执照者各数十家，既没有保证金，发行额又无限制，因而挤兑倒闭的事件不断发生，构成四川金融史上一大灾难。

各军竞设银行金库，发行钞票

1926～1935年，四川各派军阀先后在自己的防区内开设银行金库，随意发行钞票。

1926年四川陆军第二军（后改二十一军）所设中和银行经军部批准，发行无息存票320余万元。规定当银元兑换券流通使用。1930年9月，该行破产，对市面流通的兑换券，按面值回收158万元，后因发现重号，改以七折收兑70余万元。

1927年初，二十四军各将领集资开设裕通银行，资本20万元，总经理文和笙，总行设成都，在自流井、泸县、宜宾、乐山、雅安、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在该军防区内发行一元、五元两种无期存单，约25万元，借军政力量强行通行。1932年，刘文辉兵败雅安，裕通银行停业，所发无期存单，陆续收回。

1928年4月，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下令在绵阳开设西北地方银行，发行钞票38万元。该行1930年结束时，收回所发钞票。1932年4月，又下令开设西北银行于三台，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五角、二角、一角银元兑换券，发行总额34万元。因多次发现伪券，币信低落，商民拒用。1935年，二十九军“剿共”失败，西北银行经理、职员携款潜逃，在市面流通的4万

余元兑换券未收回，三台商民组团讨债，终无结果。

1930年9月，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下令设立财务总金库，办理该军财务收支，并变相发行货币——粮契税券900余万元。该税券面额分一、五、十元三种，在市面上作十足现金通用。规定防区内上税纳粮、公款收交一律使用税券，不得收受现金或其它货币。

1932年，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成都设立财务总金库，发行粮契税券120万元，在市面流通使用，也抵交田粮税款。1935年初，邓锡侯又将该军康泰祥银号改组为新川银行，发行兑换券50万元，通令防区内各县一律通用。川政统一后，该兑换券作价回收。

四川外贸概况

1926年，四川进口货物总值81653405元，其中进口洋货货值22125630元，土货货值59527775元。出口货物总值40463705元，其中土货出口货值40231071元，土货复出口货值124707元，洋货复出口107927元。全省进出口货物总值122117110元，入超41189700元。

本年，进口贸易比较活跃。中外布匹、五色染料、土产棉纱等货贸易兴盛。第二、三季度土产棉纱进口量大增，绒货也受到青睐，煤油贸易保持销势。出口贸易有较大增长，第一季度，猪肠出口增加50%，药材贸易也有相当进展。桐油贸易不畅，比上年减少1万担。猪鬃出口不利。

1927年（民国16年）

刘湘下令加收进口货物附税

1927年2月28日，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发布命令，自3月1日起，对一切进口货物，不管在下游是否办理纳税手续，一律加收2.5%的附税。

成都建成孙中山铜像

1927年3月12日，适值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经成都社会各界和群众团体发起，由四川省督军府筹建孙中山纪念铜像。铜像设计者为留法归来的雕塑家江小鹣。总高约7米，像高约2米，重约千斤，身着中山装，作佇立远眺状。像座为红砂石质，高约5米，上刻圆形花纹，四面环刻“大道之行”四字。1928年1月23日落成揭

幕。铜像座落在今春熙路南口与城守东大街交接处。

立像建成后，因其造型失真，铸工粗糙，成都各力量于1942年发起募捐，得到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和20军军长杨森的资助，由市政府主持，聘请寓居成都的留法雕塑家刘开渠担任设计造型任务。铜像为座姿，通高9米，像高1.8米，中山着长袍马褂，手握《建国方略》，眉浓目深，作沉思状，端坐中式方圈椅上。座为砂石，外像镶嵌方解石，分三段叠合。第二段白色大理石上刻铜像题名及简介。

194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日举行铜像揭幕典礼，位于春熙路中段街心花圃内。

重庆“三·三一”惨案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早在2月，蒋介石即派杨引之、戴弁、向育仁到川，与刘湘等进行反革命策划，阴谋镇压共产党。3月24日，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炮击南京，酿成惨案，中共重庆地委决定31日在打枪坝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是日，预先化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刘湘二十一军所属之三师王陵基和七师蓝文彬部士兵100多人，以及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所属民团团丁，当大会宣布开始时，即开枪挥刀进行屠杀。从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左右，当场打死137人，伤1000余人。在现场屠杀的同时，军阀、团阀、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分子又纠集地痞流氓捣毁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市总工会、新四川日报社，中法学校、中山中学、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校等革命活动的阵地。4月1日，中共重庆地委组织负责人冉钧被害。4日，杨阆公在打枪坝脱险后离渝赴汉，在轮船上被严密封锁的敌特抓捕。6日，杨阆公在重庆浮图关被敌人挖眼割舌，英勇牺牲。4月10日，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之一的钟梦侠召集临时党团地委会议、推举任白戈为党、团地委负责人，指定詹正圣协助工作。会后，钟梦侠、刘成辉相继离渝赴汉。经过两个月的工作，查清了党、团和革命群众牺牲情况，恢复了部分党组织，并向中央写了报告。6月，任白戈离开重庆前往涪陵，临时党、团地委由詹正圣负责。

四川军阀的清共反共活动

1927年4月9日，四川军阀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联名发表“反共拥蒋”的青（9日）电，指斥中共为“异党”，诬称中共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制造阶级斗争”。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刘湘等人再次发表“反共拥蒋”通电。

4月10日，成都市政当局捣毁由

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成都市党部，封闭成都市总工会，逮捕并杀害了总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孟本斋。

4月20日，国民革命军部分陆海军将领在南京举行集会，联名通电，拥护国民政府清除共产党，完成北伐。川军署名将领有：二十军军长杨森、党代表段远谋、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党代表李仲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党代表刁广孚。电文声明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各军长远在川康，未及与会。

1927年 4月2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向傅义被委为中国国民党四川党务特派员(向与戴傅贤交谊深厚，过从甚密)。向传义在成都成立“国民党四川登记委员会”，作为四川清党、改组的机构。不久，又在成都、重庆分设办事处，负责两大区域的登记工作。根据四川登记委员会制定的《四川省各县市党员登记审察条例》规定：凡属共产党及跨党分子，“当一律拒绝，不得登记”。这是从组织上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的清理和打击。旋向又兼任第24军刘文辉部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接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达成协议，在成都设立三军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向任处长。具体执行清党工作。

川西北联合运动会开幕

1927年4月，中共党员、潼属(包括三台、盐亭、射洪等8县)联立高级中学校长袁诗荛在三台县发起和组织了川西北联合运动会。袁诗荛在运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军阀”的讲话。

杨森率兵出川，进攻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5月5日，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率部从万县出发进攻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命粤、桂、川、黔军阀分兵六路，并会同两湖军颠覆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5月9日，杨森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杨军推进至嘉鱼、新堤后，会同叛军刘佐龙向汉阳紧逼。杨森派师长范绍增占仙桃镇后，遭第八军李云杰师阻击。6月8日杨森军在仙桃镇被北伐军叶挺独立二十四师、李云杰师包围，两师突破杨军防线，歼灭杨部7个团，使杨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6月20日他率残部逃到宜昌。6月下旬败退回万县。

重庆火灾

1927年5月18日夜，重庆城区金紫门外竹林街发生火灾，延烧358家，损失6100余万元，死亡6人。1928年4月19日，重庆再次发生大火。大火自下午3时起至夜3时止，火起自

千厮门洪崖洞，由东川书院街入城，延烧香水桥、石板街一带；上至临江门入城，延烧横街、七星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城外则上至官山下至鱼溪。受灾者7000余家，损失惨重。1931年12月22日，重庆千厮门火灾又起，延烧1000余户，焚死200余人。

涪陵农民自卫军

1927年5月，涪陵农民自卫军迅速发展。涪陵县四镇乡（即蔺市、新妙、同乐三个镇和龙潭乡）农民武装在共产党员李蔚如的领导下从5000多人扩大到8000多人，正式成立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李蔚如任总指挥。他们奋起策应泸顺起义，声讨刘湘制造“三·三一”惨案。6月24日，涪陵县农民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0多人，邻近的南川、綦江、长寿、巴县等地亦派有代表参加。涪陵县农协正式成立后，决定进一步发展农民武装，使涪陵成为“三·三一”惨案后可与重庆军阀、团阀相对峙的革命力量集中的一个基地。7月3日，李蔚如被杨森部驻涪陵师长郭汝栋与刘湘合谋诱捕，押至重庆途中，4日壮烈牺牲于重庆南岸黄桷垭，涪陵农民革命武装随之解体。

刘文辉兼并刘成勋部及防地

1927年6月8日，刘文辉发动兼并刘成勋之战。刘文辉对盘踞雅（安）属、宁（西昌）属和上川南的彭山、双流、新津等县的刘成勋，早有兼并之心。刘文辉与邓锡侯部黄隐、李家钰商定，出兵瓜分刘成勋的地盘和军队，并暗中收买刘成勋的师、旅长。6月6日，刘文辉发出声讨刘成勋的通电，6月8日，刘文辉以夏首勋为司令，指挥张清平、蔡玉龙两部，分3路向刘成勋部袭击，顺利攻下双流、新津、温江、崇庆、大邑、邛崃、蒲江、名山、丹棱等县。刘成勋见大势已去，于6月30日逃到荥经，发出通电下野，于7月3日回到大邑老家。刘文辉占了刘成勋的大片防地，收编了其大部分军队。

吴佩孚逃川，受杨森庇护

1927年7月13日，吴佩孚率僚属及残部取道光山、秭归进入四川。杨森派旅长廖开孝率部迎接入川，杨森亲自用汽轮送吴佩孚及僚属到奉节县城外白帝城永安宫住下。12月27日，蒋介石明令讨伐吴佩孚，称“吴佩孚逃匿四川，煽动土匪，意图扰乱大局。据军事委员会胪列事实具呈，应予严拿究办。”1928年1月1日杨森派彝陵、长安、福川三轮迎吴佩孚残部2000多人到万县。1月6日蒋介石明令免去杨森本兼各职。杨森不理，2月15日送吴佩孚到达县转大竹范绍增防地。吴在大竹竟打出“孚威上将军行辕”和“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招

牌。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贯彻“八·七”会议精神

1927年8月，中共临时省委在重庆成立。7月，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钟梦侠到重庆，8月上旬又派刘披云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入川传达。8月12日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傅烈，组织钟梦侠，宣传刘披云。10月13日，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学习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等4个文件。但会议受到中央“左”倾错误影响，作出了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占据乡场以至县城”等“左”的决定。22日，临时省委发出1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贯彻临时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27日，临时省委党内刊物《四川通讯》在重庆创刊，在此前后，中共川西和川南特委分别在成都和泸县建立，刘愿庵、刘远翔分别任书记。这时，全省30多个市县和地区恢复了中共党的组织，全川已清理登记的中共党员共计442人。

四川各地发生“厂杂版”风潮

1927年，因四川军阀在各防区滥铸半元“厂杂版”银币，劣质半元充斥市面，遭到各地商民拒用，劣币币值狂跌。当年10月，遂宁驻军规定：厂版九折、杂版五折行使；11月，三台驻军宣布：汉字半元一律八折使用，私铸劣币概予拒用。消息传开，川西、川北各县“厂杂”半元大量流向成都，抢购各种商品，商店关门拒售，交易停顿，形同罢市，人心恐慌。公私部门、商号均拒收杂版，厂版以八折行使，足色大银元、铜元多被藏匿，在流通领域造成很大困难，社会经济秩序被打乱，形成“厂杂版”半元风潮。

形势恶化后，邓、田、刘三军部迫于舆论压力，会衔发布命令、布告、声称要捣毁私厂，查禁劣币。然而三军所属各师、旅、团多抵制命令，照常铸造劣币。当时兼任成都造币厂厂长的邓锡侯深感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通电“解甲下野”。各军出于利害考虑，才同意停止私铸。三军部规定：“厂版与大洋同价，每二枚换铜元7000文；杂版每二枚换铜元5600文，由政府用铜元兑换杂版。”但每天仅拨1万吊（每吊1000文）铜元，分设5个点兑换，挤兑现象严重，挤伤、踩伤不少人，官方乘机停止兑换。群众要求查禁劣币的呼声更加强烈，民众和学生自发集会游行，掀起反劣币运动。三军调动军警，残酷镇压民众和爱国学生。

1928年，川陕边防督办刘成厚宣布：四川汉字半元六折行使。6月，成渝市面厂版半元跌至五折以下，杂版仅值大洋二角，已低于币材价值。造币厂只好回收半元杂版，改铸一元大

洋。历时一年的“厂杂版”风潮渐告平息。

成都各学校罢教要求解决教育经费

1927年11月28日，成都国立与省立各学校校长、教职员实行总辞职、总罢教，本日发表宣言：“本年下期，已行课十余周，仅领经费一月之九成。”“各校教职各员，事蓄无资，穷年矻矻，尚不免饥寒之苦，昨已相率罢课。”同时，成都省立各级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出通电：“各级学校开课已三月余，中等以上学校所领经费仅一月之九成，小学校仅一月。当此珠米桂薪，气肃天寒之际，实难维持生活。”“向教育厅呈请，务于11月26日以前，至少筹足一月半金薪，以维生活。殊限已过……经费无着。”“因此，已于11月28日起，停止授课。”

12月5日，省教育厅召集省立学校各校长开会讨论教育经费办法与恢复开学事宜。学生200余人，怒斥教育厅长万克明，勒令交代侵蚀肉款（教育经费）的罪行，并将万拉出游街示众。万克明乘间奔至二十八军军部而得以庇护。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于6日发出命令，诬蔑学生“鼓吹暴动，居心叵测，显有共党从中主使。”命令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多派密探，侦察禁止集会结社”，“倘有暴烈行动，准一体严拿惩办”。

成都各学校的斗争，在全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响，重庆、自贡、岳池等地纷纷响应。成都罢课罢教的斗争历时一月，迫使反动当局表示接受全川肉税划作教育经费的要求，教育厅长万克明被迫辞职。

二十一军设立“丁戊债务委员会”

1927年，二十一军设立“丁戊债务委员会”。刘湘占据重庆之初，防区狭小，收入有限，开支浩繁，举债甚多。在1926～1927年间，负债总额已达800万元，多系商帮承担。6月30日，刘湘发行的钧益公期票突然停兑，震撼重庆。刘湘以信誉丧失，引咎辞职为借口，取得商帮谅解。后经全军协商，决定一面缩编军队以省开支，一面设立“丁戊债务委员会”（1927年为丁卯年，1928年为戊辰年），以甘绩镛为主席，决定分别发行“粮契税借垫券”（以粮契税作抵），“内地税券”（以进口税的二五附加作抵），“整理借款短期公债”（以统税作抵），并成立专门机构办理摊派推销工作。该债券400万元须至1940年10月方能付清本息。

四川外贸概况

1927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74236074元，其中进口洋货货值16645301元，土货货值

52861410元。出口货物总值51838914元，其中土货出口货值51782303元，土货复出口货值11292元，洋货复出口货值45381元。全省进出口货物总值126074989元，入超23397160元。

本年因受内战、土匪骚乱影响，进出口贸易增长不大。春秋两季，除日本棉纱外，其他洋货进口大为减少，煤油无进口，卷烟进口量大大减少。土货进口不佳，出口大有起色。夏布、猪鬃、桐油、烟叶交易兴旺，山货出口货值为6329464元，桐油出口货值为6384868元，生丝货值为11875426元，药材货值为6327147元，夏布货值为9462237元。

1928年（民国17年）

国民党右派策划的省党代会在渝举行

1928年1月15日，经过清党后，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筹备处策划的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大会选举出省党部执、监委委员及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有：唐德安、黄圣祥、冷曝东、刘赓唐、刘质文、陈学池、王竖僧、曹四勿、周重生、马瑶生、王伯常、王岳生、胡汝为、张赤父、张孝生，共计15人。候补执行委员有：冉君谷、颜仲卿、王瑞珍、郭亮东、杜铚春、刘瑞禾、蹇国桢、杨子一、于衡，共计9人。监察委员会委员有：蒋特生、游盛文、刘在方、方琢章、郭昌明、陈阴槐、张俊夫，共计7人。候补监委有：汪蜀宇、陈相尧、洪舜德、陈伯衡、李璧珍，共计5人。出席全国党代会代表有：吕超、谢持、陈敬修、刘禹九、冷曝东、傅真吾、陈仲卿、蒲宾虞、陈天民、黄季陆，共计10人。候补代表有：谢百城、易宇昌、李镜澄、王颛书、彭函农、雷纶、刘梓春，共计7人。

国民党四川省党代会提出“四川党务整理计划大纲”，提出开展工人运动，倡议从速组织总工会及各地工会，在各种工会中建立特别党部，以便指导工人运动。

2月21日，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在重庆发出通电，宣布按第一次省党代会决议，省党部将迁设成都，执、监委员定于3月1日在省就职，正式成立省党部。

自贡盐业工人举行大罢工

1928年2月7日，中共自贡党组织领导2万多盐工举行大罢工。1月

13日，大坟堡盐场资本家无故停产，解雇工人，工人集会反对。2月7日，资本家勾结军队镇压、逮捕和打伤工人。中共自流井特支立即组织2万余名盐工举行大罢工，盐场到处贴满了《罢工宣言》、《快邮代电》，还动员组织自贡各界举行罢市、罢课支援，富顺、内江、荣县、威远的工会、农会也纷纷声援，这场罢工坚持了20余天，取得了部分胜利，打击了资本家和军阀的气焰。

中共临时省委召开扩大会议

1928年2月10～15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四川春荒暴动问题，选举了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周贡植、刘亚雄等11人为省委委员。傅烈为省委书记。这时，全川中共党员共有1015人，有13个县委、23个特支、直属军支部5个，特区1个，通讯处5个。会议根据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着重讨论了组织四川全省春荒暴动问题，制订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由于受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这次会议对本省的政治形势也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在四川组织暴动，客观条件“早已超过”，“只待我们去组织”，就可以“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荒暴动局面”，还在《暴动大纲》中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左”的决定。会议选举刘愿庵为四川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

1928年2月16日，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此前，政府委派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杨廷铨为省立一中校长，引起学生不满，学生成立以进步组织“石犀社”为核心的“拒杨大同盟”，散发《拒杨洪声》传单，坚决反对杨廷铨入校。1月14日，杨廷铨在武装警察护卫下强行入校，并殴打和开除了一些反对他的学生。2月5日，中共川西特委组织400多学生召开声援省立一中学生择师大会，2月14日，省立一中离校学生100余人，由“石犀社”的陈进思等率领，直奔校长室质问杨，遭杨辱骂，引起学生公愤，将杨打死，投尸井中。2月16日，省会军警联合办事处派兵包围成都大学、成都师大等校，逮捕师生100余人，当天下午4时，中共川西特委宣传委员袁诗荛、团特委书记周尚明等14位同志，未经审讯，即遭杀害。省立一中被解散。惨案发生后，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发表抗议宣言，校长张澜及该校教职工相继辞职抗议。成都各界人士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了“二·一六”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旅外川人谋求四川和平统一的活动

1928年2月20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推李烈钧集结四川民众请愿代表、京沪同志、各军代表，订期商榷川事，以备采择。同时，李烈钧致电在上海的戴季陶、卢锡卿、熊克武、黄季陆、王伯涵、谢慧生、黄佛公、赵铁桥和在南京的黄复生、张群、傅真吾、稽述庾、吴晋航、张季鸾、陈戎生、王荫椿、王素仙、李灿东等川籍人士、各军驻京沪代表和赴京请愿代表，齐集南京，共商四川局势、前途和措施，其中包括省政府、康藏绥抚委员会、团务委员会、一切制度和人选问题。会议定于3月1日开始，在国民政府举行。

1月26日，旅京四川国民党员封岳崧、孙壶东、刘选青等，借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旅京川人大会，到会70余人，由封岳崧主席，讨论四川应兴应革各事，以便中央决策参考。会议推举封岳崧、张世镛、曾扩清等15人负责办理请愿事宜。会议呈交国民政府请愿书，对于治川提出具体方案。

2月27日，旅沪川人黄复生、卢师谛、曹叔实、谢慧生、赵铁桥、黄季陆、熊克武等举行四川旅沪同志聚会，对川事发表了14点意见，谋求川政和平统一，其中有：统一省政，废除苛捐杂税、田赋预征，控制兵额枪枝、兵工厂，统一币制，税制和税收机关，保障教育经费独立，严禁军人干涉教育、行政、司法，严禁阻碍交通、任意扣用车船等等。同时还针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妄图分裂西藏的图谋，提出设立康藏绥清委员会的建议。

3月1日，国民政府召集四川民众请愿代表，京沪同志及川中各军代表商谈川事，第一次会议于下午3时在国民政府大客厅举行。本日到会代表有：李烈钧、黄复生、赵铁桥、卢师谛、李星辉、黄真煊、梅恕曾、曹叔实、黄佛公、黄季陆、李献义、稽述庾、吴晋航、喻正衡、傅真吾、王素仙、王荫椿、黄慕颜、杨金宇等28人，由李烈钧主持。会上发言的人有李烈钧、黄季陆、吴晋航（刘文辉军长代表）、喻正衡（刘湘军长代表）、王荫椿（邓锡侯军长代表）、李星辉、黄佛公（四川团务代表）、杨金宇、傅真吾（刘湘代表）、黄朋豪（赖心辉军长代表）、黄慕颜、卢锡卿、赵铁桥。意见复杂纷呈，各持己见；军人代表尤其维护本集团利益，互相攻讦。李烈钧作了小结。

3月4日，四川旅京同志会在南京第一公园内烈士祠开会，到会百余人，公推陈杰作主席，报告会议意图，因政府对川事有所征询，特召开大会，集中旅京同志意见。旋由黄季陆报告3月1日国府会议情形，继由曹叔实、陈伯衡、李绍文等先后发表意见。最后议决：1. 拥护戴季陶等2月27日

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14点建议；2.请中央慎选四川党务人员；3.推代表陈杰、张树勋、黄乃安等9人向国民政府请愿；4.推派9人组织执行委员会办理会务；5.请中央严办共产党人。

3月5日下午2时，国民政府继续开会讨论川事，黄复生、卢锡卿、黄慕颜、曾通一、黄季陆、陈泽霈、杨淑陶、杨全宇、陈杰、曹叔实等20余人到会，各军代表多未列席。李烈钧、王麟生、黄季陆、曹叔实、陈杰等均主缓设省政府、团练民办、黄慕颜反对川事由武汉政治分会处理，主张在省政府设立前，应设川人讨论会。旋由李烈钧宣布，会议不再续开，各种意见均转达政府，政府为川局和平统一作出决策，决不偏袒军人。

南溪农民暴动

1928年4月7日，中共川南特委领导南溪农民暴动。1月，川南特委在自贡召开扩大会，通过了《川南暴动计划》，决定在宜宾、南溪组织农民暴动。2月，中共南溪县委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斗争，在15个乡镇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5000余人。川南特委曾派曾君杰、郑则龙、袁敦厚等到南溪，在牟坪设暴动总指挥部，曾君杰任总指挥，赵之祥任副总指挥。4月7日，各路农民7000余人高举“川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攻占了一些乡镇，消灭了当地的团防武装。10日，在牟坪召开起义胜利庆祝大会。宜宾驻军派两个营围攻牟坪等起义地区，相持7日，起义失败，曾君杰等100多名战士英勇牺牲。

中共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在重庆英勇就义

1928年4月9日，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成员在重庆英勇就义。3月9日，省委书记傅烈和周贡植等，在重庆兴隆巷参加巴县县委成立会议时，被警察发觉被捕。4月9日，傅烈和周贡植等9人被害于朝天门。傅烈牺牲后，刘愿庵代理书记。4月下旬，刘愿庵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由张秀熟代理省委书记。

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发动倒杨之战

1928年5月15日，杨森因庇护逃亡四川的吴佩孚而被免去本兼各职后，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等联衔通电讨伐杨森。杨森部下郭汝栋倒戈，1月21日在涪陵就任蒋介石任命的二十军军长职，接着杨部范绍增就任刘湘所委川鄂边防军司令职，吴行光就任二十军副军长职，三部联合，出兵攻万县。杨森采取不固守地盘、集中兵力、首先击破范绍增主力的战术，胜则出梁山、垫江，直趋涪陵；败则退城口，待机卷土重来。范绍增刚出

兵攻万县，第二十八军十一师师长罗泽洲从背后出兵，占范部防地大竹、垫江及长寿等县。5月22日倒杨军在开江战败，5月23日双方在任市铺激战，倒杨军向涪陵溃退，杨部占领梁山。6月6～7日，双方激战于涪陵，杨森军战胜，占领涪陵。倒杨军战败，郭汝栋、范绍增、赖心辉部分别溃退南川、木洞、綦江。11月6日蒋介石玩弄手法，下命杨森免于查办，恢复第二十军军长职。

国民党四川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

1928年7月6日，国民党四川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成都纯化街原省议会内举行成立大会。指导委员向传义、熊晓岩、叶松石、陈杰、杨全宇等到会，各军代表及机关法团代表1000余人参加。

同年3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卢师谛、黄季陆、黄以镛、向传义、叶松石、熊晓岩、陈杰、李星辉、杨全宇9人为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

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是根据同年2月初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通过的《整顿党务案》的决议进行的。要求各省党部及相当于省党部的机关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指派党务指导委员，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

全川大旱，屏山、绥江大水

1928年四川省春间严重缺雨，夏旱尤重，受灾者70～80县，尤以川西、川东北地区灾情严重。绵阳、剑阁、三台等12县，连年皆大荒旱，收成甚歉，本年自春至夏又大旱无雨，比户稠人，兑成饿殍。12县户口在600万左右，能自给者十之三四，待救者十之六七。

同年夏秋，屏山、绥江（云南境内县）水灾。绥江在屏山上游50公里，金沙江水陡涨数十丈，全城居民铺户，淹没三分之二，漂毁房屋200余间，财产损失严重。屏山的水灾灾情虽无资料记载，但城内有洪水的刻痕，洪水位为305.20～305.60米，洪峰流量为29400秒立方米。

国立四川大学正式成立

1928年9月19日四川教育厅奉大学院令筹设四川大学，专门组织筹备国立四川大学讨论委员会。教育厅长向传义兼任，聘请李阎人、熊晓岩、傅养恬、杨吉甫、伍所南、曹四易为委员。连日开会筹商，决定呈报中央请拨经费，由曹四易赴京陈述费用提案，并作出7项决议，其要点为下：①将成都师大、成都大学、茶叶专门学校，蚕业专门学校以及1927年夏秋季业已联合成立公立四川大学的工业专门学校，外语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等

10校合并改组为国立四川大学。②国立四川大学设文、理、法、农、工、医六科。③国立四川大学暂行附设高级中学，所有在校预科学生一律归入附设高中肄业。④四川大学成立后，各学校专门部停止再招新生，已有之专门部学生毕业为止。⑤为解决四川省师资缺法问题，四川大学教育系附设一年制的师范专科。⑥合并各学校在校生审查后分别编班。⑦四川大学教育经费共应为111万元，但实领数不及一半，请中央每年加拨180万元及开办费300万元。

1931年9月，四川省政府将原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10月9日，省府决定得到国民政府批准。10月18日，三大学正式合并，国立四川大学正式成立，设文、理、法、教育4院、11个系，另有2个专修科，本科学生1337人，教师178人。

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资中会议

1928年9月23日，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4个军长在资中磋商解决四川问题的妥协办法。二十军军长杨森、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未获邀请与会。

资中会议9月25日结束，形成主要决议三项：①统一意志，②裁缩军队，③组织省政府。该决议除由与会军长联名呈报国民政府外，并分电熊克武、戴季陶、张群等川籍旅京沪人士。

杨森等组织“四川同盟军”

1928年10月10日，杨森、赖心辉、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四川江防军总司令黄隐、二十八军三师师长陈鼎勋、二十八军十一师师长罗泽洲、二十军一师师长郭汝栋、二十八军独立旅旅长谢无圻8部为对抗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军长召开的资中会议，在遂宁组织“四川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四川同盟军”），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鼎勋为副主席。会议决定，8部队步调一致，围攻重庆。杨森部由长江北岸经张关铁山向江北进攻；罗泽洲部由邻水向江北进攻；黄隐部由合川协攻江北；陈鼎勋部由铜梁经壁山向重庆进攻；赖心辉部经白市驿向重庆进攻；郭汝栋部由长江南岸进攻重庆。

刘湘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感到腹背受敌，自动将资中、内江等县防地转让刘文辉，让他去牵制赖心辉、陈鼎勋、李家钰，以便自己集中兵力回击罗泽洲、杨森两部的攻势。

国民政府提出整理川政办法

1928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致电刘湘、刘文辉，宣布整理川政办法，要点是：①已任命省政府委员，克日

成立省政府，实现全省统一，结束防区制。②川省养兵巨万，无益国防，徒增内乱、应立即大加裁汰，尽量缩编，厘定兵额军制，不得自由扩充。所有兵工厂，一律停办、以绝乱源。③各防区任命官吏弊害无穷，官吏任命权应集中于省政府。④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应予废止。建立统一征收机关，不得各自为政。⑤整顿全省币制，撤销各处造币机构。⑥应有固定教育经费，并在此基础上，逐年增加，健全教育制度，充实教学内容。⑦各地民团应加收编归各县政府监督指挥，严禁军队强行干预。⑧健全司法制度，法官由中央任免，地方和军队不得干涉司法工作。国民政府要求四川在最短期限内全部实施上述整顿川政的计划。

中央政治会议任命省政府委员

1928年10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

（1）组织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文辉、邓锡侯、向传议、谢持、任鸿隽、刘湘、田颂尧、黄复生、杨森、吕超、卢师谛、熊骅、卢仲琳为四川省政府委员，指定刘文辉为主席、邓锡侯兼民政厅长，向传义兼财政厅长，任鸿隽兼教育厅长，谢持兼建设厅长；

（2）杨森免于查办；

（3）任命刘湘、邓锡侯、刘存厚、杨森、田颂尧、赖心辉、郭汝栋、胡若愚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指定刘湘为委员长，邓锡侯、刘存厚为副委员长。11月13日，国民政府又补刘文辉、李家钰、孙震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

刘文辉攻占赖心辉防地

1928年12月15日，刘文辉出兵攻赖心辉部，当日刘文辉与邓锡侯，田颂尧共同发出“关怀川局，期速戡定”的通电，实际上刘文辉命其师长夏仲实率部，由荣昌进攻占永川的赖心辉部，并将赖军逐出距城30里的小学场。驻来凤驿之赖部师长马昆山，闻永川被刘文辉部夺去，他率部反攻，相持于小坎地一带。12月28日，赖部夜袭夏仲实部，被夏部击退。刘文辉另一部绕道攻占赖心辉的老巢江津，并夹击渡过北岸援永川的马昆山师，马师被击溃。赖心辉率残部退至合江，刘文辉部继续向合江压迫。赖心辉不能在川立足，率残部退到贵州赤水，投靠黔军周西成。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重建

1928年12月18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重建。10月1日，因原团省委书记彭兴道和团省委委员廖时勉叛变告密、党、团省委机关被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团委书记蔡铭剑等20余人被捕。半月后，王陵基在重庆卫戍司令部搞公开审判，张秀熟利用

公开审判的机会，痛斥王陵基。《新蜀报》以《张秀熟舌战王灵官》为题作了报道，在全川引起很大的震动和反响。12月18日，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选举穆青、刘愿庵等5人组成新的临时省委。

下川东之战

1928年12月10日，杨森等发出讨伐刘湘通电，发动下川东之战。

12月16日，刘湘以优势兵力将罗泽洲部打败，罗部撤出邻水，败退广安。12月28日，杨森大军攻刘湘，遭到刘湘部猛烈反击，激战于长寿、江北间，杨军大败，撤出长寿。刘湘命廖海涛、陈兰亭两师攻占涪陵，向垫江推进；范绍增师也向垫江推进。杨森溃不成军，防地忠县、丰都、万县相继失去。杨森再退梁山，又被刘湘部郭勋祺、王陵基夹击，杨森率残部逃往罗泽洲 的防区渠县。

这次大战，刘湘攻占杨森下川东防地23县，收编杨部3万余人，建立了以万县为中心的下川东势力范围。

外轮称霸川江航业

1928年，本年内进出四川轮船1023艘，载运量338368吨。外轮势力强盛，计英轮237艘，78053吨；美轮152艘，47958吨；日轮76艘，36114吨；德轮、芬兰轮各为22艘、14艘；其余法、意、瑞三国轮船数量不等。外轮共计为909艘，占总数88.15%，载运量30.69万吨，占总量90.7%。其中又以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美商捷江为最。到1932年，太古公司航行于川江的轮船有“万通”、“万流”等8艘，总吨位4957吨，全部是1921～1926年造，其中1000吨以上的就有2艘；怡和公司有“嘉和”等轮3艘，总吨位2958吨，1000吨以上的1艘；日清会社有“长阳丸”、“云阳丸”等5艘，总吨位3992吨，1000吨以上的有2艘；捷江公司有“宜昌”等轮8艘，总吨位4363吨。在这些外轮公司中，以太古实力最雄厚，既有适合洪水季行驶的大轮，又有专为枯水期间行驶的浅水小轮。外轮以雄厚的实力和先进的船舶，迅速犯霸了四川对外的轮船航运业。迄止1930年，重庆至上海航道上共24艘轮船行驶，华船仅1艘，95%以上都是外国轮船。

外国轮船称霸川江的主要原因是军阀混战割据，川江和重庆，万县等口岸成为军阀争战之地，华商轮船被拉兵差、运军粮军火已成常事，加以沿江土匪猖獗，华轮频遭抢劫。大多数华轮公司被迫歇业倒闭，少数民轮只好付出高昂的“挂旗费”改悬洋旗，求得苟延残喘。1928年10月，首航川江的“川江轮船公司”因竞争激烈，营运状况不佳；加之本年8月“新蜀通”在湖北黄州境内被撞沉没，10月，“蜀和”号又触礁失事，仅剩“蜀享”

一艘无法维持而宣告破产。卢作孚以艰苦卓越的创业精神和优良的经营管理方式与外轮公司竞争，到1930年，民生公司资本总额增至35万元，比初创时净增6倍。1931年，8个华轮公司加入民生，被誉为“异军突起”。

英美煤油倾销四川

1928年英美煤油倾销四川。

自1925年上海“五卅”事件后随即有抵制英货运动。1927年英美商业公司撤离重庆，煤油进口锐减。仅年底始有27.3万加仑的美国煤油进口。1928年形势渐趋平静，英美两国兵船护送商船运柴油、煤油，本年新进口4971吨、英国亚细亚、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垄断全川煤油市场。两行在川均设有油池贮藏。亚细亚的油池设在重庆唐家沱。美孚行的油池设置较为普遍，万县为其据点之一，储油供应下川东各县；泸县为其另一据点，储油供应川南各县；设于重庆者有三，贮量足够四川3年之用。两洋行在川遍设分销处，销至农村。亚细亚有分销处90余所，美孚行有分销处80余所，其他零售分销环节尚未计算。1928年亚细亚月销额54万余元，美孚行月销额48万元，共计月销102万元，年达1224万元。统计每月输入煤油达12200余万箱。四川原用的植物油灯，部分被“洋”油灯所替代。

四川外贸概况

1928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83417337元，其中进口洋货货值25601562元，进口土货货值57815775元。出口货物总值57680930元，其中出口土货总值57680430元，土货复口货值7591元，洋货复出口货值55881元。全省进出口贸易总值141098267元，入超25736407元。

本年四川山货输出货值6237933元；桐油输出340393担，价值10174131元；夏布出口货值6894444元；药材出口货价7549541元。生丝出口货值13240045元，略高于上年，在上海销势平稳，但本省丝商所得，仅足以补偿本年购茧时所受成都丰元劣币的损失而已。四川当局严禁粮食出口，但本年仍有13210担输出。进口烟草从上年的560担骤增至2117担，水烟贷（铜制吸烟器具）减少11806根。

本年万县施美洋行租售美孚油池（包括净油池、毛油池、蒸汽锅炉、趸船等部分）。从此，四川新式油厂兴起，出口桐油也由毛油转为净化油。

本年四川进口税11434454元，出口税11554342元。复进口税6374825元。

四川人口及耕地概况

1928 年据国民政府内政部估计（1933 年《申报年鉴》）四川人口总数为 47992282 人，据同类资料统计：耕地面积为 107149149 亩。

1929 年（民国 18 年）

重庆市政府成立

1929 年 2 月 15 日，根据国民政府《市组织法》，有关部门决定重庆正式建为四川省直辖的市，成立重庆市政府。

重庆市政府下设秘书处、财政局、工务局、公安局、教育局、土地局、团务局、市金库、南岸管理处、江北管理处等机构。第一任重庆市市长潘文华。

本年重庆市区内的人口共计 232993 人、45038 户（南、北岸人口未计在内）。

省府开办重庆大学

1929 年重庆建市后，省政府根据 1925 年善后会议议案开办重庆大学，由刘湘兼任校长，聘甘绩镛为副校长，本年秋先设预科，1932 年开办本科。1935 年春，聘胡庶华任校长，并在教育部正式立案。

重庆大学校址初设南区菜园坝，后迁磁器镇沙坪坝，占地 750 亩，各类校舍 483 间，年度经费为 37.5 万元，由省政府支付。抗战前夕，重庆大学已建成理学、工学、商学 3 院，有数理、化学、地质、土木、电机、采矿、化工、工商管理、会计、银行保险 10 个系和体育专修科，共有 34 个班，学生 720 人，教职员 196 人。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1929 年 2 月 15 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刘愿庵对中共“六大”精神的传达，讨论贯彻方案，认为四川要加紧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会议总结了四川革命运动的经验。6 月 7 日，临时省委在成都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选举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为书记，组织穆青，宣传刘披云，军委李鸣珂。会议决定省委于 8 月迁重庆。

四川中西医联合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

1929 年初，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激起全国中医坚决抗争。上海中医界首起

筹备召开全国抗议会议，四川成都市医民联合会、神州医学会等中医团体，赓即开会响应，发出快邮代电声援，抗议政府的“荒谬决议”，并派员纷驰各县市医药团体联络，选出梅少鹤、祝敬铭、杨树祺、刘子沉为参加全国抗议会议的四川代表。重庆成立了“全国医药总联合会重庆分会”，推进中西医界团结。选陈士希为主席，代表重庆医界赴南京请愿。一时，省内各地纷起响应，举行抗议集会，写文章、贴标语，发通电。四川代表于3月17日在上海参加有15个省市和20多个县共240个医药团体计380名代表的“全国医药代表大会”，坚持要求政府撤销荒谬的“决议案”。全国中医抗争，得到各界支持。有识见的国民党要员、西医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组织，纷起声援，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撤销了“废止中医案”，并于1934年1月，颁发《国医条例》，承认了中医的合法地位。

四川省政府成立

1929年3月22日，根据上年国民党中央会议决议精神，刘文辉等电呈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四川省政府委员在成都成立，主席刘文辉、委员邓锡侯、田颂尧、向传义同时在成都宣誓就职，委员刘湘在重庆宣誓就职。

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宣布；四川省政府已依法成立，本军所管辖屯戍区域内的各县政务已交还省政府，军内暂设的政务委员会也同时撤销。次日，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也通令该军屯戍区各县，限于4月1日前一律遵照国民政府县级行政组织法成立县政府。

省政府成立前一日，成都第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联合办事处宣告结束。

3月25日，杨森、罗泽洲、李家钰、何金鳌、陈鸿文以及谢德戡的代表在顺庆（今南充市）举行会议，认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共13人，现仅由刘、刘、邓、田、向5人宣誓成立省政府，实属非法，决定联合出后兵讨伐5人把持的“省政府”。会议期间，吴佩孚、刘存厚派代表列军。

上川东之战

1929年4月18日，李家钰、杨森、罗泽洲等发动上川东之战，进攻刘文辉。李、杨、罗等在下川东之战被刘湘战败后支持同盟军，对刘文辉玩弄两面手法，先在幕后，后反助刘湘大得渔人之利十分愤恨。为卷土从来，3月中旬，齐集顺庆，致推李家钰为同盟军主席兼前敌总指挥，调集部队，拟先进攻资中、内江等地，打垮刘文辉。

刘文辉将部队集中资中、荣昌、隆昌，委向传义为前敌总指挥，夏首勋为副总指挥。4月19日，李家钰指挥杨森部何金鳌指挥4个旅、罗泽洲部

陈鸣文旅、黄隐部谢德堪、刘潢冰等部共约100营兵力分3路由蔡家场、太平场围攻资中，刘部林云根坚守，刘文辉坐镇资中督战，血战两昼夜。刘文辉令夏仲实率余中英、张志芳、陈鸣谦3旅经内江驰援，解资中之围。4月21日，杨、罗部战败，分向资阳、乐玉退却。4月23日李家钰急电邓锡侯、田颂尧请求出面调停，表示愿意停战，最后以问盟年抑，不防同盟军撤回原防区而告结束。

万源固军坝起义

1929年4月27日，在中共川东党组织和王维舟发动下，李家俊领导万源县固军坝农起义。起义军受中了万源、城口一带农民自卫军1000多人，成立川东游击军，由李永俊任总指挥，唐伯庄任政委。游击军转战于城口、达县、宣汉、万源边境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多次抗击敌人的围剿。1930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命名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李家俊任司令，游击根据地发展到1500余平方公里，人口数万，部队扩充至2000余人。4月，李家俊奉调省委工作。6月，刘存厚（蒋介石委任为新编十五师师长）纠合万余兵力向游击队发动了第三次围攻，根据地逐步被敌人占领。7月，起义最后失败。

旷继勋率部起义

1929年6月29日，四川江防军黄隐部第七混成旅旅长、中共党员旷继勋率领全旅官兵3000人在蓬溪县大石桥乡起义。1926年，中共就在该旅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发展旅长旷继勋为中共党员，各团长、营、连政治指导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1929年上川东之战后，旷继勋得悉由于叛徒告密，川军军阀密谋围歼该旅，部队处境日渐危急。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了该旅起义计划，并派刚从苏联回川的罗世文和邹进贤（化名朱三元）等赶到部队参加筹划起义。起义后组成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总指挥旷继勋，党代表罗世文，特委书记邹进贤。省委发出《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士兵举行革命兵变宣言》，起义部队按计划应到万源地区与李家俊领导的第一路红军游击队汇合。旷继勋率部紧急行军，转战于蓬溪、西充、南部、达县、梁平、渠县等地，曾一度攻占蓬溪县城和南部的新政，分别建立苏维埃政府。7月20日部队到达达县南岳场。在中共南岳区委的建议下，决定里应外合攻下梁山的猫儿寨进行休整和补充给养。因突然事变，计划落空。7月底，部队在梁山虎城场被军阀刘湘、田颂尧、刘存厚等部队包围、因部队疲惫不堪而被打散。起义失败后，旷继勋按党的指示转赴上海。

《成都庸报》创刊

1929年7月，受中共地下党支持，由第三党成都市委主办的报纸——《成都庸报》创刊发行。

该报社址设春熙路侧锦华馆内，经理李俊夫，社长李守白，主笔兼总编辑董人宁（中共党员），编辑有马天民、汪隽、袁斗文、谭尼甫等。继任社长为冉庆之，代经理高思伯。

《成都庸报》为日报。该报反蒋倾向鲜明，否认当时南京政府的合法性，迳称之为“蒋记中央”。对国民党中央派到四川主持党务的吴淡人、彭纶、徐中齐等，称之为“蒋记中央派到四川之皇子皇孙”；称他们主持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为“蒋记省委”等等；并不失时机地报导国内政治斗争，军阀混战的真象。继续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成都政治空气沉闷。军阀、政客虽热衷于办报，全市共有各类报纸30余种，但大多是拥蒋反共的，有的以迎合市民心态的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成都庸报》敢于直言政治，矛头直指当政权要，这无疑给徬徨中的人们一副清醒剂，因此深受各界欢迎，发行量达到3000份以上。

1930年，随着国民党“清党”的深入，政治迫害日益加剧，该报自行解体。

自贡盐业工人总同盟罢工

1929年8月11日，自贡盐业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举行总同盟大罢工，上万名工人和市民群众包围市政机关达10小时之久。因叛徒出卖，罢工委员会领导成员、中共大坟堡支部负责人萧凤阶和工会骨干方士廷等21人，均于罢工前夕被川南警备司令部逮捕。21日，萧、方二人被杀害于大坟堡的周家冲。本日，2000名罢工工人不顾军警当局的血腥镇压，抬着二烈士灵柩，举行送葬游行，以示抗议。

《新新新闻》创刊

1929年9月《新新新闻》创刊于成都，1950年1月因散布反动言论，被成都市军管会查封终刊。经理陈斯孝。该报每日出四开版两张半，最初每天只印五百份，后来每天销售到两万多份。《新新新闻》在外县聘有特约通讯员，在上海、重庆有特派员、特派记者，地方新闻多是该报显著的特点。

日本考察团来川

1929年10月1日，日本对华文化局派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岸上谦吉等5人来华，调查长江一带水产动物，教育部曾电苏皖赣鄂湘川滇黔新9省政府设法阻止，岸上谦吉等不听劝阻

到达重庆，教育部又电川省当局扣留护照，制止他们深入内地。

全省公路建设迅速发展

1929年11月25日，四川通信社报导，自2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省公路建设成效显著，已通车的路段合计1000余公里，正在建设的路段合计1000余公里。

已建成通车的路段主要有：成都——龙泉驿、成都——灌县、成都——嘉定(乐山)、成都——绵阳、遂宁——潼南、新津——邛崃、遂宁——简阳、遂宁——安岳、嘉定（乐山）——夹江、成都——什邡、成都——赵家渡、绵阳——江油、绵阳——潼川（三台）；

正在建设中的路段主要有：简阳——重庆、潼南——安岳（已完成20公里）、潼南——铜梁、万县——梁山、垫江——邻水、邻水——大竹、潼川（三台）——保宁（阆中）、顺庆（南充）——遂宁（顺庆至蓬溪间60公里已完成）、成都——简阳（成都至龙泉驿间已通车）、重庆——綦江、松潘——茂县、自流进——富顺（自流井至贡井间已于7月1日通车）。

寓禁于征，烟毒泛滥

1929烟税成为四川军阀的主要财源，四川各地军阀在禁烟的幌子下大抽烟税，使烟毒泛滥。各防区设有禁烟查缉局等机构，烟税的种类有烟苗税、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内销税、外销税、红灯税、懒捐以及各种附税等等。烟税不但种类繁多，税率也很高，如烟苗每株至少征洋三、四分以上，甚至不依种烟的数额来征损。如1931年大竹一县抽烟捐12.5万余元；大足县征17万元，涪陵征30万元。烟税在军阀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大。二十一军1930年度的总收入31319172在元中，烟税收入占43.5%。烟毒泛滥于全川，对生产和生活各方面带来了严重危害。粮田面积减少，导致粮食产量锐减。“四川瘾民约占全省人口的1/19，使劳动力受到极大摧残。

地质学家赵亚曾开创峨眉山地质系统研究

1929年，地质学家赵亚曾绘制成第一幅《峨眉山地质图》和《峨眉山地质剖面图》；同时以化石为依据，划分出峨眉山各时代地层，以“峨眉”二字为词头，建立了峨眉山地层顺序，为系统地研究峨眉山地质奠定了基础。

谭锡畴、李春昱调查四川石油

1929年谭锡畴、李春昱随川康调查队数次入川，先在成都、雅安、西昌、康定、雅江、理化（理塘）、瞻化(新龙)、甘孜、道孚、丹巴、松潘、理番（理县）、平武等地，以后又东到重

庆，北至遂宁、蓬莱镇、达县，南到泸县、自流井一带进行地质调查。撰有《四川石油概论》、《达县油田》、《四川盐产概论》、《四川西康地质志》等，对四川盆地的大地构造、地层、盖层、油水动力关系等作了综合论述，绘制了1∶200万的《四川油田位置区域交通及背斜、断层构造略图》。

广州中山大学及两广地质调查所来川调查石油

1929、1931年广州中山大学及两广地质调查所组织了两次四川地质考察团，均由瑞士人哈安姆（A.Heim）任团长，在重庆、自流井、石油沟、峨眉山、蓬莱镇、西康、大雪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著有《四川重庆附近地质构造和石油》、《四川自流井地质构造》、《扬子江上游地质构造志略》、《四川峨眉山构造之研究》等文，把四川盆地内的红色地层划分为自流井系、重庆系、嘉定系。这些地层名称，至今仍被采用。

四川出口桐油获国际特别奖

1929年在加拿大举办的国际油质比赛会上，四川出口桐油荣获特别奖。

自19世纪晚期桐油开始外销以来，四川桐油以产量高、质量好享誉国际市场，特别是秀山一带所产“秀油”质量优异。不少洋行经营四川出口桐油，桐油外销量逐年增加，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的关秤9.4吨，上升到1929年的22620吨，约占全国桐油输出总额的35%（全国为64690吨)占全川出口总值的21.1%。

随着国际市场对桐油质量要求的提高，四川桐油的加工制作也不断改良。1928年美商施美洋行在万县聚渔沱租赁油池，以水蒸气炼制纯度高的桐油出口，万县各桐油厂纷纷效法。从此，四川结束了只能输出粗桐油的历史。次年，精制桐油即在加拿大获大奖。

四川外贸概况

1929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85843065元，其中进口洋货货值26839625元，进口土货货值59003440元。出口货物总值69166965元，其中出口土货货值69067645元，土货复出口54831元，洋货复出口44489元。全省进出口货值总额155010030元，占全国贸易总值的4.33%。入超16676100元。

本年山货出口货值6259537元，桐油出口货值13891907元，生丝出口货值17801175元，药材出口货值7829950元，夏布出口货值9462237元，出口土货货值中，生丝高居首位，占全国生丝出口总值的15%。桐油出口量激增。

本年进口贸易总值创最高纪录，

大多数货项都增加了。洋卷烟的进口成倍增长。

1930年（民国19年）

国民党改组派与拥蒋派在四川的较量

1930年1月1日，国民党改组派在驻蓉三军（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支持下，在少城公园召开“救党迎汪（精卫）大会”，反对蒋介石篡夺政权。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周馥昌出任大会主席，改组派四川省委冷曝东讲话。拥蒋派国民党人数十名进入会场鸣枪、投弹、捣毁主席台。大会主席之一的徐获权及与会群众约100人受伤，5名肇事者被军警捕获。改组派以大会名人发出通电指出，此资暴行乃黄埔学生陈杰、吴淡人、徐中齐、彭纶等人所策划指挥。

同年1月3日，刘湘与龙云、毛光翔联合通电，赞同阎锡三、张学良等上月20月发表的“铲除改组派”、反对唐生智的通电。

同年1月9日，刘文辉因上年12月2日与唐生智等53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汪反蒋，受到何键等来电责问，深感事态严重，去电驻京代表谎称：“前缘豫战开始，唐来电征求意见，因答以效忠党国，一致努力，拥护中央，始终不渝。”然结果“殊非意料所及”，希代表“即转呈中央，以明真相，免惑听闻。”

同年1月13日，国民党重庆市暨江、巴三个党务指导委员会在重庆夫子池联合举行“救党驱汪大会”，表示拥护蒋介石、反对国民党改组派。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陈学池到会报告开会宗旨。

重庆特大火灾

1930年3月14日，重庆市区东水门发生大火，延烧铺店1000余家，死伤10余人，损失约在1000万元以上，灾况凄惨。

1930年（民国19年）8月25日，重庆市区储奇门河街一带发生大火灾，从早上9点过烧到半夜，前后延烧8个多小时。火起于储奇门外，延烧入城，遍及仁和湾、双巷子、金紫门、镇守使署、玉带街、上至三圣殿、大梁子、磁器街，灾区广袤三四里，受灾商民逾万户，仅登船逃离被淹死者就达40余人，财产损失数千万元，是重庆前所未有的特大火灾。

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成员先后牺牲

1930年3月至5月，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成员先后在重庆英勇牺牲。3月，省委组织部长穆青在重庆被叛徒出卖被捕，5月牺牲，4月18日，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在重庆遭特务逮捕，19日牺牲。5月5日，省委书记刘愿庵和程攸生、邹进贤等在重庆因叛徒出卖被捕，囚于巴县衙门，7日壮烈牺牲。6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书记程子健。

四川运动员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1930年4月1日～10日，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四川选派男女运动员共8名参加比赛，获一项第七名，一项第十四名。

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涪陵县罗云坝成立

1930年4月7日，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涪陵罗云坝成立。早在1929年冬，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和一批军事干部先后到涪陵开展工作，在罗云坝组织了农民游击队，并于1930年3月发动驻涪新汝栋部赵启明（中共党员）连起义，进入罗云坝，两支武装合编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李鸣珂任总指挥，起启明任前敌总指挥，全部武装500余人。游击队成立后即经武隆县烂坝子，进军丰都栗子寨，兵力发展到700余人，整编为游击纵队，王岳森任总指挥，以栗子寨为游击根据地，游击地区扩大到涪陵、石柱、丰都、彭水、武隆等县边境。8月，起义部队在数倍敌人的围攻下失败，赵启明率余部转入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继续斗争。

全省教育概况

1930年5月9日，省教育厅发布全省现有中小学、师范学校、教育经费统计数：中学134所，师范学校44所，师范讲习所14所，小学22095所；每年省教育经费约174万元，县教育经费379万元。

川滇交界地震

1930年5月15日，川滇交界发生地震。云南巧家县为滇东繁盛区域，又与川地毗连，颇为热闹。所属金塔湾在金沙江边上，上离蒙姑、下距巧城均25～30公里。地震之时，该处受灾尤甚，地陷甚多，村落房屋全部倒塌，树木多从根拔起。受灾最重者有100多户，均系全家死亡。附近村落被山岩压坏者甚多。县南新塘湾石砌田埂大部震垮，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山坡裂缝宽10厘米、长数十至百余米者有10余条。死伤数十人。

会泽、昭通亦有感。一月之内小震不断。

据现代科学推测，这次地震震中位置在北纬26°6′，东经102°6′，烈度

7～8度，震级5$\frac{3}{4}$级。

成都军警逮捕师生，查封高校

1930年6月8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逮捕西南大学负责人梁伯龙。15日，查封了西南大学，拘捕张竟若等教师10余人，学生60余人；以后又陆续拘捕数十人。岷江大学、民力大学也同时遭到查封。

6月15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令各校严禁学生集会结社和宣传活动，如有故意违反，即根据国民政府禁止学生集会结社令，由军警究办。

6月18日，省政府正式将西南大学一、二学院查封，逮捕教授6名、学生4人，该校第三院，以及由学生会筹办的平民夜校也被解散。西南大学全校遂告解体。

7月10日，刘湘令成区内各学校在7日内肃清“反动学生”。

7月31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在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批杷院23号寝室捕学生龚一平。

重庆新闻业蓬勃发展

1930年6月18日，据《巴蜀日报》报导，重庆新闻事业呈现兴旺发展之势。报社、通讯社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加，计有：

(1) 日报8家。《商务日报》、《新蜀日报》、《大中华日报》、《重庆民报》、《川康日报》、《建设日报》、《巴蜀晚报》、《东方晚报》。

(2) 通讯社约50家。其中按日发稿的18家，主要有：新生命、华洋、东北、革命、三民、秋阳、一间、青年、高舆、环球、四川通信社、国际、大陆电讯社、统一，日闻、大同、渝钟、民众新闻社，其余获准立案的约30家，不定期发稿的约占半数，余者未发稿。

川省夏旱秋潦

1930年夏，四川东部、南部大旱，受灾67县，尤以秀山、彭水、奉节、巫溪、万县、梁山（梁平）、綦江、巴县（重庆市）、永川、荣县、威远、隆昌、荣昌、江安、南溪、合江、西充、南部等县灾情严重。上述地区，入夏以来，骄阳肆虐，田禾枯萎，池堰井田涸竭，饮水俱无，秋收无望。綦江群众曾组织祈雨大会，不料在游行途中，守城军队竟用刺刀乱戳，当场刺死数人，构成祈雨惨案。梁山数月无雨，田禾枯槁，补栽无水。居民无以度日，纷纷自尽，有为债务所逼，悬梁自缢。大批饥民逃往万县乞食。

同年7月，灌县（都江堰市）大雨，岷江暴涨漂去白沙积木，冲毁崇德庙门。索桥损坏，数日不通。毁民房庐舍，坏田以万计。外江流域荡析离居者1000余家，毁桥40余座。

同年9月川西，川中60余县霖雨

为灾，秋禾无收。涪江暴涨，沿河城乡被淹，冲坏桥梁河堤甚多，洗荡流离者千余家。德阳城郊遭洪水冲击，淹没良田万顷，外东大桥也被洪水淹没。

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成立

1930年8月2日，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成立。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重庆召开，继续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各级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省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程子健，全川党组织划为下川东、上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地区。会后，省委发出第18号通告，要求各地派党员到军阀部队组织士兵暴动和建立红军；积极组织米荒斗争，将其扩大为有组织的示威，实行抢米，没收地主豪绅米粮、财物及土地，组织游击队，扩大红军，省行委负责人余乃文、饶耿之等先后牺牲。年底，省行委迁成都。不久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省委、程子健任书记。

理塘附近地震

1930年8月24日，理塘附近发生地震。下坝区房屋大多倒塌，死伤数百人，牲畜死伤更多。据现代科学推测，这次地震震中位置在北纬30°0′，东经100°0′，烈度7度，震级$5\frac{1}{2}$级。

“成都摩登剧社”成立

1930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上海摩登剧社”的唐明中回川，联络王怡菴、李仲宜、陈明中、萧崇素、萧中英等人，在原有“四川戏剧协社”的基础上，吸收公教人员、新闻界、企业界人士和大专院校学生约60人组成“成都摩登剧社”（后更名“现代剧社”），男女同场合演新编话剧。该剧社举行多次公演，演出《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寄生草》、《娜拉》等中外进步话剧，在四川产生了较大影响。

卢作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

1930年8月30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创设于重庆北碚。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四川最早的私立科研机构，1930年3月8日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1893～1952）率领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公司等4单位共15人出川，赴江浙和东北三省考察。他深感北碚科研气氛远低于江浙，决心在四川创办西部科学院，得到蔡元培、黄炎培等的支持与赞助，在上海考察期间就建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同年8月30日回到北碚，集资15万元正式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自任院长，院址设于火焰山东岳庙，初设工业化验所、农事试验场、博物馆和兼善中学，后来相继成立4个

研究所，情况见下表：

名　　称	起止时间	负责人	人数	主　要　业　绩	结束方式
理化研究所	1930～1949	王以章	3	分析化验物质2000多种	并入博物馆
农林研究所	1931～1938	刘振书	8	办农场推广10多个新品种	停　　办
生物研究所	1931～1938	王希成	18	采集动植物标本3.5万号	停　　办
地质研究所	1932～1938	常隆庆	4	矿产调查，绘制地图一批，《叠溪大地震》调查报告	划归四川省地质局
兼善中学	1930～1932	郑献征 张博和			单　　设
博物馆	1930～1937			6陈列室，13503个陈列品 参观人员36万人次	移交实验区署
图书馆	1933～1937			设图书室，期刊室	同　　上

西部科学院的主要出版物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年度报告书》、《中国西部科学院月度报告》、《气象月刊》、《地质丛刊》、《地质研究所丛刊》、《四川产业素引》、《四川煤炭之实用分析》、《中国植物分类检索表》等。为扩大财源，还委托张博和创办兼善公司，该公司开辟了西山坪农场、兼善公寓、兼善餐厅、石灰厂、面粉厂等。

重庆开办机器纺织印染厂、面粉厂

1930年9月，重庆开办三家装备电动机械的纺织印染厂：①沙市纺织公司重庆分厂，资本100万元，有新式精纺纱锭6400锭，月产纱12包；②大明染织厂，资本100万元；③卢作孚先生在北碚创办的三峡染织工厂，资本10万元，备有12马力柴油机1架，铁轮机37部，电动纺织机6部，织袜机20部。

同年开办的还有江北瑞丰机制面粉厂，资本30万元，制粉机器全部使用电力，年产面粉7500袋。

江津兵变

1930年9月3日，省行动委员会领导江津兵变。江津是刘文辉二十四军第一师及第二混成旅防区，副师长兼旅长张志和为共产党员，党在该部有一定的工作基础。9月3日，省行动委员会发动兵变时，张志和已离开江津到成都，兵变前敌人已闻风预作防备。兵变时由李克俊指挥，城外士兵攻入县城，城外许多友军尚未得到通知，代旅长魏孝康廉指挥反对起义的官兵进行反扑，起义于次日晨失败。4日，百余名起义官兵遭逮捕、军支书

记李崇实，县委常委龚秉仁等相继入狱。25日，47人被抢杀。另有一部分起义部队撤出江津城，有的辗转到湘西投入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

刘、邓、田发出反蒋通电

1930年9月6日，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发出反蒋通电。9月8日，李家钰领衔师旅长114人也发出反蒋通电。1930年蒋与阎（锡山）、冯（玉祥）投入百万以上的兵力进行中原大战。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及李家钰、罗泽洲等善观风色，想借机出夔门，扩张实力，特别是四川省主席刘文辉，拥兵10余万，占有防地70余县，野心勃勃，想站在阎、冯一方反蒋，问鼎中原。刘湘为对抗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支持蒋介石讨伐阎、冯。首先从分化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入手。6月24日他派刘佛澄、王海平为代表赴渠县与杨森商谈再次合作，双方达成3点协议：①川东北各将领在中央领导下，一致团结，放弃过去封建式的派系团结；②川东北各将领合作后，集中兵力于重地，武装维持川局和平；③若川战不幸爆发，川东北各军一致出兵讨伐。

刘文辉派张笃伦、冷杰生赴北平，参加8月7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扩大会议。冷杰生电刘文辉：阎、冯已委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和第六方面军总司令，邓、田为副总司令。8月25日刘文辉拟定反蒋拥阎、冯的电文，拉邓锡侯、田颂尧及其部将签字，9月6日发出反蒋通电。

刘文辉正组织各军出兵之际，9月17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命，率兵入关。张学良一出兵，阎、冯的扩大会垮台，汪精卫等人于19日逃太原。刘文辉等急电蒋介石，解释通电是受骗，表示他拥蒋到底。

刘湘发行粮契税券，征收统捐

1930年9月16日，刘湘下令在重庆设立二十一军总金库，即日起发行粮契税券，定额为200万元，税券面额分1元、5元、10元3种，在成区内十足流通行使。凡征税金额在1元以上的，概收粮契税券；各机关拨解款项，一律以粮契税券交纳。后增发至900余万元。

1930年10月，刘湘裁并税捐机构，在重庆设川东税捐总局，统一征收沿江各军所征的统捐、特税、护商费、江防费等各项税捐及费款，收入分别划拨。

广汉兵变

1930年10月25日，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领导广汉兵变。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就对驻广汉的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进行工作，先后派大批的党、团员到这支部队中工作，发

展党员百余人。该旅所辖的3个团，8个营中大都有党的基层组织，还发展了许多共青团员。10月25日，在党的领导下，该旅驻广汉3000余人举行兵变，占领县城，于当天成立了广汉县苏维埃。起义部队因受到一批旧军官的破坏，又遭重兵包围，起义失败。邓锡侯、刘文辉随即下令成都军警团办事处，在成都大肆捕杀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

罗泽洲被部属解除兵权

1930年11月16日凌晨，二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被其独立旅一、二、三团团长李俊、叶维琼、钟明远带兵扣押软禁于南充师部靖江楼，同时被拘禁的还有罗泽洲之弟旅长罗成章。

罗泽洲被解除兵权后，该部将领成立以旅长陈鸿文为主席的临时军事整理委员会维持善后事宜。罗泽洲暴虐残忍，专横跋扈，为害一方，民愤极大。因想脱离二十八军而独立，早为邓锡侯所痛恨。因此，邓密嘱被罗解除独立旅旅长职务的清乡司令刘殿戡，联络另一旅长陈鸿文倒罗。罗被扣押后，邓随后即委陈鸿文、刘瑞文为十一师正副师长，王元虎、陈新前、李俊、程资民、杨宗礼为二十二、二十一、独立第一、二旅旅长、熊玉璋为特科司令，从而收回了顺庆（今南充市）等7县防地。

北道之战

1930年11月下旬，二十八军驻顺庆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扣押其师长罗泽洲、旅长罗成章后，驻渠县的杨森和驻遂宁的李家钰，都出兵抢占罗泽洲防地。李家钰出兵占顺庆、杨森出兵占广安、岳池、渠县、营山、蓬溪5县。罗泽洲化装辗转逃到遂宁，得李家钰帮助招回旧部成立第二十三师。陈鸿文部被杨森、李家钰赶出顺庆，来到成都。邓锡侯既无防地又无粮饷供养这支部队，只好交由刘文辉改编。

1931年3月16日，刘文辉委陈鸿文为川康边防军第2师师长。邓锡侯为收回北道7县防地，与刘文辉联合出兵，19日晚，邓锡侯召集各师、旅长部署向遂宁李家钰发起总攻。李家钰在一夜之间丢了华阳、简阳。21日，邓部马毓智师从简阳龙泉寺推进；黄隐师从淮口推进，陈鸿文部渡沱江攻安岳、乐至。李家钰在遂宁外围抵抗。3月30日刘文辉部占遂宁。

3月31日，刘湘借口制止北道战事，提出借道二十八军三师师长陈鼎勋防地璧山、合川，他命第一师唐式遵、第二师王缵绪及第五旅蓝文彬部向璧山推进。刘湘大军压境，陈鼎勋无力抵抗，4月2日撤离统治10余年的合川。刘湘部占领合川、璧山、武胜、铜梁。

刘文辉部与李家钰相持在顺庆的寒坡岭。3月22日刘湘派1个旅支援李家钰，并送给李大批枪弹。

5月底经刘、邓、田各军协商：李家钰部仍归二十八军编为一师，任李为副军长兼师长，划仪陇、蓬安、营山为防地；师部设周口；罗泽洲为二十三师师长，防地为顺庆，陈鼎勋师以遂宁为防地，北道之战结束。这一战，邓锡侯、罗泽洲、李家钰丢防又折兵，而刘文辉、刘湘势力大为增强。

四川外贸概况

1930年据重庆海关档案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93945690元，其中洋货进口货值22901219元，土货进口货值71044471元。出口货物总值72254897元，其中土货出口货值72142429元，土货复出口货值47946元，洋货复出口货值64521元。全年进出口货值总额165347182元，入超21688794元。

本年出口贸易中，山货货值7909519元，桐油货值12066773元，生丝货值19480482元，药材货值8714470元，夏布货值8676958元，猪鬃货值3460458元。生丝高居出口货值首位，桐油因国际市场需求增加，销路很广，出口量激增。药材贸易趋于平稳，夏布销量仍有增加。

本年进口贸易中，五金电器材料大量进口，由于进口关税过高，土布比洋布便宜，洋布进口减少，洋纱进口相应增加。

1931年（民国20年）

重庆市民银行开业

1931年1月5日，原定资本为50万元的重庆市民银行在状元桥原大中银行旧址开业。董事长温少鹤，总经理潘昌猷。开业时仅收足12万元资本，内有重庆市政府认定的5万元股本。经批准发行5角和1角辅币券，最高发行额达130万元左右。

国民政府任免四川军政要员

1931年2月27日，国民政府发布任免令：特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所有四川各军归刘湘全权编遣；撤销刘湘、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赖心辉、郭汝栋、杨森、胡若愚、刘文辉、李家钰、孙震等的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

4月27日，国民政府命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免去原省政府委员任鸿隽、黄复生、吕超、熊骅、卢仲琳的委员职务；免去田颂尧、邓锡侯、任鸿隽、

向传义分别兼任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职务。任命刘文辉、郭昌明、向传义、张铮、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嵇祖佑、林耀辉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刘文辉兼省政府主席及民政厅厅长，郭昌明、向传义、张铮分别兼任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职务。

重庆自来水公司竣工供水

1931年3月1日，经过5年浩繁规划与建设，耗资400余万元的大型供水工程——重庆自来水公司竣工供水。

建成当年，日供水量约2000余吨，经过改造扩建，到1937年，日供水量已到4000余吨，缓解了山城用水困难的严重问题。

康藏发生纠纷

1931年3月8日，康藏接壤的大金、白利两寺因土司争产，引起纠纷，藏军乘机入康。

3月24日，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专员唐柯三赴川，调查康藏纠纷案。达赖喇嘛电蒙藏委员会称：已令藏军停止行动，听候中央专员和平解决。

4月1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电国民政府告藏军大举进攻、节节逼进情形，请予制止。国府即令唐柯三速往康地调查，并促西康迅速建省，指定以巴塘为西康省会。

6月3日，赵亮功等代表西康13县难民发出通电，详述达赖受英国指使，两度派兵入侵西康经过。并将1914年达赖与英国订立密约及达赖在布达拉宫召集会议，企图分裂祖国的决议案全文作为报告附录。同日，蒙藏委员会特派员唐柯三离蓉西行，前往康定与达赖代表会商康藏纠纷解决办法。

6月10日，藏兵进占理化，距康定仅200里。藏兵约3000人，康兵不足1000人。

10月11日，奉派赴康调查的蒙藏委员会专员唐柯三，以数月调处无方，电蒙藏委员会引咎辞职。

12月1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召集省府委员邓锡侯、田颂尧、向传义、张铮等共商唐柯三、刘赞廷草拟的康藏和约草案，内容包括：将甘孜、瞻化二县划归藏方，并由川省赔偿藏方2万元。与会者十分愤慨，表示绝不承认。

1932年10月5日，班禅向参谋本部建议解决康藏纠纷办法15条。主张西藏绝对服从中央；进康藏军应立即撤退；组建西康省政府；达赖应立即释放所拘后藏人员；划定康藏界址；西藏政务，由达赖主持前藏，班禅主持后藏，政教分开，互不侵犯。

10月8日，康藏双方代表在德格县岗拖召开会议，签订停战协定（亦称“岗拖和约”）。协定规定，汉军以

金沙江上下游东岸为最前防线，藏军以金沙江上下游西岸为最前防线，双方不得逾越。本年10月8日～28日，双方作战部队各自后撤，汉军退至俄兹、德格、白玉以东，藏军退至葛登、同普、武城以西。前线兵力双方均不得超过200人，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自条约签字之日起，共同遵守。

四川省佛教徒代表大会揭幕

1931年3月29日，四川省佛教会举行全省佛教徒代表大会，到会各地代表111人。大会改选执监委员，选举结果：存智、禅安、昌圆、德光、贯一、行乐、戒明7人当选为僧伽执行委员；陈显、傅雨村、牛德封、皮怀白、司徒濬伯、朱伯等6人当选为居士执行委员。大乘、圣九、澄一、祖光4人当选为僧伽监察委员；谢子厚、徐深清2人当选为居士监察委员。

刘文辉、刘湘争霸四川，矛盾扩大

1931年5月20日，刘文辉以给刘湘之母（大嫂）吊孝为名，要与刘湘商谈退还军火、飞机的事。刘文辉以200万元从国外购买的飞机和枪械等，运抵万县时，被刘湘驻万县的师长王陵基扣留。刘文辉与刘湘多次交涉无效，这次登门与刘湘面谈索要。刘湘将责任推给王陵基，并说王陵基不肯退还他也没有办法。刘文辉无奈，采用挖墙脚的办法，策动刘湘师长范绍增、旅长蓝文彬倒戈。刘文辉送给范绍增30万元，蓝文彬15万元，范绍增收钱后立即向刘湘报告。蓝文彬因未报告，10月15日被刘湘扣留关押。刘文辉与刘湘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双方积极准备大战。

重庆时疫流行

1931年5月，重庆近半月以来，气候不调，时疫流行。据市公安局调查，平均每天死亡人数在100人以上，其中多数死于脑膜炎症。

“左”倾冒险主义在川的贯彻

1931年5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常委会，传达共产国际路线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会议认为，全川革命运动“必然迅速的继续的高涨”。党在四川的中心任务和策略路线是发展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加紧兵士运动，造成兵变前提；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压迫与侵略，加强反对改组派、第三党、国家主义派、取消派的运动等。10月，省委收到中央7月发出的指示信。来信指出：目前四川党刻不容缓的任务是立即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加紧反对失望消沉，曲解国际路线为退却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省委将此信作为四川工作转变的基本文件，要求各地党

组织认真学习贯彻。

刘湘发行四川善后公债

1931年6月14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电呈国民政府，要求发行四川省善后公债2000万元，用于办理四川善后（编遣川军）。7月18日，立法院会议通过；7月2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决定8月1日起发行，年息8厘，每年1月31日为付息之期，每6个月还本一次，分10年还清。财政部在四川省内属于中央税收的印花、烟酒税中按月拨付20万元为还本付息基金。

同年，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也电达国民政府，请援例批准发行省公债2000万元，未能如愿。

全川发生严重水旱灾害

1931年全川水旱灾害迭至，春夏大旱，赤地千里，成都、简阳、资阳、内江、隆昌、富顺、井研等39县，去秋至冬少雨，今春夏又旱，小春豆麦已焦，大春难望栽插，饥民以秕糠、野菜、蕉头、草根、白泥（观音土）充饥，灾荒甚重；入秋又遭大水，区域几及全川。

全川受灾县有灌县、彭县、郫县、崇宁、邛崃、大邑、蒲江、隆昌、荣昌、内江、彭山、安县、新津、永川、名山，纳溪、什邡、南川、三台、岳池、广安、合川、涪陵、巴县、泸县、古蔺、南充、西充、蓬安、宣汉、梓潼、南溪、营山、万县、梁山、开江、城口、达县等，灾荒区域，遍布全川。被灾人口高达200余万。

成都粮食缺乏，米价奇涨至每石47元。饥民日益增多，市面抢夺食物的人比比皆是，外南青羊宫大批饥民约400人，估吃大户，并将场外的南瓜、芋、麦数十亩争夺一空。井研县因饥自杀者甚多。宜宾县属白花场，贫民在凉风垭山角下挖取粘土充饥，每日争先恐后，常起纠纷，后挖成一洞，深约2丈，有14人进洞躲雨，岩石被水冲垮崩塌，无一生还。内江县属高梁镇附近岩壁有白泥沙，乡民用以充饥，一日正值人多拥挤之时，岩壁崩塌，将取泥沙男女约20人活埋土中，似此情况，屡有发生。

1931年8月，合江发生水灾。长江和赤水河涨水，合江县城再遭洪灾，农村损失惨重，尤以西南两乡受害最甚，田土谷粮被水摧损十分之七。县城南北门外，漂没民房570余家，受灾者4430余家。

同年8月，屏山发生大水灾。连天大雨，县城水深五六尺，一片汪洋。马边之夏溪、屏山所属之云丁、黄丹、舟坝4个场均遭大水淹没，黄丹、舟坝各场的街道被大水冲去半节，云丁、夏溪冲去房屋各数十间，水中呼救之声惨不忍闻，4场合计淹死民众700余人，牲畜货物损失无算。

同年秋，泸州大雨大水成灾，城区灾民1900余户，淹没大小河街及小市等处。1933年，泸州近城地区及各码头又被洪水淹没。

水灾赈委会核定为一等受灾县者有射洪、威远、资中、泸县、江安、隆昌、江津、开县、云阳、彭水、南川等12县；核定为二等受灾县者有绵阳、江油、潼南等31县；核定为三等受灾县者有郫县、乐山、犍为、成都等42县。

据海关统计：当年湘米上运入川数量为101512担（约508万公斤）。

二刘大战前夕实力和防区

1931年7月底，邓锡侯、刘文辉与李家钰、罗泽洲的“后顺庆之役”结束后，四川军阀割据形势和兵力如下：

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刘湘驻重庆，据有下川东二十八县和鄂西十八县，共计四十六县。有六个师、三个路、又三个司令，总计兵力101500人。

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驻成都，据有川、康八十一县。有五个师、三个路、三个独立旅、七个司令，总计兵力113000余人。

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驻成都，据有川西十四县，甘南三县，合计十七县。有五个师、一个独立营，总计兵力42000人。

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驻三台，据有川西、川北二十六县。有五个师、三个路、一个特务司令，总兵力53000余人。

成都由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合驻：刘文辉据新南门、南门内外一带街市；邓锡侯据皇华馆及新东门、东门城内一带街市；田颂尧据西门、北门及外东兵工厂、牛市口汽车站一带。

二十军军长杨森驻广安，据有渠县、广安、岳池、蓬安、营山五县。有师长三人、旅长八人，共有兵力17000人。

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借驻杨森防地营山，有五个旅，总兵力15000余人。

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借驻刘湘驻地武胜，有两个旅，总兵力7000余人。

川陕边防军总司令刘存厚，据有宣汉、达县、城口、万源四县。有两个师，总兵力17000余人。

刘文辉军队多，地盘大而且富，其自贡及五通桥盐场，更为各军所垂涎。刘湘地盘稍次于刘文辉，兵力与刘文辉旗鼓相当，控制了四川进出口要津，有购运军械弹药之便，又能扼制各军的军火转运。各军均无力与二刘抗争。

“九·一八”事变激起四川反日抗议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其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进攻沈阳东北军，炮轰沈阳城，同时向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成为日本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政治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四川人民群情激愤，迅速掀起反日抗议活动。

9月24日，重庆王家沱和租界租期届满（原约30年为期，本年9月24日到期），全年数万民众罢工、罢课、罢市，并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日口号，强烈要求收回王家沱租界主权。

9月25日，重庆各机关法团、各民众代表筹备成立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

9月28日，重庆各界2万多人在夫子庙集会，抗议日军侵占东北，杀戮中国人的罪行。会后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四川各界抗日救国大会”等组织，广泛开展反日活动，不买卖日货，不卖粮食和蔬菜、食盐给日本任何团体和私人；在日本工厂、商店工作的员工罢工，不为日本做工。

9月29日，成都各界300多个团体约数万人举行反日大会，声讨日本侵略，要求团结抗日，会后，成立了“四川抗日救国大会”、“四川国难救济会”、“成都工人反日团”等组织。

10月10日，成都各界数万人又在少城公园集会、游行，发表对日宣言，实行经济绝交，并要求川军出川抗战。

自9月下旬始，自贡、广安、泸县、南充、万县、西昌等地，都先后举行了反日抗议活动，成立抗战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收回重庆王家沱日租界运动

1931年9月24日，重庆各界群众掀起收回南岸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重庆南岸王家沱日租界30年租期已满。为了按时收回租界，重庆人民数万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并向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请愿，强烈要求如期收回日租界。

自1928年底以来，中共党组织影响下的“反帝大同盟”、“反日大会”等组织曾多次提出要求收回王家沱日租界。1929年9月各界群众还专门成立“重庆国民废约促进会”掀起收回王家沱的群众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斗争，1931年10月24日，市政府派军警接管了王家沱日租界。但次年，日本又以看守财产的名义，经国民政府同意，派日本侨民再次回住原王家沱租界。直至抗战开始后，又才由重庆市政府接管租界财产，日领事下旗回国。

四川开办的主要银行

1929～1931年10年间，四川开办的主要银行有：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美丰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

庆市民银行、四川盐业银行以及二十一军总金库等。这些银行大都发行钞票。成立较早的交通银行在该行发行的钞票停止兑现后即已停止营业。1919年开办的大中银行曾经盛极一时，但因受北京旧政权的债务拖累而关闭。1926年开办的中和银行曾有几年信用昭著，但在1930年5月间市场上发现大量伪造该行钞票，该行因而亏累至于破产。

四川外贸概况

1931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87365600元，其中洋货进口货值24954132元，土货进口货值62411474元。出口货物总值56800555元，其中土货出口货值56673105元，土货复出口货值7839元，洋货复出口货值119611元。全年进出口货物总值144166161元，入超30565051元。

本年出口土货中，山货货值6946183元，桐油货值7245800元，生丝货值14181498元，药材货值9250422元，夏布货值5011547元。

本年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和各埠普遍发生的银价暴跌的影响，四川贸易呈现下降之势，仅重庆口岸贸易额就下降约17605400元。

久和公司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川丝外销断绝，积压存丝达6000担以上。多数丝厂无力支撑，相继倒闭。全川年产量降至5500担，约值300万元。重庆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缫丝行业，产品无法外销，仅经营少量内销业务。由同孚、大有、天福、肇兴、同泰、华康、谦吉祥等丝厂组成的“久和公司”，发挥集团优势，联合经营，也仅维持一年，宣告失败。

1932年（民国21年）

四川人民声援“一·二八”抗战

1932年2月，抗日救亡运动在川中各地兴起。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消息传来，四川各界群众纷纷开展声援活动。2月4日，成都建立“国民救国会议四川各界民众促进会”，发出通电，重庆分别成立“四川民众督促川军出兵大会”、“中国义勇军四川赴难队”、“四川停止内战大同盟”等组织。3月10日，全市数万市民游行，吁请四川各军出兵抗日。

交通部提高邮费，激起各地人民的抗议活动

1932年春，交通部通饬全国邮政局，自二季度开始，挂号信、常信每件增收邮费2分；印刷品收费加倍，西南边远省份，加收3倍之多。

川省各市县对邮费提价办法反应强烈，社会各界抗议活动纷起。成都、重庆文化教育界、出版界、商会自4月下旬开始，不断呈递公函、投书报刊、举行集会、停业罢市、坚决反对这种摧残文化教育事业，增加人民负担的行径，一致要求收回成命，关心民瘼，取消邮费附加费。但是，国民政府无视人民呼声，此项邮费附加，仍然维持不变。

刘湘派兵入鄂西“剿”红军

1932年3月12日，刘湘、刘文辉亲任总预备军正副司命长官。3月25日刘湘升范绍增为第四师师长，命其受第一路纵队司命王陵基指挥。刘湘以抗日为名，命王陵基率独立旅旅长兼荆沙警备司令郭勋祺，第三师第九旅旅长张邦本及范师第十一旅旅长贺森权等部出川。蒋介石任命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派王陵基代理，派参谋长袁承武驻王的指挥部。各部先到宜昌驻3月后，刘湘才下达围攻洪湖红军的任务。王陵基命郭勋祺旅进至潜江、熊口、龙湾，即按兵不动。范绍增率田良桢旅，经沙市、潜江，进占老新口后，贺龙的红三军第九师主动出击反攻，范部与红军相持1月，伤亡近千人，7月中旬，田旅被红军围歼两个营，范绍增右臂受重伤，退下火线。由副师长罗君彤代理指挥作战。1932年夏秋，蒋介石调集数十万重兵对鄂豫皖、湘鄂西洪湖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进向四川北部转移。

蒋介石怕川军占湖北防地，命川军返川。

二十一军清理借款发行公债

1932年4月，二十一军为整理重庆金融，以渝万两地税捐作抵，发行库券200万元，约定半年偿清。为清理债务和调节军需，年内又先后发行库券和公债5次，发行总额累计已达2720万元。其中库券债额2000万元，约定偿还期限6～12个月；公债债额720元，约定偿还期限推迟到8年后。至1934年9月，该军发行库券及公债共16次，应偿本金7985万元，未偿部分4350余万元。

峨眉山千佛顶设立高山测候所

1932年8月1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为参加第二次国际极年测候活动，在峨眉山千佛顶设立高山测候所。

1929年9月，国际气象会议在哥

本哈根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4个国家。他们一致认为，在1882年至1883年间进行的南北极地气象观测，即第一次国际极年测候的收获十分丰富，为进一步搜集资料，决议在第一次国际极年测候的五十周年，再组织一次类似的测候，时间订在1932年8月到1933年8月共13个月。1931年，主持极年委员会的丹麦气象研究院院长考尔博士，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要求中国参加合作。竺可桢所长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就决定在国际极年测候计划期间筹建泰山和峨眉山两处高山测候所，作为合作的内容之一。1932年7月6日，气象研究所派胡振铎等3人，携带气象仪器从南京出发，7月30日终于到达了峨眉山千佛顶，8月1日如期开始观测，至1933年8月31日完成观测任务后即行撤销。

重庆汤氏字号连锁倒闭

1932年8月底，重庆金融、商业巨子汤子敬父子经营的民记钱庄受汉口昌和烟土公司倒账影响，周转失灵，比期无法收交，首先倒闭。受到牵连的汤字号钱庄、大成、同生福、正大永、峤源等共8家，随之倒闭。与汤字号往来较多的诚大、鼎盛、同丰等有关钱庄和商号，亦因受牵连而歇业。

汤子敬父子为重庆巨富，人称“汤百万”、汤氏经营的钱庄、商号占重庆经济实力1/3。这次连锁倒闭，震撼山城，给全市金融、商贸市场造成混乱和紧张。

二刘大战拉开序幕

1932年9月29日，李家钰、罗泽洲下令向刘文辉开战。李、罗自北道之战后，防地大部丢失，兵力损失一半，为了生存，只得投靠刘湘。刘湘也助以粮饷械弹，使李、罗为他效力。1932年9月29日，李家钰部队向周口移动，罗泽洲驻武胜的部队则向李渡移动。10月1日夜，罗泽洲的熊玉璋旅向距顺庆70里的李渡、邓锡侯部陈鼎勋师康岷山团发动进攻，刘文辉部陈鸣谦旅调达凤岗，邓明枢团前往增援，迫使罗泽洲部退嘉陵江东岸李渡一线。罗泽洲在李渡点燃战火之后，抢先向蒋介石告状。10月4日，驻营山的李家钰部向顺庆发起攻击，与刘部陈鸣谦旅在李渡至荆溪场一线激战。10月14日刘湘联合田颂尧、杨森及李家钰、罗泽洲共同出兵攻刘文辉，拉开了刘湘、刘文辉大战的序幕。

二刘兼并之战

1932年10月19日，由刘湘指使师长唐式遵等94名师、旅长发出讨伐刘文辉的通电：“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重权轻义，素性猜狠。在个人非载福之器，在国家非任重之材，自隶戎行，好出心机，因缘时会，操

纵两端，遂有今日之势。彼据地半省，经济极充……乃彼两任主席，对于治川大经大法，从未提及；而于分化他军，收买队伍，钳制部属，强为奴用，则又自诩多能。言之津津，道之凿凿，甚至分遣无赖，阴谋暗杀，嗾使匪类，扰人防区，花样极多，变法层出……更挟其日暮穷途之武力，藉名国防，加倍搜刮。弟兄叔侄，遍据要津，家奴养子，横行廛市。川西南田连数县；成都市甲第成街。银行广设于蓉渝，商号满布于防区。……式遵等前拟治川纲要时，往前商榷，已预料文辉必为此大政策之破坏者。……式遵等文日（12日）通电时，对于文辉尚复曲予涵容，隐示微意冀其或有悔悟。今果怙恶，故违众意，是彼已自绝于人。……一面拟呈前纲要，刻期实施，以除祸根而奠川局”。这是刘湘大举进攻刘文辉的信号。

当刘文辉陷入孤立之际，刘湘于10月18日指挥联军向刘文辉部全面展开进攻。刘湘以李家钰、罗泽洲、杨森三部从遂宁、安岳、资中方向压迫刘文辉的左侧背，同时警戒右翼；王缵绪师向潼南、安岳方面进击；东路总指挥唐式遵向永川、荣昌、隆昌、富顺、宜宾方面推进；潘文华师向永川、自流井、富顺推进；南路总指挥穆瀛洲沿长江向宜宾推进。刘湘亲自指挥空军及海军“巴渝”、“嵯峨”、“长江”号配合步兵作战。

这一战，刘文辉先失永川、江津、潼南、大足，11月31日继失隆昌、荣昌。12月26日前后丢失泸州、富顺、内江、自贡、宜宾等地。

刘田省门之战

1932年10月21日晚10时，刘文辉、田颂尧两部在成都巷战。刘文辉为了称霸四川，1930年1月，偷袭田颂尧控制的四川兵工厂，运走部分枪弹和机器，还收编田部团长帅国桢为第十三旅旅长，刘、田的嫌怨由此加深。1932年7月，刘文辉又挖走田部寇澄清团，委寇为宪兵司令，更引起田颂尧的痛恨。这时，刘湘、刘文辉为争霸四川，准备一决雌雄。但刘湘不敢贸然发动进攻，为稳操胜券，必须折散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保定系的联合。刘湘支持田颂尧先对刘文辉开战。于是，在1932年10月21日晚10时，在成都北城开火。田军占西北两门，刘文辉收缩兵力将东北门的部队撤走。田部趁势在上陞街、山西会馆、后子门一带构筑工事；派王铭章师一旅在后子门与刘军对峙，刘军在煤山（今体育场处大土堆）上架大炮数门，对准田颂尧司命部。1932年11月16日，刘文辉、田颂尧两军在成都决战。田军夺取煤山，17日下午，刘军旅长王治人率6团兵力向煤山冲锋，守煤山的田军被迫撤至昭忠祠抵抗。田军副军长孙震亲自指挥与

刘军争夺煤山。战到11月21日，田军全线失利，经邓锡侯及成都士绅呼吁调停，刘、田达成停战协议。到10月25日，田军在邓军的掩护下撤退出城。

国民政府组织工程师考察三峡工程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技正恽震组织长江三峡考察队。恽震率水电工程师曹瑞芝、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处长宋希尚、美籍测量工程师史笃培、技术员陈晋模等人。自宜昌溯江而上，沿途考察了葛洲坝、三斗坪、黄陵庙、万县、长寿、重庆等地，提出开发三峡和葛洲坝规划。这是四川最早的水平较高的水电考察和规划。

南部农民暴动

1932年11月25日，中共党组织领导南部升钟寺、保城地区农民举行武装暴动。1928年初，南部县就建立了中共党的支部，1932年秋，中共南部县委领导区委已达4个，党支部27个，党员共250多人。升保地区党、团员和农会会员人数较多且最集中。11月25日，党领导升、保地区农民举行暴动，组成“川北工农红军游击队”。总指挥张友明，政委谭德武（化名覃文），军事指挥罗南辉。升、保农民起义震动了整个川北。田颂尧命令南部、保宁〈今阆中〉、剑阁、盐亭等县武装向保城进攻。川北工农红军受挫，12月22日，指挥部在南部县双风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张友明等于24日突围后到南江县桃园寺任伟章旅做军运工作。

荣威激战

1932年（国民21年）12月4日，刘湘、刘文辉的荣威之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两军全面展开战斗，刘文辉投入7万兵力，刘湘出动5万兵力。战事以荣县的老君台、老林口、犍为县城和仁寿县江家场一线最为激烈。仅江家场一战，双方死伤2000余人。这一战事关彼此成败，所以刘文辉到青神指挥，刘湘则坐镇自流井。刘湘军潘文华师郭勋祺、范子英、章安平旅向扼守笋子山的刘文辉军夏仲实师进攻，双方激战3日。与此同时夏仲实部从荣县文昌宫、赖河坝一线发动猛烈反攻。潘文华师不支败退至长山桥、啸天岭一线，再退至距荣县10余里的白石沟。接着，刘文辉部冷寅东、陈鸿文两师反攻荣县、威远，双方集中3万多兵力，在荣县西南的老林口、老君台、杜家井、文昌宫一带激战。刘湘部伤亡较大，退至白石沟。冷寅东率部占据观音岩、老君台。潘文华部为争夺老君台与冷寅东部鏖战5天，官兵战死达3000余人。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部驻仁寿，12月19日晚率部经球溪河进入杨森部防线到资中金带铺，倒戈投刘湘，被刘湘委为

师长。刘湘、刘文辉两方相持不下，于12月21日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

红四方面军入川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冲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展转西征，于12月中旬到达陕南西乡、城固地区，只有15000余人，乘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向南进军，翻过大巴山向川北挺进。12月25日，解放通江县城。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中县城，2月1日攻克南江县城，很快攻克通、南、巴三县广大地区，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四川外贸概况

1932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60128620元，其中洋货进口货值3401707元，土货进口货值56726913元。出口货物总值40579519元，其中土货出口货值40573278元，土货复出口货值6241元。全年进出口货物总值100708139元，入超19549101元。

本年受淞沪抗战影响，出口市场萧条，对生丝、猪鬃、羊毛、小兽皮、牛皮等的需求量减少。药材一直是四川主要的出口产品，但马六甲海峡和暹罗（泰国）的经济衰退，影响了这些东南亚国家华侨对四川药材的需求。南北战乱也影响了四川药材对各省的输出。唯一获得巨大成功的土货是桐油。本年运往下游的四川桐油共计10.8万担，比1930年有大幅度增加。

本年进口贸易也不顺畅，但洋货的直接进口量均略有增加，商人们倾向于在重庆直接进行交易，而不愿通过在上海和汉口的代理机构交易。

本年进出重庆港的船只859艘，总吨位为292497吨。

1933年（民国22年）

《社会日报》创刊

1933年1月12日，《社会日报》在成都创刊。该报社长刘静修，副社长宋大鲁、编辑有欧阳缉光、谢定铨、陈克农等。该报以专访特写形式报道重要国际、国内、本省市新闻、大事，以消息快捷、翔实为特色。因此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成为当时成都各种日报中发行量较大的报纸。1935年1月7日，成都警备司令部以“载有肖、贺匪势消息，不啻为匪张目”为由，将

该报查封。

《川北穷人》创刊

1933年1月，中共赤江县委书记吴永康创办《川北穷人》报，四开两版。2月份后，《川北穷人》报改为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机关报。8月，《川北穷人》停刊。分别创办《共产党》作为中共川陕省委机关报，《苏维埃》作为川陕省苏维埃机关报。1935年4月红军北上时两报随即终刊。

《战场日报》创刊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军区政治部、西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报《战场日报》创刊，四开两版。8月，《战场日报》停刊，改出《红军》报。西北军区政治部这张机关报，于1934年8月终刊。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20人(其中妇女代表30余人)。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指导川陕省各项工作的根本大法。

大会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选举产生了由11人组成的川陕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即政府)，熊国炳为主席、副主席杨孝全、罗海清，秘书长黄超。

苏维埃制度是立法行政合一。因此，工农兵代表大会不仅产生了苏维埃政府，同时还制订和通过施政纲领和各种政策法令。

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全省最高政权机关，大会闭幕后为执行委员会，执委会闭幕设常务委员会。其组织机构有：省军区指挥部、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省政治保卫局、省革命法庭、土地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内务委员会。8月，苏维埃政府迁巴中县城。同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一批党团员先后调往川陕苏区工作。

实施银本位制，宣布废两改元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银本位币铸造条例》15条。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每枚总重26.6971克，含银88%，铜12%。规定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用银本位币出纳。

4月，财政部通令全国，自6月份起废两改元，规定公私收付及契约票据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原以银两收付的，按生银7.15钱折合银币一元。

成渝二市及四川各地陆续按上述条例规定的办法实施了银本位币制，废除了历代沿袭的银两计量制。

废“两”改“元”肇自1912年北京政府，1930年二十军军部也曾明令

颁行，但由于金融市场长期混乱，这一改革措施并未认真实施。

邓（锡侯）、刘（文辉）开战，刘败出成都

1933年5月6日，刘文辉、邓锡侯两军开战。刘文辉深恨邓锡侯趁他与刘湘荣威决战之时，占去遂宁、安岳、乐至等地，援助刘湘支使从属黄隐部从背后袭击仁寿藉田铺二十四军部队，放田颂尧的部队五次进入成都。1933年旧历除夕，刘文辉趁荣威停战之机率部回成都。决定与邓锡侯开战。邓锡侯于5月4日拂晓，逃出成都，避往新都。5月6日，刘部攻占邓防地温江、邓部在新都昆河沿岸布防。刘文辉命石肇武、余为海、刘元塘、彭韩，王治人等旅进攻，两军沿昆河鏖战。为了阻挡刘军渡昆河，5月12日，邓派黄隐部砍去都江堰调济流量的马槎，放外江水入昆河，昆河水位陡涨，造成外江缺水，两岸农田无水灌概，而昆河两岸却泛滥成灾，广大农民遭受水旱灾害，苦不堪言。

邓锡侯与刘文辉相持于昆河，力不能支，急向刘湘求援，并拜刘湘的军师刘从云为师。6月25日刘湘纠集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联名通电武力制止邓刘之战。7月2日刘湘到内江指挥进攻刘文辉部。7月7日刘文辉率部撤出成都，次日被迫通电辞去四川省主席一职。

红四方面军粉碎田颂尧三路围剿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打垮四颂尧的三路围攻。1月27日，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令其对红四方面军迅速“进剿”。2月12日，田颂尧以38个团近6万人的兵力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围攻红军，同时，杨森的15个团和刘存厚的一部以及中央军、陕军一部也协同“进剿”。红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集中打击田颂尧部的部署。5月中旬，红军开始反击，仅10余天就收复全部失地，歼灭敌军2万多人，田颂尧的部队损失近半，彻底粉碎了敌人历时4个月的“三路围攻”。6月底，红四方面军召开“木门镇军事会议”，总结作战胜利的经验，并把部队由4个师扩编为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总兵力达到4万多人，根据地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人口140余万。8～10月，红四方面军又接连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性战役，歼敌近2万人，开拓了大片解放区，使根据地扩大到东起城口郊外，西抵嘉陵江，北到陕南宁强、镇巴，南抵营山、渠县，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控制着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8座县城，建立了23个县和1个特别市的苏维埃

政权，红四方面军发展到8万余人，并组织起数十万人的地方武装，成为中华苏维埃的第二大区域。

二十四军扩大预征，田赋负担沉重

1933年6月，二十四军在防区邛崃等县开征1957、1958年度的田赋。因各军扩军备战，军费增加主要以加征田赋预征款供给，预征年度无限延伸。8月1日，二十四军防区各县田赋已定为每季预征两年，即一年八征。其中，芦山已预征到1959年，8个月内已预征8年田赋。9月20日，罗江开征1961年度田粮，该县农民千余人向县府抗议，捣毁征收机关，要求县长停征。县府紧闭大堂，由公安局、商会出面收拾。

四川灾情严重

1933年四川历遭雹、蝗、水、旱各灾，其中以旱灾最重。入夏以后，川东南各县大部分受雹灾，计有仁寿、隆昌、綦江、古蔺、邻水、富顺、古宋、江安、宜宾、泸县、石柱、万县、大竹、高县14县，受灾面积甚大，损失惨重。璧山县螟蝗成灾，禾苗尽被毁损。安县大雨，山洪爆发。遭受旱灾的县有南充、岳池、广安、渠县、铜梁、江安、隆昌、资中、内江、綦江、南川、巴县、丰都、涪陵、开江、邻水、大竹、古蔺、开县、荣县、永川、泸县、酉阳、广安、忠县、石柱、蓬溪、什邡、璧山、江北、犍为、合川、万县、梁山、垫江、黔江、彭水、秀山等38县，灾情重者颗粒无收。灌县堰堤频遭战争破坏，致沿河10余县发生大水灾，灌县、崇庆、郫县、温江、双流、新津各县漂没人口达2万人，冲毁农田5万亩。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5县境内，又发生地震。

各种灾害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农村崩溃日益加速。岳池县有50多万人口，急需救济的贫民近20万人。长寿县约计8万余户，急待救济的农民约计4万余户。雷波、马边、峨边、屏山4县农民逃散者6万余人。农村人口逃亡，大批流入城市，1934年3～10月，重庆市区人口就增加了5168人。巴县、南川等县灾情严重，两县逃难的男女难民1万余人。南川县妇孺饿毙者随处可见。合川县全县60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古蔺县农民弃家远逃者达千余家，因饥饿而死者达3000人以上。丰都县仅同德镇23000农民中，就有15000人不能生活。綦江县40万农民中，无法维生者达15000余人。其他各县如潼南、西充、武胜、铜梁等地，不能维生者到处可见。

二刘大战结束，刘文辉逃往汉源

1933年7月21日，刘湘率部进入成都，收编刘文辉各部组成“安川

军”，委李家钰、罗泽洲为“安川军”东路正副总指挥，由成都、简阳向新津、双流推进；邓锡侯为北路总指挥，由成都向温江、郫县推进；刘湘自兼南路总指挥，由犍为、嘉定、仁寿向青神、眉山、彭山推进。

7月7日，刘文辉退出成都驻新津后，命石肇武、刘元塘、熊思进、彭韩旅和王元虎、陈鸿文两师共30余团兵力，在崇宁、郫县、双流布防。7月11日罗泽洲部攻占双流，7月14日李家钰部进占新津县与罗部汇合。15日，刘文辉集中兵力退守岷江一线。刘湘则集中所属及邓、李、罗部兵力111个团，抵达岷江东岸。与刘文辉部对峙。刘湘用飞机在新津、崇庆、眉山、青神、嘉定等地侦察、投弹。8月1日刘湘下抢渡岷江的总攻令，8月14日又下令全线总攻，邓锡侯部谢德堪旅首先从三渡水抢渡过江，接着马毓智师渡江占羊马场。李家钰部攻新津刘家渡，罗泽洲师从双流擦耳岩强渡过江。刘湘的王缵绪、陈兰亭、潘文华部也分别从嘉定篦子街，眉山王渡强渡。并占领新津、嘉定、眉山。李家钰在邛崃县城俘获川西人民极为痛恨的刘文辉的义子、旅长石肇武，枭首后将首级挂成都少城公园示众。刘文辉于8月16日率部全线溃退，退到雅安。8月下旬刘文辉派代表请求刘湘收编其部队。9月15日刘文辉逃往汉源，“安川军”占领雅安。10月下旬，刘湘收编刘文辉部队后，保留其二十四军番号编为2师4旅12团及宁属、康属两屯殖司令，划雅安等8县为其防地。

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防地增至80多县，军队扩大到10多万人，邓锡侯新分得乐至、资阳等县，李家钰分得安岳、资中等县，罗泽洲分得顺庆附近地区。

叠溪地震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茂县叠溪发生7.5级地震，震中烈度10度，茂县北区沙坝及三齐河东西24寨，山岩崩坠，村落覆没；里不罗寨山崩地陷，满目荒丘；芦花、黑水各寨，山岳崩溃，地多沉陷；叠溪城两山下崩，覆盖全镇；叠属下三塘，山峰崩裂，峻峪迁移；叠属四大寨及松坪沟内外五寨，各山峰均纵横崩裂，村落倒毁；渭门关、石大关及后山各寨，山崩地陷，房屋多毁；小北区各寨，山峰崩溃，村舍无余；山后十二寨，山石下坠，变为乱粒；叠溪西岸龙池，山崩壅江，全村覆没，龙池干涸，整个震区群山崩颓，尘雾遮日，山河改易，城廓庐舍荡然无存。地震死亡6865人，受伤和受灾难民8277人，牲畜死亡8978头（只），倒塌房屋5100余所，农田、粮食损失80%以上。岷江河谷两岸，滚石横江，正流、支沟堵塞，流径截为数段，河道不通，

在银屏崖、大桥、叠溪以及松坪沟、鱼儿寨等处积水成大、小海子10余处。银屏崖处堵江堰寨，积水倒灌至沙湾等地，13公里以内变成一片泽国，农田淹没，村寨涤荡罄尽。

茂县、黑水、松潘、理县、汶川、绵竹等县受灾。灌县、德阳、成都也有破坏。泸县、隆昌间一煤炭洞崩裂，压死工人10余人。三台、射洪、天全、乐山有强烈震感。荣昌、资中、内江、井研、富顺、江安、合川、重庆、广安、万县也有震感。

10月9日19时，叠溪海子暴溃，积水倾湖涌出，浪头高达20余丈、壁立而下，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10日凌晨，洪峰仍以极高的水头涌进灌县。都江堰内外江口冲成卵石一片、渠首工程、防洪堤坝扫荡无存、石桥、木桥、索桥全被吞没、冲毁韩家坝、安澜桥、新工鱼嘴、金刚堤、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等，沿河民居财产漂没。崇宁（治今郫县唐昌镇）、郫县、温江、双流、崇庆、新津等县均受巨灾。茂县、理县、汶川、灌县等被洪水吞没2150余人、牲畜4485头（只），冲毁房屋6800多处、农田7700余亩，损毁粮食200多万斤。

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六路围剿川陕苏区惨败

1933年10月4日，刘湘在完成他的“安川大战”后，正式就任蒋介石于当年7月7日委任他的“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务。10月6日刘湘在成都宣布，“四川剿匪总司令部”设成都，并以剿总身份统率各路军阀部队110余团（最多时达140余团），约20余万人，分6路向川陕革命根据地进攻。6路部署是：

第一路，由二十八军任主力，总指挥邓锡侯，由广元、昭化、剑阁一线向通江、南江、巴中进攻、截阻西进的川陕红军；

第二路，由二十九军任主力，总指挥田颂尧，由苍溪、阆中进攻通江、南江、巴中、负责阻止川陕红军南进；

第三路，由李家钰的四川边防军、罗泽洲的新编二十三师任主力，总指挥李家钰，副总指挥罗泽洲，负责蓬安、南充一线进剿通江、南江、巴中、阻止红军南进；

第四路，由二十军任主力，总指挥杨森，负责从广安、岳池方面进剿通江、南江、巴中、阻止红军南进；

第五路，由二十一军任主力，总指挥王陵基，在开江、开县集结，负责支援各路攻防；

第六路，由二十三军任主力，总指挥刘存厚，负责从达县、渠县进剿通江、南江、巴中、阻止江军东进。

六路围剿之战开始就出现各路不听指挥，攻守不一，失去战机，给徐向前率领的川陕红军创造了重点打

击，各个击破的有利形势。同年11月到次年1月，王树声以主力部队痛击王陵基指挥的东线第五路、第六路的攻势和西线一、二、三路的协攻。大量杀伤后，主动后撤放弃绥定（达县）、宣汉、剑阁、旺苍、仪陇及嘉陵江一线，诱敌深入。1934年2月12日夜，在徐向前亲自指挥下，集中红军四、九、三十军各一师，全歼进驻胡家场一带的刘湘部警备第二路郝耀廷部，第二路副司令郝耀廷、参谋长、副参谋长、团长一人被击毙，缴枪千余枝。刘湘闻讯大怒，下令撤销王陵基本兼各职，并将他拘禁于成都。

1934年2月17日，刘湘策划了第二期作战计划。3月3日，下达第二期总攻令。4日，西线第一、二、三、四路同时发起攻势。一路攻旺苍坝，二路攻恩阳河，三路攻玉山场，四路攻鼎山场。红军为避其锋芒，初战后于3月中旬主动放弃巴中，4月初放弃江口，西线退守贵民关、观光山，以便阻击第一、二路军；南线退守杨柏河、得胜山、镇龙关一带，以便阻击第三、四路军。新任第五路总指挥唐式遵在刘湘督促下从3月中旬到5月末联合第六路军向红军发动第三期总攻，除占部分城镇外，伤亡逾万。

1934年5月中旬，刘湘在成都召开第三次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四期战事方针："攻克通江、万源，并自通江北部沿川陕边向万源方面横扫。"刘湘为安抚各军，由唐式遵出面保证，军事结束后，各路均有"安全保障"，不致被刘湘兼并。同时拨出300万元军饷和300万发子弹接济各军。刘湘又任命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任总预备军总指挥，将二十一军暂编第二师、教导师第三旅、模范师第二旅均拨归潘文华指挥，投入其总兵力4/5，共计80个团，10万人。

6月下旬到7月下旬，刘湘倾50余团数万兵力，分三路向万源、通江发动全线进攻。红军收缩阵地，凭险据守，敌军6月21日攻占通江后，红军收缩兵力，凭险固守万源，敌军进展困难。7月11日各路对万源发动总攻，收效不大。7月22日，唐式遵以其主力7个旅进攻大面山，亲率督战队到前线督战。25日攻势达到顶峰、平射炮、山炮、迫击炮全部发射，还派飞机临空助战；步兵以密集队形进行波浪式的多层冲锋。红军以逸待劳，掌握战机，居高临下先以近距离火力杀伤，继以短兵相接，枪刺刀劈，打退了敌军多次冲锋。

8月初，刘湘颁布奖惩条例，攻占万源，奖洋10000元，攻克各据点，赏洋数千元不等。放弃阵地，军法从事；高级指挥官不上火线督战，枪决。8月5日，川军第五路军进攻万源，唐式遵火线督战。第一师与陈国枢、王三春等部攻甑子坪、花萼山，迂回万源东侧；第二、三路两师向万源正面玄武

殿、孔家山进击；第六路廖震，汪铸龙两师进攻南天门，迂回万源西侧，东线其他各部和西线各路全力配合。进攻中，以班至营的军官组成敢死队，指挥官赤膊督战，对畏缩不前者就地枪决。激战终日，未能奏效。7日拂晓，唐遵式再次发动全线攻势，先以密集大炮火力轰击，随后在飞机掩护下发动冲锋，也未攻克万源。

8月10日，红军主力四、九、三十军发动反击，猛攻五、六路军结合部南天门，敌军措手不及，全线崩溃。东线反击战胜利，除以红四、九军一部继续追击外，红三十军、红九军主力及红四军一部立即转赴西线。8月中旬，红军由通江南面的上官庙渡巴水，夜袭三、四路军结合部，一举攻克杨柏河、得胜山，西线各军溃不成军，伤亡惨重。

这次由刘湘组织的四川军阀六路围剿川陕革命根据的战事，长达10个月，动用兵力110余团、20余万人，其结果是全局溃败，被红军歼灭6万，俘虏2万，缴枪3万余支，炮500余门，击落飞机一架。刘存厚、罗泽洲因部队被歼而撤职；田颂尧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刘湘、邓锡侯、杨森、李家钰各部亦因红军歼击而一蹶不整。

8月23日，刘湘以战事失败而通电辞职，未获批准。

四川运动员参加第五届全运会

1933年10月10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开幕。四川选派男运动员77人，女运动员31人参加比赛，获第一名1项、第二名2项、第五名2项，第六名1项。

川东游击军发展壮大

1933年10月27日，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境内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930年7月，在李光华、王维舟、覃文等领导下，在川东建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后更名为川东游击纵队）。这支部队奉命东征武汉途中失败。1931年5月，王维舟重组川东游击军，任总指挥，建立起3000余人的游击纵队，迅速建立了以宣汉、开县、开江、达县边境为主的游击根据地、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1933年10月，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的宣汉、达县战役，歼灭刘存厚军队一部，10月27日，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境内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即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三十三军发展到1万余人。此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8万多人，达到鼎盛时期。

王良引进卡介苗

1933年，王良将卡介苗引进中国。

王良（1891～1985）成都市人，预

防医学、生物制品专家。10岁入法文学校，毕业后，考入法国在越南开办的河内医学院。1913年学成回国，在四川、云南等地行医。1931年至1932年赴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在卡介苗发明者卡——介二氏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他将卡介苗引进中国，在重庆筹建中国第一个卡介苗实验所，从事实验研究和推广应用。首次在我国将卡介苗接种婴儿，并进行健康防视。成为我国进行卡介苗研究的第一位专家。

二十一军发行各种库券、公债

1933年统计：1932～1933年刘湘的二十一军为筹集军费，发行各种库券和公债总额为4120万元，其中一期整理金融库券200万元，一期整理川东金融公债500万元，一期盐税库券150万元；二期整理川东金融公债120万元，军需公债券100万元，印花烟酒库券500万元，二期盐税库券500万元。田赋公债1500万元；三期整理金融库券250万元。这些库券，公债的偿还时间最长达100个月，大多为50～60个月，最短为8个月。

四川军费支出

1933年统计：1928～1933年，四川内战频繁，军队扩大，军费急剧膨胀。财政支出中军费所占比重极大。仅二十一军的军费由1928年的1269.4万元上升到1933年的4592.7万余元。全川年耗军费由1926年的3880.3万元上升到1934年的9000万元，较之于民国元年扩大15倍。四川财政收入也由1916年的1155.1万元增长到1.5亿元。

全省各地展开抗捐斗争

1933～1934年在军阀割据的防区制下，战祸频仍、军费无度、苛征暴敛，激起全省各地的抗捐斗争。1933年5月，上川南邛崃、雅安、大邑、丹棱、蒲江、名山等地人民因驻军一再增加粮税，预征无度，借垫频繁，组织抗捐军进行武装起义，前后战斗年余。1933年7月，绵阳、安县推派代表赴潼川请求二十九军减免苛重的月摊捐款数目及附加的“剿赤临时费”。10月23日，绵阳群众群起捣毁吴家坝区办事处，将粮册粮票尽数焚毁，齐赴县城请愿。1934年4月，金堂县第九区农民反对催缴烟捐，群起捣毁当地征局。10月，雷波县群众以政府滥征捐税，群情激愤，与军警发生冲突。1933年2月13日，古蔺驻军强征米捐，引起全城商民愤怒，罢市抗议。4月25日重庆市民为反对市政府勒派马路捐一律停业。2月16日成都市商人苦于苛捐杂税的搜刮，聚集各同业公会、商店代表万余人罢市游行，各行各业一致实行停业抗捐，一律不缴国税印花，前后历时3个多月。1934

年4月，重庆税局将所有陆运货物改照水运货物依花色估价完税，税捐负担较前增加数十倍。重庆绸缎、西药、苏货等行业纷纷集会抗议，挑贩药商并因此停运。1933年1月，蓬中盐场十垣灶商360余家，为反对二十九军令场署转饬灶商等预借盐税4个月，全体宣告歇业。1933年3月，渠河沿岸人民，以渠河计岸盐商垄断食盐，任意抬高市价，沿江驻军相率加税，致使盐价更见高涨，推派代表向运署要求转令修改招商认销办法，并豁免新加税款，以重民食。

四川外贸概况

1933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50940252元，其中洋货进口货值2328830元，土货进口货值48611422元；出口货物总值42968233元，其中土货出口货值42937674元，土货复出货值30559元。全年进出口货值总额为93908485元。入超7972019元。

本年山货出口货值7144880元，桐油出口货值11881530元，生丝出口货值6923732元，药材出口货值5209533元，夏布出口货值287152元，土货中，桐油出口居第一位，山货居第二位，生丝从本年开始，退居第三位。出口贸易中，发展较快的商品有猪鬃、鸭毛、肠衣、牛皮、羊皮、五倍子、染料、桐油和苎麻。四川红糖出口数额达235万担，上年仅8.2万担。

1934年（民国23年）

四川地方银行开业，开始发行“地钞”

1934年1月12日，由善后督办刘湘筹组的四川地方银行开业，由郭文钦任理事长，唐华、康宝志任正、副总经理，资本200万元。总行设重庆，在成都、万县设分行，省内各中等城市和上海设办事处。该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还大量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五角、二角地方银行兑换券（简称“地钞”）。“地钞”发行初期，准备金充足，币值稳定，商民乐用。后因“剿赤”军费激增，二十一军总金库大量领用“地钞”，导致发行额高达3700余万元，准备金不足10%，兑现困难，币值下跌，市面上每1000元“地钞”需贴水170～180元，多次发生挤兑风潮。1935年9月，国民政府下令停止使用“地钞”，以国币八折收兑，仅有6万余元未收回。地方银行也奉命改组为四川省银行。

《华西日报》在成都创刊

1934年3月15日，《华西日报》在成都创刊。此报为刘湘创办，以后成为他主持的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舒君实、张必果、邓汉祥先后任社长。1938年初刘湘死后，该报由潘文华接办，王白与、罗忠信、甘鉴斌等先后任任长，贺次君、谢崇周、李次本、吴汉家等先后任总编辑。抗战时期由于有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该报工作，使该报成为成都进步报刊的中坚力量。

中共四川省委改组

1934年4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遵照中央 指示重新组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指责四川省委的工作没有“ 转变”，“无很大进展”等等。“中央认为必须更新省委的成分，以保证中央的指示与路线在川的彻底实现。改组后的省委以刘道生为书记。中央认为四川党的工作中心是“开拓新的游击区域，发展与创造新的苏区，赤化全川，争取苏维埃在四川全省的胜利”等，10月，刘道生慑于敌人的白色恐怖潜遁后，刘克谐代理省委书记，1935年2月，刘克谐和省委组织负责人余若萍先后被敌人逮捕，省委机关遭破坏，此后全川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均遭破坏，只有个别基层党的组织得以保存。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由于牺牲或被敌人逮捕，省委在8年中先后经过10次改组或重建。

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入川

1934年4月28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应四川当局之请本日抵达重庆。团长胡庶华谈工作任务时说：“考察 以两个月为限，一俟考察完成，当有详细报告，以供四川当局及社会人士参考。”5月1日考察团到成都，7日分9组分途出发。6月15日陆续由重庆离川，该团的考察结果，由专人编撰出报告书，交川省当局参考。各组行程如下：

（1）矿冶组：彭县白水铜厂、花梯子马松岭铜矿，青杈岭煤窑，嘉定五通桥，斑竹堤钢厂旧址，犍为石林煤矿，威远连界场铁矿及煤矿，自流井、荣昌、夏溪口、綦江、南川、沐川、屏山、宜宾、邓井关、泸县及嘉陵江一带。

（2）水利水力组：灌县、岷江上游、金堂、嘉定、宜宾、泸县、合江、巴县、万县 。

（3）电力电讯组：成都、灌县、彭县、金堂、宜宾、泸县、合江、乐山、巴县、万县。

（4）铁道公路组：成渝铁路、自井铁路、渝黔铁路、成康铁路及其他主要公路各干线。

（5）水泥组：嘉陵江一带及重庆

附近。

(6) 盐糖业工业组：简阳、资阳、内江、资中、自流井、五通桥。

(7) 纺织组：重庆、壁山、荣昌、乐山、成都、三台、南充、遂宁、内江、江津、合川、泸县。

(8) 油漆组：万县、巴县、成都、自流井、北碚。

(9) 药物组：重庆、江油、灌县、雅安。

1936 年 1 月 5 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书》出版，刘湘为撰序文。

川东旱，川西大雨涝

1934 年，四川东部春夏少雨干旱；四川西部大雨大水成灾。

入春以后，四川东部 42 个县连续少雨干旱，尤以江北、綦江、邻水、涪陵等 20 余县旱情严重，这些地区从春至夏连旱数十日，豆麦、禾稻多已枯死，平均收获仅足常年十之一二，饥荒甚重，民食草根、白泥，闭结而死者甚多。

夏秋，四川西部 80 余县大雨大水成灾。灌县、温江、什邡、郫县、崇庆、广汉、金堂、双流、新津等处，7 月淫雨数旬，山洪暴涨，沿河各地俱成泽 国，索桥冲毁无遗。资阳全城几成泽国，淹没人畜数百，倒塌房屋甚多。8 月，荥经、泸定暴雨倾盆，山洪暴发，冲毁田地、房屋、漂没人畜、粮食甚多。

巴县、南部、綦江等 13 县，春夏干旱，秋又遭大水，灾情甚重。

重庆建成大溪沟发电厂

1934 年 7 月 20 日，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举行厂房落成暨发电仪式典礼。

1932 年，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令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电力厂筹备处”，委市长潘文华兼处长，刘航琛为副处长。建设电厂资金，除刘湘从烛川电灯公司所余货物税附征的电业基金拨一部分外，主要是由重庆金融界投资，刘航琛控制的川康银行投资 70 万元，康心如控制的美丰银行投资 30 万元，华西兴业公司投资 8 万元。工程由华西兴业公司承包，安装从国外定购的三台 1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934 年 7 月建成供电。

1936 年重庆电力公司从英国进口 2 台 4500 千瓦发电机组，对大溪沟电厂扩建，1938 年先后竣工，使该厂装机容量增至 12000 千瓦，线路增至 200 千米，成为建国前四川设备容量最大的电厂。

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本空军的轰炸，将该厂发电设备分散安装，化整为零。

彭县、屏山地震

1934 年 9 月 1 日，彭县发生地

震。县属河坝场地震时沉没，彭县教会三层洋房一座亦沉没，仅屋顶一尺许露于水面。

9月，屏山发生地震。县属两河兵家村，经地震后沉陷，损失稻、麦、玉米约在10亩以上，溺陷房屋二椽，附近地区仍继续下陷。

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建立

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委员会建立。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松桃县会合。稍后，在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会师大会，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30日，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再次攻克酉阳县城，发动湘西攻势。11月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26日，在湖南大庸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湘鄂川黔临时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和湘鄂川黔省军区。红二、六军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一方面军的长征。1935年9月，敌人对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二、六军团于11月19日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

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

1934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会议，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12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如下：

(1)免去四川省政府委员刘文辉、郭昌明、张铮、向传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稽祖佑、林耀辉本职；

(2) 免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兼职；

(3) 免去兼四川省民政厅厅长刘文辉、兼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厅长郭昌明、兼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张铮、兼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向传义兼职。

(4) 任命刘湘、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筠为四川省政府委员；

(5)任命刘湘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6) 任命甘绩镛兼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刘航琛兼财政厅厅长、郭昌明兼建设厅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厅长、邓汉祥兼省政府秘书长。

1935年2月9日，国民政府任命刘湘兼任四川全省保安司令。

同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

英人福庆为峨眉山测高

1934年，英人福庆博士初测峨眉山标高。结果是：主峰万佛顶11800尺，分别高于第二峰金顶200尺和第三峰千佛顶400尺。

二十一军发行巨额债券

1934年，二十一军发行巨额债券。1933年二十一军财政收支不敷

1600万元，1934年更增达4100万元。刘湘除从四川地方银行滥发钞票支付部分外，依靠再发债券弥补。1934年发行的债券为统税库券300万元，三期盐税库券250万元，短期军需公债300万元，“剿赤”公债1000万元，四期盐税库券600万元，二期田赋公债1500万元，发行金额共计3950万元。以上各项债券，仍以各家银行、钱庄为主要推销对象。

四川外贸概况

1934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38898670元，其中洋货进口货值2478207元，土货进口货36420463元。出口货物总值36061162元，其中，土货出口货值35965410元，土货复出口货值95752元。全年进出口货物总值74959832元。

本年山货出口货值8257084元，桐油出口货值6175822元，生丝出口货值2668148元，药材出口货值5797056元，夏布出口货值285514元。山货中，猪鬃在国际市场销路日广，本年度出口数量达10671担，货值5591432元，仅次于药材，居出口商品第三位。桐油则跃居第一。生丝一落千丈，居第五位。

1935年（民国24年）

蒋介石设立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

1935年1月8日，为控制四川财政金融。蒋介石决定在重庆设立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任命财政部委员吴隆钱为特派员。不久，改任陈绍妫为特派员。7月，改任关吉玉为特派员，关任职时向最长。1月18日，该署在重庆公园正式成立。

此后，税收划分为国、省两税，归口分解。中央银行开始在成、渝、万三地现行发钞。

蒋介石派遣“参谋团”入川

1935年1月12日，蒋介石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简称参谋团）一行200余人，在该团主任贺国光率领下低达重庆。13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为参谋团举行欢迎宴会。14日，参谋团宣布“为咨询各军状况及便于军事上联络计，决令各军各派一高级参谋，到行营办公”。

按照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该团“为对四川‘剿赤’各军作战运筹

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其任务是：订立四川反共作战计划；指导各军军事行动，督察各军官兵勤惰，厉行奖惩；考核各军械弹的分配与消耗、军费的支用，以及经理、卫生、表报事宜；督促并指导与反共有关的政治设施。”总之，蒋介石通过派遣参谋团入川，开始直接干预并进而控制四川军政大局。其组织机构，以主任、副主任、秘书、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人员，以及高级参谋、督察专员、各级督察员构成。后又逐渐扩充，开设的主要机构是：主任办公厅、第一、二、三处、政训处、军法处、交通处、运输处、边政委员会、铁肩总队、别动总队、川黔二省公路监理处等。担任过“参谋团”高级职务的军政要员有：

主任贺国光（湖北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肄业，后入北平陆军大学，入川前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兼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副主任杨吉辉（字芳毓，四川资阳人，陆军大学毕业，曾任21军参谋长、兵工厂总办等职）、政训处长康泽（字兆民，四川安岳人，别动队总队长）、副处长叶维（字介人，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又留学日本，攻读士官学校，回国后加入“复兴社”，系骨干分子）、军法处长余中秀（湖北人，日本法政大学高等研究科毕业。）、边政委员会常委李璜（四川成都人，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习院毕业，国家主义派创始人之一。）、常委沈重宇（四川内江人，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川黔二省公路监理处处长胡嘉诏（江西人，日本京都大学土木工学科毕业）。

贺国光在刘湘为其举办的欢迎宴会上警告四川军阀说：对于川军“以前的一切，概不追究，只要秉承蒋委员长命令，努力‘剿赤’，中央能予以物质上之接济。否则，江西枪决师旅长及县长成例甚多，幸勿轻易尝试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入川

1935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2000余人在队长康泽（康泽兼任参谋团政训处处长，一身而二任）率领下，与参谋团先后入川。别动队总部设有参谋组、指导组、经理组、总务组、作战组、调查股、组织股、情报股、人事股、会计股、军械股、事务股、军法股、医务股。总部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公秉藩，第二支队队长马希良、第三支队队长曾晴初。别动队入川后，分别派出队员前往各重要城市重庆、成都、自贡、泸州、乐山、万县、达县、南充、涪陵等地，对川军各部、地方政府及社会团体进行拥蒋反共、统一四川的政治、军事活动。其主要活动有如下3项：

（1）在川军各部调整，改组政工机构。军、师部设政训处，团设政训主任，连设指导员，康泽安插到川军

各部的别动队员约有数百人。别动队员在川军中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法西斯独裁思想，灌输军人绝对服从中央、听人调遣的信条。同时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刘湘系统的动向进行监视。

（2）在全省保安机关中建立政工机构。四川保安机关过去未有政工组织，别动队分别在省保安处，专区保安司令部中设政训室，由别动队员担任。首任省保安处政训室正副主任由叶维、史柏英充任；各专区政训室设中校主任一人，少校、上尉训练员一人，文书、事务若干人。其首要任务是负责全专区的壮丁干部训练班。别动队还想方设法控制地方武装，将各县团防和自卫队等分别组织为总队、大队或独立中队。由于别动队员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深入地方后，使中共各级组织及民众社会活动受到极大破坏。

（3）开办各种训练班、整理保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全省各地训练工作，由省保安司令部政训总室全面规划，统一部署，下达各专区、县遵照执行。别动队先举办保甲（壮丁）训练班，以行政专区为单位，由专区政训室主办，抽调基层正副区长、壮丁队区队长、队副、联保主任、联队副、壮丁联队长、保长、保队副、壮丁队保队长等基层官吏集训，由行署专员兼班主任，政训室主任兼副主任，为期一月左右。集训班向学员灌输集权思想，效忠党国的观念，并将可靠分子吸收为“复兴社”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会员。

此外。政训室又调训各县、市商会、工会理事、监事参加“特种公民训练班”；康泽又以“四川省国民军训处”处长名义，派遣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到各地在中学以上学校任军训教官，在青年学生和教师中培植忠于党国、效忠领袖的势力。

县及县级以下的行政改革

1935年初，省政府开始实施县及县级以下的行政改革。

根据县政改革条例，县长是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的行政权集中于县长。县政府下面撤“局”设“科”，各科和县政府全部活动由县长统管，没有县长许可，任何机构不得代行县政府职权。县长也是包括警察和保安队在内的县武装部队的司令。县长有权任命县属各重要地区和县属行政机构的主要官员。

县长的任免由省民政厅按考核任免程序进行，其它机构和个人无权任命县长。根据这一规定，1936年2月16日和7月1日两次由民政厅公布了全省新任县长名单。

县下行政机构为区，每县划分为3～6个区，每区设区长，由省政府按正式行政官员待遇支付区长薪金并提

供区的行政经费。区长由县长任命并，由县长负责，负责全区一切行政事务。

区以下恢复保甲制度。7月初，四川省政府颁发“保甲制”实施限期表。令各县推行保甲制度，定为三期完成。第一期自7月15日起，至8月15日止，挨户编号。第二期自8月16日起，至9月30日止，说明推行理由。第三期自10月1日起，至11月15日止，实施抽查复查。

“保甲制”以10户为1甲，设甲长，10甲为1保，设保长；合10余保为1联保，设联保主任（1940年后改为乡或镇公所，设乡、镇长）。联保直辖于区，区设区署，置区长。区以大小繁简分甲、乙、丙三等。全川约设500多个区。

“保甲制”规定以甲为单位，实行联保联坐诛连，一家犯法，九家连坐。这是国民政府和刘湘为巩固基层政权、控制人民群众、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所采取的统治措施。

中央红军长征入川南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南。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红军应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渡江的作战计划》，22日，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活动，钳制刘湘兵力，而集中全力，向西线进攻以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29日，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由黔北进入川南。

川黔、川陕等省际公路的修建

1935年1月。参谋团入川伊始，就制定《四川剿匪公路建设计划图表》，强调“建设公路便利交通，而对军事运输尤关重要。”全省四大干线的川黔、川陕、川湘、川鄂公路为这个时期所兴建。并拨善后公债1500万元，实行“义务征工”，历时2年余，新增公路1361公里，沟通邻省通道。

1935年3月川黔路开工，任罗竞中为工程处长。路线起自重庆海棠溪，在崇溪河沟出川至贵州松坎，川境长176公里。参谋团限定当年5月15日通车，征民工10万、石工3万，昼夜赶修，6月15日通车，死亡民工千人，仅给死者埋葬费6元。

1935年9月，川陕公路开工。路线起自成都，经新都、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昭化、广元，在川陕两省交界七盘关之头沟接线，川境长420公里（其中成都至绵阳135公里建于防区时代），实行“义务征工”筑路，征工绵阳1.5万、梓潼2万、剑阁5万、昭化2万、广元5万，不给工资，粮食工具自带。1936年6月1日全线通车。

四川省成立财政整理委员会

1935年2月12日，四川省政府召开第一次省务会议，决定成立四川省财政整理委员会。根据蒋介石对整理四川财政的命令，会议通过了四川财政状况和整理方案，并由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陈绍妨、刘航琛赴南京请示实施办法。

四川财政整理方案的要点是：1.执行财政部命令，建立健全中央直辖的税收机关；2.一切公款收支统一于省、县政府财政机关，实行统收统支，革除自收自支、散漫无稽弊病；3.厉行预算决算制度，编制年度预算决算，一切收支纳入预决算，凡预算所立项目，不得移作它用；4.划分支付与经营的权责，不得混淆。

7月10日，省财政整理委员会正式办公，刘湘兼委员长，甘绩镛、唐华、刘航琛任委员，下设田赋、税捐、业务、经理4组。

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湘任省主席

1935年（民国24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7月6日移蓉），刘湘宣誓就任省政府主席。行政院派四川高等法院院长谢盛堂及蒋介石的代表贺国光监誓。同时就职的还有：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甘绩镛，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刘航琛，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杨全宇、建设厅长郭文钦、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邓汉祥、保安处长省政府委员会谢培筠杜炳章等。

川陕游击队的斗争

1935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组建川陕游击队。川陕游击队是红四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前夕，决定留下一支游击队，作为建立游击根据地，鼓舞人民斗争意志的重要力量。2月初，红四方面军抽调300余人枪，在旺苍组建“川边留守阵地游击队”，主力红军退出川陕后，改称“川陕游击队”，先后由刘子才、赵明恩担任领导，游击队下设3个大队，以南江县桃源寺与陕西交界处的深山密林为根据地，活动于南江、宁强、南郑、广元等地，最盛时达千余人。1936年4月，川陕游击队遭胡宗南重兵围剿，损失惨重。6月，在原川陕根据地群众的支援下，建立起以南江、南郑两县边界为中心、纵横百余里的游击根据地，队伍得到再次发展。后来，由于敌人长期封锁，游击队不了解抗日战争形势和党中央政策，中共中央和重建的四川党组织虽多次设法与之联系均未成功。1940年3月，国民党164师集中5个团7000余人，围攻几百人的游击队，赵明恩、刘子才先后被害，坚贞不屈的游击队战士大部壮烈牺牲。

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保安

司令

1935年2月9日，国民政府令：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保安司令。

在本年度进行的行政制度改革中，特别强调在“剿匪”省份实行“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四川为“剿匪”区，因此实行严格的保安制度，省设保安司令部，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司令，每个行政督察专员区，设区保安司令部，专员兼保安司令，专署所在县，由专员兼县长。另设专任副司令一员。县设县保安司令部，由县长兼司令，县以下设区分署，有专任保安人员，各乡镇由联保主任兼保安职责。

裁减兵员，核减军费

1935年2月14日，因四川军队庞大，军费不敷，负债8700万元，刘湘以善后督办公署名义通令各军：各级官兵薪饷，从本月起6个月内，折减发给。规定上将月薪320元，中将200元，少将160元，上校120元，中校100元，少校80元，上尉50元，中尉以下士兵，照现额9折实支。

2月28日，刘湘又以督办公署名义电告各军：自3月起，各军军费均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筹核发。

3月1日，四川省政府宣布：经督办公署核定，各军月饷核减如下：二十八军邓锡侯部造报73.07万元，核减为50万元，为造报数的69%；二十军杨森部造报59.09万元，核减为18万元，为造报数的33%；二十九军田颂尧部造报144.85万元，核减为40万元，为造报数的28%；川康边防军刘文辉部造报42.49万元，核减为12万元，为造报数的35%；新编第六师李家钰部造报56.24万元，核减为20万元，为造报数的36%；新编二十三师罗泽洲部造报34.17万元，核减为10万元，为造报数的29%。二十一、二十三两军（二十三军原为刘存厚部后归刘湘），核定为317万元。

经过核减，各军军费均被刘湘大幅度减下来，唯独刘湘自己统辖的两军军费高达317万元，超过其他各军军费总和150万元的1倍多。核减后的年度军费，仍高达5980余万元，已经超过了四川省税收收入，未能达到蒋介石裁军节支的目的。

6月5日，蒋介石在成都召集川军将领讲解“剿匪与整军之要道”，强调“整理四川军队，第一件根本事情，就是先要裁兵”，“至少要裁到半数以下，然后才可以谈到整理”。他要这些高级将领“自己想办法自动的裁减”。

6月25日，行营参谋团着手整理川军，第一期平均减员1/3，对被裁官兵实行集训，择优备用。

7月1日，督署开始实施2月14日颁布减发各级官兵薪水办法。

7月16日，督署不问各部川军是否裁编，一律照原军费减发1/3，于是军费由每年5980万元减为4000万

元。

省府推行“行政督察区”制度

1935年2月24日，四川省政府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剿匪区域行政制度》，推行“行政督察区”制度，在四川省设置18个行政督察区，每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上承省府，下辖各县，行政督察专员并兼任公署所在县的县长。此项改革方案，3月26日由蒋介石批准，公布实施，其区划范围及专员名单如下：

第一行政督察区：辖成都、华阳、温江、双流、新津、灌县、郫县、崇宁、彭县、新繁、新都、崇庆12县。专署设温江，专员李为轮。

第二区：辖内江、资中、资阳、简阳、仁寿、荣县、威远、井研8县。专署设资中，专员王次甫。

第三区：辖永川、巴县、江北、綦江、江津、合川、大足、铜梁、璧山、荣昌10县，专署设永川，专员沈鹏。

第四区：辖眉山、彭山、丹棱、青神、夹江、洪雅、邛崃、蒲江、大邑9县。专署设眉山，专员梁正麟。

第五区：辖乐山、犍为、峨眉、雷波、马边、屏山、峨边7县。专署设乐山，专员陈炳光。

第六区：辖宜宾、南溪、江安、高县、珙县、庆符、长宁、筠连、兴文9县。专署设宜宾，专员冷薰南。

第七区：辖泸县、隆昌、富顺、叙永、合江、纳溪、古宋、古蔺8县。专署设泸县。专员裴纲。

第八区：辖酉阳、秀山、彭水、黔江、南川、涪陵、石柱、丰都8县。专署设酉阳，专员赵鹤。

第九区：辖万县、巫山、巫溪、城口、开县、奉节、云阳、忠县8县。专署设万县，专员罗经猷。

第十区：辖大竹、渠县、广安、梁山、邻水、垫江 长寿7县。专署设大竹，专员刘景淑。

第十一区：辖南充、西充、岳池、蓬安、营山、武胜、仪陇、南部8县。专署设南充，专员刘光烈。

第十二区：辖遂宁、潼南、安岳、乐至、蓬溪、三台、中江、射洪、盐亭9县。专署设遂宁，专员罗玺。

第十三区：辖绵阳，梓潼、安县、什邡、绵竹、德阳、罗江、广汉、金堂9县。专署设绵阳，专员鲜英。

第十四区：辖剑阁、昭化、广元、江油、彰明、平武、北川、阆中、苍溪9县。专署设剑阁，专员田湘藩。

第十五区：辖达县、宣汉、开江、万源、通江、南江、巴中7县。专署设达县，专员王铭新。

第十六区：辖茂县、松潘、理番、懋功、汶川县及抚边、崇化、绥靖等屯。专署设茂县，专员谢培筠。

第十七区：辖雅安、名山、天全、芦山、宝兴、荥经、汉源及金汤设治局。专署设雅安，专员刘镛。

第十八区：辖西昌、会理、昭觉、宁南、越西、盐边、盐源、冕宁8县。专署设西昌、专员王旭东。

上述第一、二、三、九、十四、十五区专员，为蒋介石南昌行营提名，其余各区专员为刘湘提名。全体行政督察专员于5月22日宣誓就职，蒋介石特派杨永泰监誓。

刘湘整理田赋

1935年2月28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主持省务会议，决定自3月1日起，全川各县田赋，一年一征。在军事未经整理就绪之前，暂照一年田赋数目，附征3倍的临时军费，此外不得有借垫预征情事。自1937年度预算起，附征的3倍临时军费，更改为二征，连同正税一征，共为一年三征。与过去相比较，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与此同时，四川省政府也开展了查滥粮、原定征册的配套工作。

四川省政府实施国地税分流法案

1935年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通令全省废止各地驻军就地筹饷办法，一切收支统由四川省政府办理。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统筹全省的财政收支，国、省税费的划分。国税为关税、盐税、印花税、菸酒税、矿税等归中央接办，并开征统税。省军费仍暂由省库开支。国税收入除已指定用途者外，大部分补助地方“剿共”及地方政务、债务费用，省税包括田赋、屠宰税、契税、鸦片特税、营业税、房捐、地方杂税等，归省财政厅管辖。1938年1月，进一步划分国地税项。国库（中央银行）经收国税，负责拨支全川军费，同时中央接管禁烟收入。省库（四川银行）经收省税，负责拨支政债各费。

川南游击纵队的斗争

1935年2月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成立。中央红军进驻云南扎西时，中央军委决定选派一批干部和战士组成川南游击纵队。指派徐策（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八军团民运部长），夏才曦、邹风平（泸州中心县委书记）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以徐策为书记，抽调正规红军400余人组成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开展游击战争，队伍发展至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长征。后遭敌正规军和民团的频繁“围剿”，损失严重，特委和纵队领导人徐策、戴元怀、余泽鸿、刘干臣等先后牺牲，余部坚持斗争。1936年，红军二、六军团得知消息派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司令阮俊臣率部到川南寻找游击队。6月初，两队汇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阮俊臣任司令，刘复初为政委，共计900余人，声威大振。敌慌忙部

署“三省会剿”，游击队在川滇黔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伤亡减员后，到1937年春归于失败，余部在云南、贵州分别坚持到1947年。

刘湘联共抗蒋

1935年2月，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受到蒋介石势力入川的沉重压力，遂通过老同盟会员傅春吾的关系，与中共代表张曙时建立了初步联系，并接受中共团结抗战，摆脱蒋介石控制的建议。

5月下旬，为消除刘湘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恐惧心理，中共中央华东局又派黄子谷回川（黄曾任邓锡侯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为邓部江防军司令黄隐胞弟）会同张曙时向刘湘等川中将领宣传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一文的抗日主张，以改变他们的反共立场。

9月下旬，黄子谷再度奉命入川，专作刘湘的工作。刘湘此时一方面已在军事、政治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四川实力派首领，另一方面又要同蒋介石进行控制与反控制斗争，需要运用中共的影响和力量，使他摆脱孤立无援的处境，因此，他不断与中共代表或第三者接触，表示赞同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华东局还通过黄子谷转交他一大包密封文件袋，黄刚到成都，刘湘派参谋长傅常亲到黄家，取走了文件袋。

10月中旬，刘湘派旅长黄冈（秋侠）迎接黄子谷见面。黄对刘湘赞同宋庆龄、何香凝“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表示钦佩，对刘湘与中共和各进步社团的密切联系和合作表示满意，希望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关系。刘湘也陈述了他对形势的看法和主张，并望中共给予谅解和协助。10月底，黄子谷、张曙时接办了《成都快报》改名为《建设晚报》，用以宣传抗日，提倡民主。刘湘每月补助该报经费400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敬佩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赞同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共通过刘湘的高级幕僚张斯可、乔毅夫、高兴亚、郭秉彝等为刘湘出谋献策。刘湘曾先后派叶雨苍、王干青为代表，到延安与中共中央联系。1937年8月以后，中共中央曾先后派罗世文、李一氓以中共代表身份来川，与刘湘建立联系，在宣传中共主张动员刘湘走抗战道路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中共还吸收了刘湘的高级参谋郭秉彝入党，并通过各种关系介绍一些中共党员到刘湘部队中工作。中共所派人员在对刘湘等川军将领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讲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的道理，指出坚持抗战的光明前程，这对于推动川军出川抗战，起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入川

1935年3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防堵消灭在川黔地区迂回作战的中央红军，从汉口飞抵重庆。

3日，他手令驻川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并令川军郭勋祺部与桐梓黔军向遵义城东北进攻。周浑元部向遵义西北地区进攻，吴奇伟部集结刀靶水一线防堵，企图以南北夹攻战略，“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4日，蒋介石在重庆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活动，发表了以“围剿”红军、建设四川为内容的讲话。

18日，蒋介石再次在重庆扩大纪念周讲话提出：禁绝鸦片，取消防区制、实行征工，推行新生活运动为四川的要政，必须全力实施。

20日，蒋介石电令“围剿”中央红军的川、滇、黔各军迅速构筑碉堡，严密封锁红军入川通道。令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向古蔺地区追击，刘兆藜、周成虎部向叙永天池移动，魏楷部转至桂花场，周化成部驻守古蔺城外，田中毅、张诚部赴合江、江津沿川江堵截，郭勋祺、廖泽、潘佐旅各一部，由茅台西渡赤水，尾追红军。3月22日，中央红军在朱德领导下，出敌不意，分别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从川南重入黔北，将蒋介石部署的川、滇、黔三省合围部队及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传部抛在赤水以西地区。红军旋南渡乌江，进军云南。。

4月2日，蒋介石下令将在“剿共”中“防守不严”“玩忽命令”的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对副军长孙震记大过一次，以进一步控制四川军阀，加强“剿共”。

常隆庆发现攀枝花铁矿

1935年春，地质学家、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及其地质考察队，在对凉山地区考察数月之后，首次进入攀枝花一带，在马坎、那拉箐、陶家渡等地发现了煤矿，又在兰尖火山、朱家包包、红格等地发现了铁矿。他激动万分，凭借一双慧眼，一把地质锤，一个罗盘，一把软尺，初步测定出攀枝花西部地区铁矿和煤矿的储量。他写出了《马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发表于《新宁远》月刊，首次将攀枝花宝库公诸于世。

自此开始，到1942年间，他前后8次深入攀西地区，1937年出版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报告；1938年参加了川滇铁路勘察测绘工作，规划在金沙江上修8座大桥（现在除一座无人行走的吊桥外，正好8座大桥）；

1939年，他又与西康技艺专科学校采矿教授刘之祥复查攀枝花，发现了渡口今兰尖铁矿露头处，经现场观测，绘制地形地质草图，估计出此处铁矿储量为1100万吨以上。现在攀钢正好建在这里；1942年，他邀请一批地质、矿产专家考察攀枝花，作了中国最早的磁法测量，由学者陈正鉴定发现钛磁铁矿。1944年，税裕琪根据南非发现钒钛磁铁矿的经验，认为含钛铁矿都含钒。经鉴定确认，攀枝花果然是大型钒钛磁铁矿。

取消关卡，地方税捐统征

1935年3月21日，为取缔各地征收的非法税捐，各地37个税卡和重庆所设税捐总局奉命裁撤，成立四川省地方税局。二十一军总金库被取消，改设省政府总金库，由财政厅长刘航琛兼主任。对各种应税货物，在出境或入境时进行一次性征税，运输途中不再重征。

中央银行在川设机构、发钞票

1935年3月25日，中央银行设立重庆分行；8月16日，设立成都分行；9月设立万县分行。到1942年，中央银行在四川设立的分支行、处达30余个。抗日战争期中，中央银行总行迁重庆达7年之久。其主要业务为发行钞票，统管外汇，经理国库。汇解军政款项，调剂金融市场等。中央银行先后在四川发行印有“上海”、“重庆”地名兑换券2000多万元。实施法币政策后中央银行的钞票定办法币，成为四川省内主要的流通货币。1949年12月，中央银行在川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

四川春荒，出现人吃人惨象

1935年，四川春荒，出现人吃人惨状。入春以来，北川北乡连松茂片口一带，连月来发生盗食死尸案数起。松潘、万源、通江等地，自杀其女、孙吃肉充饥之事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人饿死道旁，活人即伏尸而食以充饥。还出现杀人卖肉的情况，有以卖人肉汤为生者。松潘平定关一带，灾情甚重，杀人而食，卖4200文一斤，冒称牛肉。北川死尸每斤500文，活肉卖1200文或几千文不等。

5月，川东农村发生春荒。合川四乡农民，生活无着者达十之六七。古蔺具遇荒弃家远逃者1000余家。大竹各乡饥民麇集，动辄数百乃至一二千人。饥民大多以豆叶菜根果腹，迨至草根树皮剥食干净，争挖白泥充饥，如南川、古蔺、遂宁、南充、武胜、合川、隆昌、内江、宜宾、江安等县，白泥竟成饥民主食。古蔺一县饿死者达3000余人。铜梁饥民数百入米市抢米，被团丁打死打伤数人。南川冷水乡饥民竟将死尸烹食充饥，此种惨象各地时有发生。

中央统一通货，四川发生“地钞”风潮

1935年4月，四川省政府转财政部令：各商业银行，限在本年9月底前收回所有未经中央核准发行的纸币及类似纸币的元息存单、储金券等。发钞只由中央、中国、四川地方三行办理。6月，省政府规定，地钞与渝钞等价行使，并规定，除上述三行纸币外，各税收机关对其它杂钞一律拒收。9月，蒋介石颁发收销地钞办法，规定自本月15日起，川省内所有公私交易一律以中央钞为单位。四川地方银行钞停止使用。11月国民政府公布改革币制方案，施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钞券为法币。12月31日，为各地杂币券及地钞收销截止期，全川通用法币。因时间仓促，种类复杂的硬、纸币，未能合理地按质兑换，尤以边远县份为甚，人民遭受巨大损失。

自统一通货的政令发出后，四川地钞及其它杂币地位动摇，人心恐慌，市面混乱。8月重庆中央银行设点按面值收兑地钞，挤兑秩序异常混乱，连续发生挤伤踩死弱幼惨剧。9月10日，蒋介石颁布收销地钞办法，规定自15日起停止地钞行使，按八折掉换中央银行本钞，限期3个月收销完毕。消息公布后，引起全省极大轰动，各界反映强烈，市场出现混乱，物价一律上涨二成，各银行、钱庄停收存款，限制汇兑。内江地方银行被群众捣毁。各地商民代表纷纷集会，电请蒋介石收回成命，改按地钞面值掉换中行本钞，维护群众利益。但无济于事。中行仍按八折收兑，至当年底共收兑地钞3716万元，并于次年1、2月在重庆、成都两地销毁。

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

1935年5月22日，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为了表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各族人民打天下，也是各族人民的朋友，根据彝族的风俗和重义气的特点，刘伯承在冕宁县彝海子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代表红军将一面写有“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鸡支队”的红旗授与小叶丹。对受敌控制利用同红军对立的罗洪家族则耐心说明党的政策，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区，并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壮年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力量。

美国远东经济考察团来四川

1935年5月中旬，美国福勃斯远东经济考察团来川。其团员有英美烟草公司董事汤麦士、美国商务总会董事希佛利、密西根大学教授雷麦、斯丹福大学教授阿尔司培等17人抵达成都。考察的主要内容在于明瞭中国的建设实况及远东市场情形，并搜集

关于白银问题的材料。该团计分：金融财政、贸易关税、运输交通三组考察，遍游沪、粤、平、津、汉、渝各地，于6月18日返回美国。考察报告于11月在美国发表：建议与中国合作开采运销白铁矿藏；鉴于英、意等国利用庚款售销工业、建筑、商船、铁道材料，建议参加竞争，推广长期放款，在中国设立资力雄厚的代理机关，有权可以对于购美货者给以长期信用，或在华设立大银行，以助中国发展，而以大量购白铁增进中国的出口贸易；主张对华长期放款应有统制机关，以保证资本不致挪用，如投资工程应由美国人监督，管理应有美人国参与等。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6月初，红四方面军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三十军、九军各一部由岷江西进，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代表四方面军致电中央，报告当前的敌情和红四方面军的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表示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中央红军。12日，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翻过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县东南的达维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4日，在夹金山下达维的喇嘛寺举行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都出席了大会，发表讲话。

蒋介石举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

1935年6～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其所谓“统一然后复兴，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举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以大佛殿、万行庄、报国庄、伏虎寺、善觉寺为团址，团本部设报国寺。蒋介石自任团长、刘湘为副团长，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为团附；陈诚担任教育长；杨永泰、贺忠寒、李明灏、康泽、王俊等主持日常团务；蒋百里、扬治中、杨杰、杨文琚、罗隆基、肖一山等担任专业教学；薛岳部担任团部警卫。训练分前后两期，共训练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高中级军官共4003人。

清偿债务，发行善后公债

1935年6月30日，四川省政府清理各军防区所欠 借款和未偿债券本息，经请准由国民政府公布条例，发行善后公债7000万元，年息6厘，以四川盐税作抵，定于1944年以前分期偿还。此后，为整理旧债和弥补预算差额，省府又发行各次公债。至1938年5月底止，未偿公债本金共1.1亿余元。

教育部整理四川院校

1935年7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经过对四川高等教育的实际考察，提出整理办法六项，由川大及省教育厅遵办：

一、川大理教及政经两系均合并；文学院各系依旧，增设农学院；

二、重大定为省立，先设理、工两院，原有教理两系合并。工学院设土木、采冶、电机三系，经费充足时，得增设医科。原有文、农两院学生并入川大，由省教育厅先行接收。

三、省立农学院并入川大，由省教育厅先行接收；

四、省立工学院并入重大，原址及设备由省教育厅改办职校。

五、重大原有学生，未经备案，一律由省教育厅重行检定，呈部核定。

六、省立农、工两院原有经费，分别拨归川大、重大支配。川大及各该校院附中、附小，划归省教育厅办理，经费由省教育厅另行筹措。

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开业

1935年7月8日，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开业。

中国农民银行由原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成立，总行设汉口。7月8日，在重庆设分行，首任经理筛迪锦。主要业务为发行钞票，发放农贷、指导组建合作社，辅设合作金库等。继后在川成立的分支行处，最多时达47个。实施法币政策前，该行在四川发行有1元、5元、10元的流通券。1936年，国民政府规定，农民银行钞票等同法币。1949年12月，中国农民银行在川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

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成立

1935年7月15日，将介石电令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委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关吉玉兼任处长，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兼任副处长。四川一切重大财政措施和年度预算都必须经行营财政监理处审核同意。

李德才蜚声曲艺界

1935年应上海胜利公司之邀，四川著名扬琴表演艺术家李德才（1903～1982）（原名德娃子）赴上海灌制专辑唱片30余张。他久负盛名的《贵妃醉酒》、《抢伞》、《三祭江》、《活捉三郎》、《秋江》及曲牌《将军令》等，均灌入唱片。这些唱片发行、受到中外华人喜爱、行销全国和东南亚一带。他逗留上海3个月，在“小广寒”开办专场演唱，博得听众高度赞美。回川途中经汉口时，邂逅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程对他的美妙唱腔大加称赞。稍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也致函赞许。

李德才，广汉人，出身扬琴世家。

其父炳福为盲人，学杨琴于成都谢兆松，与同门李连生并称高足，在曲艺界颇负盛名。德才从父习扬琴生角，8岁登台，14岁倒嗓，苦练仄音改习旦角，唱腔妙雅，一鸣惊人。后在成都沟头巷协记茶园，玉带桥陆羽茶楼献艺颇久，也曾应重庆曲艺界之邀，在山城章华舞台演唱。

中央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

1935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整理四川财政金融办法》，决定自本年8月1日起，由中央发行民国24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3000万元，以中央在川省所收统税、印花、烟统税，月拨55万元为基金，专款存储，作为收回地钞之用。规定1940年11月底还本付息。

自二季度开始，中央银行实施回收兑换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钞券，除地钞外，二十一军和二十八军粮契税券、川康1元、5元无息存单，美丰10元、1元券，平民儿童5角储金礼券，四川建设1元无息存单，万县铜元券等均回收，至年底约共收销各地各种杂币券2000万元。至此，全川流通的只有中央、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

12月，四川完成收销地钞和各种杂券后，市场筹码短少，经由财政部及有关方面商定领钞合同，由省内公私行庄以现金（法币）6成，保证准备（公债）4成，向国家银行领用钞票使用。计在重庆领用9260万元，在上海领用2440万元，合同期限两年半。期满后，曾一再延期。

民国24年度财政预算

1935年7月，省政府确定民国24年度（1935年7月1日至1936年6月30日）财政预算为：

（1）收入合计6790万元，其中国税1320万元，省税5470万元；

（2）支出合计：6790万元，其中军费4000万元，行政费1200万元，债务1590万元。

四川省开办统税

1935年8月1日，四川省开办统税。财政部为整理四川省财政，特将四川划入统税区，在全川开办统税，凡以前运销四川的卷烟免税运照起运者，自本年8月1日起，应即一律完纳统税，贴足印花，领用统税运照；自运达川者，被重征后，特重征税据，来部请求退税。在四川境内设厂制造的各种统税货物，由四川财政特派员派员驻厂照率稽核征收统税后，始准出厂销售。1937年10月1日，重庆开始征收战时临时统税。凡进口货物，无论空远、陆运、水运均一律按照转口税征7.5%。

全川开办短期小学，推行义务教育

1935年8月13日，四川省政府为推行义务教育，令各县市开办短期小学，招收9～12岁儿童入学。规定成渝两地各办20所，其余大县各办20所，中县18所，小县15所。全川短期小学经费定为65万元，由中央补助13万元，省府支拨26万元，余26万元由地方分筹。

1936年川省义务教育经费29万元（中央补助14万元，本省自筹15万元）。全川有完小1200余所，补小28000所，可容学龄儿童不到总数1/2；全川检定合格小学教员23530人，达不到需求量1/2。迄止1937年春，全省平均1000平方里区域内有小学及幼儿园12所，每1000人中有入学儿童15人；全省人均教育经费0.21元。西康每1000平方里区域内有小学及幼儿园0.06所，每1000人有入学儿童2人，每人年均教育经费0.3元。

“参谋团”改组为“重庆行营”

1935年10月3日，蒋介石下令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贺国光为参谋长。11月1日，重庆行营正式成立，参谋团即行撤销。

1937年3月，贺国光升任行营副主任，并在顾祝同返川前代行营主任。

1938年2月12日，邓锡侯被任命为行营副主任。同年4月26日，邓锡侯出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文辉被任命为行营副主任。同年8月1日，张群被任命为行营主任。后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迁重庆办公，重庆行营于1939年2月1日撤销，另在成都、西昌两地分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贺国光任成都行辕主任，张笃伦任西昌行辕主任。

四川省政府局部改组

1935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四川省政府局部改组：民政厅长甘绩镛免去厅长兼职；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郭昌明、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杨全宇均另有任用，免去本兼各职；任命王又庸、卢作孚、李为纶为省政府委员，王又庸兼民政厅厅长，卢作孚兼建设厅厅长，李为纶兼教育厅厅长。

四川运动员参加第六届全运会

1935年10月10日，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开幕。四川派遣男运动员48名，女运动员16名参加比赛，获第三名2项、第四名3项，第五名1项、第六名2项。

川军第一期整编就绪

1935年10月，川军经裁员缩费，行营参谋团组成“点验委员会”点验完毕后，各军第一期整编完成。编制

及将领如下：

(1)陆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辖第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域；第一三四师，师长夏炯；第一三五师，师长杨汉忠。全军共15团。

(2)陆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辖直属旅，旅长余松琳；第一三六师，师长陈光藻；第一三七师，师长刘元塘；第一三八师，师长唐英，全军共15团另一个特务大队。

(3)陆军第四十一军（原二十九军），军长孙震。辖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三师，师长曾宪栋；第一二四师，师长孙震兼。全军共18团，另一个特务团。

(4)陆军第四十五军（原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辖第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第一二六师，师长黄隐；第一二七师，师长马毓智；第一二八师，师长邓锡侯兼；第一三一师，师长陈离；特科司令谢德堪。全军共24团。

(5)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辖第一师，师长饶国华；暂编第二师，师长彭诚孚；第四师，师长范绍增。全军共16团又12个独立营。

(6)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辖教导师，师长杨国桢；第5师，师长陈万仞。全军共14团又6个独立营。

(7)陆军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辖第一师，师长廖震；第二师，师长郭昌明；暂编第1师，师长陈兰亭。全军共计16团又11个独立营。

(8)陆军第一〇四师（原新编第六师），师长李家钰。全师共计9个团，又1个补充团。

(9)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直辖部队，辖暂编第三师，师长许绍宗；模范师，师长郭勋祺；暂编第四师，师长张邦本；暂编第三旅，旅长范楠煊；独立第五旅，旅长田钟毅；独立第六旅，旅长熊玉章；独立第七旅，旅长刘树成；警备第一路，司令邓国璋；四川边防军第六混成旅，旅长黄岗。

四川设农村合作委员会，推动成立县、市合作金库

1935年10月，四川省政府按照《农村金融紧急条例》规定，设置县、村合作委员会，推动全省合作事业的发展。1936年11月，省合作金库成立后，即积极辅导设置县、市合作金库，拟定3年内完成普设计划。县、市合作金库由省金库、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本局筹划区辅导设置。到1939年底，共发放农贷2700余万元，所有农贷，均由合作社集体贷款。全川共有130余县成立了合作社，入社农户达150余万户。1940年1月，四川农村合作委员会由建设厅长兼主任委员，四川省银行两行经理为委员，并拟定三项中心工作：一、普遍建立合作组织，二、发展特产产销合作，三、推广出征军人家属合作组

织。到1944年止，在四川成立县（市）合作金库121个，西康成立10个。合作金库成立后，即发放合作农业贷款。8年中由合作金库发放的合作农贷约占农贷总额的50%左右。

四川省政府裁撤军队杂捐

1935年10月，四川省政府裁撤军队杂捐。四川防区制时代，各地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自省府改组后，即规定：凡以前各地百货税项、附加各款以及各抽数过道货捐，一律通饬裁并。无论进出口货，只须纳税一次，即可通行各地。截至1935年10月份止，苛捐杂税裁撤者，据各地呈报，达120余种。而各税收机关经省政府裁并者，亦达50余所。

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自11月4日起，所有完粮纳税收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银元，违者全部没收。法币发行时，财政部采纳川省各界意见：同意将收兑的银元，暂存渝蓉两地，以安定人心；对法币流通不足的边远县区，准予暂时保持市面原有货币使用习惯；川铸银元，除钢版、铅版假造者外，原则上均按1元兑换法币1元。这些适当照顾川省民众利益的措施，减少了法币在四川发行的阻力，除藏、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因历史习惯，在一段时期拒用法币外，内地各市、县均通行法币，四川币制混乱的局面逐渐结束。

新又新戏剧传习社成立

1935年，由二十一军独立师师长刘树成筹办的四川第一所以培养川剧艺员为目的的戏剧学校“新又新戏剧传习社”在重庆成立。

该社社长由刘树成担任，川剧剧作家刘怀叙任副社长，名丑刘成基（当头棒）任教导主任。社内实行以老带新、传艺包教的方式，高薪聘请著名老艺人任教。川剧著名艺人张德成（生角）、阳友鹤（筱桐凤，旦角）、傅幼麟（武生）等均到社任教。

该社首批学生50名经过严格训练，很快就能独立演出，道具、剧装更换一新，演出技艺也达到较高水平，使山城川剧观众耳目一新，场场满座。

1936～1938年，因省府迁往成都，刘树成部整编后移驻川西，“新又新”剧社也因之迁到成都。当时成都川剧团体有春熙路的“三益公”、棉花街的“永乐”、布后街的“成都大戏院”，剧社初无定所，最后在祠堂街建立了“新又新”大舞台。这个表演团体阵容整齐，行当齐全，演员严肃认真，艺术水平高，在成都、重庆同行和观众心目中印象很好。

“新又新”剧社还大胆改编新戏，著名的时装新戏“血泪碑”就是他们

成功的新戏之一。在表演方面，他们能吸取电影、话剧之长，丰富自己的川剧表演技巧。

后因失火烧毁了剧院，全团演职员在少城公园、商业场昌宜电影院演出。1941年底，“新又新”剧院修复。1943年，蒋介石观看了剧社演出的哪吒闹海。1945年剧社人员星散。

都江堰大修，改建鱼嘴

1935年冬至1936年春，都江堰大修，第一次采用水泥，改建堰首鱼嘴。

1933年10月岷江叠溪洪水爆发，都江堰首全被冲毁。同年冬到次年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拨款1.2万元恢复砌石鱼嘴，于1934年4月完成。因基础不牢，1934年7月讯期复被冲毁。1935年冬，四川省政府拨付工款15万元进行大修。大修由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沅主持，将鱼嘴位置西移20余米，浇筑混凝土基础，水泥沙浆砌石筑成顺水流线型新型鱼嘴，同时加固百丈堤、内外金钢堤、飞沙堰和人字堤，内、外江亦同时大力淘修。工程于1936年4月8日告竣，由省府主持开水典礼。

都江堰自1936年改用水泥新材料砌筑后，直到1973年改建外江节制闸拆除，中经36年，一直稳固完好。

这次大修都江堰是四川省水利工程第一次采用现代工程材料和现代施工方法。

马边地震

1935年12月18日15时10分36秒，马边发生6级地震，震中烈度8度。16时发生$5\frac{3}{4}$级地震，第二天0点59分又发生6级地震、21时21分再次发生$5\frac{1}{4}$级地震。四次地震造成城垣、房屋坍坏，压毙人民数百，死牲畜无算。新华乡全场房屋倒塌。雷波西宁，50余铺户全行震倒，压毙男女4人，重伤6人，轻伤30余人。川西南地区均有震感。

“一·二九”运动后四川出现抗日救亡高潮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四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北平爆发中共领导的12月9日抗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入四川后，11日，重庆大学连夜组成“学生救国会”，24日，重庆39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114人集会，成立“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出版《救国半月刊》。成都、万县等地学生也同时响应，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兴起。一些分散隐蔽的共产党员团结积极分子，推动运动发展。“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不到3个月就被当局责令解散。1936年6月，在共产党员漆鲁鱼领导下，秘密成立“重庆救国会”，形成重庆群众抗

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为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奠定了基础。

四川金融风潮

1935年，四川发生大规模金融风潮。这一风潮酝酿于1932～1935年间。1931年10月31日，重庆“申票大王”石建屏经营烟土、土产等的建记字号，因投机申汇300余万元，获得暴利20万元，继续卖空，但“九·一八”事变及武汉水灾发生，烟土销量呈锐减，土产出口疲滞，亏累数十万元，以致倒闭。汇和、美通、桓美、鸿胜、康济等号受倒闭牵连，相继停业。石被捕判刑2年6个月。

1932年7～9月，重庆钱业公会与证券交易所发生钱票兑换风潮，票据失去信用，无法兑换现款。8月，重庆发生“汤字号”事变。汤子敬父子经营的民记钱庄受汉口昌和烟土公司倒帐影响，周转失灵，首先倒闭。汤氏联号大成、富润、同生福、正大永、源远长、永福、同昶、峤源8钱庄，和与汤字号往来较多的诚大、鼎盛、同丰3家钱庄及有关商号随之倒闭，未了债务50余万元。“汤字号”约占重庆经济势力1/3，倒闭事件震撼全市金融。10月，成都谣传二十四、二十九两军将开战，凡以军人为背景的银钱行号，连日发生挤兑。11月5日，重庆各银行、钱庄因军阀筹饷紧迫，无力应付，倒闭19家。1934年8月，刘湘“剿赤”失败，秘密离川，时局不稳，成都四川银行发生挤兑风潮，成都中国银行、重庆市民银行成都分行等家同受波及。9月17日，蒋介石电四川善后督署：成渝两地汇出申汉大批款项，致汇水高涨，人心浮动，应即查禁。究其原因，由于历年财政亏空严重，为弥补赤字四川地方银行依靠增发钞票维持，迄止1935年4月统计，共计发行主辅两币3307.68万元，准备金仅306.79万元，不及发钞额1/10，因此币信大大动摇，金融风潮愈演愈烈，时有挤兑发生，申渝汇价波动不已。

日货倾销四川

1935年日货倾销四川。自1931年以后，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加紧与英国争夺四川市场，四川棉纱、棉布市场逐渐被日货占领。日本棉织品已占重庆总销量的70%。年输入达200万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东北为基地向内地大量走私白糖、人造丝、海产品等，更加剧了日货在四川的倾销。自1936年起，全川再度掀起低制日货、查禁日货走私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四川省银行在重庆成立

1935年，四川省政府改组后，经省务会议通过，将四川省地方银行改组为四川省银行。由省政府拨款80万

元，凑足资本200万元。是年11月1日，原四川省地方银行总分行处，一律改名。四川省银行总行初设重庆，1946年9月，后奉令迁成都。先后担任董事长的有周焯、郭松年、潘昌猷、邓汉祥、李星枢等，担任总经理的先后有刘航琛、潘昌猷、杨晓波、康宝志、何兆青、王锡琪等。到1947年在省内共设立分支行处109个，分布在全省76%的县市。四川省银行以“调剂全川金融，扶助经济建设，开发生产事业，促进农村复兴”为宗旨。经财政部核准曾发行辅币券1000万元，并向中央银行领用钞票，代理公库。1949年底，四川省银行各级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

潘钟祥、谢家荣先后提出四川盆地陆相生油观点

1935年潘钟祥在巴县石油沟、达县税家槽、蓬溪县蓬莱镇3处调查后著《四川油田简报》，提出白垩纪陆相生油的观点，并拟定钻探巴县石油沟构造的1号井井位。

1937年谢家荣著《中国之石油储量》，认为四川的三叠系石灰岩“或即为成油之源”。其上大陆沉积之石油，“或即自下迁徙而成者也”。认为除自流井外，较有希望钻获石油的地区有：巴县石油沟、达县税家槽、蓬溪县蓬莱镇。

美人费尔朴英译《峨山图谈》向世界印行

1935年，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哲学系美藉教授费尔朴及其妻费尔朴·马尔玉，将清末黄绶芙、谭钟岳等编著的《峨山图谈》译成英汉对照本，费时4年。经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方纲修订，向世界印行。

四川外贸概况

1935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四川进口货物总值56067459元，其中洋货进口货值2055359元，土货进口货值54012100元。出口货物总值36810012元，其中，土货进口货值36741334元，土货复出口货值68678元，全年进口货物总值92877471元

本年土货出口情况是：山货出口货值8271816元，桐油出口货出值13628025元，生丝出口货值858840元，药材出口货值4431860元，夏布出口货值818888元。桐油在出口土货中居首位。山货中，猪鬃为大宗，本年出口10996担，货值4466913元。生丝仍无明显起色，夏布自“九·一八”事变后，销路日益衰微。

1936年(民国25年)

四川开征营业税

1936年,四川举办营业税。自川政统一以后,四川将旧有税捐改为统一制,设立地方税局,一次征收。后奉中央命令,将卷烟、棉纱、火柴等项,归入统税范围,川省地方财政收入渐减。财政部令四川省府改变营业税,增设四川省营业税局和各地征收机构,公布"四川省营业税征收办法"。先从省内重要都市试办,然后逐次推及各县,扩大征收地区和征收对象。税额骤增数倍。1937年11月1日,省府将原征收2%的营业税率,改为征收3%。此前尚未开办的市县,全部自12月份起按新税率开征。后以偏僻县份工商营业不旺,将边远40余县的营业税局、所停办。

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1936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坚持北上陕甘的战略决策。

1935年6月,中央红军3万人左右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在懋功会师后,在两河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并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行动。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多,个人野心大膨胀,向中央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率左路军南下。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为陕甘支队。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松岗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兴乡)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公开分裂中央和红军。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耐心地对受欺骗的指战员做工作,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四方面军中不得人心。由于路线错误,南下天全、芦山、名山的部队在作战中减员过半。中央一再电催北上,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2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又经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同时得到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的积极支持,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

上，10月，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四川连年大旱

1936～1937年（民国25年丙子、26年丁丑）四川省除成都平原外，普遍大旱，是近百年来四川发生过的最大旱灾，人称丙（子）丁（丑）大旱。

1935年，四川川中、川东、川北已有不同程度干旱，特别是梁山（今梁平）、邻水、大竹、达县、南江、万源一带，夏旱两月无雨，秋田收获多者四成，少者不足二成。1936年丙子旱区更扩大到川西、川南一带。灾区先是春旱，继之以夏旱，迄秋冬直至1937丁丑春夏，连月亢阳无雨，泉干井涸，田土龟裂，无法下种。丙子或有存粮，丁丑则无以为继，草皮树根食尽，采掘白泥，饥民络绎于途，死者填沟壑，生者四散逃荒。有记载的南江县饥民，两天饿死2000人；巴中县2～5月饿死饥民800余人；万源县全县人口，灾后骤减三分之一。据四川省政府统计：1937年春，全省受灾140县，灾民3000万人，受灾区域及人口均占全省的五分之三。四川当年灾区各地，至今普遍仍有“丙子易过，丁丑难挨”的民谚。

更严重的是大旱之年不是无雨，而是暴雨，导致洪灾。1936年万县遭逢数十年罕见大旱，8月6～7日洪水暴涨，沿江各镇均成泽国。重庆自1937年8月初起，连日大雨，江水骤涨，交通断绝。江津大旱之后。8月江水大涨，河街一带尽成泽国。万源县9月19～24日大雨6昼夜，城内城外俱成泽国。

成渝造币机构收归中央管理

1936年3月，四川省政府转财政部通知，令成都、重庆两造币厂归中央造币厂监督管理。10月，中央造币厂派工程人员罗权、谢光宇到成、渝两厂考察后，指定重庆铜元局为厂址，将成都厂旧有机械运渝，筹设中央造币厂重庆分厂。

省府发行四川善后建设公债

1936年4月1日，四川省政府得财政部批准，发行四川善后公债，用以办理善后建设事业。债额法币1500万元，年息6厘，偿还期限15年，自发行日起，每届半年抽签还本，至民国40年前3月底，本息全数清偿。指定在中央征收四川部分盐税项下，每月拨给补助金4万元，并由四川省政府于营业税项下，每月拨给5万元，共计每月拨13万元，为还本付息之用。

马边等地地震

1936年4月27日7时59分11秒马边6$\frac{3}{4}$级地震，震中烈度9度。至4月29日共发生5.5～6级地震4次。县府监狱内外砖墙及各办公室土

墙均震毁，各处电线震断，震坏民房不知其数，屏山县府三堂震坏。隆昌小南门地垣倒坍数丈。城乡内外官井巷、姚家巷、南北两关等处之房屋均有倒坍者，屋瓦坠落尤多。泸县白塔顶震落，报恩塔震坏。綦江角塘民房破坏。

自贡、灌县、岳池、蓬溪、雅安、茂县、南充、开县、重庆、江安、宜宾、郫县、温江、崇庆、中江、成都、广汉、遂宁、永川、铜梁等地亦震。

同年5月16日15时5分44秒雷波西宁6$\frac{3}{4}$级地震，西宁民房被毁者占十之六七。死亡居民达四五百之多。江安，乐山有破坏。灌县、乐山、江安、重庆、开县亦有震感。

盐税统一附加

193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盐税统一附加。即日公布实行全国各盐场销地及税率表；规定盐税的正税分为场税和岸税，实行产、销两次课征制；盐税附加规定有外债附加、中央附加和地方附加三项。中央附加包括整理费和附加两项内容。地方附加包括河工捐、产地捐、加征产捐、销地捐、销地整理费、军事特捐、缉私捐等多项内容。盐税税额按产区和销地分定，分别征收。整理盐税的目的和重点是废除封建"引岸制"，建立盐的自由贸易。实行就场征税，统一全国税率，整顿附加。即原来的地方附加收归中央征收。致使正税之外征收附加合法化。中央附加之外，又有地方附加，使人民的负担一加再加。川盐抽收附加后，生产大受影响，川盐市场价格亦出现波动。

民国25年度财政预算

1936年7月15日，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公布民国25年底(1936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全省财政预算：

(1)收入合计8235万元，其中国税2630万元(其中盐税1670万元，统税600余万元，印花、烟、酒税300余万元)，省税5605万元(其中田赋2600万元，禁烟收入900万元，契杂税500万元，屠宰税270万元，地方税540万元，营业税360万元，房捐20万元，土地登记费365万元)。

(2)支出8500万元，其中军费4100万元，行政费1400万元，付债3000万元。

《四川日报》创刊

1936年8月7日《四川日报》在重庆创刊，日出对开报纸一张，陈远光任社长兼总编辑，蒲剑秋任总主笔，该报宗旨为"唤起民众，努力救国"。1937年3月该报迁到成都，车耀先任董事长，陈远光任社长兼总编辑。抗战期间，在中共四川省工委的领导下，成都市委书记杜桴生任该报总编辑，一大批中共党员参加编辑、出版工作，发表

了大量的抗日社论、短评和反映形势的报道。后来由于经费困难，从1937年9月19日起改办四开版，1939年4月30日停刊。

成都大川饭店事件

1936年8月24日，成都爆发反对日本设领事馆的大川饭店事件。日本政府为侵入我国西南，于6月向国民政府提出在成都设领事馆，并任命岸井英一为总领事。消息传出，受到全川人民的强烈反对。8月22日，“成都各界民众反对日本在蓉违法设领大会”成立，举行集会游行。23日午后，日本先遣人员田中武夫等4人，由重庆到成都，当晚住进骡马市街“大川饭店”。24日，数千民众结队游行示威，午后，包围“大川饭店”，捣毁了经理室和餐厅，日人深川经二和渡边恍三郎被打死，田中武夫、濑户尚二被打伤，一部分群众还涌向东大街，暑袜街、春熙路等地，捣毁了长期贩卖日货的8家商号。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的企图未能得逞。大川饭店事件是成都各阶层人民群众反日反帝的受国行动，张曙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刘湘做了大量工作，使刘湘改持反对设领事态度，一些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四川省始建第一批江河水文测站

1936年8～12月四川省水利部门先后在岷江、嘉陵江布设四川省第一批水文测站。

四川省现代水文观测始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5月重庆海关设立狮子山(玄坛庙)水位站，1917年2月万县沱口、1922年4月宜宾中城镇由航运部门设立水位站。

1934年4月28日至6月15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应四川省善后督办刘湘邀请组团来川考察水利、水电资源及工程建设，提出培育人才，加强勘测，建立水文测站，积累基本资料建议。

1935年11月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在灌县成立厅属四川省水利局。1936年1月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要求在四川岷江、青衣江、大渡河、嘉陵江、乌江等布设水文测站，观测水位、流量、雨量、蒸发量、含沙量等。至1936底，四川省水利局分3区设置了第一批岷江紫坪铺、大渡河铜街子、青衣江黄河、嘉陵江私盐沱、龙溪河袁家坪等流量站(水文站)7处，水标站(水位站)13处。

成都民先队成立

1936年10月初，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成立。共产党员韩天石、王广义等受中共的指示，从北平、山东转学到四川大学，他们约集川大、省立师范等校进步学生16人秘密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

(简称民先),受北京民先队总部领导。成都民先队印发内部刊物《M·S周报》("M·S"为"民先"汉语拉丁化缩写),公开出版《活路周刊》。与此同时,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饶孟文也团结一批革命青年,秘密组织"海燕社",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6月,"民先队"与"海燕社"合并,由韩天石、周海文、康乃尔、胡绩伟等组成新的"民先队"领导机构。"民先队"作为中共外围组织,在宣传抗日救国、壮大抗战力量、输送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等方向,作了许多重要贡献。

全川鸦片产量与瘾民概况

1936年10月15日,据前四川禁烟特派员萧致平透露:四川鸦片生产分布在川东、川南、川西山区,估计下川东丰都、涪陵、长寿、垫江、开县、开江等年产量共5万担以上;宁属(西昌督察区所辖)盐边、会理、盐源、德昌、荣经等县年产量共7万担以上;嘉定所属雷波,马边、屏山各县年量共1.5万担以上;川西北松潘、理番、茂县、汶川、懋功各县年产量共2万担以上,全川合计每年鸦片产量在15万担 以上。全省瘾民统计,截止本年9月底止,约为110万名,加上漏报40县瘾民约80万~90万名,全省总计约在200万名左右。

成都各界悼念鲁迅先生逝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21日,国立四川大学师生在川大文学院(旧皇城致公堂)召开成都各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会上,包括朱一凡(中共党员)在内的著名人士相继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对发扬鲁迅战斗精神,推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刘湘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1936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川康绥靖公署,任命刘湘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于12月18日通电宣布"谨于12月20日在蓉就职"。

四川省水利局延聘全国水利建设人才

1936年冬,青神邵从荣应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邀请回川,接替张沅任四川省水利局局长,将局机关由灌县迁到成都,延聘全国水利人才。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全国水利技术专家,学者来川者日多,邵更多方罗致,先后应聘来四川省水利局工作的有曹瑞芝,李赋都、黄万里、张有龄、顾兆勋、李镇南等留学德、英、美、日、法等国的专家和国内培养的吴际春、魏振华、朱墉庄、刘砆等水利专家,为四川采用现代水利技术作出贡献。

四川省水利局在邵从燊任职的1936～1949年期间，除对涪江、岷江、青衣江等河段以及都江堰灌区进行现代测绘，作出全面水利开发规划外，先后完成涪江天星堰、龙西渠、大围堰、四联堰，大渡河楠木堰、青衣江花溪渠、巴县梁滩河等一大批现代引水渠堰工程。四川高地灌溉所用水轮泵，首先为刘砚工程师制造，并被四川省建设厅命名为刘砚式抽水机。

四川地方杂捐

1936年，四川省财政厅征收地方杂捐。自省财政厅统筹全川地方财政后，税收较平时减少，加之军费增加，负债达3000余万元。省财政厅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为：(1)追收田赋，提高屠宰税金额，并加收信用金和押金。(2)举办地方税，对进出口货物分别照15%和10%征税，并附加"剿赤费"一成。(3)设置省禁烟督察处，规定四川烟土税率为每千两烟土征税300元。(4)买卖契税税率照各县原有税率应征数目加一成征收。(5)随粮摊派善后公债，发行清理四川省政府短期借款凭证和省库券。

四川桐油出口总值居全国首位，油菜籽产量创纪录

1936年，四川出口桐油达到57万担，总值4796万元。当年全国出口桐油86.7万担，总值7300万元，四川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5.7%，居全省出口商品货值第一位。

30年代中期，四川桐油出口呈现曲折增长之势：1932年31.7万担；1933年45.6万担；1934年26万担；1935年42.2万担。

同年，四川油菜籽播种面积1255万亩，平均亩产59公斤，总产量7438万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油矿探勘处成立

193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四川油矿探勘处成立，下设达县、巴县两个矿区，负责钻探四川石油。王橛任处长。探勘处成立后，向德国哈卜罗公司订购4部旋转钻机，2套修机设备和2部抽油机。钻机是德国汉乃尔厂制造的，能钻1200米深的井。在运川途中受损，运抵重庆时，能配套使用的钻机仅3部，其中两部是完整的，1部缺动力设备，另购柴油机配套。资源委员会先后调给玉门油矿两部。四川是国内最早使用旋转钻机钻凿油气井的。截至1949年，四川用旋转钻机开钻井6口，完钻井5口(巴1、巴2、威1、江1、隆2、；隆4井未钻完)，总进尺6028.13米，最深井是巴1井1402.2米。钻获气井两口。

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中取得优势地位

1936年，经过与外轮激烈的商业

竞争，民生公司兼并了“捷江”（美籍）等轮船公司，成为与太古（英籍）、怡和（英籍）、日清（日籍）、招商局（华籍）四大长江轮船航运公司并驾齐驱的大型航运企业。

1934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华商轮船近30艘，总计7000多吨，基本上统一了川江航运业。同时，实力雄厚的美商捷江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失败，5艘大轮船被民生公司收买。另一英商轮船公司也被民生公司兼并。

1935年，捷江公司破产，出卖全部产业，民生公司收购外轮11艘。民生公司轮船数已由1930年的3艘增至40艘，总吨位由230吨增至16884吨，净增72倍，股本从25万元增至120万元，资产从54万元增至730万元。民生公司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年均利润达到40万元。

1936年，轮船增至47艘，共计20400吨，股本167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年客运量41万人次，货运量8万吨，航线延伸到上海，并在宜昌、汉口、南京、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

民生公司在长江航线上站稳了脚跟（详见下表）。

1936年长江航线上各大轮船公司船舶数量、吨位比较表

比较项目		合　计	太　古	怡　和	日　清	招　商	民　生
船舶数%		100	16	13	17	7	47
吨位	吨数	138946	29725	32275	35077	21464	20404
	%	100	21.39	23.23	25.25	15.45	14.68

四大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配备的船舶数量均大大少于民生公司，但各轮吨位多在1000吨左右，民生公司1000吨以上的船舶仅6艘，其余均为500吨左右的小轮。因此，四大公司轮船多行驶申汉，汉宜段；而宜昌以上的川江段和直航泸渝的航线多为民生所经营。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34年，宜渝段货运总量为116657吨，太古、怡和、日清三公司共为26722吨，占总量22.9%，其余89935吨，占总量77.1%，主要是民生和美商捷江公司的载运量。1936年，宜渝段货运总量为194316吨，三公司共为78696吨，其余115620吨，59.5%主要是民生公司的载运量（捷江公司轮船已被民生公司收买），因此，民生公司在竞争中获得了巨大胜利。

四川国医学院成立

1936年，四川国医学院成立。其前身为四川医学院，成立于1929年，1933年交由中央国医馆四川省分馆主办。经筹备于1936年正式成立。初名中央国医馆四川省分馆国医学院，1945年改名为四川国医学院。校址在成都市兴禅寺街。

该院初由赖华峰任院长。1946年，院长由林梅坡担任，副院长孔健民、李斯炽。1948年，院长由曹叔实以省国医馆长兼任。该院于1949年停办，历时13年，累计毕业学生近千人。为解放前四川中医学校开办年代最长、培养人员最多的一所学校，且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存在的国医学院。

四川外贸概况

1936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经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53669327元，其中洋货直接进口货值2369327元，土货进口货值51300000元。出口货物总值37657000元，其中直接出口土货值57236元，转口出口土货值37599764元。全年进出口贸易总值91326327元。

本年土货出口贸易中，山货货值8848020元，桐油货值29016730元，生丝货值1121124元，药材货值9630505元，夏布货值525603元。山货出口货物中，猪鬃获得稳定的增长，本年出口量10996担，货值4466913元。

1937年(民国26年)

重庆炼钢厂生产军火

1937年1月1日，重庆炼钢厂改隶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1月8日，该厂1500千瓦发电机发电，3吨电炉开始炼钢，生产出西南地区第一批电炉钢锭。3月4日，该厂开始铸造飞机炸弹。7月，轧机生产热轧钢材；10月建成3吨侧吹转炉1座。1938年10月炼钢厂开始生产木柄手榴弹、甲雷(地雷)及甲雷引信。1939年1月1日重庆炼钢厂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24厂。预定年产钢锭2300吨、钢品500吨。1939年5月开始，日本飞机连续轰炸该厂。1940年5月29日、6月10日两次轰炸该厂。1941年1～8月5次轰炸该厂。

《大声周刊》出版

1937年1月17日，成都民先队

通过车耀先出面出版《大声周刊》，周海文、胡绩伟任主编。该刊除四川外，还发行到云南、贵州等省，在提高全民觉悟、团结进步青年、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出版至13期时被当局查封。以后更名为《大生》继续出版，出版到5期时又被查封。7月9日，再次更名为《图存周刊》继续出版。

和成银行成立

1937年1月，经财政部批准，和成银行在重庆成立。该行原为和成钱庄，改组成和成银行时，资本增为60万元，后经多次增资，1948年12月，资本为金元券200万元。首任董事长稽述庾，总经理吴晋航。总行设重庆，在上海、昆明、长沙、南京、广州、汉口、柳州、贵阳及省内各大中城市均设有分支行、处，最多时达30余个。该行经营管理有方、业务颇好。

设立省会计管理机构

1937年1月，四川省设会计委员会于财政厅，办理各机关会计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事宜。自1939年1月起，为加强全省会计制度的管理，成立四川省会计处。5月，成立审计部四川审计处，办理川康两省审计事务。

四川银行业控制烟土贸易

1937年1月，四川禁烟总局与川盐、美丰、川康 、重庆、江海、四川商业、四川省7家银行，合组利济财团，资本500万元、禁烟总局认股50万元。利济财团又与禁烟总局合办烟土统收处，资本定为1000万元，总局与财团各占一半，目的在于控制全川烟土贸易。统收总处设重庆，在产烟区的涪陵、丰都、垫江、宣汉设分处。财团和统收处都由吴受彤任经理。统收处收购的烟土，交售给禁烟总局，大部分存放货栈，准备运往省外谋暴利。禁烟总局资金占压，无法拨款给统收处，而财团又只顾开出统收处所需购烟款项的期票以获利，致800多万元期票到期无款兑现，被迫宣布停兑，酿成严重风潮。经省财政厅长宣布对停兑风潮的处理意见后，风潮始平息，当年利济财团获纯利126万元。

行政院通过川黔铁路公司章程

1937年3月9日，行政院会议通过川黔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理事监察人名单。理事长曾养甫兼任公司总经理。四川与西南海港无一可直接连络的铁道。1914年，北京政府曾与中法实业银行缔结钦渝铁路建筑借款，后因欧战爆发而停顿。国民政府为国防运输计，1937年3月9日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川黔铁路特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其业务为先行建筑及经营成都至重庆的铁路干线，自内江至自流井的支线。公司额定资本

为2000万元，分20万股。铁道部及四川省政府为提倡起见，各认4.5万股作为官股，其余11万股由中国建设银公司并行募集作为商股。官股理事有：张公权、曾养甫、邓益光、刘航深、甘绩镛、卢作孚。商股理事有汪楞伯等11人。抗战前铁道部派员已测量川黔铁路线约十分之五六。抗战期间公司停办。

成渝铁路开工修筑

1937年3月21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修筑。四川建筑铁路之议，始于清末创修川汉铁路。但20余年间均未顾及建设。1936年铁道部与四川省政府合作成立川黔铁路公司，开始筹备修筑成渝铁路。其建筑费用预计为法币5450万元。除川黔铁路公司额定资本2000万元，并接受法国"中法工商银行"的3450万元贷款（其中料款2750万元，建筑费700万元），此项借款以成渝铁路营业收入及铁道部缴存的第三期铁路建设公债1000万元作为保证，分15年偿清。成渝铁路原订两年半建成。1937年3月21日开始动工。后因抗战爆发，订购运送材料困难而中断。抗战前夕仅修筑了重庆至内江之间的路基工程、桥梁及隧道工程。

省府发行建设公债

1937年3月22日，省府经中央批准发行四川建设公债4500万元。按计划分两批发行：第一批3000万元，用于铁路850万元，公路450万元，生产建设700万元，弥补预算1000万元；第二批1500万元，用于公路400万元，生产建设600万元，弥补预算500万元。

四川兴业银公司成立

1937年3月，四川兴业银公司在重庆成立。该公司为重庆金融界为投资川省实业而联合组织的。资本500万元，其中四川省银行等10家入股355.5万元，钱庄16家入股44.5万元，私人入股100万元。刘航琛任董事长，周见三任总经理。1937年11月，改名为华西商业银行。1949年秋季停业。

西康省银行成立

1937年4月，西康建省委员会令筹建西康省银行，额定资本50万元，8月1日在康定正式开业。李先春任董事长，程仲梁任总经理。总行设康定，并在雅安、西昌、成都、重庆、富林、甘孜、理化、天全、会理、荥经、巴安等地设分行和办事处。1939年8月，经财政部核准发行藏币券200万元，每元合法币0.448元，作为调换藏洋之用。

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访华

1937年5月至1941年4月间，

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先后3次来华，访问四川。

1937年5月28日，世界教育会长、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夫妇及女儿来华观察教育，由武汉飞抵成都，6月1日参观省会各学校，应邀在华大、川大演讲，2日应省教育厅邀请，在省党部对省会中等学校教职员演讲。3日赴灌县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5日，由省建设厅长卢作孚陪同飞渝，6月10日乘船离渝。

1940年4月16日，孟禄再次访华，由港飞抵重庆。18日，中美文化协会宴请孟氏及出席本届太平洋学会的中国代表。美驻华大使詹森、思政府经济顾问杨格爵士、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等百余名来宾出席作陪。在渝期间，孟禄会见了蒋介石、孙科、孔祥熙等国府要员。4月22日离渝飞港。

1941年4月22日，孟禄第三次访华，由港飞抵重庆。当天，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嘉陵宾馆设宴欢迎。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37年5月8日，四川官商合办的大型工商企业——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大华生丝贸易公司”，1933年1月12日，为摆脱四川丝业面临的深刻危机，由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主持，联合金融界、丝业界人士，在重庆设立“川丝整理委员会”。同年2月，该会联合重庆的同孚、善顺、大江、大有、丽华丝厂，乐山华新丝厂，三台裨农丝厂，南充德合、同德、六合丝厂，江津几江丝厂共11家丝厂成立“大华生丝贸易公司”，共有丝车4038部。“大华”经营失败，1935年5月宣告结束，所属11厂的厂基、厂房、机器设备抵债交川丝整理委员会接管。

国民政府为进一步发展蚕丝生产，全面控制四川蚕丝事业，1937年4月底5月初，由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出面，与丝商代表温少鹤、李奎安、黄勉旃达成官商合办“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协议，5月8日，该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由何北衡兼任董事长，刘航琛、吴晋航、李奎安、黄勉旃为常务董事，奚致和、熊子昌、童斗皋、杨赞卿、陈光玉、汤壶峤为董事，陈丽生、侯庆五、李敬之、孙述禹、温少鹤为监察（何北衡、刘航琛、吴晋航为官方代表）。范崇实任总经理，胡为盖为协理，陈光玉、熊子昌任襄理。公司除经营“大华”11家丝厂外，还统理全川蚕种、蚕茧收烘和缫丝的生产、经营，继后又扩大到织绸、绢纺。其分、支公司、蚕种场、茧庄、缫丝、织绸、绢纺等工厂分布全川，达100多处。

创办初期，公司资本总额30万元（丝厂厂房设备不包括在内）。1937年生产改良蚕种12.1万余张，1939年增长为64.3万余张；蚕茧收购数量也

由数十万公斤增加到300余万公斤；生丝产量由1700余担上升为6900余担，生丝销售量由1400余担上升为4300余担。资本额由30万元增至1938年的300万元，1940年的400万元。纯收益由4万余元增涨为74万余元。1940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对生丝的统购统销，丝业公司的特权丧失，丝业公司由兴盛逐渐衰落。

全省受重灾，多处人相食

1937年6月1日，《中国农村》报道：四川本年141县受灾。在26个重灾县中，灾民以树皮、草根、观音土（白泥）充饥，通江、巴中、北川等地，有人吃人者。阆中、松潘、北川每公斤人肉价格：死尸1200文，活肉2400文。涪陵、苍溪、通江、南江一带，每天每县死亡五六百人。成渝路上，每天死亡五六十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承认，忠县已埋饥民尸体1.8万多具。

民国26年度四川国省联合预算

1937年6月7日，四川国省联合预算经蒋介石核定后正式公布。1月10日，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谈四川国税、省税划分办法：自今年起，盐税、统矿税、印花烟酒税由中央征收；田赋、契杂税、屠宰税、营业税、房捐等由省征收。军费由中央发放，政费由省库支给。四川省民国26年度（1937.7～1938.6）国省预算四川岁入岁出各为8630万元。岁入内计国税2630万元，其中①盐税1670万元；②统矿税660万元；③）印花税烟酒税300万元。省税6000万元，其中①田赋1950万元；②禁烟收入2400万元；③杂契税550万元；④屠宰税300万元；⑤地方税300万元；⑥营业税400万元；⑦房捐100万元。岁出为军务费4100万元，行政费1600万元，债务费2820.85万元，预备费109.15万元。后因抗战军兴，川军出川抗敌，军费由中央负担，并由中央另订划分国地收支办法，故本年度川省预算实际上已有大变更。

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成立

1937年6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7条，并电令何应钦任该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瓒绪、孙震、李家钰、范绍增、向传义、董宋珩、郭勋模、许绍宗、张邦本、徐源泉、夏斗寅、李蕴珩、周浑元。

卢作孚建立峨眉山林业试验场

1937年6月，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聘请庐山植物园主任、植物学家秦子农，在峨眉山筹建四川林业试验场川南分场。场部设红珠山原蒋介石官邸内（今红珠山宾馆），开辟实验场地于三道河一带。

四川战前兴办工矿企业概况

1937年7月初，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四川共有工矿企业700余家，绝大多数兴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统手工业，如丝织、井盐、制革、印刷、陶瓷等，发展较快，总数达230余家。原有的企业纷纷向机器生产转化，新办的企业从投资，经营管理到生产技术，都具有新式企业特征。棉织、火柴、食品、玻璃、化工、自来水等企业开办数量多达240余家。能源基础工业如五金矿产、煤矿、机械、电力、建筑建材等行业得到引人注目的增长，如五金矿产、机械企业90家，电力企业67家，煤矿16家，建筑建材企业16家，总数达到189家。四川战前工业有三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1)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四川新式工业主要分布在近代对外贸易中心重庆和经济较为发达的成都、自贡、乐山、泸州、南充等城市，战前四川工业已开始从上述地区向水陆交通较为便利的县镇辐射，如火柴企业扩展到渠县、合川、遂宁、合江、广元、涪陵、万县、资中、永川等县。电力工业更具普及之势，扩展到全川数十县。

(2)从企业资本额看，较过去大为增加，一般中小企业资本稳定在数千元，有数万到数十万资本的大企业增加不少。如丝织业，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12家，占企业总数的23%。棉织业中，资本额在5万以上的企业18家，占企业总数的14%。印刷业中，资本额在5万元以上的企业11家，占企业总数22%。

(3)企业生产技术普遍提高，机器的使用更为广泛，使用机器的企业有较大增加。1921年统计：缫丝业10年中蒸汽缫丝数量增加一倍，重庆10家缫丝厂，全部实现机器生产，成都丝织业也争相购置机器，改进甚大。据部分行业统计：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是：火柴业13%，玻璃业46%，缫丝、丝织业36%，印刷业82%，棉织业17%，造纸业18%，面粉加工56%，碾米业21%，五金、机械、翻砂业14%，煤矿业31%。

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举行

1937年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历时4天，7月9日闭幕。出席会议的军政人员有：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副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 、委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孙震、李家钰、范绍增、向传义、董宋珩、郭勋祺、许绍宗、张邦本、徐源泉、夏斗寅、李蕴珩、周浑元。参加会议的还有重庆各机关负责人、行营少校以上官佐、各军师独立团长以上将官共300余人。大会主席何应钦主持会议，刘湘致词。

这次会议的要旨是贯彻落实经蒋

介石批准，6月22日由军政部电达刘湘的“川康整军方案”。方案规定：川康军队以军为单位（或独立师旅），直隶于中央，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压缩军队数量，划一整编，充实质量；由中央统一管理为原则。会议决定，川康军队的整编工作在1个月时间内完成。

同年8月10日，川康各军遵照川康整军会议规定，于10日前整编完成。川康各军整编后编制如下：

川康绥靖公署直辖部队：共计60团，编为3个军，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番号有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一六一师（师长许绍宗）、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十一旅（旅长邓国璋）、十二旅（旅长范南轩）、三旅（旅长田钟毅）、四旅（旅长周绍轩）、五旅（旅长杨亮基）、十六旅（旅长刘树成）、十七旅（旅长刘若弼）。

二十四军共编为2个师，1个独立团，军长刘文辉。四十一军共编为3个师，1个独立团，军长孙震。四十五军共编为3师8旅16团，军长邓锡侯。四十七军辖2师，军长李家钰。

整编前，川康军队共有8个军、辖26个师，9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171个团。

抗日战争爆发，四川省抗日救亡运动组织纷纷成立

1937年7月7日，“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从此，全川抗日救亡运动有了统一的合法的领导机构。原来秘密建立的“重庆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分别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各种活动，各类抗日救亡组织很快发展到全川各地。7～8月，“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重庆“青年职业互助会”、“重庆妇女救国会”先后成立。9月，“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四川青年救国会”和“四川妇女抗敌后援会”于成都成立。9月18日，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成都举行了有5万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大会，大会向政府提出立即武装民众，彻底开放学生运动等四项要求。同时，重庆、温江、绵阳、万县、达县、宜宾、泸州等地，也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群众大会，并发出抗日宣言和告群众书，呼吁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10～11月，“成都文化界抗敌协会”、“重庆文化界救亡协会”相继成立。据统计，在这段期间，全省约有120个市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救亡组织，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人、学生、青年、妇女、文化等各界人民群众，开展宣传、募捐、慰问、战地服务等项支援抗日前线的工作。

苏联援华抗战，空军志愿人员殉难

1937年“7·7”事变后，苏联即开

始提供对华军援。

1937年9月4日，苏联第一批援华军用物资到达中国。至1941年10月28日止，苏联援华军火及物资共20批，总价值为54525.8643万美元。派往中国2000余名空军志愿队员，3365名军事顾问、军事教官、工程人员及专门技术人员，分布于中国各作战指挥机关、战区、生产单位，其中亦有直接参战人员，以空军志愿人员参战最多。1941年4月，苏日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停止对华军援。

1939年5月，日本开始对中国抗战后方实施战略大轰炸计划，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洛阳、长沙、贵阳、昆明等城市及许多中小城镇遭到日本空军野蛮轰炸。6月，受苏联政府派遣，苏联空军志愿大队轰炸大队大队长格坦克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率9架"达莎"(Ⅱ6)远程轰炸机抵达成都太平寺机场，担负培训中国飞行员并直接参战任务。1939年10月14日凌晨，库里申科率领全大队远航出征，执行对武汉外围日军阵地轰炸任务。中午，机队飞临武汉上空投弹，遇日机阻击，库里申科座机射手击落日机一架，旋即本机左发动机被日机击中起火，单机冲出包围沿长江返航。午后2时至四川万县红砂碛江段上空，飞机失去动力，在长江心迫降。万县民众及停泊在万县港的中国海军军舰"同兴号"参加救援，轰炸员及射手获救，库里申科不幸殉难，年仅31岁。11月3日，川江航务管理处水上保安团一大队四中队在万县猫儿沱捞获库里申科遗体。1940年1月，库里申科烈士被正式安葬于万县太白岩下，并为之建墓立碑。抗战时期在四川空战中殉难的苏军烈士还有被安葬在重庆市鹅岭公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上校军官托尔夫和卡特诺夫等人。

四川金融市场银根转紧，国府发行救国公债

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开始。重庆及全川金融市场受到震憾，资金外流，银根转紧，公债跌价，交易所停拍，信用膨胀，利率上升。为限制资金外流。委员长重庆行营命令全川15城市银钱行庄从8月14日起停业6天，八月半比期，行庄间差欠头寸均无法收交，市场利率涨至3分。

同年7月，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并组织"劝募委员会"在民间公开"劝募"。11月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四川分会发布劝募办法大纲，共九章，并劝募办法修正若干条款，以及各种认购办法，对农村、城市人口、机关、学校、团体等各类人员均规定了许多详细的劝募办法。

公债条例规定，战事结束后，第3年起由国库指拨基金，分20年还清，每半年抽签一次。公债票分1万元、1000元、100元、50元、10元、5元、1

元7种。此时国民政府所发行公债已不能指定任何担保品，实则基本不能兑换。

四川鸦片产量和禁烟收入

1937年7月12日，四川省政府电呈禁烟总监部：四川在民国25年度种区，只有涪陵、丰都、垫江、宣汉四县。前据各该县预算收获数量，涪陵约可收20200余担，丰都约可收7200余担，垫江约可收6100余担，宣汉约可收5100余担，合计4县共约收38000余担。因本年走私成风、天旱过久，将来收获预计难达20000担之数。

12月25日，四川禁烟总局发表民国22～25年禁烟收入统计：1933年为7806428元；1934年为10182430元；1935年为5991646元；1936年为6809704元。又1936年四川烟土内销10599担，外销6280担。同年缓禁丰都、开县、宣汉、梁山、开江、大竹、长寿、邻水、垫江、涪陵10县，收获烟土共计17907担。

驻渝日本领事率日侨回国

1937年8月1日，驻渝日本国领事槽谷连二于7月31日下午6时率领全部旅川日本侨民20余人，登宜阳丸轮船启碇赴王家沱，本日晨启航东下返日。

刘湘请缨，川军出川抗战

1937年8月7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奉国民政府电令，飞抵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12日，刘湘在会上发言说：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先攘外才能安内。为支持抗战，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刘湘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赞扬。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官，邓锡侯为副司令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川军出川抗战。

10月15日，军事委员会改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官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后又委任陈诚为副司令长官，邓锡侯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刘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第七战区位于平汉铁路线上，战区司令长官部初设河南许昌，在武汉设办事处。

刘湘很快与川军各部将领达成协议，组成第七战区战斗序列：

司令长官 刘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参谋长 傅常，副参谋长 余中英；

第二十三军军长 潘文华，参谋长 杨百昌，第一四四师师长 郭勋祺，副师长 范子英，参谋长 林华均，第四三〇旅旅长 唐明昭，第八五七团团长 徐元勋，第八五八团团长 唐映华，

第四三一旅旅长 黄伯光，第八五九团团长 张定波，第八六〇团团长 张昌德，第一四七师师长 杨国桢，参谋长 胡志潜，第四三九旅旅长 章安平，第八六一团团长 刘星耀，第八六二团团长 周瑞麟，第四三三旅旅长 石照益，第四六三团团长 吴守全，第四六四团团长 周极甫，第一四八师师长 陈万仞，参谋长 吴念僧，第四三四旅旅长 达凤岗、袁海青、第八六五团团长 黄黼臣，第八六六团团长 薛奉先，第四三五旅旅长 潘佐，第八六七团团长 张益斋，第八六八团团长 余中阵；

第二十一军军长 唐式遵，参谋长 刘熙鉴，第一四五师师长 饶国华，参谋长 曾南飞，第四三六旅旅长 孟浩然，第八六九团团长 戴传薪，第八七〇团团长 刘孑生，第四三七旅旅长 佟毅，第八七一团团长 刘儒斋，第八七二团团长 徐再明，第一四六师师长 刘兆藜，参谋长 张六师，第四三八旅旅长 梁泽民，第八七三团团长 凌谏衔，第八七四团团长 郭英，第四三九旅旅长 廖静安，第八七五团团长 潘寅久，第八七六团团长 杨安国，独立十三旅旅长 田冠五，第六三八团团长 谢崇文，第六三九团团长 唐郇伯，独立十四旅旅长 周绍轩，第六四〇团团长 刘克用，第六四二团团长 王凤麒。

以上是刘湘统率的第七战区嫡系部队。刘湘又将邓锡侯、孙震、李家钰三个军编组为第二十二集团军，形成第七战区第二战斗序列：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邓锡侯，副总司令 孙震，参谋长 朱瑛；

第四十一军军长 孙震（兼），副军长 董宋珩，参谋长 杨俊清，第一二二师师长 王铭章，参谋长 赵渭滨，第三六四旅旅长 王志远，第七二七团团长 张宣武，第七二八团团长 魏书琴，第三六六旅旅长 童澄，第七三一团团长 王文振，第七三二团团长 蹇国珍，第一二三师师长 曾宪栋，参谋长 吴畅，第三六七旅旅长 马泽，第七三三团团长 杨熙，第七三四团团长 李蜀华，第三六九旅旅长 陈宗进，第七三七团团长，胡子严，第七三八团团长 张宾，第一二四师师长 孙震（兼），副师长 税梯青（代行师长），参谋长 邹绍孟，第三〇七旅旅长 吕康，副旅长 杨光明 汪朝廉，第七三九团团长 王麟，第七四〇团团长 吕波臣，第三七〇旅旅长 曾毯元，第七四三团团长 刘公台，第七四四团团长 蒋永臣，副团长 阙焕然；

第四十五军军长 邓锡侯，副军长 马毓智，参谋长 朱瑛，第一二五师师长 陈鼎勋，副师长 王学姜，参谋长 孙贤颂，第三七三旅旅长 卢济清，第七四五团团长 姚超伦，第七四六团团长 谭尚修，第三七五旅旅长 林翼如，第七四九团团长 瞿联丞，第七五〇团团长 张元雅，第一二六师师长 黄隐，副师长 刁文俊，参谋长 潘大迥，第三七

六旅旅长 龚渭清，第七五一团团长 赵荣林，第七五二团团长 彭友朋，第三七八旅旅长 李树华，第七五五团团长 罗纪纲，第七五六团团长 王智先，第一二七师师长 陈离，副师长游广居，参谋长 沙韦青，第三七九旅旅长 陶宗伯，副旅长 肖咸一，第七五七团团长 王文拔，第七五八团团长 程剑霜，第三八一旅旅长 杨宗礼，副旅长 陈泽，第七六一团团长 王徽熙，第七六二团团长 邹迪僧，独立十七旅旅长 杨晒轩，第一团团长 任建勋，第二团团长 陈麟，独立十八旅旅长 谢德堪，第一团团长 周朗清，第二团团长 徐济林；

第四十七军军长 李家钰，副军长 罗泽洲，参谋长 魏粤奎，第一〇四师师长 李青廷，副师长 李注东，参谋长 李伦，第三一〇旅旅长 陈绍棠，第六一九团团长 彭仕复，第六二〇团团长 吴长林，第三一二旅旅长 李克源，第六二三团团长 张光汉，第六二四团团长 熊岗陵，第一七八师师长 李宗舫，副师长 赵培臻，参谋长 张持华，第一〇六一团团长 杨显名，第一〇六二团团长 罗仕英，第一〇六三团团长 孙介卿；

第四十三军军长 郭汝栋，第二十六师师长 刘雨卿。

上述第七战区二十二集团军中，除四十一军一二三师，四十五军独立十七、十八两旅留驻四川外，均开赴前线。川军出川路线，二十一、二十三军由东路川鄂大道出发，向宜昌集中，准备增援平汉铁路前线；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指定由北路川陕大道出发，向西安集中，准备增援晋东北地区。

自 9 月 1 日开始，川军陆续分路开赴抗战前线。

川军参加淞沪抗战

1937 年 8 月 13 日，侵华日军挑起淞沪战争。驻守闸北、江湾路、宝山路一带的八十八师，在川籍师长孙元良指挥下，奋起抗战，阻止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10 月上旬，淞沪战场上日军已增加至 20 余万人，中国军队与日军第三、第九师团在蕴藻浜一带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0 月 11 日，日军又继续猛攻中国军队驻守的大场镇阵地，从贵州飞速赶到上海的川军四十三军二十六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接防大场镇阵地。川军脚穿草鞋，手持川造步枪，顽强地投入战斗。日军使用飞机、大炮集中攻击二十六师阵地，掩护步兵冲锋。川军官兵无大炮还击，主要靠步枪和刺刀与敌人短兵相接，英勇拚搏，屡进屡退，鏖战 7 昼夜，完成了阻击敌寇的任务。第二十六师损失惨重，团长解国基阵亡，营长伤亡 11 人，全师官兵伤亡 70%，两个旅指挥所均被敌机炸弹击中，指挥所官兵绝大部分

殉国，两旅旅长仅以身免。

由于川军二十六师英勇抗战，使侵沪日军付出重大代价。1939年，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二十六师为淞沪战役中战绩优异的五个师之一。

二十军浴血淞沪

9月下旬，由军长杨森率领的川军二十军从黔西大定火速到达嘉定南翔车站，10月9日，全军编入第六军团战斗序列，接受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二十军奉命进入淞沪前沿阵地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军指挥所设在南翔车站。次日陈家行失守，战局危急，杨森当即下令，由副军长夏炯率两团兵力夺回陈家行阵地。此时陈家行已成日军锥形攻击的顶点。夏炯指挥部队奋勇冲锋，与敌展开肉搏战，杨森亲临火线督战，当日收回陈家行。日军凭借优势兵力、火炮，疯狂反扑，川军承受着巨大的牺牲，与敌苦战13个昼夜，守住了阵地。这场战役，二十军士兵死伤70%，下级军官几乎全部殉国。

10月15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与杨森军对峙。杨森令师长杨汉忠率一三四师在大场、蕴藻浜一线与日开战。日军投入九师团1个旅团、近卫师团1个旅团和其它兵力，以场镇、南翔为双轴，猛攻二十军。杨汉忠4个团扼守顿悟寺和石桥阵地，不顾日军陆、海、空军猛烈轰击，在八〇二团团长林相侯的率领下，冲出战壕，与敌白刃相接，反复拚搏。全团1000余官兵英勇杀敌守土，直到援军接防时，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二十军八0四团团长向文彬率部坚守顿悟寺阵地，与日军苦战，力撑危局，化险为夷，完成了阻击任务。向文彬在一日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升少将，这是东部战场绝无仅有的事。

在陈家行阵地上，日军增加兵力猛烈进攻，杨森军一三三师寡不敌众，被迫后撤。第六军团司令长官薛岳令杨森部立即夺回阵地。杨森遂与战区炮兵总部联系，集中重炮百门，于午后1时轰击陈家行阵地上的日军，双方展开炮战，炮战后，杨森趁敌阵地硝烟弥漫，能见度低，急令三九七旅七九四团猛攻陈家行阵地，全团官兵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使日军遗尸累累，仓惶北窜。这场战斗，七九四团虽伤亡甚大，但终于收复了陈家行。

二十军在淞沪抗战中共计伤亡团长20余名，连长200余名，士兵7000余名。因战绩突出，受到蒋介石嘉奖。

1938年11月，杨森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二十军军长由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域升任。

国民政府成立“四联总处”

1937年8月，国民政府以战时金

融措施关系重要为由，命令成立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1939年8月，财政部令四行在香港机构迁重庆办公。同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其主要内容即改组"四联总处"，由一个联合机构，改组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管银行的金融机构；并扩大组织，重选人事，提高职权，使其担负起筹划与推行战时金融、经济政策的任务。四联总处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主席由蒋介石兼任，常务理事为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等。徐堪任秘书长，主持日常业务。理事会每周举行例会一次。下设战时金融、战时经济两个委员会。迄止1942年，"四联总处"在全川设有2个分处，9个支处。1946年4月总处迁南京。自1937年10月到1948年10月，理事会先后举行正式会议372次，临时性会议若干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重大的经济政策、联合贴放事宜和各种章程制度核定等事项。改组后的"四联总处"，实际成为国民政府最高的金融垄断机构。1948年9月底，立法院通过议案："撤销四联总处"。"四联总处"从成立到撤销共11年。

四川乡村电话初步发展

1937年8月11日，四川省府建设厅发表全川乡村电话统计：已架设电话线的县有135个，交换机3550部，线路长53306公里，员工1640人，经费302800余元。

三银行改组川康"平民银行"

1937年9月22日，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实行合并，改组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资本总额定为400万元，总行仍设重庆，原重庆平民银行总经理宁芷村出任新行总经理，于当日开始营业。

重庆平民银行创立于1928年，川康殖业银行创立于1929年，四川商业银行创立于1932年。

四川省抗日进步报刊大量涌现

1937年9月，由四川青年救国会主办、熊复主编的《救亡周刊》创刊。在此前后，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创办、胡绩伟主编的《星芒周报》（后改为《星芒救亡联合周报》）出版；由成都爱国青年学生主办的《火炬》半月刊，由地方势力主办、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主编的《国难三日刊》和《华西日报》，由四川抗敌后援会主办的《妇女呼声》，由沙汀等主办的《抗战星期刊》和《战旗旬刊》，还有由各界抗日进步人士主办的《抗敌周刊》、《统一战线》、《文艺后防》、《金箭》等宣传抗日的刊物纷纷出现。这些进步报刊，大都以鼓吹抗日救亡、提倡民主政治作为主要

内容，对于增强抗日力量的团结，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推动全省抗日群众运动，发展全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川军增援娘子关之战

1937年9月底，日军大举进犯山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注意力放在忻口战场，而忽略了娘子关一线的防务。10月中旬，日军第十师团一举攻占石家庄，进而又派十四师团一〇九师团向娘子关发动猛烈进攻。阎锡山急令刚好抵达太原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四十一军一二二师转向晋东娘子关西南地区，截阻西进的日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命三六四旅于10月24日由岩会镇出发，迎战日军。25日在娘子关西南马山村与日军一〇九师团发生遭遇战。战斗刚开始，三六四旅两挺机枪即被打坏一挺。日军以优势火力作掩护，向川军发起冲锋。三六四旅官兵只好抽出背上的大刀与日寇肉搏，反复冲杀几次，伤亡过半，被迫后撤。

10月22日，第一二二师三六六旅旅长童澄奉命率部奔赴娘子关附近东西回镇迎战西进日军。该旅七三二团于25日深夜接近西回镇时，即被日军包围，血战至拂晓，一营官兵以身殉国，另外两营被迫后撤。后续部队七三一团于26日在西回镇以西柏木井沟与日军相遇，日军用大炮、机枪作掩护，冲入七三一团阵地，该团官兵手中步枪无刺刀，只好用枪托与敌肉搏，血战一整天，夜晚被迫后撤，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

大批影剧人入川，四川戏剧舞台面目一新

1937年10月至1939年1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等地电影界、戏剧界演艺人士纷纷入川，使四川戏剧舞台出现多姿多彩，面目一新的局面。

1937年10月16日，由川人夏云瑚护送白杨、陈白尘等组成的“上海影人剧团”乘民生轮抵达重庆。10月27日起，该剧团在国泰大戏院公演《沈阳之夜》、《芦沟桥之战》。

1938年1月2日，由熊佛西带领的“农村抗战剧团”乘民裕轮抵达重庆。9月西上成都，19日起在蓉公演《塞上风云》。与“农村抗战剧团”同船到重庆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由吴雪主持）于1月10日在重庆公演《塞上风云》。

1938年1月28日，以赵丹、魏鹤龄等为首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乘民生轮抵达重庆，2月18日起在重庆公演《民族万岁》。

1938年2月，由余上沅率领的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重庆上清寺，2月28日上课，4月起在重庆公演

《飞将军》、《爱与仇》、《魔窟》等戏剧。

1938年9月，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的“怒潮剧社”(后更名“中国万岁剧团”)随厂迁到重庆，并于同月16日起在国泰大戏院首演《为自由和平而战》、《血祭九·一八》等剧。

1938年秋，中央电影摄制场所属“中电剧团”随厂迁重庆，1939年3月30日起公演《战斗》。

1939年1月，上海“孩子剧团”经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6省辗转入川、抵达重庆。同月25日，在一园影院首演《不愿做奴隶的孩子》。

东部工业大规模内迁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战局恶化，作为大后方的四川迅即为沿海省分大批工厂内迁创造条件。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决定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后改称工矿调整处)，民间企业家也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后改为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沿海沿江工矿企业内迁工作。东部工业大规模内迁，构成我国工业布局的一个重大的变革。

1937年8月12日到11月12日在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和工矿调整处共同努力下，共迁出民营工厂148家，工人2100多名，机器物资12400吨(未迁出上海的工厂有2270家)。内迁的工厂第一步先迁到武汉，迄止1938年2月迁到武汉的工厂实有121家。第2步再迁四川，据工矿调整处统计：到1940年6月沙市、宜昌失守时，沿海沿江迁入四川的民营工厂共计245家，物资总约9万余吨。这批迁川厂矿企业分属的行业系统是：冶金工业1家；机械工业103家；电气工业18家；化学工业40家；纺织工业23家；食品工业10家；教育用品工业32家；其它工业14家。迁川厂矿主要来自上海(104家)、汉口(90家)、南京(10家)，其余来自南北各省。迁移地址90%以上均在川东重庆、巴县一带，少数在成都和川西各县。

自抗战爆发，沿海沿江的民营厂矿渝鑫钢铁厂、顺昌机器厂、大公铁工厂、天原电化厂、龙章造纸厂等40余家率先迁移重庆。于1938年4月18日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选举颜耀秋、庞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马雄冠、林美衍、余名钰、吴蕴初、李奎安、胡西园、庄茂如等为委员。

1939年1月20日，汉口申新第四棉纺厂内迁重庆南岸开工生产，是四川的第一家现代化动力机器棉纺织厂。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沙市、郑州的棉纺厂先后内迁四川，与申新四厂同时内迁的还有郑州豫丰和记纱厂、武昌裕华纱厂、汉口军政部临时军用纺纱厂、湖北沙市纱厂、西安大华纱厂等，共内迁纱锭14.2万枚，布机870台。内迁厂除大华纱厂在广元建厂外，其余都在重庆、长寿。此外军政部第三

被服厂武昌制呢分厂于抗战初期也迁来重庆，有毛纱锭2220枚。

四川省政府制定《三年建设纲要》和《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

1937年5月，四川省政府制订并颁布“四川建设三年纲要”。“纲要”共分十大部分：(1)辅助中央完成国防建设。本项又分①整理军队协助垦荒(使国防建设与生产建设有调节互利的效用)；②实施社会军训，培养国防基础；③设备消极防空，普及防空知识。(2)整饬警卫、巩固社会秩序。(3)禁毒防病，增进人民健康。(4)整理财政，改革征收制度。(5)整理地政，增加土地效用。(6)改进生产，增加社会富力。(7)发展交通，辅助生产建设。(8)改进金融，发展各项产业。(9)改革教育，适应建设需要。(10)革新县政，改进人民生活。后因抗战爆发，上述各项已不足适应需要，乃重新拟订建设大纲。

同年9月，省政府颁布《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其要点为：(1)尽量发展五大资源：①动力资源：煤、石油、水力；②金属资源：铁、铜、锑、金、铅与锌；③化学资源：硫、硝、盐；④粮食资源：米、麦、杂粮。⑤服装资源：棉花，羊毛与皮革。(2)创立或扩充八大工业：①钢铁部门；②炼铜部门③兵工部门；④机器部门；⑤基本化学部门；⑥水泥部门；⑦纺织部门；⑧伐木部门，附设造纸厂。(3)次第修筑三大铁道：①修筑成昆铁路；②修筑成宝铁路；③完成成渝铁路。此计划后被束诸高阁，并未实施。

四川省贸易局成立并颁布章程

1937年9月24日，四川省贸易局在重庆成立并颁布章程。叶元龙任局长，何北衡、吴晋航任副局长。该局由重庆行营与四川省政府合组而成，以统制非常时期全川对外贸易并扶持其发展为目的。抗战爆发，四川感觉最严重的问题是进出口货物的路线被截断，为谋补救，拟开辟由汉口经粤汉铁路而至香港，由昆明经滇越铁路而至海防的两条对外贸易交通线。贸易局的任务是办理有关进出口货物的报关、运输、保险等手续。除总局设重庆外，另外在汉口、长沙、香港、昆明等处各设分局。并陆续从国外购进大批卡车。

田赋加码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地方供应浩繁，农民负担的田赋及其附加不断增加。四川省府规定：田赋加征正附税(省的正赋及保安、国难费的加征；县的保甲经费及地方附加等的增派)。为新开税源，开始举办土地陈报，增收溢赋，改订田赋新科则，厘定田赋新税率。1938年，强化了征收机构和视察制度。7月4日，省府通令：自本年度起，田赋一年两征，仍加征九成国难

费，分上下两季征收，每季附征四成半。1940年2月4日，四川绅耆方旭、尹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19人联电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说：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使创痛已深之川人得以稍苏喘息。7日，四川各县旅省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又分电蒋介石、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及省府各单位，申诉川民不堪再增负担，呼吁核减省府预算。

四川省政府订定《四川省抗战时期中心工作提要》

1937年10月2日，四川省政府订定《四川省抗战时期中心工作提要》。内容为：训练民众，补充兵源，储备粮食，厉行禁烟、禁毒，增筹战时财政，训练战时需要的技术人员，尽量开发资源，建设各种工业，完成各种交通，振兴水利，实施战时教育，维持地方治安等12项。

四川首次使用旋转钻机钻获天然气

1937年11月6日，四川油矿探勘处用德制钻机开钻巴县石油沟构造的巴1井，至1939年11月25日钻至井深1402.20米三叠系上部石灰岩地层时获得天然气，最大关井压力为106大气压（约10.7兆帕），测得气井无阻流量为1.4万立方米/日，证实盆地西部（自流井）和东部（石油沟）的三叠系都产天然气。巴1井是国内首次使用旋转钻机钻获的油气井。在钻井过程中，有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油气勘探技术：①在井深386～1402米间先后14次共取出岩芯43.6米，经化验分析，取得3个不同层位的岩石孔隙度，为国内用近代技术钻取岩芯之始。②在井深1200米，关井井口压力100大气压（约10.1兆帕）时使用自制悬挂式井壁封隔器进行中途裸眼测试，两次均获成功，测得气体流量，是国内最早使用中途测试技术。③翁文波与助手用改制仪器进行电测井，测得自然电位曲线及视电阻率曲线。判断可能产出油气的层位7个，是国内首次使用电测井及解释技术。巴1井获气后即开采使用。1941年2月组建的天然气制品厂，曾用耐压钢瓶灌充天然气代替汽油，作为汽车和长江轮渡的动力燃料使用。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自本日起由南京移驻重庆。宣言说："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四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

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余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同日，四川省政府电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重庆，重庆军政当局及各界群众10余万人齐集江岸欢迎。

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成立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5人分别从延安启程回川，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组织。他们在广元会合开会决定：邹风平、廖志高赴成都筹建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于江震等赴南充筹建中共川北工作委员会（简称川北工委），属省工委领导。12月，邹风平、廖志高到达成都后设立省工委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省工委书记由邹风平担任。省工委成立后，立即以成都、重庆为重点，着手清理党员和恢复党的组织。1938年3月，中共成都市委建立。同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5月，邹风平到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回成都后传达长江局的指示：要求四川3个月内在原党员人数基础上发展10倍；月底，省工委召开全省工作会议，决定6～8月以大力发展党员和扩大组织为中心工作，完成发展党员的任务。接着，陆续接上了一批分散在各地党员的组织关系，吸收了一大批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入党，党的队伍迅速扩大。7月，宜宾、泸州中心县委建立，梁山特支成立。10月，自贡中心市委成立；12月，重庆市委建立。到1939年上半年，全省发展党员约7000人，一大批党的基层组织相继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川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川军转战太湖，饶国华殉国广德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自浙江金山卫登陆后，浙江全境告急，南京告急，刘湘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芜湖，并令唐式遵率二十一军、潘文华率二十三军经句容县分道向溧阳沿太湖西岸宜兴、长兴、泗安、吴兴一线构成第二道防线，以阻遏内窜之敌。提任前卫的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于11月23日率全师到达长兴县，刘兆藜率一四六师扼守李家巷、新塘间由吴兴北上之路，饶国华率一四五师固守广德东面的界牌、泗安间道路，一四八师及十三、十四独立旅在林城、红 星桥至长兴间协同上述各师作战。一四七师作为总预备队，策应各部队作战。

11月24日，日机轰炸长兴。25日，日机3架向一四四、一四六师阵地投掷炸弹。26日，日军进攻夹浦，川军

奋起抵抗。日军步兵800余人在装甲车掩护下猛攻，川军采取近距离反击，摧毁日军装甲车3辆，击溃了日军步兵攻势。后2日，日军集中陆空兵力攻占太湖内东西洞庭山后，向一四四师驻地夹浦一带发动猛攻。师长郭勋祺亲自到前沿督战，被日军枪弹击中负伤后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使官兵极为振奋，坚守阵地。经过几天激战，一四四师伤亡官兵二三百人，直至弹尽粮绝，撤往广德。

11月22日，刘湘令潘文华率一四五、一四七师等部队在广德县布防，并令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在广德城后10里的誓节渡设立司令部。同时，又调该军独立第十三旅和一四六师前往泗安镇，换下中央军吴奇伟部。

11月23日，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为掩护友军安全，令先头部队四三六旅八六九团攻占泗安阵地。该团与日军前锋遭遇，苦战3昼夜，因兵力单薄，伤亡惨重。26日，日军出动坦克向泗安进攻，饶师武器陈旧，从未与坦克作战，因此纷纷后撤。饶国华向驻吉安一四六师求援，该师未及时支援。日军依仗陆空优势，采用中央突破战术，沿广德大道突破了林城守军的防线，并在空军掩护下，突破了一四五师守卫的泗安机场阵地。守御机场的该师八七〇团在机场边沿与日军恶战整日。师长饶国华深知情势险恶，当夜即通电全师官兵，誓死守卫国土，为川军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而献身。次日，八七〇团团长刘孑生率全团血战，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刘孑生身负重伤，全团官兵伤亡3/4以上。机场陷落前，饶国华命令将航空器材及燃料油桶全部焚毁，然后全师后撤，泗安失陷。日军主力又沿吴嘉公路直趋广德，饶师困守广德，与日军苦战。

在一四六师四三六旅旅长廖静安支持下，八七五团团长潘寅久于26日从吉安向泗安日军进袭，用手榴弹和马刀与日军拚搏，血战之后，收复泗安镇。进占广德的日军，由于饶国华师的顽强抵抗，加之泗安日军惨败，纷纷退出广德。此时，第一四六师和独立十四旅赶到，对日军实行反攻，各军直指界牌一线。日军集中兵力，调集坦克向川军发动攻势，川军官兵不顾日军枪弹密集，跃上坦克，从了望孔投进手榴弹，炸毁了日军两辆坦克。川军在坦克爆炸声中，冲出战壕，与敌肉搏，大败日军。此战歼灭日军数千，击毙装甲车队长1名，缴获装甲车10余辆，载重汽车数辆，卡车20余辆，其它军用物资无算。同时，刘兆藜命令十四旅六四二团便衣队以快速追击方式，直捣日军占据的东湖亭镇，缴获大量战利品并俘获日军30名，收复东湖亭镇。

11月30日，饶国华奉命收复广德，他亲率一营官兵反攻，冲入日军阵地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围困在十字铺据点。日军多方劝降，饶国华威

武不屈，紧握雪耻刀再次向官兵宣誓，以死报国，不成功，便成仁，决不向敌人屈膝投降。当夜，饶国华在弹尽粮绝之后，写下绝命书，自戕殉国。国民政府为表彰他的忠烈，特追赠为陆军上将。

12月12日，重庆市及江北、巴县各界群众在夫子庙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1万余人。

各国驻华使馆迁渝办公

1937年12月上旬，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到重庆。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多数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38年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先迁渝。6～8月，美、法、英、德、意、比等国驻华大使馆陆继迁至重庆。至1945年初，先后共有22个国家在重庆设立驻华外交机构。1941年7月，德、意承认汪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意断交，德、意在华（重庆）外交机构关闭。1945年底至1946年初，各国驻华外交机构陆续迁返南京。

省务会议通过1938年度地方经费预算

1937年12月13日四川省省务会议通过“1938年度地方经费预算纲要”，通令全川各县遵照施行。纲要的要点为：①各县照1937年度预算筹集1938年度地方经费。②以全县经费8成，作1938年度地方经费开支。③所余2成，连同1937、1936年度预备费所节余之费，作为战时新增事业之经费。④关于地方机关，尽量在8成开支内裁员减薪，并紧缩办公经费。⑤财务方面的县经收处、县金库，教育方面的地方文献委员会、修志局等，及民、建、保方面的各项骈枝机关，均决定裁撤，俾集中财力，使不致超过8成经费开支范围。以上各项办法，均于1938年1月1日起，全川各县一致遵照施行。

抗战时期四川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1937～1945年，四川成为学者、作家、艺术家云集的人文胜地，研究和创作成果极为丰硕。

一、思想文化成就

史学方面。1941年，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2年，邓初民出版了《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4年，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郭沫若的学术论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部分论文均是1940年10月到1945年4月他主持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期完成的。1944年3月，郭沫若为教育抗日军民，不骄不馁，总结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在《新华日报》连载后，社会反响很大，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恐。不久，中国共产党将此文列为整风文件之一，供全

党学习。

在哲学方面，成就最大的要数杜国庠，他在抗战期间先后完成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尤其对墨子、公孙龙有独到的见解。同时，他还和侯外庐、纪玄冰、赵纪彬合著了《中国思想通史》。杜国庠治学谨严，持论平实，为学术界所尊重。此外，冯友兰还发表了《新原人》。

二、文学艺术成就

抗战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繁荣之旺，成就达前所未有，就研究和创作两方面的成果而言，话剧最为壮观。

文学研究方面，郭汪若先后出版了《沸羹集》、《天玄地黄》两部论集，结合历史和现实，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王昆仑在这期间出版了《〈红楼梦〉人物论》，这是"红学"中别具一格的重要论著。在文艺理论方面，蔡仪完成了《新美学》，有很大影响。文艺界结合《论主观》一文展开了对民族形成的讨论。1941 年 11 月。为了对抗"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的压迫 ，周恩来同志通过南方局联合文工会和重庆文艺工作者，举行了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的盛大文化活动，对研究郭沫若生平和创作，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有重要意义。

在文艺创作方面，以郭沫若的历史剧成就最为突出。他先后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五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话剧剧本。茅盾（沈雁冰）创作了小说《腐蚀》，话剧本《清明前后》，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和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诗集《剑北集》等，还创作了剧本《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面子问题》。田汉创作了话剧剧本《秋声赋》，戏曲剧本《岳飞》、《会缘桥》、《双忠记》和大量诗作。夏衍的创作活跃，其中川话剧《第七号风球》最为成功。阳翰笙自 1938 年到四川后，创作了大型话剧剧本《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曹禺的《蜕变》，以及他和宋之合作的《全民总动员》，都是影响很大的话剧剧本。吴祖光创作了历史剧《正气歌》和话剧剧本《风雪夜归人》。洪深创作了《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话剧剧本。陈白光创作了《群魔乱舞》、《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话剧剧本。于伶创作了《夜光杯》、《花溅泪》、《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等话剧剧本。宋之的创作了《雾重庆》、《祖国在呼唤》等剧本。石凌鹤创作了《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等剧本。张骏祥创作了《万世师表》，沈浮创作了《重庆二十四小时》、《金玉满堂》，马彦祥创作了《残雪》、《国贼汪精卫》，杨村彬创作了《秦良玉》、《清宫外史》等历史剧本，寇嘉弼创作了《风陵渡》、《还乡记》（原名《燎原》）等剧作。徐昌霖创作了《重庆屋檐

下》、《密支那风云》、《黄金潮》等剧本，周彦创作了《秣稜风云》（即《桃花扇》）、《龙王庙》等话剧。

川湘、川滇、川鄂公路相继通车

1937～1941年，继川黔、川陕公路建成之后，川湘、川滇、川鄂公路全线相继通车。川湘公路起自川黔公路的綦江，经南川、白马、彭水、黔江、酉阳、秀山而至川湘交界的茶洞镇。全长698公里。所经各处大部为群山沟壑，工程艰巨。1935年11月，綦江段首先开工，1936年1月，全线动工，经沿途征调民工，并用款500余万元，于1936年10月完成。1937年1月，川湘公路全线通车，计至重庆到长沙约1300余公里。

川滇公路分为东路、中路、西路三线。东路由成渝路上的隆昌南下，经泸县、叙永，直趋贵州的毕节，再转西南经威宁入云南，过宣威、垴益（接滇黔路）而通昆 明。1939年完成通车。由隆昌至昆明，全程975公里。川滇中路由成都起而止于昆明，中经新津、彭山、眉山、夹江、乐山、犍为至宜宾。由宜宾渡江，沿横江河谷出云南的盐津，南走经大关、昭通、鲁甸、东川、寻甸、嵩明而达昆明。成都乐山间162公里，完成较早。宜宾 至昆明亦于抗战期中完成通车，约长800公里。川滇西路，系由乐山至西昌经会理至云南的大姚、祥云，以接滇缅公路，共1113公里。乐山至西昌 一段525公里，1941年完成。西昌至祥云一段548公里，也于同年通车。

1936年2月续建川鄂公路。路线起自成渝路上简阳，止于利川，全长644公里。当时由简阳至渠县已建成。万县至分水岭，在防区制时期已修通。新建的只是由渠县至万县分水岭段，长187公里，行营限工期3个月，直到1937年4月才打通。鉴于万县至利川，工程艰巨，改修川湘路上黔江至石门公路，以通湖北。

方文培领先对峨眉山植物进行系统研究

1937年，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方文培，率领师生40余人，在战前考察峨眉山植物资源，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基础上，第二次对峨眉山植物进行实地考察和系统研究。经4年努力，于1944～1946年，先后编印《峨眉山植物图志》2卷8册，著录种子植物200多种。中英文对照，图文并茂。这部200余万字、200余幅插图的科学巨著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英国皇家学会为表彰他的学术贡献，授与他银质奖章。

全川各县普遍设立测候所

1937年四川省建设厅在各县普遍建立了测候所。

1935年川政统一后，卢作孚任省

建设厅长时，以气象与农林、水利、航空、军事、工程等均有密切关系，加以当时四川连年发生旱涝等自然灾害，乃筹划普遍设立全省各级测候所。1936年5月，省建设厅举办各县建设科技士训练班，加授气象观测课程，与此同时，省政府令各县除昭觉、宁南、靖化（今金川）等县情况特殊外一律设四等测候所，属各县政府建制，业务技术由建设厅指导。9月，省建设厅在乐山、内江、遂宁3处筹建三等测候所，直属省建设厅，于11月1日建成正式开始观测。此外，由于技术人员及气象仪器设备缺乏，同年底只有剑阁、彰明、新繁、温江等26个县设立四等测候所。至1937年底全省共建立测候所147处。此后，除少数县测候所的气象观测记录有中断外，保持了10年以上的气象观测记录的所占总数的80%以上。

抗日捐献热潮

1937年冬至1938年1月，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各抗日救亡团体和《新华日报》发起的劝募寒衣和春节劳军捐献活动。重庆市民捐献寒衣款20余万元，制作棉背心千万余件；重庆被服厂职工为前线将士制作棉衣30万件；重庆妇女抗敌协会还发动家庭妇女裁制棉衣，慰劳出征将士。成都战地服务团办事处，将成都市民捐献的皮、棉背心25000件运往前方。南充蚕丝改良场职工，集资缝制丝棉背心1000件赠送平型关大捷中荣立战功的八路军。

四川开办的主要金融机构

1937年统计：1932～1937年，四川金融业畸形发展。军阀的长江，川西北等银行陆续设立，重庆及川东在刘湘独霸下局势较稳，平民、川康、川盐、市民、商业等家银行相继开业。中央、中国农民两行入川，交通银行复业，在国家银行向全川大中城市扩展机构的同时，四川地方银行改组为四川省银行，增设分支行处。四川省合作金库也宣告成立，并发展县库与信用合作社。刘文辉的济康银行、邓锡侯的新川银行等，也在此时新设或改组。商业银行中，省外有金城，江海两家来渝设行；省内有四川建设等行开业；川康、平民、商业三行合并。荣昌等数十县兴起或筹设中的农村银行，也如雨后春笋，但动机不一，或为救济农村，或为谋求利益，甚至是为筹办军米而设行发钞。这些农村银行以及旧式金融机构中的典当业，稍后都被新起的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合作金库及各地信用合作社取而代之。据《四川省统计提要》公布：四川省内各类银行的各级机构共105家，其中，国家银行32家、省银行18家、商业银行55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战略大后方，中、中、交、农四家国家银行的总行及战区各重要金融

机构相继迁渝，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川各地。中、中、交、农自1938年迁川后，共在四川设立分支行116处。1938～1941年，由省外移设重庆之政府银行共14家，共增设总分支机构33行处，省外移渝之商业银行共15家，其增设之总分支机构，为28行处。据不完全统计，此间迁川的银行有：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江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

金融物价概况

1937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发行总额为16.39亿元，发行指数为117%。同期，重庆物价批发指数为98%，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100.72%。

四川外贸概况

1937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经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49353490元，其中洋货直接进口货值3233490元，土货进口货值46120000元。出口货物总值39434357元，其中直接出口货值204357元，转口出口土货值39230000元，全年进出口货物总值88787847元。

本年洋货直接进口货值高于去年，土货进口值则低于去年。土货直接出口货值比去年高出3倍以上，转口出口土货值略有增加。

汽油和煤油仍是进口货物的大宗，汽油进口量从上年329万公升增加到483万公升，煤油从上年410万公升增加到896万公升。这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燃料油需求猛增的结果。

本年以邮包外运的出口主要土货是药材、白木耳和麝香。桐油仍为出口大宗，出口72万担猪鬃仅出口8454担。药材也因南洋市场的丧失而导致出口减少，货值2500000元。尽管甘蔗丰收，食糖出口量却减少11718担。

自南京沦陷，长江航路受阻后，新辟4条通道供国际贸易使用：一是由重庆沿长江至汉口，再经粤汉、广九铁路到香港；二是由重庆经川黔公路到贵阳和昆明，再从滇越铁路出境；三是自重庆经叙府（宜宾）和昭通到昆明，仍由滇越铁路出境，或进一步从腾越出缅甸；四是自重庆直飞香港，这条路速度快，但花费大，通常用以运输少量白猪鬃和名贵药材。

四川人口及耕地概况

1937年，据《四川各市县26年度保甲户口统计表》（《四川省概况》，1939年出版）测算，四川全省150县1区共计9378607户，52085011人。又据《四川建设统计提要》统计，全省耕地面积108174564亩。

1938年(民国27年)

唐式遵继任23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免去刘湘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职,任命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唐式遵为总司令。

刘湘病逝汉口

1938年1月20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本日下午在汉口万国医院病逝,终年48岁。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刘湘。25日刘湘治丧委员会为刘湘举行追悼会,蒋介石参加了追悼会。26日,刘湘灵柩从汉口运回四川。2月4日运抵重庆,5~8日由重庆各界公祭,9日移送成都。2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为刘湘举行国葬。因修建南郊陵园费时较久,直至1939年9月19日,才在成都举行国葬,灵柩安葬于成都南郊陵园(今南郊公园)。

四川政局风潮

1938年1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一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委员;二任命张群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时决定撤销川康绥靖公署。

张群主川消息传到四川,立即引起四川军政方面强烈反对。省府保安处长王陵基(刘湘系统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的实际领导人)反应尤其强烈,召开武德学友会会议,并邀省府秘书长代行主席职权的邓汉祥出席,共谋对策。邓在会上公开反对蒋介石对川局的决定,主张联络邓锡侯,刘文辉共同抵制张群主川。王陵基等鼓动刘湘所部留川将领彭焕章联合17名旅长致电蒋介石请求收回成命。四川抗敌后援会也向全国发表通电,拒张主川。王还组织人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示威游行,反对张群主川。

国民政府为平息四川政局风潮,安抚刘湘部属,于3月2日发表邓锡侯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4月13日,发表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3月中旬又发表潘文华、王缵绪分别任二十八、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3月下旬发表王陵基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又任命贺国光为重庆行营代理主任。刘文辉任副主任,傅常为参谋长。另外还把后方刘湘系的师长郭勋祺、郭昌明、许绍宗升任军长 。

4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张群因担任中央重要职务(行政院副院长),一时不克赴川就职,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百日政

潮至此暂告平息。

《大公报》在重庆出版

1938 年 1 月，《大公报》在重庆出版发行。该报 1902 年 6 月 17 日在天津创刊，1938 年 1 月由武汉迁到重庆出版，并成为各地方版的总社。重庆版主要由张季鸾负责。1941 年 9 月 6 日张季鸾病逝，由胡政之对渝、桂、港三馆总其成，重庆版具体由曹谷冰负责经营管理，王芸生任总编辑。在抗战期间，该报坚持抗日爱国立场，同时也发表过拥蒋反共的评论。

《新民报》在重庆复刊

1938 年 1 月，《新民报》在重庆出版。1929 年 9 月 9 日，该报在南京创刊，1937 年 11 月 28 日停刊，1938 年 1 月 15 日在重庆复刊，日出四开报纸一张。萧同兹任董事长，陈铭德任总经理，邓季惺、张恨水先后任经理，罗承烈任总主笔，赵纯继任总编辑。

四川省政府制定督垦土地大纲

1938 年 2 月 24 日为督促民众承垦荒地，从事种植，增加生产，以作长期抗战的充分准备，四川省政府制定并颁布《四川省督垦荒地大纲》7 条。《大纲》规定：四川推行垦殖事业备领的荒地，以下列区域内的官荒为范围：①通江、南江、巴中、城口、万源。②北川、平武。③松潘、理县、茂县、汶川及靖化。④天全、芦山、宝兴、金汤。⑤昭觉、冕宁、宁南、盐源、盐边、会理、越西。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⑦南川金佛山。⑧酉阳、秀山、黔江、彭水。⑨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泸县、隆昌等县间的东西山。⑩合川、邻水、武胜、广安、岳池等县间的华蓥山。⑪昭化、广元、剑阁。

王铭章战死滕县

1938 年 3 月 17 日，第四十一军代军长兼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坚守滕县孤城，抵御日军猛烈攻势三昼夜，不幸自戕身亡。

年初，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划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后因邓锡侯奉命回川担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由孙震继任总司令。孙震兼任的第四十一军军长职务由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代理，邓锡侯兼任的四十五军军长由副军长兼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继任。3 月初，川军在滕县前线由孙震、王铭章指挥（陈鼎勋因病在徐州）。当时，邹县日军不断增加，台儿庄地处徐州要津，成为日军攻占徐州的必争之地。而滕县地处京浦路徐州门户，日军夺取滕县成为台儿庄大战的序幕。

3 月初，据第二十二集团军侦察人员所得情报，占据济南的日军十二军团长西尾寿造的部队不久将向二十二集团军发动攻势。总司令孙震于 3 月 10 日从临城到滕县及其北部界河

视察，并同四十一军王铭章、税梯青（师长）、吕康、王志远（旅长）、四十五军陈离（师长）、陶宗伯、杨宗礼（旅长）等研究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大家一致认为，固守徐州门户滕县，是阻止日军南下的要图。作战部署调整为：由集团军总预备队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师部和三六四旅（旅长王志远）旅部、并令一二四师（师长税梯青）师部由利国驿进驻滕县，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师部驻扎滕县城内。王铭章为第二线指挥官。并任二十二集团军前方总指挥。陈离为第一线指挥官，指挥本师及一二四师一个旅在滕县北界河、香城、大山一线防御。王铭章令七二八团团长张宣武率部进驻滕县以北15里的北沙河，布置第二道防线，令七三一团长王文振率部进驻滕县东北的平邑、城前，掩护第四十五军第一线阵地侧背，以防日军侧击。

3月14日凌晨，日军步、骑兵万余人，大炮20余门，坦克20余辆、飞机30架，向两下店、界河一线川军发动全面攻势，重点进攻下看埠、白山、黄山等处前沿阵地。守军一二七师周营全体官兵作战非常勇敢，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部战死。第一二五、一二七两师川军与日军激战一日，除少数前沿阵地被日军占领外，界河东西一线川军主要阵地仍然完好无损。

3月15日晨，日军向九山、五福庄阵地进攻，受川军阻击，未能突破。日军旋改变战术，除正面攻击外，派出3000余人迂回川军左后方，占领了柳泉埠，截断了滕县到界河的公路，使陈离所部一二七师陷入日军包围。另一股日军从济宁东南石墙出发，向守深井的一二四师三七0旅进攻，该旅兵力单薄，苦战支撑，伤亡惨重。日军又以万余人兵力向滕县城右侧迂回，到下午5时，日军已到达距滕城东北10余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滕县危如累卵，城防兵力除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七师部和三六四旅部警卫人员外，仅有警察、保安人员400～500人。王铭章向临城孙震总司令求援，孙震无兵可派，只好令特务营长刘止戈率步兵3连，驰援滕县。

王铭章知大队援军无望，于是电令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率一营军队回防县城，并表示：本师决心固守滕县城，与滕县共存亡。他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以10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为基干，组成守城部队，并彻夜加强防御工事，准备弹药粮秣，作好战斗准备。

3月14日，日军濑谷支队从两下店附近发动攻势，15日傍晚抵达县城附近。16日拂晓，日军1万余人向四十五军守卫的界河一线发起总攻。同日晨8时，日军在城外东西两高地架设10余门山炮向东关城内、西关车站猛烈开炮，日机10余架向县城投弹、射击，又集中火力猛攻土寨东南角，炸

开12米宽的缺口。日军步兵用10余挺轻、重机枪开路，进攻东关。川军采取近距离手榴弹反击，使日军尸横遍地，难以入城。与此同时，汤恩伯集团军北进临城，以侧击日军左侧为由，拒绝了援救滕县的要求。下午2时，困守孤城的王铭章部遭到日军更加猛烈的进攻。下午5时，日军发起第三次攻城战，集中30余门大炮猛轰，10架敌机轮番轰炸，守军受到严重伤亡，东关工事和城内南沙河阵地均被日军突破。17日晨，日军第十师团3万余人以50余门山炮、野炮、重炮和20余架飞机对县城进行狂轰滥炸，全城顿成焦土。随后又用坦克为前导，掩护步兵冲锋，川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反复争夺东南城突破口，收复东南城防。下午，县城遭敌四面猛攻，形势危迫，王铭章亲率师长税梯青、旅长王志远、童澄、吕康、曾甦元和县长周同等登城督战。日军攻势凶猛，城墙多处被削平，工事全部被摧毁，日军凭借火力掩护，大队蜂涌入城。王铭章率幸存官兵与敌奋战，不幸腹部中弹，继而连中两弹，为免落敌手，一面高呼“杀敌”，一面拔枪自尽。身受重伤的300余官兵，以他为榜样，不愿被敌俘虏，纷纷以手榴弹自戕，为国捐躯。参加滕县保卫战的四十一、四十五军官兵伤亡数千人。困守滕县城川军官兵牺牲2000余人、日军伤亡4000余人。川军坚守滕县苦战36小时，为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时间，振奋了抗战士气。王铭章牺牲后，4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兵工署在渝组建7大兵工厂

1938年3月，军政部兵工署着手在重庆组建7大兵工厂，重庆从此成为大后方主要的军事工业基地。陆续筹组的7大兵工工业是：

第24工厂，由原设重庆磁器口的重庆钢铁厂改隶兵工署后组建，年产钢锭2300吨，钢材500吨；

第10工厂，设忠恕沱，主要生产各种炮弹、枪弹；

第21工厂，由金陵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迁渝组建，总厂设陈家馆，一分厂设鹅公岩，主要生产步枪、机枪、迫击炮；

第30工厂，设南岸大佛寺，主要生产各种子弹、手榴弹、枪榴弹；

第50工厂，设江北郭家沱，主要生产37战防炮、60迫击炮、57无后座力炮；

第26工厂，设长寿，主要生产兵工化学药品；

第25工厂，设詹家溪，主要生产枪弹。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军政部兵工署 合组四川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并合资将綦江民营铁矿、铁厂收归官办，资本100万元；又合资开办南桐煤矿。这些企业成为重庆军火工业的原材料供

应基地。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驻重庆

1938年4月16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由南京迁驻重庆曾家岩。

1938年2月28日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议定，气象研究所由南京迁往重庆。4月16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达重庆曾家岩。1939年6月3日敌机轰炸重庆后，政府即令各机关疏散，气象研究所行政及统计部分于5月13日迁往北碚临时所址。1940年该所为适应长期抗战需要，在北碚朝阳镇水井湾象山购地兴建新厦，同年12月下旬迁入新址，1941年元旦开始在新厦办公。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5月迁回南京北极阁原址。

重庆暴雨，川中特大雹灾

1938年4月24日，重庆暴雨。全市房屋被毁数百间，两江木船损失70余只，珊瑚坝机场飞机受损7架，全市各项损失合计约数百万元。同时以隆昌、荣昌为中心的川中地区纵横二三百里遭受特大雹灾，死43人，重伤120人。庄稼、房屋、牲畜损失价值在1500万元以上。

四川省卫生专门机构成立

1938年5月2日，四川省政府省务会议决定：为“推动全川卫生行政”，于民政厅内成立“四川省卫生委员会”，统筹全川卫生事宜。1939年，四川省政府为应付日机空袭救护之急，委令贵阳农村建设促进会乡政学院教授陈志潜为筹备主任，于5月16日正式成立四川省卫生实验处，隶属民政厅，陈志潜任处长，处内设医政科、总务科和技术室，工作人员38人。1941年，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改为“四川省卫生处”，直属省政府。

重庆大火

1938年5月8日晨，重庆临江门大火，烧毁江岸民房7000余家，为时7小时，死伤在100人以上，无家可归者3万余人，估计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川省广招壮丁，成立兵役机构

1938年5月12日，四川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联席会议决定：全省除前已出兵14个师外，再出8个师，并即成立22个补充团。同时宣布：迄至本年3月份，出川部队自招壮丁4万余名，军政部各练编处共收壮丁11万名，合计已招壮丁16万名。本年底，四川共计征送壮丁174145人。

6月初，四川省兵役行政机构——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在成都成立，由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王缵绪兼代司令。川省自1937年起，即设有成茂、叙泸、渝酉、建南、夔绥、川北6个师管区，分别由龙杰三、周建陶、钟彬、

李铸、黄汉勋、苏炯任司令，直隶军政部，受军管区指挥监督。每个师管区下设3～4个团管区。县政府改兵役股为兵役科，负责办理兵役事宜。

7月17日，四川军管区拟就全川壮丁训练计划：全川壮丁共计800万人，除免、缓、禁、延及公务员与学生外，须受训练者约600万人，本年上下两期可训练300万人，1939年再训练300万人。

除1938年征送数外，前后各年实征壮丁数如下：1937年为103837人，1939年为296341人，1940年为266373人，1941年为344601人，1942年为366625人，1943年为352681人，1944年为391112人，1945年为283086人。8年间全川共计实征壮丁2578801人，为同时期全国实征壮丁14050521人的18.4%。这个征兵数还不包括西康省实征壮丁30938人，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招的10余万人。

省府整理四川财政

1938年6月6日，四川省财政厅长甘绩镛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川省财政情况及今后措施。报告中说：自抗战以来，本省出兵抗战，建设后方交通，支出愈益浩繁，而因战事影响，工商业不振，农村日就凋敝，税收随之锐减，川省财政几濒绝境。今当足踏实地，力谋川省财政的自力更生。如严格执行预算，以求收支平衡；健全会计制度，以树立审核基础；慎选财务人员，厉行赏罚，以实现廉能政治；清丈土地，改良征收方法，以平均负担，减少苛扰；及其他种种兴革事宜，现正具体规划。9月9日，重庆行营为整理四川财政召开谈话会。行营财政处长关吉玉提出预先拟就的改进四川财政计划书，其要点为征收一元化，统一购买用品，及人才侧重专门等项。行营主任张群归纳各方意见，列为五项，作为研究中心，即①预算；②制度；③土地陈报；④债务；⑤专案请示事项。

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四川

1938年6日，世界学联代表团克鲁格曼(英)、雅德(女，美)、傅路德(英)、雷克难(加)一行4人，由欧洲起程赴纽约出席世界青年学生联合大会，途经中国，考察青年运动及中国抗战形势，16日由武汉抵渝，受到重庆各校、中苏文协、市政府、抗敌会等法团600余人欢迎，代表团在渝期间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并参观各大学。6月20日，飞抵成都访问。21日，省府、川康绥署及成都各法团代表300余人在“蜀一”电影院举行欢迎大会。22日成都新闻、文化、教育各界40余团体100余名代表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茶会，欢迎代表团访问成都，代表团在蓉期间参观了新都实验县、四川省战地救护训练班等处，23日，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省府代主席

王瓒绪在省府宴请代表团一行，川省政界耆旧、在蓉各大学校长、外籍教授应邀出席作陪。

《时事新报》创刊

1938年6月25日，经张万里登记注册，由王达非主笔、刘刁慈任总编的日报《时事新报》在重庆创刊。由于该报新闻快捷，时评犀利，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报纸之一，发行量达到30000余份。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成立

1938年7月1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在成都正式成立。参议员共70人，议长李伯申，副议长向传义，秘书长罗文谟。

议长李伯申主持成立大会，首先为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念致哀，随后由议长致开会词称："本会的成立，负有三种任务：一是增加全民抗战力量，早日达到抗战必胜的目的，这是本会最重大的任务。二是关于省政的兴革问题。照临参会的条例，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促进省政兴革起见，才设立本会。三是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是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规定的"。省府主席王缵绪及程天放、刘倚仁、邓锡侯等人亦相继致词，均以宣传民隐，协助政府，革新省政，共济时艰相期勉。

四川省政府通令田赋一年两征

1938年7月3日，四川省政府通令规定田赋一年两征，并加征九成国难费。通令中说：四川田赋过去一年四征，近年减为一年三征。值此抗战爆发，国势陆危，四川地居后方，责任甚重，凡属有关国防的各种建设，急不可缓，需费较多。以简政着手，自本年下季起，改为一年两征，附征的国难费，仍照旧案年征九成，分为上下两季按季随粮征收四成半，以济公急。各县本年下季应征一征田赋及附征的四成半国难费，着即于7月1日开征，截止12月底全数扫解。各县学粮与民粮同样办理。

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开幕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首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7月15日闭幕。会议选举了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董必武、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35人为驻会委员。

本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该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性机关，"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方针，于实施前，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6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选任江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同时公布《修正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四条，规定参政员名额为200名，并公布参政员名单，计：各省市88名，蒙

古、西藏地方6名，海外华侨6名，其他方面人士100名。其中中共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邓颖超7人。四川及川籍参政员有邵从恩、谢健、张澜、胡文澜、晏阳初、曾琦、李璜、王立明、朱之洪、吴玉章、喻维华、陈豹隐、任鸿隽13人。

同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11月6日闭幕。

四川大熊猫出口欧美

1938年7月，英国博物院专家史密斯等在四川汶川县一带捕捉到大熊猫9只，由成都空运香港，经海路运抵英、法等国动物园饲养。这是在四川首次捕捉活熊猫运国外饲养。

1941年9月14日，宋美龄宣布向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赠送大熊猫一只，作为对该会大力救济中国难民的谢忱和表彰。所赠熊猫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院院长格莱翰博士在西康省境内捕获。9月22日，美国动物协会特派纽约市博物院动物专家蒂文由美飞抵重庆，代表美国接收大熊猫。随后，宋蔼龄亦宣布将向美国赠送一只大熊猫。11月6日，蒂文从成都将宋氏姐妹赠送的2只大熊猫（雄、雌各1）飞抵重庆。11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以中国政府名义举行了赠送仪式。宋氏姐妹、国民政府外长郭泰琪、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等官员及中外记者出席仪式。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同时对美播出赠送实况。11月24日，2只大熊猫运抵香港，12月30日运抵美国纽约。1942年4月29日，由美国联合救济国难民协会发起的全美儿童为大熊猫提名竞赛揭晓，雄性大熊猫得名为“斑棣”，雌性大熊猫得名为“斑达”，中奖者是一个名叫南赛11岁美籍哥伦比亚裔男童。

1940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向英国政府赠送一只大熊猫。5日，大熊猫乘专机由蓉抵渝，再改搭英国专机飞往伦敦。大熊猫为1岁雌性，重80磅，在汶川县境内捕获。5月11日运抵伦敦动物园，取名“联合”，14日向公众展出。

省内急性传染病流行

1938年夏秋，合川、安县、荣县、威远、荣昌、资中、内江、隆昌、富顺、泸县等地城乡流行白喉、猩红热、脑膜炎、伤寒等急性传染病。其中合川县尤为严重，患者占人口十分之八。传染病流行区死亡人口不少。

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

1938年8月1日，行政院举行第374次会议，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决议如下：①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张群呈请辞职，应予照准。②任命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代主席王缵绪兼任四川省

政府主席。③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稽祖佑免去民政厅长兼职，任命胡次威为委员兼民政厅长。④委员兼教育厅长蒋忠澄另有任用，免去本兼各职，任命杨廉为委员兼教育厅长。⑤任命委员何北衡兼建设厅长。⑥委员兼秘书长邓汉祥另有任用，免去本兼各职，任命陈筑山为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会议同时简任蒋志澄为重庆市市长。

同日，国民政府免去顾祝同的重庆行营主任，特派张群继任行营主任。

各国常驻重庆新闻机构和记者

1938年8月中旬，德国柏林海通总社通知该社驻汉口分社社长艾格劳率3名主要工作人员前往重庆设立分社。在此之前，重庆尚无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常驻。1938年9～10月，武汉战局日益恶化，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法国法新社，苏联塔斯社，德国徒新社及美、英、澳等国各大报社驻华（汉口）机构的原班人马，陆续迁来重庆。1941年底，常驻重庆的外国新闻机构计17家，记者18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驻东南亚各国的国际新闻机构部分随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撤往澳洲，其余均陆续经缅甸、印度转驻重庆，1942年8月，常驻重庆的国际新闻机构28家，记者31人，为抗战以来最盛时期。

1944年底，在渝常驻的外国记者34人，每日来渝旅行来访的记者约10～20人。1945年底，大部分国际新闻机构和工作人员搬迁至南京、上海。

1943年5月18日，全体驻渝外国记者在重庆成立“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向各国驻华使馆散发了成立宣言，推举《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为会长，赵敏恒（路透社）、白修德（《时代周刊》）、叶夏明（塔斯社）为副会长，摩萨（美联社）为秘书长。7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重庆两路口记者招待所举行成立大会。

1944年4月18日，爱金生等15名记者以记者协会名义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放宽新闻检查标准。10月中旬，蒋介石在《双十文告》中严厉批评驻华外国记者，作为回答。《文告》激起全体外国驻渝记者强烈不满。记者协会为此召开大会，议决由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和国际通讯社与大新闻社出面，在10月18日晚间同时向全世界公布“4·18”请愿书，并附详细背景文摘。18日晚因合众总社未收到原件，无法分送其它通讯社，仅发一摘要电，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转发，在同盟国家中引起极大反响。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连忙起草《宣传部长发言人之驳斥声明》，连同外国记者的“4·18”请愿书、“10·18”说明书一起送蒋介石审阅。蒋介石大发雷霆，斥责外国记者“侮辱国家元首”，“干涉中国内政”，指令有关人员警告外国记者并

扣留全部有关文电。

刘承钊首次在峨眉山发现“峨眉髭蟾”

1938年8月21日，动物学家、东吴大学教授刘承钊，率领师生50余人去峨眉采集动物标本。是日晚，雨后，在大峨寺后草丛中首次发现“胡子蛙”（当地俗称）雌雄各一只。后定名为“峨眉髭蟾”，以新属新种入学典。西方学典则称“刘承钊蛙”。

国民党禁止结社集会、取缔进步报刊

1938年8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通令全川，禁止民众组织任何抗日救亡团体和集会游行，并宣布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标准，钳制舆论。8月23、28日先后查封了《大声周刊》、《星芒报》等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并派特务捣毁了由潘文华出资经营、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编辑的《华西日报》报馆。

9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制定了《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暂行办法》，规定所有报刊所发全部稿件必须在发表前一日送检，违者罚令停刊一日至一周甚至永久停办。10月1日，开始施行。

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会部、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组成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渝成立，依据上述机构和舆论控制办法，国民党开始肆意践踏人权、取缔进步报刊。

省农业改进所成立

1938年9月1日四川省政府将原设的家畜保养所、蚕丝改良所、稻麦改进所、棉作试验场等单位合并为农业改进所。9月15日，川省府向中国、农民两银行及省合作金库商借500万元，以改进丝、棉、桐、蔗、稻、麦、柑桔的生产与运销。11月24日，省府通令成都、华阳等65县分别成立农业推广所。1940年2月8日，省农改所在成都青羊宫举办“劝农大会”，内设畜牧、农业、化学等9组，分别陈列各县农业推广所展品。遂宁、内江、江津、合川、泸县、乐山、三台、广安等县农业推广所也同时在当地举办此项活动。

川军二十三集团军皖南大捷，二十二集团军血战罗山

1938年9月16日，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驻守皖南8个月，沿芜湖、繁昌、彭泽等长江要塞布防，扰敌和打击日军舰船西上武汉，阻截长江敌舰运输线，8个月来先后击沉、击伤敌舰艇300余艘。继6月获港大捷之后，在湾址一带击溃敌第六师团、第十二师团各一部及台湾守备队波田支队组成的扫荡军。二十三集团军（后改番号为五十军）获奖金1万元，潘佐部（148师）

另获奖金3000元。陈万仞(21军军长)记功一次,并荣获荣誉勋章。

9月18日,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一二四、一二五师,由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率领开赴罗山,接受第十七兵团司令官胡宗南指挥,参加信阳、罗山战役。自本日起,先后在竹林铺、小罗山、沿狮河一带阻敌;因敌强我弱,阵地失守,退往湖北枣阳鹿头镇,全军伤亡3000余人。

《中央日报》在重庆出版

1938年9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重庆出版。该报1927年3月27日在武汉创刊,1938年9月15日从长沙迁到重庆出版,并成为总社。报纸为对开四版,主要刊登中央社消息。抗战期间,社长先后为刘光炎、何浩若、陈博生、陶百川、胡健中等。抗战胜利后,总社迁回南京,重庆版仍继续发行。

川军第三十集团军麒麟峰、万家岭大捷

1938年9月,王陵基统率的川军第三十集团军参加南浔会战,先后在麒麟峰、万家岭战役中歼敌大捷。

8月15日,王陵基接蒋介石电令,率第三十集团军赶赴第九战区,参加南浔战役。王陵基率部从沙市经岳州、汨罗到达修水。8月下旬,日军攻瑞昌中央军不利,向武宁方向退却,王陵基部十四师第一旅、新十五师第二旅抵挡不住,败退下来,日军攻下岷山。日军一〇六师团松浦少将,旅团长青木敬一率部西攻五家铺,商震部李营固守覆血山,日军猛攻覆血山,李营不支败退。日军占山后西进,夹击麒麟峰。川军新十三师师长刘若弼率部布防于天洼山、区道岩、百水街一线,他奉命抽调新十四师第二旅罗忠信部增援,强夺麒麟峰。该旅自9月24日协同友军与日军血战,往返冲锋数次,牺牲甚大。战至28日拂晓,守军伤亡过半,形势危迫,若麒麟山失守、必将造成全线崩溃。总司令王陵基急令调川军6个营增援。全部参战川军与日军血战两昼夜,在日军飞机、大炮和毒气的猛烈攻击下顽强地与敌搏斗。29日下午,川军官兵重鼓余勇,从血泊中站起来反击,终于将日军击败,夺回了麒麟峰,挽回了江南战局。这次战役,罗忠信旅伤亡军官50余人、士兵1000余人。

9月,为解除日军对武汉的包围,第三十集团军和三十一集团军奉命向南浔、瑞武两路挺进,以牵制长江北岸日军。9月25日,川军新十三师和友军到达德安西南的万家岭附近,与日军苦战10日,各部伤亡很大。川军和友军奉命撤至修水南岸,倚山布防。日军轻敌冒进,行至德安河畔,受到川军夹击,本间师团长及其官佐、大批士兵被击毙。新十三师乘胜反攻,将日军正

面主力击溃，俘获甚多。万家岭大捷，给日军重大打击，蒋介石下令嘉奖川军第三十集团军。

10月11日，重庆市各界300余单位共25000余人，隆重召开万家岭祝捷大会。

全川实行地籍整理

1938年9月28日，四川土地陈报办事处成立，职能为整理地籍，增收田赋。财政厅长甘绩镛兼任处长，祝平任专任副处长。本年工作为办理成都等5县土地简易清丈。自1940年起，始依正式规定办理地籍测量。截至1947年底止，先后完成成都、自贡两市区、宜宾等125县局城镇，暨北碚管理局辖区的第一次所有权登记。双流、温江等24县辖区的第一次土地所有权登记，也配合土地测量工作衔接进行。

敌机首袭重庆、成都

1938年2月19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重庆，在广阳坝投弹11枚。10月4日，日寇飞机9架袭击重庆。日机在广阳坝投弹30余枚后，窜入重庆牛角沱一带投弹数枚。10月22日，敌机18架袭击梁山我空军前进基地，投弹160余枚，经我空军迎战，击落敌机1架。

11月8日，敌机18架，分两批首次空袭成都，在凤凰山机场及外南机场投弹百余枚，炸死卫兵1人，伤3人，被我空军击伤1架。15日，日机17架空袭成都凤凰山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死1人。

12月26日，日航空司令官江桥英次郎中将配合汪精卫降日行动，分两次派飞机空袭重庆。首批于10点30分从汉口起飞，13时35分到达重庆上空，因云层过浓，目标不清，无法投弹。第二批于10时50分从汉口起飞，14时到达重庆上空，从密云中发现重庆东侧地区，投放炸弹多枚。

国民政府设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

1938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为开发西南，特设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拨款2万元，以统筹规划西南的开发建设。该会与金融界合作筹集3000万元作为资金。发行建国公债5亿元，作为开发建设西南的专款。1939年1月，成立西南经济研究所，“专为研究开发西南各省富源”。以交通部长和农本局长为正副所长，经济部长及西南各省长官任董事。这是一个主要的咨询机构。鉴于川康在西南经济建设中的关键地位，同年11月，行政院组织了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

《扫荡报》在重庆出版

1938年10月10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办的《扫荡报》在重庆出

版。该报1931年3月创刊于南昌，1938年10月10日由武汉迁到重庆出版，并成为总社，日出对开报纸一张。社长丁文安，1939年5月改为何联奎。1944年9月1日该报改组，由黄少谷任社长兼总经理。抗战胜利后，经张治中提议，该报从1945年11月12日起一度改名为《和平日报》，总社迁南京，重庆版继续发行。该报于1949年11月停刊。

《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发行

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同日在重庆出版发行。《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武汉失守后迁重庆继续出版，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由《新华日报》社编辑的《群众》杂志（周刊），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刊。它们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新华日报》总馆设重庆，在成都、桂林设有分馆，在贵阳、昆明、自贡、南充等地设有分销处，在宜昌、雅安等地设有推销处。抗日战争期间，其主要负责人有潘梓年、熊瑾玎、吴克坚等人。《新华日报》在很长一段期间，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周恩来规定了《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亲自审阅和撰写重要社论及稿件。《新华日报》自创刊始，就十分注意加强同各界人士的联系。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报上辟有“读者信箱”、“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经济讲座”和“自然科学”等专刊，还辟有“文艺之页”、“木刻之页”、“时代音乐”、“日本研究”等副刊。由于《新华日报》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抗日民族抗一战线的意义、作用以及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揭露旧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呼吸到新鲜空气，成为群众的精神粮食。

民生公司为抗战作出特殊贡献

1938年到1945年，民生公司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维持和发展川江航运，为抗战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大批后撤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约12万吨囤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英法等外轮公司乘机抬高运价2～3倍。民生公司及时提出“为抗战服务，军运第一”的经营方针，毅然采取大幅度降低运价的措施（运价降低30%～60%），总经理卢作孚亲赴宜昌指挥抢运，集中主要船只和业务人员，分段运输，昼夜兼程，经过40余天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人员和物资运进四川。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运送出川部队270多万人，其他各类人员150余万，各种战备物资100万吨，

而公司却为此损失轮船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

为开辟川江航业、发展战时经济，民生公司增辟了多条航线，并冒着极大风险，在金沙江、乌江、澜沧江、赤水河及岷江、嘉陵江上游河段进行试航和考察，同时开辟了川陕、川滇、川湘等省际水陆联运和水空联运，使战时运输和公司业务得到很大扩充。到1945年止，除战时损失的船只外，公司实有轮船仍达84艘，总计25781吨，为1936年的1.5倍。

除航运业外，民生公司在抗战时期还投资若干经济建设事业。原有的民生机器厂在抗战期间已扩建为大后方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拥有先进的设备和强大的技术力量，能修造各种船舶，制造后方需要的各种蒸汽机和各种生产设备。同时，拥有恒顺机器厂、渝鑫钢铁厂、天府矿业公司、大明染织厂等四川最大的厂矿；还在贸易、保险、建筑、食品、新闻等10多个行业投资，投资总金额高达公司股本额的50%，成为这些行业的大股东。民生公司成为一个以长江航运为中心，同时拥有机械、冶金、煤炭、贸易、保险、纺织、食品等企业的巨大的综合性实业公司。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迁川

1938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等全国性的抗日爱国文化团体相继迁川。同时，郭沫若、曹禺、老舍、夏衍、田汉、阳翰笙、赵丹、白杨等一大批文化界进步的著名人士云集四川，使全川的抗日宣传活动进入高潮。一批影响较大的文艺刊物；如《抗战文艺》、《中原》、《文艺阵地》、《全民抗战》、《全民周刊》等，均在重庆出版发行。《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反映抗战现实的剧目在川广泛上演。“孩子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演出队等，深入全省数十个县进行抗日宣传，对各地的抗日宣传队、歌咏队等进行辅导。10月10日，重庆举行全国第一届戏剧节演出活动，有21个演出团体参加演出，上演剧目40个，观众达10万人次。“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为接待和团结全国的新闻工作者，在重庆办了“记者之家”，同时，该会还对重庆、成都的新闻团体进行指导。

新都、中江县乡民包围县城

1938年11月10日，新都实验县乡民因不满县政府征兵及各种实验设施，在地方哥老会首领及土豪的鼓动下，集合附近各县袍哥、团丁数千人，围城反抗。省政府据报，派保安三中队驰往调处，并派保安处长刘兆藜会同新任县长罗远猷前往解决。经派员与哥老会首领等商讨，答应将县长陈再

泗撤职。14日前后围城团丁陆续撤退。

同年12月7日，因中江县第一、二区区署伙同联保主任抽壮丁舞弊；同时县府用大斗强买民间存谷，小斗卖出；又擅自变更禁烟办法，引起乡民公愤，乡民数千人捣毁多处乡镇联保处，又分三场集中，包围县城。省府派保安处副处长王元晖率领两个保安团前往镇慑；同时将县长廖育群撤职，以平民愤。另委肖烈为县长，成立宣抚委员会进行善后调停，乡民才逐渐散去。

中共川东特委和川西特委建立

1938年11月21～25日，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省工委成立以来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工作；决定不再成立省委，分别成立川东、川西特委。川东特委建立在重庆，书记廖志高，川西特委在成都，书记罗世文，副书记邹风平。撤销重庆市委和成都市委。川东、川西特委成立后，均直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这次扩大会议还决定以成都、重庆、自贡、乐山、泸县、南充为重点，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2月，中共川北工委在南充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撤销川北工委，分别成立南充、遂宁、阆中三个中心县委。同时，还先后成立了嘉定中心县委，北碚中心县委。

程天放接任川大校长

1938年12月13日，行政院通过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的任命案后，全校师生举行罢教罢课活动，并发出文电反对政府的决定。因程天放为国民党党务人员，本年11月25日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四川省党务人员训练班主任，又无管理高校经验，故遭川大师生抵制。

学潮发生后，四川省政要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均出面调解；程天放又依照川大师生要求，呈请教育部撤销了素为师生不满的该校秘书长孟寿椿的职务，又提出办好学校的保证，才平息了师生的情绪。

12月23日，程天放到四川大学接任校长职务。

行政院会议通过西康省政府人选，雅属、宁属各县划归西康省

1938年12月13日，行政院第393次会议通过西康省政府人选。任命刘文辉、段班级、李万华、叶秀峰、韩孟钧、王靖宇、格聪呼图克图、杨永凌、黄述为委员，刘文辉兼主席，段班级兼民政厅长，李万华兼财政厅长，叶秀峰兼建设厅长，韩孟钧兼教育厅长，王靖宇兼保安处长，张为炯为秘书长。

本年9月1日，经行政院决定：四川省所辖雅属、宁属各县，除名山县划入四川外，其余各县自9月1日起划归西康省管辖；川省府分电各该专县遵令移交。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在

康定成立。

四川粮食产量创纪录

1938～1939年四川粮食生产因风调雨顺、播种面积增加，出现了少有的好收成。193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322.24万吨，1939年连续高产，保持稍低于上年产量的1181.23万吨。1940年粮食产量下降为776.1万吨，1941年上升为949.6万吨，1942年又上升为974.2万吨，但未能恢复1938年的水平。出现起伏的原因是：棉花、甘蔗及油菜籽等经济作物价格上升幅度快，与粮食的价格差距拉大，因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但是，1942年以后，因战区扩大，军需民食需求量剧增，市价格上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又不断增加，产量也再次上升，形成新的高产局面。

1938～1943年四川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表

单位：公顷、万吨

年份	籼稻		小麦		玉米		甘薯		蚕豆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1938	2582467	617.87	1289133	188.67	677800	72.15	797533	390.51	507667	53.40
1939	2285267	658.65	1101933	130.28	868200	130.40	726800	256.04	614467	5.86
1940	1655467	303.59	1010800	108.42	801000	88.59	611200	231.72	583400	43.74
1941	1891933	388.07	720000	110.61	930867	105.75	707067	294.79	620866	50.37
1942	2023600	413.82	1342600	158.79	923267	113.84	693467	236.60	615267	51.14
1943	1769200		1192667	125.96	766333		476667		614467	51.89

大批四川青年奔赴延安

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1939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四川进步青年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视作抗战前哨、革命圣地，在中共川康特委组织下，纷纷奔赴延安。1937年11月，丁雪松、何郝炬、李新、张露萍、田家英、胡绩伟、张黎群、曾彦修等青年学生就是从成都到延安的。1938年，由范长江组织的青年记者协会等以华北战地服务团名义去华北解放区。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形势日趋严峻。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强了对国统区共产党活动和进步分子言行的限制。1939年纪念“5·4”运动期间，重庆就开始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了保存实力，隐蔽骨干，中共川康特委和南方局决定，利用山西反动派阎锡山在中共帮助下创办

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来川招收学员的机会，将四川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旅外剧团成员152名（其中党员70余名）送往山西第二战区担负抗战工作。

1939年12月8日，由王怀安、于北辰和曾凌三同志担负途中组织工作的学员队伍由成都出发，经咸阳到达西安。他们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得到中共中央改变他们去向的决定。鉴于第二战区发生反共事变，这批学员不去山西，改去延安。1940年2月2日，他们顺利到达延安。中共中央青委将这一大批青年分别安排到女大、鲁气、抗大、自然科学院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以后，不少人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优秀人才。

重庆、成都等城市举行义卖、献金活动

1938年12月，由重庆各界义卖委员会和《新华日报》倡导的各界义卖活动进入高潮。义卖办法是：买货人成倍付给义卖者货款，义卖者将货款交给政府，支援前线。各界人士、广大市民积极参加义卖活动，争购义卖品，到1939年3月中旬，各界义卖收入已达500万元。

1938年12月，成都各界也组织了义卖协进会，在全市开展义卖活动，为抗战筹集现金。次年发动全市体育、文艺工作者积极组织义赛、义演活动，所得门票收入，转汇前线。

此后，全川各地出现持续不断的献金热潮。1940年5月21日，丰都县商人冉聚盟捐资10万元，国民政府给他颁发了金质奖章，以资鼓励。9月26日，江津绅粮王正平捐谷1000石。广大工农群众也踊跃捐献，女佣杨妈妈把历年积蓄50元，全部送交赈济委员会。有的人力车夫捐出自己一天所得收入，宁愿忍饥挨饿。合川县人民劝募达到30万元，决定购买“合川号”飞机支援前线。大竹县范楠煊（川军师长）将在重庆的一份产业变卖现金20万元，购买飞机一架捐给政府抗战。

1938年金融物价概况

1938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发行总额为23.1亿元，发行指数为164%，较上年增长40.6%。同期，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164%，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60.9%。

四川外侨人数猛增

1938年开始，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外交机构林立，各国侨民人数猛。同时，居留四川各县的外侨急剧减少，大部分集中于成、渝两地。1938年12月，在川居留外侨为740人。分属15国籍，分布于25市、县。其中重庆市472人，占63.78%；成都市156人，占21.0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川居留的外侨再次猛增，大部分集中于重庆

一地。1942 年 12 月，全川外侨总数 1343 人，分属 23 国籍，仅重庆一市就达 1053 人，占当月全川外侨总数的 78.41%。外侨人数居前 5 位的是：英、美、韩、苏、法。

太虚法师出访东南亚

1938 年底，重庆北碚缙云山慈云寺主持、汉藏佛学教理苑院长太虚法师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由重庆抵昆明，赴缅甸访问。访问团在仰光拜谒大金塔、吉铁石佛塔、瓦城大金佛、勃固大巨佛、海边佛发塔等 5 大灵迹，访问仰光高僧，代表中国佛教徒供养佛塔，赠送礼品，缅甸各地僧众前往该团住地拜谒访谈者逾千数。访问团受到当地华侨的热情欢迎，出席同各华侨组织欢迎会、演讲会数十次，12 月 31 日，访问团在仰光参加了盛大的迎接舍匍银塔入大金塔的典礼。1940 年 1 月 9 日，访问团离开仰光前往印度访问。11 日抵加尔各答。13～14 日，印度佛教界、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分别招待访问团一行。14 日，访问团由加尔各答出发巡礼各地佛寺。3 月，访问团赴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等地访问。4 月转赴越南。5 月 4 日，由越南飞抵昆明。6 月初返抵重庆。6 月 12 日，日机轰炸重庆，炸毁古寺长安寺、罗汉寺。13 日，太虚法师以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名义，特电缅、印、越、泰各国佛教徒，呼吁共予制裁。

四川外贸概况

1938 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经由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 37168664 元，其中洋货直接进口货值 2628664 元，土货进口货值 34540000 元。出口货物总值 16693131 元，其中直接出口货值 203131 元，转口出口货值 16490000 元。全年进出口货物总值 53861795 元。

本年进口货物中，汽油和煤油均较上年减少，其中汽油从 483 万公升减少到 114 万公升，煤油从 896 万公升减少到 228 万公升。进口土货中，原棉进口数从上年的 5943 担增加到 37647 担。这是因为沦陷区各纱厂大部分迁川，各厂原棉也运抵重庆。棉纱仍为土货进口大宗，但本年进口量却大为减少，从上年的 178062 担（货值 1940 万元）减少到 98285 担（货值 1540 万元）。由于运输困难，其它土货的进口量也大大减少，其中卷烟从 26388 担减至 10138 担，稻米从 79299 担减至 13124 担。

直接出口土货中，麝香和名贵药材一般靠飞机或邮包运到香港。转口出口土货中，只有食糖增加了，从 129687 担增加到 162741 担。其它转口货物均出现锐减趋势。其中桐油从 206357 担减少到 128870 担；未硝山羊皮从 979231 张减至 375267 张；绵羊皮从 90 万公斤减少到 1043 公斤；

生丝从531746公斤减至29653公斤；五倍子从14966担减至5610担；药材转口货值从250万元减至130万元；猪鬃从8454担减至3389担。上述转口各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运输困难，但猪鬃减少还受到上年全川大旱、饲料缺乏、猪产量下降的直接影响。

1939年(民国28年)

成都、重庆人民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同时开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次日，国民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同日，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讨汪精卫叛国罪行；《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3日，又发表社论《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号召全国军民把伟大的民族义愤"变成一个声讨民族叛徒的广泛运动和热烈浪潮"。在国共两党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全川迅速形成讨汪运动高潮。1月，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和影响下，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成都青年抗敌协会等，发动群众集会，通电讨汪，举行火炬示威游行；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发起全国文化界拥护抗战国策，并联合全国出版界、各报馆、通讯社、各文化团体，召开讨汪肃奸大会，同时致函文协各地分会及各地文化界人士发起同样的讨汪活动。2月15日，重庆举行了万余妇女参加的讨汪大会和游行示威，会后，又发动了67个妇女团体参加的反汪签名运动。5月7日，成都各界再次举行有万人参加的反汪大会及火炬游行。全川各县继成、渝之后，也纷纷举行了有相当规模和声势的讨汪活动。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妻陈璧君，以及周佛海、陶希圣由重庆飞昆明，次日叛逃河内，经先期到河内的陈公博牵线，公开叛变投敌。12月29日，汪在河内发出艳电，要求国民政府接受日本对华声明，与日本议和。至此，汪精卫及其党羽成为可耻的汉奸。

西康建省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在康定成立，西康正式建省，省会设康定，刘文辉任省主席。西康省辖地，除原金沙江以西13县、康区19县和1个设治局外，还包括从四川省划出的14县和2个设治局。

西康建省酝酿时间很长，清末即已开始。1925年改川边特别行政区为西康特别行政区，设西康屯垦使兼摄民政。1928年改设特别行政区政务委员会于康定。1934年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为委员长。1935年国民政府设置西康行政督察区。至1938年12月行政院始决定建省并任命省政府委员及主席。

日机轰炸重庆、成都

1939年1月7日，日机31架袭击重庆。10日，日机30架大密度轰炸重庆，投弹后东窜。15日，日机27架袭击重庆，投弹58枚，毁房屋20余幢，炸死124人，伤166人，我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日机6架，伤4架，坠机落于南岸大兴场境内。此后，5月3日、4日、12日、25日，6月9日、11日，7月6日，9月3日，连续轰炸重庆。其中5月3日、4日两次轰炸最为凶残，史称“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

5月3日，日机45架于13时17分入侵重庆上空，以密集队形投弹100余枚，市区大梁子、苍坪街、左营街、新丰街、陕西街等地，被炸起火，死伤居民近千人。位于苍坪街的《新华日报》营业部、编辑部被大火烧光，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被炸，一枚500磅重的大炸弹落在办事处钱之光主任办公室，幸而未爆。

5月4日，日机27架狂炸重庆，都邮街、柴家巷等繁华市区尽遭轰炸，市内发生大火灾，居民流离失所，死亡约2000人，伤3300余人，房屋被炸1200余幢。驻渝英、法、德等国使领馆均遭重大损失；英国大使馆及领事馆伤一洋员，死20余名中国人；法国领事馆落炸弹两枚，房屋全毁；德国领事馆四面起火，延烧房屋，损失极大；苍坪街美教会全部摧毁，损失惨重。中国空军奋起迎击敌机，击落日机3架。国民政府拨出巨款紧急救济，并下令党政机关组织服务队，集中车辆船舶，疏散市民，仅在5、6、7日三天内，疏散市民25万人。

同年5月8日、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4次轰炸成都，其中以6月11日轰炸给成都造成的损失最大。

6月11日19时30分，敌机27架夜袭成都，在盐市口一带投掷炸弹、燃烧弹100余枚，引起多处大火灾，军警及防护团员赶赴现场扑救，烧至午夜，火才完全被扑灭。军警及救护团员黄保宗、张笃生等34人在现场光荣献身。这次空袭炸死市民226人，炸伤432人，炸毁房屋4700余间。南门外英美教会主办的华西大学校舍中弹3枚，两位外籍教授受伤，公私财产损失惨重。中国空军起飞迎敌，击毁敌机3架。

11月4日，敌机27架袭击成都，

投掷炸弹百余枚，炸死市民16人，炸伤18人，炸毁房屋60余间。中国空军奋起迎战，击落敌机3架。

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成立

1939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因十八集团军前称“八路军”，故该办事处习惯仍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重庆办事处曾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是中共所属军队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公开的合法机关，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办事处初设于机房街20号，遭日机轰炸后迁往红岩嘴13号，处长钱之光，副处长周怡。下设经理科、文书科、运输科、总务科、招待所、医务室、托儿所。设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亦由办事处管理。办事处一方面直接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办交涉，处理有关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各项事务；另一方面也办理中共中央南方局交办的一切工作。办事处的整个工作，始终坚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亦率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迁到南京，办事处遂于同年8月撤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迁重庆

1939年1月，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由武汉迁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三厅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通过演剧、战地服务以及各种文艺形式，开展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为限制三厅活动，先后三次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1940年8月，蒋介石竟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由于周恩来出面干预，蒋介石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要在政治部里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并要第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1940年10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组成。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包容了比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文工会的主任委员为郭沫若，副主任委员会为阳翰笙、谢仁钊。设有10名专职委员：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柏林、翦伯赞、胡风、姚蓬子；10名兼职委员：舒舍予、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侯外庐、卢于道、马宗融、黎东方、王昆仑、吕振羽。文工会成立后，许多人在哲学、历史、经济、文艺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文工会还举办了各种讲座、演讲、报告会等，邀请社会名流、著名学者如张澜、沈钧儒、张友渔、王芸生、邵力子、冯玉祥演讲，深受群众欢迎。1945年3月3日，文工会被迫解散。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为南方局的书记；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南方局常委。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它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以及港澳地区和海外党的组织。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组织在其统治区域内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它的机关秘密设在重庆红岩嘴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内。

南方局内部秘密工作机构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妇女运动、统战工作、青年工作、文化工作、敌后工作等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华侨、南洋工作组。1946年5月南方局迁南京，改称南京局。

从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到1946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前的7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四川省一级组织和部分地方、部门的党组织，都是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等一系 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还订定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工作纲要》(1939年3月)、《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1939年5月)等图书检查办法。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宣传部、军委新闻检查局等部门，也分别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文件。此后，各地反共磨擦活动日益严重，接连发生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在重庆，国民党军警公开搜查《新华日报》社的堆栈并逮捕工作人员。

重庆行营结束，新设成都、西昌行辕

1939年2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本日结束，另在成都、西昌新设委员长行辕、派贺国光、张笃伦分任两行辕主任。

东部高校迁川

1939年2月4日，据教育部统计室公布：抗战以来东部专科以上学校迁入四川者，计有国立中央大学(迁重

庆沙坪坝)、武汉大学(迁乐山)、东北大学(迁三台)、交通大学(迁重庆九龙坡)、上海医学院(迁重庆歌乐山)、中央政治学校(迁重庆南温泉)、药学专科学校(迁重庆歌乐山)、中央工业职业学校(迁重庆沙坪坝)、音乐学院(迁重庆复兴关)、艺术专科学校(迁重庆盘溪)、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迁重庆盘溪)、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迁重庆北碚)、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迁重庆新开市)、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迁重庆沙坪坝)、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迁成都华西坝)、牙医专科学校(迁成都华西坝)、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迁璧山)、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璧山)、同济大学(迁南溪)、戏剧学校(迁江安)、山东大学(因入川师生过少,并入中央大学)、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迁重庆北碚)、吴淞商船学校(迁重庆江北)、蒙藏学校(迁巴县)、江苏省立 教育学院(迁璧山)、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迁乐山)、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迁万县)、私立复旦大学(迁重庆磁器口)、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迁重庆南岸)、私立沪江大学(迁重庆磁器口)、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迁重庆市区)、私立朝阳学院(迁重庆兴隆场)、私立南通学院医科(迁重庆北碚)、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重庆沙坪坝)、私立之江文理学院(迁重庆市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迁重庆江北)、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迁重庆南岸)、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迁重庆北碚)、私立金陵大学(迁成都华西坝)、私立光华大学(迁成都光华村)、私立齐鲁大学(迁成都华西坝)、私立燕京大学(迁成都陕西街和华西坝)、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迁成都华西坝)、私立上海法学院(迁万县)、私立华侨工商学院(迁江津)、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迁江津)、私立铭贤学院(迁金堂)、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迁泸县)。

综计抗战期间迁川高等学校48所,除山东大学入川师生过少并入中央大学外,实为47所。其中迁重庆的25所,占迁川高校的53%;迁成都的7所,占迁川高校的15%;其余迁璧山3所,迁乐山2所、迁万县2所,迁江津2所,迁三台、南溪、金堂、江安、巴县、泸县各1所。

国民参政会组成川康建设期成会视察各地

1939年2月12日,国民参政会首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参政员116人,21日闭幕。会议通过提案90余件。其中有"组织川康建设视察团"案。根据国民党中常会111次会议决议,撤销汪精卫参政会议长职务,由蒋介石继任议长。

2月21日,由议长提议,国民参政会首届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川康建设期成会"。由议长指定参政员邵从

恩、张澜、李璜、黄炎培、梁漱溟、吴玉章、陈豹隐等人为会员组成，指定李璜、黄炎培、冷商、林虎等21人组成视察团，立赴川康各地视察；根据视察情况，拟定川康建设方案，建议政府实施。3月2日，蒋介石核定《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及视察团组织大要》。该团于3月18日分5路赴川康各地视察100天，于7月返渝。

视察团返渝后，编成约90余万字的《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同年10月25日，蒋介石核定《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组织规则》。该会以国民参政会议长为会长，由议长指定参政员25～30人为会员组成。本会任务，为“督促政府推进川康政治经济各项建设，并负设计建议及视察与考核之责，以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所有设计与建议以及视察与考核的结果，由本会请议长咨请政府决行”。该会在成都、宜宾、阆中、万县、雅安、西昌设有办事处，视察以吏治、兵役、治安及民生为主要对象。1942年10月，该会并入“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

对长江、嘉陵江、乌江等河流进行大规模整治

1939年开始，为解决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交通的困难，国民政府调遣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江汉工程局等水利机构，对四川的长江、嘉陵江、乌江、岷江、金沙江和綦江、滏溪河等开展大规模的整治和渠化工程，使水运通航条件显著改观。并以重庆为中心，开辟了轮船航线20条和川湘、川陕水陆联运路线2条，大大便利了战时的运输。

中美桐油借款成立，桐油贸易市场变化

1939年2月29日，中美桐油借款成立，总额为美金2500万元，年息4厘，5年还清，用于出口桐油，采购器材。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为此特设复兴商业公司于重庆，办理该项进出口贸易业务。

4月1日，由四川桐油巨商合组四川桐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100万元，并在彭水、达县、万县、叙永、巴中、南充、乐山等29处设立分公司。

10月19日，四川省政府颁布《四川省桐油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大纲》，确定万县等32个城市为内地桐油市场；重庆、万县、泸县、宜宾为桐油输出口岸。

“侯氏制碱法”获得成功

1939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研究并创建侯氏制碱法。

永利公司总工程师侯德榜为我国化工界之先驱，经20余年苦心工作，用苏尔维制碱法在天津、南京设立制碱厂生产烧碱。规模大，产品精，为东

亚之冠。抗战期间，该公司在天津、南京之盐厂、碱厂沦入敌人手中，遂迁四川犍为五通桥开办川厂。公司迁川后，制碱所用之盐产自井卤，价格较海盐高，苏尔维法之特长难于应用，故另创一新法——侯氏制碱法以代之，将盐之利用率由苏氏法之75%提高为98%，且可与氨厂、焦厂联立。自1939年春，侯氏即开始研究，在实验室中，每日可制碱5公斤。后扩大为一半工业型之工厂，日产量可达500公斤。此项研究为我国制碱工业开创了新纪元，具有世界影响。

财政部在重庆召开地方金融会议

1939年3月6日～10日，财政部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有15个省的地方银行参加。决议的要点为：发展经济力量，维护币制信用，增进银行业务，便利收购物资，平抑物价涨落，接济粮食需要。并发表宣言，动员各地金融经济力量，以辅助中央推行财政金融经济政策，加强省与中央、省与省、省与县乡间金融事业的联系和合作，粉碎日本经济封锁梦想，繁荣内地产业。

省府令执行《川省铜元划一兑价办法》及《取缔囤积铜元办法》

1939年3月12日，四川省府令所属执行财政部规定的《川省铜元划一兑价办法》，规定：大当200文、大当100文、大当50文、小当200文、川当20文、清当20文，6种铜元均作法币1分；半边大当200文、小当100文、清当10文、民当10文、川当10文，5种铜元作半分行使。1940年8月21日，又公布《取缔囤积铜元办法》。规定对大宗囤积意图居奇的铜元没收充公，奖励告密；铜元须照法定兑价兑换；携带铜元出境超过法币20元的，予以没收。27日，又通令各县，查禁奸商收买、囤积、熔化、贩运铜元，维持法定兑价。然正值抗战时期，铜价高涨，市场铜元多藏匿，零星找补均感困难，私运、溶化铜元现象，屡禁不绝。

第三十集团军参加南昌会战

1939年3月15日，川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奉命率部参加南昌会战，担任武陵方面的防务。20日，日军第六师团向武陵地区发动攻势，该集团军奋勇阻击，激战10日，于29日凌晨退守武陵以西莆田桥、烟港街阵地，武陵陷落。

中共四川地方组织贯彻隐蔽精干方针

1939年4月下旬，由于国内政治形势日渐逆转，中共川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作出《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着手从组织上巩固党，党的活动由半公开转入隐蔽状态。6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关于

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组织立即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10月，中共川东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组织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巩固党组织的问题。1940年3月“抢米事件”发生后，川康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一系列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措施。由于罗世文被捕、邹风平转移至延安，南方局决定以程子健为代理川康特委书记。7月，南方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川东党的工作，周恩来在最后作结论时，对川东党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会后，川东党组织为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作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1941年1月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在四川各地解散进步团体，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利用各种手段侦破共产党组织，因而使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据此，中共四川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采取了坚决措施，作出了许多改变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的规定，保护了一大批党员和党的组织。

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参加随县、枣阳会战

1939年4月30日，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总司令孙震率领下，驻防湖北钟祥、京山、随县、均川一带，与盘踞京山、钟祥一线的日军对峙。2月下旬，日军第三、四师团对川军发动进攻，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与日军激战后，退往襄樊，第一二二师退往张家集，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二师撤往枣阳以北。第四十一、四十五军因有较强的苏制机枪大炮火力，与敌长时间对峙，消耗了日军战斗力，消灭大量日军。3月，随枣日军与京钟日军共七个师团兵力以左右包抄之势对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实行围剿。两军发现后，于本月撤退，川军仍回襄樊驻守。

川军反攻南昌

1939年5月1日，川军刘雨卿二十六师在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率领下投入反攻南昌的战役。这次反攻战，该师王克俊旅曾攻克南昌机场，击毁敌机3架，毙敌甚众。军长陈安宝阵亡，师长刘雨卿重伤，该师官兵伤亡约1/3。

甘孜事件发生

1939年5月，国民党中央派戴季陶前往甘孜向九世班禅亡灵致祭。戴在甘孜等地逗留近三个月，将甘孜女土司德钦汪姆收为义女。戴季陶在甘孜时，班禅行辕曾要求他转致国民政府，明令划康北为班禅行辕辖地，戴未置可否。班禅行辕遂有恃无恐，广为扩充实力；除与瞻化（新龙县境）头人曲

梅芝玛等密商武装驱逐驻军外，又促成班禅行辕卫队分队长益西多吉与女土司德钦汪姆婚配，借以联络康北藏族上层，共同对抗刘文辉。刘出面制止了这一婚事，并由驻军将德钦汪姆拘禁寨中。

6月，曲梅芝玛举事失败，被二十四军捕杀。班禅行辕又联络甘孜部分头人，武装进攻二十四军驻甘孜部队八一五团。半月中，该团被围困，断水缺粮，被迫缴械，并被押离甘孜，班禅行辕遂乘机占领甘孜全境。战事持续到1940年春，班禅行辕武装被二十四军战败。2月5日，班禅行辕率余部迁往青海玉树。2月6日，二十四军部队重新进驻甘孜。

重庆各报停刊，暂出联合版

1939年5月5日，因日本飞机连日轰炸重庆，水电交通及印刷发生困难，重庆《时事新报》、《大公报》、《新蜀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等十家报纸奉军委会命令，自本日起，一律停刊，暂由各报发行联合版，组织联合委员会主持其事。公推《中央日报》程沧波为主任委员。下设经理委员会，由《时事新报》黄天鹏任主任委员；编撰委员会，由《大公报》王芸生任主任委员。重庆各报联合版于6日开始发行，同年8月12日结束。

行政院直辖重庆市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改重庆市为行政院直辖市，法定市区为300平方公里。

国民政府禁种鸦片办法

1939年5月9日，蒋介石通令西南各省，严禁种植鸦片。限令本年内将各省辖境以及边区地带，一律绝对禁种，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容留片面寸叶发现。关于一切施禁的宣传查剿等事，尤应 于下种之前，及初种出土之始，即行严办，以免仓卒不及之弊，而收事豫则立之功。凡有包庇纵容，或因缘食利者，无论其人居何地位，有何关系，均必断然法绳惩处，不可稍存宽假。7月11日，行政院422次会议通过关于《肃清私存烟土办法大纲》，及《督办肃清私存烟土公署组织规程》，并呈请国民政府简派王缵绪督办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贺国光为会办；刘文辉督办西康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张笃伦为会办。8月1日，蒋介石电四川、西康、贵州三省政府主席，切实负责于今明两年内禁绝烟毒。9月5日，四川省督办肃清私土公署成立。王缵绪4日邀宴贺国光，邓锡侯、潘文华等，商讨肃清私土有效办法。10月15日，蒋介石发表《告四川省同胞书》中说："禁烟毒为今日四川唯一急要之大事，无论有何障碍，均应断然排除，必须依照中

央六年禁绝计划，于1940年依限完成。关于禁种方面，一律严于铲除，期以年内根绝；关于禁吸方面，业已责成主管机关，迅即普设戒烟院所，厉行登记，勒令戒绝。关于运售方面，无论中央地方，决不以禁烟收入之分文，为财政之抵补，所有征存特税，应悉以拨充戒烟之经费。如有地方有司误解政府意旨，妄谓寓征于禁，而阳奉阴违，对禁政执行不力者，必须依法严惩不稍宽贷。至于军人，如有军队官兵，包运烟土，私行贩售，皆当认为首恶，惩其上官。并已授权各清剿部队，执行区内肃清烟毒之职责，务期军政社会，一体协作”。11月10日，根据行政院颁发各省查禁种烟督导团组织简则，四川督导团组成，计分10组开展工作。12月5日，蒋介石手订《四川实政纲要》，关于禁烟部分：(1)禁烟务须完成，过去已有的禁烟收入，除用于禁烟设施，绝对不准移作他用。(2)统一禁烟行政，封锁边区运烟，训练戒烟医生及查缉人员，以增进禁政效率。(3)各县烟民实数，应于3个月内调查完毕，每县在规定期限内，设立能容500～1000人的戒烟所1～2处。(4)无论何处，绝对不准私存烟土，偷种烟苗，一经发现，应即依法严惩。12月16日，蒋介石为统一川省禁政机构，令将川省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川康禁烟督察处，川东缉毒办事处，民政厅禁烟科等，一并裁撤，改组为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蒋兼任督办，行辕主任贺国光兼任会办。下设三处四室，并于川东南西北各区，分设协办，办理各该区肃毒事宜。

三青团四川支部成立

1939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于本日成立，任觉五为主任，李天民为书记。

1938年3月29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议案。

1938年9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布正式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与中央监察会本日在重庆正式成立。

国府发行1939年四川建设公债

1939年8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四川建设公债条例10条。公债发行定额为法币750万元，于民国28年9月1日照票面十足发行。公债利率为年息6厘，第一年只付利息，第二年开始还本，至民国43年6月30日全数还清。此公债指定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及其委托之银行为经理还本付息机关，其发行票面分为1万元、1000元、100元、10元四种，均为无记名式。

全省霍乱流行

1939年5月，重庆地区难民中发

生霍乱。6月，传自贡。7月，成都、郫县、德阳、崇庆及川北各县疫情骤增。8月，乐山、洪雅、雅安等县疫情出现。全川流行50余市县。自贡发病率最高，盐工尤盛，死亡5000余人。成都霍乱，传遍全城。

省政府在此次霍乱大流行中，共发给各市、县疫苗4865瓶，仅能注射1万余人。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曾在成都租赁民房，成立"隔离病院"，从8月3日起到9月10日止，历时40余天，共收病人89名。

杨森制造"平江惨案"

1939年6月12日，川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秉承国民党当局密令，派其总部特务营第二连，前往平江嘉义镇，包围了新四军驻该地通讯处，将新四军上校参谋涂正坤、通讯秘书吴贤众杀害。深夜，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秘书吴渊、曾金声及家属录英等6人活埋于一淘金坑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平江惨案"。

同年8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召开"平江惨案"烈士追悼会。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代表肖正岗及重庆各界代表200余人出席。

宜宾建成单机容量最大的电厂

1939年6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价购汉口既济水电公司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安装于宜宾，建立宜宾发电厂。1940年元月电厂破土动工，1943年12月正式建成投产。这是当时西南单机容量最大的发电机组。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成立

1939年7月1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在成都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参议员61人(5月1日由省政府公布的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参议员名单70人)，议长李肇甫、副议长向传义(继李任议长)、唐昭明(继唐为副议长)、秘书长罗文谟。

议长李肇甫主持成立大会，首先向抗战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默哀，然后致开幕词。开幕词称：参议会负有三项任务：(1)增强全民抗战力量，夺取抗战胜利；(2)集思广益，促进省政兴革；(3)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及政要程天放、刘倚仁、邓锡侯等出席会议并相继致词。

本届临参会设立于成都文庙后街女子师范学校内，活动时期为1939～1942年。

育才学校在北碚开学

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开学。学校设有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组。音乐组主任贺绿汀，舞蹈组主任吴晓邦，戏剧组主任章泯。学校聘请了一批

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担任教师。还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如翦伯赞、田汉、吴玉章、邓初民、周谷城、秦邦宪等来校兼课或讲学。学校开办了“林间讲座”，请了郭沫若、夏衍、曹靖华、刘白羽、周而复、周扬、邵荃麟、艾芜、戈宝权、沙汀等来演讲。育才学校内建有中共党支部，是一所注意结合实际，面向社会的新型学校。皖南事变后，尽管学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限制和经济封锁，但经陶行知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努力，育才学校为中华民族培育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从1939年开办到1946年，学校共招收学生410人。他们中有一批到了延安，有一批分别到了中原、华北、苏北、皖南、浙东等抗日根据地，还有一批到云贵、川东、成渝等地及《新华日报》参加革命工作。此外，在农村识字小组、音乐俱乐部等处接受育才学校教育的人数达2000人。

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四川

1939年7月30日，美国记者、《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作者、伦敦《每日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E·Snow）抵渝。8月13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密电军委会政治部，强调斯诺亲共，应进行监视，并随时报告其行踪。12月26日，斯诺从香港向美国发电，首次暗示国民党军队将向新四军进攻。此时，驻渝外国记者及各大通讯社尚无此类报道。30日，中国驻美总领事于俊吉向美国报界发表正式声明，公开否认斯诺的报道。1941年2月，斯诺从廖承志处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后，立即从香港发出急电，美国《星期六邮报》率先刊登斯诺的电文，引起强烈反映。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斯诺在华采访权限，斯诺被迫离华返美。

中共自贡重庆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1939年7月底，自贡盐工被强抓壮丁。8月1日数百名盐工集队要求释放被抓盐工。遭警卫打死打伤各1人。中共自贡中心市委适时地发动数万工人游行、请愿，发动市民罢市、学生罢课支持工人的斗争，迫使当局完全接受工人提出的惩办凶手，给死者追悼、抚恤，给伤者赔偿医药费，保证“盐工缓役办法”的真正执行等要求。

在中共川东特委的领导下，重庆开展了一系列改善职工生活的斗争：9月，中国无线电公司工人反对无理解雇工人，要求增发解雇金的斗争；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工人要求发放生活津贴的斗争；重庆市邮电报务员要求加薪的斗争。10月，大明纺织厂工人反对资本家打骂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川江海员先后发起反对拉丁和大批裁员，要求增加工资和解雇金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大都取得了胜利，并在斗争中创造和发展了一些新的团

结群众的组织形式，如职工创办的伙食团、职工死难大会、技术学习小组以及宿舍小组等。这些灰色的合法组织，成为掩护工人骨干、领导群众斗争的有力工具。

中共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1939 年夏，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在重庆潘文华家同刘文辉会晤。在上一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赴汉口途经成都时，曾先后会见了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中共中央代表同川康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先后两次会见。向他们讲明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他们认清抗日战争的国际国内形势，阐释坚持团结抗战必胜，分裂妥协必败的道理，坚定他们抗战到底的信念。1941 年 3 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华岗为代表到雅安去做刘文辉的工作。同年，中共秘密党员李相符、杨伯恺、田一平等，会同刘文辉及民主人士邓初民、马哲民等，在成都成立以“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为宗旨的“唯民社”，由刘文辉出任社长，并出经费，办了《华西晚报》，以后，中共党员黎澍等还到晚报工作。1942 年 2 月，刘文辉在重庆同周恩来首次会晤。周恩来向刘文辉分析了形势，指明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使刘明确了政治方向。从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转入实际配合的阶段。同年 6 月，中共南方局派王少春到雅安，并在刘驻地设一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少春经常向刘传达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及解放区抗日胜利消息。同时，中共南方局还派钱松甫到阆中潘文华为主任的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内设了秘密电台。1943 年 11 月和次年 6、7 月间，刘文辉派代表杨家桢到重庆和王若飞进行过两次会晤，求得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1945 年 2 月间，中共又派张友渔帮助刘文辉认清形势，了解中共在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方针政策。1946 年 2、3 月间周恩来将要离开重庆到南京时，又托人带话给刘文辉，鼓励他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点，以取得人民的支持。中共同时还对邓锡侯、潘文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共的启迪和帮助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终于在 1949 年 12 月率部起义，走到了人民阵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受苏联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1939 年 8 月 14 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陪同，在峨眉山洪椿坪千佛庵内举行接受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递交国书的仪式。

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访华

1939年8月23日，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尼赫鲁访华抵达重庆。重庆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来自南亚的友好邻邦的杰出使者。30日，尼赫鲁到达成都访问。9月5日，尼赫鲁由渝回国。

9月2日，尼赫鲁曾致电毛泽东，对他未能应邀访问延安表示遗憾，并祝中国革命成功。

尼赫鲁在渝期间，曾与蒋介石举行过中印关系和友好合作问题的会谈。中共驻渝代表王明、博古、林柏渠、吴玉章等会见了尼赫鲁。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曾于9月4日为尼赫鲁举行欢迎会。

四川大学迁校峨眉山

1939年8月，四川大学为避日机空袭，迁校于峨眉山。校本部设伏虎寺，文学院设保宁寺，法学院设万行庄，理学院设善觉寺，师范学院设报国寺，新生院设青龙场（今罗目镇）鞠漕林家私宅（御史第）。校长时为程天放。1943年2月1日，迁返成都望江楼原址。校长时为黄季陆。

川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王陵基率领的川军第三十集团军参加长沙会战。9月初，日军对华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参谋长板垣制定了攻占长沙的战略计划。日军第一〇一、一〇六、三十三、十三、六、三等6个师团及长江舰队舰艇300余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飞机百余架、化学兵队，合计18万人，于9月14日开始，由赣北、鄂南、湘北三路同时进攻长沙。川军三十集团军奉命固守修水、武宁间阵地，并以新十四、十五师分别挺进德安以西，阻击南下之敌，并增援傅家埠。

杨森率领的第20军也参加了长沙会战。该军先在鄂南通城南楼岭、桃树港一线阻击南犯之敌日军三十三师团，后又在湘东长寿街与日军作战。10月6日，奉命东进，协同王陵基三十集团军反攻修水。12月又攻鄂南通城，毙敌千余人。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恳辞主席职务，请缨出川抗战，英勇卫国，殊堪嘉奖，准王缵绪率部驰赴前方。出征期间，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同时任命贺国光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原秘书长陈筑山改任委员兼建设厅长。

10月3日，蒋介石由重庆飞往成都，到省政府视事。

这次罢免王缵绪省主席职务，是蒋介石迫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压力的结果。但是蒋介石兼主席，又是抑制地方实力派野心、巩固中央权力的新招。

国民政府开展节约建国储蓄运动

1939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委员会，并公布《节约建国储蓄券条例》，规定中国、交通、农民、邮汇局、中信局发行储蓄券，开展节约建国储蓄运动。省、县政府均成立储蓄委员会，并由党、政、社团组成劝储团。1940年9月18日，四川省政府成立储蓄委员会分会，要求全省每人每月储蓄5～10元，形成强制性摊派储蓄。至1941年1月28日，四川与重庆即吸储5132万元，占全国完成数25%以上。1942年又吸储84800万元，超过目标69.5%，占全国完成数27.67%。在其间"四行、两局"曾发行美金节约储蓄券1亿元；邮汇局还以搭销储金邮票方式，强制民众存储。1943年3月，又公然拟定《强制储蓄条例》。

川军李家钰部晋南告捷

1939年11月27日，川军李家钰部四十七军转战晋南，自7月至10月底，经历大小战事583次，共伤毙敌军2654人（少佐以上军官20余名）；炸毁铁路32段，火车头2部、车厢5节，汽车36辆，汽油300余桶。

12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李家钰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仍兼四十七军军长。

川军参加"冬季攻势"

1939年12月初，各战区奉命向侵华日军发动冬季攻势。

第五战区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冬季攻势开始前，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以一个加强团东渡襄河，炸毁汉（口）宜（昌）公路和京（山）钟（祥）公路桥梁以及日军通讯设施，因电报被日方窃获，执行任务受挫，与日军血战七天后，突围回到主力部队驻防地大洪山。

12月，冬季攻势开始，许绍宗（代总司令），第二十九集团军和张自忠三十三集团军奉命合攻钟祥。第二十九集团军与敌激战七天，攻占王家岭，与日军在汪家对峙。张自忠屡攻萍梓不下，与敌胶着。次年1月，日增援部队赶到，第二十集团军被迫退守客家坡、三阳店地区。

第三战区，冬季攻势开始前，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驻防青弋江以西至江西湖口以东，总部驻木镇观音洞，与日军主力对峙。川军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命，攻占贵池县官股煤炭山建筑截击日军舰艇的长江要塞。冬季攻势开始，二十三集团军在东起荻港，西迄湖口的广阔地带，向日军发起进攻。后因唐式遵与郭勋祺（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意见不合，竟使第三战区筹备两月之久的冬季攻势告终。

12月12日，第九战区“冬季攻势”开始。王陵基三十集团军所属川军72、78军分路向通山武陵之敌发动进攻，由于日军凭险固守，各军均无大的进展。

同日，第五战区发动冬季攻势，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向应山、随县之敌发动进攻，给日军大量杀伤，并缴获大量武器辎重。

重庆中信局开办战时陆地兵险

1939年12月8日，中信局在重庆开办陆地兵险业务，由财政部拨基金1000万元。承保范围是：存栈货物、生产工具及物资、建筑物等。从开办到抗战胜利，川、康、渝合计承保额达192亿元，收保费16733元，两者均占全国总额的70%左右。赔付率为17.4%。

缅甸政府代表团访华

1939年12月12日，缅甸政府代表团一行9人首次访华抵渝，访华团团长宇巴伦（缅甸上议院副议长）、副团长都弥亚辛（女，缅甸总督府内阁长）。12月13日，重庆各界3000人在国泰大剧院举行欢迎大会，叶楚伧、陈立夫、邵力子、张伯苓、洪兰友、王猷生、张蔼真、朱学范等政要出席大会。当日，访华团先后会见英驻华使馆代办哈特尔、驻渝总领事庞斯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军政要员。中缅双方会谈了中缅关系及边界问题，并议定组织中缅文化协会。15日参观陪都中大、南开、重庆等大学。21日飞抵成都访问，受到成都各界千余人欢迎。23日，参观华西坝大学区。12月24日，离蓉飞渝返国。

1940年9月，英国表示愿意重新开入于1939年7月关闭的滇缅公路。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于10月3日向英首相邱吉尔正式提出重开滇缅路的要求，并要求改善滇缅路运输状况等问题进行磋商。

1941年1月15日，缅甸殖民政府派出以总督府参事孜罗、商务实业部长宇巴丹、工务部长尼可生等4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再次访华抵渝，商谈改进中缅运输及商务问题，英方提议设立中缅混合委员会，聘美国专家为主席，管理缅甸境内一切运输。蒋介石立即同意，下令成滇缅路运输工程监理委员会，统筹调度。1月16日，缅甸政府代表由英驻华大使卡尔陪同，拜会孔祥熙、王宠惠、翁文灏等国府要员。

1939年金融物价概况

1939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发行总额为42.9亿元，发行指数为305%，较上年增长85.9%；同期，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355%，较战前增长116.4%，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28.13%。

本年重庆15家银行放款比例：商业放款占89%，工矿业放款仅占0.1%。

四川外贸概况

1939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经由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27452558元，其中洋货直接进口值1052558元，土货复进口值26400000元。出口货物总值9873379元，其中土货直接出口货值373379元，土货转口出口货值9500000元。全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7325937元。

本年进口洋货中，汽油和煤油居首位，但本年较上年的进口量大为减少。汽油从1145559公升减少到116969公升；煤油从2278041公升减少到4087公升。石油公司受到战事困扰，政府限制进口，存货告罄。复进口土货中，原棉从37647担（货值210万元）增加到72989担（货值470万元）。同时，棉纱却从98285担（货值1500万元）减少到28546担（货值630万元）。由于棉纱价格昂贵，人们转而购买棉花，加工成绵纱。铁制品、电气材料、化学产品等因人口增加、工业内迁而进口猛增。

通过航空和邮包直接出口土货数量增加。麝香从263担（货值17480元）增加到436担（价值35513元）；药材出口值从97442元增加到196204元。转口土货中，比较特殊的现象是，棉纱、卷烟、电气材料等的出口有所增加，由于长江运道阻塞，这些货由公路运抵重庆，再用船转运湖北。四川井盐和食糖也大多运往湖北、湖南，供应当地居民需要。猪鬃和桐油因运输困难，出口量下降。猪鬃由中央信托局控制，桐油由贸易委员会控制，前者从上年的3389担减至143担，后者从128870担减至8055担。

1940年（民国29年）

綦江惨案

1940年1月15日～18日，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即“战干团”）的忠诚剧团在重庆公演历史剧《李秀成之死》时，被国民党特务密报宣传共产主义。干训团教育长桂永清密请国民政府政治部长陈诚同意，按国民党颁发的《惩治异党条例》，在战干团5000学生中清查共产党。刑讯逼供，历时半年，被株连者达500余人。其中，除主演李秀成的李英和忠诚剧团的男女演员20多人被活埋外，战干团所属的一、三总队等部被活埋的达

210人，受刑致残的40余人。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战干团爱国青年的真相被披露后，重庆舆论界极为震惊，当时的国民参政员章士钊写了声讨法西斯专制主义的《书綦江狱》一文，悲愤呼喊："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狱。"

四川全省普设县银行

1940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县银行法》。嗣后，财政部又颁发《县银行章程准则》。通知四川省政府，要求各县于1年内次第设立县银行，以活跃地方金融，发展生产事业。同年3月，四川实施新县制，制订全省分四期（3个月为一期）完成普设县银行计划。11月1日，潼南县银行率先成立，为全国第一家，其他各县亦纷纷呈准领照开业。至1946年，全省成立县银行133家，西康省10家，附设的分支机构达200个以上，同县合作金库一起，组成一个较密集的地方金融网，实为全国之冠。由于县银行多，资力薄弱，业务发展受限。在时局多变，市场动荡中，无力应变，在"两次币改"中自动停业者占十之七八。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与第三兵工厂合组

1940年1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与第三兵工厂合并，调整组织，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系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于1938年2月成立的机构。3月将汉阳钢铁厂的马丁炉、蒸汽轧钢机，六河沟铁厂的百吨高炉和上海炼钢厂的机床等主要设备器材35000余吨迁到四川。5月选定重庆大渡口为建厂厂址。10月，日军进逼武汉，折迁工作停止。运抵重庆设备物资共32321吨，沿途损失2745吨。主要设备有100吨高炉2座，10吨平炉2座，1.5吨、3吨电炉各1座，10、12、14、18寸轧机各一套，30、34寸钢板轧机各1套。合并调整后，设7个制造所。一所水电，二所炼铁，三所炼钢，四所轧钢，五所炼焦，六所耐火材料，七所修造机件。

省城举办"劝农大会"

1940年2月8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在成都市郊青羊宫举办"劝农大会"，本日开幕，会期三天，内设畜牧、农业、化学、蚕丝、改良工艺作物、农村经济、垦殖工程、粮食作物、森林果木、病虫防治等专业组，分别陈列各县农业推广所展品。并备有电影、话剧、国术等各项游艺活动，招待农民和四方游览者。遂宁、内江、江津、合川、泸县、嘉定、三台、广安等县也分别在各县农业推广所所属场所同时举办了"劝农大会"。

此项"劝农大会"，是省农业改进所为鼓励农民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而规定每年春季举办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1939年首次举办一次，收效甚宏。

川康兴建水利工程

1940年2月12日，川康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北衡谈川康水利工作：①已完成的水利工程有三台郑泽堰、绵阳天星堰；② 正在进行的工程有绵阳陇西堰、洪雅花溪渠、青神洪化堰；③正在整理者有眉山醴泉堰、峨眉余公堰；④正在测量者有西昌邛海、安宁河、雅安青衣江等处。俟两处测毕，即赴古蔺、古宋、酉阳、秀山等县测量，兴办新水利溉田工程，或整理旧有堰工。⑤通济渠灌田达30万亩，受益面积之广，仅次于都江堰，遍及新津、彭山、眉山三县。决定于本年2月底施测，计划整理，并扩大灌溉面积为40万亩。3月26日，中、中、交、农四行投资1亿元，发展四川农田水利。

四川省图书馆开馆

1940年2月28日，四川省立图书馆开幕。馆址在城守街中城小学内。该馆原计划以皇城四川大学旧址约20亩为馆址，因建筑及经费关系，一时尚难实现，故暂设今址。

全省颁布新县制，划定县市税收

1940年3月1日全川135县市自今日起实施“新县制”，定3年完成。1939年6月28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训练班作《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的讲演，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整理，草拟《县各级组织纲要》及《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区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县以下各乡（镇）建立保、甲制度。县长必须是国民党员，乡（镇）长、保长必须经“训练及格”者才能充任。乡（镇）保长兼任各该国民兵队队长和乡（镇）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校长，把地方上的政治、财经、地方武装、教育和民众组训结合在一起，以加强对基层政权和广大农村的控制。川省实施“新县制”的步骤是：本年3月底前，充实县政府。4月底前，调整区署。7月底前，训练正副乡镇长，成立乡镇公所，中心学校及乡镇国民兵队。8月底前，甄选保长。12月底前，训练保长。

同时，省政府为适应贯彻新县制的需要，决定充实县市地方财源，划定屠宰税、房捐等为县级收入。1941年2月19日，省政府规定开征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和行为取缔税（后改为筵席及娱乐税）等项县市地方新税，并分别颁发各县市征收规程，通知实施。

成都“抢米事件”

1940年3月14日，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当晚8时许。成都南门外有人领头集合二三百身份不明的暴徒前往重庆银行办事处仓库。他们持手枪、木棒，解除了仓库门警武装，捣坏仓板，致使大米流于遍地。暴徒离开后，附近贫民提着口袋拥挤前往抢米，四

周围观者众多。当晚11时左右，突然开来五卡车的军警，对群众任意逮捕和大打出手。接着，成都行辕公开扬言：抢米是共产党干的，他们要趁米荒发动武装暴动。国民党特务机关以此为借口，枪杀《时事新刊》编辑、共产党员朱亚凡，逮捕了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共产党员车耀先、《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经理洪希宗等10多名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抢米事件”是抗战以来在四川发生的有预谋的公开反共事件。4月1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的名义，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广为散发《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川同胞书》，揭露了事件的真相，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之所以制造这个事件，其目的在于“破坏国内之团结，挑拨国共两党之关系，借此作为投降派分裂之口实，借此作为压迫共产党之口实。”事件发生后，全川出现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许多地方的中共组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不少共产党员被捕关押和枪杀。

陈嘉庚率侨团来川

1940年3月26日，南洋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抵重庆，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陈嘉庚在卢沟桥事变后，即在南洋华侨中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任会长。在他的主持下，从1937～1940年募得南洋华侨捐款总数约二三亿元。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大业。1938年，陈先生得知汪精卫大放“和平”厥词，当即从新加坡通电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这次陈嘉庚亲自到重庆，不仅对祖国抗战大局十分关心，而且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非常愤慨，他十分赞赏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教授直言敢谏的刚正作风。

同年5月初，陈嘉庚由重庆到成都，而后转道西安赴延安。在延安期间，陈嘉庚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并参观了延安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7月底，陈嘉庚离重庆辗转回到新加坡。

四行增拨农贷资金

1940年3月28日，四行和农本局增拨农贷资金。为扶持大后方农业生产，26日四联总处公布《各行局与各省政府办理农贷合约草案》15条。与过去比较，贷款对象有增加，范围扩大，购田有贷款，期限延长。28日，中、中、交、农四行决定投资1亿元，调剂四川农村经济，发展农田水利。10月25日，四联总处核定西康省本年农业贷款600万元。5月27日，川省府与各行局决定扩大农贷，据《四行局与农本局农贷办法纲要》12条的规定，以

农民团体或个人、农业改进机关为对象，种类有生产、供销、储押、水利、运输、耕地、副业、推广等。分联合办理及分别办理两种。联合办理的贷款，分担比例为：农民银行35%，中国银行25%，交通银行、中信局各15%，农本局10%。分别办理的贷款为，农民银行53县，中国银行23县，交通银行14县，中信局5县。6月1日，川省府向四行押贷150万元。开始办理农业贷款。6月20日，川省府从四联总处给川省农贷总额1亿元中，拨出1000余万元办理猪牛繁殖贷款及以防疫保险工作。

1943年，四川农贷38800余万元，占全国总额的27%；其中农业生产贷款46%，农田水利28%。民国34年(1945)，四川农贷占全国总额的31.8%居首位。抗战胜利后，四川的农贷地位逐年下降，贷放总金额虽大幅度增加，但因通货恶性膨胀，实际效益已明显减少。

成都救亡团体和进步社团被迫解散或停止活动

1940年3月至4月，国民党在全川加紧限制抗日救亡活动。设在成都的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社团，如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青年记者协会成都分会等，先后被迫解散或停止活动。许多进步书店也被查封。同时，四川省政府下令取缔各校学生的校外活动，通令限制学生结社集会。11月，军事委员会、教育部召开会议宣布："今后办学应以肃清奸党为急务"。12月，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率一批特务抵成都，顿时形势更为紧张。由于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日益加剧，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断被捕，环境日趋恶劣。

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成立

1940年4月8日，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兼主任委员(由省府秘书长贺国光代表)，建设厅长陈筑山兼副主任委员；除各厅长、省府委员为当然委员外，另有专任委员3人，设计员10人，负责拟具各项生产计划。会内设秘书室、农林、工商、矿产、交通、电力、水利6组。经费规定为200万元。9月2日拟订川省水利建设3年计划：①灌溉耕地，增至50万亩；②成都至宜宾间行驶百余吨商船；③建成10000千瓦水电厂；④完成都江堰流域防洪工程；⑤发展水力机械。后因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生产计划委员会于本年11月8日撤销。

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第三届年会

1940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行第三届年会。主席颜耀秋报告：该会自1938年4月17日成立以来，现有会员150余单位。工厂种类，重工业方面分煤矿、炼铜、炼铁、

翻砂、机器、电气业等。制造业方面，包括造纸、制革、制药、仪器、铅笔、日用品、纺织业、火柴业、玻璃等。交通方面，有造船业、电器机械厂之设置。此类工厂大部业已先后复工。惟因限于内地，运输困难，原料缺乏，资金利息较高，人工短少，尚有赖于政府扶植，使日臻繁荣。

省务会议通过1940年度财政和建设计划

1940年4月19日，四川省政府省务会议通过本年度财政和建设计划。财政部分：2月22日省财政厅长谈本年度预算，岁入为6800万元，岁出约9000余万元。由于社会各界的异议，改编了本年度预算，收支共为7000余万元。建设部分包括：①民政部分：依靠《县各级组织纲要》调整县政机构，充实乡镇，严密保甲制度。②教育部分：普及国民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整理并增筹地方教育经费。③建设部分：增加粮食产量，培植国防工业原料及设厂自制代替舶来品，发展贸易产品，整理公路及完成通讯网，计划开发管理黄金，煤铁、木材，注重边区垦殖，扩大合作事业，调整征工机构，健全平价机构等。

民生轮船公司轮船失事

1940年4月20日，民生公司民用轮由重庆市区开往北碚途中，上午8时在磁器口上游约4华里的飞浪子失事。乘客100余人中淹毙者达89人，多系公务人员。

川军参加枣阳、宜昌会战

1940年5～6月，第五战区所属各集团军，以及川军二十二、二十九集团军经"冬季攻势"后短期休战，与对峙已久的日军七个师团开始会战。5月1日，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攻势。6月5日，日军南路军在沙洋南北强渡，分股向沙市、江陵、十里铺西进，企图由南北两路围击驻襄西由陈诚统率的第六战区中国军队。

川军二十二、二十九集团军投入战斗。二十二集团军所部四十五军在大洪山东麓及随县以西地区转战至会战结束。该集团军四十一军曾于5月中、下旬担任襄樊守备，并于6月6日收复襄阳城。二十九集团军所部四十四、六十七军在大洪地区鏖战至会战结束。该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共伤毙日军将校级军官10人。日军四十师团团长天谷直次郎被击伤。

日机轰炸重庆、成都

1940年5～10月，敌机连续6个月对四川进行狂轰滥炸，其主要目标是重庆、成都两市。敌机对重庆的轰炸，从5月开始，先后于20日、22日、27日、28日、29日、30日轰炸7次，每

次出动飞机多则120余架，少则20余架。空战中，中国空军共击毁敌机12架，击伤41架，仅6月份1个月，敌机对重庆的轰炸即达10次之多，每次出动飞机100余架，市区内文化机构、学校、商业区，外国使领馆，名胜古迹无不遭受严重摧毁。中国空军迎战敌机，一月中击毁敌机17架，击伤60余架。6月份的轰炸，以6月11日、12日、24日、25日、27日、28日、29日七次轰炸最为残酷。6月11日，敌机126架分4批空袭重庆市区，先后投掷炸弹、燃烧弹200余枚，炸死炸伤市民60余人，炸毁房屋100余幢。苏联大使馆多次中弹，德国海通社炸毁，法国哈瓦斯社门口中弹，房屋倒塌。6月12日中午12时，敌机145架窜入重庆上空，先后在市区及江北地区投弹480余枚，炸死伤市民1400余人，炸毁房屋300余幢，炸毁佛教古刹——长安寺、罗汉寺。6月24日，敌机117架分四批先后空袭重庆，在江北、北碚及市区投弹400余枚，英国总领事馆全部被炸毁，英国大使馆、法国总领事馆院内中弹。6月25日，敌机125架再袭重庆。6月27日，敌机90余架分三批袭击重庆，在沙坪坝学校区掷炸弹数百枚，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室工厂及教职员住宅被炸毁数十幢。6月28、29日连续猛炸重庆。

7月内，日机空袭重庆5次。4日，敌机分两批先后对文化教育机关进行狂炸，国立中央大学、省立重庆大学再度遭受浩劫，两校园内共丢炸弹200余枚，炸毁校舍百余间。重大理学院、文学院图书馆及宿舍房屋被毁数幢；中央大学校舍也受到严重破坏，死伤员工10余人。5日，敌机80余架；16日，日机54架两度轰炸重庆，我空军奋勇迎敌，击落敌机3架；曾击落敌机5架的飞行将军丁寿康，在此次空战中不幸殉国。22日，敌机120架；31日敌机90架先后空袭重庆。

8月内，敌机先后5次对重庆进行猛烈轰炸，市民伤亡甚重，市区房屋遭到大量毁坏。9月，敌机90架袭渝，分两批向大梁子、朝天门、曾家岩、海棠溪、龙门浩等大量投弹，造成惨重损失，11日，日机90架分三批袭渝；19日，敌机190余架分两批轰炸市郊，死伤市民100余人，苏联大使馆再次中弹。20日，敌机170余架，滥炸市内商业区及居民住宅区，多处被燃烧弹击中起火，延烧范围极广，居民死伤惨重。临近重庆的万县、合川、铜梁、邻水也受到敌机空袭。23日，敌机80余架分两批先后袭渝，向海棠溪等处投弹，引起大火。

9月，日机5次轰炸重庆，多者100余架，少者60.70架。中国空军奋勇作战，不幸被敌击落13架击伤1架。这是数月来，我空军遭受的重大损失。

10月，敌机3次轰炸重庆，每次

来犯约在10至数十架之间。17日，敌机18架，向市区内外投弹，炸毁市内仅存的天主堂，炸毁船舶9艘，居民死伤10余人。25日，敌机44架分两批袭渝，向南岸美国大使馆附近及市郊投弹，美舰杜伊拉号及太古公司万象、万流两轮均被炸伤，炸毁民房10余幢，炸死居民10余人。

同年，敌机乘四川5～10月天气晴朗连续轰炸成都等地区。对成都的轰炸主要集中在5、7、10三个月，其中尤以10月份轰炸最为猛烈。

5月18、19日，敌机18架空袭成都，连续轰炸，轮番投弹百余枚，市民死伤50余人。

7月24日午后，敌机36架向市内投弹138枚，死伤居民近200人，炸毁房屋638间，中国空军击落敌机1架，击伤10余架。

10月内，敌机5次轰炸成都。4日，敌重型轰炸机27架，在26架驱逐机掩护下，于上午9时许入侵成都市空。从北较场（时为中央军校），一直炸到新东门城墙（时为高射炮阵地）以南菜地，投弹近百枚，落弹处，建筑为墟，房屋起火，血肉横飞，尸横遍地。城边的西蜀小学校被炸，躲避在城墙屋角的小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损毁房屋160余间，炸死市民100余人，伤220余人。5日，敌机36架轰炸成都市区。12日13时，敌机29架，向成都西城区投弹近百枚，平安桥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27日，敌机两批先后空袭成都市区，第一批21架，第二批15架，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及其附近皇城一带投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亡数十人，市立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被炸毁，将军衙门行辕中弹数枚，炸毁房屋2/3。

迁川工厂统计

1940年6月，宜昌沦陷后，自1937年7月开始的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工作始告一段落。据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统计，3年中迁入四川的民营工矿企业共245家，物资设备达9万余吨，技工4000余人。在此245家工矿企业中，以类别计：冶炼1家，机械103家，电器18家，化学40家，纺织25家，食品10家，教育用具32家，其他工业14家。以原设地点计：上海104家，汉口90家，南京10家，沙市、杭州、宜昌各4家，无锡、济南、汉阳等地各2家，嘉定、南昌、香港、青岛、太原、济南、卸甲甸、石家庄、南通、九江、郑州、常州、长沙、天津、大冶各1家，其他地区7家。迁移地点90%以上均在川东，靠近重庆、巴县。迁川西者较少。

省银行充实改组

1940年6～9月，四川省银行充

实改组。3月3日，川省临时参议会立案讨论“四川省银行弊端百出，应请省府彻查”。6月23日，兼川省主席蒋介石令四川省银行增资改组，派潘昌猷、郭松年等15人为董事，潘昌猷为董事长。熊梦觉等8人为监察。杨晓波任总经理。资本增为1000万元，其中省府、商股各400万元，财政部200万元。9月23日，财政部只拨了一张统一丁种公债200万元的收据，省股未拨，商股未募，只是帐面资本由原来的200万元增为400万元。

川北等地暴发霍乱

1940年夏，大旱连旬，霍乱肆虐，川北尤甚。7月，剑阁、南部首先发现疫情，迅速蔓延到阆中、梓潼、苍溪、三台、广元及乐山等地。其中，剑阁最为严重。7月26日，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派出3名医务人员，携带800瓶霍乱疫苗赴剑阁防治，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死亡人数众多。

全川米价暴涨

1940年7月10日，全川米价暴涨。本年四川实际被旱县份约30余县，通货膨胀日益显露，导致囤积居奇。3月13日，成都食米恐慌，每石价骤涨至60元以上，发生抢米事件。7月初成都米价每石80元，8日100元，9日涨至115元，10日120元，其他各地米价亦暴涨。11日川省府订定平抑米价紧急办法，规定全川以7月9日米价减25%，为最高价。物价平准处分电各县市，自7月13日起实施，严禁暗盘黑市。15日，绥署、省府会衔布告：纠众抢米者处死刑，囤积居奇者，没收充公。米价经平抑，游资转向棉纱，以致棉纱市场交易极为活跃。不久，米价继续上涨。10月1日，成都附近米价已涨至每石200元。

西康省临时参议会成立

1940年8月25日，西康省临时参议会在康定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参议员20名，议长谭其茳，副议长胡恭先，秘书长黄汝鉴。谭其茳主持会议并致词，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议长谭其茳在成立大会致词中称：“际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西康人民应表现自己意志，贡献自己力量。”西康政府应理解民间疾苦，满足民间要求，以互助共信之精神摧除侵略而争取独立自由，是必有代表民意者为之沟通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紧密其联系，效命于一途。故集思广益，政府之责，促进省政，人民之责。付此特殊任务于省临时参议会者，所以期早日共完全民族抗战建国大业也。”省府主席刘文辉在致词中首先提出三点希望：“议员熟悉乡邦情形，可下情上达；建议机关与执行机关要通力合作，人民与政府的意见，便得了一个沟通的

机会；西康属民族地区，各界人士相聚一堂议事，可消除隔阂，形成新省精神意志之统一”。其致词中还提到西康民族地区的夷务、宗教、差徭三个特别问题。

成立大会结束后即召开了本届临参会第一次大会。

四川实施粮食管理办法

1940年8月30日，省府举行418次会议，通过四川省政府管理粮食暂行办法大纲及四川省粮食调查暂行办法大纲，并筹建四川省粮食管理局。9月3日，全国粮食管理局派嵇祖佑为四川粮食管理局局长，何乃仁为副局长。9月22日，省粮食管理局设置粮食供应处，处长为嵇祖佑兼。同日省政府令全川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县内粮食的调查、征购等事项。县长兼主任委员。9月11日，全国粮食管理局在四川定价派购黄谷450万石。蒋介石发表《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要求各地纠正藏粮不售现象，并提倡“捐献军粮的运动”。

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

1940年9月6日，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由行政院长蒋介石、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副署，发布渝字第290号令，正式定重庆为“陪都”。国民政府命令称：“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扃，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战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著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舆情而彰懋典。”

从上文“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句看，国民政府自1937年11月移驻重庆，直至1940年9月5日，是将重庆作为“行都”来对待的，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将洛阳作为“行都”对待一样。

重庆定为“陪都”的决议，是1940年8月1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最先通过的。在此之前的同年3月，汉奸汪精卫等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打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旗号，声称还都南京。国防最高委员会为申明民族大义、明正视听，才通过决议，明定重庆为“陪都”。

国民政府成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

1940年9月17日，行政院482次会议决议组织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详细规划大重庆的建设事宜。10月1日，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组

织规程，经行政院会议通过，共计12条。规定该会直隶于行政院，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委员9～11人，必要时并得延聘专家为设计委员。至于各种建设计划的拟订，得征询各有关机关的意见，或请其提供材料，制定议决案呈由行政院核准后执行。重庆各界本日举行庆祝陪都建立大会。1941年3月30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成立。5月2日举行第一次委员会，通过①陪都计划工作纲要及初步工作纲要；②陪都分区办法等10余条。

川军陈万仞部收复马当

1940年10月初，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陈万仞率领的第二十一军切断上年被日军攻占的长江要塞马当。

陈万仞受命后，不顾川军武器落后，缺少重炮的困难，与师团长商定了克服马当的作战计划。10月11日，川军突击队巧妙地避开马当东南据点的强火力区，于夜间奇袭马当要塞，全歼要塞日军，并由川军主力击退了要塞周围的守护日军。12日川军以要塞的日军重炮攻击长江中停泊和往来的日军舰艇，击沉击伤多艘。川军出色完成了拦击日舰、控制长江的任务。

四川劝募军饷捐献军粮运动

1940年10月9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四川省政府、川康绥署联合发布《四川省民国29年度捐献军粮运动实施办法》、《四川省29年度捐献军粮奖励办法》，开始了四川劝募军饷、捐献军粮的运动。迄至当年底，全川报省者70余县，共捐献稻谷11.3万余市石，代金13万余元，捐谷数量以涪陵1.8万余市石为最多。

1941年2月28日，自贡商人余述怀一次捐献军粮黄谷2000市石，折合代金7万元。截至7月10日止，计88市、县共捐献黄谷9.436万市石，杂粮1700市石，代金165.3769万元。川省献粮会以工作完毕，定于8月10日结束。

“全国国民体育会议”在渝召开

1940年10月10日～15日，“全国国民体育会议”在陪都重庆召开。教育部长陈立夫、考试院长戴季陶、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以及体育教育委员会全体委员、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各专科以上学校体育主任及教育、体育专家与会，通过发展体育运动的提案73件。会议由陈立夫主持，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何应钦、谷正纲、商震、郝更生等先后讲话。

加强户政管理的措施

1940年10月13日，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订颁《陕鄂湘川康滇黔后方七省总清查实施办法》，川省府成立户籍行政系统，制定设置户籍人员办法

及四川省各县县政府户籍组织章程，通令各专署、县府依限设置，加强户政管理。于1941年底完成全川各县市整编保甲、清查户口的工作。1941年10月省府发表统计：全省共划为4314乡镇，62843保，673372甲，7829676户。1943年4月2日，根据国民党十中全会的提示，四川省政府在制订民国32年度施政计划的中心工作中，进一步提出：为建立民意机关，先办公民宣誓，然后依法召开户长会议、保民大会，再依法选举乡镇民代表会。迄至4月底止，全省111县、市召开了户长会议及保民大会，104县成立了乡镇民代表会。

省临时参议会举行

1940年10月15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召开。省府秘书长贺国光报告川省施政概况。大会通电全川各市县响应蒋介石9月11日所倡捐献军粮运动的号召。在30日闭会的宣言中，指出："当前第一严重事态为粮食问题"。"其次则为物价问题"。"再其次则为财政问题"。"据财政当局报告，截至现在实施结果，除第二预备金用罄无存，复追筹补充外，尚差1000余万元。"至于民国30年度预算，"不敷达9000余万元"。

川省禁烟成效

1940年10月16日，省府秘书长贺国光向省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的施政政绩报告中介绍了川省禁烟的成效。报告中说：关于禁种，内地现已绝迹，边区如雷马屏峨等处，曾派军队督铲，几次发生惨案，但终以深山峻岭，不易查出之故，迄今犹未铲尽。在禁售方面，现已无明售现象，惟暗售尚难言无。1941年1月18日，川省禁烟督察处公布川省禁烟实况；①邻省鸦片输入。②武装运烟者多。③流动兜售鸦片者多。④少数民族地区种烟不绝。⑤边远县区偷种。⑥巨室编民吸食者多。⑦河道、工厂窝藏。⑧下川东各县毒品流行。⑨豪强犯禁不治。⑩禁烟者奉行故事，甚至有借端通利者。⑪移风易俗未成。

重庆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

1940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文化艺术社、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国民外交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全国戏剧、电影、美术、木刻、音乐各界"抗敌协会"等12团体，在重庆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冯玉祥、周恩来、梁寒操、叶剑英、沈钧儒、郭沫若、老舍、王昆仑、胡风、田汉等300余人到会。当晚，重庆文化艺术界50余人举行聚餐晚会，周恩来到会并演讲，他说："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有四大特点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的。这四大特点就是：一、律

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嫉恶如仇。”并称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斗士，对鲁迅的一生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省府发行整理债务公债

1940 年 10 月，四川设立偿债委员会。对省府所欠各项债务，报经中央核准于次年 1 月发行整理债务公债 3500 万元，由偿债委员会换偿。经省政府发行的各种库券和公债，其未偿还部分陆续移交中央，由财政部统筹整理。

各国援华助战，派驻重庆军事、情报机构

1940 年 10 月，斯大林亲自任命崔通夫将军为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顾问团长。12 月，崔可夫率 15 名军事专家抵渝，这是抗战时期首先来华常驻的外国军事代表团。至 1944 年夏，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及工程人员累计达 500 余人。

1941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美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军援，同年 10 月，罗斯福总统任命马格鲁将军为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10 月 19 日，美驻华军事代表团抵渝。英国为平衡与美国的外交活动，亦向中国派驻军事代表团。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加入同盟国作战。法、波、荷等国先后在中国派驻军事代表团。

1941 年 4 月，苏日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撤离。但部分苏军顾问一直到 1944 年夏才陆续归国。其余国家的驻华军事代表团，在 1945 年底先后撤离重庆。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均在重庆设立专门的战时情报机构，搜集与战争有关的情报资料，从事出版物的交换工作，其中由美、英政府驻华机构独立掌握的机构有：美情报协调局重庆办事处、美国战略情报局重庆办事处、美国战略服务局重庆办事处、英国情报部驻华办事处等。各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也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此外，美国海军驻华代表团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联合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专门搜集气象及日占区的军事情报。

1945 年 8 月以后，美、英在华战时情报机构和人员陆续撤离重庆。

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蓉成立

1940 年 11 月 1 日，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成都成立。6 月 3 日，行政院颁布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 12 条，规定川康两省主席，经济、交通、农林、财政部代表及两省建设、财政厅长为当然委员，并设聘任委员若干人。由行政院指定 1 人为委员长，8 至 10 人为常务委员，主持会务。11 月 1 日该会在成都正式成立，同时召开

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张群代表蒋介石主持会议。此次全体委员会议于4日结束。通过设川康兴业公司的决定，推张群为该公司董事长。资本定为7000万元。

蒋介石辞去四川省主席，张群继任

1940年11月13日，行政院举行490次会议，会上通过两项决议：

(1)准许蒋介石辞去所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张群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直到1946年9月10日离任，任省府主席六年之久)。

(2)免去贺国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谷正伦宪兵司令职务；委派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委派贺国光为宪兵司令，兼重庆卫戍副总司令。

1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了上述任免决议。张群于18日就职，直至1947年4月，张群任行政院长，才免去省主席职务。

11月19日，行政院任命李伯申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

四川省气象测候所成立

1940年11月，四川省气象测候所在成都凤凰山成立。这是四川省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全省气象专管机关。

1940年10月，省政府委员会第419次省务会议通过，将成都测候所改组为四川省气象测候所，掌管全省气象测候及研究事宜。11月任命易明晖为第一任所长。12月中旬，省气象测候所由外北凤凰山机场迁至外东下沙河堡塔子山新址办公，并于1941年1月1日开始在新址观测。

美、英等国民间组织积极援华抗战

1940年12月3日，美国红十字会派遣该地中国救济事业部主任贝克、副主任韦思礼来重庆主持救济事宜。贝克来华共计筹款500万美元，采购的首批药品计120吨，已启运仰光，转运中国。这是该会向中国大批捐赠医药用品的开始。据不完全统计，至1945年11月，重庆市卫生局接受捐赠的医药器材、药品、布匹共计24批，重庆市民医院16批，重庆妇科医院2批。1942年4月，美国红十字会捐赠救济四川空袭被灾小学生的布匹137包由渝运抵成都。5月14日，四川省政府组成“成都市办理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空袭被灾小学生学生兰布分配委员会”，会同省动员委员会空袭紧急联检处进行调查、登记、发放。

1945年6～7月，成、渝等地爆发大面积霍乱，成都市一周内死亡174人，重庆市一周死亡150人，染病者逾6000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请求美国空军紧急从美空运防疫血清5.5万磅至重庆。7月23日，救济总署派遣

来华协助救济工作的美籍专家8人到达重庆，并随机带来数十吨消毒药品、器械及医疗设备。

截至1945年底，英国联合援华会共计募集捐款160余万英镑，并募集大批衣物及医疗设备援华。抗战期间，英王室成员及英国红十字会也曾为中国抗战举行募捐活动。

马寅初被捕

1940年12月6日，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国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教授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软禁。马寅初被捕是因为他先后在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上、香港出版的《工商日报》和《大公报》上、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演讲会上，发表文章和演讲，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四大家族、达官贵人大发国难财的祸国殃民罪行；义正词严地宣传开办“临时财产税”，征收豪门巨富的不义之财，充作抗日经费的主张；并指名道姓公开斥责蒋介石。马寅初被捕之后，激起了重庆大学师生的公愤，掀起了营救马寅初的怒潮。1941年3月30日，在中共地下党的发动下，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和重庆大学师生举行祝贺软禁中的马寅初六十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新华日报》送去寿联。重庆大学师生在校园内修建“寅初亭”，以志纪念。马寅初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和江西上饶集中营，他在关押期间始终不屈不挠。1942年春夏之交，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才把马寅初释放出来，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大木鱼堡五号家中。1945年抗战胜利，马寅初全家才迁回沙坪坝重庆大学宿舍。

财政部开征糖类统捐

1940年12月10日，财政部通令税务机关，自本日起一律开征糖类统税，规定从价征收15%。自抗战爆发，全国工商业发达地区及沿海大城市相继沦陷，关、盐、统三项主要税收锐减。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选择大宗消费品食糖征收统捐。

成都市长杨全宇购囤粮食被枪决

1940年12月23日，成都市原市长杨全宇因与大川银行重庆分行经理串通，以福民面粉厂之名购囤大量小麦，事发后，经蒋介石批准在重庆枪决。

缅甸记者访华团来川

1940年12月28日，由团长宇巴格里、副团长宇敦丹、团员宇巴丹、宇模加里、汤晋逊、巴达渣芝、达渣芝一行7人组成的缅甸记者访华团，由滇抵渝访问。重庆市各机关、文化团体，各报社代表百余人到机场迎接。中午，国民政府外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宣部

举行宴会欢迎宇巴格里一行。1941年1月2日，代表团拜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4日，中国文联同志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重庆广东大酒家宴请记者团一行，宋家骅、谷正纲、陈铭枢、吕超、马超俊、曾虚白、朱世明、张道藩等党政要员出席。5日，重庆市文化团体联合举行茶会招待记者团。7日，记者团副团长宇敦丹及团员6人，由中缅文协、国民党中宣部、国民政府社会部、成都《中央日报》社、中央通讯社代表陪同飞抵成都访问，成都市各机关团体、新闻界代表到机场迎接。10～11日，代表团参观成都各大学、省农改所、武侯祠；12日赴灌县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记者团副团长宇敦丹应邀到交通部成都广播电台作了广播演说。14日，代表团离蓉飞滇，1月15日离昆返缅。

四川省第一次行政会议分别在成都、重庆举行

1940年12月、1941年1月，四川省第一次行政会议分别在成都、重庆召开。成都会议1940年12月23～28日召开，对粮食、财政、土地陈报、新县制、国民教育及清剿清查问题，均有原则性的结论，作为今后川政实施的依据。重庆会议于1941年1月13～17日召开。以成都区会议所获结果，作为重庆区讨论时的基础与参考。

重庆佛教徒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

1940年底，为宣传抗日救国，由重庆北碚慈云寺青年僧侣乐观发起组织的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曼林、觉华、能仁一行4人，由渝出发赴滇，准备步行前往东南亚各国，“志在与敌人在国际上作长期之战斗。”慈云寺主持太虚法师热情支持，主动捐资100元。乐观等僧人的请求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和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等机关的积极支持，中央国际广播电台为此进行了专题报道。行前，众僧侣收到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缅文化协会赠送的“苦行救世”、“大同正轨”锦旗各1面。

12月24日，宣传队循滇缅公路抵达仰光。中国佛学会仰光分会及仰光市各法团代表到车站迎接。1941年1月5日，缅甸华侨精神动员总会召开第18次国民月会，到会者约七八百人，邀请乐观等人到会演讲。乐观介绍中国抗战形势，宣传人类和平，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为使缅人和佛教徒认识到日寇在华暴行，乐观在缅印行了有中、英、缅的特刊，收录缅甸高僧宇煞格巴拿、宇宫点乃、宇宋省达等大师的反战文章，在仰光、瓦城、毛淡棉等城市散发。1941年7月，缅甸局势恶化，英国宣布封锁滇缅公路。宣传队被迫

取消原订前往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的宣传计划，于8月返回中国。

1940年金融物价概况

1940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发行总额为78.7亿元，发行指数为560%，较上年增长83.6%；同期，重庆批发物价指数较战前增长287.6%，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7.83%。

国民政府邀请美国著名人士访华

1940～1941年，为争取美国援华，国民政府以各种名义邀请美国著名人士访问四川。

1940年9月3日，美国克利泼斯·霍华德报系主办人霍华德访华抵渝，受到蒋介石、孔祥熙、王世杰等国府要人的分别接见。霍华德在渝逗留2天，于9月5日返美。

1940年9月4日，美国记者"太平洋考察团"抵渝访问。9月6日，北美联合通讯社及《旧金山记事报》记者甘宁生(R·Gunninson)应邀抵渝，蒋介石、孔祥熙、王世杰分别会见甘氏。甘宁生返美后，在48家刊物发表中国之行的见闻，呼吁援华。罗斯福总统为此特别召见甘宁生，了解中国情况。

1940年12月7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抵渝，月底受蒋石接见，12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约请斯特朗长谈，透露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及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接触的情况，并将一些文件交斯特朗，请她在适发时候发表。1941年2月初，斯特朗在美国收到中共南方局通过秘密渠道寄出的信件，信内附有中共中央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的全文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十五点计划的正式声明。《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巴恩斯抢先发表，成为独家新闻。此后，斯特朗在《美亚杂志》发表了详细的分析文章。

1941年4月12日，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E·Hemingway)代表《纽约时报》、《下午日报》，海明威夫人代表《柯立耳》杂志，由香港飞广东韶关访问第四战区后，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夏晋雄陪同飞抵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拟定计划，希望利用海明威声望扩大影响，特别请求蒋介石批准发给随军记者证，但将限制他前往北采访。海明威返美后所写访华见闻，曾引起极大反响。

1941年5月8日，美国《生活》、《时代》、《幸福》三大杂志发行人、美国华会委员卢斯夫妇受美国"中国救济事业联合会"委托，取道香港抵渝，协助国民政府发起的"争取美国对华救济"活动的宣传工作。9日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外交宾馆设宴欢迎卢斯夫妇，外交部官员及重庆市市长夫妇出席作陪。10月，蒋介石夫妇

接见卢斯夫妇。11～12日，卢斯夫妇参观妇女指导委员会、儿童保育院等处，并访问翁文灏、张家廒。5月14日，卢斯夫妇飞蓉访问，参观"工会"组织，并赴灌县都江堰游览，21日，卢斯夫妇结束访问，偕《时代》杂志驻华记者白修德(T·White)离渝飞香港返美。

1941年7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行人兼总编辑英格蒙尔，由缅甸仰光飞抵重庆访问一周，采访蒋介石等国府高级官员后由渝转飞莫斯科。

1941年9月13日，非律宾《马尼拉前驱报》发行人罗慕洛由港抵渝，先后会见吴铁城、蒋廷黻、王宏惠、关国桢、郭泰祺、何应钦、翁文灏等高级官员。9月17日，由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陪同访问蒋介石。

四川外贸概况

1940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经由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4500万元，其中洋货直接进口货值480万元，土货复进口货值4020万元。出口货物总值11319182元，其中土货直接出口货值519182元，土货转口出口货值1080万元。全年进出口贸易总值56319182元。

本年度洋货直接进口值从上年的100万元增加到480万元，直接出口值从上年的373379元增加到519182元。从通商口岸运进的土货从2640万元增加到4020万元。运往通商口岸的土货值从950万元增加到1080万元。直接进口的大宗货物是药品、无线电话及零件、机器及工具、表及零件、电力器具、科学仪器与器具。直接出口的土货主要是白木耳、药材和生丝。6月，宜昌和沙市的陷落，造成转口其它口岸的大宗货物如食盐、药材和食糖一落千丈。转口出口土货中，桐油从上年的62696担增加到82152担，原棉从72989担增加到86188担，铁制品从10828担增加到20826担。桐油主要来自万县，由复兴商业公司收购后，经由陆路转运出口。原棉大多来自沙市和宜昌运来的存货，铁制品也是这两个城市拆御的船只零件。重庆海关没有陆路贸易的统计资料，据了解，大批汽油、棉纱、棉布、卷烟、机器、汽车零件取道公路运入，另有大批桐油、猪鬃也从陆路出口。

四川人口及耕地概况

1940年，据四川省民政厅(转引自《四川省统计年鉴》1946年版第1册)国民政府内政部(《各省市政区户口统计总表》)统计资料合计：四川、西康、重庆三省市人口为48791503人。又据《四川省建设统计年鉴》统计：1941年四川耕地面积为103680644亩。

1941年(民国30年)

《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真象

1941年1月11日,当《新华日报》在报馆举行创刊三周年活动时,传来了发生皖南事变的急电。周恩来当即在会上强烈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并指示《新华日报》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予以揭露。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重庆市党部及《中央日报》、《扫荡报》的有关人员在重庆市党部共商限制《新华日报》发行的六项办法。1月18日,《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稿件被国民党当局扣留,周恩来表示抗议,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被扣发稿件的部位,报社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送到了重庆人民群众及国内外人士手中。2月,国民党中央特种会报对《新华日报》有"只准印,不准卖"的规定,《新华日报》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仅2月4～16日的13天中,被国民党军警宪特拘捕殴打的报丁、报童达35人次,被无理没收的报纸达数千份,其中2月6日这一天,国民党宪兵不仅将一板车《新华日报》全部没收,还扣留了拉车的工人。周恩来得悉后,立即向国民党的谈判联络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并亲向国民党宪兵当局交涉,迫使其发还了被没收的报纸和放出了被扣人员。在此前后,《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先后五次致函国民党当局,对迫害《新华日报》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6月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才复函说:"已批复对《新华日报》予以保护"。

宋庆龄等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电

1941年1月12日,国民党元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谴责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积极实行"剿共"分裂政策。电报说:"最近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电报要求蒋介石"慎守总理遗训,力行先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宋庆龄等此通电的发表,获得国内外抗日势力和爱国人士的一致支持。

省临时参议会举行临时大会

1941年1月18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临时大会在成都举行，会期三天，20日闭幕。前一日预备会议通过新任议长向传义推出民、财、教、建、保五组审查委员。会议审核了省政府民国30年度施政计划和收支预算。会议通过议长、副议长人选。省政府主席张群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和闭幕式上讲话。

四川省政府民国30年度施政计划围绕以下中心工作进行：①实施地方自治，彻底整编保甲，确立户籍行政，健全乡村警政；②调整财政机构，厉行公库制度，整理县市财政，强化经济建设；③推行国民教育，培育师资力量，改善教师待遇；增加教育经费；④促进农村事业，增加粮食生产，推广蚕丝棉业，举办水利，开发交通，调整物价；⑤禁绝鸦片种植，肃清烟毒。

四川财政收支预算为：总概算138252057元（后经国府核准为139832243元）。田赋，按照民国29年（1940年）度增加167%；营业税增加160%；自本年1月1日起加收国难费0.1%。

1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伯申已就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经依法另选向传义为议长，唐昭明为副议长。

四明等8家银行钞票在川通行

1941年，行政院通令各省，对四明、中南、中国农工、中国农商、中国实业、浙江兴业、中国垦业、中国通商8家银行的钞票，一律行使。连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共计12行钞票在全川通行。

著名作家洪深全家三口服毒

1941年2月5日，在重庆的著名剧作家洪深，在饥寒交迫与政治迫害的艰苦煎熬中，留下“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的遗书，全家三口服毒自杀。郭沫若闻讯与医生前往急救，才得脱险免难。洪深的自杀，反映了当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吃不饱、穿不暖、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1942年12月30日，重庆戏剧界集会庆祝洪深50寿辰，300人参加，老舍主持。郭沫若致颂辞，提出应学习洪深思想之深邃宏博，生活之艰苦及作品之丰富。洪深致谢辞，表示决心为戏剧事业的发展而奋斗。

万县发现活化石——水杉

1941年2月，中央大学教授干铎在四川万县磨刀溪发现化石植物现代种水杉。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erboides Hu et Cheng）是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古老树种，即孑遗植物，1941年2月中央大学教授干铎在四川万县磨刀溪（现名谋道溪）发现一落叶古树，高30余米，胸围7米，十分罕见，因无叶，未采得标本；1943年中大王

战教授采得标本，见树下有一小庙，横扁上有“水杪庙”3字，并将标本转交中大郑万钧教授，郑见标本后认为可能是一新属或新种，由于重庆无足够资料，他便将标本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请代为鉴定，该所研究人员在1941年日本植物学杂志上找到依据，认为是一化石植物的现代种。化石植物现代种水杉的发现轰动了植物学界，认为是20世纪生物学的重要发现之一。

美总统特使柯里访华，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华抗战

1941年2月上旬，美国总统私人代表、总统经济顾问克劳林·楂里博士、秘书代普莱奉命首次访华抵达重庆，与蒋介石、林森等国民政府军政首脑进行了一系列会谈。根据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商讨对华援助问题，2月14日，在英驻华大使馆安排下，柯里秘密会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会谈涉及了国共关系等问题。2月27日，柯里一行离渝飞香港回国。柯里首次访华，确立了美国以全面援华抗日的为核心的亚洲外交基本政策。柯里向罗斯福建议由美国派遣一个经济、政治、运输等方面的专家小组来华监督援助工作。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罗斯福旋即指示柯坦克从速制定援华方案。3月31日，宋子文向美为提出援助要求：供应30个师的全部装备；为修通连接中、印、缅公路的器材；归陈纳德指挥的1000架飞机及飞行员。

4月23日，罗斯福批准启运第一批价值4500万美元的武器，随后又批准运出了第二批价值1亿美元的军用物资。

1941年夏，为了监督援华资金的物资的使用及运输，美国财政部派出了财政及运输小组前往中国。7月4日，滇缅公中运输监理委员会监察长贝克博士飞抵重庆。同时，经罗斯福批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7月初批准建立了以约翰·马歇尔将军为团长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任务是改善滇缅公路运输网，并监督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分配使用。10月，代表团在重庆秘密开始工作。1942年6月，中美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约定双方在战争期间相互供给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美国军援开始大批运抵中国。

1942年6月，中美双方就租借法案援华物资分配问题发生争执。6月29日，蒋介石向美国提出维持中国战区的“三点要求”，并要求美方召加与之意见相左的史迪威。1942年7月21日，美总统特使柯里奉命再次访华抵达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了援华物资、中美关系、英国对印政策等问题。8月7日，柯里返美向罗斯福报告认为美国应尽全力维护中国战区，以便充分利

用战后中国在亚洲的潜在价值，抗衡苏、日。建议撤换史迪威。1942年10月12日，罗斯福答复蒋介石的“三点要求”，同意增加对华军援数量；同意中、英、美共同收复缅甸，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线，但未同意撤换史迪威。同时，在印度兰姆珈尔由美国训练、装备的中国驻印军整训工作正式展开。至1944年10月，美国在印度共训练、装备了中国军队的5个步兵师，7个装甲战车营及特种部队。1942年12月，史迪威向宋子文提出由美方在云南整训中国陆军30个师的计划，蒋介石立即同意。1943年2月1日，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整训新军。云南远征军共整建中央军6个军，昆明行营3个军。1944年4月，开始换发美式装备，共计29个师。中国驻印军和云南远征军都参加了缅甸战役二期作战，收复了滇西、缅北地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为加强远东地区的空中威慑力量，于1942年7月4日宣布将中美志愿航空大队（1940年8月1日成立，指挥官陈纳德）并入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0航空队，编为第23战斗机大队，作为美军驻华部队参战。任命陈纳德为大队长。同时陆续从美国增派大批飞机和飞行员，补充扩大编制。1943年初，改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由陈纳德任司令官。

1942年3月，根据陈纳德建议，中国空军航校14、15、16期共300余名学员赴美接受美军训练，1943年9月以后陆续归国，编组“中美混合空军大队”，由美军提供飞机，投入湘、桂前线作战。至1945年，美国陆续援助中国的各类飞机共计近1400架。

“租借法案”的军援包括海军援助。援助舰艇，到二战结束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战时手手中没有控制。

1941年夏，美国国务院开始制定在教育、工业技术及文化出版方面援助中国的计划。1941年11月，援华文化计划大体完成，1942年正式实施，主要内容为资助中国留美学生；派遣技术专家援华；开展文化合作与交流。

1940年10月10日，英美财政代表团一行3人由港飞抵重庆，监督英美平准贷款使用情况，成员均为财政专家。团长倪米亚爵士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团员柯克朗为美财政部长助手，巴克斯德为缅英政府经济顾问。自10月16日起，代表团成员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财政部长进行了多次会谈。10月21日，柯克朗离渝赴各地考察，倪米亚、巴克斯留渝工作。

日机轰炸重庆、成都等地，重庆发生大隧道惨案

1941年3月开始，日机对四川重庆、成都等战略基地的轰炸进一步加剧。轰炸次数和强度增加。本年日机

对重庆的轰炸集中在5～8月，对成都的轰炸集中在3～8月，打击目标集中在市区，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严重。

（一）轰炸重庆

5月内，日机6次轰炸重庆。2日，英法两国领事馆均中弹被毁。9日，日机袭渝，求精中学、安息会均中弹破坏，英国大使馆又遭损失。10日，求精中学、英国使馆再遭轰炸，房屋毁损严重。

6月5日夜，日机空袭重庆，市民仓惶挤避较场口大隧道内，由于人数大大超过隧道容量，通风机又发生故障，受到窒息的人们互相拥挤，秩序大乱，造成窒息死亡惨案，死亡992人，重伤151人，轻伤数千人。事后，迫于舆论压力，军事委员会将重庆防空司令刘峙撤职。29日，日机63架，分两批袭渝，向市区投弹，死伤100余人，英国大使馆全部被炸毁。

7月，日机8次袭渝。其中，27日，敌机80余架，分三批由鄂袭川，在成都市西南、西北投弹数百枚，市民死伤惨重。29日日机90余架分四批入川，有三批轰炸重庆，重庆市防空警报长达9小时没有解除。日机在新市区一带投弹，苏联大使馆部分被毁。30日，日机130架大规模轰炸重庆，市区遭受惨重损失。停泊港口的美国兵舰图图拉号被炸毁。

8月，日机先后7次持续轰炸重庆，造成市内断电停水，市民断炊失眠的悲惨局面。同时，日机还向国民政府机关和军政首脑的军命部、军政部投掷燃烧弹，军政部大楼全部烧光，破坏严重。仅13日一天，蒋介石的曾家岩官邸三度被日机投弹，均未命中。30日，蒋介石正在重庆南郊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日机突袭，猛炸黄山，炸死卫兵2人、重伤4人；同时，市内国民政府大礼堂全部被炸毁。

（二）轰炸成都

1941年内，日机8次轰炸成都。3月14日，日机31架袭蓉；5月20日，日机21架袭蓉；5月22日，日机54架袭蓉；6月22日，日机9架袭蓉；7月27日，日机108架袭蓉；7月28日，日机再度袭蓉；8月11日，日机100余架袭蓉；8月31日，日机27架先后袭蓉。其中，尤以7月27日轰炸最为残忍。

当天11时许，日机分4批，每批27架，共计108架，连续不断对成都进行狂轰滥炸，向市区和市郊投弹320余枚，炸死市民574人，炸伤573人，摧毁房屋2470余间。盐市口、祠堂街、少城公园、平安桥街、青龙街等地为重灾区，几乎化为废墟。皇城附近的清真寺被炸毁，市郊老西门三洞桥、新南门锦江两岸、新东门猛追湾一带，房屋倒塌，遍横尸首，重伤者的呻吟声惨不忍闻。驻成都的中央防空总监高炮部队对空作战，猛烈还击，击中日机数架，残机坠落郫县、仁寿一带，被击中

日机中有日空军领队奥田大佐，从他尸体上搜出了成都重要机关单位的地形图。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本无暇东顾；加之，我国防空力量加强，除个别入侵偷袭事件外，日军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空袭四川的军事行动了。

12月8日，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日机轰炸重庆达数百次，炸死9218人，炸伤13908人，占全川炸死、炸伤人数的41%和53%。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推动下，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以国共两党之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标志，并订立了信约12条。皖南事变后，他们痛感有加强自身团结与共产党更加密切合作的必要，遂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派出代表同周恩来会谈，表示合作的诚意，盼望中共给予切实援助。周恩来代表中共对他们的要求深表赞同，并派人协助其尽快组织起来。1941年3月19日，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李璜等17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秘密成立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推定了常委和各方面负责人，黄炎培任主席（是年冬改由张澜继任）。9月，在香港出版发行机关报《光明报》。10月在《光明报》上正式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表政纲和宣言，提出了贯彻抗日，加强团结，争取国家独立，结束党治，实行宪治，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政治主张。

韦鼎烈等创中国滑翔新记录

1941年4月4日，中国滑翔运动员韦鼎烈、韦鼎峙驾驶中山、中正号滑翔机由成都至重庆拖曳成功，创造了中国第一，远东第一的新记录。

省务会议通过粮食增产方案

1941年4月11日，四川省政府委员会议通过“四川省民国30年度粮食增产方案”，规定增产途径为：(1)增加粮食作物栽培面积；(2)增加每单位面积产量；(3)减少粮食损耗；(4)补充农业劳力。由省府成立粮食增产委员会，督导推行全省粮食增产事宜。7月17日，川省府拨款480万元，救济旱灾县区农民，并制发四川省各县防旱

补籽贷款实施办法。

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第四届会员大会

1941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本日在重庆举行第四届会员大会。该会拥有178个会员工厂，计分钢铁、电气、化工、制盐、制烟、染织、教育仪器等14类。本届会员大会主要议题为："如何增加生产力量"。

粮食产供销管理办法

1941年4月24日，粮食供应问题日益严重，川省府规定粮食管理5项办法：①粮食买卖，必须集中在指定市场；未经获准的商人，不得经营粮食业；②粮食运输，由绥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团队保护；③所有粮食（包括农户余粮）必须登记；④凡由县派令出售粮食供应市场之粮户、农户，必须照遵售出；⑤凡隐匿不登记之粮食，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5月27日，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同向四川派遣督粮特派员分赴四川四个督粮区督粮；在特派员下，另派县督粮委员分赴各县协助地方政府推行粮管政令；督粮委员兼任行辕军法官。

6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后，本日又公布：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西5省为"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实施区域，25日又加入重庆市。

7月1日，粮食部设重庆民食供应处。

9月1日，四川省粮政局成立。

9月8日，粮食部成立修建四川粮食仓库工程处，决定先在14个区修建仓库96所，库容100余万市石。

10月5日，粮食部在内江设立第二民食供应处，负责内江糖区、自贡盐区的民食供应。

10月20日，粮食部在绵阳设立第三民食供应处，负责川北盐区的民食供应。

省务会议核定民国30年度地方财政预算

1941年5月6日，川省各县市民国30年度地方财政预算，经省务会议核定，总数为2.1亿余元，其中以第三区各县为最多，共2500余万元，以第十六区各县为最少，共计200余万元。川省民国29年各县市地方财政预算，总数为7000余万元，本年度因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增加200%。

五通桥盐场电力采卤成功

1941年5月，犍为盐场采用电力推汲卤水，产量成倍增加。

井盐生产，长期采用人力、畜力推车汲卤。1902年开始出现蒸汽卷扬机汲卤，使汲卤动力发生一次飞跃。1941

年初，岷江电厂完成第一期工程，犍为场灶户许友昌在牛华溪川南机器厂订造电力绞车1台，5月在五通桥党家沱的宝昌井安装试车，运转良好，该井卤水生产由月产盐30吨上升到50吨，自此开始了井盐生产的电力采卤新历史。

康定等地地震

1941年6月12日7时13分康定、金汤发生6级地震。金汤房屋倒塌甚多，牲畜多罹其灾。岩石崩溃，声如巨雷。庄房沟地面折裂。宝兴正街一碉楼震倒。康定城内倒墙数处，岩石有崩裂。中江城东5里许之何家碾倒塌房屋数楹，压毙一人。泸定沙坝一农民被震坠崖跌死；安乐坝一倾斜房屋倒覆，全家打伤；县立民众教育馆当门之御碑（清康熙时所建）震倒，飞石打坏民教馆门墙。

地震波及天全、泸定、什邡、成都、大邑、乐山、荣县、资中等地。

成都发生抢米风潮

1941年6月28日，米价持续上涨，粮商囤积惜售，成都发生抢米风潮。29日，蒋介石电成都行辕、川康绥靖公署，令对成都抢米风潮，迅筹善后措置。

四川农业合作事业的广泛推广

1941年7月6日，成都举行国际合作节第19届庆祝会。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自1935年成立以来，到1939年底止，共发农贷2700余万元。所有农贷，皆由合作社集体贷款。全川有130余县成立了合作社，入社户数达150余万户。1940年1月6日改组后确定的三项中心工作：①普遍建立合作组织；②发展特产产销合作；③推广出征军人家属合作组织。据四川省主席张群在报告会中说：今日川省已成立的合作社共2.4万所，经放贷款逾6400万元，每年减轻民众负担计130万元，增加社会财富达1.2亿元。

田赋征实

1941年7月24日，四川省政府奉行政院电令：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8月，国民政府直接掌管各省田赋。行政院公布《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财政部成立田赋管理委员会。川康两省田赋管理处相继成立，并接管土地陈报事宜；各县征收局于8月底撤销，改组县田粮管理处，9月1日成立。蒋介石手令，饬川省府将田赋征实列为“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切实推行”，川省府制定征实征购实施办法，通饬各县自1941年9月16日起一律照令开征。征收的方法规定：以1940年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0.8公斤），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由税务、粮食部门负责办理。川康两省还分别制订收购粮

食的办法、随赋收购粮食的标准、征购粮食的价格及其还款的交付等。1942年颁布随赋带征县级公粮及其有关规定。1943年又将征购改为征借，征借种类包括征借、累进征借。征借办法为不付现金，只付粮食库券。田赋征实与征借使国民政府获得了充足的粮食用以保证军需民用。

1941年9月16日开征，至次年2月底，四川省实收总额1330余万市石，超过原定计划数1200万市石的11%，为全国第一。占全国21省、市征实、征购总额的1/4。

1944年6月17日，蒋介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肯定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四川征收粮食的数量甲于全国各省。据粮食部统计，四川省1941～1949年田赋粮食征实、征购总额为89.33亿公斤，占全国同一时期粮食征实、征购总数的22.6%。

重大因拒派校长，被解散整理

1941年9月5日，重庆大学拒绝新任校长梁颖文接任，被教育部下令解散整理，惩治肇事学生。自上月19日省立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辞职，行政院任命中央设计局主任秘书梁颖文为重大校长后，学校发生学潮。9月1日，学生殴辱新任总务长李某，追逐新任校长梁颖文。教育部以整饬校风为由，作出将该校解散整理的决定。

9月8日，在省政府纪念周会议上，主席张群报告了重庆大学的学潮事件。

蔗糖产销专卖情况

1941年9月9日，行政院通过《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从1942年1月15日在川康两省开始对食糖采取专卖政策。四川为全国蔗糖主产区，1937年全川年产蔗糖219.3万市担；1938年259.4万市担；1939年165.5万市担；1940年327.3万市担；1941年220.9万市担。为获取专卖收入，国民政府规定专卖的方式为“商制、官购、商销，”政府从中独占批售利润。食糖专卖局为推广川糖销售，于1942年6月分别在西安、老河口设立运销处，办理对西北地区及豫鄂两省的运销工作。1942年川糖年产仅130万市担，尚不及原产之半。1943年10月4日，川康食糖专卖局提高食糖价格，不分产区销区，一律照中糖议价，按原价提高50%。当年专卖利益已收足1.58亿元。到1944年3月18日，川康食糖专卖利益达2.8亿余元，超出征额8000万元。1944年8月1日，开始对川康区食糖实行征实，征实额定为50万市担。

平准基金委员会颁布国内持照及特许银行买卖外汇办法

1941年9月15日，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立，平准基金委员会规定国内

持有执照或特许银行买卖外汇办法。自本日起，凡进口商需用美元或英镑外汇时，经平准会或其指定的代理机关核准，小额交易在美金2000元或英镑500镑以内，个人零星汇款在美金200元或英镑50镑以内的，由各该银行售给外汇。但已向平准会购得外汇的申请人，应将在市场购进的外汇售给各该银行，否则以后不再核给所需的外汇。11月23日，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开始在重庆供给中外商人进出口贸易外汇。

川盐空前增产

1941年秋，沿海盐区沦陷，川康盐务局奉令尽力增产，盐务总局举办“增产加运大借款”，四川得8000万元。各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开发深井，增辟卤源，开发利用天然气，增设炭花灶，加紧生产，以供应湖南、湖北、四川、陕西、西康、云南、贵州7省军需民食。1941年产达987.8万担，占全国盐产量的51.50%。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川盐占全国盐产量的比重已高达63.94%。随着产量上升，四川盐税收入也迅速增加，1942年达63571.4万元，为1937年的22.7倍，占全国盐税收入的44.23%。

省银行、中农行在川设购粮机构

1941年9月，四川实行田赋征实。四川省银行受省府委托，与农民银行在全省普设购粮机构240个，两行各半，负责发行粮食库券和供应法币。省银行为此增设购粮财务管理处主其事。

四川粮食储运局成立

1941年10月1日，由四川粮食购运处改组的四川粮食储运局在重庆成立。局长康心之，副局长赵述言同时就职。前四川粮食购运处，即日办理结束。1942年1月27日，行政院任命康心之为四川省粮食局局长，原代理局长刘航琛改任四川省粮食储运局局长。全川设重庆、泸县、大竹、南充、宜宾5个分局，并以各县县长兼任本县仓库主任。

黑水地震

1941年10月8日23时24分20秒黑水一带6级地震，震中烈度8度。县城附近及黑不寨、大小瓜子等地土石房屋全部倒塌，压死人畜甚众，财产损失数十万元。茂县、汶川、成都、眉山、乐至、江油、彰明等地亦感地震。

中国戏剧节公演活动在重庆展开

1941年10月10日，中国戏剧节公演活动在重庆展开。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重庆多雾，敌机轰炸基本停止，为躲空袭而下乡的文化界人士和各剧团大都返回市内。因此，这个季节成为戏剧演出和开展各种文艺活动的黄金

季节，进行大量的雾季公演。1940年1月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加紧反共和压迫进步人士活动，使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庆的政治空气沉闷压抑。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这个雾季公演的机会，巧妙地运用当时的戏剧演出，作为打破政治上沉闷空气，继续推动文艺运动的一个突破口。由于中共南方局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著名的进步的文艺界人士，因此，面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民主的戏剧活动得到蓬勃发展，雾季公演便发展为“雾季艺术节”。从本年度到1945年连续5年的雾季艺术节中，仅演出的大型剧目就达100多个。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等剧团，先后演出了陈白尘作的五幕话剧《大地回春》、郭沫若作的五幕史剧《棠棣之花》和五幕话剧《屈原》、阳翰笙作的六幕话剧《天国春秋》、夏衍作的五幕话剧《法西斯细菌》、曹禺作的四幕话剧《蜕变》、吴祖光作的五幕话剧《风雪夜归人》、夏衍、宋之的、于伶合作的《草木皆兵》、欧阳予倩作的五幕话剧《李秀成之死》、茅盾作的话剧《清明前后》等一大批戏剧。其他如小说、美术、音乐、诗歌等文学艺术活动，也在重庆和全川许多地区得到广泛的发展。

中华剧艺社成立

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在重庆成立，并举行首次演出。该社是阳翰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筹建的民间职业剧团。皖南事变后，进步电影摄制工作陷于停顿，大批电影工作者转入戏剧战线，“中艺”就是以电影从业人员为骨干组成的，主要负责人为应云卫、陈鲤庭、陈白尘等。该社从成立到1946年5月结束，时跨6个年头，并以重庆、成都为演出阵地，曾到北碚、乐山、自贡、泸州和内江等地公演，先后演出过《屈原》、《大地回春》、《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复活》、《风雪夜归人》、《家》、《升官图》、《孔雀胆》、《忠王李自成》、《钦差大臣》等内容深刻、风格多样的剧目。其中，《屈原》是“中艺”的代表剧目，该剧的空前优秀的演员阵容，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水平。《屈原》公演成功，惊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治区，出现连续半月售座场场暴满的盛况。“中艺”为配合抗日民主运动，打击反动文化逆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大会在重庆举行

1941年11月16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和安排，重庆的文化界和各方面人士举行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大会。周恩来在筹备这个大会时指出：为郭沫若作寿是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大会

举行时，会场上高悬“以清妖孽”四个大字，冯玉祥致开会词。周恩来、老舍、黄炎培、沈钧儒等先后在会上致词。《新华日报》出版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头，并撰写代社论《我要说的话》，文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和创作生活作了高度的评价，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大会筹备组还举办了郭沫若生平及作品展览，并决定在本月20日起演出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同时，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也先后举行了纪念活动。这种纪念会，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群众活动，是对国民党实行的法西斯政策的一次有力回击。此后，在重庆曾多次举行了类似的祝寿和庆祝创作生涯的纪念活动，成为中共组织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团结群众的一种活动形式和工作形式。

收回地方税课

1941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取消省级财政，收回地方课税。随着国民政府统治区通货膨胀的日趋严重，财政赤字愈益增大。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及6月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作出“实行战时新财政政策的决议”。决议要点为：①改变财政收支系统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二级制，取消省级财政，将其并入国家财政系统。②调整提高各种税收。③举办专卖。11月，《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公布。1942年1月，四川省府随即照条实施。

川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轰炸威克岛、关岛、马尼拉、新加坡、香港，并袭击北平、天津、上海的英美驻军，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香港后，加强了对大陆
中南地区的攻势，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

同年12月13日，日军第11军团司令官阿南维畿命令第2、第6、第40等师团准备进攻江南地区；同时命令驻南浔铁路沿线的第34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策应作战；并令江北各兵团完成战斗准备，防备中国军队反攻。16日，湘北前线的日军集结于岳阳以南地区。20日，第6师团集结于新墙附近至新墙下游右岸地区，并将主力推进到河岸。21日，第40师团进入箕口东北11公里处。

中国方面第9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迅速补充整训，充实了战斗力，战区司令官薛岳命令第10军军长李玉堂加强长沙附近的防御工事和通讯设施，构筑了岳麓山重炮阵地。川军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领第58军、20军、第37军与湘北岳阳、鄂南通城日军对峙，采用纵深防御战略，构

筑密集的工事，加强战备。第20军担负新墙河以南地区防务，军部驻平江水口桥；第37军担负汨罗江以南地区守备任务第58军担负通城至黄岸市地区守备任务；（其主力部队驻扎平江地区，作为机动部队）。长沙会战前夕，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奉命率新15师和第78军从赣北开赴湖南平江地区，与薛岳拨调给他指挥的第37军一道，担负聚歼逼攻长沙的日军主力的任务。

12月24日，日军强渡新墙河向南发动进攻。川军第20军133师在汨罗江以北，新墙河以南地区坚持阻击日军，血战七天，以掩护战区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134师迎头痛击来犯日军后，沿岳阳至长沙大路构筑工事，阻击日军后续部队。川军第30集团军78军向平江以北追寻日军主力，第37军歼击福临铺之敌后，集结待命。

在1942年1月上旬日军发动的长沙攻城战中，川军第27集团军第20军、第37军、第58军分别在新墙河以南、西影来山、福临铺以东阻击日军后勤工程兵部队和沿粤汉路南下的日军，川军30集团军第78军在长沙东南迎战日军。两支川军在围歼攻城日军、截击北溃之敌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表现出川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财政部颁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1941年12月9日，财政部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15条。除县银行及侨资内移设行者外，不准新设银行。银行设分支行，应先呈部核准。1943年2月17日，财政部再度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规定除县银行外，不得新设银行，华侨内移资金也不准新设银行。

川康建设期成会在渝举行第三次全会

1941年12月12日，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体会员会议。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列席。该会主任秘书报告过去会务概况，各办事处主任李璜、黄炎培、冷祐、张澜、褚辅成、林虎、莫德惠分别报告各该处工作区域内关于治安、禁烟、兵役、吏治、粮政、新县制等各方面的情况，随由川康两省主席报告过去一年各该省的施政情况。

中央银行发布存放款管制办法

1941年12月22日，中央银行训令银钱业公会，规定《比期存放款管制办法》6条。内容为：比期存款利率由公会于比期前两天报中央银行核定；比期放款不得超过存息2厘。每届比期，需款行庄可申报缘由，提供保证品，向中央银行请求放款。中央银行可

随时进行检查。

中、英、美召开东亚军事会议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美三国在重庆召开了“东亚军事会议”。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国民政府于12月8日对日正式宣战。1941年12月22日，英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将军与美国陆军航空兵总司令勃勒特将军自仰光飞抵重庆，当晚拜会蒋介石。在2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三方商讨了共同作战问题，议定，如日军入侵缅甸，中国将派陆军助战，美国负责供应战略物资。24日，魏氏、勃氏同机离渝飞仰光。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中国正式加入同盟国作战。1月3日，同盟国决定组建中印缅战区，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总司令。

抗战中四川征粮总额

1941～1945年，在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粮食政策的五年中，四川成为中国战时粮食的主要供应基地。自1941年8月改制，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对四川下达的粮食征购(借)总额为8400万石。四川实际完成的收仓粮食数字为8382万石，仅欠18万石，达到99.8%的良好结果。

据粮食部统计，1941～1945年五个年度中，全国田赋征实，共收谷、麦2.6亿多石，上述四川征实总额，已占全国总额1/3。

1941年金融物价概况

1941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发行总额为78.7亿元，发行指数为1076%，较上年增长92.2%。同期，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2737%，较战前增长114.4%，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3.65%。

四川外贸概况

1941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经由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3610万元，其中洋货直接进口货值910万元，土货复进口货值2700万元。出口货物总值2020万元，其中土货直接出口货值350万元，土货转口出口货值1670万元。全年进出口贸易总值5630万元。

本年运输困难妨碍了重庆对外贸易。由于大批运输工具被征作军用，公路的货运量大大下降。特别是第四季度，滇缅公路完全被用于军需品运输，货运基本断绝。上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飞机严重破坏了重庆的工厂，工业遭受巨大损失，直接影响了对外贸易。上年6月宜昌和沙市陷落以后，长江中游的水运完全中断。

1942年(民国31年)

部分日用品实行专卖

1942年初,财政部开始实施食盐、糖、烟、火柴等日用消费品的专卖,以保证军需民食。对食盐供应,自1月开始,政府实施盐专卖法,对盐的产运销实行统一管理。制盐人按规定数额生产之盐,全部缴存政府指定之仓,由专卖机关统购统付。官收分为"给价官收"和"贷款官收";运输以委托商运为主,以政府自运或招商代运为辅;销盐以"官趸售,商零售"为原则;盐税改称"专卖利益",成都、重庆、雅安实行限价,以后各县市又实行计口授盐。专卖法的实施,保障了7省的食盐供应,增加了国库收入。1942年所收专卖利益即达35000余万元。

1月16日,川康区食糖专卖局成立,于2月15日起,实行战时食糖专卖办法,停征统税。5月1日及7月1日,川康两省先后对火柴及菸类开始实行专卖,均倍征统税改征专卖利益。此项专卖制执行两三年,于1944年下半年起先后停止,仍恢复征税。

省财政收支纳入国库

1942年1月1日,中央划分收支系统,开始实施《国库统一处理各省收支暂行办法》。四川省级财政收支一律纳入国库,作为国家收支统一处理。改行国县两级财政后,原有省级税收归并入中央。3月1日,营业税移交财政部直接税处接管。

财政部定桐油、猪鬃、茶叶、矿砂为统购统销物资

1942年1月12日,财政部定桐油、猪鬃、茶叶、矿砂为统购统销物资,并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富华两公司合并改组。凡外销物资,均由该公司统购统销,各省营、民营公司不得经营。统购统销之外的物资,允许自由经营,但所得外汇,必须交与政府。川省出口的桐油、茶叶、猪鬃,因受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海运受阻,经行政院经济会议核定:一面维持出口统制,一面放松内销限制。桐油准许商民采购、存储、转运;原征的茶叶平衡税停征,准运销全国;取消对猪鬃存储时间及数量的限制;并协助各厂将桐油提炼为汽油、柴油。1943年3月再以"促进外销争取外汇"统购了生丝,同年5月统购统销了羊毛。统购统销使售价低于成本,农民砍伐桐树,货弃于地,桐油从150余万担减至几无数字可寻,蚕丝只存1/10。1945年10月9日行

政院会议决议取消茶叶、桐油、生丝、猪鬃等统购统销办法，撤销贸易委员会。

食盐专卖由财政部盐务总局主办。糖和烟类，另设专卖局筹划管理，火柴则设专卖公司主办。这3种专卖分别于1942年2月、5月和7月先后于四川、西康等地区实施，逐渐推广。食盐专卖采取民制、官收、官运、官专卖的制度。糖、烟类和火柴专卖办法，名义上与盐专卖相同，实际上并没有收购，只由专卖机关将已核定收购价格的品种，按数配给各承销商号，由它们向制造厂商缴款承购，并向专卖机关缴纳专卖利益，逐件(包)领、贴专卖凭证，以资证明。

1942年7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条例》，自8月1日起在川康两省及鄂西区域实施。烟叶是四川大宗商品，什邡县制"淡巴菰"卷烟，销售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及苏联。1943年全川烟叶产量1024000市担。1945年全川菸叶种植面积100万市亩，年产300万市担。菸类实行专卖以来，到1942年12月30日，重庆共获专卖收益2300余万元。1943年度，渝蓉的烟叶专卖利益，重庆为1.12亿元，超出预定数额1200万元，成都为3000余万元。1945年2月，烟叶停止专卖，改为征税。

专卖收入的增加，多系货币贬值所致；而专卖机构冗员充塞，其业务人员经费竟占专卖收入的60%以上，因此专卖政策受到公开的指责。从1944年7月起，国民政府对糖废止专卖，改行征收实物。1945年2月起，食盐、烟类及火柴也同时废止专卖，恢复征税。

中共组织在重庆、成都部分大学生中建立"据点"

1942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成都部分大学生中着手建立"据点"。据点是为适应当时党的组织停止发展，而一些进步青年又迫切要求组织起来，接受中共组织的领导的情况而建立的。据点是一种没有统一名称，没有固定形式的中共组织的外围组织。到本年底，由南方局青年组直接和间接联系的各据点进步青年有250人，其中重庆有186人。以后，据点继续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已在一批大中学校、工厂、公司中建立起来。1944年以后，在据点的基础上，在成都建立了"民主青年协会"，在重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它们都是中共在四川省内较大的秘密外围组织，是中共组织在成都和重庆的学生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

川康兴业公司成立

1942年2月1日，川康兴业公司在重庆成立。该公司旨在吸收民间游资从事生产建设，开发川康两省经济。

行政院指派张群为官股董事长，顾翊群、秦汾、卢作孚、黄季陆、邓汉祥为常务董事，邓锡侯等9人为董事，潘文华等6人为监事。商股董事钱永铭等12人，监事康定恕等5人。资本7000万元，其中官股4000万元（中央股3000万元，四川股700万元，西康股300万元）；商股3000万元（重庆1800余万元，成都1100余万元）。迄本月股款7000万元已全部认足，实收股款6074万元。该公司成立后，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撤销。川康兴业公司首次董监事会议上，董事长张群提名聘邓汉祥为总经理，陈介生为总稽核，何北衡、戴自牧为协理。商股董事推选钱永铭为副董事长。

蒋介石出访印度

1942年2月4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随员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等，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陪同下离开重庆前往印度访问。2月5日抵加尔各答，9日抵新德里。10日会见印度总督林里格罗。11日会见印度 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和阿柴德。18日在加尔各答会见甘地。2月21日，蒋介石一行飞返昆明。1942年5月，中印双方互在重庆和新德里设立了外交专员公署。

花纱布产销管制办法

1942年2月13日实行棉纱统筹供销办法。物资局长何浩若发表谈话：纱价提高为6900元，由农本局统购统销，按原价直接售与用户；同时登记存纱，由政府定价收购，并采川花易纱换布办法。3月14日，物资局公布“统筹棉纱平价供销办法”，和“物资局对于直接用户请购棉纱暂行供应办法”。4月，公布“统筹棉花管制运销办法”、“农本局委托代理收换织物办法”，利用原有的纱号代办以纱易布的业务。10月，物资局颁发“管理直接用户织成品暂行办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花纱布管制的领导机构，1943年2月2日，国民政府将农本局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专责管制花纱布，隶属财政部。6月15日，蒋介石电军委会及行政院，分别通令各军政机关，整肃花纱布管制纪纲，严厉惩处营私舞弊或利用职务乘机牟利及一切机关团体套购渔利或冒领滥用者。

在花纱布管制过程中，对公教人员所需棉布采取定额平价供应。抗战结束，花纱布管制停止“以纱易布的办法”，并改变“配售民用布办法”。

中国银行等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

1942年3月25日，财政部公布

《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办法》8条。由财政部拨基金1亿美元存入中央银行，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及中信、邮汇两局负责发行美金储券，分10元及不定额两种，后者供大额填用。每100元法币折合美金5元，利率为1年3厘，2年3.5厘，3年4厘。4月1日起开办。1943年8月1日，四行两局奉令停售，该券自发行以来，总额美金1亿元已将售完。停办的原因，据分析为：①已收到法币回笼的效果；②防止敌奸套购；③防止从中渔利。

国民政府在川发行关金券

1942年4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以筹供中额钞券以应市面需要为词，令中央银行将库存关金券陆续提出发行。规定每关金1元折合法币20元，与法币同样行使。关金券面额计10分、20分、1元、5元、10元5种。发行关金券始于1931年5月1日，当时仅限于商人用以缴纳进口关税，照面额行使，发行数额不大，流通区域以上海、天津为多，福建厦门次之。

中国首座跳伞塔在渝落成

1942年4月4日，中国第一座跳伞塔在重庆建成并举行落成典礼。国民政府要人于右任、白崇禧、张治中等到会祝贺，贺耀祖代表蒋介石致辞，上万市民观看了跳伞表演。

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第五届会员大会

1942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第五届会员大会。依照国民政府颁布的《人民团体组织法》，再次修改章程，执行委员会改为理事会，设理事21人，候补理事5人，理事长由胡厥文担任。监委会则改为监事会，设监事7人。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宗旨和任务作明文规定如下：

第二条“本会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协助各厂迁川恢复生产，增强国力，并于抗战胜利后，协助迅速复员，增加生产为宗旨。”

第四条“任务”：①关于会员工厂迁运入川之协助事宜；②关于会员建厂之购地及设计事宜；③关于会员工厂状况之调查及统计事宜；④关于会员工厂业务之调查及指导事宜；⑤关于会员工厂技术之研究事宜；⑥关于会员工厂纠纷之公断事宜；⑦关于协助工厂请求借款及津贴事宜；⑧关于会员物品之审定事宜；⑨关于政府委制各项物品及会办事宜；⑩关于购办及检验工业原料之供应事宜；⑪关于协助会员工厂之复员事宜；⑫关于其他一切有关第二条宗旨之事宜。”

至于入会条件，第六条规定：“凡各省之工厂迁移入川者，由本会会员工厂两家以上之介绍”。入会时会员分为四级。会员代表的产生：“一级会员得推派4人，二级3人，三级2人，四

级1人。”“其表决权、选举权由其所派之代表行使之，每一代表为一权。”

本次会员大会还通过决议，请政府拨出美金借款1亿元作为发行债券保证，以吸收游资供给民营工厂资金，从事生产。并请扩大工矿贷款、确定贷款办法及响应购储美金公债等。20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扶助产业的发展》指出：资金困难，原材料器材涨价速度超过成品，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美开辟“驼峰”航线

1942年4月18日，中美两国合作开辟的、连接中印两国、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国际航线试航成功；6月，正式由中美合办、以美方为主的两国航空公司（美国空运大队和中国航空公司）承担空运任务。美国空运大队负责运输盟国援华军用物资，每月最高货运量达到44000吨。中国航空公司负责民用进出口货物运输，每月货运量最高达2400吨，三年多时间，共运各类货物44300吨。中航增加的航机、一切燃料、配件与经费全由美方负担，并在印度加尔各答设置机组基地。

这条航线的开辟，是盟国对日宣战、对华援助的重要方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新加坡、缅甸相继被日军占领，西南抗战基地唯一的国际陆路交通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新修的中印公路（西昌至印度的萨地亚）路线长、路况差，不能解决战时运输问题。经中、美、英三国商定，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当称“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飞越驼峰的飞机要升空到28000英尺（8540米）以上，以印度的汀江为起点，中国的昆明、宜宾、泸州为终点，航程1000公里。在开辟这条世界上最艰险的航空交通线的过程中，众多优秀的美国飞行员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数以百计的美国飞机被世界屋脊吞没。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

1942年4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民国31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条例》，定额美金1亿元，于5月1日开始，由中、中、交、农四行在重庆发行。年息4厘，1944年起，10年还清。该公债可以法币购买，每100元法币购买美金公债6元。本年度四川摊派1500万元。5月5日，财政部公布《奖励团体及人民承销美金公债办法》。

重庆实行粮食定量供应

1942年5月22日，重庆市民实行立约定量购米，民食供应处预计每月照约发售之米约7万余石。6月15日，重庆对公务人员及其家属生活必需的煤、油、盐、布四类，实行定量分售。

1943年10月1日，省府令各县施行粮食凭证购买制。

11月15日，渝市食糖专卖分局，增设23处供应站，各站每日销糖200斤，按身份证发售，每斤定价35.5元。

陈独秀在江津逝世

1942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国现代思想家陈独秀于本日晚在江津逝世，终年60岁。6月11日，陈独秀遗体被安葬于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邓氏康庄。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清秀才。早年从事反清活动，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1916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理论家之一。“五·四”后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总书记。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8月7日被党中央撤销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中央机构，由他任总书记，并出版《火花》期刊。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5年之久，1937年8月获释。1942年5月27日病故于江津。

中农行统一接办合作金库和农贷业务

1942年5月，四行实行业务专业化管理。自6月14日起，原由中国、交通、中信局、农本局在川辅设的合作金库，全部交由中国农民银行统一管理监督。同年7月，四联总处通知：农贷业务由农民银行集中管理。中国、交通、中信局原办农贷业务、机构、人员，一律于8月底前移交农行接办。1944年9月，合作金库业务亦归并农民银行办理。合作金库名存实亡，不再办理存、放、汇业务。

四川内迁金融机构统计

1942年6月前，内迁银行状况：自抗战以来，战区银行纷纷迁川。中、中、交、农四国家银行的总行迁渝，战时全国金融业集于重庆。四行在川境增设的分支行处共达116单位，其中91单位分布于川境各县市，25单位设于重庆市区。与战前川境国家银行总数38处相较，实已增加3倍以上。

自战事发生到本年6月底止，战区各银行之移设其总行于重庆者，共有9家。其中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各4家，省地方银行1家。各省省银行在渝增设分支行处者，共有9家，战区及后方各省商业银行来渝增设分支行处者11家。由省外移设重庆的政府银行共14家，其增设的总分支机构则为33行处。省外移渝的商业银行共15家，其增设之总分支机构为20行处。由省

外移重庆的各类银行行处数目，共达53个单位。

中共建立新的川康特委

1942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成立新的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鉴于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的逆转形势，周恩来指示，新的川康特委的任务是按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的指示，做好秘密工作，要求党员找公开职业作掩护，首先站稳脚跟，埋伏下来，再根据形势发展开展活动，不要轻举妄动。

省府实施地价政策，财政局开征地价税

1942年8月8日四川省地政局决定在川省各区择18县成立地籍整理处，实施地价政策，由财政局开征地价税。已在泸县等10县成立，办理土地测量、登记及规定地价。限4个月完成。

1943年4月3日，地价税与地价增值税。次第开征。重庆市税额本年度定为3亿元。

10月23日，川省府决定，完成地籍整理的成都等80余县市，开征地籍税。全省本年征额为1亿元。12月25日，川省本年度土地税，已在32县市开征，截至本月中旬止，地价税已收300余万元。

1944年3月17日，川省本年度土地税总额定为4.2亿元。

1945年5月20日，川省府通令整理地籍后的各县，开始征收土地税，以税收的15%作为地方财政收入。

川军参加浙赣会战

1942年9月，参加浙赣会战的八十八军所属川军新编二十一师，自松阳地区向盘踞在缙云、武义、永康地区的日军发起攻势，推进至雅畈一线，所部六十一团收复武义县城，六十三团经过强攻夺回永康县城，追敌至上下茭道一线。

陪都首届体育节及第二届运动会开幕

1942年9月9日，陪都首届体育节及第二届运动会联合庆典开幕。运动会至10月20日结束。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并出体育特刊祝贺这一盛会。特刊发表了毛泽东“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题词，董必武、叶剑英、李富春、冯文彬等中共驻渝人士亦题词或发表专题文章。

“联合国艺术展览”在重庆开幕

1942年9月18日，由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展期3天的“联合国艺术展览”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揭幕，并举行开幕仪式，招待各国驻渝使节及新闻界。国府官员吴铁城、张道藩、潘仝展，美国大使高斯、英国大使

薛穆、澳大利亚大使艾格斯顿、荷兰大使白鲁格、比利时代办史迈次、波兰代办德罗霍斯基、土耳其代办明罗斯基、苏联使馆代办及中外新闻记者共百余人出席。展览共有31个国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参展，为抗战期间重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艺术展览。

国民政府与美、英等国商定废除不平等旧约，签定新约

1942年9月，美国向英国建议，两国采取主动行动，与中国谈判废除历史遗留的不平等条约问题。10月10日，美、英分别宣布将与国民政府谈判废约。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将美方草案交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双方在华盛顿正式开始谈判。中英谈判同时在重庆举行。中美谈判较为顺利，中英谈判遇到极大障碍。英国不仅在通商问题上横生枝节，而且坚持九龙租借地不能提前归还。英国首相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演讲时称决不放弃任何一块大英帝国领地。11月14日，英国外交部公开宣布：废除英国在华特权不包括香港归还中国。中方则要求先行收回九龙，作为将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双方僵持，谈判难以进展。此时，日本决定对华特权尽速撤销，并据此与汪伪政权加速谈判“废约”。蒋介石为在外交行动上抢在日伪之前，匆忙决定对英让步，要求英、美在1943年元旦签订新约。英方以未接到本国政府训令为由要求延期，美国亦以不能单独行动婉拒。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与日本率先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定》，宣布“收回”各国租界、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北平使馆区，废除治外法权。1月14日、2月23日，意、德相继宣布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新约同时在重庆、华盛顿签字。

中英、中美新约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内容：废除治外法权；废除《辛丑条约》；交还北平使馆区、各地租界；允许英、美人民在华旅行、居住和经商；双方交换领事及战后商洽商约等。关于通商口岸、船舶停靠权、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等问题，均照议以换文式规定。中英新约还适用于印度；英国放弃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特别法庭的一切权利；放弃要求任用英籍人为中国海关税务司的权利，5月20日，中美(华盛顿)、中英(重庆)同时换文，英、美宣布放弃在中国领水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特权；放弃军舰在中国领水航行、留泊特权。英在华经营航运等事业的一切财产由中国政府收购。新约即时生效。1943年～1945年，国民政府仿照中英、中美新约条款，先后与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丹麦等国订立约，各国在华轮船全部停驶。川江航权是中国首称收回的内河航权。

成都西郊发现前蜀王建陵墓

1942年9月，因挖掘防空洞，偶然发现排列整齐的砖砌地下建筑。华西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闻讯前往考察，断定为一座古代陵墓。经四川省古物保管委员会和省博物馆组织发掘，专家鉴定，这个长期被称为抚琴台的土丘，实际上是五代时期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墓中发现壁画百余幅，以及石刻、石棺及大量文物资料，有重要考古价值。

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来川

1942年10月1日，美共和党领袖威尔基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访华，由兰州飞抵成都，受到成都中外人士600余人欢迎。当天，威尔基在成都参观华西协合大学，游览成都市区。10月2日下午飞抵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各国驻华使节到机场迎接。3日，威尔基分别会晤了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林森等国民政府军政首脑。4～5日，威尔基与蒋介石就中国与盟国的合作、战后世界问题美对华军事、财政援助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和磋商。会谈期间，威尔基参观了重庆的工厂及各大学。6日，各国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国文化运动委员会、国联同志会等18个文化团体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联合茶会，招待威尔基一行。美驻华大使高思、苏驻华大使潘友新、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艾格斯顿、国民政府官员王世杰、朱家骅、冯玉祥等300余名来宾到会。10月11日，威尔基结束访华归国。

英国议会访华团来川

1942年11月10日，应国民政府邀请，由英国议会上院议员艾尔文爵士为团长的英国议会访华团一行4人（团员艾弗亚爵士、下院议员卫德波、劳森，分别代表英保守党、自由党、工党）由昆明飞抵重庆访问。这是英国议会代表团首次访华。国民参政会主席张伯苓、英驻华大使恭穆、中国驻英大使顾维均及各国使节、陪都各文化团体300余人到机场欢迎。当天，访华团与蒋介石会晤，转交了英首相邱吉尔及上下两院议长的信函。11月11日，晋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转交了英王亲笔信。12～17日，频繁会晤国府军政要员，参观陪都教育机构及工厂。19日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24个文化团体在重庆嘉陵宾馆宴请访华团。11月30日，访华团飞抵成都访问。12月1日，在成都市内参观。4日赴灌县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12月11日，离蓉飞抵昆明访问。

财政部训令废除比期存放制度

1942年12月17日，重庆银钱两

业公会议决，并呈财政部，自动废除比期。31日，财政部令，自1943年1月起，废除比期。1943年1月6日，成都银钱两业开会，决定照财政部训令，自16日起废除比期。比期制度的废除，不仅缓解了月半、月底集中收付款项的拥挤紧张现象，而且有利于平抑利率、削弱囤积，但还不能解决黑市借贷问题。

川省电讯网初具规模

1942年11月12日，四川省电讯网初具规模。1937年8月11日，四川省建设厅发表全川乡村电话统计：已架设者153县，有交换机3500部，路线共长53306公里，员工1460人，每年开支经费302800元。至本年，四川省电话管理局已在成都、宜宾、遂宁设立工程区，并将在重庆、达县设立工程区，以管理电话设施。现全川各乡镇已安装电话机5000余部，平均每乡镇均有1部。

中英科学合作馆成立

1942年，为实施中英战时文化合作项目，筹设中英科学合作馆，英国剑桥科学史专家、生物学博士李约瑟和助手鲁桂珍（华籍）抵达四川，进行文化联络工作，结识了大量的中国学者和名人，其中有迁川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全国自然、人文学界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张资珙、刘仙洲、陈邦贤、郭沫若、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王亚南、侯外庐、吴大琨、邓初民等，为中英科学合作奠定了基础。

1943年，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成立，总部设在重庆两浮支路胜利村1号，在昆明设分部。该项目由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经费，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辖的科学促进会提供场地，共有高级研究人员7名（英籍4名，华籍2名，英属印籍1名），由李约瑟主持工作。该馆的中国国内工作与英驻华使馆、中国政府各有关主管科学、工程的部门联系密切；国际联系方面，纯学术活动与英国文化协会所属的科学工作部门联系；在与军事有关的战时应用技术方面及军事技术方面，与英国战时生产部中国办事处联系。该馆还担负向战时中国提供科学仪器、文献、化学试剂、科学信息、学术交流等项目的援助活动。科学合作馆拥有一个专用汽车队，负责从印度、缅甸将援助物资运抵昆明、重庆。

沟通战时中国的中外科技交流，是中英科学合作馆最主要工作，也是最有成效的工作。1943～1946年，该馆向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英、美等国的科学、工程图书及设备，总共赠送外交原版图书近7000册，167种美国科学及工程杂志的缩微胶卷及大量的阅读设备。李约瑟还从中国选取自然、人文学科的杂志和

论文介绍到国外交流、发表，范围涉及19个学科。1943年选送论文80篇，1944～1945年选送108篇，大多数都推荐到英国的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1945年，李约瑟将中国在战时生产的一批科学仪器、标本送至伦敦参加英国文化协会十年展览会。1946年10月，又作为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巴黎举办的国际科学展览会上的特殊陈列展出。

1940年3月，李约瑟离开重庆回到英国，旋即赴法国巴黎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处长。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宣告结束。

增加糖、盐各业贷款，促进生产发展

1942年12月，为扶持川康区糖、盐业的发展，财政部公布《管理经营盐业商人向银钱业借款实施办法》8条，《各区食糖专卖局管理糖业商人向银行借款实施办法》7条，分别规定盐务机关许可的产、供、销三种盐业工商户和经特许的食糖制造、承销两种工商户向行庄借款，应报部备核或由部核给贷款。如有顶冒移用，罚金50%，甚至停止其营业。

12月27日，财政部核准川康食糖专卖局糖业贷款4.4亿元，其中蔗农及厂商生产贷款1.4亿元，由农民银行核放，运销贷款3亿元由中国、交通银行核放。此项贷款2亿元用于贷放资中、内江糖业。

由于政府贷款的扶持，1943年四川蔗糖年产量达181.7万担，食盐年产量达452万担。

通货膨胀的加剧与平抑物价政策的实施

1942年12月，通货膨胀加剧。迄至本月，法币发行总额为344亿元，发行指数为2442%，较上年增长126.9%；同期，重庆趸售物价指数为7776%，较1937年6月增长184.1%，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1.28%。本年实施的平抑物价政策有2月1日经济部在重庆设立物资局，管理日用必需品的供应及价格。2月13日，棉纱统筹供销办法实施。自6月15日起，重庆对公务人员及其家属生活必需的煤、油、盐、布四类，实行定量分售。12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限制物价办法”。蒋介石通电全国，所有物价以11月30日为评定标准，自明年1月15日起一律实行限价。

1942年金融物价概况

1942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发行总额为344亿元，发行指数为2442%，较上年增加126.9%；同期，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7776%，较战前增加184.1%，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1.28%。

四川外贸概况

1942年据重庆海关档册统计：经由重庆海关进口洋货总值16万元，出口生丝和猪鬃分别为1200担和22000担，其余进出口贸易统计不详。

1942年～1943年，重庆贸易仅仅维持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直接的对外贸易完全由政府垄断。后方物价普遍高昂，工业原材料缺乏，此状况仍在迅速发展。

1943年(民国32年)

四川编审县市局地方财政预算

1943年1月4日，四川编审民国32年度地方预算。全川计2市、137县、2设治局、1管理局，共142单位。经省政府全部审定，总计岁入岁出总额各为914127916元，较上年度预算总数570 200 028元，增加60%。在每一单位收支额方面，最高额为成都市，计41064424元，最低额为北川县，计1620017元。在增加比率方面，最高为成都，计增加117%；最低为罗江，计增加14%。

工农业贷款总额投放情况

1943年1月5日，中国农民银行安排今年农贷总额14亿元，分配比例是：农田水利60%～70%，农业推广20%左右，增殖特产约15%，正由四联总处审核。3月10日，中国农民银行决定增放川省农业生产贷款，分配给重庆7500万元，成都5000万元。据《新华日报》揭露，14亿元农贷大部分被盐商借去。

7月25日，四联总处核定本年度工矿事业贷款总额20亿元，其中国营8亿元，民营12亿元，借期延长至半年以上，押品不限于原料，于6月29日开始贷款。据该处对煤矿、钢铁、机械、电机、纺织、化工、面粉、制糖、电力等业需要资金的估计，共为23.5亿元。10月10日，重庆中央银行拨专款10亿元，为厂家购备原料，以其中2亿元代厂购27种，8亿元自购6种。品种有棉花、羊毛、茧、麦、五金、煤、桐油等，仅棉花一种即达5亿元。

本年钢铁工业贷款5亿元中，资源委员会所属钢铁厂2.7亿元，孔祥熙的中国兴业公司1.8亿元，而民营各厂只得到5000万元。

物价上涨与限价办法

1943年1月15日，四川省政府颁布《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实施细则》、

《管制粮食实施细则》、《管制日用品实施细则》，规定粮、盐、食油、棉纱、布匹、燃料、纸张等民用必需品的价格，由当地政府核定，有擅自抬价者，立即取缔，并按军法惩处；对运价、工资亦实行限制。4月21日，川省管制物价联合办事处在成都成立。

华侨兴业银行开业

1943年1月，华侨兴业银行在重庆开业，经营商业银行兼办储蓄信托业务。资本总额800万元，实收400万元，侨领司徒美堂为董事，彭其操、荆有岩先后任总经理。在昆明、贵阳、桂林、西安、韶关、兰州设分行。

英国汉学家陶德斯来川讲学

1943年2月4日，受英国文化学会派遣，英国学者、汉学家、英国东西文化学社牛津大学分会委员、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陶德斯来华讲学抵渝。2月8日，拜访中央研究院长朱家骅、中央设计局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高等教育部长蔡俊时等科教界名人。9日，中英文化协会举办茶会招待陶德斯，国民政府外长兼中英文协会长王世杰、英驻华大使恭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艾格斯顿等40余名来宾出席。2月24日，陶德斯来蓉，在各大学讲学，逗留3周。3月14日，由蓉抵乐山参观，16日在武汉大学演讲，20日赴峨眉山游览。陶氏在西南各地巡回讲学历时一年。

中、英、美召开军事会议，商定攻缅军事计划

1943年2月5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派遣，美国陆军航空兵总司令安诺德、英国陆军元帅狄尔来华抵渝，向蒋介石通报1943年1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召开的英美首脑会议[①]上商定的攻缅计划。2月7日，蒋介石单独会见安诺德，要求美国提供对华空军援助，作为中国支持攻缅计划的条件。2月8日，安氏、狄氏同机离渝返印。

1943年10月19日，中英美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1943年8月，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上决定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任命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为战区统帅，史迪威为战区副司令，准备发动缅北战役。10月16日，英军蒙巴顿中将、美军史迪威中将、索姆威尔中将携魁北克会议决议及邱吉尔信函，由印度来华抵渝，协商攻缅计划。10月1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三方军事会议。中方何应钦、商震，美方史迪威、索姆威尔、阿纳德，英方蒙巴顿参加。英、美将领对攻

① 1943年1月14～23日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召开，会上讨论了同盟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

缅计划作了说明，蒋介石同意攻缅计划，同时又要求将中印航线空运量维持在每月1万吨。会议将攻缅日期定为1944年1月15日。

“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成立

1943年2月，对蒋介石反共本质已有深刻认识的一些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如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郭春涛、朱蕴山等，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关怀和启发下，在重庆发起组织同志座谈会，每月召开一二次时事座谈会，联系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该会初称“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9月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以“民联”名义吸收成员，开展有组织的活动。后来这个组织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在重庆设分行

1943年3月，英国汇丰银行在重庆设分行，由上海分行划拨营运资本8000英镑，折合法币40万元。经理葛瑞，1950年结束在渝业务。

6月1日，英国麦加利银行亦在重庆设分行。由总行划拨5500英镑，折合港币40万元作营运资本，首任经理马康济。1948年12月底，结束在渝业务。两家英国银行，多吸收英籍公司和英镑人士存款，头移存放本埠同业，很少经营一般放款业务。

四川省第一次物产竞赛会开幕

1943年4月1日，四川省物产竞赛会在成都开幕。会中设工业、手工业、农林、水利、矿业、交通、教育、卫生等馆，同时开放。各县参加者60个单位，迁川工厂机关学校参加者74个单位，竞赛品4730件，会期半月。省府主席张群在开幕式致词中说：青羊宫的花会，由来已久，向极繁盛。自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开始，利用这一民间习俗，改组为商业劝工会。终清之世，共举行过3次劝工会。其集会的宗旨，是奖励工业、联络商情，对于各种制造的奖励品计分五等。到民国26年（1937年），因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举办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派本省建设厅长为专任委员，负责征集各地手工艺品，赴首都展览。乃又仿照以前规模，改组为四川省物产展览会，征集各县物产，陈列展览。同时并与首都联络，进而和其他省份出品比较观摩。这一届展览会的唯一宗旨，是籍以明白本省各地出产情形、分布状况和生产方式，重在征集当地特产，供人观览，兼以策励改进。考其布置管理指导介绍等方法，比较前清历次所举办者显然有进步。民国28年（1939年），因空袭频繁曾一度停止。本届物产竞赛会

于4月25日闭幕，各界参观达28.9万余人。

重庆、成都等地实施《票据承兑贴现办法》

1943年4月10日，财政部决定在重庆、成都、内江、万县、宜宾等地，先行实行《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以开拓银行业务，活跃资金市场。票据种类为工商、农业和银行的承兑汇票。票据经背口后得互相买卖，向银行贴现或向中央银行重贴现。贴现率由银钱公会、中央银行公告，并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票据交换。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成立

1943年5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歌乐山下正式成立，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军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这是由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局和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进行情报、气象、电讯方面的合作，并由美方为军统训练和武装特工人员。以后，这里演变成监禁、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营。

隆昌县圣灯山构造钻获天然气

1943年5月1日四川油矿探勘处在隆昌县圣灯山构造开钻隆2井，钻至井深747～748米时发生井喷，继续钻至844.97米事故完钻。同年12月9日在井口压力为34大气压（约3.4兆帕）时测得日产天然气12.6万立方米，并产卤水。钻探前，陈秉范曾于1940、1941年作了两次地质调查，著有《四川石油之新展望》，把圣灯山列为有钻探价值的构造之首，测有1：25000的地形地质图。在《四川圣灯山油田钻孔位置之商榷》文中，拟定4口井位，目的层为香溪统和嘉陵江统。经资源委员会采纳后，又详测了7条地质剖面，绘出构造图。隆2井钻获天然气和卤水后，1944年以柴油吸收法提取天然气中的汽油，成立天然气炼油厂。1946年隆昌地方人士集资开办“隆圣企业公司”，利用隆2井所产卤水和天然气熬盐，生产烧碱和漂白粉。

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进驻川西基地作战

1943年5月，由四川省承建的川西空军基地竣工。5月中旬，美国陆军航空兵20航空队第一批地勤人员分乘12架大型运输机在新津机场降落，以后每天约有20余架运输起落，大批美军飞机陆续抵达川西各工地。至1944年“圣诞”节止，美军常驻川西7大机场的各类飞机在250架以上，各种军事人员8000名以上，美军先后在四川驻扎的地区的：成都（风凰山）、温江、新津、邛崃、崇庆、双流（太平、中兴、彭家、马家场）、酉阳、三台、广元、

阆中、遂宁、南充、隆昌、泸县、宜宾、重庆(白市驿、广阳坝)、大足、江津、南川、灌县、梁山(今梁平)、万县、铜梁、开县。1944年6月16日,美陆军航空兵部队34架B29远程轰炸机群从川西基地起飞首次从中国大陆空袭日本本土。17日,蒋介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谓"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恪尽其国民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营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在渝召开

1943年6月1～9日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后发表宣言,其要点为:(1)战时战后统筹兼并顾。①农工矿互济供需、互相依存。当此外来物资断绝之际,必须妥慎计划,以期自给。②扶持现有产业器材技术及原料,尽可能集中管制,储备分配。③鼓励并控制新兴产业,新办事业。根据军民的需要及原料器材的供应情况,分别予以鼓励及限制。④预筹战后的产业复员。(二)产业合理化与科学管理:①产业组织必须有妥当的配合,规模较小者宜调整合并。②倡导效率水准,鼓励工作竞赛。③提倡制造的专一化及成品的标准化。④加强同业组织。(三)调整矿业统筹运销。(四)粮食增产与农田水利。①粮食增产,应着重缺粮区域。一切技术措施,均应与行改密切配合。②增加棉花产量,管制与推广并行,贷款与运输兼重,并划定川、陕、湘、豫、鄂5省为增产区域。③农田水利。各级政府应遵照非常时期强制修筑塘坝水井法令,督促实施。各省设置直辖于省政府的农林机关。(五)人力动员与人力节约。①产业机关与教育机关密切合作,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②加强对劳动力的分配、技术员的管理、劳动强度的提高。

省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二届一次会议

1943年6月1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成都开幕。议长向传义、副议长唐昭明主持会议,秘书长罗文谟,议员105名,省府主席张群列席,并报告一年来重要施政情况:成立县市各级民意机关;完成征购任务;编写施政计划及择定中心工作等情况。会议于18日闭幕,议案268件。此次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田赋征实案、四川经济建设案、建立乡镇以奠定地方自治基础案等。

本届临参会设在成都文庙后街女子师范学校,活动时期为1943～1945年。

中央银行发行代钞定额本票

1943年,通货急剧膨胀,造币厂日夜赶印钞票,仍不敷调用,市场现钞缺乏。6月4日,中央银行首先在重庆发行多种大面值的定额本票,与现钞

等价行使。此后，成都等地亦相继发行，并允许中国、交通、农民三行视必要亦可发行。

四川开放黄金市场，金价猛涨

1943年6月5日，财政部宣布黄金解禁，原颁取缔买卖黄金各项法令暂停施行，准许人民自由采售，但不得输运国外及沦陷区。四川开放黄金市场后，金价猛涨。8月13日重庆银楼公会评定黄金价格，每两收进为10400元，售出为12400元。

改粮食征购为"征借"

1943年6月20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通过的省政府交议的改粮食征购为征借实物案公布。其内容为：(1)征借数额①征借总额仍照上年度定为1600万市石，计征额900万市石，借额700万市石。②为补救灾歉流滥及抵补减削量重县分征额起见，征借两项，仍借一成分派。③本年度应扣还的民国30年粮库券1/5及其利息约130余万石，应就各县本年度应征总额内照数扣减。④各县征借实物后，除积谷外，其余一切以田赋或谷物为对象的摊筹派募，概须一切禁止。(二)征借标准：①征借划分办理；②征实标准，查考上年情形，切实改进，务须公平。③借粮标准，以收益在150市石以上之户为起点。(三)征借期间，各县开征日期，定为9月16日，但收获季节较迟之县，得展期半月或一月征收，截限日期，照旧办理。

6月22日行政院619次会议决议通过四川省本年粮食征购部分，全部发给粮食库券，不另搭发现金的办法。库券没有利息，自1948年起分5年偿还。

省农业改进所制定推广双季稻三年计划

1943年6月25日，四川省试种早稻南特号、沙吊子、晚稻及晚籼稻混合间种，试验结果，增产40%。省农业改进所制定推广双季稻的三年计划。本年已在川南川东推广约10万亩，拟第一年增产1250万石，第二年预计增产2500万石；第三年预计增产3000万石。

北碚地震台成立

1943年6月，中央地质调查所迁重庆北碚后，成立地球物理研究室，李善邦等人为记录川、滇地震为目的，设计制作结构简单、以机械杠杆放大的地震仪，创建北碚地震台。至1946年该台(已迁南京)共记录地震109次。记录的第一次地震在成都附近，记录最远的是土耳其地震。该台共出观测报告4期，其观测资料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地震资料中心和英、美等国重要地震研究机构交换。这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个地震台，也是抗日战争期

间中国大陆上唯一的地震台。

都江堰洪灾与抢救工程

1943年7月7日，灌县连日大雨，都江堰宝瓶口水位突升至18划尺。正午，金刚坡被淹没，飞沙堰、人字堤溃决，流速每秒高达5500立方米，随水冲下之巨石，有重达1吨以上者，水势之大且猛，为数十年所仅见。都江堰堤堰工程多遭摧毁，内外江各县均因之遭受水灾。省水利局于灾前疏于职守，事后又未积极抢救，致使灾期延达10余日。8月2日，省临时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追究该局失职之责。8月5日，省水利局发表“七·七”都江堰洪水及抢救经过。都江堰抢修工程已全部完竣，省政府令饬各县自行修复河堰。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介石代理主席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上午7：04时在重庆市山洞双河桥官邸逝世，享年75岁。

同日晚11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推选行政院长蒋介石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8月17日，四川各界在成都四川省党部礼堂举行追悼林森主席大会。

省务会议通过县乡财政划分实施办法

1943年8月17日，四川省政府举行省务会议，通过县乡财政划分实施办法。计划分三期进行，此举在于让县乡财政自给自足，担负起本县建设开发，维持地方安定的职责。乡财政收支列入县市预算，先送交县市参议会决议后，连同县市政府每年拟编的下年度施政计划及总概算书9月底以前，呈请省政府审定。于11月底以前公布。

民国33年度省财政预算和县市局地方财政预算

1943年8月19日，川省府制定民国33年度编审各县市地方预算注意事项，及县市总预(概)算岁入岁出科目表，暨各县市局民国33年度编制施政计划注意事项，分饬各县市局遵照；并限令本年9月10日以前，送府备核。

11月11日，四川省民国33年度岁入出预算，经会计处编定为343 441 000元。

12月2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审议省政府交议的下年度财政总预算。

12月17日，全省各县市局民国33年度地方预算(即全省2市、137县、2设治局、1管理局，共142单位的总预算)，业经省府全部核定，总计岁入岁出总额各为2 152 363 868元；较

之本年度预数915 765 611元。(包括追加预算在内),增加146%。

川江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及船员工会联合会成立

1943年8月20日,川江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及船员工会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所有长江、嘉陵江、岷江、沱江、涪江、渠江、綦江、黔江、永宁河、御林河等11区民船公会及船员工会,均派代表赴重庆参加成立大会。8月23日闭会,发表成立宣言,并决议请政府按运输成本核定运费,酌减营业税,制止沿江各县苛扰及非法封船。

重庆商品进出口统计

1943年9月6日,本年上半年重庆货物进口总值为437 815 464元,出超1亿元以上 。进口货物以杂货居第一位,其次为矿砂、钢铁及其制品、药材、棉布、纸烟、植物油、盐、棉花、染料、综、棉纱。

中共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

1943年9月,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南方局,川东特委撤销,在川东地区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书记分别为孙敬文、曾淳,均未建立集体领导机构。重庆市委和北碚中心县委由上川东特委领导,巴县中心县委由下川东特委领导。上下级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工作上努力贯彻中共南方局提出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方针,力求使自己扎根于群众之中。1944年,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撤销,重庆市委和巴县中心县委改由南方局组织部直接领导,一直维持到1946年3月。

川军第23集团军击沉敌舰300余艘

1938年9月16日,川军第23集团军驻防皖南,沿芜湖、繁昌、彭泽等长江要塞布防,扰乱和打击日军舰船西上武汉,8个月来,先后击伤击沉敌舰船300余艘。继6月获港大捷之后,在湾址一带,击溃日军第6师团第12师各一部及台守备队波田支队扫荡军。23集团军(后改番号为50军)获奖金1万元,潘佐部148师师长另获奖金3000元。陈万仞(该部21军军长)记功一次,并荣获华胄荣誉勋章。

常德、桃源会战,许国璋捐躯

1943年10月,日军调集约九个师团的兵力和大批伪军,进犯湖南常德、桃园。川军二十九集团军和七十四军奉命反击,"常桃会战"开始。

会战之初,四十四军在南县、华容、安乡和石首、公安、津市地区与日军鏖战20余日,将日军击溃,且有缴获。许国璋师在虎河两岸及沣县、津市

与敌激战，毙敌二千余人，击沉日军汽艇和机器船20余支，夺获枪弹甚多。因另一路日军攻占沣县、石门等地后包围常德，四十四军遂被隔绝在常德地区。许师奉命转移到常德西北太浮山、太阳山阻击日军。当时各团伤亡过半，实力单薄，部队尚未行动，日军骑兵万余即在空军掩护下分路来攻，两翼友军也被击败。许师伤亡过重。11月20日拂晓，日步骑兵千余人进攻师部排头岗，附近仅有四四九团残余官兵约一营及师部特务连、工兵连各一队，激战中，许师伤亡惨重，被迫退守陬市北的畲田坪。当时又接到集团军总司令"速到太浮山"的命令，许国璋部尚存的副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幕僚数人和官兵不足200人乘夜突围，天明时遭敌合击，血战中许师长中弹身亡。噩耗上报，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邀请蒋介石出席美英中三国定于11月22～26日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18日，蒋介石夫妇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主任林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朱世明及其他随员20余人离渝，21日飞抵开罗。2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就战后亚洲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详细的讨论。11月26日，蒋、罗、邱三氏最后审定《开罗宣言》。27日，蒋介石夫妇一行离开开罗返国。途经印度时，曾召见中国驻印军将领并会见史迪威、蒙巴顿等美英高级将领。12月1日返抵重庆。

开罗会议是中国第一次出席的国际最高元首会议。

食盐附加税开征

1943年11月3日，为增加财政收入，在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的同时，国民政府开征食盐战时附加税，重庆盐务分局奉总局电，自本日起，将食盐仓价（包括战时附加税），核定为每担1440元，其中附加税300元，合每斤3元。自1945年1月起，食盐战时附加税增加到每担1000元，3月又增加到每担6000元。从1944年3月起，随盐附征10元的军队副食费。从1944年3月起，规定全体人民不分男女老幼，每消费食盐1斤，负担70元的食盐附加。1942～1945年，食盐的专卖收入，盐税及食盐附加税的收入，共为722亿元，占同期税收总收入的49.5%。

省军管区动员知识青年从军

1943年11月5日，四川省军管区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限令四川在一月内征集知识青年4.5万人，飞赴印度，补充远征军。本月中旬，

省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前往三台、罗江、德阳、广汉等地学校宣讲“学生对兵役之责任”鼓励学生从军，迄止12月8日，成都参军知青5200余人，三台3000余人，达县、射洪、资中、绵竹等县各数百人。经体检合格者2229人，编入成都军政部教导第二团受训。迄止12月25日，达县从军知青163人，编入江北第一教导团。1944年1月，重庆市及附近各县参军知识青年共计1539人。

1944年5月29日，重庆各界在新运广场举行欢送会，欢送川、陕、豫、皖四省出国远征青年启程。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鼓动青年从军的口号：“十万青年十万兵”。1944年11月1日，四川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在成都成立，川省主席张群任主任，鼓动全川各县暨专科以上学校成立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征集第二批参军知青。同日，重庆也成立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市长贺耀祖任主任。11月24日，四川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宣布：迄止23日，全省已有30县市及川大、齐鲁大学等六校成立了征集委员会。全省申请登记青年共计4676人，内有女生920人。12月29日，全省申请从军青年已近二万人，省征集委员会限令各地新年元旦集中，入伍出征。

1945年2月3日统计：四川129县、市局登记申请从军知识青年29157人。

冯玉祥发动献金运动

1943年11月8日，为动员民众捐输财力支持抗战，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本日自渝出发，经自贡、乐山等地沿途倡导节约献金救国运动。12月25日到达成都。沿途各县人民热烈捐献，总额已逾1000万元。冯玉祥从1944年1月开始，又前往川西、川南各地发动献金运动迄止5月16日，四川14个县市共献金1.3968亿元（金银饰品在外），其中：自贡260万元，乐山304万元，荣县150万元，五通桥220万元，牛华溪70万元，双流80万元，夹江30万元，新津160万元，眉山84万元，彭山60万元，成都1200万元，合江1450万元，江津1350万元，泸县5300万元，隆昌3250万元。自6月开始，献金运动进入高潮，冯将军所到之处，各界群众踊跃不甘落后。6月22日，内江召开献金大会，共献金5400万元，金戒指150只。绅士李焕章长期献金，每年240万元。自贡市于7月22日在蜀光中学召开全市第二次献金大会，有35000余人参加，当场献金13000万元，除现金外，还有金戒指130只，金手镯8只，布鞋1万双。个人献金最多者王德谦献金1500万元，余述怀献金1000万元。自贡献金数量打破四川各市县的纪录，也打破了全国各市县献

金纪录，居全国第一。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全省献金情况统计：1944年5月以前，四川14县市献金总值2亿元（包括黄金饰品，物品折价）。5月16到11月底，内江、自贡、富顺等市县第二次献金活动总额，约5亿元。

冯玉祥对节约献金运动提出4项原则：①捐款由总会直接呈交国民政府主席；②献金用于慰劳前方将士，荣誉军人及苦难同胞，多则用以购买飞机，大炮和坦克；③凡为献金工作的一切费用，均由发起人自掏腰包，不得从捐款中开支一文；④捐款完全出于自愿，不加一丝勉强。

重庆各界人士庆祝沈钧儒70寿辰

1943年12月21日，重庆文化界、妇女界、律师、上海法学院、育才学校师生及各党派人士400余人举行茶会，庆祝沈钧儒70寿辰。董必武、郭沫若、陶行知、左舜生等出席并讲话。董必武在讲话中热情赞扬沈钧儒认真学习，研究新事物和勇于实践的精神；强调说：沈先生所主张的抗战、团结、民主，目前犹尚待努力。

全省征调50万人修筑机场

1943年12月，全省征调50万人修筑机场。为在对日作战中的盟军提供军事设施，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在川西修建特种工程（包括4个轰炸机场，5个驱逐机场），分布于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成都、温江、德阳等县。此项工程于本月全面开工，参加修建的民工达50万人。供应食米100余万石。运米民工先后亦达一二十万。全部土方总计在百万立方米以上，挖运土工具，自为民间常用的锄头，扁担，撮箕等。该工程于1944年5月完成，并交付使用。5月18日，交通部与四川省政府联合举行特种工程完工慰劳会。6月16日，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于本日0时从成都基地起飞，首次轰炸日本本土的钢铁中心八幡市。

开征娱乐、筵席捐

1943年，四川开征娱乐、筵席捐。凡菜肴每席价格达到一定金额的称为筵席，消费者应按规定缴纳筵席税。筵席税由市、县政府按当地物价情形，自行规定起征点，提经县、市参议会决议，呈报财政部备案，并准予每3个月调整一次。筵席税税率采用弹性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凡以营利为目的的电影、戏剧、书场、歌场、球房等娱乐场所，均要代征娱乐税，娱乐税的税率同样采用弹性比例税率，从价计征，由各市、县政府按娱乐性质，分别划分等级，确定税率。

1943年金融物价概况

1943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

发行总额为754亿元，发行指数为5357%，较上年增长119.3%。同期，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20930%，较战前增长169.1%；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0.47%。

四川外贸概况

1943年，据重庆海关统计：经由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590000元，出口货物总值84000元，全年对外贸易总值677000元。

1944年（民国33年）

盐务局贷款3亿，增加川康盐产

1944年1月10日，盐务总局决定贷款3亿元，增加川康盐产。其中贷款自贡两场各1亿元，五通桥场3000万元。7月10日，贷款分配比率再确定为自流井2亿元；五通桥1亿元，可分4次领取，每次以1月为期，每期领2500万元。

川省农林垦殖有成效

1944年1月30日，抗战以来，川省农林垦殖有成效。自1938年初四川省政府制定督垦土地大纲，当年设定的移垦区有北川——平武垦区，预定移民2000人，经费98000元。1939年，川省府协助组织华西垦殖公司，认股20万元，并令省银行投资30万元。11月19日成立省府垦务委员会，统筹规划有关难民垦殖事宜。1940年1月3日，垦务委员会划定两大垦区：①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②松潘、理番、懋功、靖化、汶川。开垦面积约24万亩，可收容难民数万。到年底，川省已有民营垦殖社30个；垦殖公司5个；垦地15.85万余亩；垦民6516户，2万余人。农林部本日发表统计：全国各省公营民营垦务机关团体，共153个，以四川为最多，占53个。西康省12个。垦民数目，全国以陕西为最多，四川次之，计为24834人，西康省210人。

公益储蓄的实施与推广

1944年2月3日，行政院制订《乡镇公益储蓄办法》。3月1日，四联总处开始推行本年度乡镇公益储蓄，全国总额为229亿元，四川配额为40亿元。3月10日，行政院令各地各级党政主管，每周应召集会议研讨推进乡镇公益储蓄。7月9日，四联总处规定，各行、局所收乡镇公益储蓄，一律存于中央银行，在办理工矿及其他生产事业贷款时，再向中央银行以转抵

押重贴现支用。22日，行政院公布施行《重庆市加强推行乡镇公益储蓄奖惩办法》11条。除超储奖励外，对拒储、滞交、储不如数的，要视资力加倍给予加重征工期、定期停业、永远停业、舆论制裁、强制储蓄等处罚。8月17日，川省分摊的40亿元乡镇公益储蓄，已按13个等级分配到县、市。以成都3亿元为最多，理番、松潘等100万元为最少。成都至本月上旬缴库数仅7182万元，只及任务的24%。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短评"乡镇公益储蓄"。指出全国200亿元总额中，四川占40亿元，数目不小，人民要有余力才能负担。应该按财产、按收入，用累进方式分配储蓄，而不应按人口、按户口分摊，钱多多储，钱少少储，贫民小户豁免。本年虽百般催收，未及半数。

1945年4月6日，国民政府因乡镇公益储蓄推行以来，强迫摊派，近于勒索，而收效甚微，所收储款每被各县挪借，领券不交款的比比皆是，自本年起不再举办乡镇公益储蓄，已办的应即结束。

川省的公路建设

自1935年以来，四川的公路交通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川黔、川陕、川湘、川滇东路、川滇中路、川滇西路等省际公路相继通车。省内各市县县际公路也大多修通。1944年3月11日，四川省公路局报告本省公路交通建设时说，全川公路总长已达56000公里，较之于1937年底的5000公里，增长10倍以上。

豫中会战，李家钰阵亡

1944年春，日本侵华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援救其侵入南洋的孤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4月17日，日军在中牟县强渡黄河，开始豫中会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得知日军作战计划，会战伊始，就先弃洛阳南逃。原集结于洛阳附近准备参战的六个多集团军也闻风西溃。李家钰奉命在新安、渑池之南掩护友军转移。他虽身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由于多次恶战，实力大为削弱，实际指挥的只有四十七军的四个步兵团。他面对强敌，视死如归，毅然承担掩护友军后撤的任务，与敌周旋于新安、渑池以南地区。

5月21日，李军总部在陕县东南地区与日军主力遭遇，他亲率总部官员和特务连官兵与敌反复冲杀，毙敌众多。不幸在转移陕县秦家坡时，中敌埋伏，在激战中中弹殉国。官兵抢回他的遗体时，遍体枪眼，令人敬仰。

6月22日，国民政府特追赠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

印度农业访问团来川

1944年4月19日，由植物专家巴文博士、蚕茧专家撒尔、农学专家辛氏博士等来华工作访问的专家组成的印度农业访问团抵达重庆访问。19～23日拜会国民政府官员，与农林部商定访问工作计划。5～6月，访问团依次访问四川成都、乐山、自贡、五通桥及桂、滇等地，参与当地农业工作后，由昆明返国。

食盐供不应求，成渝各地实行计口授盐

1944年5月9日，食盐供不应求，盐务总局公布各机关学校购盐办法。6月10日，行政院核定广元、三台两县为凭证计口授盐实施区域。7月19日，重庆盐务公局设“重庆市食盐计授管理处”，实施计口授盐，8月1日正式开始实行计口授盐办法。8月28日，成都市定于9月1日开始实行计口授盐办法。29日川康区计口授盐原定重庆、成都、万县及雅安4大据点为实施地区，除重庆已实施外，其余各地统限于9月1日普遍实行。渝市推行将及1月，统计全市居民约需1.3万市担，工厂及公务机关约需6000担，总计约2万市担。

重庆等地发生抢购黄金之风

1944年5月下旬，重庆等地商民深恐政府要提高官价，纷纷排队抢买黄金、黄金期货及黄金存款，教会美汇由450元升至650元，银钱业公会每天熙熙攘攘，异常拥挤，有行无市问题已压倒贵贱问题。投机买卖黄金和买金保值之风盛行。排队办黄金存款的长蛇阵，中国银行从一楼直到三楼之上，交通银行因抢占柜台发生打架，在一片提价的谣言声中，中小银行面临难关，只得宣布停售，黄金美钞黑市价高涨。重庆金融市场的疯狂投机，震憾了四川的大小城市，到处出现抢购黄金之风。

建业银行在重庆成立

1944年6月1日，建业银行在重庆成立。该行是中共地下党与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合资兴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1000万元，以扶持民族工商发展为经营宗旨，首任董事长汪代玺，总经理范鸣畴。次年，改选李维成任董事长，龚再僧（即龚饮水、中共党员）任总经理。总行设重庆，有成都、天津、上海、南京、长沙、武汉6个分行。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延安

1944年6月9日，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由团长射保樵、副团长邓友德率领抵达延安。参观团有外国记者6人，他们是：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纽约时报》史坦因，美国《时

代杂志》、《同盟劳工新闻》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福尔曼，《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夏南汗神甫，塔斯社普金科。中国记者9人，他们是：《大公报》孔昭恺，《中央日报》张文伯，《扫荡报》谢爽秋，《国民公报》周本渊，《时事新报》赵炳烺，《新民报》赵超构，《商务日报》金东平，中央社徐兆镛，杨嘉勇。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 赵景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4人。参观团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十八集团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接见了参观团全体记者，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参观团在解放区进行广泛的访向之后，于7月26日从延安返回重庆。中外记者普遍对访向表示满意，写了许多新闻报导和调查报告。其中，《新民报》记者赵超构所写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在该报连载，颇受读者欢迎；后又印成单行本，四次再版，成为大后方人民了解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的畅销书。这些报导和通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斗争与生活，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使国民党宣传部门对边区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

省参议会通过田赋征借实物数额

1944年6月20日，省参议会通过田赋征借实物数额。6月6日，粮食部发表“粮食征购办法，”自本年起改为征借。6月7～20日召开的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会议期中讨论了川省本年度田赋征实办法大纲草案。川省本年度田赋征实，粮食部原要求征实征购总额提高到2490万市石，经与临参会反复磋商，改定为2160万市石，内中征额900万市石，借额1100万市石，另为弥补灾歉短收增派160万市石。本年度征借数额之外，除地方积谷照章派募外，其余一切以田赋或谷物为对象的摊筹派募，一律切实禁止。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范宣德、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拉铁摩尔、美对外经济处对华供应科首席联络官哈查德一行4人来华访问，由迪化（今乌鲁木齐）飞抵重庆。

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元首及开罗会议决定应加紧对日作战，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并要求蒋介石迅速开展对驻华日军攻势。但蒋介石坚持要求美国提供巨额财政援助和英、美海空军的实际支援，否则不能发动对驻华日军的攻势。这引起美国政府、特别是主持援华物资分配的史迪威的强烈不满。同时，驻华日军于1944年4月15日突然在豫湘桂地区发动攻

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美双方矛盾迅速升级。为挽救行将破裂的中美关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奉命访华。这是抗战期间美方最高级别的访华官员。

6月21～24日，华莱士与蒋介石就中美关系、中共关系、政治改革等问题进行了5次会谈。在渝期间，华莱士参观了美红十字会驻渝办事处、驻华美军总部、陪都各教育机构。6月24日，华莱士一行由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陪同由渝赴昆明访问。行前发表书面谈话，希望中美两国互助合作，共同进行对日作战。27日，华莱士经桂林飞蓉访问，参观金陵大学、华西文化中心、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6月30日，离蓉返美。

川康经济建设服务社在渝成立

1945年6月24日，川康经济建设服务社在重庆成立，股本2000万元，推选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为理事长。徐堪、刘文辉、邓汉祥、康心如、胡子昂、卢作孚等人为常务理事。胡子昂兼任总干事。该社旨在联合川康两省生产、贸易、金融、交通等项事业，在国策指导之下，首求解除目前困难，进谋将来协调发展。以发展工矿事业，开发动力资源；发展农林渔与灌溉事业，推广优良品种，增加生产数量；发展对内对外贸易，提高商品品质，划一商品标准，调整产销数量；发展水陆交通，缩短运输路线，加强运输力量；发展金融事业，调配资金用途、灵活周转，降低贷款利息为终极目标。

地方积谷及使用办法

1944年6月30日，川省府规定地方积谷使用办法。①灾情较轻请求贷放，经专署查核，准就该县市局所存备荒部分积谷酌遵贷放，秋后照十分归还，但最多不得超过所存备荒积谷的1/2；②灾情严重请办理平粜散放者，由省府派员查勘，确有办理平粜或散放之必要时，再予核准，但使用数量，仍以不超过各县所存备荒积谷25%为限；③呈请以积谷办理辅助农村生产事业发展，向金融机构抵押借款者，一律暂缓办理。

本年度川省积谷数额，粮食部核定为30万石，仍与本年度田赋征实一并征收，另仓存储，以备救荒及优待之用。

棉产区的扩大与棉贷增加

1944年6月30日，为鼓励农民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川省举办棉花贷款。由建设厅、成都花纱布局、农民银行会商决定，共计贷款4000万元，分别在产棉区遂宁、射洪、三台、蓬溪、中江、简阳、金堂、广汉、德阳等地贷款，已于本日前全部贷出。本年全川棉田面积：涪江流域121.2万亩，沱江流域47.9万亩，岷江流域30.5万亩，嘉陵

江流域86.8万亩，其他各地13.54万亩，共约300万亩。

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扩大生产规模

1944年7月15日，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拟扩大生产规模。经济部为协助成都电力发展，已商准各行局贷款启明电灯公司3000万元，其中中、交两行各1000万元，中央信托局及邮汇局各500万元。该款全部作为扩充发电量及整理线路之用。

1945年6月17日，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再向经济部借蓄煤专款1亿元，并呈准自本月起每月配拨嘉阳煤1000吨，再向资源委员会租用岷江电厂的500千瓦电机，以使成都供电量有较大增加。

财政拨款整修川江航道

1944年8月4日，财政拨款整修川江航道。川江宜宾至重庆一段航道，计长378公里，有险滩39处，尤以筲箕背、连石三及小南海等处，最为凶险。按本年4月份物价、工价估算，计需经费1.54亿元，由财政拨款。该航道整修于本年7月开始，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施工，预计明年大水以前完成全工程。1945年6月28日告成。试航表明新槽水流平稳，深度足够，各方均感满意。

糖类统税征实办法实施

1944年8月15日，糖类统税征实办法公布。自本年8月15日起，在川康区实施，并划定交通发达地区如内江、资中、沱江流域，每百斤食糖外征税率30斤，交通不便地区，则按议价折收法币。

本年度川康区糖类统税征实额定为50万市石。

农业丰收，粮油日用品价格下跌

1944年8月31日，农业丰收、粮油日用品价格下跌。据川省农业改进所本年4月份63县农情电报：估计全省小春丰收，平均在七成左右，为1938～1943年六年来小春收成之最高纪录，其中尤以小麦收成为最佳。粮油日用品价格渐趋低落。据全川各县市场调查，9月28日米价以三台为最高，每市石4800元，达县最低，每市石2850元。麦价以广安最高，每市石3914元；达县最低，每市石1900元。

中央银行举办“黄金存款”和“法币折合黄金存款”

1944年8月31日，四联总处通过“黄金存款办法”、“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办法”，将两种存款列入推行储蓄范围，由四行、两局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桂林、兰州7地，于9月15日同时开办。黄金存款，每一总行、

局限储20万两，以1两为起存点，定期为1、2、3年，利率分别为二厘、三厘、四厘。到期存款，本息均以黄金支付。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以纯金一市两为单位，按照当日中央银行金价存入法币。9月15日，金价两值17500元，定期为半年、1、2、3年，利率分别为四厘、六厘、八厘、一分。到期本金以黄金支付，利息照存入法币数额计算，以法币支付。在通货恶性膨胀情形下，商民多有参加法币折合黄金存款者。

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赫尔利·纳尔逊来川

1944年9月6日，美总统特别代表赫尔利(Hurley)将军、美前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Nelson)博士，由史迪威将军陪同，自印度飞抵重庆访问。

由于中国军队在豫湘桂地区连续溃败，美国军方于7月4日向罗斯福建议，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全部军人。罗斯福于7月6日电告蒋介石，建议授与史迪威以指挥全权。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要求派遣政治代表来渝调整蒋、史关系。8月19日，罗斯福电告蒋，将派赫尔利以总统代表身份去中国，并加派纳尔逊作为驻华经济调查团团长，以研究中国急剧恶化的经济。

9月8～12日，中美双方就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展开派列讨论，最后议定由史迪威担任中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指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经蒋介石核准，对部队的任免奖惩须依中国的法令行事。谈判中，宋子文提出中方必须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分配，被美方拒绝。9月12日美方提出一个涉及支持蒋介石政权及史迪威职权的“十点大纲”，蒋介石根本不予考虑，同时，广西和滇西的远征军保卫昆明。史迪威对此怒不可遏，要求蒋抽调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南下增援，蒋佯作不知。蒋、史矛盾已不可调和。罗斯福于9月18日向蒋发出最后通牒式电报，声称如蒋不支持缅北战役，美就糇绝对华援助。9月19日，蒋介石命令宋子文正式要求美国立即召回史迪威。赫尔利和纳尔逊(9月22日返美)均支持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兼任驻华美军总司令，10月31日，魏德迈将军来华上任抵渝。

9月19日，纳尔逊与蒋介石进行两次会谈，就中美联合筹组战时生产局及战后中美经济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22日，纳尔逊返美。11月16日再度来华抵渝，协助中国组建成立战时生产局。11月28日，纳尔逊受聘担任国民政府高等经济顾问。

中美联合设立战时生产局

1944年9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Hurley)少将、前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Nelson)同

机飞抵重庆，纳尔逊的来华使命是商讨经济和生产问题。9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与纳尔逊会谈2次。22日，纳尔逊返美向罗斯福报告了访华情况。11月16日，纳尔逊及助手洛克(Locke)、嘉克逊(Jacoson)及经济专家再度飞抵重庆，着手联合筹组战时生产局。11月27日，蒋介石聘纳尔逊为国民政府高等经济顾问，美机械专家孔莱(Coonley)为战时生产局顾问。11月17日，纳尔逊的两名助手即协助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起草中国战时生产局组织法。1944年12月16日，中国战时生产局在重庆成立，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战时生产局组织法》，确定战时生产局机构及工作范围。设置战时生产局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战时物资的生产，负责监督和联系各公私生产机构、工作范围为组织军、民品生产，运输、分配原料，征用物资，调用生产款项，制定生产标准及技术改造。美方先后派遣工业技术专家30余人来重庆协助战时生产局工作。1944年11月16日，来华专家共16人，1945年3月，又派来专家20余人(专家21人，顾问、助理各1人)。1945年8月，依战时生产局组织法，中美结束战时经济合作。

重庆、成都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涨

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引起了重庆、成都各界人士强烈反响。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0月10日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一党专政。10月1日，重庆召开由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的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数千人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提出向法西斯统治展开斗争。10月7日，成都的大学生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起，有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5所大学12个社团参加，在华西坝联合召开了2000多人的公开集会——国是座谈会。会议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1000多师生举行“双十晚会”，教授张志让、周谷城及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刷新政治，团结全国，实现民主，挽救抗战危局。在重庆的其它大学，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援华抗日美机在峨眉山失事

1944年10月1日，援华抗日美

军C—109号运输机1架，从印度卡来贡达机场起飞，沿“驼峰航线”运输汽油往我国陕西汉中B—29重型轰炸机场。飞至峨眉山弓背山黄桷漕处撞毁。全机组11人死难。

民主青年协会成立

1944年10月18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和联系下，成都各大专学校中进步学生联合起来，于成都文殊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统一的组织“民主青年协会”，并推选燕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为召集学校，王晶崙和黄寿金为总负责人。会后，会议出席者回到各校建立组织，开展活动。民协的领导成员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尽管他们中大部分未同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直接联系，但是，民协是遵照中共的方针政策，按中共外围秘密社团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民协在各校建立干事会（或支部），按一定手续发展会员，建立小组，分配会员工作任务，要求会员保守秘密，组织会员学习时势政治等。民协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也是当时发动成都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

成都“市立中学事件”

1944年10月31日，成都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包围殴打成都市立中学罢课学生，制造了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40余人的“市立中学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组织通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立即发动和组织各大中学校学生、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声援市立中学学生的斗争。11月6日，“成都各大中学学生声援市中学生后援会”成立，并于次日举行招待会和受害学生家长座谈会，发表《告全市市民书》，说明事件真相，开展大规模的宣传。11日，全市大中学生数千人在华西坝召开声援市中同学、抗议警察暴行大会，会后，到省政府请愿，提出惩凶、赔偿、医治受伤同学、保障学生人身安全4项要求。13日，政府被迫公开在报纸上正式刊出撤销成都市立中学校长职务，市长余中英、警察局长方超“引咎辞职”，被捕学生得到释放，斗争取得胜利。

《华西晚报》社被砸

1944年11月11日，《华西晚报》被砸。《华西晚报》是潘文华所办的《华西日报》的编辑人员利用报馆提供的工作条件办起来的，经潘文华同意，由他的参谋长罗忠信任晚报社社长，中共地下党员田一平任经理。周恩来曾亲自关心过问《华西晚报》的工作，并派人到报社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华西晚报》刊登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并对蒋介石、国民党破坏抗日、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阴谋进行揭露。1944年10月和11月成都发生“市立中学事件”期间，晚报公开发社论和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成都市政府市长余中英的警告，以后，报馆又遭特务

砸抢，造成严重破坏。1947 年 6 月 1 日，《华西晚报》被国民党查封。

萨凡奇博士完成三峡计划方案

1944 年 11 月 14 日，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奇博士应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副主任钱昌照的邀请，于 5 月抵达重庆，担任资源委员会顾问。萨凡奇博士同几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考察了大渡河、马尾河、都江堰等水域。9 月，沿长江而下，抵达西陵峡，踏勘了长江三峡的地理形势，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协助下，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萨凡奇方案》）。方案送资委会后，萨凡奇离渝返美。

四川省农会成立

1944 年 11 月 16 日，四川省农会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省主席张群应邀致词，希望四川省农会成立以后，能够领导全川农民，对川省农业的改进共同努力。

川省物价腾贵，金价猛涨

1944 年 12 月，迄至本年 12 月止，法币发行总额为 1895 亿元，发行指数为 13464%，较上年增加 151.3%。同期，重庆趸售物价指数为 58774%，较战前增长 180.8%，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 0.17%。物价腾贵、金价猛涨。商民从保值考虑，多将法币投入黄金储蓄。11 月，重庆黄金存款已达 10 万两。1945 年元月，全国共收黄金存款 20 余万两，重庆即达 10 余万两。3 月 28 日，重庆泄漏黄金提价消息，当日法币折合黄金存款高达 2.1447 万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黄金舞弊案。3 月 29 日，黄金官价由每两 2 万元提至 3.5 万元。4 月 21 日，重庆黄金市价每两突破 10 万元。6 月 25 日，财政部令停止收受黄金储蓄。自运用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以来，银行回收法缺点 800 多亿元之巨。7 月重庆黄金市场平均价格，每两高达 19.6 万元，8 月 1 日，财政部通告：黄金储蓄存户在 1 两以上者，捐献 40%。8 月 11 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成渝市场黄金每两跌至 11.5 万元。

美金公债舞弊大案

1944 年，重庆发生美金公债舞弊案。民国 31 年黄金公债劝募，截止本年度重庆已达 1000 余万美元，为全国之冠。四川省银行董事长潘昌猷趁中央银行通知停止代销民国 31 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之机，采用倒填年月方式，以每元公债合法币 20 元的牌价，收买余存未销出的美金公债 100 余万元，获得的巨额差价，绝大部分进入潘的私囊。直到 1946 年才被揭发。

省政府增加工业贷款

1944 年迄至 12 月，国民政府增

加工业贷款按月统计如下:2月5日,四联总处核定本年度全国工业贷款总额89.5亿元。

7月13日,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对政府公布的工业贷款办法提出6条意见:对国防、民生必需的、效率卓著的工厂要切实扶植;以某种成本生产某种标准产品,售价不变,不一定采取订货方式;工贷期限请求放宽;国营与民营工厂间要合理分配贷款;贷款机关对民营厂贷款要适当分工;请留部分贷款给产业证券市场、工业票据承兑所及工厂联合库。

7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李家元专论"工业贷款方式的商榷",认为民营工业向国家金融机关贷款,利率不及商业银行的一半,用意不错,但贷款要商业银行承兑,以致贷款向商业银行集中,而不嘉惠工业。因此,应改由核准工矿登记的经济部负责会同国家金融机关进行审核贷款。

8月5日,四联总处核定本年度工矿生产事业贷款33.2亿元,其中国营13.2亿元,民营20亿元,并已拟定具体贷款办法。

9月28日,民营工业贷款改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负责办理,不向银行直接请贷。并规定长期贷款由该处贷放,营运资金由该处转四联总处办理,滞销转产由该处投资解决。

10月14日,四联总处奉准成立放款考核委员会,实行巡回稽核制度,稽查借款厂矿各种财务、业务、技术状况。

10月27日,成都中央信托局与成都市银行联合举办手工业短期贷款,质押每户最高5万元,信用最高2万元,期限3个月,利率2.8分。一般反应是数目不大,手续过繁。

12月8日,四联总处决定拨款100亿元,为扶助战时生产专款,由战时生产局支配,作为各生产单位扩大生产、改进技术之用。

12月31日,四川省银行统计:全年投资16个行业计35个单位,帐面金额为846万余元,照票面估值的金额为2224万余元。其中以成都自来水公司的1000万元为最多。

中共川东地区组织在农村建立游击武装

1944年12月,日军攻占贵州独山,重庆和川东地区为之震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一旦日寇进攻四川,川东党组织就地发动游击战争。为此,南方局曾在重庆办了一期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农民运动工作、组织武工队和开展武装斗争等经验;并先后派遣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川东的广安、大竹、渠县、达县、宣汉、南川、石柱、万县、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地,与当地党组织结合,开辟和发展农村工作,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武装,为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开展的武装斗争奠定了

最初的基础。

1944年金融物价概况

1944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发行总额为1895亿元，发行指数为13464%，较上年增长151.3%。同期，重庆批发物件指数为58774%，较战前增长180.8%；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0.17%。

四川外贸概况

1944年据重庆海关统计：经由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2884000元，出口货物总值2183000元，全年对外贸易总值5067000元。

本年由于豫湘桂军事大溃退，四川通往外省的几条公路均被切断，贸易直线下降。

1945年（民国34年）

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

1945年1月2日，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向传义为主任委员、李肇甫、何北衡、李璜、李天民等49人为委员。该会的设置源于1943年6月省参议会的建议和历次会议的不断研讨。2月28日，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成都举行，讨论通过了省府交议的四川经济建设计划。决议：本年应办之工程21件、工程费54.89687亿元。

国民政府发动捐献军粮运动

1945年1月13日，国民政府以改善士兵待遇的名义，发动大户捐献军粮。规定1月份开始收集，3月办竣。献粮标准：凡收益在10000市石以上者，捐献40%；5000～10000市石者，捐25%；500～1000市石者，捐15%；100～500市石，捐10%。2月6日，重庆市政府召集有关单位商讨实施献粮、献金办法。该市献粮任务为2万石，献金任务为2.704亿元。2月25日，川省献粮任务，经行政院核定为375万石。粮食部拟具进行派献的办法12条，限5月底办竣。5月8日，川省大户献粮献金再改为限6月底以前完成。

重庆、成都人民发起要求民主的签名运动

1945年2月13日，重庆妇女界104人联合签名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2月22日，重庆文化界300余人联合签名由郭沫若起草《对时局进言》，要

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之法令，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等六项具体要求。4月，成都文化界1000多人在《对时局献言》上签名。

省田赋粮食管理工作会议分别在成渝二市举行

1945年2月16日，粮食部为商讨川省田赋粮食管理工作起见，召集川省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督粮委员，分成渝二区举行会议。川东区为第3、第6、第7～12、第15等9区。2月23日在重庆召开。由粮食部长徐堪主持，川省府派建设厅长何北衡、粮政局长康宝志代表出席。会议主题为：①县级田粮机构合并后应如何达成任务案：此次调整，拟将粮政科撤销，改为县田粮管理处。储运业务较繁的县分设立专处。②各专员兼督粮委员与储运区分局切取联系案；③川东各县历年欠粮追收办法，此种欠粮者，多为大粮户。如其不追，不只未得其平，且亦不能令先交者折服。④川省献粮如何如期如数完成案。⑤粮食之集中运输如何完成案。⑥革除田粮弊端案。

3月7日，川西区田粮会议，由省主席张群主持，议决要案：②省级田粮机关属省，由粮食部监督。②县级田粮机关仍属省，由省府监督指导。③每县以设一种仓库为限。④追收欠粮，不得以代金折价。

重庆“胡世合事件”

1945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枪杀前往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检查违章用电的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时称“胡世合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市人民对特务的暴行极为愤慨。中共南方局因势利导，发动人民群众，采用各种方式控诉特务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许多工厂、学校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声讨特务，抗议法西斯统治。事件发生后的10天之内，以工人为主，前往吊唁、公祭胡世合的群众达20多万人次，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26日，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了杀人凶手，同意从27日起公祭3天，第一天由重庆市长贺耀祖主持公祭，并抚恤胡世合遗嘱，3月1日重庆市民上万人参加了为胡世合举行的送殡示威游行，斗争取得了胜利。

四川工矿企业统计

1945年3月20日，自抗战以来，四川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7年底，全川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即拥有动力和3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仅115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93%；共有

工业资本 214.5 万元，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0.58%，共有工人 13019 名，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2.85%。到 1945 年，据四川省政府发表的统计，全川已有工厂 1377 家，资本总额 579.47 亿元，每家平均资本为 42.08 万元。分布地点：重庆 496 家，成都 232 家；江北 101 家；乐山 48 家。其余 500 家分布全川各地。

四川工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东部大工业内迁；二是国民政府在实施开发西南的经济战略计划中，加大了向四川工业投资、借贷的比重，造成了工业的大发展机会。在各类工业中，以机械、五金、电力、矿冶、建筑建材工业的增长比例最大，1944 年，这类重工业拥有企业总数为 800 家，合计资本为 11.8249 亿元，占当时企业总数的 33.6%，占资本总额的 46.5%。

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偕夫人访华来川

1945 年 3 月，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将军夫妇访华抵渝。英驻华大使薛穆、邱吉尔首相驻华私人代表魏亚特将军，重庆市市长关国桢夫妇，海军司令桂永清，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等中外官员，重庆妇女界代表共 70 余人到机场迎接。3 月 8 日，蒙巴顿与蒋介石会谈战区军事合作问题。蒙巴顿夫人以英国圣约翰救护团总监身份参观重庆市各医院、学校。3 月 21 日，蒙巴顿夫妇离渝赴昆。

川北 13 县被灾，省府提出救济办法

1945 年 4 月 9 日，川省去年因气候反常，雨雪过多，红苕在未收掘以前，即受影响。川北各县先后报灾请赈者，计达 13 县。川省府主席张群本日召集被灾县份县长等举行座谈会，听取春荒报告，并有所指示。①兴办水利，发展交通，利用民国 30、31 年粮食券到期本息谷之半数，实行以工代赈。②酌拨一部分粮谷，平粜出售，平抑粮价，稳定市场。③增加农贷数额，以便购耕牛、种籽。④加拨急赈款项，酌予救济。⑤酌贷备荒积谷，于本年秋收后再行归还。⑥受灾较重县份，对于 31 及 32 年旧欠田赋，准其折征贷金。⑦33 年尾欠田赋，准其折缴小麦。

中共四川地方组织派出代表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共四川地方组织派出了出席“七大”代表小组，组长廖志高，副组长程子建，代表成员有 14 人。会后，中共中央安排四川代表及在延安的四川地下党的同志，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党的工作进行检查、讨论和总结。

川康兴业公司股东、董监事会议筹备战后计划

1945年5月3日，川康兴业公司34年度股东大会及董监事联席会议，对于战后准备筹办的事业已有所决定：甲、关于工矿部门者：①设立水电厂，拟就灌县韩家坝及紫坪埔西岸先设第一、第二发电厂，以水电供应灌县及成都一带之需要，其第一期装机容量暂定为4000～5000千瓦；②就成都附近设立化学肥料厂，制造氮气肥料，如石灰氮气与硫酸铔。③兴办纤维木浆造纸及人造丝工业。④利用四川所产各种原料，兴办颜料、油漆、油墨等工业。⑤兴办纺织染厂，拟订购英国纱锭10万锭，战后在川北设立纺织染厂。⑥开发犍为县五通桥盐区附近的煤矿。

乙、关于贸易部门者：①经营桐油业务，从产制运销各方面加以整理规划，求其改良，并以出口桐油换得之外汇，采购川康经济建设所需的机器器材及其他必需之物资。②经营川康外销特产，如生丝、猪鬃、药材、五棓子、白蜡等。

全川设粮食储运处90处，统一征收地方田粮

1945年5月4日，川省田粮机构，本月开始调整，所有粮食征收工作，统一由储运处办理。各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已将征收部分交由储运处接收。川各县储运处经核定为90处，处长一职一律专任，粮额过少县份，即予撤销。县级经收处移归储运处后，决定裁并1/2。至于各县粮政科，亦全部裁撤。

黄金、美钞市价猛涨，成渝金融市场掀起投机狂潮

1945年5月28日，重庆金融市场的疯狂投机，震撼了后方的大小城市，排队抢买黄金、黄金期货及黄金存款，美汇由450元升至650元。银钱业公会每晨熙熙攘攘，异常拥挤，虽经取缔，却转移到民族路另行开辟，有行无市问题已压倒贵贱问题。6月8日，行政院宣布：提高黄金官价为每两5万元。6月12日，重庆市银钱两业公会奉财政部令，为取缔黄金、外汇的黑市买卖，由两公会组成营业市场管理委员会，在场内以存、放、汇及法令许可的银行业务为交易范围，主要任务是调解市场因营业发生的纠纷，纠察违反场规者并维持秩序。简章及管理规则同时公布。6月下旬，投机买卖黄金的和买金保值的人，排队办黄金存款。中国银行的长蛇阵从一楼直到三楼以上，交通银行因让"有关系的"抢先到柜台里办理，发生打斗。在一片提价谣言声中，许多小银行面临难关，只得宣布停售，于是黄金、美钞黑市涨价。6月25日，财政部令停止收受黄金储

蓄。6月26日，成都金价突破20万元。

全川流行霍乱

1945年6月1日，内江首先发现霍乱疫情，迅即流行资中、富顺、乐山到西康各县。数日后，在重庆以及整个川东地区传播。6月24日，在成都流行，蔓延川西地区，北至广元。据部分医院统计：接收病人在2万名以上，死亡3300余人。如眉山县城7月18日发现病人，迅速传遍全县乡镇，疫毙者尸体无法掩埋，被弃掷河心顺流东下，浮尸盈岸。城内居民关门闭户，俨然一座死城。

当时，仅在重庆、成都、自贡设置检疫站，开设临时霍乱医院，限定在部分机关团体人员、学校师生及部分居民中"免费注射"霍乱疫苗，由于注射、输液设施奇缺，患者死亡惨重，平均死亡率为10%以上。

四川丝业公司扩大产销业务

1945年6月2日，抗战胜利在望，四川丝业界已日趋活跃，对于战后的国际贸易，积极筹划，准备争取国际市场，大量增加生产，生丝的品质亦力求改良。本年复兴公司所规定的B级丝，均能做到。四川丝业公司为扩大产销业务，在美国订购的新式机器，正设法起运中。该公司筹款10亿元，作为收购春茧价款。川北一带市价，每市斤由1600元跌至1200元，预计可收80万余斤，缫丝1000担。该公司总经理范崇实特于日前驰赴三台、遂宁等处，视察各单位业务。

省府追加棉花生产贷款

1945年6月5日，川省府请准财政部增加本年度棉花生产贷款2亿元。集中贷放射洪、荣县、蓬溪、阆中、南充、中江等8个受灾县份。川省本年度棉花生产贷款原定为2亿元。后追加2亿，共计4亿元。

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6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长宋子文、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蒋经国等组成的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离开重庆前往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6月30日，中苏会谈正式开始，苏方斯大林参加会谈。7月12日，宋子文以回国请示为由离苏，谈判中断。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斯大林当天要求立即恢复中苏会谈。8日，双方重开谈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8月14日，在苏联作出不支持中共，定将中国东北行政主权交还国民政府的承诺后，双方正式草签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4日，中苏双方在重庆交换条约批准书。

资源委员会在川勘采石油

1945年6月28日，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江油探测的油田，定于8月中旬开钻。所需器材约300吨，大部已运到。

8月26日，川省石油储量，据调查以资中、仁寿、巴县、犍为、泸县、自贡、富顺、荣县、蓬溪9县为最丰，估计达570兆桶以上，省政府与经济部有合力开采拟议。

10月17日，经济部在江油划定石油矿区59亩，从事探勘。

1946年7月，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派工程师杨博泉、孙万铨到遂宁蓬莱镇大井沟探勘石油。资源委员会目前正在开采中的计有：(1)江油海索溪；(2)隆昌圣灯寺；(3)资中罗泉井。

金融市场枯竭，物价大幅度上涨

1945年迄至6月，金融市场枯竭，物价大幅度上涨。2月28日，重庆因竞购黄金期货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银根极度紧张，银钱业票据交换差款9亿元，黑市利率高达12分以上。4月18日，重庆《金融通讯》发表社论，认为重庆两个月中黄金存款100亿元，黄金期货迟迟不至，物价仍上涨两三倍，黄金政策对平抑物价无补。5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龙季子文章《黄金不能解决目前的物价问题》，认为放款紧、利息高的原因是黄金被诱进了投机市场。

1月6日，四川省政府公布31县市米麦价上涨。乐至县米价最高，每市石6400元。灌县麦价最高，每市石4700元。

2月7日，报载：四川30县市米麦价。乐至米价最高，每市石8400元，麦价遂宁最高，每市石6450元。

3月5日，行政院公布重庆物价调查：去年12月较1937年抗战前，增加485倍；今年1月增加为655倍，2月又增为877倍。

4月15日，重庆猪肉每斤450元，鸡蛋每个28～30元。成都食米每石2.5万元，洋纱每件由2.4万元涨到4.7万余元。

7月11日行政院公布，本年6月份物价指数为战前同期(1937年6月)的1579倍。

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青年奔赴中原解放区和延安等地

1945年6月至8月，根据中共中央建设中原解放区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育才学校驻城办事处等据点，先后发动和组织510个青年学生到中原解放区。1946年4月，又在重庆和成都录选了英语基础较好的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80余名，分三批从重庆到张家口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训练班学习(后转入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并组织了一批教师到延安工作。这批干部，后来都成了各条战线的骨

干。

四川省7处水利工程告竣

1945年7月28日，川省7处水利工程告竣。①彰明长清堰，可灌田1.5万亩；②梓潼宏仁堰，可灌田3600亩；③邛崃三桥堰，可灌田8000亩。④乐山牛头堰，可灌田13400亩。⑤犍为绥水堰，可灌田10000亩；⑥内江大水沟，可灌田18778亩；⑦夹江永兴堰，可灌田4000亩。合计各县完成水堰，可灌田78978亩。

国防委员会决定黄金存款征献40%

1945年7月3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黄金存款存户一律征献40%，以法币交纳，并将官价由每两5万元提至17万元。从1两起，不分大小存户一律征献。储户怨声载道，指责政府“失信于民”“太不公平”。重庆《新华日报》评论指出：“制法的人不讲法律，讲信用的又不守信，吃亏小民只好饮恨吞声”，整个黄金政策和政府信用均受到损害，得不偿失。

对全省煤矿实行补贴政策

1945年8月1日，战时生产局为奖励嘉陵江区及南川区煤矿增产增运，以供重庆区需要煤焦起见，特订制给奖办法9条，于本日起实施。本办法所指定之各煤矿，以甲种煤矿为限。各煤矿每月产运数量，以各该矿1945年度内1月份至前一个月份所产煤焦运经出口地点之平均吨量为最低产运之标准。凡各矿产运量较最低标准增加10%以上者，每吨给奖金1000元，超过最低标准产运量至30%以上者，加给每吨奖金1000元。

省务会议通过全省田赋征借实物办法和各县市局征借配额

1945年8月6日，四川省务会议决定：民国34年度田赋征借实物及各县市局征借粮食配额，照去年旧例办理，各县配额不变。计征额900万市石，借额1100万市石，加配额160万市石，共计2160万市石。

川省水利建设

1945年8月6日自抗战以来，四川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利建设。水利贷款自1937年开始贷放，至1943年10月已达2.7亿余元。受益农田有70余万亩。1944年四川农田水利贷款经核定为3000万元。水利建设，到1943年10月，已完成者有大型灌溉工程15处，灌田30万亩；堵水坝227座，灌田95895亩；凿塘2826口，灌田125849亩；各工程共计灌田522744亩。到1945年8月6日，据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报告说：全省水田4000万亩，现能灌溉者已达400余万亩。

日本无条件投降，成渝等地欢庆胜利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四国政府发出请降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唯一要求谅解者，请保留天皇。

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前一月，7月26日，中、美、英国发表《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实施《开罗宣言》，严惩战犯，建立民主新日本。8月6日、8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9日，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100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9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本日下午7时左右经美国新闻处证实后，陪都百万市民彻夜欢腾，大街上到处是人潮，车潮，从中一路到新街口，张贴着《中央日报》号外的墙壁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车夫也挤在前面。人们欢歌笑语，互相道贺，朋友家人热烈拥抱，热泪交流。新运服务所广播员一遍又一遍地播送合众国际社、中央社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新闻，市民们欢歌雷动，笑声不断。青年们开始火炬游行，鞭炮声通宵不断。

8月16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经省政府证实后，成都百万市民一齐涌向春熙路，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花圈花篮堆积如山。全城沉浸在节日气氛中，鞭炮震耳欲聋。自发的欢庆游行队伍长达数里，队列前导为一大卡车坐满人群，车前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左右伫立着两位装扮成自由女神的姑娘，十分引人注目。

9月3日，成渝两市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参加者各有五六万人。

全省各地均举行了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全省金融、商品市场剧烈波动

1945年8月11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全省金融、商品市场剧烈波动。成渝市场黄金每两由20万跌至11.5万元；美钞跌至1850元。百货猛跌40%至50%。五金、西药等价格急剧下泻。银根奇紧。桐油、茶叶等出口物资，以外销有望，价格上升。9月6日，内江糖价每万公斤由2400万元跌至900万元，宜宾白蜡，每百斤由40余万元跌至10余万元，一般物品均在狂跌之中。8月26日，重庆市商会因物价狂跌，向财政部请愿，要求政府贷款100亿元以解困境，被拒绝。中小银钱行庄资金周转失灵，商店、工厂面临困境，纷纷停业停产。据12月31日四川建设厅宣布：因资金不足，全省1655家工厂中有40%倒闭。

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

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中外记者数十人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说："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救国大计。""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希望中国的一切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先后同蒋介石会晤谈判多次，频繁地分别在桂园、红岩村等处接见国民党高级党政军官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新闻和文艺界、外国使节和友好人士及记者等。或宴请、拜会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友好交谈；或出席他们的宴请和会议；或阐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中国的政策和主张；或提出两党谈判的重大原则性意见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由重庆返回延安。

四联总处核准工贷50亿元

1945年9月1日，财政部、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四联总处与中央银行商定公布《紧急后方工贷实施办法》，规定贷款总额50亿元，以原料、机器、成品作押，月息3.4分，期限一年。申请贷款厂矿应取得战时生产局证明，请财政部总担保，由中央银行按9成转抵押。公文用划一格式，以便随到随办。财政部虽将这一办法告知工业界代表胡西园，但实际情况是，对押品估价、公证、存仓手续，费时较长，而且是由全国工业协会与迁川工厂联合会两会全体会员作连环保。

抗战中川省新增课税

1945年9月3日，四川省主席张群在"胜利日感言"中说：抗战期间，各种公债之摊募，各类储蓄之劝派，以及各种税捐，如营业税、各种专卖税（火柴、食盐、食糖）、印花税、所得税、地价税等，或创始于全川，或在全川继续扩大推行，综计川人直接间接负担数字，亦无一不超过全国其他各省。

四川水患人疫

1945年9月初，岷、沱、涪江和嘉陵江大水。

涪江流域夏秋之际大雨遍及全区，9月5日，干支各流水势齐发，致酿成清道光（公元1821年）以来特大洪水，遭受空前水灾，田土荡然，庐舍为墟，哀鸿遍野。遂宁以上水患最甚，水位之高，水势之猛，皆为年老土著记忆之所不及，沿岸受灾惨重。这次水灾，岷江、沱江、涪江等流域受灾33县，绵阳、潼南两城被淹，交通断绝，射

洪太和镇淹毙数百人，江油中坝淹毙2000余人；三台东北大学水灾损失数千万元。沿江房屋、稻田、中药材冲荡无存，损失数以亿计。阆中、苍溪等地8月大雨，嘉陵江水暴涨，蓬安洪水决堤，江水通城下，两岸人畜禾苗悉被没，重庆、北碚河街一带尽成泽国。9月3日，两江上涨一丈余，朝天门一带水已上岸，房屋多被冲毁，居民被淹死者无数，轮渡停航。9月4日，重庆再度大水，太平门、朝天门一带，数万住房倒毁，人畜死亡无算。

同年7至8月，成都发生水灾。由于雨水连绵不断，时有暴雨倾盆，雨量高达605毫米，城中到处是汪洋一片。许多街道可往来舟楫，千余户人家无处栖身。交通阻滞，工商停业，市区内被水淹者达115条街巷，淹没水深达3英尺以上。

8、9月，金堂两次遭受暴雨洪水的破坏。8月连日骤雨不息，29日大水，附城河地带尽成汪洋，城内公园街、北街、公安街、余家湾等地被大水淹没，房屋墙垣、大树等冲毁甚多。9月1日再度大水，水位之高为数十年所罕见。玉虹桥水电厂被淹，城墙大段大段浸坍，房屋墙垣倒毁许多，财产损失无算。

战后照旧征借四川田粮

1945年9月8日，豁免田赋办法，经行政院核定，分电各省市政府遵照实施。关于四川等后方11省、市，民国34年度田赋，为配备复员期间军公粮食紧急之需，仍照常征收征借（包括带征县级公粮在内），依限扫解。民国36年度一律豁免一年。

1946年7月19日，本年度川省田赋征实及征借粮食额，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计征实谷450万市石，征借谷450万市石，附征省县级公粮135万市石，共为1035万市石。

8月4日，重庆行辕负责人就征实政策发表谈话称：时至今日，仍有不同意于征实者，前蒋主席致川省参议会电文中，曾声言政府为轸念民艰，豁免后方各省本年度田赋一年；惟目下时局维艰，中央为纾解民困，乃有继续征实之决策，分为两年内各征一半，课额并未加重。政府仅为权衡国是之缓急，当有提先落后之权。且此种措施，亦属常情，不得谓为失信也。

重庆工人争生存、反迫害的斗争

1945年9月25日，重庆永兴机器厂等27个工厂的工人发表联合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和资本家使工人在抗战胜利后处于失业和饥寒交迫之中，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改变自身的厄运。10月，重庆5万多失业工人选出代表成立失业工人请愿团向当局请愿，提出安置和救济失业工人的要求。10～11月，渝鑫铁工厂等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重庆机器、纺织、军

工、化工、印刷等行业的工人，联合发出呼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中共重庆市委于10月组成了重庆地区工人运动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王璞担任组长，其任务是以反内战、反独裁为中心，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

陈诚整编川康部队

1945年秋，合作抗日的国共双方举行了中外瞩目的重庆谈判，会议中争论的焦点，是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提出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实行“政治民主化”。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且实行军队民主化，然后把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都交给民主联合政府。经过反复协商，国共双方按照美国马歇尔将军的建议达成的整编统编方案是：将全国陆军第一军整编为108师，其中国民党占90个师，共产党部队占18个师，以后逐步编成为60个师的国防军。已整编的川康部队，陈则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抗战刚一结束，就带领着军务署长方天，整编科长裴治镕（先章）由重庆飞赴成都着手整编工作。当时驻在后方的川康军队有24军刘文辉部所辖的刘元瑄的135和陈光藻的136两个师；56军潘文华部所辖陈兰亭163和彭克汉164两个师；95军黄隐部所辖谢无坼126和杨晒轩的新九师；另外还有刘树成的新17师，李根固的新25师和彭斌的新一旅，共八个师一个旅。刘、邓、潘三方面都是一个军辖的两个师，表面上兵力不相上下，实际他们各保有一个独立旅的空番号，另外刘文辉的西康省政府又直辖有邓秀迁的靖边旅；邓锡侯则有川康绥署邓亚民的警卫团；潘文华除遥控刘树成、李根固师和彭斌旅外，还有一个李元宗旅和潘清洲的巴山警备旅。当此时也，他们都想把各自的实力暗中增强或保持原状不变，甚至还想要扩编，但迫于整军形势的严峻，不能启齿而已。他们为表示对陈诚的尊重，这些部队在蓉的校级军官，于第二天都集中在中央军校礼堂，聆听陈诚讲话，大意是①盟军战胜日本，因素很多，从实力而论，单是美国海空军力量，就足以夷平三岛。陈举例说，他说亲到琉璜岛战场上空视察，发现全岛就象烤焦了的面包一样，日寇虽顽，也不得不无条件投降，现在盟军剩余军人物资很多，根据美援计划，可先装备国民党军12个军，36个师，所谓阿尔法α部队，其余则用国产枪械装备，简称伯塔β部队。今天抗战胜利，摆在国家面前的任务是和平建国问题，而建国的主要一环又是建军。国家平时编制，按国力最多只能保持90个师，所以现在就应着手编并充实，也

就是实行整军。②有人担心如果现在开始整军，异党问题又怎么办呢？陈说其实这不足为患。想当年在江西，大家只要齐心，加上一把力，加紧封锁，恐怕早已不成问题。现在抗战胜利，国运转隆，如果他们不听命于中央，割据称兵，我保证三个月内将其消灭。③现在川康后方的绥靖部队，除各军独立旅空番号统一撤销外，余可暂时不动。但部分老弱官兵也须预作复员打算，有事将来再征召后军，无事应解甲归田。陈等留蓉仅三天，就匆匆飞返重庆。（《黄埔同学话今昔》一书系1994年6月由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黄埔同学会合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行两局总行、局陆续迁往上海

1945年9月，原迁来重庆办公的四行两局总行、局陆续迁往上海复业。在四川只保留分支机构。次年，外省驻川的地方银行，以及部分较有影响的商业行庄，亦纷纷迁走。据《地方金融》1947年底统计，全省共有银行机构761家，比1945年底868家减少12.3%。

物价暴跌，产品滞销，成渝等地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停产

1945年9月～12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全川物价暴跌，产品滞销，成渝等地工商企业纷纷倒闭、破产。

9月19日，中国兴业公司因受经济严重危机所迫，已将其钢铁厂停炉。

10月18日，成都市手工棉织业受物价暴跌的打击，大多数织户宣告破产，失业工人万余名，棉织业公会呼吁当局转请国家银行贷款20亿元救济。

10月31日，川省制纸各工厂因资金缺乏，原料、工资成本过高，大半停产，或减少产量紧缩开支，藉维现状。就手工纸业言，夹江原有碓户2000余家，现仅存约4/10。就机制纸厂言，全川原有9家，今仅4家，日产量由20吨下降为6～7吨。

11月14日，各小型机器厂困难重重，重庆市500余家已全部停工。政府对他们的收购与订货无具体指示，工贷也无着落。各小型工厂将筹组小厂联合会请愿。

12月1日，犍为、乐山间迁川工厂均告停工或减产。

12月10日，中国兴业公司、渝鑫钢铁厂、恒顺机器厂、张瑞生机器厂、华生电器厂、华安电工厂呈请经济部，准予遣散员工，停止生产，办理结束。

12月11日，渝市炼油工业38家大多宣告停工。各大纱厂因原料接济困难，几濒停工。

12月24日，岷山区煤业260余家锐减至60余家。

民生公司民淳轮失事

1945年10月5日，民生公司民淳轮失事。本日晨在重庆朝天门象鼻子附近触沙滩倾倒沉没，乘客生还者240余人，死亡者达70人以上。失事原因，轮船年久失修，与驾驶人员的疏忽，均有关系。

《双十协定》签字

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曾家岩桂园客厅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是国共两党代表自8月29日以来，经过多次反复谈判，就实现国内和平达成的协议。

《双十协定》共分12款：①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②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③关于国民大会问题；④关于人民自由问题；⑤关于党派合法问题；⑥关于特务机关问题；⑦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⑧关于地方自治问题；⑨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⑩关于解放区政府问题；⑪、关于汉奸伪军问题；⑫、关于受降问题。其中，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双方歧异较大，采取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距的方式处理。

重庆谈判期间四川民主力量空前活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与重庆各方面代表人物进行广泛接触，增进了各派人士对中共的了解，促进了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团结和壮大，上层民主力量陆续组织起来。8月31日，重庆《中华论坛》等10大杂志主办人举行会议，一致认为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审查书籍杂志制度已无存在必要，并决定从9月份起不再送审，发行联合增刊。9月8日，成都《新中国日报》等10余家新闻文化团体联名致函重庆杂志界，响应拒审行动，表示从即日起拒绝送审。9月3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在重庆成立，毛泽东在接见筹备会的成员许德珩等时，建议把九三学社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得到了筹备会的一致赞同。9月29日，黄炎培等在重庆集会，决定筹备中国民主建国会，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正式成立。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张澜为主席，并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会议，协商国是等10项主张，并坚决支持中共的谈判主张。10月19日，重庆文化界人士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柳亚子、沈钧儒、许寿裳、叶圣

陶、茅盾、巴金、曹靖华、冯雪峰、胡风等500余人到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抗战胜利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号召文化工作者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动员广大民众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奋斗。12月23日,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简称"经协")成立,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沈钧儒、马寅初、梁漱溟、胡厥文应邀出席。会议通过了章程,推选阎宝航为理事长,沙千里、杨修范、林大琪、罗叔章、胡子婴、王寅生、耿一民为理事,通过了《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反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

粮食部调集四川历年征购存粮接济长江流域各地

1945年11月2日,四川省政府据粮食部代电,川省历年征购存粮,计民国30年存谷775620石,31年967985石,32年3291793石,33年909097石,应全部拨作特别准备粮食,并速将各县存粮集中长江沿岸,以备运济下游各埠。省府令饬各县迅速拨交备运。

1946年1月22日,粮食部核准拨运川粮100万石济汉口,因运输困难,须至三四月间水运通畅后方可运毕。

6月7日,国民政府中央党政军各机关留渝联合办事处主任朱绍良奉蒋介石令,以京、沪、湘、鄂等地粮食需要紧迫,着令川江航运以粮为主,还都人员及商货均暂停两月。

12月6日,国家政府需粮孔急,令长江联合办事处每月运粮万吨东下,因限于运输条件和各地存粮不多,均未达到预期数字。10月份东运5354吨,11月份3026吨,12月份枯水期间,预料难达2000吨。

綦江铁路通车

1945年11月11日,綦江铁路举行通车典礼。该路自重庆上游猫儿沱綦江县三溪矿区为止,全长85公里,1942年5月开工,时辍时修,共用经费88057.46万元,全部钢轨系用大渡口炼钢厂国产35磅标准轨造成,为本路的特色。该路主要用于煤矿、铁厂的原材料运输。12月14日,綦江铁路奉命交由军政部兵工署接管。该路共有员司120人、工人169人,除员司70人由交通部调派平津、京沪、武汉、黔桂、粤汉各区工作外,其余由兵工署全部留用。

行政院通过川省年度预算

1945年11月18日,川省府民国35年度预算经行政院核定,总额为380亿元。

1946年4月6日,川省府会计处审核民国35年度省各级单位全年预算总计为130余亿元。5月10日,行政院440次会议通过:四川省各级单

位全年各项支出经费为117.88亿元。

“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

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500余人集会，成立“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郭沫若、陶行知、黄炎培等在会上发表反内战讲话。会议制定了章程，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号召国民党官兵拒绝内战。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成都、重庆学生反内战、反迫害

1945年11月，成都的四川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的21个社团联合发表制止内战宣言，号召学生共同努力，挽救时局危机，组织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力量去制止内战。11月13日，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30多个文化教育单位强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27日，重庆大学学生致书美国学生，呼吁美军退出中国，要求一致行动阻止美国政府资助国民党加剧内战。12月2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5院校学生，签名反对内战，并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等三项国是主张。

全川学生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武装暴徒镇压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等校反对内战的学生，酿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消息传来后，全川各界群众极为震怒。各民主党派和民众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和广大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声明，发出通电，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暴行。12月7日起，四川学生为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成立“一二·一”惨案后援会。9日，成都大中学生5000多人，在华西坝召开追悼昆明死难烈士大会，大会发出通电声援昆明学生，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同日，重庆各界群众1万多人在长安寺举行追悼大会，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公祭连续举行了3天，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出席了这次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各界群众一致要求惩办祸首，取缔特务组织，保障民主和自由。除以上举行的大型集会外，成渝各学校还分别举行了昆明死难烈士追悼会。

四川省参议会成立

1945年12月5日，四川省参议会在成都纯化街省党部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出席参议员共134人。省府主席张群主持参议员宣誓仪式并代表中央致词，谓誓词中“恪遵国父遗教，奉行三民主义，服从法令，尊重地方人民公意，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为积极方面应为之准则。“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为消极方面不应为之戒条。省参议会公推74岁高龄参议员曾省斋致答

词，谓誓必代表民意，促成民主宪政，建设新的四川。同日举行正副议长选举会，向传义当选议长，唐昭明当选副议长，秘书长为罗文谟。

议长向传义在大会开幕式致词中称："在组织条例第三条中规定省参议员之权责7项：①关于建议省府之兴革事项。②有关人民之权利义务之兴革事项。③省经费之支出分配事项。④省府交议事项。⑤听取省府施政报告，并提出询问。⑥接受人民请愿。⑦其它法令付与之权职。

会议除通过川省府下年度工作计划、岁出岁入概算及施政报告外，并有建议案450件。其中较重要的议案有，抗战结束后，请中央明令停止田赋征实，以利民生案；从严取缔高利贷，实行农贷，以救农村，恢复繁荣案；请继续修筑川甘公路川段路线，以利西北交通；"四川建设纲要"与"四川经济建设公司"案。省主席张群在闭幕会上说，省府当分别性质，就人力财力所许，实施所通过的各项经济建设方案。

本届参议会活动时期为1945～1949年。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华来川

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访华抵达重庆。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联合政府所统治的统一的亲美中国。1945年12月11日，美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与马歇尔一致议定，美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12月15日，杜鲁门宣布任命马歇尔为特使，前往中国完成调停国共冲突的特殊使命。12月26～27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声明中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由民主分子包括中共及其它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部门，停止内争。宣称三国决不干涉中国内政。苏、美各自阐明了从中国撤军的立场。

12月27日，国共会谈在马歇尔参加下再度举行。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同时成立了由马歇尔、张群（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3人会议。1月10日，3人会议发布"停战令"。13日，在北平成立了由叶剑、郑介民、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14日，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军事3人小组开始工作。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军队整编基本方案，上述协定是在马歇尔调停下，蒋介石迫于形势而签订的。签约后他深感"失策"。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

1946年7月，国民党已决定发动大规模内战来解决国共问题，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意图亦日渐明显。8月2日，国民党军轰炸延安，8月29日，攻占承德，9月底进攻张家口。9月30

日、10月9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两次向马歇尔提出备忘录。此间，10月8日的马歇尔最后一次调处失败。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声明》，谴责美、蒋破坏政协及停战协定。1947年1月，美国最后放弃调解。1月6日，杜鲁门宣布召回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川开展业务

1945年12月22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公路局订约，在复员声中，自1946年1月1日起，开办旅运意外保险，保险费按途程长短分段计收，最短60公里以内200元，最长300公里以上900元。索赔办法为：乘客意外致死30万元，伤15万～25万元，行李减失5万元。

四川粮食征购征借额数

1945年统计，从1941到1945年，四川粮食征购征借数额总数约在7700万石以上。据1948年《中华年鉴》所载《历年田赋征实征借(购)收起数量统计表》统计：四川历年收起数量：1941年度为6892232市石；1942年度为16612428市石；1943年度为16163529市石；1944年度为19493839市石；1945年度为18331016市石。此项数字已较四川省主席张群《胜利日感言》所发表的总数约7100万石高，且未包括献粮在内。又据时粮食部长徐堪在《抗战时期粮政纪要》中追述，总数达8200余万市石，约占全国粮食征购征借总额的31.63%。

川丝产销状况

1945年统计，从1937到1945

抗战期间四川生丝产量统计表

年度	生丝总产量	改良丝产量
	(市担)	(市担)
1938	24,000	2,184
1939	24,000	7,782
1940	24,000	8,918
1941	21,600	8,959
1942	21,600	5,875
1943	20,400	6,127
1944	19,200	6,413
1945	18,000	6,118

年，全国主要产丝区江浙、广东等省生产停顿，国内外生丝供应多依赖四川。

川丝每年外销量约10000担，其中销欧美约6000担，缅甸约4000担。内销约19000担，其中成都区约3500担，乐山区3000担，南充区约2000担，其他区约1500担。1943年国民政府对生丝统购统销，四川的外销生丝统由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复兴公司收购出口。抗战结束，虽然取消了统购统销法令，但仍规定生丝必须交中央信托局统一出口。

1945年金融物价概况

1945年6月，迄止本年上半年，法币发行总额为3978亿元，发行指数为28289%，较上年增长210%。同期，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213320%，货币购买力指数为战前的0.004%。

四川外贸概况

1945年据重庆海关统计：经由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29551000元，出口货物总值2323000元，全年外贸总值31874000元（以关金券计）。

本年上半年，本地贸易普遍发展。1月，战时消费税取消后，大批海关支卡被裁撤。8月，日本宣布投降，货物价格暴跌，由于官方干预，市场危机缓解。随着战时各种限制的取消，贸易复苏，进口货物，特别是洋货大幅度增长。

1941～1945年间，西南地区进口的洋货主要是药品、染料、金属、棉纺织品；出口货物主要是猪鬃、生丝、钨砂、桐油等，其中猪鬃和生丝大多空运到印度。

四川人口概况

1945年8月5日，四川省政府公布全省人口统计：全省142县市，共有人口47489 540人（未包括原西康省）。

1946年（民国35年）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1946年1月10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出席政协会议的全部代表共38人，按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分为：国民党8人，有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共七人，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由秦邦宪代替）、吴玉章、陆定一、邓颖

超；青年党5人，有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民主同盟9人，有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9人，有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会议秘书长雷震。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表示：政府决定实施“四项诺言”：“一、人民之自由，二、政府之合法地位，三、普选，四、释放“政治犯”。中共代表周恩来致词说：“会议要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的方案，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保障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民盟代表张澜、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人士邵从恩也在会上致词。

政协会议从1月10日开幕，到1月31日闭幕，一共举行了10次全体会议。在第10次全体上，逐项讨论并通过了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5个议案。确认了和平建国方针，否定了独裁内战方针；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会议后举行了闭幕式，蒋介石、周恩来、张君劢、曾琦、莫德惠先后发言，表示接受和拥护会议的决议。

西康省参议会成立

1946年1月18日，接行政院通知，遵照民国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及省参议员选举条例的规定，简派周馥昌为西康省参议会秘书长，筹备省参议会，并由康定等27个县选出参议员27名。

1946年4月3日，西康省参议会在康定子耳坡举行成立大会及新议场落成典礼，出席参议员有胡恭先等26人，到会的还有省府主席刘文辉及各界人士100余人。参议员及秘书长宣誓后，即由刘文辉、胡恭先分别致词。

同时，举行正副议长选举会，由刘文辉监选票。选举结果，胡恭先为议长，王学禹为副议长。下午举行预备会，抽定参议员席次，决定各组审查委员会委员，又决定本次大会中心议题8项，即夷务、禁政、交通、差徭、地方自治、国民教育、经济建设、澄清吏制。

四联总处贷款抢修川北被灾水利工程

1946年四联总处贷款抢修川北被灾水利工程。去年9月，涪江流域山洪暴发，绵阳、罗江、广汉、安县、绵竹、金堂、中坝、赵家渡、三台、射洪等地，均罹水灾，房屋淹没，人畜死亡，禾田损坏。四川水利局为抢修水灾中受损失的水利工程，经国民政府提出，向四联总处贷款9亿元，目前已分6区开

工。4月30日多已整修竣事。

重庆大中学校师生举行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的示威游行

1946年1月25日，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由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发动重庆师生万人举行游行示威。参加的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学院、国立艺专、育才学校、中大附中、重庆中学、蜀都中学、国立商业职业学校等院校。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各大学教授马寅初、金善宝等也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走到国民政府向政协会议请愿，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提出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成功以前，不许闭幕等71项国是主张。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向学生代表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其他党派代表也讲了话。这次学生运动，对政协会议成功起了促进作用。

四川粮民向政府索取借谷债款

1946年1月29日，四川粮民借谷债权团成立，并选派代表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撤职查办省主席张群、解散省参议会、制止成立四川经济建设公司、未还谷款本息（抗战中征借粮谷款本息）应予抵缴田赋等主张。声明：如政府置之不理，则自行持券抵缴田赋。国民政府迫于民愤，饬令四川将扣作建设基金的还谷款发还原主，并在1946年征实项下扣除粮食库券本息的五分之一。

3月12日，四川各县粮民代表100余人组成四川粮民索债请愿团，本月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请愿。3月3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函告已由主席团批送行政院核办。

1947年5月10日，行政院提出归还四川民国30、31年借征川省粮民粮食库券本息共计230万石办法：参照民国34年12月底本省各县平均谷价，每市石5000元计算，折合法币115亿元，扣除本年度欠缴代购谷款14亿元，共应归还谷款101亿元。行政院以紧急命令方式，饬财政部拨交川省具领，转发各粮户。

重庆“较场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当天，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23个团体联合发起，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参加会议群众近万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布置特务暴徒数百人前往捣乱会场。大会主席团的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和新闻记者、劳协会员60余人被暴徒打伤，经到会群众奋力抢救，郭沫若等始得脱险。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和政协参加党派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新华日报》及《民主报》、《商务日报》等重庆舆论界连续发表评论和

文章进行抗议和揭露；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分别组成“二·一0血案后援会”，慰问受伤人士，发表声明抗议特务暴行。2月16日，成都民主青年协会发动5000多大中学生集会，抗议国民党特务制造“较场口事件”。

重庆金价猛涨

1946年2月12日，重庆金价随平、津、沪、汉金价猛涨，市价由每两9.3万元，接连突破10万、11万大关，较官价高出2万多元。中国银行门前争购黄金者，数百人发生扭打，乱作一团。

四川丝业公司贷款收购春秋茧

1946年四川丝业公司向四联总处请求贷款22亿元作收购春茧用，四联总处准贷12亿元。8月20日，四川丝业公司以各地秋茧即将上市，向四联总处贷款40亿元，计划制丝2000担出口，惟四联总处仅核准17亿元，该公司转向省银行贷款13亿元。

重庆“沧白堂事件”

1946年2月15日，重庆人民在沧白堂举行庆祝实现国内停战的和平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会议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主持。从1月11日开始，协进会先在重庆合作会堂后改在沧白堂举行了各界民众大会。大会邀请出席政协会议的各方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先后举办8次，深受群众欢迎。国民党特务分子多次捣乱破坏。2月15日晚的大会上，特务分子又捣乱破坏会场，殴打代表和群众，侮辱谩骂殴打报告人郭沫若、王若飞、梁漱溟、李公朴、李德全等人，制造了“沧白堂事件”。

泰国政府访华团访华来川

1946年2月27日，由泰国政府外长銮实为团长，内务部代表毕民特、商务部代表拉紮、秘书迪东克为团员的泰国政府访华团一行4人访华抵渝，代表泰国政府就中泰建交条约来华换文。在渝期间，与国府军政要员会晤多次。4月3日，蒋介石在林园官邸宴请访华团一行。4月，访华团离渝赴昆返国。

重庆“三·二三惨案”

1946年3日21日，重庆29兵工厂（大渡口钢铁厂）工人10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23日，全厂工人集会，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代表，特务警卫大队开枪镇压，打死工人4人，重伤8人，轻伤多人，制造了“三·二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揭露特务暴行，并派记者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工人在各面的支持下，坚持斗争，至4月4日，终于迫使厂方释放了被捕工人，答应增加工资百分之

百，暂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条件，罢工斗争胜利结束。

卢作孚赴北美考察航业，订购加拿大轮船回川

1946年4月10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启程赴北美考察航业。6月28日，卢作孚由美返沪宣布，已向加拿大借款订购轮船18艘，均属适合川江航行者。

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

194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30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并介绍省委成员吴玉章、王维舟、傅钟与公众见面。中共四川省委实际上又是中央的代表。它负责领导川、康、云、贵和《新华日报》的工作。7月以后，王维舟等相继调回延安，由张友渔任副书记。此后，省委机构缩小，只留少数精干班子坚持工作。省委成立后，继承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事业，大力开展省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地下党的建设，继续推进民主运动，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扩大发动内战的突然事变。省委成立前1个月，以王璞为书记的重庆市委成立。5月，以蒲华辅为书记的成都工委成立。

省府通过四川财政5年计划

1946年四川省财政厅近日拟订四川财政五年计划：①恢复省级财政。②充实省银行。③整理县银行。④建立财政方案。⑤整理县市财政。5月18日，省府通过财政厅拟定的五年计划：拟定①财政：确立省级财政，田赋、契税、营业税划归省，田赋以50%归县，20%归国库，30%归省。②金融：整理并充实省银行及县银行，借以稳定并发展县金融。

省府编制四川五年建设计划

1946年省府编制四川五年建设计划。自抗战结束，国民政府确定川省改建模范省，各部门五年计划，省府正加紧讨论。已讨论竣事者，计有教育、建设、地政、卫生、会计、禁政、保安等8项，其余如民政、财政等，亦将脱稿。6月19日，川省府所拟具的五年建设计划书，分政治、经济、教育、建设四部分，送省参议会审议，再呈请中央核定。五年建设中的经济建设部分分为交通建设、水电建设及工业建设三个部分。交通方面为修筑成渝铁路、川黔铁路；水电方面川西以都江堰为中心，川东以龙溪河为中心；工业建设基本原则在中央整个建设计划之下，力求区域经济建设的完成。

四川机械公司、农业公司获财政拨款

1946年为改进轻工、农业机械生

产，四川省政府拨款1.3亿元充实四川机械公司，拨款7000万元充实四川农业公司，并饬令省银行尽量贷予周转金，使其能大量出产轻工业的机械及农业机械，以促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

重庆、成都悼念李公朴、闻一多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战士、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新的暴行在重庆和成都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28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发动下，重庆各界人士6000余人在青年馆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在会上致词，一致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恐怖暴行。会后，50多个团体和各界人士组成“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提出限期缉拿凶手，取缔特务组织，切实保证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等要求，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奋斗。8月18日，成都各界召开追悼李、闻大会，各界人士和群众团体共2000多人到会。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会上致词要求严惩凶手及幕后主谋人，并表示要为民主之实现，民族的和平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殴伤张澜等人。次日，吴玉章致电张澜表示慰问，并谴责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9月4日，张澜致函民盟政协代表，要求他们就此事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李、闻血案的发生及国民党特务在成都的暴行，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破坏和平，坚持独裁，压制民主的真面目。

加拿大工程师来省协建川西水电工程

1946年7月14日，奉加拿大政府之命来华协助建设川西水电工程的加拿大工程师斯塞克斯顿本日抵渝，四川省主席张群接见塞氏。17日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陪同其赴蓉转灌县视察。10月21日，四川都江电厂经塞氏等实地查勘后，认为极有开发价值。其工程拟分期进行。第一年完成50000千瓦的电力，第二年10万千瓦，第三年可达到20万千瓦。该电厂拟向加拿大政府借款兴建。

政府调高美元汇率，重庆物价高涨

1946年7月17日，政府决定美元汇率由1:2020调高为1:3350元，调高65%。重庆物价两天内上涨率为：百货15%，香烟30%～35%，进口货物25%，布匹及日用品5%～15%，四行、两局奉令紧缩放款，以抑制物价。重庆《新华日报》指出：“调整外汇的目的，在于缓和目前工商业界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和强化支持内战的所谓战时财政。”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各级组织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

1946年7月，鉴于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重庆市委对华蓥山区附近的广安、岳池、武胜、渠县、合川、江北、梁山、邻水、大竹，下川东的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县，陆续派出干部，并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同时，加紧当地组织的清理恢复与发展。在农村中，一方面从抗丁、抗粮、抗捐入手开展农民运动；一方面开展统战工作，掌握部分基层政权，为发展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四川年度棉花贷款发配各产区

1946年9月3日，川省民国35年度棉花在贷款总额共2亿元，分配19县。其中射洪、简阳、仁寿各1000万元，盐亭、华阳各500万元，江油200万元，中江3200万元，遂宁3500万元，潼南、巴中、仪陇各600万元，乐至650万元，南部、南充、奉节各750万元，三台3400万元。

四川盐业公司贷款改进产销

1946年9月4日，川康区盐贷银团在重庆成立。8月自贡市商业受沪、港等地不景气影响，倒闭极多，尤以银钱行号营业困难，大都紧缩，子金行市极为混乱。盐场场商派出代表到南京向盐政总局请愿，要求增加盐业贷款。

9月4日，川康区盐业贷款银团在重庆成立。委员7人中以中国银行赵雨圃任主任委员，交通银行张叔毅任副主任委员。其余委员为农民银行、中信局、邮汇局、商业银行、银业界的代表。盐业发款总额为172亿元。在国家行局认额86亿元内，中国银行占35%，交通银行30%，农民银行20%，中信、邮汇各7.5%。银行公会认76亿元，钱业公会认10亿元。

11月，川盐资金短缺，政府组织的盐贷银团重运销轻产制，小制盐厂因此多已破产。

张群离任，邓锡侯代理四川省主席

1946年9月11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请假赴美就医。国民政府令邓锡侯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于16日接任。

行政院补助四川财政亏空

1946年10月23日，行政院补助四川财政亏空。本年四川财政支出已临最大难关，行政院电四川省政府，允补助6493亿元，并由中央免赋239425亿元。

重庆“失业军官请训团事件”

1946年10月、11月，重庆发生“失业军官请训团事件”。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非嫡系的云、贵、川、康籍军官大量遣散。在重庆的4000多名失业军官自发起来斗争，成立了失业军官请训团。中共四川省委派出党员在失业军官中进行工作，发动数千名失业军官请愿，要求收回集训，解决生活问题。他们不顾国民党当局镇压，两次包围重庆行营和重庆警备司令部，并绝食抗议，喊出“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口号。国民党当局被迫让步，答应将失业军官收回集训，但同时又逮捕了请训团的主要骨干。在此之前，成都也发生了上千失业军官集会组织请训团，要求国民党政府收回集训，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

中外工程师勘测长江三峡水坝工程基地

1946年11月24日，在两年前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其博士探测长江三峡工程的基础上，中外工程师再度勘测三峡水坝工程基地。

抗战胜利后修建三峡工程列入议事日程。1946年10月19日，资源委员会三峡水力工程组经济考察队施雅风等一行5人抵万县，估计沿江各县可能因兴工面积大遭受损失的程度。考察沿江各县的生产交通概况，以便该项工程完成后能因地制宜根据各县需要予以配置。

11月24日，有关三峡水坝的建设计划，在萨凡其博士答应再度来华工作后变得更有希望。关于三峡水坝基地的勘测，由中央地质调查所三峡地质队担任。侯德封、陈梦熊、刘东生、姜达权一行在南津关一带查勘，并将提出报告供选择筑坝地段参考。

四联总处贷款协办大型水利工程

1946年12月11日对1947年大型农田水利贷款，四联总处规定以集中力量，完成以往未完成的工程为原则。经就已经贷款举办而未完工的川省梁滩河、沙河堡等处及康省的周公渠39处作一估计，尚需贷款120亿元。除由水利委员会转请国库拨付一成计12亿元外，其余108亿元准由中农行贷款，并按七折向银行转抵押。

1947年1月26日，四联总处允贷款6亿元，协助四川省政府举办未完的大型水利工程、定期3年还清本息。计巴县、梁河分配8000万元，华阳沙河堤9000万元，灌县都江堰4000万元，三台大围坝8000万元，乐山六坝3.1亿元。

全川人民抗议美军暴行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消息传到四川后，立即在全川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1947年1月3日，重庆31所大中学

校学生代表在重庆大学开会，成立“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并决定于4～7日罢课4天。同时，民盟重庆支部、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等16个人民团体，也发表了反对美军暴行的宣言。1月5日，成都的四川大学等27个单位学生代表1000余人，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集会。会议通过决议致电美国政府，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致电蒋介石、杜鲁门，要求废除中美商约，会后，举行了游行。6日，重庆6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佬滚出中国去”、“反对不平等的中美商约”等口号。接着，举行“抗暴宣传周”，10多所大中学校组成宣传队在重庆开展广泛宣传，揭露美蒋勾结的罪行。同时，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全市大中学生举行第二次反美暴行游行，并成立了成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成都妇联和民盟四川省支部还分别发表了抗议美军暴行宣言。在自贡等城市，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全川出现了以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反对美国侵华政策，要求废除美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场波及全川的工人学生为先锋的抗暴运动中，多次遭受国民党特务镇压，为避免过多暴露而造成大的损失，中共四川省委在后来逐渐引导学生停止街头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加强培养在抗暴中涌现的积极分子，组成各校的核心力量。

重庆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

1946年12月，为纪念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庆社会各界决议将1941年12月30日落成的全民抗战“精神堡垒”木质建筑改建为“抗战胜利纪功碑”。当月破土动工，1947年8月落成。该碑矗立于重庆市中区邹容路、民族路、民权路交汇处，棱形柱体，钢筋混凝土结构，坐南朝北，通高27.5米，直径25.5米，碑台为石砌圆形建筑，高1.37米，直径25.5米，台面直径16米，由南北两面各铺垂带踏道10级达于碑台平面。碑座高4米，外表系本色水磨石，分上下两部分，下部高1.37米，八棱形，每面宽2.5米，围高20.1米；上部高2.63米，每面较下部内收0.7米，宽1.4米。碑身高22.13米，呈弧形圆柱体，每面宽1.3米，为米色水磨石，东南西北四面自下而上各设通风窗五扇，对街口的四面，各装自鸣钟一口。碑正面镌刻“抗战胜利纪功碑”7字，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　重庆市市长张笃伦”。碑座除正面是门外，另7面上部皆刻有碑文，幅宽1米，高1.5米，碑文有定重庆为陪都的《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并序》，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重庆行营代主任张群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等文字。

重庆解放后，抗战胜利纪功碑文及图饰等被毁弃，碑面重作装饰。1950年10月，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中央银行公布川、康、渝、蓉金融机构统计数

1946年12月，中央银行稽核处统计：川、康、渝、蓉共有金融机构1163家，其中总机构380家，分支机构783家；按性质分，国家行局115家，省银行119家，县、市银行274家，商业银行379家，银号33家，钱庄63家，信托公司7家，保险公司81家，合作金库92家。据此，在当时全国金融机构总数中，上述各地已占四分之一。

全川123县遭受旱灾

1946年，全川123县遭受旱灾。重灾区古蔺、三台等26县农作物减产50%～70%以上。什邡等44县，春季农作物减产达40%以上。

1946年金融物价概况

1946年12月，迄止本年底，法币发行总额10319亿元，发行基数1000亿，上升指数为73845%，较上年增长444.5%。11月份，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495800%，货币买力指数为战前的0.0002%。

四川外贸概况

1946年，经由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113420万元，其中洋货直接进口货值88070万元，因无免税凭证而重新上税的洋货价值25350万元。出口货物总值69690万元，这是转口出口土货的货值。直接出口土货主要是空运到香港的猪鬃等。

本年6月前后，通往加尔各答的空中航线中断，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恢复到战前状态，主要是通过由重庆到上海的水道进行。进口货包括价值8680万元的机器设备工具、价值21190万元的化学品和药品、价值11690万元的染料和价值11920万元的纸张。转口进口货物主要是棉布、棉纱、卷烟和原棉。出口贸易因生产成本和运输费用高涨而受挫折。猪鬃是直接出口和转口土货的大宗，本年直接出口35454公斤，其中18264公斤运往澳大利亚，另外17190公斤运往香港。

本年遵照海关行轮总章进出港船只为1092只，计重313536吨。政府为战后复员而严格控制了航运，包括军队和粮食的运输。一批美国登陆艇由中国轮船公司接管，航行于重庆和上海之间。本年重庆、汉口、南京、上海之间的航运持续不断。

四川人口及耕地概况

1946年，据四川省民政厅、重庆市政府、西康省民政厅人口统计合计：四川、重庆、西康三省市人口总数为49479978人。又据四川、西康省建设厅统计：四川、西康两省耕地面积为155448000亩。

1947年(民国36年)1月12日省建设厅公布四川全省人口数及耕地、粮食产量统计数。计全省人口47547120人，耕地面积84056306市亩，粮食产量222634567市石，粮食消费量119819511市石。

1947年(民国36年)

省参议会议议定成渝铁路诸问题

1947年1月10日，川省参议会第三次大会，讨论有关成渝铁路诸问题，议定：①公司名称定为成渝铁路公司，由省府商同交通部改组川黔铁路公司而成。②成渝铁路的性质为官商合办，其原有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的股款应设法归还，收回路权。③为使成渝铁路提早完成，速筹260亿元，其筹集方式用股票行之，以各县市局为一单位，权益之大小，视股金多少定之。其权益之享受，为出款人民所共有。④股款筹募的标准，暂定为田款占60%，成渝两地工商业占20%，沿铁路线县市的工商业占10%，全省营业税占10%，由省府商同重庆市政府订定之。⑤由省府令各县市局会同各县市局参议会，商讨推选股权代表办法，每县市局推行代表1人。⑥省府定期召集县市局股权代表，并函重庆股权代表出席，开股东大会，选举董监事，成立成渝铁路公司。⑦目前急需之款，由省府向中央先行借贷，将来筹募归还。⑧川汉铁路股款从速清理收回，作为增投成渝铁路资金的一部分，以便发展其支线。

经济部将在川中央企业移交川省管理

1947年1月15日，经济部电四川省政府，以战时在四川举办的工矿事业，复员后业经审度情况，加以合理调整：由资源委员会经营或合并经营者，均征洽地方政府意见接办。如四川酒精厂、矿业公司、万县电厂，均交川省府接办。泸县电厂亦拟将市区营业出让地方经营。都江电厂原系与川省府合办，近拟与岷江电厂合并组织川西电力公司，仍与川省府合办。宜宾机器厂、资蜀钢铁厂、威远铁厂等现虽已停工，均可出租或转让各地方政府，人

民愿意承租经营者，也可申请洽商转让。

黄金、美钞价格猛涨，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

1947年1月16日，中央银行发行新版大额关金券250元（关金券1元＝法币20元，250元等于法币5000元）和500元（等于法币10000元）两种大钞。消息发布后，物价立即猛涨，重庆黄金厂条1日之间由每两39.6万元涨到42.5万元，20日高至53万元；美钞由3350元暴涨至8000元。成都资金流向上海抢购黄金、美钞，申汇猛涨，每千元收汇费50～60元，日汇上海款在20亿元以上。2月11日，中央银行宣布停 售黄金。

年初以来开始形成的黄金风潮更见高涨，并迅速波及成、渝等全国各大城市，2月11日重庆黄金厂条每两由77万元升至82万元，12日跃至100万元，美钞也在一夜之间由10400元升至15400元再升至16500元。各类物价都随黄金、美钞暴涨。成渝两地政府相继发出通告，停止黄金，美钞交易。16日，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禁止黄金，美钞的自由买卖，金、钞市场停闭后，商品价格疲跌，游资暂时转入金融机构，市息低落，全国各大城市利率一致向下倾泻，成都由12～13分跌到8～9分。

财政部盐政总局实施保护川盐销区办法

1947年1月14日，财政部盐政总局实施保护川盐销区办法。据该局局长缪秋杰谈：目前政府为保护川盐计，规定海盐沿长江上运，只准运至沙市，惟期间限定为三年。此三年内，希望川盐能够改良品质，尽量减少成本，以与海盐竞争。又为使川盐供求平衡，以免生产过剩，于是逐步将大竹、忠县、万县、江安、万源等地小规模的井灶停产。

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馆被搜查

1947年2月28日，中共驻渝联络处和四川省委机关、《新华日报》馆被国民党重庆当局派出军警包围搜查，人员被软禁。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悍然下令《新华日报》停刊，限期撤离在渝中共人员。省委和报社的全体人员，在吴玉章的率领下据理力争，表示强烈抗议，提出严正声明，同国民党军警宪特展开了连续一个星期的斗争。后奉南京中共代表团指示，省委与《新华日报》全体人员于3月7日和9日分批撤走。国民党由此而彻底堵死了国内和平大门。中共四川省委撤退后，重庆和成都的党组织先后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取得联系，并接受上海局指示开展工作。

重庆市政府拟订《重庆市实施经济措施方案纲要》

1947年3月4日，重庆市政府遵照2月16日中央所颁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拟订《重庆市实施经济措施方案纲要》，本月提交由有关机关团体合组的“重庆市经济紧急措施会报”讨论，经一致表示赞同。《纲要》分为：①关于取缔投机买卖者；②关于管制物价者；③关于工资管制者；④关于日用主要必需品供应者四部分。

川省实行禁毒新办法

1947年3月，川省实行禁毒新办法。3月9日，川省府以时届春烟播种之期，恐毗连省界边地，仍有漏剥烟苗，潜伏滋生情形，特电陕、甘、鄂、湘、渝、黔等省市政府转令各有关区县，遵照合订联合防治偷种查剥烟苗办法，立即定期肃清烟毒，务期灭迹。

3月19日，川省府组织查禁烟毒辅导团，其任务：①宣导禁烟禁毒令；②宣导禁烟毒要义；③考察各县市禁烟毒办理情况；④激励地方士绅协助办理禁烟；⑤督饬各县市加紧推行禁政；⑥考核主办禁政及协办禁政机关的情况；⑦调查推行禁政的困难。该团由川省禁烟督理处、省党部、省参议会、高等法院及川康绥署共同组成，分东南西北4组，驻于著名烟毒区垫江、梁山、宜宾、旺苍、南江等地。

4月4日，川省府拟定本年度全川各县市禁政工作计划，以3—6月为肃清烟毒时期；7—10月为烟毒总检举期，11—12月为抽查复查及检核奖惩期，令全省各县市分别办理。

川省府推广良种，改良农业

1947年4月2日，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电川省府，规定以绵阳、重庆、成都为中心，办理农业推广事宜，由四川省农政所会同农业推广委员会所派专员办理。成都区推广种类为稻、麦、杂粮。重庆区为稻、麦、蔬菜。绵阳区为稻、麦、杂粮。推广面积，稻15.2万亩，麦8.2万亩。其经费除各县市自筹外，推广委员会补助800万元。

川省改良卫生机构，增加医药设备

1947年4月16日，川省改良卫生机构，增加医药设备。省卫生处长董秉奇向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会报告：①本省卫生机构大小单位共319个，按编制约需技术人员3400人。为培植此项人才，拟成立四川医学专科学校，采取四年制办学。并就成都医职学校增加助产士及护士各一班。②卫生试验所已于4月1日成立，5月以后，即可制造防疫各种苗浆。并拟官商合组公司，制造机械及药品；③行总准拨川省的床位353床，药械110吨，将妥为分配各单位使用。美国红十字会赠药14吨，拟用以奖助各地卫生院。

行政院改组四川省政府

1947年4月17日，国民党六中全会第65次会议推举张群为行政院长。

同年5月13日，行政院第三次会议通过改组四川省政府案：①通过张群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呈，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②四川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李肇甫、委员兼教育厅长刘明杨辞职，均免本兼各职；委员邓汉祥兼财政厅长调任省政府秘书长；任命委员吴景伯兼财政厅长、任觉五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余中英、牛锡光、刘泗英为委员。

四联总处核定年度农贷计划

1947年4月19日，川省民国36年度农贷，经四联总处核定为135亿元。内计农产运销67亿元，农业生产30亿元、棉产贷款35亿元；余为水利及农副业贷款。

8月21日，川省本年度农贷，四联总处在原核135亿元的基础上，又核定棉、烟、生丝、皮加工贷款45.6亿元，大型农田水利贷款6亿元，养蚕制种贷款4亿元，蔗糖生产贷款41亿元，前后共计231.6亿元。

省府实行改良蚕丝生产办法

1947年4月27日，川省府为增加蚕丝生产以裕农村经济，实行改良蚕丝生产办法：①择定南充、西充、仁和、安居、大河坝、三台、射洪、盐亭、绵阳、梓潼、阆中、南部、苍溪、筠连、高县、沐爱（1948年置县，1950年并入高县）16处为重要区，先行设置蚕桑指导所。②饬各县设置桑苗圃，经费已请中央拨款补助。③非四川丝业公司营业区域，饬由地方政府指导设置新式缫丝厂及蚕丝公司。④令饬省合作事业管理处通知合川、铜梁、洪雅、青神、丹棱、乐山、屏山、沐爱等25县政府，迅速组织生产运销合作社，办理蚕丝运销事宜。

成渝发行万元大钞，各地物价上涨

1947年继年初中央银行发行新版关金券250元和500元两种面额的大钞，4月30日、5月2日，成都、重庆中央银行先后又发行1万元面额大钞，人心惶惶，物价暴涨；筹码需要量猛增，省内各地普遍发生钞荒。5月29日，成渝钞荒波及全川。内江、宜宾、泸县、资中、铜梁、广元等30多县，发现不具名的大额本票流行市面，扰乱金融。

财政部拨还拖欠川省1941～1942年粮食库券本息

1947年5月10日，中央应还川省民国30～31年两年粮食库券本息，共计粮谷230万石；经行政院参照

1945年12月底本省各县平均谷价每市石5000元计算，共需115亿元，除扣该年度欠缴代购各款14亿元外，共应偿还谷款101亿元。行政院以紧急命令饬财政部拨交川省府具领，转发各粮户，以便作为增产费用。省府奉令后，由财政厅会同田粮处商洽配发办法，拟短期内发还粮户。6月20日，省主席邓锡侯在四川省参议会第一届四次大会上说：中央应付收购本省民国34年，应还30—31年两年库券本息谷价款，原定为每石5000元，经迭次请求，中央已允增为每石10000元。

行政院通过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分区调整办法

1947年5月13日，行政院通过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分区调整办法。5月7日，重庆市社会局发表重庆市各种物价统计：以5月5日为基础，与本年1月比较，零售价上涨62.6%，趸售价上涨82.7%。5月13日，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分区调整办法，经行政院本日会议通过，定5月份起实施。重庆、成都属于第四区，基本数为20万元，加倍数为1000倍。四川属于第五区、基本数为17万元、加倍数为800倍。

重庆、成都学生声援南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

1947年5月18日，北平学生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游行，被军警包围毒打。5月20日，南京学生声援北平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打伤150余人。消息传来，成都、重庆等地学生奋起声援。重庆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委员会"。24日，重庆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院校开始罢课声援，各校学生决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倡议，准备于6月2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和示威游行。同时，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院校也相继发出通电声援，并积极准备6月2日的联合大罢课。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这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在重庆、成都实行大逮捕，被捕共产党员、民盟盟员、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共计270余人。这次大逮捕，使成渝地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而未能形成高潮。为了把学生运动骨干统一组织起来并形成核心，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为表示对"六·一"大逮捕永志不忘，故名为"六一社"。1948年冬，"六一社"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成都等地粮价飞涨，发生抢米风潮

1947年5月5日，成都等地粮价飞涨，发生抢米风潮，若干米店被抢。川康绥署逮捕数人，枪决抢米之正犯2人。省政府于午后召开记者会，宣布

查究囤积，疏畅米源，平价供应等办法。晚10时起并宣布戒严。

5月10日，成都市物价评议委员会成立，市长李铁夫谈：今后评价，只准跌、不准涨。川省府通令全川各县市一律成立物价评议会，取缔投机操纵，严格管制物价。

6月7日，川康绥靖公署与四川省政府，为平抑川省各地物价，特规定办法4项，通令各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各县县长遵办，并布告全川人民周知。办法为：①凡各地敢有聚众抢米者，准军警宪及地方团队拿办。其聚众持械抢米而又拒捕者，并准格杀勿论。②各地粮食应绝对自由流通，严禁阻关阻运。倘有故违，不分官民，一律究办。尤应切实保护运道，如被抢劫损失，即责成该管县长暨当地乡镇保甲负责赔偿。③凡囤积粮食操纵粮价，预买预卖仓飞者，一经查获，应即按照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从重处办。④各地大户存粮，应遵地方政府限期出售，违则以囤积居奇论处。

6月16日，川省府为解决成都粮食问题，特规定自本月起每日举行粮食会报。本日议决成都附近各县，每日须供应2000担，由省府办理食米平价，照市价八折供应市民。

川省公布财政状况

1947年6月19日川省公布财政状况。省府会计处会计长报告说：①民国35年下半年度岁出总额为177.2亿元，岁入总额为162亿余万元，收支不敷14.6亿元，仍请中央补助。②民国36年度省总预算，经一再调整，计岁入岁出总额各为829.4亿元，其中所列中央补助款为590亿元，但仅奉准补助320亿元，与生活补助费增加数122亿余元，申请中央增加。③本省各县市局民国36年度总预算，已先后核定：岁入岁出总额各为1630亿元，比较民国35年度整编预算541亿元增加3倍以上。④各县市本年预收支总额，最低为5亿元以下，最高为40亿元以上，以5～2亿为最多。

通货膨胀引发社会经济危机

1947年6月开始，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利率上升，工商各业倒闭成风。成都市零售物价总指数自民国26年度至36年度6月底，十年物价计高涨1.5万倍。36年1～6月计高涨1倍以上。重庆市纱价及米价连日上涨，影响一般物价及人民生活，黑市利率已达15～16分，各分支行处也将利率提高为放款7～8分。存款3～4分。9月，夹江纸业在高利贷压榨下，纸商百余家大都处于不景气的窒息状态，有几家纸厂已停工。重庆土布业原有1300余家，从业人员4万，月产土布数万匹，近因原料高涨，成本加重及受舶来品冲击，已倒闭700余家，停200余家，剩下300家在风雨飘摇之中。重

庆康乐园农产品制造分公司在以高利吸收存款后宣告倒闭，使许多平民受累。

1947年6月，据有关报纸统计：参加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的470余家工厂中，停工者达80%以上。机器工业，由抗战期间的434家，减少到182家。这仅存的企业中，还有50%处于暂时停工、伺机复业状态。电气工业原有30多家，现只剩下中央电工器材厂等10余家。丝绸、布、呢、绒等各业也处于停滞状态。

川西大水

1947年7月4日川西平原大雨，成都发生60年所未有的大水灾。据统计沿江民房被冲毁802间，灾区40余处，无家可归者万人，损失在百亿元以上，木材冲失10余万根，菜油损失百余大桶。据川省府17日初步勘报，蓉市受灾者共27000户，灾民82000人，因水灾而伤亡者近300人。国民政府一次拨发急赈款10亿元电汇川省。9月6日，行政院决定救济方法三项：(1)加拨帐款20亿元发放急赈。(2)四联总处拨贷款100亿元办理农贷。(3)田赋减免问题由财政部酌情办理。

9月16日，省府统计公布本年遭灾地区计岷江、沱江、涪江流域33县，受灾禾田656789亩，房屋5373间，被灾人口442921人。全部财产损失约在千亿以上。

中共川康特委恢复

1947年7月，中共成都工委派人到上海向负责领导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钱瑛汇报工作，钱英指示恢复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副书记马识途。钱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川康特委要配合解放战争，加强农村工作，组织武装斗争。川康特委成立后，成都工委撤销，成立成都市工委，彭塞任书记。川康特委恢复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并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建立了联系。7月21日，川康特委派员到仁寿县，组成有300余人、五六十支枪的东山游击队，攻占了借田区公所。之后，该游击队化整为零，就地分散隐蔽，少数转移到外地。

川省田赋、税收加码

1947年8月10日川省民国36年度各项税收经中央核定，共计650亿元，其中公用市场使用费115亿元，地价税3.78亿元，土地增值税7.17亿元，房捐19.82亿元，契税119.8亿元，新税共41.52亿元，屠宰税370.48亿元。

8月12日，省府主席邓锡侯谈本年四川田赋征实四项：①为中央征借900万石；②为省县级征公粮135万石；③为弥补短收加配征45万石；④为积谷征320万石。共计1400万石。

8月23日，省务会议通过本年田

赋征实办法：①为配合动员“勘乱”需要，全部征收实物，征借谷 450 万石；②省县应得田赋部分实物，不予收购，惟交通不便及不需军粮地区，中央应征三成及征借全部留归地方，另以其他交通便利区域所得粮食抵交中央；③省县公粮随赋代征，代征数额以征实额的三成为原则，全归地方动用，不予收购。代征标准及数额由省拟定；④本年到期应还库券本息，中央为“勘乱”需要孔急，照民国 36 年 12 月全川平均粮价全部收购；⑤开征日期展至 9 月 16 日，务须开征后 3 月如数收足。

9 月 1 日，重庆市预算不敷 200 余亿元，市府拟有本市自筹 130 亿元的办法：①营业税自 104 亿元追加为 208 亿元；②房捐本年中下两季照原额各加 3 倍、2 倍与 1 倍。

四川建成 8 项水利工程

1947 年 8 月 9 日，据省水利局统计，四川已建成下述 8 项水利工程，改善了大面积农田灌溉状况，计有：巴县梁滩河水利工程，灌溉面积 2 万亩；华阳沙河堡高地灌溉工程，灌溉面积 8000 亩；内江大小灌溉工程，灌溉面积 1.3 万亩；三台东山六坝灌溉工程，灌溉面积 3.2 万亩；彰明长青堰灌溉工程，灌溉面积 8000 亩；灌县导青堰灌溉工程，灌溉面积 7900 亩；犍为清水溪电力提水工程，灌溉面积 1 万亩，邛崃三桥堰灌溉工程，灌溉 8000 亩。8 项水利工程，合计灌溉面积共 106000 亩。

全省清查亏欠粮食、粮款

1947 年 9 月 19 日自 5 月 15 日通过川省清查粮食粮款委员会组织章程后，全川清查粮食粮款工作告一段落。粮食部四川清粮督导团主任王思诚谈：各县清粮工作，已有 2/3 以上县份汇计到蓉，本月底可望全部汇齐。根据最近统计，川省历年官商亏挪粮谷共有 900 万市石以上。其中乡镇长亏拉约占 50%，加工及承运包商亏欠约占 25%，各县府田粮处挪移及虚报约占 25%。挪移作公用之粮谷可以抵案，其余亏拉亏欠一律严限追收。目前拘捕及押追之各级亏粮官员已有数百人，估计今年至少可以追回粮谷 100 万石。又据 1949 年 3 月 4 日四川省清查粮食粮款委员会函省参议会，查明全省各县自民国 30～34 年度在征实征购中，官商中饱，亏欠粮谷共 500 万石。

《西方日报》创刊

1947 年 10 月 10 日《西方日报》在成都创刊，日出对开报纸一张，董事长刘元瑄，社长兼总主笔杨露，总编辑陈落，副总编辑张先畴。这张报纸是在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及其侄刘元瑄（二十四军代军长）的支持下创办

的。刘文辉提出报纸"中间偏左"的方针。编辑部主要成员政治倾向一致，约有一半是中共党员和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协"成员。报纸在政治上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军事上揭露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真象，激励国统区人民的斗争热情；在经济上揭穿国民党经济措施的骗局，指出其不利于人民群众的实质；为人民群众，尤其是公教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起码生活权利呼吁，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1949 年 4 月 22 日该报被迫停刊。

物价飞腾，中央银行发行大钞

1947 年 11 月，四川物价如野马奔腾，各地拒用小钞，纠纷事件随处可见。成都因小钞清点不便，只好称重量计算；安县小钞成捆，无人接收；泸县税捐处近日所收小钞 2000 余万元，每天只能数 6 万元，1 年也清点不完；中坝因拒用小钞发生斗殴，日必数起；金堂淮口商业清淡，柜台上的小钞都堆积如山；万县、开江焚毁小钞，大火历时各两天。12 月 10 日，重庆中央银行发行 1000 元、2000 元面额关金券，每张各相当于法币 2 万元、4 万元。

中共川东临时工委成立

1947 年 10 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到上海汇报工作返渝后，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的指示，成立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王璞，副书记涂孝文。王璞在临工委会上传达钱瑛的指示：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在农村武装斗争中，多搞小型游击队，一般不搞打旗号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加强城市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川东临工委成立后，重庆市委改组为重庆市工委；建立上川东地工委，驻广安；建立下川东地工委，驻万县；川南地工委驻泸州。1948 年 4 月，建立南（川）、涪（陵）工委，驻南川。此后，重庆和川东地区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县委、工委和特支。各地区、各系统的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许多在抗战中失掉党的关系的党员，与党重新取得了联系，一大批在民主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川东临时工委部署武装斗争

1947 年 11 月，中共川东临时工委部署武装斗争工作。委派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从重庆带一批干部前往下川东，部署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的武装斗争；派邓照明为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加强梁（山）、达（县）、大（竹）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派出一批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华蓥山区，与当地党组织配合，准备武装斗争。同时，通知川东各地党组织积极做好发动武装斗争和支援策应的准

备。

省府编制本年度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与薪津调整数

1947年12月29日，四川省政府编制本年度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与薪津调整数。据四川省政府统计处报告，川省公务员生活费指数的编制，系自1941年10月开始，依照行政院令颁布的各省重要市县公务员生活费指数查编办法的规定，在全川分18个区域，计成都、自贡两市，及16个专员公署所在县，每区各编一指数。编制指数所用的物价，系由各县市政府，各地邮局及各地方法院三机关，每月1日、11日及21日分别调查各地物价，每月21日以后，由统计处根据各调查查报的各旬物价表，计算汇编指数，当月报告国民政府主计处。此种生活费指数所采用物品种类及权数如下：计米2市斗，面粉2.5市斤，猪肉5市斤，猪油1.5市斤，鸡蛋9个，盐0.8市斤，糖0.5市斤，酱油1.5市斤，豆腐10市斤，蔬菜20市斤，阴丹布1市尺，白土布1市尺，冲哔叽1市尺，呢鞋0.5双，皮鞋0.05双，线袜0.5双，房租0.5平方丈，煤90市斤或柴70市斤，菜油1.5市斤，水12挑，肥皂0.5块，毛巾0.3条，牙膏0.3支，茶叶0.1市斤，人力车资30公里，沐浴2次，理发2次，洗衣12套，医药教育文化娱乐及其他杂费等，以前项总消费值加15%计算。由上列各项物品的权数，乘各月平均价格的总和，即得个人该月份的标准生活费用。再以基期消费值除之，即得各该月份的生活指数。据该处指出，自民国30年10月起，该处均按年逐月编成指数，截至民国36年12月止，成都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为79007621　即比民国30年10月增加790076倍。

成渝国家行局奉令停止对外贷款

1947年12月，成渝国家行局奉令停止对外贷款。3日，重庆为平抑物价抽紧银根，国家行局奉令对外贷款一律暂停。仅粮食，食盐，棉花贷款可专案办理。出口业可做押汇。20日，川省参议会通过临时紧急动议，电请中央立即撤销要省、市、县银行停止放款的禁令。30日，年底大关，成都国家行局和省银行以政府通令现为停止放款期间，对工商业的贷款要求一概拒绝。1948年1月10日，成都《工商导报》发表社论《立即开放贷款》，认为：为控制大钞发行后物价暴涨的局面，四联总处停止国家行局及省、市、县银行的各种贷款，作为抽紧银根的手段。但办法公布一个月来的事实说明，不贷款只是使正当工商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而投机市场仍照常活动，物价上涨更猛烈。经济决策者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掩饰错误而不立即开放贷款。1月23日，财政部订定《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

法》计16条，转各银行、钱庄遵照执行，重新开放贷款。

成都发生"官箴予事件"

1947年12月30日，成都市参议员官箴予因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论，遭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川大、华大、华西协中、协进中学等大中学校学生闻讯，群情激愤，3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强烈要求当局释放官箴予，并成立了"保障人权大会"。游行学生得知报纸报导不实，诬称官箴予与中共地下党密谋扰乱社会治安，忿而捣毁了中央社成都分社、《中兴日报》、《成都快报》。游行队伍又进入省政府请愿，要求放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官箴予。

1948年(民国37年)

"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发动武装起义

1948年1月8日，根据中共川东临工委的指示，成立"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司令员赵唯，政委彭咏梧，下属奉大巫支队、巴北支队、七南支队，后来成立开县支队。奉大巫支队首先在云阳南溪和巫溪西宁同时举行起义，两支起义队伍集中后，遭敌重兵围剿。1月16日，彭咏梧率部转移突围牺牲。其余几个支队也先后分别在云阳、奉节、开县以及湖北利川境内进行了几次战斗，并取得了一定战果。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武装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做群众工作。1月17日，上川东工委开会决定扩大武装，加紧巩固梁山、达县、大竹边境的虎南、南岳、大树地区，以及开县境内的游击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从2月2日开始，敌人分兵对以上游击区进行围剿，经过1个多月的迂迴作战，游击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分别撤离。2月13日，川东临工委在重庆举行会议。王璞传达从川康特委转来的钱瑛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攻心，强化敌人的危机感；发展农村两面政权。会议分析了局势，总结了奉大巫起义失败和梁达地区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暂不发动全面起义，而着重于准备工作。

省务会议通过1948年上半年财政收支计划

1948年1月9日，川省省务会议通过本省民国37年上半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岁入岁出各为9743.44015亿元。岁入部分包括：①税课收入330.9亿元；②工程受益经费收入621.5万

元；③罚款1000余万元；④财产子息收入1490余万元；⑤财物售价收4300余万元；⑥补助收入9365亿元；⑦协助收入28.3亿元。支出部分，包括：①政权行使支出7.48亿元，②行政支出297.5亿元；③教育文化支出300余亿元；④经济建设支出6098.5亿元；⑤生活补助费支出2472.8亿元。

省府通令各市县实施粮食管制

1948年1月10日，川省府为稳定全川粮价，通令各县市切实施行粮食管制。①各县市局本年新增暨原存部分积谷，务须全部保存。至县市局应得公粮，须保留2/5，备作调节民食所需，不得移作别用。②严厉查禁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由各县市政府、田粮处协同党团暨地方民意机关团体切实检举，并奖励密告。如查获未领部颁营业执照而购囤粮食者，即照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从严治罪。其系粮商购运粮米，亦应由县市政府随时登记查考，有囤积不售者亦按违反粮食管理治罪。③必要时照本府民国34年3月颁行本省各县市督售大户余粮办法，切实登记大户余粮，由县市政府规定并派员监视，分期出售，以资调剂。④划定粮食交易市场，派员管理，严禁仓飞、赌期及一切非法买卖。⑤健全粮食业公会，继续彻底登记粮商，积极辅导，并妥为保护其合法经营。⑥尽力疏导粮源，严督所属治安机关及乡镇保甲人员保护运道，使粮食转运灵活。⑦严禁阻运，除有大批粮食运出长江口外须经粮食部核准给证外，应准自由流通，以利供求。⑧遵照粮食部民国36年4月颁行粮食押汇原则暨实施办法，办理粮食储押，使粮食集中销区，稳定粮价。⑨必要时须限制住户购储食粮数量，按人口多少，以足够下年秋收以前为度。并实行机关团体学校食米代购办法，以免刺激粮价。⑩积极改良农作物，促进粮食增产，厉行粮食节约消费，严禁以稻谷、玉米、小麦等食粮酿酒制糖。

川康盐务局调整盐价

1948年1月13日，川康盐务管理局调整盐价。渝仓价花盐每担70万元，巴盐每担82万元。

粮价飞涨，省府决定供应公教人员平价米

1948年2月1日，粮价飞涨，学潮起伏，川省参议会鉴于学潮起伏的原因在于各校师生生活不安定所致，特建议省府供应全川公私立学校公粮，按月发给教师1市石，学生2.5市斗，按市价5折计算。2日，公教人员供应食米事经省务会议通过，即日开始实行。省府职员每人按月可领食米5双斗，工役可领2双斗。

全省裁减公教人员的员额

1948年2月21日，四川省政府决定：现有公教人员13312人，连同中央复员转业人员计算，已达15400余人，根据行政院指示减为8550人，势必造成严重失业问题；上半年内暂不裁减，超过人员由各部门拟定办法上报。因超员后工薪不能按月足额支付，3月25日，成都各学校举行罢课，要求教职员月薪均10成支给。经省政府补拨10亿元后，始行复课。

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暴涨

1948年3～8月，通货膨胀日益严重。3月5日，四川各地粮价飞涨，成都双市石售310万元，重庆上熟山米每市石突破300万元大关，逼近400万元。3月20日，成都、眉山、仁寿、彭山、华阳交界处，均曾发生抢米事件。6月4日，成都米价每双市石已突破1400万元，人心不安。6月15日，重庆物价激涨，黑市黄金突破9000万元大关；20支飞艇棉纱，上升至每包3.06亿元。6月17日，发生抢米风潮。7月18日，重庆物价：河米每市石1100万元，零售山熟米每市石1700余万元；小麦680余万元，"绿飞艇"纱每包12亿元。飞机票价渝沪空中霸王号2.7亿元，渝蓉4500万元；长江干线轮船客货运价，自17日起，一律增加110%。8月4日，公布7月份公教人员生活指数，成都重庆区列为95万倍，川黔列为90万倍；7月份物价指数：趸售总指数为1928324倍；分类指数以衣著类为最高，1636470倍；食物类为最低1220393倍。8月8日，重庆自来水加价，每担由4万元调整为8万元，加上力资平均每担在20万元左右。8月19日，法币因通货恶性膨胀而崩溃，国民政府以金元券收兑法币，其比例为金元券1元兑换法币300万元。8月20日，重庆市场陷于混乱，停止交易。黑市黄金，卖价55亿元（厂条），买价50亿元，银元580万元；纱布仅有抵帐交易；上熟山米涨至2400万/石，大美亭阳丹布2亿元/尺，学生兰布1.77元/尺；金融贴水率高达23%。成都市场，黄金石条涨为44亿；银元由19日的245万元涨至480万元，棉纱每件19日13亿元，20日上涨到16亿元；米双市石由19日3100万元上涨到5200万元，菜油（老秤百斤）由19日3850万元上涨为5800万元；每千元支票兑现仅700元，贴水率为30%。

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川康地下党组织

1948年至1949年，由于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暴露，国民党特务机关以此为突破口，接连破坏了中共川康地区地下党组织。

1948年2月9日，国民政府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收到一封内装《挺进

报》的亲启信，十分恼怒，下令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组织了273个特工小组在重庆市及上下川东20余县进行搜索。4月1日，抓捕了重庆市中共地下秘密联络点“文城出版社”负责人任达哉，任供出其领导人、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4月4日，抓捕了许建业。接着，又抓捕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和《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捣毁了《挺进报》社。刘、冉在特务威逼下叛变，出卖了川东临时工委、重庆市委及川康特委主要干部及所属组织，致使上下川东各县县委书记和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捕，共产党员王朴、刘国志、杨虞裳、成善谋、江竹筠等108人相继被捕。1949年1月，徐远举委任刘国定为组长、军统渝组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组成“川西特侦组”到成都抓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正在与蒲接头的川康特委委员华健，荣（县）威（远）地下党负责人韩秉炀。蒲在被捕当天，供出川康特委领导成员和所属组织及党员以及一些上层统战关系，使协进中学校长傅茂青夫妇、川西特委军委负责人韩子重、负责交通的秘密党员王文鼎以及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夫妇等17人被捕，温江、大邑、三台等县地下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

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改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1948年4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免去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原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同年3月20日，蒋介石电召邓锡侯前往南京述职。蒋介石斥责邓锡侯处理学潮软弱无力，下兵征粮未取得预期成效，迫使邓锡侯引咎辞职。28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邓锡侯辞职照准，遗职调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接替”的消息。消息传到成都后，邓部军人鼓动省、市参议会、总工会分别电请蒋介石、张群收回成命，要求邓锡侯留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为此，行政院于4月3日正式下达任免命令。

邓锡侯卸职后，由国民政府任命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令其移驻川陕边区，邓坚不受命，蒋只好收回成命，改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成都发生“四·九血案”

1948年4月9日，成都发生了镇压学生的“四·九血案”。中共成都市委决定是日通过民协组织成都学生游行请愿，要王陵基给学生配发平价米，并发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当成都大中学生三四千人上街游行到省政府请愿时，王陵基下令镇压，当场捕去学生132人，伤200余人。事后，各校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四·九血案后援会”。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及一些中学宣布罢课，抗议国民党的暴行。成都各界和

省内外许多学校纷纷声援成都学生的斗争。在广泛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加之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迫使反动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这次学生运动，促进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发展。

川北大量流通硬币

1948年4月25日，纸币不断贬值，硬币进入流通。当日报载：川北三台金堂一带大量流通硬币，每1银元折合法币40万元；大铜元每枚值法币1万元，米每升铜元5个，茶每碗小制钱2文，其余物价比照折合。省府据报后电令制止。

五通桥钻出石油井

1948年5月23日，川省建设厅消息：永利化学公司川厂在五通桥杨柳湾试凿深井成功，于10分钟内自井中吸出原油150加仑，以普通技术化验结果，计有73%为汽油，26%为重油，预计每日可产2万加仑。

理化地震

1948年5月25日15时11分21秒西康省理化县（理塘）7.3级地震，震中烈度10度。藏坝、德巫、汶洼一带山河崩裂、房屋倒塌，共伤亡军民千余人，鸡、犬、牛、羊死亡无数。全县灾民食宿无所，人心惶恐万状。康定葛坝与九龙县交界处倒塌房屋30余家，压死16人，伤二三十人（含九龙4人），损失牲畜、财物至巨。波及康定、越西、西昌等地。

此次地震余震一直延续到8月2日，前后共发生余震180余次。其中以7月19日、21日两次最为强烈，仅次于5月25日强震。此次地震中，先后伤亡1200余人。

重庆米价高昂，发生抢米风潮

1948年6月16日，重庆发生抢米风潮。6月16日下午6时，重庆抢米风潮开端于黄家垭口的嘉涪米号，而蔓延颇广。全城直至17日晨始告平息。被抢米厂米店70余家，失米7000余石。渝市米价连日不断上涨，升斗小民日食维艰。及16日更一日数涨，市价与牌价相去倍蓰。16日牌价猛提至449万元，而晨间市价已达600万元，傍晚若干店铺商提至850万元以上，更有高达1200万元者，市民感受威胁。傍晚嘉涪米号主客间因市价牌价之争导致抢米风潮。事件发生，警察局及保安队即前往出事地点维持秩序。17日9时，市府决议：(1)切实保护粮运，使船在中途及抵岸后，绝对安全。(2)予米店以合理的保障。(3)督导市场，务使米商尽量出售存米。(4)请重庆绥署出示，严禁同样事件再度发生。(5)已批准之本市3500亿元粮贷，即迅速向有关方面洽办贷款手续。(6)请绥署转令附近渝市的各产米区，实行

议价，并严格取缔粮食期货交易。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对重庆市粮商不遵政府议价致与购户发生冲突事件作如下紧急处置：(1)命令重庆市政府自17日起，饬令各米店依照粮食调节委员会所议定的官价出售，不得再有黑市。(2)命令警备司令部维持市区秩序，严惩乘机扰乱者。同日，重庆市长杨森发表谈话，诬蔑此次抢米事件为共产党操纵，截止17日上午止，已逮捕185人。

灌县都江电厂投产输电

1948年7月13日，四川五年建设计划重点项目之一的灌县都江电厂火电输蓉。自1947年7月动工，本年6月25日试电成功后，经停电整修机器，检视线路，7月12日起正式输电供应成都，装机容量2000千瓦。本日在灌县该厂举行开机典礼，由省主席王陵基主持。

发行"关金券"大钞，全川市场恐慌

1948年7月18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宣布：因物价上涨，现行钞票面额小，不敷流通，自本日起，发行大面额"关金券"4种：关金1万元券(合法币20万元)，关金2.5万元券(合法币50万元)，关金5万元券(合法币100万元)，关金25万元券(合法币500万元)。自上年12月10日发行10万元大钞到本日发行500万元(关金25万元券)大钞，法币面额陡增50倍。

新币"关金券"大钞出笼后，刺激物价狂涨，市场钞荒，不仅未能缓和，反而加剧。成都贴水率已高达30%，重庆更高达50%。28日，渝市各行庄票据交换额达529725亿余元。本日重庆绥署召开紧急会议，研讨钞荒对策。绥署主任朱绍良电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请于本周内空运关金25万元券合计5万亿到重庆，以缓解渝市钞荒。

省参议会通过本年度田赋征借数额及办法

1948年7月23日，四川省参议会通过本年度田赋征借数额及办法。6月23日，中央以军粮孔亟，决定四川本年征借加倍，计征900万市石，借900万市石。7月19日，省参议会本日特别审查会，决定征实900万市石，征借450万市石。23日，省参议会决定川省本年度田赋征实总额为1620万市石，计①田赋征实900万石；②征借450万市石；③省县公粮三成共270万市石；④另加文化教育补助公粮45万市石。省参议会通过本案后附有详细说明，谓时局艰难，政府需要与民生困难应两相兼顾，故作如上决定。至于征收积谷，因与优待谷混淆不清，由各县自行办理，省参议会不予讨论。文化教育补助公粮，系为补助省级公私立

中学学生而设，每一学生半年免费供应食米1双市石（共约4000余人）。已领公费学生，则按市价半价供应（约4000余人）。川省新闻记者、县立中学学生，则由各县自行设法筹措。8月12日，川省参议会决议本年内拨谷45万市石补助教育文化事业，由行政院驳回。8月21日，国民政府同意四川本年四赋征实900万市石，征借450万市石。

筹建四川第一座全机制白糖企业——资中糖厂

1948年7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改变四川糖业生产的落后面貌，与台湾糖业公司协议，成立“四川省糖厂筹备处”，资源委员会以资中县银山镇资川酒精厂的全部资产作投资，台湾糖业公司以苗栗糖厂未用的日榨甘蔗250吨的机制糖设备（包括压榨、清净、煮糖等设备）作投资，共同筹建全机制白糖厂。1949年全部设备运到四川，同年12月成立四川糖业有限公司，该司将所属资川酒精厂与四川省糖厂筹备处合并，改名为“资中糖厂”（现名银山糖厂）。不久即解放，该厂尚未建成，但为四川提供了第一套全机制白糖的技术装备。

华蓥山地区武装起义

1948年7月，中共川东临工委书记王璞在岳池罗渡开会时，鉴于敌特对党组织的加紧侦破，形势异常危急，遂决定将原计划在第四季度发动的华蓥山地区武装起义提前举行，并决定成立“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从8月10日至9月20日，先后在广安戴市和观音阁、武胜三溪、岳池伏龙、合川金子沱、武胜真静、渠县龙潭等地举行6次大的武装起义，参加起义队伍共2000多人，分别宣布成立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七、八、三、四、六支队。华蓥山武装起义，震动全川。国民党重庆行辕和四川省政府立即调重兵围剿，省主席王陵基亲赴战地巡视督战。由于寡不敌众，华蓥山起义相继受挫失败。中共川东临工委书记王璞及各支队一些主要干部先后牺牲，突围部队中的多数人员大都隐蔽和转移，少数被捕。华蓥山起义失败后，在起义地区的大竹、广安、邻水、岳池等地，还保留下来几支小型武工队，继续开展以自卫为主的游击活动。11月，川东临工委领导成员邓照明与肖泽宽接头后交换了情况，总结了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农村不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队，也不大量发展党员，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

川西、川南地区遭受风灾、水灾

1948年7、8、9月，富顺、青神、西昌、沐川等县遭受严重风灾、水灾，损失惨重。

当年8、9月，富顺遭受两次水灾。8月，富顺由于暴风雨袭击，沱江洪水上涨，沿江房屋多被冲溃，受灾地区以黄角、牛佛、琵杜等乡为重，横溪、溪临两乡全场复没。9月，沱江洪水继续上涨，滨江住户开始第三次搬迁。小南门沙堆冲去大半，一片汪洋。富顺两月内连遭水灾3次，受灾区域几遍全县，成千灾民无家可归。

同年，青神遭受大水灾，损失极为惨重。先是连日淫雨不断，导致山洪暴发，沿思濛河流入县内。莲花场首当其冲，全场被冲去；汉阳、罗波、瑞峰、南附等乡亦遭大水冲击，人畜损失无数。据统计，此次水灾被淹面积达120余保，田土13万亩，占全县耕地6/10强，被毁场镇有六七个之多，牲畜家禽随洪水漂没的不计其数。

7月，西昌遭受严重水灾。由于连日淫雨，安宁河水暴涨，德昌、米易等地居民房屋被水淹没，财产损失甚多。

8月，沐川县暴雨成灾。因岷江支流沐川河由南至北穿城而过，夏秋市区常因雨水成灾。8月31日，暴雨连续不断，市区的面食店、杂货店被淹，西街、南街、北街水深尺许，一片汪洋。南街冲毁房屋40余间，城外良田400余亩，土壤全被冲尽，剩下一片沙砾。死亡人口无法统计。

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各地发生镍币风潮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命令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包括《金元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其目的在于发行金元券，收回法币及东北流通券，以金元券收缴人民所有金、银、外币，登记控制本国人民的外汇资产，进行财政搜括。规定即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停止发行，限期兑换金元券。法币以300万元、东北流通券以30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发行金元券消息公布后，成、渝等地各行庄奉财政部令停业两天。较大的公司关门停业，主要日用品零售价格普遍上涨，人心惶惶。21日，成都市商会发出通告，自本月23日起一切收交，一律以金元券计算，各类商品价格由各业自行斟酌实际情况议定。25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发行的所有铜、镍辅币，不分年限和版次，一律按面额作金元券辅币通用。先前市面上仅值数千元法币的1枚半元镍合金币，身价一跃至数百倍。26日，重庆、成都发生镍币风潮。重庆市面出现大量旧镍币持有者抢购商品，有的商店拒不收受，有的虽用而故意抬高物价，纠纷迭起，市场一片混乱。成都散存民间的大量镍币，流向市内各商业区，人群涌进商店，不问货物贵贱，疯狂抢购，各店难以招架，纷纷提早关门，甚至各娱乐

场、饭馆都告客满，萧条已久的成都市场，突然变得异常“繁荣”。同日，成都市商会紧急通报制止以镍币抢购物资的4点办法，并由市府布告周知。9月2日，重庆市商会秋季大会决议，请政府收回镍币，彻查中央银行公告镍币行使的奉电时间、通报时间和泄漏镍币行使消息的情况。6日，行政院复电川省参议会，关于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经理杨孝慈延迟公布镍币通用消息，致市场紊乱，民间蒙受极大损失问题，已派主计长徐堪赴川查办。

金元券发行10多天后，重庆物价上涨40%。

川省实施物价管制

1948年9月川省实施物价管制。8月26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南京说：“最近中央颁布币制改革及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四川物价稍有波动，其原因系由于国家统一币制改革，而金银外汇与金元券的兑换比率，系照全国一般的标准所规定，实较西南各省市本月中旬的兑换价格为高，而一般物价又系比照战前水准伸算改定，故上涨情况难免。

9月4日，川省对物价管制，决定采取两项措施：①全面管制：全川各县市物价，一律压平至8月19日价格以内；②成都市场波动，由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局派人到各市场维持秩序，严禁高抬市价或藏货不售。

9月11日，川省府举行经济会议，决议组织全川经济管制委员会，王陵基兼主任委员，并分组办事。全川各重要城市，设督导员1人，协助县市政府管制物价。

行政院颁布《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通货膨胀加剧

1948年11月11日，行政院颁布《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计20条。发行总额由原规定以20亿元为限修改为以命令定之，每元法定含金量由原规定0.22219克修改为0.04443克。这个修正办法将金元券贬值80%。13日成都《工商导报》发表社论《论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认为《办法》的特点是：政府公开承认金元券贬值80%，把金元券的发行额提高4～5倍及长期继续收兑金银、外币。这虽可暂时弥补财政赤字，但人民却将遭受通货膨胀的痛苦。17日重庆《大公报》的社评说：“政府宣布币制改革还不满3个月，行政院即公布《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陡然将币值贬落80%，翁文灏改革币制，迫兑金、钞以膨胀金元券，逼出人民的血汗储蓄，硬性限价，造成抢购巨潮，毁了工商业。目前的经济局势已危如累卵，而膨胀的洪流滔滔未已。”

川盐加价

1948年11月19日通货膨胀中川盐加价。川康盐务局本日通告食盐

加价200%，花盐每百斤168元，巴盐每百斤167元。

川省工商金融实业倒闭成风

1948年12月，受通货膨胀影响，川省工商金融实业倒闭成风。12月15日，重庆拆息高涨，银根奇紧，商店倒闭达到高潮，上半个月已倒闭100家以上，今日比期，1天中倒了20家。同月，重庆保险业也因受限制物价、子金高涨、工商萧条、货运减少的影响，以致业务清淡，宣告停业或业务陷于停顿的已达10余家。1949年初，宜宾中原纸厂、乐山嘉乐纸厂因金元券不断贬值，物价高涨，停止生产，职工失业。成都工厂百余家因无钱买煤停工。重庆机器业150余家，停产者60余家。自贡、犍乐盐场存盐堆积，井灶户无法生产，20余万盐工生活濒于绝境。

1949年(民国38年)

中共川东特委成立和工作重点的转变

1949年1月，由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江北广大地区，全国胜利在望；国民党政府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西南地区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战略要地；中共上海局决定成立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副书记邓照明。邓照明从香港返渝后即与肖泽宽碰头，传达上海局指示：全国解放在望，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重点必须从农村向城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发动群众保护城市、工厂和学校，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川东特委成立后，陆续派出干部到党组织被破坏的地区清理和恢复组织。此时川东地区除原来未受破坏的组织外，没有建立新的集体领导机构，大多实行单线联系。7月，川东特委临时负责人在重庆开会。会议根据”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讨论了加强统战、策反和护厂护校以及营救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政治犯等项工作。会议还决定进行组织调整。

戴傅贤在广州服毒自杀

1949年2月11日晚，国民党元老、国史馆馆长戴傅贤(季陶)在广州服毒自杀身亡。戴傅贤自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一直担任考试院长。1949年初，国内局势紧迫，戴处

于完全绝望的境地于2月11日晚在广州寓所服毒自杀，遗嘱要与生母黄木夫人合葬成都，以敬孝道。两日后，装棺飞运成都，暂停文殊院内，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并派居正来川主祭。戴傅贤遗体安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

全川“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斗争

1949年2月14日，由于物价飞涨，生活难以为继，重庆市国立院校教师罢教3日，要求改善待遇，重庆大、中学校学生立即声援。26日，重庆大学、中央工校、省立教育学院、女子师范学院等大中学校成立“师生员工争温饱委员会”，要求改善待遇，进行罢课绝食斗争。2月28日，国民政府调整公教人员待遇，规定成都区增薪35倍，而成都物价以去年8月19日金元券发行时为基数，物价平均高涨700倍，邮资平信已涨300倍。因此公教人员更加愤怒。据统计，按去年8月19日币改时为基数，四川本年2月份生活指数为450倍，公教人员待遇仅增35倍。

3月份，生活指数为3500倍，公教人员待遇只有105倍。3月13日，成都省立18所学校教职员全体请假，向四川省政府要求发放救济费，增发食米，按1948年8月19日资薪标准折发银元。14日，四川大学教师罢教，学生成立“尊师运动大会”，进行义卖、义演、宣传等活动，将收入作为尊师费用。17日，重庆学生4000余人举行请愿游行，27日，上万学生在重庆大学广场举行“活命营火晚会”，并成立“重庆学生争生存、争温饱联合会”。4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制造了镇压学生的“四·一惨案”。从4月2日起，成都、重庆学生为声援南京学生，掀起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斗争的高潮。省立各校尊师大会在各报刊登启事，请求社会各方援助老师的正义斗争。4月2日，重庆省立8所院校教工代表大会声援成都教师的正义斗争。4月5日，成都华西协和中学师生举行罢课营火晚会，会后游行到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住宅，高呼“反饥饿、反迫害”，“打倒王陵基”等口号。4月6日，川大教授全体请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重庆学生决定于4月21日举行全市抗议示威游行，报名参加游行的大中学校和学生，分别占全市总数的1/3和80%以上。自贡等地的学校师生，也开展了“反饥饿”斗争。对于波及全川的“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斗争。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慌。4月底，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布《紧急维持治安》10条“杀令”，4月20日，王陵基下令逮捕四川大学等学校的师生。中共重庆党组织采用了灵活的策略，以各校学生分别就地游行，取代原定的全市学抗议游行，结束了这场斗争。中共成都党组织则有计划地将各校的中共党员和外围

组织成员，接送到川西、川南各县，参加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

朝令暮改的币制改革与全省性金融风潮

1949年2月，朝令暮改的币制改革导致全省性的金融投机风潮。自去年"8·19"币制改革以来的6个月内，国民政府的经济措施已变更了4次：第1次是去年11月1日放弃限价政策，实行自由交易；第2次是11月12日，将金、银、外币国有转变为准许人民持有，并办理金、银存兑；第3次是12月16日，金、银停止存兑，另发行黄金公债；第4次是今年2月24日，财政金融改革案的公布。朝令暮改的币制改革，导致全省性的金融投机风潮。1月30日，成都新市场一带的金银黑市交易，从早到晚热闹异常，省会警察局派武警数十名前往弹压，并捕银元贩20余人。11日，川省府令各县，对买卖金、银、外币，高价买卖银币，严加取缔，依法究办。2月12日，重庆警备部巡查组上午突击检查米亭子银元市场，没收银元300余枚，捕12人回部讯办。但下午该银市又人如潮涌，银元涨价，袁头1700元，孙头1400元，川版1200元。一度销声匿迹的镍币，又东山再起。成都及附近的投机者，大量收购镍币，汹涌之势不亚于金元券初发时的镍潮。警局出动武装弹压，并拘捕买卖银元、镍币的商贩25名，但镍币交易并未终止。

重庆绥署、四川省府实施管制金融、平抑物价办法

1949年2月14日，重庆绥靖公署以近日物价波动，经决定原则4项，分电川滇两省府及渝市政府，克日召集各该地国家银行及银钱各业公会商决办法实施，以期稳定物价。该原则为：①凡行庄运现入境，由海关及特定人员检查，限令送交国行进帐审核用途，继续支付。私人携带，由各行自行斟酌限制数量，超额仍饬存国行，查明正当用途支付；②饬各行庄严格审查信用放款，制止滥发保付支票，各行局并停止同业买汇；③调节食粮；④严禁金银买卖。至棉纱交易限于现货，严禁期货及投机交易。

行政院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案》

1949年2月24日行政院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案》。随着金元券破产，国民政府在广州通过《财政金融改革方案》，规定以银元、"关元"为军费开支和关税征收的计算标准单位，部分货物税和盐税改收实物。黄金、白银准许人民买卖；银元准许流通、买卖；外币仍禁止流通；金、银、银元、外币非经财政部特许不得运送出国，运入国境的除中央银行外应征进口税，但出入国境的旅客携带金饰总量不超过2市两、银饰不超过20市两、外币总值不

超过美金500元的，不在此限。

中央银行发行大面额金元券

1949年3月1日，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公告：发行面额500元、1000元的金元券。3月，在大钞影响下，成都市面掀起空前涨风。两天内黄金每两达15.4万元，上涨40%；川版银元每枚900元，上涨20%；棉纱每包37.8万元，上涨40%；百货上涨30%以上；匹头上涨10%～20%；食米、食糖及其它货品各上涨5%。21日，重庆中央银行发行面额1万元的定额本票，成都中央银行漏夜赶制面额5万元的定额本票。又赶制2000元、5000元、20000元的金元券。4月1日再发行5万及10万元的定额本票，物价疯狂上涨。成都米价每斗金元券2万元，银元每元换金元券2.3万元。4月16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增发10万、20万、50万、100万元的定额本票，以后增发到面额1000万元的本票。

各地开放黄金、白银市场，金价猛涨

1949年3～5月，自2月24日行政院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后，3月3日，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联合布告，在中山公园（今文化宫）恢复银元市场。乐山也在白宫花园恢复了金、银和银元公开交易。4月12日，成都币券兑换市场在安乐寺开幕。市内1000多家兑换店同时开业。除光、烂、哑及含银量不足的银币暂不兑换外，其余不分版面、种类，一律兑换流通行使。在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已渡长江的影响下，重庆黄金连日猛涨，4月30日1天内，每两更由5700万元激涨至1.1亿元。5月14日，重庆便衣刑警在热闹的黄金市市场，逮捕黄金犯10余人。此后交易化整为零，秘密进行。两天内即由每两5.7亿元冲破10亿元大关。

封锁长江航线

1949年4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下令封销长江航线。民生、益通、华庆、合众、强华、实孚、华中等航业公司停滞沿长江各码头的轮船达90余艘，失业员工1万余人。四川进出口贸易以飞机作为运输工具，取道广州，以香港为市场。华南、鄂、湘、黔、陕、甘等地官僚、地主、商人和随军眷属纷纷入川，穗渝等航线班机拥挤，成、渝、万均告房荒。

钞荒严重，中央银行赶印空运巨额现钞

1949年5月，成都钞荒严重，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向中央银行索现的，终日不绝。但因南京、上海局势突变，总行拨现无着，只得电请广州分行拨济。5月10日，中央银行印刷厂恢

复渝厂，开始印钞，每日可出钞票50万张。先印50万元、10万元两种面额钞票。15日，中央银行由广州空运1万元面额现钞500亿元到成都，包机费却花去900多亿元。

省府转发省务会议管制金融临时办法，成渝两地取缔黄金市场

1949年5月，四川省政府转发省务会议管制金融临时办法，成渝两地取缔黄金市场。5月3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召集重庆市各有关机关负责人，研讨整饬金融问题，经决定办法5项：(①即日起严禁金银出境，凡航空旅客赴公署辖区以外者，每人携带黄金不得超过2两，银元不得超过20元。②中国行组织15个检查组，检查各商业行庄发行本票实况。③各商业行庄所发定额本票，限即日全数收回。④各商业行庄除依票据法规定，应顾客书面请求者外，一律停发保付月票，其已发者，如期收回。⑤所有非法金银市场，立即解散，并由市政府拟具金融市场管理办法呈核。此经济紧急措施的实行，使各行庄均具戒心，紧缩信用，致银根空前紧俏，日折息每千元高达420元，期款已无人愿意贷放。黄金市场解散后，仍有少数暗盘交易，价格惨落，由2.4亿元跌至8500万元，惟成交不多。银元市外交易，每100个价格亦由5.5亿元跌至3亿元。

5月5日，成都日来金银暴涨，激起各货直线上升，人心惊慌，省府决定根据西南长官公署管制金融办法，对成都金融与经济采取紧急措施。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会本日决议：①严禁金银出境，并禁止携带大量钞票入境；②禁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及保付支票；③严格管理金银市场；④中央银行收兑小额金元券。

5月9日，成都市府制定管理金融市场的3项办法：关于中山公园银元及铜、镍币掉换管制办法；关于金银器业公会紫罗兰茶社金市管制办法；关于取缔新商场的非法黄金交易办法。今起由军警宪负责执行。

同日，成都市银钱业公会理监联席会议议决：限制市区金银出境，金元券入境；严格取缔金银市场；各行庄签发本票，须经中央银行保付后始得流通；公用事业不得拒用金元券。

成渝金银价暴涨，商民弃纸钞用银元

1949年6月7日，成渝金银价暴涨，商民弃纸钞用银元。本日成都银元价早上每枚7.2亿元，中午即高达18亿元。据省会警察局侦查，上涨的原因是：留蓉的立、监委20余人，纷纷托人到中山公园抢购银元，平均每人购买100枚以上；成、渝两地1千万元面额本票同日出笼，刺激金、银上扬；各县商民纷纷拒收金元券，致金元券大多向成都集中，造成空前涨风。8日，重

庆市各公用事业今起全部以银元计算收费。同日，成都突然掀起一股隐伏已久的拒用金元券狂潮，商店为免遭收金元券的损失，相继关门。省府举行紧急会议，一面晓谕市民不得歧视金元券；一面要中央银行抛售银元，收兑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金元券。

征借公粮

1949年6月20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提出川省本年征实900万石，征借450万石，省县公粮270万石的征粮方案。省参议会一届八次大会决议通过征实900万石，征借280万石，县级公粮135万石，省级公粮并在征实数内开支。8月12日，行政院电令川省府，本年田赋征借，川省仍450万石配征，附加省级公粮135万石亦不容减少。省参议会一届八次大会的决议应作无效。川省府即照电令强迫配征。9月7日，省参议会举行临时大会，追认粮食征借450万市石。10月18日，省府电令各县田粮处，民训经费，亦须随粮附加。11月11日，国民政府加紧搜括粮食，限令四川本年度田赋如期征齐。

西南服务团组建

1949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江南各大中城市招募进步学生和青年，筹建西南服务团，为进军西南接管和建设服务。本月中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上海团、南京团、苏州团先后在上海、南京、无锡成立。7月20日，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筹组进军西南的会议上，确定二野三兵团和西南服务团领导干部陈锡联、谢富治、张霖之、曹荻秋、魏思文等组成重庆市和川东区（当时确定合署办公）的领导机构。以后，西南服务团随军解放大西南，在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成立

1949年6月，在“川西南人民武装委员会”和中共雅乐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并建立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9月，游击队伍在大邑等地深入发动群众，发动和组织了以刘文彩为主要斗争对象的有上万群众参加的武装减租斗争。11月下旬后，公开打出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旗帜，以公开和半公开的形式开展活动，并发表宣言，号召川康人民站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成整个大陆的全部解放。之后，游击纵队将主力向邛崃、大邑山区与平坝交界一线集结，首先打击“清剿”游击队的国民党军警和反动地主、乡团武装，占领部分乡镇，配合解放大军的进军。同时，游击纵队还在成都设“留蓉工作部”，担负游击队的后勤任务，参加统战策反工作。当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战役节节胜利之际，游击

纵队分别集中于名山、雅安、大邑、邛崃一带，堵截国民党军，直接俘虏敌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武装3000余件及一批军用物资。游击纵队发展到共有8个支队和2个直属大队，基干武装5000余人，活动范围达20余县，在配合解放成都战役、围歼和瓦解国民党残军、维护社会秩序、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宗仁发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办法"

1949年7月2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办法》。金元券自发行以来逐日急剧贬值，6月20日，银元1元牌价合金元券13亿元，折合法币3900万亿元。金元券崩溃。6月22日，行政院在广州宣布停止金元券的发行和流通。7月2日，代总统李宗仁以命令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币，发行兑换券，所有公私支付一律以银元为计算单位，各级政府税收及公营事业收费，应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银元券与金元券的兑换比率为1元换5亿元，限两个月内收回（按照牌价，人们兑换银元券每元要损失8亿元）。

四川发生第二次镍币风潮

1949年7月25日，成渝等地货币投机愈演愈烈。24日晚，重庆获悉镍币将增值行使的消息，抢购镍币的人潮汹涌，激起各地一片涨风。25日，重庆、成都两地中央银行公告：据财政部命令，原有各版镍币，照面值作银元辅币行使。一日之间，价值陡升10倍，镍币风潮又一次在全川各地掀起。重庆零售商生意特别兴隆，竞相提价。成都商场惟恐去年镍潮将再度重演，纷纷关门。全川各地市面混乱异常，商店暂停营业，市场一度陷入瘫痪。镍币风潮发生后，在成都，川省府紧急会议决定，晓渝市民仍照商会原定比率，按镍币面值的1/10行使，同时冻结24日的物价；在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下令，暂停执行镍币增值。财政部也电中央银行收回原令。波动的人心稍为平静，两大城市商店渐恢复营业。

成渝等地开铸银元

1949年7~8月，成渝等地开铸银元。金元券崩溃后，行政院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币。7月31日，中央造币厂委托重庆第21兵工厂正式开工铸造银元，每日可铸3万元。8月1日，成都造币厂复工，原有熔化炉、印花机多已损坏，日产银元仅1.2万枚。约经1月，全部修复后，日产达10万枚左右。但仍不敷市场周转。

川省拒用银元券，省府强制推行

1949年7月～10月，川省拒用银元券。自发行银元兑换券后，各地人民

恐重蹈金元券的复辙，拒用银元券。7月10日，重庆发行银元券后各物实行评价，屠商曾罢市反抗，其他各业大都将货物疏散，只以少量较劣的商品应市。7月14日，绵阳运到大量银元兑换券后，商民以无处兑换，恐被贬值，拒绝收受，纠纷迭起。康定中央银行因无硬币兑现，银元兑换券虽已运到，仍未发出。8月18日，重庆、成都拒用银元券，重庆西南长官公署派出军警查拿拒用的人民；成都市政府布告市民不得歧视银元券。24日，川省府令治安机关从严查禁歧视银元券。9月10日，川省府令成都银钱业，严禁拒收银元券。10月14日，泸州专署布告，对歧视银元券的判处死刑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川省各地普遍歧视银元券，或打折扣行使，或完全拒用。政府、军警则在各地强迫人民对银元券要与银元等值行使，致纠纷迭起，物价暴涨。商店不堪赔累，纷纷关门歇业，酿成银元券风潮。11月2日，西南长官公署派员在川省府召集军、政、商、学各界负责人开会，强迫推行银元券。3日，成都市派出军警拘捕银元券贴水商贩130余名。11日，成都市政府急电由广州迁回重庆的行政院，以蓉市银元券充斥，贴水已达40%，人心惶惑，要求成都中央银行大量抛售金银。18日，成都中央银行暂行冻结银元券发行，并按市商会镍币照面额1/10行使的比率，兑出库存镍币实值4000元，流通市面。

国民政府推行“二五减租”

1949年7～10月，为挽救失败的命运，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推行“二五减租”。7月30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公布辖区农地减租实施纲要，分饬辖区省市政府彻底执行。纲要为：①实惠农民；②主佃兼顾；③简切易行三原则；暂定减租标准为自民国38年度起，农地减租一律照约定租额或习惯租额减去25%（故称二五减租），以后不得增加。8月6日，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减租工作推行委员会。综计全省参加减租工作人员约9.6万人。所需经费，除省、县政府筹拨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协助银元29万元。

8月4日，西南长官公署政委员会土地处印制《农地减租宣传纲要》10万份，《为实施农地减租告民众书》100万份、《减租实施纲要》5万份，寄发辖区各县，以资宣传。西南各省市减租工作至此展开。四川推行“二五减租”遭到地主豪绅的抵制，有的先加押金后减租，有的明减暗不减，有的强迫收回土地，逼使佃户搬迁，纠纷迭起。到10月份，仅省法院即收到佃农控案达500余件。

省银行库存80万银元运往台湾

1949年8月，省银行存银运台湾。全国解放在即，川省主席王陵基奉

行政院长阎锡山令，将四川省银行库存80万银元，提交财政部长徐堪自成都运台湾，由川省府将积谷变卖数十万元，交付省银行作为补偿。

焚销法币、金元券、银元券

1949年8～12月，中央银行焚销法币、金元券、银元券。法币早已成废纸，8月19日，成都中央银行连日在东较场焚销，共烧2000余箱，计1.8万亿元，折合金元券60万元，再折合银元为一厘二毫。10月28～11月3日，中央银行成都分行派员在重庆溥泉纸浆公司监销金元券。共煮销金元券10余万亿元，净重23吨多。12月16日，成都收兑回的银元券223万余元，在中山公园当众烧毁。

重庆市"九·二"大火灾

1949年9月2日下午5时，重庆市下半城赣江街李清发油蜡铺用火不慎引起火灾。由于市政当局平时忽视消防建议，加之气候炎热，风助火势，火起后无力扑救，火灾迅速蔓延，水东门至朝天门、陕西街至千厮门一带燃成火海。大火持续18小时，次日早晨才熄灭，酿成巨灾。据重庆市警察局事后调查，烧毁街巷39条、学校7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座及粮食、棉花、布匹、食糖、汽油等大量物资，受灾9600多户，灾民4万多人，死伤近7000人，其中死亡2874人。损失极为惨重。

重庆"中美合作所"屠杀事件

1949年9~11月，国民党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大批屠杀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进行大屠杀。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和其子杨拯中及其秘书宋绮云等6人被枪杀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枪杀；11月14日，江竹筠、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11月27日，许晓轩、刘国志等近200人被杀害；11月29日，城区"新世界"临时看守所中的犯人被押到松林坡杀害。前后被杀害的近300人。

蒋介石制定破坏重庆计划

1949年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大西南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制定了破坏重庆的计划。11月21日，重庆解放在即，蒋介石从台湾调技术大队到渝执行破坏任务。特务头子毛人凤在重庆嘉陵新村召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破坏重点第10、20、21、23、24、27、30、31、50各兵工厂、大渡口钢铁厂、军械总库、大溪沟发电厂、长寿水电厂、小龙坎广播电台等。29日，蒋介石由渝逃成都时，武装特务炸毁江北刘

家台兵工厂，护厂工人及家属死伤84人，居民死伤2000余人。其他各兵工厂、发电厂由于工人积极进行护厂斗争，武装护厂，阻止了特务进行爆破，使工厂设备绝大部分得以保全。

重庆、成都等地护厂护校斗争

1949年9月，重庆、成都的中共组织分别传达了上级组织关于保存力量、保护城市和护厂护校等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并立即行动，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针对国民党当局以兵工厂和发电厂为重点进行破坏的行动计划，成都、重庆、自贡、泸州等地工人，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组成“护厂队”、“工人纠察队”等护厂组织，日夜站岗巡逻，坚持生产，防止敌人破坏。11月28日和29日，重庆国民党军警在蒋介厂的命令下，开始执行其破坏重庆重要工厂的计划。二十一兵工厂的工人，把敌强行堆放的炸药全部撤除，保护了工厂安全。大渡口钢铁厂的共产党员刘家彝、简国治和16位工人一起，在搬走敌人埋下的炸药时英勇牺牲。大溪沟电厂的工人武力阻止了敌人爆破队进厂。成都启明电气公司的工人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阻止了国民党胡宗南炸毁电厂计划的实施。各大中学校中共支部和外围组织“民协”、“新青”、“火星社”等，也在各校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护校队，保护学校和协助校方清理校产，对顺利接管学校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对四川市场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

本日成都物价：黄金每两（31.25克）90元，较上月5日（下同）上涨29.24%；棉纱每包623元，上涨29.8%；菜油每百斤（老称）12.9元，上涨17.3%；大米每石5.7元，下跌1%。

本日重庆物价：黄金每两（31.25克）92.5元，较上月5日（下同）上涨10.1%；棉纱每包550元，上涨2.8%；布（四君子哔叽）每匹37元，上涨23.3%；大米（山米）每石9元，上涨12.5%；小麦每石6.2元，上涨9.9%。

四行两局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重庆、成都，溃退台湾

1949年10月15日，四行两局由广州迁移重庆。人民解放军向广州发起进攻，10月12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广州移重庆办公。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相继由广州逃往重庆。15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中央信托、邮政储汇局及中央合作金库的总机构，随国民政府陆续由广州逃至重庆。11月28日，解放重庆迫在眉睫，中央银行等再随“总统府”和流动

内阁，由重庆逃至成都，立足未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进军中，仓惶向台湾溃散。

省府强募爱国公债

1949年10～11月，省府强募爱国公债。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爱国公债筹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民国38年爱国公债筹募办法，计划掠夺1500万银元。11月9日，四川省政府强募此项公债，全川总额扩大到银元6500万元，重庆摊募1500万元。但已难以付诸实施。

省府制定《金融紧急措施办法》，规定银元券兑换黄金限额

1949年11月14日，川省府制定《金融紧急措施办法》，规定自本日起银元券得以黄金兑现。办法规定每两黄金兑银元券120元，市民凭门牌或户主身份证，每户每次配兑银元2元；军人兑现仍照原办法及数额办理；机关、团体兑现，须严格审核兑给数量；扩大兑换点；邮包及飞机乘客寄递银元券的，追究来源，暂予冻结；不准利用职权包庇抢购等10项办法。12月8日，行政院令中央银行将现存黄金11500两及镍币，扫数拨交川省府，责成四川省银行参照成都黄金市价议定比率，收兑银元券。川省主席王陵基只拿出1000两兑换，吞没1.05万两。至15日，据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成都市收兑银元券今日截止。自10日开始收兑起，6天内只兑出黄金431两，兑收的银元券共223万余元，于16日在成都中山公园当众烧毁。

解放军进军四川

1949年11月1日，根据毛泽东主席进军西南的战略布署，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达了进军西南、解放四川的命令。以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开始向川黔守敌发起进攻。二野第三兵团和四野发起鄂西战役，对川湘鄂边的宋希濂集团军实施钳击战术。第五兵团和三兵团的第十军向贵州玉屏、天柱进击，迂回包围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于是，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玉屏的千里地域，解放军多路进军，从东南方向包抄川东南地区。第一野战军进至川陕交界处的秦岭一线，与二野配合，突破胡宗南川陕防线，由北向南，对川西北进行战略包围。

11月7日，解放军攻占鄂西的恩施、建始、川东秀山，宋希濂部西撤。11月8日，解放军进攻巫山地区，11月11日解放酉阳，12日解放黔江，重庆告急。蒋介石由台北飞抵重庆，急调胡宗南一部增援重庆。国防部任命郭汝栋（七十二军军长）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督促王克俊二十一军（驻乐山）、陈春霖四十四军（由赤水退向泸州）、七十二军和陈宏模、艾绍恒等三个独立

师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沿长江沱江布防，阻挡解放军渡江。

11月15日，解放军攻占贵阳，蒋经国代表其父赴川东南劳军，向宋希濂、陈克非（二十兵团司令）传达固守乌江的命令。11月16日，解放军攻占彭水、重庆卫戍司令部动员各区县组织“反共保民军”，40万人以上县份成立一师。王陵基将“安川计划”呈蒋，决定成立“反共救国军”50万。蒋介石在官邸召见张群、王陵基、顾祝同，商讨云南事态和川东作战计划。

11月19日，解放军攻占石柱。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四川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停止抵抗，投向光明的四点忠告。同时命令第五兵团先攻占叙永、盐津一线，切断敌经泸县、宜宾南逃云南之路；第三兵团牵制南川、綦江之敌，待第五兵团迂回预定位置后，会同作战。解放军在涪陵以南白涛镇，截歼西逃的国民党十四兵团余部，俘获兵团司令钟彬。同时解放遵义。

国民政府迁都成都，在渝各部、会职员，除留少数人外，均参军或遣散。蒋介石制定了破坏重庆的计划，破坏重点为：第10、21、25、30、31、50兵工厂、大渡口钢铁厂、军械总库、大溪沟发电厂、长寿水电厂、小龙坎广播电台等。重庆市参议会首届十二次大会通过“保卫大重庆”方案。重庆卫戍成就司令部任命喻孟群、许绍宗等为第一至第五路“反共保民军”总指挥。

11月22日，解放军攻占武隆县和江口镇。

11月23日，解放军在南川东部击溃宋希濂部主力，宋希濂率残部逃往川南。

行政院通过蒋介石、阎锡山拟定的“总体战”方案，划四川为四个作战区，实行军政一元化。川北作战区，由胡宗南负责；川东区由孙震负责；川中区由杨森负责；川西区由王陵基负责。

行政院通过“政府实行战斗体制办法”。宣布：“各部会厅本处理战事上所需之人员，编为行动内阁”人员共计126名，其余人员，或另安排工作，或发3个月薪饷停职。

11月24日，蒋介石电令罗广文“严责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25日，解放军攻占南川，罗广文15兵团崩溃。

1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将十八兵团划归二野建制，军委不再指示。解放军攻占綦江县，并在南川以北歼灭宋希濂、罗广文3万余人。解放军四十七军由涪陵北渡长江，向垫江推进迂回包围重庆。

11月28日，解放军进占南温泉、江津及其东部顺江场、鱼洞溪等地，形成对重庆的钳形包围。行政院长阎锡山、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由渝飞蓉。翌日，国府中央机关高级官员乘专机3架，由渝逃蓉。总统府驻北较场中央军

校，行政院驻商业街励志社，中央党部驻省党部，西南长官公署驻农改所。

11月29日，贺龙向十八兵团等部发出入川作战命令。蒋介石下达破坏重庆的命令，中共地下党领导重庆市民、工人护厂。除第一、二十一、二十九、五十兵工厂和刘家台炸药库重庆发电厂遭到破坏外，其余破坏计划均遭到失败。

海军江防舰艇永安号、郝家号在忠县江面起义。解放军一部由江津渡江，在铜梁驿击败陈鞠旅第一军的抵抗，向白市驿推进。下午蒋介石林园后面枪声大作，重庆兵工厂爆炸声四起。蒋乘车逃往白市驿，因沿途汽车拥挤，途中再三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夜宿中英号专机上。

重庆解放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当日凌晨，蒋介石由白市驿机场飞逃成都。解放军由李家沱、海棠溪、木洞镇强渡长江，解放重庆。同日午夜占领叙永县城。英山号等6艘海军舰艇在重庆江面起义。

当日，邮局中共党组织当即以全体职工名义，打电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消息。下午，川东地下党组织和重庆市各界代表过江与进军部队接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傍晚，人民解放军分数路进驻市区。当天，社会大学学生在“胜利记功碑”（即今解放碑）上升起了迎接解放的第一面红旗。12月初，人民解放军党组织与重庆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锡联为重庆市市长。

四川成立军政管理机关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锡联为重庆市市长，曹荻秋为副市长。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重庆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委员会”，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

12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

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泸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内江、自贡等地军事委员会成立。

12月31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命令：成都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阎秀峰任副主任。

成都十二桥大屠杀

1949年12月4～7日，国民党在成都十二桥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川西挺进，国民党统治集团行将在大陆覆灭之际，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执行，先后于12月4日和7日深夜，在抚琴台和十

二桥将监禁在国民党稽查处和四川省特委会的杨伯恺、于渊、王干青等35名革命者秘密杀害。

解放军进军川中各地

12月1日，解放军占领壁山，永川县起义。蒋介石由渝抵蓉，暂避中央银行歇息，旋与军校召开军政会议，策划“保卫”四川、西康。出席会议的有：顾祝同、张群、陈立夫、谷正纲、谷正鼎、秦德纯、胡宗南、邓锡侯、王缵绪、刘文辉等。

王陵基组织“反共救国自卫军”自兼司令，各行政区专员兼总指挥，各县县长兼司令。

12月2日，蒋介石在成都恢复总统职务，孙震奉命率川鄂边区绥署及所部由大竹向嘉陵江流域集结。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十八兵团加速南下，形成对胡宗南部的南北夹击。奉节、铜梁、合川、泸县解放。杨森奉命在遂宁、绵阳沿线布防。

12月4～5日，留蓉国大代表、立、监委50人，通过决议，请蒋介石复职。富顺、自贡、荣昌、江安、潼南、纳溪解放。

12月6日，第三、五兵团火速强占乐山、邛崃有利地形，荣县、内江、隆昌、云阳解放。海军“同心舰”在云阳江面起义。阎锡山在成都军校召开“总体战”执委会，讨论“保卫四川及反攻战略”。

12月7日，威远、资中、安岳、武胜、南溪、垫江、忠县、丰都解放。蒋介石决定：政府迁台北，在西南设大本营，指挥大陆作战。

12月8日，万县解放。国民党军政大员由成都飞往台湾。

川西大决战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成都进逼。蒋介石从重庆逃到成都后，即在北较场中央军校召见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王陵基等，策划了由胡宗南部担负主力，由国民党其他残部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各部密切配合的“川西大决战”，同时下令由顾祝同、钱大钧、萧毅肃等组成临时作战指挥部。

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命令第三、五兵团主力继续西进，占领乐山、大邑、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其他国民党残部退往云南的道路，会同由陕入川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等部，围歼胡宗南部和国民党其他残部于成都地区。

川西大决战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经营川西、西康、西昌等地区多年，占有地利优势；刘文辉等早就受到中共影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与四川地下党关系密切，对蒋介石退守川

康不利。12月初，中共中央在布置川西围歼战后，由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刘文辉等，要他们坚守西康、西昌，阻挡胡宗南退却之路。同时，蒋介石不断对刘文辉等施加压力，要他们倾全部兵力与胡宗南配合作战，他们采取一推二拖的办法，虚与委蛇。

12月7日，刘文辉、邓锡侯逃出已被蒋介石控制的成都，与潘文华在彭县会合。12月9日，正式通电起义。同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

刘文辉等川军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川西大决战的战略布署，同时堵死了胡宗南等部向康滇退却的去路，蒋介石重新调整人事，由顾祝同代替张群担任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杨森为副长官兼代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又委王缵绪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为第二路游击总司令，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余锦源、严啸虎为副司令，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

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往台北。12月11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由胡宗南统一指挥成都地区各部队。担负“确保成都”之战。

12月13日夜，胡宗南部向驻守成都武侯祠的刘文辉二十四军某团发动猛攻，该团坚守到凌晨，少部分突围，大部分牺牲。

12月14日，广元、井研解放。15日，简阳、仁寿解放，解放军在乐山以北抢渡岷江，向北推进。王陵基率7个保安团从邛崃、蒲江突围，向西康、雅安逃窜，二十四军分两路在洪雅、丹棱、邛崃一线阻击。

16日，乐山、青神、夹江、峨眉解放。顾祝同由成都飞逃台北。

17日，丹棱、眉山、彭山、洪雅、犍为解放，解放军攻占川陕要隘剑门关。

18日，剑阁、南江、青川解放。七十二军副军长兼自贡警备司令卿云灿率三百六十九师在乐山沙湾起义。杨森、孙震由成都飞逃台湾。

19日，蒲江、名山解放。解放军在大渡河畔沙坪场全歼宋希濂部，俘宋以下官兵3400余人。

20日，邛崃、大邑解放，解放军完全截断了胡宗南西去之路，对川西成都地区国民党军形成东南西三面合围之势。

21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对被包围的胡宗南等部发出最后警告，立即放下武器，否则全歼。同时，绵阳、巴中解放。王陵基败返成都，继逃名山，被俘后逃脱（后在江安擒获）。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41军军长张宣武、四十七军军长严翊等率部在什邡、金堂、广汉等地起义，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率部在大邑起义。

22日，罗江、江油解放。胡宗南在

新津第五兵团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李文、盛文、罗列、沈策、李振、周士瀛等出席，决定23日晚突围。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代主任喻孟群率所部二十军及独立师官兵在广汉起义。

23日，仪陇解放，联勤第四补给区司令曾庆集、第四十一补给区司令欧阳仪清、第七补给区运输司令熊志等率西南联勤80余单位在成都起义。胡宗南由成都飞海南岛榆林港。曾扩清、余锦源、王旭夫、杨超群等率"川康游击挺进军"在金堂被解放军击溃，曾等被捕。

24日，朱德总司令电令刘文辉等，嘉许其起义行动，并嘱服从解放军军纪，协助大军肃清残匪，建立革命秩序。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部在郫县起义。成都防区总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潜逃。被困于成都地区的胡宗南等部分兵三路向西康、西昌方向突围。

25日，刘、邓令十八兵团向成都及其川东地区推进，围歼向东北逃窜之敌，第七兵团司令的裴昌会在德阳孝泉镇起义。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三十军军长鲁崇义、九十军六十一师师长陈华率部在成都起义。一百二十七军军长赵子立率部在巴中起义。成都市市长冷董南为迎接解放，维护成都治安，约集各界成立"四川省会临时治安委员会"。西川人民保卫军正、副司令官郭勋祺、罗忠信发出通告，在解放军未入城前，暂行维持市区治安。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王缵绪在成都蜀一影院召开各人民团体会议，宣布"成都解放"，并派副司令曾庆集兼城防司令，维持临时治安。

26日，解放军解放新都、什邡，向广汉推进。解放军向被围胡宗南部发动全线攻势，黄昏时，司令官李文清降，李文以下5万余人投向解放军。

27日，成都解放，川西战役共歼敌(包括起义、投降)30余万人。

刘、邓、潘起义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第二十四军、九十五军及二三五师在彭县通电起义。同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所部在宜宾宣布起义。刘、邓、潘起义是中共长期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也是刘、邓、潘走向人民阵营的最终结果。起义使盘踞在川康地区的国民党残部受到了剧烈的震动，加速了其崩溃瓦解的速度。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复电对刘、邓、潘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恳切指示他们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5日"约法八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1月21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西康起义

1949年12月12日，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在雅安召开军政人员大会，举行起义仪式，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成立“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

西康省政府代主席、民政厅厅长张为炯在康定宣布全省起义。

在西康地区起义的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受到胡宗南空运到西昌的一个团和贺国光的围攻，二十四军副军长兼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率部移驻富林，继续抵抗胡宗南等军队的进攻。

成都解放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所部在成都隆重举行入城式，贺龙、李井泉率部胜利进入成都市区，受到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的代表及其他起义将领和各界人士、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31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李井泉。随即，南下党组织与成都地下党组织的党员以及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举行了会师大会。至此，中共成都地下党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水旱灾袭击全川，2000万人面临饥馑

1949年，水旱灾袭击四川108县，2000万人面临饥馑。据成都报纸记载：1949年四川遭春旱的县份，占全省十之六七，达65县局以上。川北、川南、川中各地，大部稻田龟裂，无法栽秧，广大农民无以维生。乐山等县的饥民，挖泥土、掘菜根、剥树皮充饥，大批饥民四出求食。屏山等地既遭春旱，5月20日又受空前雹灾，历时20分钟，所降雹弹，长若砖块，巨若碗碟，房屋倒塌，树木摧折，人畜死亡，无数禾苗被打死埋没。旱灾未了，水患又至。5～7月，长江、岷江、沱江、涪江相继暴涨，致使全川77县市局遭受洪水之灾，灾情仅次于1947年（当年被灾89县市）。重庆市5、6月两次遭受洪水袭击，塌房垮屋不断发生，人畜房舍冲毁不少。成都7月降雨量669毫米，不仅比近10年的7月份平均降雨量260.7毫米多408.3毫米，而且为最近10年的年平均降雨量1001.8毫米的3/5以上；春熙路等37条街道均被水淹，交通梗阻，商店关门；洪水将新东门大桥冲毁；许多街道水深数尺，可以行舟。本年全川报灾的，计142县市局，其中34县市既遭春旱，又受水灾，受灾地区超过全省的70%，灾民亦几占总人口的1/3。

四川人口耕地概况

1949年，四川人口总数为57300000人，耕地面积113882342亩，人均耕地面积1.99亩，人均粮食占有量530.78斤。

编后记

《四川省志·民国大事纪述》的编纂工作开始于1985年。中间由于人员变动、离退休等原因，影响了工作进度。1988年调整人员、落实职责、明确编纂方案和实施办法后，编纂工作走上正轨。

本书是在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由张学君担任主编，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本书编纂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将各阶段参加编纂工作的人员和完成任务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1985～1988年，为收集资料阶段。当时编纂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分头到图书馆、档案馆搜罗民国历史资料，先后抄录和复印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分工编写了少量编年大事记和部分大事资料长编。这段工作由任一民主持，参加工作的省志编委人员有张学君、张利源、胡力三、徐朝中、王勤、王长文等同志。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刘方健副教授提供了1912～1949年经济大事资料，四川省社科院李有明编审提供了1919～1926年政治大事资料，四川省文史馆提供了1927～1949年政治大事资料。

二、1988～1992年，为明确编纂体例，落实专家学者编写初稿的阶段。拟出《民国大事纪述编写要求》，并约请张学君、刘方健、徐振增、马宣伟、张莉红、邓寿明、黄友良、胡力三、王亚利等同志分工撰写初稿。这些同志先后完成了分工担负的初稿，1992年底初稿告竣。

三、1993～1994年，为加工初稿，增删内容，统一体例、文词，撰写前言后记，完成送审稿的阶段，本阶段任务由张学君完成。送审稿最后由本书责任总编秦宜雅编审审订。

四、1994～1995年，为本书审核定稿阶段。本书完成送审后，经审核委员会何郝炬、岳忠同志审阅，提出了不少重要修改意见，并建议集体会审。省志编委会根据领导建议，将书稿略加修改后，打印并分送审核委员会全体成员审阅，并于1995年

1月召开审稿会议。与会同志充分发表意见，指出了许多内容、结构和史实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增补遗漏条目的建议。编者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再次对书稿进行修订增删。于1995年5月完成修改工作。秦宜雅编审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认真修改了本书前言。

本书的编纂工作植根于60年代《四川通志》总卷第二组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上。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得到张秀熟老前辈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原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图书馆、档案馆、成都市社科所等单位和《四川省志》各分志编辑室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主编学识浅陋，本书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主编谨识

1994年9月20日